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20世纪后半期 中国史学史

下册

周一平　主编



目　　录

第五章　中国通史编纂

与西方不同，中国史学自古以来就重视通史的编纂。①在古代相继产生了纪传体通史著作《史记》、典志体通史著作《通典》、编年体通史著作《资治通鉴》和纪事本末体通史著作《通鉴纪事本末》等，对当时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与之相适应，中国古代史家还对通史编纂的实践进行了理论性的积极探讨，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史学的通史编纂遗产。20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进化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中国几代史学家为了探索中国历史的自身脉络和发展轨迹，不断进行中国通史的编纂与研究，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取得了与古代史学完全不同的新的重大进展，并在 20 世纪后半期完成了多部通史编纂。

一、通史编纂与史学发展

中国的通史编纂，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重要代表作品，这就是体裁不详的《世本》和编年体的《竹书纪年》。《世本》主要记述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列国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都城、制作等历史内容，一般认为，是中国纪传体史书的雏形。《竹书纪年》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一般认为是战国史家所作，但它在当时并没有流传于世，西晋时才因盗墓而从汲冢中出土，因为它与流传史书的记载多有不同，一面世即引起了很大震动，不但有多名史学家从事该书的整理工作，而且史

---

① 关于"通史"的概念，学者们的理解并不一致，一般认为即是指贯通性的历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或世界的从人类文明的最早出现到编写通史者当下的历史过程。按照杨翼骧的解说，完备意义的通史，应该达到三方面的标准：第一是时间通，从古至今；第二是地域通，记述所有可知地区的历史；第三是内容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等各方面的内容。见《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 页。由于中国古代史的时间范围很长，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独立发展，一些以"中国通史"为名的著作实际只记述了中国古代史，并没有完全做到"时间通"，但是学界一般也承认它们为通史著作。因此本书所用的"通史"一词，既包括含有上述三方面内容的中国通史类著作，也包括那些大致以"中国通史"为名但实际上只记述中国古代史的著作，但不包括各种以"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为名的断代通史性著作。

学家司马彪还用它的记载，纠正谯周《古史考》的错误122条，由此可见当时史学界对它的重视。此书在宋代已经散佚，但因它在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明清以来直到当代，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辑佚和校释，其中包括20世纪的史学大师之一王国维，可见其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之深远。

在前人的基础上，司马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纪传体通史著作《史记》，这是中国古代最杰出、影响最大的史学著作，此后，纪传体被历代皇朝定为"正史"，历代修史连续不断。

唐代通史著作出现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史学家杜佑所著的典志体通史著作《通典》。这是在司马迁、班固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内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不但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新体裁，而且直接启发了元初马端临撰著更加宏大的典志体通史著作《文献通考》，清朝时进而续修《通典》，以致形成以它为首的"十通"系列史书，从而完成了对整个中国古代史进行典志体通史撰述的完整系列。

北宋时期，史学兴盛，名家辈出，司马光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著作《资治通鉴》，使编年体史书重现辉煌。问世后，继作、仿作和改编接踵而出，促成了宋代撰写编年体当代史的高潮，以致元明清三朝一直续写不断。《资治通鉴》的另一影响，是由它而衍生出朱熹编写的纲目体通史著作《资治通鉴纲目》和袁枢撰写的纪事本末体通史著作《通鉴纪事本末》。对这两部不同体裁的史书，后世也是仿效、续补蜂拥而上，并因此也形成了这两种体裁的贯通古今的史书体系。

明代史家重视当代史的撰写，因而在严肃的学术层面上，通史成果不多，但明代史学的另一个特点，即历史著作的普及性潮流上，却以由《资治通鉴》、《通鉴纲目》衍生出的史书为代表的编年体通史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①]显示出了通史著作在向全社会普及史学知识方面的趋势。

清朝时，考据史学独盛，通史、断代史的写作都不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史家们从挽救民族危亡出发，撰写了大量和现实紧密相关的史学著作。19世纪末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著作和进化史观、民史观的传入，一些资产阶级化的中国史家，批评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是"君史"，提出以民史观重写中国通史，[②]从而唤起民众救国于危亡，用梁启超当时的话说，就是"史界革命不起，则吾

① 详见乔治忠：《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② 详见周一平：《论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形成》，《华东师大学报》1995年第5期。

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①]

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有重新编纂中国通史的想法，也都各自提出了编写原则和方法，但都没有完成，不过他们的理论影响了很多人，1904 年中国第一部新式中国通史问世，即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 年商务印书馆将之作为大学丛书之一出版，改题为《中国古代史》)，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章节体中国通史著作，开辟了中国史书编写的新路。

之后，中国史学家撰写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通史著作。据统计，在 1904 年以后的 20 世纪上半期，出版了 70 种各类型的中国通史著作，占整个 20 世纪中国通史出版量的一半还多；[②]而这一数量，又与同一历史时期中，中国古代、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版的各种断代史和近代史的通论性著作的数量总和大体持平。[③]显而易见，中国通史编纂已然构成了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而其中较有影响的通史著作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现在的不同版本也称《吕著中国通史》)、张荫麟《中国史纲》、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吴泽《中国通史简编》等，都在历史学自身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以至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 50 年中，其中很多著作都曾被重版重印或修订再版发行，为后世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全社会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史学的学科建设开始了新的道路，提高学术价值、科学价值，写出更加客观、科学的中国通史成了大陆史学界的重要目标，吕振羽和范文澜修订自己原来写作的通史著作，尚钺、翦伯赞和郭沫若等人也开始主持编撰通史著作，这些著作的编著和出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的健康发展，史学的学术研究也逐步走上了正轨，中国通史的编纂又提上了史学的发展日程，到 20 世纪末，不但编写了很多中国通史著

---

①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赵梅春：《20 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附表“20 世纪中国通史著作一览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关于 1904 年以后的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古代、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版的各种断代史和近代史的通论性著作，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0—1980　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统计的。

作，而且出版了几部多卷本、大部头的代表作品。虽然这些通史著作价值各一，评价者也是见仁见智，但每一部中国通史的完成都对当时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促动，这真切地说明了通史编纂对史学发展的重要作用。

总之，中国史学发展史已经表明，各时代的通史编纂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史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那些价值高、影响大的通史著作，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及之后的史学发展。因此，总结中国通史著作的编纂历程，也就具有重要的史学发展意义。

二、20 世纪后半期的通史编纂概况

1930 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诞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 1949 年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涌现出一批著名史学家，并写出了几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这就是吕振羽在 1941、1948 年先后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上、下册，范文澜在 1941、1942 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上、下册，翦伯赞在 1944—1946 年间出版的《中国史纲》第一、二册，吴泽在 1945 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这些著作的内容，都显然迥异于前此及同时代的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写出的通史著作，在全国显示了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的革新性。但由于当时国内革命环境的制约，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这段时期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史编纂的草创阶段，不论其理论体系还是编纂实践，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发展和大力完善。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唯物史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了和平建设时期的跨步前进。从 1949—2000 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历经了曲折和艰辛，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期间中国的通史编纂一步步走向深入，出版各种通史类著作七八十种，其中既有对旧作的修订再版，更有新著的不断涌现，既有通俗性通史著作和大专院校各类通史教材，也有专门的学术研究之作，既有以五种社会形态演进为中心编写出的中国通史著作，也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新的探索后，用新的具有中国自身发展特色的历史体系来撰写的通史著作，并从最初的一人撰写发展到集体编写，最后更出现几百位学者共撰一书的空前盛况，从各个层面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通史编纂的宏大规模。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通史编纂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7年(1949.10—1966.5)。

这一时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史学界主导地位,唯物史观成为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指导思想,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蔚然成风,并用他们的有关论断论述中国历史成为时尚。

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学术界很快对研究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论争。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关于农民战争及其历史作用问题、关于汉民族形成和民族关系问题,关于历史研究中如何对待古与今的关系问题、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问题等,[①]都直接涉及中国通史编纂的内容和观点,都在这一时期中出版的各种通史著作中有所反映,而这些著作的出版又反过来加强了史学界的讨论深度,从而促使这些通史编纂者们不断对通史编纂的理论进行思考,范文澜和翦伯赞还先后写出了自己关于如何编写中国通史的宏观性理论建构文章,这是本期通史编纂过程中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在中国通史著作编纂方面,本期成果不是很多,但大多出于名家之手,因而对以后史学的发展还是有着重大的影响。统而观之,主要有:

1. 首先是范文澜和吕振羽等人从1951年开始,对自己的通史旧作进行修订。范文澜在"文革"前完成了对《中国通史简编》前三编(共4册)的修订工作,具体情况下文有专节论述。吕振羽在1941年出版《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1948年完成第二分册,并与第一分册一起,合并一册出版,此后到1950年,一册本共出版印行7次。1951年,他对此书做了第一次增订,主要是资料订正和文字润色;1953年又做了补订;1954年他又对全书进行修订工作,于1955年出版第一次修订本;1959年时,他又出版了本书的第二次修订本。此后他还想继续修订,还想续写近代以来的历史,但十余年的政治运动,使他再也无力完成这些工作,因此1959年的修订就是他对本书所做的最后一次订正。

对1959年修订版的内容,吕振羽在当年4月15日写的《后记》中作了说明:第一,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上,增加了西周到战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和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作者认为他以前叙述得不够全面和明确,这次

① 详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第三编第二章第一节(蒋大椿撰写),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也可参见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第二、三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修订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第二,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对以前论述得太简单、材料不够有力的地方作了增补,进一步订正和阐述了这个问题;第三,在对古代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改变了以前"侵略"、"被侵略"、"反侵略"的提法,在一些理论原则上作了相当的补充,并增加了少数民族史的内容。这三个方面内容的增补,既增加了很多新材料,又完善了他的历史观点和通史体系。此外,这次修订对引文及关键性的问题,也都一一加以注释,以便利读者的检查。

此书在编纂体例上,打破了过去按照王朝世系或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笼统模糊的分期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学说,将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作者坚持西周封建说,认为西周是初级封建制社会,秦以后到清为专制主义封建制社会。

在内容上,此书摆脱了以政治为主线的传统窠臼,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为基础,阶级斗争为线索,贯彻以人民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统治阶级中的伟人和英雄给予适当评价;注意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科技等在历史总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综合作用;注意避免封建正统观念和大民族主义的影响,比较客观地描绘了各民族的贡献,揭示了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主题。

20世纪50—60年代初,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一样风行于世,但自1963年吕振羽被捕入狱后,其著作就不再出版,直到1982年10月才又重新出版,此时,吕振羽本人已去世两年余。吕氏通史,自1951年第一次增订,到1982年重新出版,共出版印行14次。①

还必须提一下吕振羽的另一部遗著。1961年,吕振羽曾为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第一班学员讲授历史课程,同年,他的讲义《中国历史讲稿》被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印行。此书共18讲,27万字,相对于他的《简明中国通史》来说,可谓更加简明扼要。全书理论性强,但做到了深入浅出,而且内容上重点突出,并不面面俱到,因此,《讲稿》也就"以更加明确而概括的形式,说明了他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独到见解",不仅是对《简明中国通史》的"通俗化、精练化",而且也有许多突出之点,"是他一生对中国通史研究的最后总结"。②这当然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更是研

① 据董润丽:《吕振羽藏书著述概览》,载王忍之等主编:《吕振羽研究文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② 刘茂林等:《吕振羽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86页;《中国历史讲稿》在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评传》对其有专节评述,但严格来说,《中国历史讲稿》只能算是通俗性历史著作。

究吕振羽史学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

在修订旧作的行列中，周谷城也是本期的一位突出代表。他的《中国通史》初版于1939年，从原始社会一直写到五四运动。为使中国通史完整，指出历史事实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他在《导言》中提出了"历史完形论"，重视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完整性，并始终将这一理论贯串全书，是一部自成体系、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通史著作，因此很受学界重视，一直流传于海内外。1955—1956年，全书由新知识出版社重新出版，压缩了大约20万字的篇幅，在"导论"中删去了"历史完形论"的有关论述，加上了"编著目的"，即提高对祖国的认识、培养爱国热情、巩固建设的信心、养成建设祖国的品质，其中大量引用毛泽东1939年12月以来的有关论述，鲜明表现了当时全国史学著述的风尚。

1957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谷城对此书的第一次修订本，其中，在上举四项"编著目的"中，在"祖国"二字前都加上了"社会主义"的定语；对一些章节的标题作了修改，重要者如第一篇第四章标题由原来的"阶级的社会"改为"等级的封建国"，第七章标题由原来的"由王国到帝国的演变之开始"改为"贵族奴隶主的没落"，第三篇第七章第四节标题由原来的"满族乘机侵入"改为"满族的入关"，第八章第三节标题由原来的"夺取郑成功之台湾根据地"改为"统一郑成功的台湾据地"，第四篇第一章标题由原来的"由英国之对外扩展到中英鸦片战争"改为"由英国的对外侵略到中英鸦片战争"，其下的第一节标题也作了相应修改；在内容上也作了修订，如全书结论部分在论述中国历史的转变时，删掉了原来的前两个内容（一九一九年的转折、十月革命的影响）。1957年以前，此书已印行14次，这次修订后也印行2次，不可不谓影响甚大。但1958年以后，此书遭到相当集中的批判，据学者考察，这"可能是遭到政治批判最为强烈的一部通史著作"。①

1981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第二次修订本，但修订范围较小，其中，正文每一篇之前加了一个简短提要，使读者能先得要领；在第一篇第一章论述中国古代史大势时，全部改写了关于古代史性质的说明文字；个别内容作了顺序上的前后调整，文字也向通俗易懂方面做了些修改，其他内容则基本未动，也正因此，此第二次修订版及此后的历次印刷，版权页都署为"1957年8月第1版"，但实际上已经是第二次修订版。

---

① 姜义华、武克全主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第二编第五节（王家范撰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周谷城认为:“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奴隶同奴隶主的阶级斗争过程。”①这个“古代史”,除了第一篇篇名“古代史”中首先叙述的夏朝以前的原始社会史的内容外,他专指的是从夏商以来一直到西汉末或新莽初期的历史,其主要内容,就横的方面说,中国古代史是由并立的诸族归并为统一帝国的归并过程,就纵的方面说,是奴隶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过程。这个时间区段的划分,是和其他所有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观点都不同的。作者把从新莽开始到五代末的历史时期列为第二篇,题为“中世前期”,认为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及各族间的战争。第三篇题为“中世后期”,时间是从宋初到鸦片战争,是封建社会持续时代,包括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种族斗争比前一时期更厉害,对外贸易则海上贸易几乎完全代替了陆路贸易。第四篇题为“近代史”,时间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已有了资本主义,但内部仍有封建势力的压迫,外部则有东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肆入侵,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在此双重压力下,进行激烈的斗争。全书即按照这个结构,脉络清晰地记述了从史前时代至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1982 年,此书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此后流行更广,“至今仍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必要参考书”。②

2. 本期中国通史著作编纂的第二个内容,是对早期旧作的补续完成,代表人物是邓之诚。他在 1933 年出版《中国通史讲义》,次年增加宋辽金夏元部分,改名《中华二千年史》,分上、中两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将此书修订,并补续完成明清部分(卷五),于 1956—1958 年全部出齐。相对于 1934 年出版的前四卷来说,作者本着时代较近、所述宜详的原则,对明清部分篇幅加倍,征引的史料也更多。全书五卷九册,逾 200 万字,始于秦朝统一,终于清朝灭亡。在编纂方法上,大体采用传统的纪事本末体裁,并兼采纲目体眉目清晰的特色,按照世系、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生计等专史内容区分事类,大字书写,然后按类撮录各种原始资料,用小字列于下方,进行讲述。其所取资料,首重正史,次及政书,然后是杂史和其他

---

①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权页署为“1957 年 8 月第 1 版,1999 年 10 月第 21 次印刷”,第 29 页。但这个版本实际上是第 1981 年第 2 次修订本。

② 黄敏兰:《20 世纪百年学案 · 历史学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5—147 页。周谷城《中国通史》在 1939 年出版后,邓广铭在 1942 年 9 月发表《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中国青年》第七卷二、三期合刊),认为周谷城在历史观点和历史解释、内容取材及行文方面存在一些疏误,检核周书修订版,邓广铭所指者并没有全部修正。

史料，但耳闻目睹的近人著述则不录。大量运用史表。在内容上，重视民族变迁和经济发展，认为二者对今后立国立人关系至大，因而对民族消长和经济盛衰用力尤多，记之独详；重视地理和官制的沿革演变；重视学术文化，以明学术之渊源、思想之变迁，亦以见时代递变、递进之迹。这些内容，在当时的通史著作中是很有自己特色的，因而出版时很受重视。但此书以大量直录史料原文为特色，其书在后世的流传不如本期其他通史著作。

3. 本期中国通史著作编纂的第三个内容，是出现了一些通俗性通史著作。这主要有叶蠖生在 1953—1954 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史话》（上、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袁农在 1953 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史话》（上海实习出版社），黎明在 1955 年出版的《通俗中国史话》（上、下册，通俗读物出版社），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在 1956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概要》（人民出版社），李光璧在 1958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通俗讲话》（通俗读物出版社），吴晗在 1963—1965 年主编的《中国历史常识》第 1—8 册（中国青年出版社）等。这些著作，主旨都在简要介绍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这对当时极度缺乏祖国历史知识的广大民众，起到了重要的普及作用，是历史与社会结合，直接为现实服务的一种表现。其中，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著的《中国历史概要》，从原始社会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五年，是第一部贯通中国古今的中国通史著作，但全书篇幅只有十万余字，分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三个部分加以介绍，这对一般读者来说，既系统、完整，又更加鲜明简要。1980 年，此书由知识出版社修订再版；2009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将其列为“北大大课堂”丛书之一，重新出版。

4. 本期中国通史著作编纂的第四个内容，是一部新编通史著作的出版和两部新编通史著作的开始编纂。这就是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在 1954 年 8 月出版；郭沫若在 1958 年开始主编《中国史稿》，最初目的是为干部编写，后来转成大学文科教材，计划从原始社会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62—1963 年，作为大学文科试用教材印行了第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二（战国、秦汉）、四册（从鸦片战争写到五四运动前夕）；翦伯赞在 1961 年开始主编《中国史纲要》，目的是为文科以外的大学科系编写教材，计划从原始社会写到五四运动前夕，1962—1966 年出版了该书记述东汉以后直至 1919 年五四运动这一历史阶段的第二、三、四册。以上三书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和翦伯赞的情况以下有专节论述，此处仅谈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

尚钺(1902—1982),原名宗武,字健庵。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追随鲁迅从事文学创作,后受李大钊影响,从1924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加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1940年以后,开始研究历史。1947年任山东大学教授,1948年任华北大学二部史地系主任、教授。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任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等职,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1972年,以原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成立清史研究小组,尚钺任副组长,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成立历史系,尚钺任主任,至去世。主要史学著作有《中国历史纲要》、《尚氏中国古代通史》、《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索》及《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因中国通史教学的需要,尚钺便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以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具体的发展法则为目的,编写新的教材,此即《中国通史纲要》。全书先由他自己写成初稿,然后和另外几人一起缩编、整理、增删,仍由他负主编责任。为慎重起见,在出版前曾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并据以修正原稿。1954年8月,正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不足30万字的篇幅,简练纲要地讲述了从原始社会到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部以“中国通史”为名的完整著作。

作者在书前序言“编者的话”中说,本书的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揭示出中国社会历史具体的发展法则,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全书记述了从原始社会到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但因作者对当时学术界争议很大的古代史分期问题比较谨慎,所以在论述隋唐历史以前的三章中,章节标题都不使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字眼,在具体内容的叙述上也尽量避免使用这类名词,此后三章的章节标题中才明确出现“封建”或“封建制度”的称呼,这是不同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写的通史著作的。不过,作者关于古史分期的观点在具体论述中也有所体现,在他们看来:殷商以前的中国社会属于原始社会,“曾经长期存在过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公社制的社会”。[①]殷商、西周和春秋初期属于原始公社末期的家长奴役制时期。春秋中叶到战国时期,铁制生产工具出现并投入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由家长

①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

奴役制向发达的奴隶制过渡。秦汉是奴隶制繁荣并走向衰落的阶段。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曹操为恢复生产、增加军食，推行屯田制，给屯田客或田兵以一定的独立经济，鼓励他们生产，并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变成了农奴，这种屯田制是各地方势力在当时社会趋势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剥削方式”。[①]西晋时期，由于屯田制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遂代之以占田制，“使基于土地等级占有的农奴制经济获得确立”。[②]以上是本书前三章对中国历史的叙述脉络。以下各章都明确使用“封建”一词，认为隋唐到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及高度发展时期，其中在中唐以后，庄园制代替了均田制，“成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经济的主要形态，它是在当时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下所必然引起的结果”；[③]北宋时庄园制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已成为土地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形态”，“是典型的封建经济下的土地所有制形态”，而宋代经济的发展，“已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准备了前提条件”，[④]但当时的封建制度却给了它极大障碍。宋朝之后，社会经济在蒙元统治下衰敝下来。从明至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其间，经过明代恢复发展生产，万历年间，不论是手工业还是农业，在东南沿海一带都具备和呈现着“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数百年来在生产方式上发生的逐渐变化终于“引起了变革，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地增长起来”，但它“受到了封建主的各种压制和打击，未能获得迅速的发展”。[⑤]而“正当它在积极斗争着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生产落后的满族入关继而统治全国，“使中国社会经济遭到了更严重的摧残”，“阻滞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延续了中国垂死的封建社会”，但是在清代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制造业都占一定的地位”，因此作者坚信：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⑥]

除了以上脉络分明地对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进行了梳理外，作者在书中，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进行了详细阐述，大力歌颂人民群众反抗腐朽暴政和反抗侵略的英勇事迹，对残暴统治、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进行了无情鞭挞，高度赞扬了民族英雄和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各种优秀的代表人物，对一些具体

①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7页。

②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6页。

③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6页。

④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0、201、203页。

⑤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6页。

⑥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79、388、386页。

的重要历史问题，如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都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坚持了一分为二但必须分清主次的客观评价态度；在行文中，作者还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能注意到各朝代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贡献。全书结构清晰，简明扼要，语言干练，晓畅通达，内容上更是自成体系，成为一家之言，因此不但很好地达到了写作目的，而且一出版即受到了民众和历史学界的广泛欢迎，“在解放初期各界的理论学习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还影响了中小学的历史课教材的编写，相当长时期内为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基础”，“在史学研究、史学教育、史学普及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上影响了几代人”。[①]国外也先后出版了此书的日、俄、波兰等几种外文译本。而此书给予学界的最大影响，是它标志着“魏晋封建说”的正式问世。由于该书的广泛流传，“魏晋封建说”成为中国古代史分期中与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鼎足而立的最有影响的三个学派。

当然，此书也并非没有缺点和错误，更有很多值得商讨之处。出版后，王介平于当年即发表书评文章，有肯定，也与之商榷。[②]由于本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体现的都是尚钺个人的史学观点，因此就连参与本书编纂的邓春阳、张我得、何志等人也都纷纷发表书评，对书中的有关古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等一些理论问题和具体问题，与尚钺商榷。[③]而早已名震全国的通史学前辈范文澜，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的“百家争鸣”历史讲座上，对此书提出“尖锐的批评”。[④]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历史系还都组织了专门的研讨，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意见，既涉及该书中谨慎对待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更有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商榷争鸣，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还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公开发表了《〈中国历史纲要〉讨论会记录》。其他如先秦史专家童书业发表文章，专门对该书中的先秦史和宋史部分提出了不同意见，[⑤]而宋史专家邓广铭则彻

---

① 毛佩琦：《〈中国历史纲要〉前言》，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之“20世纪史学名著”版《中国历史纲要》书首。

② 王介平：《评〈中国历史纲要〉》，《新建设》1954年第12期。

③ 邓春阳：《对〈中国历史纲要〉的一些意见》，《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8、9期合刊；张我得、邓春阳、何志：《评〈中国历史纲要〉》，《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④ 尚钺：《关于研究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范文澜的批评见其《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⑤ 童书业：《关于〈中国历史纲要〉先秦史及宋史部分的意见》，《文史哲》1955年第3期。该刊同期还发表有韩连琪《评尚钺同志“中国历史纲要”——兼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一文；《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3期发表有弗·尼·尼基甫洛夫《评〈中国历史纲要〉》的文章。

底否定该书中唐宋“庄园制经济”的提法，认为唐宋时期根本不存在该书中所说的那种“庄园”。[1]

1959年，在全国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中，尚钺被作为史学界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文革”中更受到严重摧残。“文革”结束以后，人民出版社拟将此书重印，于是尚钺在1978年组织人力进行修订工作，1980年出版。这次修订的原则是：保留原来简明扼要的特点，结构和章节不变，只就某些段落作必要的删节、调整和增补；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稍加申述；将书中错误之处予以修正，提法不妥之处酌情删改。具体说来，在遣词用语方面，全书六章的名称全部予以改写，各节及节下各目也有很多改写，例如第三章原题为“西、北各族的进入北中国与汉族政权的南迁——两晋南北朝”，改为“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的斗争和融合”，第五章原题为“封建制度的高度发展与女真、蒙古统治下社会经济的衰敝——宋辽金元”，改为“两宋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金、元统治下的社会”，第五章第八节原题为“元蒙的统治与中国社会经济的衰敝”，改题为“元朝的统治与中国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第六章第七节原题为“满清民族牢狱的统治与反满运动的继续发展”，改题为“清王朝的统治与反清运动的继续发展”，第八节原题为“满清对少数民族的征服”，改题为“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节下的各目中，原书中“对外扩张”之类的标题全部改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之类的用语，在反对民族压迫的内容中，把原书中“中国人民”之类的字眼全部改成“广大人民”，等等，这些改动都使修订本的论述更加科学、准确。但原版本中称秦桧为“汉奸卖国贼”，[2]新版中几处都将“汉奸”改为“奸臣”，只有一处提“奸细秦桧”，[3]这是值得商榷的。

在具体内容方面，对原始社会的记述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删去了其间“曾经长期存在过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公社制的社会”的段落；对各章的文化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增补，并在全书中增加了许多说明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图片；对秦始皇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删掉了“征服者的野蛮统治”、“大量屠杀人民”等否定性用语；对原书中唐宋“庄园制经济”的提法，部分采纳了邓广铭的意见，改成“庄园经济”；在宋代部分谈到古代三大发明的意义时，原书引用了1951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修订时全部删去，代之以自己的评论；对元末农民大起

---

① 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②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23页。

③ 尚钺：《中国历史纲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

义的意义，朱元璋能够战胜群雄、建立明朝的原因，朱元璋建立高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必要性，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对西方传教士传播西洋学术、科技的目的及其影响，明末农民大起义中的荥阳大会的意义，李自成建立革命政权、实行革命政策，广大人民抗清斗争的意义，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删和重新改写，使其表述更加客观。

在古代史分期方面，作者作了较多修正和申述工作。例如，在谈到战国时期商品生产发展的时候，增加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关于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的经济特征的论述，用以说明："我国从战国到西汉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符合于恩格斯所阐明的规律。"①言下之意，从战国到西汉是奴隶制社会。在叙述赤眉、绿林起义之后，新增一段论其意义的文字，强调起义"解放了大批官、私奴婢和刑徒，摧毁了王莽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②紧接着谈到东汉光武帝刘秀解放奴婢时，加了一句："从法律地位上说，东汉以后的奴婢已逐渐农奴化了。"③原版本中说，西晋占田制"使基于土地等级占有的农奴制经济获得确立"，宋代"已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准备了前提条件"，修订本中全部删掉。作者认为明代手工业生产有四种形态，其中第四种，把原本中的"工场手工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改为"资本主义手工业作坊的出现"，④并在相关地方增加了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这些修正，使作者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的观点更加鲜明。不足的是，修订版虽然改写了六章的名称，但仍然没有在名称上显示出明晰的历史分期。⑤

总之，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确实是一部很具有自己个性的通史著作，惟其如此，在 20 世纪末回顾百年史学历程之际，它被众多史学名家一致推选为"20 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之一，列入该丛书重版发行。

---

① 尚钺：《中国历史纲要》，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 页。此版本把此书修订本直接署名为"尚钺著"是错误的，尚钺仍是主编，其自己所作"修订本说明"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② 尚钺：《中国历史纲要》，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0 页。

③ 尚钺：《中国历史纲要》，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1 页。

④ 尚钺：《中国历史纲要》，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6 页。

⑤ 在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之后，尚钺又独立完成了一部《大型中国通史讲义》，但直到他逝世后，才由他人整理，以《尚氏中国古代通史》为名，于 1991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六编二十二章、110 万字，篇幅约相当于《中国历史纲要》的四倍，六编名称分别为原始时代、早期奴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西周到春秋战国（二、三编）、中国奴隶制的崩解与封建制度的形成——秦两汉到南北朝、封建制度的发展——隋唐五代、封建主义最高阶段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明、清，这就明确划分了中国古代史的发展各阶段，清晰地展示了尚钺在古史分期问题上的见解。

(二) 第二阶段:"文革"时期(1966.5—1976.10)及之后的两年过渡时期(1976.10—1978.12)。

"文革"时期,一批历史学家遭到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正在主编《中国史纲要》的翦伯赞于1968年12月18日含愤自尽,范文澜也于1969年7月29日抱憾辞世,未能全部完成《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郭沫若虽然艰难地度过了"文革"时期,并从1971年开始组织了对《中国史稿》的修订工作,但并不顺畅。"文革"之后的两年过渡时期,由于"两个凡是"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文革"时期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中国通史编纂工作仍然处于低潮。在这12年间,除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在1976年7月正式出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共4册,时间范围是从先秦到隋唐五代)被易名为《中国通史》(第1—4册)、蔡美彪等续修《中国通史》第5册(宋)在1978年出版外,再也没有其他中国通史著作的出版("文革"中,提倡工农兵写史,有的工厂理论小组编写了《中国通史》,但没有公开出版[①])。这也难怪,"文革"期间,连正常的中国通史的教学也被停止,[②]又怎么会有多种中国通史著作的出版与问世呢?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否定了"文革",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开始走上全面拨乱反正的健康之路。

(三) 第三阶段:1979—1989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通史编纂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开始步入全新的快速发展阶段。

1. 本期中国通史编纂的成就,首先是原来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的中国通史著作继续编纂,有的则完成全稿。翦伯赞自1961年主编《中国史纲要》以来,由于政治原因,其他人负责的第二、三、四册在"文革"前全部出版,但他自己直接参与编写的第一册却未能编纂完成。直到翦伯赞去世10年后,才由吴荣曾整理定稿,于1979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一起将四册全部推出。后应读者要求,1983年再版时合为上、下两册,1987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此书从开始编纂就确

① 详见《文汇报》1974年11月28日第3版《上钢五厂二车间理论小组编写〈中国通史纲要〉》。

② "文革"期间,中小学不教中国历史,大学也只教四门所谓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周恩来总理得知后问:"没有中国通史吗?那怎么行呢?中国人不知道中国历史,不学通史,总得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嘛!"见陈翰笙:《对研究世界史的几点意见》,载于沛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论文集·史学理论卷》(1964—20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定为大学通用教材，全部出齐后，因体例完善，分量适当，奠定了此后中国大学历史教材的基本框架，不但被很多大学用为教材，累计印刷逾百万册，而且至今仍然是全国大学历史教材的典范之作。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1976年时已出版了第1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1979年又出版第2册(战国、秦汉)和第3册(三国两晋南北朝)，这3册都由郭沫若主持定稿，因此都署"郭沫若主编"。1978年郭沫若去世后，未经他审定的以后各册改署"《中国史稿》编写组"，于1982年出版第四册(隋唐)，1983年出版第5册(五代十国、辽、西夏、宋、金、元)，1987年出版第6册(明)，第7册清朝历史部分(1840年以前)也于此期完成初稿。与此书相配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上下两册，也于1979、1990年先后出版。这是多卷本中国通史中，唯一一部配有专门使用地图的著作。

范文澜、蔡美彪等合著的《中国通史》在1978年已出版了第1—5册，1979年出版第6册，1983年又出版了第7册，1986年又出版了第9册。此书及以上二书的详细情况，下文有专节论述。

2. 20世纪规模较大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著作开始编纂并全面展开，此即白寿彝总主编，历时二十余年才最终完成的《中国通史》。这是本阶段的中国通史编纂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白寿彝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因教学及出国学术访问，迫切感到有必要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通史。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这更坚定了他编写通史的决心。1975年9月，他牵头成立了中国通史编写组，正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编著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倡议，并得到赞许。当时动议是编写三种类型的通史著作，一种是大型本即后来的多卷本，一种是中型本，一种是小型本。中型本因为条件不够成熟而中途搁浅。小型本自1977年10月草拟大纲，三年后完成，此即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①

《中国通史纲要》记述了从远古时期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简明中国通史著作。由于是一本普通读物，《纲要》对材料来源和吸收的别人成果都没有注明，篇幅也只有30万字，但却简明凝练，体系严整，线索清晰，致力于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提出了

---

① 本段内容据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简编)》，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621页。

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如关于中国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划分问题，关于不同历史时期地主阶级中占统治地位阶层的具体分析，关于地租和国税的关系，关于地租形态的发展及其与农民阶级依附性人身关系的变化，关于民族地区与广大边区的社会发展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地位，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提出和阐述，对于更深入、更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①]也使本书成为一部普及性与科学性结合得比较好的典范之作。这是白寿彝“通史学发轫的成果，指明了通史学建设的方向”，[②]“为大型本《中国通史》的编写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③]1983 年 7 月，此书还在全国首届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选中获一等奖，被指定为通俗理论读物的必读书目，全国高校指定教材，1988 年又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到 1999 年元旦前已连续印刷 20 次，累计印数近百万册，并在国外有英、日、西班牙、法、德、蒙古、罗马尼亚和韩国文字译本。1987 年，白寿彝又主编、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续编》，续写了五四运动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很快也被译为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朝鲜文在国外出版。

1979 年 10 月，白寿彝主持召开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由此，12 卷 22 册、总字数逾 1 400 万的巨著，正式拉开了序幕。[④]1989 年 4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具有全书总纲性质的第一卷《导论》，标志着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开始进入出版阶段。其详细情况，下文将有专节讨论。

3.“文革”结束以后，恢复了高考制度，大学教育重新步入正轨，为适应教学之需，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大学都纷纷编写自己使用的中国通史教材，有些则多个大学联合编写。这些著作主要有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组《中国简史》、张传玺等著《中国历史讲稿》、徐连达等合编的《中国通史》、安作璋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赵矢元等主编的《新编中国通史纲要》等。

《中国简史》由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简史》编写组集体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 7 月出版。全书共十章，叙述了从原始社会到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历

① 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题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前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吴怀祺：《马克思主义通史学理论的建设》，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25 页。引文中在“指明”二字前删掉了“《题记》”二字。

③ 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简编）》，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第 621 页。

④ 张美娣：《二十年磨一剑——白寿彝与〈中国通史〉》，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44 页。

史概况。此书特点，一是简明扼要，图文并茂，只有 48 万字的篇幅，并附有各种插图 198 幅和与本书起止断限相当的历史大事年表；二是结构严谨，脉络明晰，基本上规划出了此后很多大学通史教材的编写模式。

张传玺、李培浩、张寄谦分工合著的《中国历史讲稿》上、中、下三册，于 1982—1984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至近代的整个历史过程，按照原始社会（夏朝以前）、奴隶社会（夏、商）、封建社会（西周、春秋、战国为封建领主制社会，秦朝至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为封建地主制社会），来划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阶段；1840—1919 年的近现代历史则列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期。在各个时期的历史发展中，主要讲述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化成就等内容。本书作者受翦伯赞影响，坚持西周封建论，这是同类大学教材中少有的现象。此外，与本书相配，作者还另行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一册，其中还附录有《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这也是本套教材的一个主要特色。

徐连达、吴浩坤、赵克尧合编的《中国通史》教材，由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全书八章，分别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夏、商、西周、春秋），封建社会的开端——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成长——秦汉时期，封建社会的缓慢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社会的繁荣——隋唐五代时期，封建社会的持续发展——宋、辽、金、元时期，封建社会的渐趋衰亡——明清时期。显然，这是一部以“通史”为名，而实际上只是中国古代史教材，因而篇幅也只有 37 万余字。

安作璋主编的《中国史简编》于 1986 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四编五十一章、72 万字，前三编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夏、商、西周、春秋）、封建社会（战国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分期，依次叙述各时期、各朝代的历史发展；第四编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编叙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的历史，下编叙述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内容也比较全面，可谓一部真正的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著作。全书力求观点稳妥，史实可靠，系统条理，重点突出，基本上能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

赵矢元、冯兴盛主编的《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分古代部分、近代部分和现代部分三册，1987 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 110 余万字，记述了从原始社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古代部分，第一章为原始社会，第二章为奴隶社会，记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第三章以下为封建社会的历史，依次记载战国

和各朝代历史;近现代部分则依专题分章记述,因而在体系框架上无甚新见。本书力求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结构合理、语言通俗,吸收了一些国内外新的科研成果,并适当增加了经济史和文化史的比重。

这些教材,一方面受当时史学界研究状况所限,一方面也由于教材本身的编写要求,存在着力求面面俱到地全面、系统讲述本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观点要稳妥,史实要可靠,结构要合理,重点要突出等共性,在基本格局上大多分为政治、经济、民族关系、阶级斗争和思想文化、中外关系等几个部分,因而往往内容雷同重复,新意不多。

4. 出现了很有影响的通俗性通史著作。其代表就是徐立亭、赵锡元、温希凡等合编,1981 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五千年》。此书是全国第一部以"中华五千年"命名的通俗性通史著作。这是一部献给中等文化读者的通俗读物,选择 120 多个小题目,写一件事、一个人或一个文物古迹,通过这些表面独立而前后连贯的题目,来反映中国历史各时期的特征,并附有一些插图、照片和地图。1985 年,此书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增订本,1991 年被评为"全国第三届日月花杯最佳图书"。由于文字简洁,叙事清晰,可供读者轻松阅读,因而问世后很受欢迎,曾风行国内图书市场,发行 20 多万册。2004 年,此书又出版了修订第三版。而自此书出版后,还带动了许多同名著作的出版发行,由此也可见其影响之大。其他通俗性通史著作,还有余怀邦编著的《中国通史纪要歌》(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等。

5. 出现了立意新颖独特、内容迥异于以往中国通史著作的"中国人民史",即张舜徽个人独撰的百余万言的《中华人民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1874 年,英国史学家 J.R.格林(1837—1883 年)出版了《英国人民简史》,以后又修订为 4 卷本《英国人民史》出版。19 世纪末,梁启超批判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君史",倡导写"民史",即受到《英国人民史》的影响。但梁启超并没有写出"中国人民史"。20 世纪上半叶,有过"中国人民史"的书,即商务印书馆 1933 年出版的曹松叶《中华人民史》,但实际上是一本中国通史,不是人民史。[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宣传"为人民写历史",但很长时间没有"中国人民史"问世。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类似的书终于问世。

---

① 详见周一平:《关于撰写人民史的几点思考》,《南开学报》2014 年第 4 期。

张舜徽(1911—1992),一生勤奋治学,博涉经、史、子、集四部,在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都有精深造诣,留下了大量极具价值的各种学术著作。其三册本《中华人民通史》,论其影响、发行,则可能远不及本阶段问世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但其别出心裁、匠心独运,确实可嘉。张舜徽晚年所作《八十自叙》中,特别点明:"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其中"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①]足见该书在其一生学术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在张舜徽看来:"'亡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虽是一句旧话,却很有道理。"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对本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以及制度文物、创造发明的成就,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亿万民众中的英杰人物,茫然无知,或者早已淡忘了,便自然没有爱国思想,并且不知国之可爱者何在,更谈不上关心国家的兴亡了。甚至国家被人征服以后,也就睹颜事仇,不以为耻。这样的民族,便永远不得翻身。此种事实,在中外历史上是很多的。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历史记载,实关系到民族的成败兴衰,必须鼓励人民学习它、精熟它,以发挥很大的作用。"[②]在这样的史学致用思想和爱国思想的指导下,在很早的时候,便"有意自创新体,试写一部《通史》,务求简明易懂,便于广大人民阅读"。

所谓"自创新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古代史书相比。这些古代史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具体的历史资料,但实质上全还是地主阶级统治史,只有帝王将相的事迹,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历史"。作者感觉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应打破王朝体系,而以人民为历史的主人,围绕人民来进行叙述。"用新观点、新方法,提纲挈领地编写出一部适用于工人、农民以及一般干部阅读的浅明通史,以节省读者的精力时间,于平易处取得应有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近几十年来新编的各种《通史》,仍然是王朝体系。说穿了,还是沿用那珂通世(日本人)所编《支那通史》、柳诒徵所编《历代史略》、陈庆年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体例而从事编述的"。"今日通行的通史读物,或失之繁,或失之深。加以编述体例陈旧,不能使人获得系统的历史知识。读者捧卷便昏然思睡,相率以学习历史为苦"。具体说来,就是这些通史著作,在体系上,"每将几个相近的朝代联在一起讲,将治乱兴衰

---

① 张舜徽:《八十自叙》,载《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②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见其书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989年,作者又以《"亡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中华人民通史〉自序》为题,发表于《中国文化》第1期,并将本处引文中的"睹颜事仇"改为"觍颜事仇",将"很大的作用"改为"巨大的作用"。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此书列为《张舜徽集》第三辑中的第一种,合为上、下两册,出版繁体新版,但此处文字与初版完全相同。

讲完以后，继之以这一时期的文化。这样循环往复地讲下去，致使读者看完一段有关文化的记载之后，又继着要看一段争夺相杀、战火连年的记载。知识既无系统，记忆也就很难”。在内容上，“尽管近人新编各种《通史》，运用新的观点，纠正了旧史的许多偏向和错误，着重叙述了劳动人民所受剥削压迫的痛苦，歌颂了历代农民起义，但没有谈到几千年间妇女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以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在历史上，只看到汉族的活动事迹，看不到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谈到事物发明时，只强调个别人物的成就，看不到集体创造的伟大。像这一类的事例很多，不能说不是一种大的缺陷”。张舜徽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也是可以设法解决的。

他的解决之道就是：“在打破王朝体系后，应以事物为记载中心，将历史上重要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的情况讲个清楚，务求使读者从中得到系统的知识，以激发其爱国之心。”其全书即是按照这个编纂原则与目的进行撰写的，是以人民为历史的主人，写给广大人民看的，因而名之为《中华人民通史》。

张舜徽认为，一个能够“辨识治学途径的史学工作者，在写作上，应该以提高与普及并重。不可偏重提高，追求专业的登峰造极；而必兼顾普及，将知识教给人民。这才合乎时代的要求，适应大众的期望”。他写这部《中华人民通史》就是普及的工作，“广大人民需要易于消化的精神食粮，所以本书力求叙事浅明，通俗易懂，使他们在紧张工作和生活中，能够趁休息时了解一下本国历史，油然而生爱国之心，以激励其奋起向上、努力报国之志。至于专家学者们，史事烂熟于胸，用不着参考及此”。因此，他的这部书与他此前出版的经学、小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精深学术专著完全不同，不是专门学术性的，不是写给专家学者们看的，“是写给广大人民看的”，这一点，在他仅有 4 页的自序中可谓三致意焉。

这部与古人、今人写作方法都不同的、体例新颖的通史著作，共分为地理编、社会编、创造编、制度编、学艺编、人物编等六编，不分章节，只标大题、小题，以事物为记载中心，顺叙而下，分门别类地描述中国历史上重要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的情况，务求使读者从中得到系统的知识。张舜徽深谙“学习历史，而不通知地理，则空间概念不明”，仅知地理空间、历代沿革，而不通晓当今形势，易致“知古而不知今”的道理，知道认识今天，会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过去，也会更容易激发他们的爱国思想。所以他把地理篇作为第一部分。地理篇主要分为 13 个专题进行论述，包括：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和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概况，我国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

件，我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历史变化，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历史上的几项伟大工程，我国历史上的六大古都，我国历史上的政区划分和人口统计，我国各行政区内的面积、人口及重要城市，全国各大区内的气候、土壤和物产情况，我国的自然资源，我国的交通运输，散布在全国范围内的各省重要通邑大埠，散布在全国范围内的远古重要文化遗址。这13个专题，既有以往通史著作的部分内容，但更多的则是作者自己新增的内容，目的就是“既讲明往事的变迁，复详述今日的发展。俾人人皆能明于国家之可爱者何在，而激发其志气。并使有兴趣学习本国历史的人们，不致和现实脱节”。[①]

第二部分为社会编。社会的变革是人类历史的重要内容，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进入到有阶级、有剥削的社会。此后，出现了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争夺相杀，被统治的广大人民受尽了剥削压迫的痛苦，而统治阶级的少数人则穷奢极欲地过着腐朽、罪恶的生活，因而激起了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革命。本编就是系统讲述这些历史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原始社会；一是进入有阶级、有剥削的社会以后。其中第二个部分又分为四个大题：第一，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作者在此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时代顺序，依次叙述历代蝉联相贯的次第以及治乱兴衰的大事，作者把这部分内容“看成是历史上中国社会的一种政治现象，摆在一边，藉以打破旧的正统观念”，同时“可使读者明了历代王朝的名号、年代及其成败得失，有助于翻检旧史，进一步深入研究”。[②]第二，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不同情况分别叙述，其中“痛苦的妇女”一节分八个小题详细列述，这在此前所有通史著作中都是零散地略微一提或根本没有提到的内容；第三，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第四，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列举各种奴隶起义和农民大起义。总体看来，这一编的内容是此前所有通史著作的最主要内容，即使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来划分大的历史发展段落，但仍然是按照朝代顺序一一叙来，虽然号称是打破了王朝体系，但实质上很难做到，也就是张舜徽在序言中批评的，“仍然是王朝体系”。而张舜徽这部《通史》，除了在本编的“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一节中，多少还能看到些王朝的影子，其他编中则基本上是见不到的。应该说，这种写法才是真正地彻底打破了王朝体系的通史编纂框架。

---

①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上册，第一部分《地理编》之叙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②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见其书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三部分是创造编。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人类文明，是无数劳动人民经历了若干年代集体创造的结晶。不认识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各方面成就，便无由了解人类的真正历史。传统的旧史书在谈到古代事物的创造和发明时，每每归功于个别人物，这便淹没了劳动大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无由认识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因此本编总结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创造，着重记述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先从生产方面写起，以次涉及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包括：农业生产中工具和各种栽培、灌溉等技术方法的改进，在生产实践中取得的各种知识，饮食内容的日益丰富，生活资料的多方面发展，生活资料的进一步美化，努力改变自然环境，创造出保健的方法，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方式与方法，创造了文字，创造了文学等十个专题，最后从农学、生物学、医药学、数学、天文和气象学、物理学、冶金和化学、地学、水利和建筑工程学、其他事物发明等十个方面，综述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其中包括有个别人物的发明创造在内。这些内容，在其他通史著作中不是一点没有，但是确实不多，而且被朝代、断限等分割得极为零散，既不系统，也看不出前后的发展进步。而此编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四部分为制度编。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便应运而生，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和加强他们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使其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逐渐制定了各种制度，来压迫和控制被剥削阶级，维持其统治与服从的秩序。本编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制度，分为土地制度、赋税制度、货币制度、职官制度、铨选制度、教育制度、宗法制度、礼俗制度、军事制度、刑法制度等十个方面，对其基本情况及沿革进行阐述。

第五部分为学艺编。自从有了文字，人类掌握了记事记物的工具以后，出现了书籍（包括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石刻），于是各种思想、各种写作和各种经验总结，大部分都保存在书籍中。人们从其中进行探讨，并加以区分条理，便成为各种学艺。作者分文字、书籍、文学、史学、方志学、文献学、哲学、宗教、音乐、书画等十个门类，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成就。其中，文献学部分合并了古代经学；医学、工技等方面已经详见于《创造编》，本编不再涉及；文字、文学在《创造编》也有谈及，但因是从创造角度谈的，而本编是从学术角度来谈，内容不同，故仍然设立这两个专题。总的来看，本编内容相当于其他通史著作中的思想文化部分，但因作者学博识通，对问题的把握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绝不同于一般的泛泛而论。

第六部分为人物编。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涌现

出各个方面、大大小小的优秀人物。从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写出有关他们的人物小传，也是通史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今人既可引起借鉴作用，又能激发爱国思想，意义是很大的”。本编分为政治、军事、英杰、哲学、教育、医学、科学、工技、字学、文学、史学、文献学、地理学、宗教、书法、绘画等 16 个方面，甄录有代表性的人物共 200 人（另有附见者 9 人）。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和一些历朝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曹操、李世民、武则天等，因在《社会编》中已有详细记述，人物编不再重复立传。“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了不少秉性坚贞、视死如归的人物，有的立功绝域，有的持节不渝；有的牺牲自己，服从国家；有的临危不惧，从容就义。这都是历史的光荣，民族的骄傲”。作者认为“有必要重点突出，加以宣扬”，所以在政治、军事之后，特辟“英杰”一类以作表彰。作者认为，其所选者“虽不全备，但几千年间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多在其中了”。[①]细审其选目，因篇幅所限，[②]或有过苛而致挂漏之嫌，但在上述 16 个方面中，贡献卓著者确实都已入选。例如，在“政治”类中，有王安石，而没有司马光；在“哲学”类中，宋、明两代仅有张载和李贽各一人入选，而朱熹、陆九渊、王守仁则被置于“教育”类中；在“文献学”类中，虽然宋代一向被人称为文献学成就斐然的时代，但却无一人入选，明代文献学也很发达，但作者也只选取胡应麟一人立传，因为他提出了考核伪书的具体方法，总结了“前人没有全面总结出的规律性知识”，[③]而在清修《明史》中，胡应麟只是以附录的形式附在《王世贞传》之后的。曾独主明代文坛 20 年，也是明代首屈一指的史学大家的王世贞，在本书的 16 个方面中没有任何位置。这些体现了作者独到的眼光和通透的学识，也使本书在所有通史类著作中傲然挺立、卓然不群。

总之，张舜徽的《中华人民通史》，结构井然有序，知识系统全面，全书从六个部分，以专题的形式、全新的角度，将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史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纵横交错的大手笔和上下贯通的独创精神表达了一定的人民性。而且全

---

①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下册，第六部分《人物编》之叙录，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1—262 页。

② 张舜徽在自序中描述他写作情况时说：“在开始草创的时候，勇气很足，下笔不能自休，收集的资料也不少。后来考虑到广大人民，各有专业，工作很忙，他们所需要的书，用不着这样繁琐，愈简愈好。一部书卷帙太大，是没有人看的，且没有时间去看。虽公家资料室购取了一部或两部，群众只是把它看成类书，偶尔翻检而已。不了解群众实际需要，而从事于贪多骛广，只能是枉费心力。于是将预备写入的内容，再三压缩，损之又损，力求删减至百万字以内。”史书当然不是“愈简愈好”，张氏此书也逾百万字，即是证明，但他所说的“卷帙太大”的缺点，确实是很有道理的，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之所以能久盛不衰，除了学术成就很高外，简明扼要也是一项重要因素。

③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下册，第六部分《人物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00 页。

书也确实叙事浅明，通俗易懂，易于“给广大人民看”，这在以往的通史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因而，此书甫一出版，便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一部继往开来、发凡起例、开路先锋性的著作，“是继《史记》所创立的纪传体和近代章节体之后的又一个创造，是史学体例和视角的又一次转折”，被评为“妙著惊史苑，天葩吐奇芬”，[①]并很快获得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这种体裁和写法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即难以从宏观上、整体上清晰地显示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对于这一点，张舜徽自己也看到了，所以他指出《中华人民通史》不是为专家学者而写，也不是历史教科书。”[②]应该说，张舜徽的这部通史，更近似于一种专史性质的通史著作，因而这位学者指出的这个缺陷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严格地说，《中华人民通史》是一本写给人民看的通史，有较强的人民性（如《史记》有较强的人民性一样），然还不是一本完全写人民群众的人民史的通史，如书中的《人物编》，只有一个黄道婆是劳动人民，其他几乎都是精英人物，如赵武灵王、孔丘、屈原、司马迁等等，似乎还是一部精英史。但《中华人民通史》坚持和走向人民史的方向，张舜徽特立独行、努力创新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四）第四阶段：1990—2000 年。

这是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通史编纂的收关阶段。通过史学界前一阶段对“史学危机”的大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反思与探讨、历史学科本身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历史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学者们思想愈加解放等，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进入到一个相当成熟的时期，在历史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就通史编纂来说，这 10 年是整个 20 世纪成就最为突出的全面繁荣阶段。

1. 本期中国通史编纂的成就，首先是此前已经开始编纂但尚未完成的大型中国通史著作的编纂全部完成。

其一是范文澜、蔡美彪等主编的《中国通史》的完成。1992 年，该书出版第 10 册，1993 年出版第 8 册。至此，历时 40 余年的第一部大型多卷本中国通史著作最终完成。1995 年，蔡美彪等将全书修订重版后，一起由人民出版社推出，并很快获得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此后，蔡美彪等又以 10 余年时间，续修了此书的近代部分，

---

① 谢贵安：《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 年第 4 期；吴量恺：《妙著惊史苑，天葩吐奇芬——读张舜徽先生的〈中华人民通史〉》，《江汉论坛》1990 年第 5 期。此后，积慧也写有书评文章：《体例独特，别识心裁的通史新著——评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中国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② 赵梅春：《20 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1 页。

即第11、12册,使这一套通史著作贯穿古今,终成完璧。

其二是郭沫若及《中国史稿》编写组负责编辑的《中国史稿》的完成。在上一阶段,其第7册即最后一册已完成初稿,但为进一步修订,一直拖到十年后的1995年4月才正式出版,标志着历时30余年之久的《中国史稿》的全书编纂工作最后完成。

其三是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完成。1989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第一卷《导论》。到1999年,全书12卷全部出版。至此,从1975年开始启动,历经20余年的磨砺,有数十位主编、数百位作者集体编写的这部规模较大的《中国通史》,也终成完璧。

以上三书,因下文有专节讨论,此处不再多述。

2. 本期中国通史编纂成就的再一表现,是出版了一些新编的各种高校中国通史教材。如199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海鹏等主编的《中国通史》上、下册;199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魏宏运主编的《中国通史简明教程》上、下册;1993—199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邱树森、陈振江等主编的四册本《新编中国通史》;199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樊树志独撰的《国史概要》;1999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齐涛主编的三册本《中国通史教程》。此外尚有林丙义主编的《中国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李定一的《中华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苏智良主编的《中国简史》(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赵永春和朱理峰合著的《中国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杨胜勇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朱绍侯主编的《中国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教材在80年代的基础上,在内容和编写体例上有新的乃至重大的进展和突破,这种突破和进展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科教材编写的最新水平和大学、中学教学改革的新要求。如魏宏运主编的《中国通史简明教程》,内容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艺术、宗教等方面,地域上也涵盖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各时期的广大区域,特别是从时间断限上,从原始社会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作者们写作的当下,这在中国通史的写作中还是少有的现象,可谓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

邱树森、陈振江等主编的《新编中国通史》,上起原始社会,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中前两册为中国古代史,第三册为“晚清”部分,即一般常说的中国近代

史，第四册为“民国”部分，即一般常说的中国现代史。全书不再沿用社会形态名称而是直接用朝代名称作为编名、章名，以便通过朝代的更迭，更好地掌握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和发展的规律。内容上则较大篇幅地增加对社会史、民族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记述，注重政治制度、社会改革或变革、区域经济、商品经济、人口增减、文化制度、社会思潮、民俗、民间社团、民族关系、民族文化、边疆变迁等内容，注意把中国置于世界历史范围之中加以考察。写作过程中，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和新史料，并挖掘出不少新资料，因而在观点和结构方面都有创新。特别是本书第三册“晚清”部分、第四册“民国”部分，分别由近代史研究专家陈振江、现代史研究专家李良玉独自担纲撰写，使全书在集体合著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也是本套教材在通类著作中的一个闪亮之点。此书出版后很受欢迎，于是作者们又根据近年的史学新成果和考古新发现，将其进一步修订，在2010年出版了修订第二版。

樊树志独撰的《国史概要》并非历史学专业教材，而是公共基础课教材，是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哲三系及文科基地班一年级学生所授课程的讲义。由于要在一个学期内结束课程，而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又极为丰富、头绪繁多，因而作者没有采用面面俱到、四平八稳、平铺直叙的叙述方法，而是以自己的教学经验，对教学内容驾轻就熟，“以宏观的视野展现中华文明史的主线”。作者“摒弃传统教材的社会发展史模式”，设立100个专题，按时代分成十四章，既做到点、线、面相得益彰，更是突出重点，勾勒出简单明了的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作者认为：“一本理想的教材，必须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它所达到的前沿水平。以往的教材，在这方面下功夫不深，给人以‘炒冷饭’的陈旧感。”因此本书大量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增强其新颖度与精深度。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虽是大学教材，但编写时注意到它的普遍适应性，以满足一般读者（包括海外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提高文化素质的愿望。有此一册，放在案头手边，闲来浏览，不能自夸开卷有益，总可以看出90年代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或许不无启迪。”[①]通读本书，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从初版的1998—2010年的12年间，本书已经出版第四版，足见其影响和发行之广。

齐涛主编的《中国通史教程》分为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三册，记述了从原始

① 均见樊树志：《国史概要·后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494页。

社会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历史，出版于 1999 年 6 月，并于当年投入教学使用。各卷均采用上下编结构，上编立足于分朝代记述历史进程，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点制度、文化为主线，勾勒不同时代的历史进程，下编则选取贯穿不同时代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例如古代卷，上编分为远古时代、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等七章，下编则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中国古代民族问题、中国传统农业与农民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古代民俗与民间文化、中国古代的宗教、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等 10 个专题。现代卷上编分为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溃败、国共两党的十年对峙、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等五章，下编则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现代史的上限、分期及宏观体系，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的构成，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及各界群众运动，北京政府时期的南北政权，中国民主党派与多党合作，现代三大文化思潮与文化论争，现代学术、文艺与文化事业，现代中外关系等 8 个专题。为了便于学生的进一步学习，各章之后还设有“导读”和“思考与讨论”，像此前的有些教材那样，列出相关参考书目和提出思考题目。在使用中，作者们还充分听取了广大师生的意见，从体例的完备、内容的完善到新的学术成果的吸收等方面，立足学术前沿，提升学术水准，不断予以修订，到 2009 年，出版了第四次修订版。在此期间，这套教材于 2001 年获得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08 年被教育部确定为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已陆续被国内百余所高校选用为历史学科专业教材或被指定为教研参考教材。

2001 年，在本套教材第二版出版的同时，作者们还编写了《中国通史教程教学参考》。它与教材一样，各卷也采用上、下编结构。上编各章与所配套教程诸卷中的章目相对应，一般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资料选辑，选录每一历史时期比较典型的原始资料；二是学术研究讨论中的不同史学观点以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状况。这些内容既可用于课堂教学，也可用于学生自修、讨论与初步的学术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两个空间”的整体教改思路。下编主要是供学生课下参考阅读的学术论文选读，目的是给学生提供学术范文。选取论文的标准是：内容上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一定的学术领域内有较大影响，代表某种观点或学派；学术格式要规范，便于学生在初学论文写作时，作临摹式

的练习。

显然,与以往通史教材相比,本套教材重在体现研究性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主旨,力求做到给教师留下发挥空间,给学生留下思考空间,反映了当前大中学校教学改革的新要求,代表了当前大学历史学科教材编写的最新模式。

3. 出现了一些书名各异、体裁不同、以普及为主兼具学术性的中国通史著作。主要有:吴剑杰、殷崇浩编著的《新编纲鉴》(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周一良等编著的《中国历史通览》(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通览》(1994年),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的百卷本《中国全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罗琨等编著的14册本《中国小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1995年版),王连升主编的12册本《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李罗力主编的4卷本《中华历史通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冯克诚、田晓娜主编的3册本《中国通史全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其中,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的百卷本《中国全史》最具特色。此书记述从原始社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历史,先在纵向上按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分为远古暨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民国10个断代;然后在每一断代内,按照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宗教、习俗、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等10个方面进行撰写,从横向上,通过专门史的形式展现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每一册都独立撰写,从一个侧面展示该时代某一专门史的发展演变;同一时期的10册合起来,就成为该时期整体历史的发展情况;10个时期的同一专门史册组合起来,就成为该专题一脉相承的几千年发展史。这就以纵横交错的形式,按照现代学术分科,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面貌,诚为一部普及与学术兼具的优秀史著。

4. 从本阶段起,又有一些新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著作陆续开始编纂,并基本完成。

20世纪以来,中国通史著作之所以被学界重视、屡屡编纂,一个重要原因是通史著作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总体认识,显示出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体系,这既有学术价值,也是通史著作社会价值的体现。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随着本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特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一些学者对如何编纂出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独特性的通史著作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其中有的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开始动手编写中国通史著作,如曹大为、

张岂之等；有的则停留于理论探讨层面，提出了对中国历史体系的新认识，提出了重建中国历史体系的理论思考，如田昌五、叶文宪等。

曹大为等自 1993 年以来，即开始编纂多卷本《中国大通史》，到 1999 年基本完成，这是继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之后的又一部鸿篇巨制，计 15 卷、2 200 万字、4 000 余幅图片、1 000 多幅地图。对于这部新编《中国大通史》的编写原则、体例及内容等方面的创新，曹大为在 1998 年专门发表文章，予以详细介绍。①

他们的编写原则是：坚持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指导，纠正以往简单化、教条化偏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对史学研究的误导，批判地汲取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详细占有史料，实事求是地对中国历史展开深入研究，在通史建设的体例、内容、观点方面有所突破，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对历史研究的有关理论有所丰富和发展。

至于体例及内容等方面的创新，将在各卷综述的撰写和全书的体例设计安排上充分体现出来。

在新编大通史中，文化将不仅是和政治、经济并列的一个门类，而且把它视为一个依存于客观物质世界和社会历史实践的、有机的、动态的、有独特个性的，集中反映人类主体意志和实践活动的整体系统。文化的多重涵义都将受到高度重视和充分展现，包括注意把握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制度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等文化具象之间的内在关联，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原因及其社会效应和历史影响。这一切都将被放置在贯通全书各部分的特殊重要地位，真正体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精神生活受到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的制约，同时一经产生，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发挥巨大的反作用力，反过来能动地掌握世界这一唯物史观的精髓。

与此相应，关于偶然与必然、随机与规律问题，本书将力求展示这样一种观点：在古代，就任何一特定的人类社会而言，越是在长期的历史运动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必然"与"规律"的作用体现得越明显。而相对于任何一个较短时期的具体历史来说，则存在着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相关的基础条件确定之后，只有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的，而历史的无数具体事件和过程都带

---

① 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 年第 3 期。作者在注释中说："本文写作过程中曾与商传、王和、赵世瑜等专家学者一起反复研讨、修改，某些段落直接采用他们的表述，系集体劳动的成果。文中不当之处，由我个人负责。"

有很大的偶然性。

全书在肯定经济基础为决定历史发展终极原因的前提下，认为整个人类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历史，其间转变的中介便是人类的实践活动，通过实践的渠道将两者沟通，实现互动飞跃。因此在高度重视人类主体意志活动的同时，尤其注重人类作为历史主体改造世界的各种实践活动。强调各种主、客观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综合作用，揭示各种“合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在充分展现各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偶然性”活动中，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中国古代宗族、家族血缘纽带纵贯几千年，并与农业自然经济、国家行政组织相互耦合，凝为社会深层结构，制约、规定着中国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特点和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走向。只有把握住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这一根本特征，才有可能对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通史研究中忽略了家族、家庭研究，一般只在谈原始社会、早期宗法制度和魏晋门阀制度时述及，而忽略了宗族制度后来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影响。这种忽略不只是一种局部的缺陷，而是带有总体倾向性的偏失。《中国大通史》的撰作，不仅在内容编排上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而且始终紧紧抓住这一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古代社会深层结构的基本特征，贯穿到整个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从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科学的剖析和诠释。

基于上述认识，新编大通史除上面提到的内容之外，在以下几个问题的理论把握上，也将与以往的通史著作有所区别：

第一，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事实证明，并非所有地区或国家都完全按照这一模式，一成不变地发展。无视中国历史实际，机械地把斯大林概括的模式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成公式，按照它来剪裁中国各种历史事实的做法，并非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劳动资料、生产力类型，将人类历史演进从宏观上划为采集渔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大时代，该书对宏观大历史阶段的划分即大体参照这一反映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分期框架。

首先，该书认为，中国古代在农耕自然经济与宗族血缘纽带双重制约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血缘纽带的滞留阻碍了完全将族人化为“非人”的活财产的奴隶制趋势，中原王朝不存在一个以奴隶制剥削形式为主体的奴隶社会阶段。其次，避免笼

统使用含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封建制度”一词，并非中国古代“封土建国”的原义（西方使用的“封建制”概念与此相类），而是从“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确定其含义，这实际上是译介、创新语汇时遗留下来的问题，极易造成混乱和争议。结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具体情况，本书把这种“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与欧洲古典奴隶社会和中世纪封建社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别”的中国古代社会，概括为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在中国古代史部分使用的“封建”概念，将恢复周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原义。而近现代史部分使用的“封建”、“半封建”的概念，则是有着“为实现民主政治而斗争”、反对“贪官污吏、买办、大地主、豪绅、土匪”等“半封建势力”、反对“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特定的现实含义，既指一种“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落后的（实即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形态下的）剥削制度和反动的政治统治，也指以“贪官污吏、买办、大地主、豪绅、土匪”等为代表的“半封建势力”，是愚昧落后、专制迷信的象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把推翻这种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封建专制制度列为革命的一个主要目标，这是本书近现代部分所要充分展现的一条主线。

因此，该书不但在剖析中国古代社会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出其自身发展的独特轨迹，就是在把握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西方、东欧的“共性”的同时，也要如实地反映出中国独特的“个性”。

第二，在充分认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重大作用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变革前的长期积累和革命后的长期延续，尤其要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变革。同时也将比以往更多地关注社会长期性、连续性、渐进性发展变化过程，更多地注意结构性的变化，从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和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原因。虽然在较短时段中不妨用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转折点，但对于长时段的历史分期，则避免仅使用某个具体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变化的标志。这一方面是因为充分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因，而这种变化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迅速完成；另一方面用个别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变化的标志，容易流于表面化，往往是引起争论的原因之一。

依据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为主要标准，综合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考察判断，该书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原始文化

农耕文明

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夏—春秋战国)

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

确立与反复(秦汉—魏晋南北朝)

发展与成熟(唐宋—明中期)

传统中的变异:走向近代(明中后期—清中期)

向工业文明转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扭曲的近代化进程(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前期)

传统社会解体与近代化被迫启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现代化推进(20世纪中后期)

奠基与探索

定型与飞跃

以上分期分三个层面标示。第一级层面依据以生产力形态为主要标准的社会文明类型,从宏观上划为原始文化、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轨三大阶段。进入文明社会以前的史前时期,属于采集渔猎生产方式,后经新石器时代革命过渡到原始农业、畜牧业生产方式,呈现出文化多元发展的特点。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即长期保持着以农耕为主(包括与农耕经济对垒和互补的游牧经济以及作为农耕经济补充形式的手工业、商业与海洋贸易经济)的半自然半人工形态生产力状态,至今仍处于向工业文明发展的过渡阶段。鉴于中国尚未实现现代化,把这一向工业文明转轨的过渡阶段和农耕文明阶段列为同级序列来把握。第二级层面则以社会形态为标准,在同一大阶段之中进行阶段性分期。第三级层面属于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发展阶段。

以上第二级层面各阶段从全局范围来看,均处于多种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并存的状态,本书的分期主要依据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定性。鉴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社会形态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动并不完全同步,因而书中的分期是一种较大跨度的模糊性分期。

第三，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充分认识到因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背景差异而导致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的差异与距离，承认这种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空间上的犬牙交错和在时间上的长期共存，真实反映中国历史纵向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演进，横向不断由分散闭塞走向融合统一的发展总趋势。

在疆域与民族问题上，将坚持以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为本位的辩证的发展的疆域观和开放、平等、多元一体发展的民族观。首先，应确定以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为本位，以此作为撰写中国大通史的立足点，而不是只从汉族和历代王朝的角度考察。应该肯定今天祖国的领土（包括近代帝国主义掠夺的土地）即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先民活动的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历史上活动在今天中国疆域范围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其次，在肯定汉文化作为高度发达农耕文明总体领先地位的同时，还要体现各民族文化自身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以及各民族对促进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将着重反映历史上各民族在碰撞中交融的潮流与趋向，正是这种多元民族文化碰撞与融合带来的兼收并蓄、熔铸创新、杂交综合优势，才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成为牢不可分的整体。

第四，中国古代跨入阶级社会门槛时形成的家国同构二系合一结构，比起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阶级关系完全取代血族团体形成国家的模式截然不同，成为一种原生的特殊社会遗传基因，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代制约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格局，影响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因而本书对一向被忽略的婚姻、家庭、宗族、各阶层、社群等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探考，绝非一般拾遗补阙，而是在深入探究中国历史特殊传统的真谛。即使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也意在切实体现马克思关于“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的科学论断，全面、深入剖析促使社会变革的各种因素，而非刻意标新立异的猎奇和可有可无的点缀。

此外，以往通史多半是通过强调农民战争来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基本原则，而且往往实际上把农民战争当成改朝换代的工具和陪衬，而对劳动人民日常生产、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状况则很少涉及。本书增加大量社会史、文化史方面内容的另一重要原因，还在于要力图真实再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全貌，揭示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引发、制约着价值追求及其导向，促进生产发展、技术改进，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全面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在选设和撰写社会生活、习俗风尚、文化观念这类专题时，注意和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

会变动关照，互相渗透连接，既使经济、政治方面的内容表现得更为丰满、生动、有血有肉；又不致使社会、文化方面的专题游离于大通史之外，成为单摆浮搁的零碎。也唯其如此，才能使大通史类编的各部分更好地条块结合，成为浑然一体的完整的体系。

显然，曹大伟等主编的《中国大通史》，是一部与以往中国通史著作全然不同且别开生面并极具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特色的学术著作。

在中国通史教材的编写方面，1994 年初，国家教委（今教育部）高教司提出重新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任务，由张岂之任主编。四年后完成初稿，随后经过两年的审阅定稿，这套定名为《中国历史》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作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于 2001 年 7 月正式出版。

为了编好这部新的中国历史教材，1995 年春天，张岂之组织了一些编写人员研究国内解放前后和国外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中国通史，考虑如何吸取它们的优点。①后由刘宝才执笔，把大家的一些看法写成《关于重编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几点考虑》一文，公开发表。文中提出三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直接针对通史教科书而言的，认为通史教科书要区别于其他史籍。重编中国通史教科书，为的是供大学历史专业教学使用。历史教学本身就是历史教育的一种形式，同时要为学生毕业后继续学习、研究历史准备条件。除教科书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史籍，如史论、专史、史话、史料等，还有不作教材用的通史，各有不同于通史教科书的写作目的。因此，作为教材用的通史，自应与其他史籍有区别。具体说来，它不要求详尽无余地叙述历史，但要有总体观念；要处理好内容的稳定性和时代需要的关系；要继续探索理论与史料统一的形式。除此之外的第一和第二个问题，也涉及一般通史编纂的原则与方法。文中指出，第一，我们要热爱中国历史，编写出鼓舞民族精神的中国通史；第二，中国通史要区别于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叙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对编写中国通史有指导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写的中国通史都以社会发展史为指导，大大提高了认识水平，但也存在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特殊性注意不够。这些中国通史著作把社会发展史的框架套用于中国通史，将中国通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① 见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前言》（由本卷主编刘宝才等撰写），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会几大段，多数大段下又分为某一社会形态的建立期、繁荣期、衰亡期之类。应该说这样做的用意不错，但对社会发展史与中国历史关系的理解值得讨论。因为，社会发展史虽然概括出人类社会的几种基本形态，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就与它节节吻合。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又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独立发展的，直到近代以前基本如此。可以设想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与社会发展史概括的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过程吻合之处很多，但不能设想它没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只是把中国历史作为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例证，必然忽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而且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进程，距离把每个朝代纳入社会发展史的某一阶段，远没有达到共识。这种情况下，依照一己之见或自己也怀疑的见解，勉强按社会发展史的框架安排中国通史又有多少意义呢？张岂之曾提出，中国通史体例按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划分段落，几个朝代可以划为一段，仍是按历史上的朝代顺序来写，不在各段标题上附加社会形态的概念。这样的体例既反映了中国历史实际，也便于反映当前中国历史研究状况，是比较好的办法。在这样的体例下，可以加强对中国历史丰富的具体内容的叙述，可以显示中国通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区别。这样做也不会丢掉社会发展史的科学理论。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念，即社会形态的观念、人类社会在社会形态更替中向前发展的观念，以及人类社会从原始公有制经过私有制向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观念，仍可得以坚持。①

在这样的规划下，全书放弃了以社会形态为题分编分章的做法，直接以历史时代为题，分为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卷、元明清卷、晚清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等六卷，从公元前2070年以前的远古社会，一直写到1999年底澳门回归祖国。其编写原则有六个方面：第一是朝代更替与历史事件相结合，将历史发展的脉络大体叙述清楚；第二是制度与人物活动相结合，既叙事又记人，记人侧重在政治、制度、管理以及科学文化方面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第三是文化与社会生活相结合，通过文化反映每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第四是注重中国历史重要内容的前后关系，做到前后呼应；第五是叙述务必基于准确的材料，依据具有科学性同时又为学术界所公认的成果，文字叙述简洁明白；第六是全书体例保持一致。其主要内容有七个方面：第一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第二是重大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第三是历代国家行政制度、施政方式

① 刘宝才：《关于重编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几点考虑》，《华夏文化》1995年第1期。

与措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消长以及处理经验；第四是历代关于农业、工商业的基本政策、管理方式和实际效果；第五是历代国家的人才培养、教育体制以及官吏选拔制度；第六是历代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处理及经验；第七是历代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状况。编者们明确提出，他们的编写目的有三：第一是向大学生、特别是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介绍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过程；第二是向大学生和研究生介绍中国历史上关于国家行政制度、社会管理、经济管理、文化政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揭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第三是结合爱国主义教育，深化并探索文科教材的编著方法。

由于这部教材力求完整、力求全面地反映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将使用面适当扩大些，因而篇幅较大，平均每卷都在 40 万字左右，六卷即达 240 万字。编者们也意识到学生们“是读不完这部教材的”，因此建议学生“选择其中若干章节去读”，建议教师“有选择地加以使用”，并准备自行将其缩编为 60 万字的两卷本，“这样，大学文科本科生读起来会更加方便些”。[①]这是可取的。

在中国通史的普及方面，2000 年出版了两部多卷本通史著作。一是由丁文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简明版，此书共 12 卷，前 7 卷为社会历史篇，叙述中国国土开辟、社会进化、经济发展、政治演变的历程；第 8 卷为民国史，第 9 卷为思想文化史，第 10、11 卷为文学艺术篇，第 12 卷为自然科学篇。另一部是由赖新元主编，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8 卷、22 册本《中国通史》，卷名分别为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部书主要以普及为重。

基于对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独特性的认识，田昌五和叶文宪等人提出了重建中国历史体系的理论思考。虽然他们还没有以完整的中国通史著作的形式外在地将其表现出来，但其理性思考却不容轻忽，很值得我们珍视。

田昌五早在 1956 年即已开始研究中国古史，1958 年后，全面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从而否定了东方不发达奴隶制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奴隶制既非西方型，更非东方型，而是独特的中国型，应定名为发达的宗族奴隶制，是宗族型的。[②]从 1978 年开始，他着手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先后发

① 张岂之：《总序》，见其主编《中国历史》各卷卷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田昌五：《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四十年治史的总结》，原载《史林》1997 年第 2 期，后收入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表了几十篇系列论文，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以“中国历史体系新论”为题，集中阐述了建立新型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宏观思考。

田昌五认为，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因受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影响，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说；因受五种生产方式模式的影响，不顾中国历史实际把中国历史纳入既定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又因为以欧洲历史为常态，以中国历史为变态，用欧洲历史剪裁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变为了欧洲历史的附庸。实际上，“中国历史是一种最正常最纯粹的发展形态。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探索中国历史的规律；用任何模式套改或剪裁中国历史，都是错误的”。[①]必须破除公式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深入到中国的历史实际，寻找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②]

田昌五“反对按朝代编写中国历史，或者按朝代分段编写中国历史，因为朝代的更迭不足以反映中国历史的规律”；“也不赞成按其他线索和文化传统来编写中国的历史，因为这不是中国历史的主线”。而原来所确定的按五种生产方式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发展程序，只适用于欧洲历史，并不适应于中国历史，因而就更应该“首先取消人为地按五种生产方式划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方法”。他提出，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应该“按中国历史自然形成的发展阶段来划分”。[③]

依据中国历史的发展系统，田昌五认为，可以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大的时代段落，即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或简称“帝国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代。至于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纳入从帝国时代到现代化的转折时期予以处理，不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④]

洪荒时代讲述的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发展史，或者是人猿社会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其主脉是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衍化过程，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

---

① 田昌五：《建立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载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田昌五以“中国历史体系新论”为核心的系列论文，基本上都收入此书及其《续编》。其中，《中国历史体系新论》一文先是收入此书，次年正式发表于《文史哲》1996年第2期。不过本文所述只是对其观点的提要钩玄，因而引述的大多是此文发表后的更为简明扼要的概括。

② 田昌五：《历史与史学》，原载《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后收入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田昌五：《史学与史家》，原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4期，后收入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 田昌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载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本文应作于《中国历史体系新论》一文写成后的1995—1997年间。

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人猿时期、能人时期、直立人时期、智人时期，时间约 600 万年。如果从社会进程来说，这个阶段应从生物人社会到氏族社会为止，以往所说的氏族社会或原始社会只是从洪荒时代向族邦时代的转变期，不能视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故此类名称可以弃之不用。①

族邦时代是因为中国古代存在着宗族社会结构，聚族而成邦。其历史主线是宗族的兴衰降替。这一时代大体可分为五个时期：宗族社会的形成和族邦的出现，万邦时期（尧、舜），族邦联盟时期（夏），族邦体系形成和发展时期（商、周），族邦体系瓦解和宗族解体时期（春秋至战国初）。这一发展路径与世界其他地区有同有异，同者是从氏族发展到宗族，异者是由家族结合为宗族，形成族邦进入文明社会。从家族到宗族，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从宗族结构予以把握。②

封建帝制时代上起战国，下达辛亥革命，为时约 2 400 年。之所以成为帝制时代，是因为这个时代通行帝制。以往称这段历史为封建社会，而且下限截至鸦片战争，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并会产生对现实有害的结论，应当废弃封建社会的提法。处在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是呈循环式发展的，前后共经历了三次大循环。据此，这段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前帝国时期，以秦汉帝国为中心，上通战国，下至西晋灭亡和南北分裂，总计 792 年（前 475—317 年）；中帝国时期，以隋唐帝国为中心，上至西晋之亡，下抵北宋之灭，总计 810 年（317—1127 年）；后帝国时期，以元明清为代表，上起北宋灭亡，下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或北洋军阀的覆灭，总计 784 年或 800 年（1127—1911 或 1927 年）。这三个时期是按照大分裂—大一统—小分裂—小统一的三次循环来划分的，从分裂与统一来讲，这三个时期几乎是重合的，可谓 800 年一循环。这种重复发生的历史现象无疑反映着某种规律，即历史大循环的规律。这种大循环的底蕴有十个方面的表现，其中，大循环的基础是土地关系的三次大循环（小循环不算），土地关系的反复变化是由于商业资本因政府的操控而造成的畸形发展，大循环的关键是农民战争和民族斗争。③“过去

① 田昌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史学与史家》、《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 年第 4 期），均见《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田昌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史学与史家》，均见《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田昌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史学与史家》、《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均见《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我们是把这三程合为一程看待的。所以避免不了长期停滞论。如按三程分别计，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1]总之，这三次大循环“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历史的运动规律”。[2]

按照中国的历史进程，经过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开始了“从历史走向现代化的时代”，[3]进入了第四次大循环。将近代社会定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是正确的，但它只是从第三次到第四次大循环的中间阶段，是处于中介状态的社会，或者说，封建帝制时代到此结束，再往前走，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代了。因为它是过渡阶段，所以其中殖民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因素可说是应有尽有，一应俱全。不过，在历次大循环之间，都出现过类似的复杂社会现象，因此这种现象也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也由于此，中国开始进入了第四次大循环。这次大循环与以往的历史大循环运动有别，以往的大循环是封建帝制时代的大循环，这次是在推翻帝制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大循环的，以往的大循环是以土地关系的循环变化为基础的，而这次大循环则是以市场经济的大循环为基础的，前者是闭塞式的，后者则要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走向世界一体化。因此，这次大循环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次质的飞跃。[4]“中国将由此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5]

以上就是田昌五提出的“通古及今的中国历史发展体系”。[6]对于自己的这一认识，田昌五认为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是“终于把握了中国历史的脉络和线索，为中国历史觅得了一套可身的服装”。[7]而自他的观点陆续发表后，也确实引起了史学界的很大兴趣和关注，并不断有人引用和发挥他的观点。

---

① 田昌五:《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四十年治史的总结》,原载《史林》1997 年第 2 期,后收入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田昌五:《一位史学大师的得与失——谈〈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原载《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收入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③ 田昌五:《从自我批判中走来》,原载《山东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收入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④ 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四十年治史的总结》,载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⑤ 田昌五:《史学与史家》,原载《学术研究》1997 年第 4 期,后收入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⑥ 田昌五:《史学与史家》,原载《学术研究》1997 年第 4 期,后收入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⑦ 田昌五:《从自我批判中走来》,原载《山东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收入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叶文宪在1999年写成《关于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考》一文，次年发表于《史学月刊》第2期。他首先梳理了70年来的古史分期讨论，指出：前50年形成了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和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八派观点，后20年虽然仍有文章问世，但都没有超出三论五说的范围。他认为，三论五说是前50年古史分期研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既然它们不可能统一，那么只有突破它们的束缚才能取得新的进展。近20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在反思和重构这一问题。他们摆脱了五形态论的束缚，已不再是三论五说"八花齐放"，而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尽管其中分期的断限和命名各不相同，但仍然达成了一些共识。从中可以看出，诸家学者对中国古代史的解读并无本质区别，断限与命名的歧义更多的是涉及方法与观念的问题，而不是对古代社会内涵的理解不同与理论分歧。于是作者提出并阐明了自己的思想方法，即网状历史与线性思维、发展不平衡与镶嵌进化现象、多种形态并存与定性定量、新陈代谢与模糊思维，从而提出了他构建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路，具体如下：

第一，完全抛弃五形态论的框架，中国历史的体系应该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第二，奴隶制是一种生产关系和剥削制度，在中国曾长期存在，但从未有过以奴隶制为特色的社会阶段；第三，不再使用内涵混乱的"封建"概念，把"封建"复归其"封邦建国"的本意；第四，在网状历史的社会立面上，只选择一条贯穿始终而又特点鲜明的线索来作为分期的坐标，避免前后阶段使用不同范畴的概念，这条线索选用国家形态；第五，鉴于镶嵌进化现象的存在，我们不必去追求每一阶段社会方方面面的同步发展。分期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研究，而不是为了把历史切断割裂；第六，尽管多形态并存和新陈代谢的渐变过程造成了质变的模糊，但分期仍应去寻找最清晰的节点，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后，这些节点应该都能用公元年份清晰地标出，而不再是含糊不清的"之交"；第七，虽然历史链是由王朝环连接而成的，但通史不应该是断代史的层层累积。在新的历史体系中，王朝不再被看成历史的主体，而只被看成是建立和管理国家的政府，朝代只具有时间标尺的作用，因为大家对此已经熟习，如果改用只有时间意义的"远古"、"上古"、"中古"，好虽好，却不能道明时代特征，而像柏杨那样数着世纪写历史又矫枉过正了。

按照上述思路，作者提出以下构想：

文献中的五帝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时代，为氏族部落向国家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已经明显出现分层，已经出现凌驾于部落之上的组织，但并不

是部落联盟。“古国”的概念很有创意，但由于尚未形成正式的国家，把前国家形态称为“古国”或“早期国家”的做法容易造成概念的混淆，而“复杂社会”的概念虽道出了实情却不是一个名称，因此不如采用国际通用的概念，称为酋邦时代。

夏、商、周三代属于一个阶段。它们并不是一条线上的三段，而是三条并行的线，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成为社会的主线。还有许多林立小国、酋邦、部落的线与它们并存，三条主线和许多辅线搓合成一条三代之绳。夏、商、周王朝只是其中最强大的，因而处于宗主的地位。这一时期国家刚刚形成，属于早期国家或初级国家，结构简单，疆域狭小，诸侯林立，贵族分权，其政治制度以封建制为特色，可称之为封建王国时代或王国时代，或按政体特征称之为封建时代。

春秋战国又是一个过渡时期。春秋时期的主流是小型王国通过武力逐渐合并，战国时期合并后的大国发展为集权的领土国家。这些区域性的领土国家是按地区划分国民的正式的国家，它们与早期国家相比，结构复杂，疆域扩大，权力更加集中，它们是帝国的雏形。这一时期是王国与帝国之间的转型时期，可以直接称其为转型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帝国，集权专制的帝国形态一直维系到清朝灭亡。这一漫长的时代可称为专制帝国时代或帝国时代，或按政体特征称之为专制时代。帝国时代可以分为各具特色的独立的三个阶段：

秦汉帝国时代，从秦统一到陈灭亡，其间包括帝国的创立到瓦解的全过程。不宜把魏晋南北朝单列为一个阶段，因为汉帝国的瓦解并未导致专制政体毁灭。这是汉民族的第一帝国时代。

隋唐帝国时代，从隋统一到宋建国，其间包括帝国的重建到再瓦解的全过程。这一轮回几乎是上一周期的翻版。这是汉民族的第二帝国时代。

多民族帝国时代，从宋建国到清灭亡。北宋虽然又一次重建帝国，但汉民族的积贫积弱已经病入膏肓，明帝国的再建只能算是回光返照。与汉族帝国的走弱相反，少数民族效仿汉族从酋邦、王国一步跨入帝国之门，并且越走越强，从辽、金、西夏到建立元帝国和清帝国。它不是一个民族的帝国从建立到瓦解的周而复始，而是多个民族轮流坐庄，故称之为多民族帝国时代。

把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划分为上述6个时代，一脉相承地道出了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历程。每个时代的界线都十分清晰，大体不会再有断限的分歧。这一古代史体系由于纳入了酋邦概念，将会对原始社会史研究产生冲击，它要求原始社会史

的研究摆脱摩尔根模式的束缚另辟蹊径。同时，这一古代史体系由于摒弃了五形态论的“封建”概念，也会对近现代史研究发出挑战。

除了田昌五、叶文宪等人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有关中国古代史体系的具体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和探索，史学界也召开了相关学术研讨会，《历史研究》编辑部还邀请田昌五在内的一批专家在2000年第2期上组织了“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的笔谈文章。相信这些植根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特性的认识基础上的理性思考，必将对21世纪的中国通史编纂产生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一）翦伯赞与《中国史纲要》的编纂

1. 翦伯赞生平简介

翦伯赞（1898—1968）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1926年回国后，南下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从事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和史学研究工作，撰写了历史学理论著作《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通史著作《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前者宣传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后者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了商、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探讨了自战国至秦汉社会性质的转变。同时，他还发表了大量史学论文，并结集为《中国史论集》第一、二册出版。这些都为正在建设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翦伯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影响力很大。在近代史研究方面，他发起编纂了两千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并亲自主编了其中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两套资料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他与邵循正、胡华合著出版了简明历史普及读物《中国历史概要》。在大学历史教育方面，从1961年春开始，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关于历史

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宏观的理论性论文，批评了当时史学界出现的极“左”思潮，以事实求是的原则，维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纯洁性。但1963年初，批判翦伯赞的策划工作即已开始着手进行。“文革”前夕，他就已经被点名批判，“文革”开始后，他很快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精神和肉体都备受摧残凌辱，最后为了坚持和维护真理，宁肯自己寂寞地死，也不愿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68年12月18日夜与夫人戴淑婉一起自尽。其一生主要学术论著，目前已编为《翦伯赞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 翦伯赞对旧著《中国史纲》的修订

早在1933年，翦伯赞就决定独撰一部多卷本中国通史著作，从古代到近代，一共八卷。1943、1946年，他相继出版了其中的前两卷，即《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分别记述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历史。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也想与范文澜、吕振羽一样，修订自己的旧著，并将其全部完成，遂在1956年开始着手主持修订《中国史纲》。1960年秋，他又着手改写第二卷即秦汉史部分，到1961年春写完第一编第一章的三节，即《秦王朝的建立及其历史形势》一文。但当年4月他接受了主编《中国史纲要》的任务，此后就将绝大部分身心投入到该任务之中，暂时放弃了《中国史纲》的修订工作。②后来《中国史纲要》虽分册进展较顺利，但政治形势却越来越严峻，以致最后连他本人直接参加撰写的第一册还未完成，就被迫害致死，更不要谈对《中国史纲》的进一步修订了。

翦伯赞在主编通史教材《中国史纲要》的同时，还独自撰写着一部断代史教材《秦汉史纲要》。③据人民出版社编审陶膺回忆，此书也准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说，翦伯赞认为秦朝时间虽然短，但却是春秋战国的总结，因此他的这部书与已经出版的同类书有所区别，要有自己的见解，有不同的特色，“要使这本书成为一件艺术品”。④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即是讲述秦汉历史的，因此他必定会把这一卷

① 由于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最终未能全部完成，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其前两卷时，分别题为《先秦史》和《秦汉史》，其整个编写计划见张传玺所作《秦汉史・校订本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先秦史》则出版于之后的1988年。

② 陶膺：《翦伯赞同志与人民出版社》，载该书编委会《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之《秦王朝的建立及其历史形势》附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7页。

③ 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④ 陶膺：《翦伯赞同志与人民出版社》，载该书编委会《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的修订工作与编写《秦汉史纲要》紧密结合。然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始终未能得到彻底修订和全部完成，实在是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一个无可估量的损失。

3. 翦伯赞与《中国史纲要》的编纂

(1) 编纂前的学术背景与理论准备

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已经形成，并逐渐影响到全党和所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大陆的史学家，比如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赞扬，不仅推动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成为热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建立了评估和重现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①]翦伯赞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开始了他对中国通史写作的理论思考。

1959年3月，翦伯赞发表论文《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明确提出：

> 我们现在写中国通史，当然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要多讲人民群众的历史。但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人的历史，并不排除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
> 把阶级斗争提到首要的地位，这是我们编写中国通史的基本原则。
>
> 在中国通史中应该把经济作为历史的主干，因为经济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
>
> 把中国历史贯串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
>
> 少数民族的历史，过去不是不讲，只是讲得不够，现在我们要在中国通史中加强这个部门，尽可能让现存的国内各族人民能够从中国通史中看到自己的祖先在祖国的历史创造中所作的努力。
>
> 主要的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此外还要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法律、文化、思想、艺术乃至宗教等等。只有通过这些重点的和多方面的研究，才能弄清中国史上各时期的社会性质，才能解决中国史上的分期问题，才能写出一部不是按照王朝断代而是按照社会性质分期的

---

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222页。

中国通史。①

同年10月，翦伯赞又在《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通史的目的，是要使学生得到一种贯通古今的基本历史概念，它不仅要阐明每一历史阶段自己发展的过程，及其所独有的历史特征，而且要阐明从一个历史阶段过渡到另一历史阶段的变革过程。"②

(2) 翦伯赞与《中国史纲要》的编纂③

《中国史纲要》的编纂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开始编纂阶段，时间是从1961年4月至1962年初；二是审查初稿阶段，时间是从1962年1—4月；三是修订与陆续出版阶段，时间是从1962年5月至1979年1月。不过，由于各部分初稿并非同时完成，加以在编纂过程中又曾出现推倒重来、另行编纂的情况，因此这种阶段的区分只是按时间顺序所做的大致划分，其中，第一阶段的起草初稿的工作在后两阶段中也是始终存在的。

第一阶段，开始编纂。这一阶段主要是决定了编纂工作可借鉴的成果，确定了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组建了编纂队伍，并开始编纂初稿。

1961年4月12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会议，翦伯赞被选为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在会上，郭沫若正在主编的《中国史稿》被规定为大学历史系通用教材，决定由翦伯赞主编一部外系通用教材《中国通史纲要》，即后来的《中国史纲要》，由他和郑天挺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同时由他本人再独自撰写一部断代史教材《秦汉史纲要》。

在此之前，即1958年秋"大跃进"时，北京大学历史系领导曾组织部分学生写过一本中国通史教材，但未能完成。第二年秋天，"大跃进"高潮再起，系领导又组织部分学生重新编写中国通史教材，这次虽然完成了任务，但编写出来的东西，连多数编者本人也不满意，甚至认为见不得人。不过，这次编写教材时，系里还指定了少数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他们在整个工作中居于次要地位，但在全部工作结束之后，却由他们接收了编得的成果，并保存下来。

1961年初，北京大学历史系事先得知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

---

① 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26页。

② 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页。

③ 本部分除明确注释者外，均据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8、211、254—259、291—295页。

议即将召开，而且北京大学历史系将由翦伯赞主编一部外系用的中国通史教材，于是就对此事进行研究。2月，系里决定以1959年学生编写的教材为基础，编写教科书。翦伯赞当时还就此事提出建议，认为学生的积极性应该保护，可以用他们的初稿为基础，能用的尽量用，不能用的再改写，并提出了具体的审稿原则和方法。

4月的教材会议决定由翦伯赞担任《中国史纲要》的主编后，翦伯赞即决定以系里正在修改的初稿为基础写成此书。由于初稿是来自青年学生，翦伯赞很是珍惜，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仔细审阅，在大约50万字的稿纸上，写了长长短短的批语数百条，修改部分约有一千多处。在他主持下，由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部分教师执笔，编写出一份《〈中国通史纲要〉编写体例》和一份《〈中国通史纲要〉目录》(草案)，作为修改时的指导性意见和全书的基本框架。

审稿触动和启发了翦伯赞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思考，归纳起来就是两个：一是如何正确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出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教材；二是组织一个怎么样的编纂队伍来完成这一编写工作。

对第一个问题，翦伯赞历时二十余日，于五月初写成《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以供各位执笔人参考。为慎重起见，翦伯赞先在一定人群范围内征求意见，继而在周扬要求下，把该文登载在11月由文科教材办公室编辑的内部刊物上，最后于12月22日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文章共提出八个问题，即：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理论、史料与文章。翦伯赞在以往思考的基础上，以正面论述为主，不具体论述问题，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这是其指导具体编写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他“毕生长期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心血结晶，也可以说，是他一生中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提出的史学理论的最高成就”。[①](详下)

翦伯赞几年来对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思想，归纳起来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坚持全面观点和发展观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写出一部按照社会性质分期，依据具

① 引文为张寄谦语，见其《翦伯赞同志与光明日报〈史学〉》，载该书编委会《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体的历史事实，阐明中国历史从一个社会历史阶段发展到另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过程，用简单明了的线条画出历史发展的轮廓，突出历史发展倾向，从而探索出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自身脉络和基本规律。“最主要的”是“要肯定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成就和贡献”。①

对于如何组建一支得力的编纂队伍，翦伯赞也因一件小事受到了启发。5月，②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正好给他送来一本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宋司马光通鉴稿》，建议他写一篇跋。翦伯赞欣然同意，阅读之后，写成《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跋〈宋司马光通鉴稿〉》，发表在 6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上。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赞扬主编司马光“亲自写提纲，对于《通鉴》一书的发凡创例所采取的慎重和负责的态度”，指出司马光“对于《通鉴》的编写，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而是一开始就抓提纲，不仅抓总提纲，而且抓每年的提纲，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纲。这一点就大大地值得我们学习”。二是赞扬司马光为编纂《通鉴》而组建的写作班子：“集体不大，每一个成员都是自己邀请的具有专门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我以为是成功地编写《通鉴》的主要条件之一。即因志同道合，在认识上、观点上就容易取得一致。即因都有研究，每一个参加编写的人，都具备独立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都能担负起他们所承担的那一部分的任务，都能写出基本上具有当时学术水平的初稿。”也就是说，编纂队伍既要和主编志同道合，也要在学术上各有专攻，要有自己的专门研究，以使全书达到“当时学术水平”。三是赞扬了司马光对《通鉴》全书的统筹提炼工作，指出：“不管参加集体的成员怎样强，如果主编置身事外，那么写出来的书，也不过是一床最好的百衲被，如果要使集体写成的书变成一个完整的连针线的痕迹都看不出来的锦绣文章，那主编就必须对全书的体例以及各段落之间的联结、贯通负起责任。司马光在这一点上作出了很好的模范。”“对于全书体例的统一安排、史实的最后校订、文字的剪裁乃至句法的锤炼，使《通鉴》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司马光付出了最大的劳动。”由此可见，要搞好集体编写历史的工作，固然要有能干的助手，“但每一部书还要有一个司马光”。总之，在翦伯赞看来，司马光主编《通鉴》，“替集体编写历史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而他“编

① 引文据田珏：《开风气之先的史学家——怀念翦老》，载北京大学历史系《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这个时间据张传玺：《教诲、指导，永记不忘》，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写《通鉴》的负责态度和治史的严谨精神，直到今天我以为还值得我们学习，特别值得集体编写历史的同志们学习”。[①]显然，翦伯赞此文不仅对编纂队伍的人选提出了较高水平的审查标准，而且对自己这个主编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因为，如果他自己不能恪尽主编之责，那他们将提供给人们的，至多“也不过是一床最好的百衲被”。因此，他将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实际上“就是表明他要真正尽到主编的责任”。[②]

为使自己主编的中国通史著作不致成为“一床百衲被”，相反却要达到“当时学术水平”，翦伯赞亲自挑选了一支相当精明强干的编纂队伍。全书共四册，第一册的先秦部分由吴荣曾撰写，秦汉部分由田余庆撰写；第二册的魏晋南北朝部分由田余庆撰写，隋唐部分起初由汪篯负责撰写，后来吴宗国也参加撰写；第三册的五代十国宋辽金部分由邓广铭撰写，元明清部分由许大龄撰写；第四册近代史起初由邵循正负责撰写，后来陈庆华也加入进来。这个写作班子，与当时《中国史稿》的几十人编纂队伍来说，绝对是“集体不大”，而且也确实极为精干，都是各自研究领域中的一流学者或领军人物，这也与《中国史稿》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人员既定，编纂工作也就随之正式开始。

第二阶段，审查初稿。1962 年 1 月 15 日，翦伯赞率邓广铭、田余庆、许大龄、吴荣曾几位编写人员，带着已成初稿南下苏州，在那里进行讨论、修改、定稿。这是翦伯赞为尽到主编责任，“特意躲到”苏州来的，“在北京不行，从早到晚，整天有人找他，不能集中时间和精力”[③]。同来的还有张传玺，他作为翦伯赞的助手兼《中国史纲要》编写组秘书，在整个编写工作中，参加了全书各部分的讨论。汪篯因病未参加，交来部分书稿。邵循正因为书稿还没写完，也未参加。16 日下午，一行人到达苏州。预定审稿时间为 3 个月，每周工作 6 天，每天 7 小时，晚上和星期日不开会。苏州党政领导给予了热情接待和照顾，并委托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柴德赓负责联系，由何荣昌负责向该校图书馆借调所需图书。17 日，审稿工作正式开始。讨论会由翦伯赞主持，带来的书稿经过印制后给每人发一份，从原始社会开始，由执笔人从头逐字逐句通读，与会者随时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柴德赓因负责联系，也多次参加讨论会。讨论的理论根据，当然是翦伯赞此前已经公开发表的《对处理

---

① 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80—283 页，但仅题为《跋〈宋司马光通鉴稿〉》。

② 邓广铭：《值得我们学习的几件事》，载该书编委会《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邓广铭：《值得我们学习的几件事》，载该书编委会《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当时预计每天讨论 1 万字左右，但因每章、每节都要讨论，甚至几乎每段、每句都要审议，而且因篇幅所限，翦伯赞要求在内容上严格把关，诸如哪些事件、人物、制度该写不该写，事例、史料是否典型，内容详略是否适当，理论、观点有无问题，甚至写法、遣词造句是否妥帖，都会被提出来讨论，因此开始几天进展缓慢。但随着经验的积累，进度逐渐加快。一般是半个月结束一部分，如先秦、秦汉部分，都是各用半个月的时间；五代宋辽金部分因字数较多，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为了主持好讨论会，翦伯赞在讨论前总是努力做好准备。他虽经年为哮喘病所折磨，但仍深夜不眠，尽量查阅有关史籍。对他的观点，大家也不是完全一致同意，加上历史问题错综复杂，原则问题上的一致并不等于对具体问题看法必然相同。翦伯赞虽然主张主编有最后裁决权，但他在讨论中，遇到不同意见，从不轻易使用裁决权，而是耐心听取大家意见，尊重少数人意见，充分发扬民主，鼓励百家争鸣，在各种意见相互修正补充后，得到比较正确的一致看法。其间，涉及体例统一、理论运用和史料鉴别等各方面问题，直到最后定稿时，他还要字斟句酌地通体进行推敲。①

三个月下来，讨论工作基本结束。结果发现，这些初稿多数没有达到翦伯赞的要求。其中，写得最好的是邓广铭撰写的五代宋辽金部分，讨论结果是篇幅上再稍微压缩一下，个别地方再进行一些小的改动，基本就通过了。其次是许大龄负责的元明清部分，也通过了审查。②其他部分要做较大的修改，有的还要重新撰写。对各部分的评估和具体修改意见都是在讨论中或讨论结束后作出的，因为是民主讨论，平等争议，各位撰写人也都同意，都感到在认识上提高了一大步，因此离开苏州时，大家心情都比较愉快。

1962 年春，苏州初稿讨论会的成功举行，是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这次讨论会使主编和各位撰写者充分交流了各自想法，在指导思想、理论原则、写作体例、章节安排、学术观点、史料运用以及遣词造句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上下高度一致的编纂思路，为下一步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

① 本段据邓广铭：《翦伯赞同志和〈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学报》1978 年第 3 期，此文系他与陈庆华、张寄谦、张传玺合作撰写；邓广铭：《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见《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书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许大龄负责的元明清部分通过审查一事，见张传玺为许大龄《明清史论集》所作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基础，可以称之为全书编纂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

讨论之中，涉及的理论、观点、史事、材料以及一些技术处理上的问题很多，柴德赓还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江南史学界的一些情况，于是，翦伯赞又有针对性地发表了长达17 000余字的理论性文章《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指出史学界在史与论、政策与理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等四个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点。虽然这都是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过程发生的，但“我们应该承认这些缺点，改正这些缺点，让我们的历史科学更健康地发展”。[①]此文的内容，既是针对当时整个史学界的，也是对他自己先前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的重要补充，因而成为此后《中国史纲要》编纂的另一指导性文献。吴宗国认为，翦伯赞的这两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宝贵财富，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学人”。[②]但也就是这两篇文章，后来竟被同时污蔑为“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历史观点”。

第三阶段，修订与陆续出版。这一阶段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重新改写先秦部分的史稿，二是其他各部分陆续审阅、修订和正式出版。

1962年春苏州初稿讨论会成功举行后，当年夏天又迎来第二件大好事，即《中国史纲要》按照“西周封建”说来写的做法得到了很多人支持。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论者”，不同意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在1961年的文科教材会议上，翦伯赞表示，古史分期问题可以在学术上予以讨论，但作为教材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写法，以便于教学。于是他准备在《中国史纲要》中按照“战国封建论”来写。但他思想上还是处于矛盾之中。1962年6月13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教材重点项目检查会上，翦伯赞严肃而庄重地谈了“西周封建论”问题，表示自己既不同意“战国封建论”，也不能说服别人改从“西周封建论”，但是，“如果写‘西周封建’，也有好处，好多不敢讲的人敢讲了”。翦伯赞发出的这一信息，很快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高教部部长蒋南翔等人都支持他按照自己的学术观点，快点把全书写完。陆定一见面就说：“你都不敢写，谁还敢写！”周扬则在当月21日听取翦伯赞汇报历史组教材编写进度时明确表示：“郭老主编，用郭老之说；范老主编，用范老之说；翦老主编，用翦老之说。这样，有利于百家争鸣。”从这天

① 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第61—75页。初刊于《江海学刊》1962年6月号。

② 吴宗国：《翦伯赞的史学思想及其对我们的启迪》，载该书编委会《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起，翦伯赞才决定按照他历来主张的“西周封建论”来编写《中国史纲要》。[①]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史纲要》第一册先秦部分的书稿要重新改写。为此，翦伯赞将本册另一撰写人吴荣曾从内蒙古大学借调到北京大学，按照新要求重新写起，其中西周至战国部分则由他亲自执笔。为了加强“西周封建论”的说服力，以便进一步建立他在中国通史中的思想体系，他决定重新做一些必要的学术研究。[②]他把早已熟而又熟的《左传》“翻读了十几遍，书都翻烂了”。而他修改别人所写书稿时，也总要先仔仔细细地看两遍，字字推敲，句句斟酌，一丝不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过。”他曾郑重地对秘书田珏说：“《中国史纲要》写好了，我就可以到马克思那儿去报到了。”[③]

半年后，苏州审稿通过的五代宋辽金部分和元明清部分被合编为《中国史纲要》“中册”(后来改为第三册)，于 1963 年 1 月首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很快受到高校有关师生和学术界的好评。这当然是对主编翦伯赞的极大鼓励，于是翦伯赞更加奋其余勇，日夜伏案，笔耕不辍。但他哪里料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对他的批判已经开始酝酿。6 月，关锋、林聿时公开发表文章，打着“开展同志式的学术批评”的幌子，诬蔑翦伯赞“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④]

1964 年 7 月，《中国史纲要》第四册近代部分也正式出版，并继续得到各高校和学术界的好评。此时，第二册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的书稿正在审阅，第一册先秦部分正在改写之中，但对翦伯赞的公开点名批判也已经被决定下来。

1965 年 8 月，《中国史纲要》第二册正式出版，至此，全书只剩下重新另起炉灶的第一册尚未出版，换句话说，全书正式完成已经是胜利在望了。这对已感觉“山雨欲来”的翦伯赞来说，自然是极大宽慰。然而天意弄人！翦伯赞既然是要通过此书“肯定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成就和贡献”，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已没有时间允许他这样做，因此他也就不能不因全书的即将完成而对其历史命运开始担忧了。

---

① 本段主要据田珏：《翦老活在我心中》，载该书编委会《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周扬的话见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2 页。此处正文中引述的翦伯赞关于“西周封建”的话语，田珏在前引《开风气之先的史学家——怀念翦老》一文中，将其谈话时间写成“1961 年”6 月 13 日，与此处的时间正好相差一年。根据正文中各种情况看，还应以 1962 年为是。

② 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2 页。

③ 田珏：《翦老活在我心中》，载该书编委会《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④ 关锋、林聿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 年第 6 期。

就在《中国史纲要》第二册出版后两个月，10 月 19 日下午，翦伯赞同秘书田珏交谈全书的编写情况时说："我国历史总的倾向是走向统一；第二个倾向走向中央集权，由分散的贵族专制，走向中央专制主义；第三个倾向，封建文化向四周发展"。"现在又有新教条主义，我的胆子小了，不敢讲了。否定的太多了，提任何问题都是否定，历史上可以肯定的不多了。""我这本书将来是要大受攻击的，我准备他们攻。""写东西之难，不身历其境不知道。"[①]一般情况下，多年的心血所注即将全部完成，有谁不高兴呢？然而翦伯赞却是阴云密布、惆怅有加、凄凉无尽，这真是历史的悖论！

果不出翦伯赞所料，不到两个月，1965 年 12 月上旬，戚本禹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点名地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半个月后的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关锋等人时说，翦伯赞和吴晗是"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②]

1966 年 3 月，《中国史纲要》第二册进行了第二次印刷，[③]这对身处逆境的翦伯赞应该多少能起到一些慰藉的作用。但也就是在当月，戚本禹等三人又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开始公开点名批判翦伯赞，污蔑翦伯赞本人是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诬蔑指导《中国史纲要》编纂的两篇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从此，对翦伯赞的各种公开批判越来越多，同时也自然和其他人情况一样，是不允许被批判者予以分辩反驳的。6 月 1 日，"文革"开始。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司马洪涛《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批判《中国史纲要》"诬蔑农民革命，宣扬阶级调和"，"美化地主阶级，讴歌帝王将相"，"吹捧剥削阶级的'让步政策'，宣扬活命的奴才哲学"。翦伯赞再也不能正常进行任何学术研究了。不但《中国史纲要》第一册最终未能编纂完成，他本人也被诬蔑为"国民党反共老手"、"盘踞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几年后被迫害致死。已经出版三册的《中国史纲要》，不断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支毒箭，十余年中屡遭批判。参加编写的执笔人员，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株连，汪篯和

---

① 田珏：《开风气之先的史学家——怀念翦老》，载北京大学历史系《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本段全部据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5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无此内容。

③ 杨济安：《翦伯赞主要著述目录》，载该书编委会：《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邵循正则被迫害致死。[1]

1978年，也就是翦伯赞去世十年后，在张传玺、邓广铭等人的努力下，党中央决定为翦伯赞洗雪沉冤。9月1日，北京大学党委召开全校大会，为翦伯赞平反昭雪。而《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也在当年早些时候由吴荣曾重行整理修订，并补充了一些新出现的考古材料，与其他三册一起，交人民出版社一并印行。1979年1月，《中国史纲要》第二至四册率先出版印行，其中第二册为第三次印刷本，第三册、第四册为第二次印刷本，第三册的版权页上还署明是第二版。2月22日下午，翦伯赞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等送了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方毅等参加追悼会。[2]3月，《中国史纲要》第一册正式出版，与其他三册一样，印数为25万册。至此，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才最终正式完成。[3]

以上就是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编纂过程。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如此细述，主要是有两点考虑：一是因为此书是一部难得的传世经典，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公认，但对此书编纂的始末经过、期间的曲折复杂，好像还没有人做过专题性的细致梳理，而1998年翦伯赞百年诞辰以来出现的新资料，完全可以使我们做到这一点；二是整个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大陆的中国通史编纂取得了极为辉煌灿烂的成就，但这些成绩也确实来之不易，其间又经历了多少辛酸血泪，后人虽可意会，但又哪是一句“意会”可以了得！诚如邓广铭等人所指出的，“让我们用新的研究成果”，[4]来祭奠和告慰这些前辈英灵吧！

(二)《中国史纲要》的学术评价

1.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理论原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翦伯赞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活跃在大江南北。

---

① 邓广铭：《翦伯赞同志和〈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此文系他与陈庆华、张寄谦、张传玺合作撰写。

② 本段据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345页；邓广铭：《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见《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书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应读者要求，《中国史纲要》在1983年再版时合为上、下两册，1987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随着国家大学教育教学的发展，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修订版；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此书的增订本即第三次修订版。

④ 邓广铭：《翦伯赞同志和〈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此文系他与陈庆华、张寄谦、张传玺合作撰写。

因此，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很自然地更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具体说来，他主持编写的理论原则主要体现在上述《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中。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公开发表于1961年12月22日，共提出八个问题。[①]第一，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作者认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在写历史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必须承认它对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各次农民战争的具体情况不同，"所起的作用也就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在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让不让步、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不要毫无分析地在每一次农民战争之后，照例写上一节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发生在封建时代的小所有者身上的农民战争，有自己的局限性，他们反对封建剥削压迫、反对封建地主、反对封建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做一个制度来反对，把地主当做一个阶级来反对，把皇权当做一个主义来反对，"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不要强调农民战争的落后性、盲目性，也不要夸大农民战争的组织性和自觉性"。

第二，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作者指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凡生存和活动于今日中国领土境内的古代各民族，不论这些民族和当时中原王朝的关系怎样，应该承认他们都是中国人。因此写中国历史，要注意不使汉族人民的历史与其他各族人民的历史相分离，要坚持民族平等原则，既承认汉族的高级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主导作用，也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认为各族之间的友好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要着重写这一点，同时也要写各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因为民族之间也曾有过相互侵犯的事实。

第三，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中国是构成世界史的一个部分，因此不要把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和整个亚洲的历史相分离，并且一般不要与世界史相分离。在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侵略是难免的，应该根据事实，进行具体分析，不要专写战争、不写和平，也不要从历史上删去战争。必须严格批判"天朝"、"上国"等大国主义思想，虽然历史上的国与国之间的从属关系往往是征服

---

① 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5—55页。

的结果,“但也要指出,单靠暴力是不能巩固从属关系的。政治上的从属和经济上的依赖是分不开的”。要通过一些具有国际意义和世界性的事件,恰如其分地指出中国文化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也要承认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同时要慎重处理边界问题,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改变的边界问题。

第四,怎样对待发展观点。作者指出,用发展的观点看历史,这是我们写历史的基本原则,但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上升,而是以跳跃和曲折式地前进,必须找出每一社会或阶段的独特的典型的东西,萌芽、典型、残余在历史上是交错的、连锁的,不要把它们孤立起来,要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它们安排在历史向前发展的锁链上,成为一个跟着一个而出现的历史因素。但也不能无视历史前进中的曲折,划出一道直线上升的线条。

第五,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作者指出:“全面看问题是我们写历史的原则,但不等于没有重点,要透过重点显示出历史的全貌。写任何时期的历史都必须掌握这一时期的历史全局。”既要看到经济,也要看到政治和文化,还要看到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既要看到汉族的主导作用,也要看到汉族以外其他各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矛盾;既要看到中国,也要看到世界,还要看到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历史在不同的国度会着上不同的色彩,不要用个别的情况否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也必须用两只眼睛看历史,既要看到历史上的光明面,也要看到历史上的黑暗面;既不要对自己的历史盲目歌颂美化,也不要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像只是一些罪恶的堆积。

第六,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是我们写历史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排除个别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的作用。在写历史的时候,要着重写人民群众,用历史观点对待这些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也要写个别的历史人物,包括帝王将相在内,要按照他们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大小给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评价,但反对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体系。

第七,政治、经济与文化。作者明确指出:“经济是历史的主干,这是我们写历史的基本原则。但这个原则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艺术。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要写出一部有骨骼、有血肉、有灵魂的历史,不要写出一部没有骨骼的历史,也不要把历史写成一个无灵魂、无生命的东西。”随后,他就通史中如何安排经济、政治与文化中的一些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论

列，为编纂人员指明了具体操作方法。

第八，理论、史料与文章。作者指出："理论挂帅是我们编写历史的原则。"但是理论挂帅不是只要理论不要史料，不是用空洞的抽象的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原理代替或去套历史，而是用理论分析史料，通过史料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或问题作出理论的概括，"不是用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出原则"；"要把史料溶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使观点与材料统一，让读者自己从史实的叙述和分析中看出理论"。至于文章，则既要生动，又要准确、严肃，既要条理清楚、衔接贯通，又要剪裁锤炼，不要为美词而害意。为了给编纂人员提供具体可行的编写方案，翦伯赞在这一问题上和第七个问题一样，也明确提示了一些具体操作原则。其中一条是："不要过多地引用经典著作的原句，最好把文句内含的精神体现在史实的叙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界盛行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正如翦伯赞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批评的，"先写一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史料写完了，再用理论去分析，或者先戴一个帽子，引马克思一段话摆在前面，下面就全部摆史料。这不是史论结合，而是史论分家"。[1]相比之下，翦伯赞的处理方式明显高出一筹，同时他也对当时"左"倾的学风、文风进行了有力针砭。就此也可以看出，翦伯赞在主编《中国史纲要》的过程中，确实是有着自己的独到思考的。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发表于 1962 年 6 月，内容有四：第一，史与论的问题。这和上文中提到的第八条大体相同，只是这里加上了对当时学术界一些错误的更多批判。翦伯赞指出，"以论带史"这个口号虽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它带有很大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更有甚者，把"以论带史"变成"以论代史"，少讲或不讲具体的历史事实，用社会发展史的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结果造成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等缺点。他明确提出，应该废除"以论带史"的口号，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应该肯定史料的重要性，"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史料是弹药，没有弹药专放空炮是打不中敌人的"。并坚定地表示："只要不是片面地强调史料，我认为是不会犯错误的。"[2]

第二，政策与理论的问题。作者指出了政策和理论的三个区别，认为历史研究

① 本处引文见翦伯赞：《在广西历史学会上的学术报告》，载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476 页。

② 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61—75 页。

中要贯彻政策的精神，但并不是把今天的政策都塞到古代史中去，用这样今古不分的方法来贯彻政策是违反历史主义的。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也不是把古人、古事拉扯到现代，而是通过总结历史上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来为政治服务，通过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历史发展的倾向，用规律性和倾向性为政治服务。

第三，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问题。作者明确提出："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诊断。"随后对史学界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说。

第四，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问题。翦伯赞说，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但是不论客观规律性怎样重要，它并不排除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历史是人创造的，不能离开人物讲历史，如果从历史上抽出了人的活动和他们活动所起的作用，历史就变成自动发展了。不能像某些历史书那样，只按照社会发展史的一般规律来描写中国史和世界史，很少提到历史人物，不仅帝王将相的活动写得少，就是农民战争的领导人物也写得不多。他强调："写历史必须写人，必须承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作用，有些是进步的，有些是反动的，只要对历史起了作用的就要写。起进步作用的人要写，起反动作用的人也要写；只有不起作用的人可以不写。"对于自己的这个论述，翦伯赞在另一篇文章中将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为：要通过具体的人的活动去说明规律性，"最好把事实写出来，让人家看了就得出结论"。①

总之，翦伯赞的这两篇文章，既从全局上提出了编写《中国史纲要》的宏观原则，也不乏对具体编写原则的阐发，这就使全书编纂有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统一指导思想。

在具体编写过程中，翦伯赞就用这些原则来检查全书各部分的写作情况。大家说这个要求太严格，翦伯赞则解释说："这个要求我自己也办不到；但是，严格一点好。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是把历史弄得公式化、概念化、表面化、简单化、片面化、现代化。我们要反对公式化，反对概念化，反对表面化，反对简单化，反对片面化，反对现代化。不要公式化，要条理分明，脉络贯通，能够画出历史的轮廓，能够

① 本处引文见翦伯赞：《在广西历史学会上的学术报告》，载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491 页。

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趋向；不要概念化，要把历史问题提高到理论的深度和原则的高度；不要表面化，要通过历史的现象，揭示出那些隐蔽在历史背后的本质，不能从本质上来谈本质，要从现象中发掘出本质来；不要简单化，不要繁琐，不要堆砌，要能扼要地把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典章制度的具体内容写出来；不要片面化，要能分辨清楚主要、次要，有所侧重，既不片面的夸张，又要重点突出。还有现代化的问题，写历史剧的同志常常有这个问题。既不要现代化，又要为政治服务，这个行不行呢？是不是我们一为政治服务，就把历史上的古人、古事都扯到现代来，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列宁讲过一句话，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要求。离开了历史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①可以看出，翦伯赞不仅是在为编写《中国史纲要》作宏观指导，而且也是在为自1958年因批判"白专"道路而盛行一时的空论学风进行补弊纠偏的工作，其旨趣意境可谓高远。

在审稿中，翦伯赞坚持四个前后相续的基本步骤："第一是资料的审查。资料对了，就有进一步审查的基础；资料如果错了，那就一切都错了。你根据错误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必定是错误的结论。因此我说第一步是要严加审查资料。第二，资料对了，根据你的这些资料，能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这是理论的审查。根据这个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可以得出另外的结论。到底你现在的这个结论对不对？要审查理论。第三，资料、理论都对了，但是你的这个说法现在暂时不说为佳。因为如果说了，可能引起民族之间的误解、引起国际之间的误解。这是政策的审查。第四，文字的审查。有的文章，写得很长，废话很多，我是反对的。我自己有时候也写长文章。但是我思想上总是不想把它写长。文章不是愈长愈好，书也不是越厚越好，而是要解决问题。所以，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自己多看几遍，看有没有废话。有就删掉，需要加进去的话就加上。"②由这个审查步骤可知，翦伯赞在主编《中国史纲要》过程中，是贯彻了他所提出的理论原则的。

2.《中国史纲要》的主要内容和学术评价

《中国史纲要》记述了从原始社会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历史，但全书

---

① 翦伯赞：《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载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1—102页。

② 翦伯赞：《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载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6页。

只有 71.7 万字，可谓一部简明扼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全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按照社会发展史的体系，将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四大发展阶段。其中，古代部分采用翦伯赞素来主张的“西周封建”说：以夏朝以前为原始社会；以夏、商两个朝代为奴隶社会；以西周为封建社会的开端，认为西周和春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战国是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过渡时期；从秦朝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是封建地主制社会，期间，秦汉是封建地主经济发展和封建统一国家形成、确立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北方各族的封建割据和南方封建经济发展时期，隋唐是封建经济向上发展和统一国家的重建时期，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是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和民族矛盾扩大时期，明清是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中央集权统治的进一步强化及其走向衰败时期。全书前七章即按照这一历史发展认识，依次对中国史前及古代各朝的历史展开论述，阐述其政治、经济的发展演变、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制定与调整、阶级关系与社会阶级结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重大成就。近代部分，以三章的篇幅，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变化、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及其失败、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工人阶级的壮大、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等重要问题，作了具体阐述。全书立论都有坚实的史料依据，做到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全面分析，客观评价，绝无空洞空谈之弊。

除了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明晰阐述外，该书在许多重要学术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例如，关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形态，该书认为，西周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领主所有制，具体表现为井田制，实质就是残酷剥削的劳役地租制。由此奠定了等级从属的基础，形成了领主和农奴这两个敌对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西周社会的基本矛盾。①春秋时期沿袭西周的井田制度，但逐渐瓦解，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了土地买卖关系。战国时期井田制崩溃，土地买卖盛行，地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领主制经济仍未绝迹，奴隶制残余也还保留。②秦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这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制度相比是进步的，但地主阶级不仅得以合法占有大量土地，而且还用各种手段剥夺农民的土地，致使农民生活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6—39 页。
②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0—62、71—72 页。

更加悲惨。[1]汉朝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基本上都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剥削方式以实物地租为主要方式。书中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清晰地揭示了这一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演变。

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阶级斗争问题上，该书对历代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中国古代的农民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但对农民斗争的落后性和盲目性也予以论述，这在讲述各朝各代经济发展和农民起义的章节中均有清晰详明的阐发。这是与翦伯赞主编全书的指导思想完全一致的。

与农民斗争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翦伯赞反对把所谓的"让步政策"当做历史公式随意滥用。"让步政策"最早是陈伯达在 1939 年 8 月提出的，认为古代的"每次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其结果总是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迫得他们要做些让步，使得农民及其他独立生产者稍为'休养生息'，这就成为社会生产力更往前发展的一个出发点"。[2]同年 12 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此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都承认了"让步政策"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突出农民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作用，史学界更把"让步政策"当成公式到处套用。1951 年，翦伯赞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也提到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斗争的让步问题，但表述严谨、措辞小心，显然是保持了他作为一名优秀史学理论家的冷静头脑。他说，古代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但每一次大的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的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不得不向农民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作了一些相对的让步"。[4]1961 年，翦伯赞在写作纲领性文章《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时，第一个方面也是谈此问题，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由于各次农

---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8—99 页。

② 见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6—297 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625 页。

④ 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载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43、145 页。

民战争的具体情况不同,"所起的作用也就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在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让不让步、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不要毫无分析地在每一次农民战争之后,照例写上一节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①]这直接驳斥了公式化的套用、滥用。在《中国史纲要》的编写中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如在评价秦末农民战争时,指出它"推翻了日益贪婪残暴的秦统治集团,使社会经济获得发展的可能"。刘邦等西汉统治者面对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造成的"剥削无所得的残破局面",不得不采取包括给农民一份土地、减轻赋税等各种措施恢复生产,这是"农民战争后地主阶级适应阶级关系的变化而采取的唯一可行的阶级政策"。[②]东汉时,光武帝刘秀"利用农民战争造成的有利形势",连续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这对农民处境的改善、对封建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③]唐朝初年,社会经济凋敝残破,统治者采取恢复生产的措施,其中均田令保证了农民获得一小块土地,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地主死亡逃散的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的转移到农民手中,有的成为国家控制的荒田"。所以,"唐均田令不得不承认农民占有这些田地的合法"。[④]明初统治者认识到过分压榨人民会引起暴动,同时也认识到,要发展农业,保证政府的赋税剥削,就必须把农民编制在土地上进行生产,"因此必须对农民做一定的让步"。[⑤]19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的农民革命最终都失败了,"但毕竟迫使封建政权采取一些让步措施,清政府应地主阶级的要求,在江、浙实行减免漕额约三分之一,并且规定了'业七佃三'的减免比例。但即使这样厚于地主而薄于佃农的不合理比例,在一些地区,如苏州附近,仍不免变成一切蠲免全归'业主'。因而在所谓'减漕德政'之中,偏枯的仍是农民。相反地,不断加重的厘金、盐课的最后负担却都落在农民身上"。[⑥]以上是《中国史纲要》全书中涉及农民斗争与统治者让步的几处主要内容,显然都是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实事求是的评定,并没有毫无分析地在每一次农民战争之后,照例写上一节封建统治阶级让步的内容。

①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载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45—46 页。

②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2—104 页。

③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1 页。

④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1 页。

⑤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9 页。

⑥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3 页。

这对当时史学界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空论，是有着极强的针砭意义的。但是，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关锋等人时说：翦伯赞和吴晗是“越来越不行了”，“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①]于是，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竟成了翦伯赞的一条罪状。

翦伯赞认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骨干，因此对古代各朝各代的讲述，经济发展状况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阶级结构、阶级关系都设专节，重点阐述，强调经济的发展变化，促使上层建筑也有所调整和改革。例如他们指出，战国初年各国进行的变法活动，正是顺应当时经济变化而出现的政治改革；[②]汉武帝也是在经济繁荣、府库充溢的基础上，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实行改革的。[③]明代中叶，在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江南五府地区，尤其是苏州一带的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④]明末清初，由于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清军入关前后的烧杀劫掠、武装镇压，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到处呈现凋敝的现象。随着清初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得到了缓慢发展，在江南和广东地区，手工业生产中包买商的活动比明代更加活跃，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也比明代更加增多。[⑤]

在民族关系方面，该书坚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观点，在阐述各朝各代的历史时，都专节列述各主要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在重点叙述各族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等友好往来这一主流的同时，也写出了各统治阶级之间互相侵犯的矛盾冲突，对北魏、元朝和清朝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和对待汉族政权一样，以唯物史观的原则进行客观的评价，做到了不偏不倚、平等对待。

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该书也都能予以记载，并一分为二地客观评价。如对孔子，肯定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同时指出他思想上守旧的倾向颇为明显。[⑥]对董仲舒，指出他的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秩序、神化专制皇权的同时，肯定他的学说是“适应文景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巩固封建国家

---

① 见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5 页。
②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3 页。
③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4 页。
④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97—206 页。
⑤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62—283 页。
⑥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2—63 页。

的统一，有其积极作用。他的更化和任德的主张，有助于防止暴政，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①

总之，《中国史纲要》全面、系统地讲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势，由原始社会一直讲到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社会。体系完整，内容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史料丰富，论点鲜明，文字精练，分量适当，“是那一时期编得最为精粹、最为规范的中国通史教材”，②既符合为大学生提供基本知识的要求，也为教师课堂讲授留有补充或发挥的余地。可谓“既便于教师讲授，也便于学生学习”，③确实是“一部有自己特色的优秀教材”，因而出版多年来，一直受到大学文科师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④

四、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⑤

（一）范文澜生平

范文澜（1893—1969），字芸台，又字仲沄，曾用笔名武波，浙江绍兴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继续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进修并任校长蔡元培的秘书。此后曾在沈阳、上海等地工作，1922 年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30 年以“共党嫌疑”被捕，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保释出狱。1932 年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次年受聘为院长。1934 年再次被捕并被解往南京，因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面营救，1935 年 1 月返回北平，在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但仍受监视。1936 年离开北平，到开封河南大学任教，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22—1936 年，范文澜先后出版《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书，获得学术界好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 年开封沦陷。范文澜在河南桐柏山区参加新四军的抗

---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98—200 页。

② 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2 页。

③ 张传玺：《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简介》，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此文对《中国史纲要》的不足也有简要概括，指出最大缺点是近代史部分比例太小；先秦部分有些段落引用史料过多过密；全书文字简练但还不够生动，翦伯赞的文风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④ 王学典认为：“目前充斥大中学教坛的各类通史性质的教本大都是本书的放大或缩影。”（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3 页）但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采用的是“西周封建说”，而很多大中学历史教材采用的是“战国封建说”。

⑤ 本节主要参考蔡美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的前前后后》，《河北学刊》1999 年第 2 期。

日游击战争。1939年10月出发，次年1月到达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后，任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在延安，范文澜以他深厚的国学修养，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史学论著，由一名国学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北方大学，范文澜任校长。次年建立历史研究室，兼任主任。1948年，北方大学并入华北大学，任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并入科学院，建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任副会长，主持史学会日常工作。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是总编辑之一。1956年5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常务委员。同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9年4月，当选为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于当年7月29日病逝。他与郭沫若等一起领导了全国史学界活动，对纠正当时史学界的偏颇学风起过重要作用。他一生的主要论著已编为《范文澜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二）《中国通史》的编纂

范文澜、蔡美彪等合著的《中国通史》，依编撰人员的不同，其编撰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范文澜独撰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时期，这是《中国通史》的前身，时间是1951—1969年范文澜病逝；第二阶段是蔡美彪等续撰完成《中国通史》的时期，时间为1978—1995年全书正式出版。

1. 第一阶段，范文澜独撰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独撰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的，但要理清其前后编写脉络，还必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通史简编》的初撰谈起。

《中国通史简编》最初撰写于1940年。当时，范文澜受中共中央委托，要求其主持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以便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作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他组织研究室的人员集体编写。参加人员有谢华、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

何编法的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于是便由范文澜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1941、1942年先后出版，当时署名为“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但实际上是由范文澜独力写成的。这部著作篇幅不大，只有56万字，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编写的比较完整的中国通史著作，[①]从观点、体裁到语言文字，与旧有的中国通史著作都有着本质不同，面貌一新，受到广泛欢迎。不但解放区各地干部多视为必读之书，而且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广大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欢迎，在学者中也引起反响，得到赞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公开出版，进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影响一时的名著。[②]

1943年，范文澜继续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1945年冬他离开延安，撰写工作暂停。已写成的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在延安出版。1947年暑假时，他开始领导修订《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其中《中国近代史》修订本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1948年《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中册修订再版，但取消了上册、中册的名称。1949年，《中国近代史》重版，《中国通史简编》也在进入北京后重加修订，于当年9月出版。

以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出版情况。从渊源上说，它是后来的《中国通史》的最初表现形态，但实际上并不属于《中国通史》的真正编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1年起，范文澜开始分编增订改写《中国通史简编》，这是他独撰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开始。当年，范文澜发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谈了他对此书的认识。他表示自己对《中国通史简编》并不满意，早就想修改，但一直没有机会，1950年才开始改了一些，但仍是不能满意，还得从头再来。文中总结了《中国通史简编》与旧史书的五点本质不同：第一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否定了旧史书中以帝王将相作为历史主人的观点；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这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第三中国封建社会三千年的历史，绝不是没有发展，书中把封建社会分成三个

---

① 吕振羽在1941年出版《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时间略早于范文澜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但因种种原因，其下册出版于1948年，因而全书完成比范文澜晚了6年。

② 蔡美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的前前后后》，《河北学刊》1999年第2期。

时期,说明了它的发展过程;第四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但也指出了农民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只能对历史发展起到有限的推动作用,同时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反抗异族侵略的英勇抵抗;第五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写了不少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至于书中的缺点,范文澜归纳出两个主要方面:第一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这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片面的"反封建",对封建统治阶级中帝王将相的历史推动作用,予以否认或缩小;其二是有些地方"借古说今",简单地借古人故事来类比今人今事,有影射内容,结果古今不分,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第二是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罗列了许多孤立的现象,不相贯通,往往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显得看问题不够全面。作者指出,要写一本比较好的中国通史,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正确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二是掌握丰富的材料和历史知识,三是要有充裕的时间保证。①

范文澜就是以这样的"自我检讨"和自我认识,开始了他对旧著的修订工作。1953年8月,修订后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由远古到秦统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鉴于一些学者来信或公开发表文章予以评论,范文澜在1954年为《简编》再版写了一篇《说明》,从七个方面予以解答,同时写成《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进一步申述书中涉及的问题,于当年7月公开发表,随后将其作为《绪言》刊入1955年出版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三版。1963年,范文澜又对该文作了较多修改,刊入1964年出版的该编第四版。在此期间,他按照该文确定的指导思想,于1958年4月出版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秦汉至南北朝)。1959年9月,他写出有关隋唐五代历史的部分章节后,因病停止工作,直到1964年,才带病将这部分内容全部写完,于1965年4月、11月分别出版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第二册(隋唐五代十国)。至此,范文澜独撰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完成了三编四册,包括的历史时代由远古到五代十国,总字数约110万字,远远超过延安版同一历史时期的20余万字,很多章节都有大篇幅的专题扩展和增写。

"文革"开始后,因为有毛泽东的保护,范文澜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但也不能进行正常写作了,休息、住院治疗和在家养病成为其主要事务。1969年4月,76岁

---

①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见《范文澜全集》本《中国通史简编》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的范文澜出席中共九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7月20日，毛泽东专门派人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之前，还是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①]正在住院治疗的范文澜立即开始组织编写工作，他不待病情稳定，就在当月29日急着出院回家，在书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开书稿，准备动手写作，不料当夜即因病情突变而去世。[②]

范文澜自从1940年写作《中国通史简编》开始，后半生精力几乎全用在这部书上。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几年修订工作，更是精益求精。对此，范文澜助手、最终主持完成范文澜未竟事业的蔡美彪指出，这虽"说是修订，实际上是重写"。书名题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与旧本最大的区别是加强学术性，写成一部深入浅出的学术著作。第一册写出后就大大不同于旧编，是向深处发展了。他本来准备在1953—1957年完成这个工作，把这部书写成四本，一年写一本。可是工作实践打破了原来的设想。第一册按预定计划写了15万字，到第二册秦汉南北朝时期，15万字就控制不住了，因为他要写得具体，各朝各地方政权单独写，于是这一册一下子就写出了36万字，超过第一册一倍多。篇幅的膨胀加大了工作量，写作时间也拖长了。第三、四册篇幅更长，写了60来万字，把隋唐的少数民族都写进去了。这一时期文化繁盛，需要反映，光唐诗就写了几万字。第四册出版时已经是1965年。于是范文澜就有了新的想法，干脆写出十卷，300万字规模。后来蔡美彪等人续编完成的十卷本《中国通史》，就是贯彻范文澜的这个意图。[③]因此，1951年，范文澜独撰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才是这部《中国通史》编撰的真正开始。

在范文澜写作过程中，协助他工作的人也都分工做一个领域的专门研究，提供资料或初稿，供他分析概括。其中最年长的是金毓黻，分工宋辽金部分；明清部分是王崇武；唐代长安部分是蔡美彪，回鹘部分是余元安，吐蕃、南诏部分是王忠，张遵骝负责搞佛教史料长编，用五六年时间从全部佛经中摘出百余万字史料。范文澜自己的撰写工作非常认真，每部分都是在扎实研究基础上才动笔的。他对佛教

---

① 《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6页。据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毛泽东是派女儿李讷给范文澜传话的，见其书第15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曹靖华：《往事漫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所收《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80页。

③ 许殿才：《千秋青史情无限——蔡美彪先生谈十卷本〈中国通史〉》，《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本来不太熟，通过对张遵骝整理的百余万字史料长编反复钻研，才写出隋唐佛教部分的几万字。大家的通力协作，和范文澜自己的严谨科学态度，是这部著作写作成功的重要保证，这对后来的续修者们也有深刻影响。①

2. 第二阶段，蔡美彪等续撰完成的《中国通史》。

蔡美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28 年生于杭州，与范文澜是浙江同乡，1949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5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从 1953 年起，他开始协助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

1969 年范文澜去世，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刚刚写到五代十国，大家都以为这部书就这样结束了。但后来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指示组织力量继续完成。1974 年，蔡美彪等人从"五七"干校回来后，近代史研究所给国务院写报告，决定让他负责开展这个工作。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据蔡美彪说："大概是因为长期协助范老的人只有我还年轻，身体尚好，还能工作。原来参加工作的人，金毓黻、王崇武、余元安都已去世，张遵骝、王忠都在病中。"蔡美彪接受任务时，先是想到了《三国志·陆逊传》中的一句话："年轻望浅，任过其才。"但想到范文澜生前的话"完成比不完成总要好些"，于是鼓起勇气，承担了这个重任。他的想法很简单："范老生前我是他的助手，身后我仍然应该做他的助手，帮助他完成未竟的事业。"这既是对范文澜的尊重，也是一种崇高的学术责任感！此后二十多年，蔡美彪一直按这个想法努力以赴，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这部书上。

对于续修工作，蔡美彪谦称是"续貂之业"，但做下来也着实不易，是靠集体合作才得以最终完成的。蔡美彪组织了写作小组，同时邀约一些其他学者合作撰写。参加人员有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经济所、文学所的，还有来自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西北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几位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合作者或编写初稿，或提供材料，都全力以赴，一直配合得很好，没有出现写稿不认真、写了稿子不许修改等棘手情况。蔡美彪负主编之责，前几册政治、经济合在一起，由他统稿，独立的章节分别编写，他做修改；各册的政治史、思想史部分大都是参据其他人员的初稿，由他写定。其中明代经济由李洵编写，清代经济单

---

① 许殿才：《千秋青史情无限——蔡美彪先生谈十卷本〈中国通史〉》，《史学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范文澜在自己完成的三编出版时，在书前"说明"中都提到了协助者，从中可知唐代经济部分由卞孝萱提供史料。

独列为一章，由汪敬虞独力完成。为了说明各册的编写分工情况，每册书前都一一注明，最后出版时也是共同署名，表示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在续修中，对范文澜已经完成的三编四册，只做加工，不做改动。加工包括订正引文错误，为古地名加注，近年新的考古资料选录若干图片做为文字的补充，补编人名索引等。续编的六册在写法上尽量贯彻范文澜的意图，同前几册保持一致。例如在语言表述上，范文澜的文字有特点，他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文笔流畅，驱遣自如，续修者们也努力学习，力求接近；在内容上，则继承范文澜"述而不作"的宗旨，不搞影射，不做多方面的发挥，主要让事实说话。至于历史对现实有什么作用，怎样发挥它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等，则由读者自己从史实中去体会。书中有时也作评论，但不多。"我们的目标是求得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史实与观点的统一，让对历史不熟悉的人也能看明白，愿意看下去。"

续修者们始终注意要有个整体框架，要有严谨的内部结构，全面系统地叙述历史的发展状况，既要有理论指导，又要以叙事为主，权衡和安排好轻重主次，做到叙事准确、条理清楚、简明扼要、夹叙夹议。蔡美彪认为，通史这种题目是永恒的课题，不但观点和材料取舍应该百家争鸣，体裁、笔法等也应该百花齐放，以适应不同读者需要。续编的六册没有拘泥于范文澜的原来写法，六册之间也不尽相同。如宋、辽、金、元部分把经济与政治写到一起，而清代经济就单独立了一章。总的说来，是尽量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写，以政治史为主，经济史穿插于政治史之中，每个时代设置思想文化专章，并以相当的篇幅写入少数民族的历史。把制度的订立与历史发展变化结合起来，把地区状况与时代顺序结合起来，力图让人们看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例如，明清之际不能写成断代史的拼合。明朝末年，明、清加上李自成像是"三国演义"，作者们在总体上反复权衡，还是按照历史的时序来安排篇章结构。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写作中注意到人物出场需交待身份，制度专名出现需有所说明，地理建置需注明方位、辅以地图，还要注意不把后边发生的人和事写到前边，如乾隆皇帝没出场时书中就不能出现乾隆年号，以免使读者莫名所以。

对于全书的名称问题，续修者们将其改称为《中国通史》，不再用范文澜在世时用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这是范文澜去世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的。理由有三个方面：第一，这部书事实上已不是原来《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本，而且也不是"简编"了；第二，续写的六册不能沿用原书名修订本，因为他们不能修订

范文澜的著作，其他续编、续补等名称都不好或不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在近代学术史上已经确立了地位，应该永远保留其书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写的部分改题为《中国通史》便于区别，而且事实上二者也不是同一部书。[①]

1978 年，蔡美彪等将范文澜完成的三编四册易名为《中国通史》第 1—4 册，和他们续修完成的第 5 册，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标志着这部饱含两代人心血的中国通史著作的重新启动。此后，在 1979 年出版第 6 册，1983 年出版第 7 册，1986 年出版第 9 册，1992 年出版第 10 册，1993 年 6 月出版第 8 册。至此，历时四十余年的第一部多卷本大型中国通史著作最终完成。1994 年，蔡美彪等将全书修订重版，对第 1—4 册增补了人名索引，第 5 册因起草于“文革”时期，受到当时环境影响，因而修订时在内容上作了较多的修改，其他各册也作了文字订正，由人民出版社于 1995 年一起推出精装本。此后，蔡美彪等又以十余年时间，续修了此书的近代部分，即第 11、12 册，使这一套通史著作贯穿古今，终成完璧。

(三)《中国通史》的史学成就

1. 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的指导思想

前文已述，范文澜在 1951 年曾发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文中对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了“自我检讨”和自我评价，并由此开始了他对旧著的修订工作。1953 年，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出版后，为了进一步申述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在 1954 年写成并发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3 年，他又对该文作了较多修改，最终定稿，作为序言刊入 1964 年出版的简编第四版。

在这篇文章中，范文澜首先回顾了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经过，重述了自己 1951 年对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两个缺点的“自我检讨”，即以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说今”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并出现头绪紊乱的问题。然后指出这次重新修订撰写的原则和思想：一方面主观上力求减少已经检讨出来的错误；一方面仍旧保留旧本的某些写法，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观点。由于这些理论性内容不可能在通史书中全面展开论述，所以范文澜在总结归纳出自己写作该书的指导思想的同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说

---

① 以上据许殿才：《千秋青史情无限——蔡美彪先生谈十卷本〈中国通史〉》，《史学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来，主要有九项：

第一，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第二，坚持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

第三，重视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肯定中华民族有久远的、丰富的、多方面的、创造性的科学传统。

第四，对"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历史结合起来，说明中国历史曾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阶段。

第五，对"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按三个时期四个大段向前发展的，从西周到秦统一是初期封建社会，从秦到隋统一是中期封建社会前段，从隋到元末是中期封建社会后段，明至清鸦片战争以前是后期封建社会。这个历程费了三千年时间，之所以延续如此之久，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历史走着大螺旋式和无数小螺旋式的发展路线。其间，农民阶级（包括一切被剥削者）反对地主阶级（包括一切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经济上作出些让步和改良。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某些部分的适合，社会生产力因而多少有些发展"。"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农民革命战争起着速度不高的火车头作用，但绝不能否认它是推动历史的火车头"。这部分是范文澜在全文中论述最多的内容。

第六，详细阐述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所用篇幅在全文排第三位。

第七，具体阐述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唐末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在秦汉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短期的、变态的，而统一是长期的、正常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在自己独特的条件下，自秦汉起汉族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自北宋起，全国范围内经济联系性加强了，这个共同体也更趋于稳定，所以在统一力量与割据力量作斗争时，总是以统一力量取胜而告结束。这部分所用篇幅在全文排第二位。

第八，专门讨论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认为祖国、国家、君主是不同的事物，但在古代中国的条件下，常常被混同为同一事物，"被统治阶级爱祖国也爱及国家和君主，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爱国家和君主也爱及祖国，只要归根是有利于祖国和人民，他们的行动都值得尊崇"。在历史上，"汉族和当时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国，就是中国"，统治阶级为满足自己的私利，曾利用民族名义，挑动民族不合，以致造

成民族间的误解，并由此常常产生令人痛心的悲剧。如今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评定历史上的各族统治阶级的功过，他们所做的坏事应该得到各族的共同指责，所做的好事也应该得到各族的共同赞许。至于各族劳动群众爱护本国的爱国主义，当然也要继承下来，并予以更高度的发扬。

第九，对历史上战争的分类。范文澜依据毛泽东有关“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的有关论述，来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指出：“凡农民起义和全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消灭地方割据，完成中国统一事业的战争也属于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破坏性的，“凡镇压农民起义（包括国内少数族起义）的战争，统治阶级内部分裂、争夺权利、割据土地的战争都属于这一部分”；另一种是侵略性的，“凡落后国侵入中国，摧残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以及中国统治阶级侵入落后国，客观上对落后国社会只有摧残没有发生推进作用的战争都属于这一部分”。范文澜的这一划分可谓简洁明了，可操作性极强，但也容易犯教条性错误。所以他又紧接着指明，对于“正义和非正义两类战争，不可机械地看作单纯的事情”。因为有些战争虽然是正义的，但也可能带着破坏、割据等消极成分；有些战争，一方面是破坏性的或侵略性的，但在另一方面却发生了有益的作用，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汉、唐、元、清时期发动的边疆战争等，都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有益的战争。既然如此，又该如何判断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性质呢？范文澜根据列宁的有关论述指出：“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对大多数居民是否有远大的利益。”古代中国的汉族和少数族之间发生的合并土地的战争，一般是推动了少数族脱离氏族社会、奴隶社会或低级的封建社会而进入到较高级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有益于人类的进化作用，是值得同情的。但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是对中国大多数居民完全有害的侵略行为，他们在中国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是要压迫摧毁中国的生产力，因而丝毫没有进步意义，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

对于以上九个问题，范文澜认为都是贯穿在整部古代史里的重要问题，他修订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就是根据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来编写的。在这九个具体问题之外，范文澜更从宏观上指出：要写出比较完好的通史著作，“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所谓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研究中国历史而不能描绘出这个基本的事情，“就无法掌握贯串古今的一条基本线索”。“所谓旁通，就是社会生活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有机联系

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要研究当时社会的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所谓会通，就是社会一直在向前运动，而运动在每一阶段上，都结合着许多矛盾”，“直通与旁通的意义只是社会发展所包含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换言之，他所要完成的这部中国通史，就是综合了“直通”与“旁通”的所有内容而成的“会通”之作。这个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史学讲求会通思想的继承，也在内涵上做出了对传统会通思想的极大超越。

在文章最后，范文澜还谈到了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关系，指出对近代史“要作系统的、全面的、深入的、经得起盘问的研究”，指出“中国史学工作者有责任介绍中国史给全世界人民”。这无疑是在昭告世人，他在完成对自己的古代通史著作《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后，就要开始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研究，不管是修订增补旧作《中国近代史》上册，还是重起炉灶另开张，总之，他要对近代史“作系统的、全面的、深入的、经得起盘问的研究”。

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范文澜亲自完成了《中国通史》的前四册，亦即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三编四册，这是“后来续写的范本”，[①]因此他的指导思想也被续修者们坚持下来。而续修者们在完成了后六册的古代部分之后，又组织力量，完成了近代史部分，才算是最终完成了范文澜的心愿。但可惜的是，全书在 1978 年以《中国通史》名义开始出版之时，续修者们却把范文澜亲自撰写并几经修改的这篇序言删而不录，这对读者了解一生追求真理、勇于承认错误和自我批评并欣然接受读者批评的史学大家范文澜来说，未免美中不足。

2.《中国通史》的史学成就

范文澜、蔡美彪等合著的十册本《中国通史》，其结构安排及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册为第一编，内容为“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远古至秦统一”。共分五章，分别为：原始人与原始公社时代，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制度时代——夏商（殷），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列国兼并时期——东周（东周、春秋），兼并剧烈时期——战国，叙述了各个时期的政治概况、经济发展、社会面貌、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等内容。这是范文澜亲自完成的前四册中篇幅最少的一册，也是学术界争论最多的一段，诚如蔡美彪所指出的：“范老的很多学术观点大家可以不同意，但这是他最熟练、最运用自如的一段，很多东西都是烂熟于心的。这也

① 许殿才：《千秋青史情无限——蔡美彪先生谈十卷本〈中国通史〉》，《史学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是他考虑最久、研究最深入的一段”，“是精华所在”。①在编写形式上，每章最后还都有“简短的结论”，简明扼要地提炼本章的主要内容。书后并附有“历代纪年表”一份，颇便读者阅读。

第二册为第二编，内容为“秦汉至隋统一时期”。共分六章，分别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成立时期——秦，国家统一巩固后对外扩展时期——西汉，继续对外扩展并由统一走向分裂时期——东汉三国，短期统一与黄河流域又一次大破坏时期——西晋十六国，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东晋和南朝，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化时期——北朝。其中，王莽建立的新朝虽曾创立许多新制，但不久东汉基本上恢复了西汉的旧制，全部废除了新朝制度，因此将新朝附于西汉之后，不特立专章；三国、十六国的分裂，分别是东汉、西晋两朝末年割据战争的继续，因而也附于两朝之后；南北朝由若干小朝廷组成，事同割据，但两朝各有较大特点，因而都特立专章。本册对各王朝的政治概况、经济概况、政治制度、农民起义、文化发展和各族间的交往与融化等情况，都分别进行了讲述。每章之后也都有“简短的结论”，提炼本章的主要内容。书后还附有“隋以前计量单位比较表”“历代纪年表”。

第三册为第三编“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一、二、三章，分别为：南北统一社会繁荣时期——隋，封建经济繁荣疆域大扩张时期——唐，大分裂时期——五代十国。主要讲述各朝政治概况、经济概况、民族关系、农民大起义和隋朝文化等内容。每章后也都有“简短的结论”，书后附“历代纪年表”。

第四册为第三编“隋唐五代时期”的第四、五、六、七章，分别为：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大理国，唐五代的文化概况。除最后一章从八个方面专门讲述唐五代的文化外，其他各章分别讲述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每章后也都有“简短的结论”。

第五册是蔡美彪、朱瑞熙、李瑚、卞孝萱、王会安合著，为第四编“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一分册，以上、下两章的形式讲述宋朝中央集权制封建统治的加强和政权的南迁，这是宋代历史发展过程的简述，内容包括政治发展、经济状况、变法斗争、农民起义、抗金斗争、抗元斗争及灭亡等。在《编写说明》中，作者指出了本册的两个编写特点：一是不沿袭政治、经济和思想斗争分别并列的叙述方法，而是基本上

① 许殿才：《千秋青史情无限——蔡美彪先生谈十卷本〈中国通史〉》，《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对经济领域和政治思想领域的发展和斗争的状况，结合起来叙述，以便于说明事件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二是书中对农民起义叙述较多，但不沿袭把农民起义列为专章的体例，而是依据年代先后，次第加以叙述，借以表明阶级斗争是怎样一步又一步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从本册起，各章之后都不再写“简短的结论”，但附录比前四册有所增加，本册就附录有“宋代农民起义年表”、“宋代纪年表”、“宋代行政区划表”、“宋代地名表”和“人名索引”等五个方面。1995 年修订版对第五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作了若干史实的订正和文字的调整，内容间有删略和增补，第三节增添了子目，但全书的基本内容没有改变。

第六册是蔡美彪、周清澍、朱瑞熙、丁伟志、王忠合著，为第四编“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二分册，包括第三、四、五章，分别为：辽朝的建立和政权的西迁，西夏的兴亡，金朝的建立和封建制的发展。这三章是对辽、夏、金统治下各民族历史的简述。编写特点是不沿用宋辽夏金综合叙述的体例，而把辽朝、西夏和金朝各列为专章，其中辽朝、西夏部分全面叙述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金朝的经济发展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结合政治状况综合叙述，但因金朝文化基本上是北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为元代的北方文化奠定了基石，因此不在本册内讲述，而是放在下一分册与宋、元文化一并叙述，以便表明前后的联系和发展。书后附录有“辽、夏、金纪年表”、“辽、夏、金地名表”和“人名索引”。

第七册是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张岂之、范宁、朱瑞熙、严敦杰合著，为第四编“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三分册，包括第六、七章，分别为：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宋金元时代的文化概况。前者内容包括蒙古建国及此后的元朝政治发展情况、经济状况、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对外战争、农民战争与元朝灭亡，以及元朝统治下的蒙古族、藏族及西北、西南诸民族的发展状况，借以表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元代中国的历史。后者叙述宋金元时期的文化状况，包括经学、哲学与理学、文学与艺术、学术著作、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内容。书后附“元代纪年表”、“元代农民起义年表”、“元代行政区划表”、“地名表”、“人名索引”。

第八册是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纲合著，为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一分册，包括第一、二章，分别为：明朝的建立与集权统治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明朝的衰落。以明武宗为分界，对明太祖至武宗时期和明世宗至神宗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做综合叙述，以便读者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整个明朝时期，蒙古贵族始终占据北方草原，与明朝时战时和，互相影响，因而这两章也以一定的篇幅

讲述蒙古历史发展的概况，并对藏族和边疆各族与明朝的关系也作简要叙述，以便显示这一时期历史的全貌。至于各少数民族状况的分别叙述，则另立专节介绍，不在本册之内。书后附"明代纪年表（太祖至熹宗，附元、金）"、"明代行政区划表"、"地名表"、"人名索引"。

第九册是蔡美彪、李燕光、杨余练、刘德鸿合著，为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二分册，包括第三、四章。其中第三章为清朝的建国、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概述明天启至清顺治时期中国历史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时期，金或清朝、明朝和农民军形成相互角逐的三大势力，展开频繁的斗争，结果是清王朝建立起对全中国的封建统治。本书没有沿用明与金、清分朝叙述的体例，而是依据年代的顺序，综合叙述这一时期三方势力的消长，以便显示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第四章为清朝统治的巩固与疆域的奠立，讲述康熙至雍正时期的政治概况。书后附"明代纪年表（光宗至南明桂王）"、"清代纪年表（太祖至世宗）"、"地名表"、"人名索引"。

第十册是蔡美彪、汪敬虞、李燕光、冯尔康、刘德鸿合著，为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三分册，也是全书古代史部分的最后一册，包括该编第五、六、七章，分别为：乾嘉时期的清朝，封建经济的衰落——清初至嘉庆，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文化概况。作者认为，乾隆时期的清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由强盛转入衰弱。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正在相继兴起，并开始侵略东方。嘉庆帝的继承者道光帝即位后，便面临着鸦片输入的威胁，1840 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由封建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因而本书的叙述至嘉庆帝去世为止，但这只是为了体例的统一和叙事的便利，并不表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断限和分期，"如果写到 1839 年，很多史实无法交待，全书无法收住"。[①]清王朝在乾隆时期确立了自己的版图，本册设立专节，叙述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借以表明清代中国的五十余个民族都应有其历史地位。关于清代经济状况的论述，单独列为专章，这是因为清王朝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的衰落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有必要以较多的篇幅，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作出较详的叙述，以便读者对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前的状况得到较全面的了解。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文化学术经历了曲折发展而出现繁荣，本册对文化学术的各部门分别作了有重点的简要评介，旨在显示这一时期的概貌和发展历程。书后附录有"清代纪年表（太祖至仁宗）"、

---

① 许殿才：《千秋青史情无限——蔡美彪先生谈十卷本〈中国通史〉》，《史学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地名表"、"人名索引"。

综观《中国通史》,除了内容系统完整、史料丰富翔实、全书规模宏大、体例也有自己特色外,在涉及中国古代史的诸多宏观问题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第一,在"直通"与"旁通"的基础上,阐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1954 年,范文澜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再版说明"中答复学界的评论时说,此书是他"在学习古代史时,企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给中国古代史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来。这个轮廓,第一,要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同样不等于一个公式),曾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诸阶段,并无亚细亚特殊之说。第二,要说明在明、清两朝,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存在的,但远不曾发展到足以破坏封建社会的程度。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是完整的封建社会,其中并无封建制崩解之说。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制起崩解作用,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大量史实中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不可能在近代史上和革命理论上找到任何根据。使古代史与近代史联结起来,近代史上一切问题(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从而得到说明,即从社会性质上得到说明,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此"。①简言之,就是将唯物史观和中国的具体历史结合起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演变规律。

同年,范文澜写成《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对上面的"基本轮廓"及两个"要说明"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在范文澜看来,长达三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四个大段,即从西周到秦统一是初期封建社会,从秦到隋统一是中期封建社会前段,从隋到元末是中期封建社会后段,明至清鸦片战争以前是后期封建社会。书中对以上的看法作了多方面的展开。范文澜指出:"禹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共有的大同社会。"②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原始公社制社会。他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在四五十万年前,中国已有原始人居住。这些文化系统不同、所奉祖先不同的各族,在各自发展自己的同时,相互间经常有冲突,也经常有经济上、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以至于融合或部分融合。禹时农业进步和军事胜利,使部落中财富增加,奴隶成为一种重要的财产,原始公社制度开始解体,向奴隶制度发展,进入了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③

---

① 范文澜:《第一编再版说明》,见氏著《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第 29 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第 27—28 页。

“启可以废‘禅让’制，说明私有财产制度在禹时基本上成熟了。”不过，禹、启和夏朝，虽然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产生了阶级社会，百姓（奴隶主）与民（奴隶）两个阶级继续在扩大，百姓群中贵与贱、富与贫继续在分化，原始公社制度继续在解体，但这些都是渐渐地进行的，因此原始公社制度所占的地位也是逐渐缩小的，不能把夏朝看作奴隶制国家已经完全成立，只能看作原始公社正在向奴隶制度国家过渡。在过渡期中，国家也就不知不觉地发达起来，产生了帝位世袭的上层建筑，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它反过来又加速了私有制度的发展。[①]商战胜夏，奴隶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商正是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②]

代替奴隶制社会的，是封建制社会。范文澜是“西周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除了在书的序言中以专题形式详细阐述了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外，在正文中也有大量论述。他指出，“商朝后期是奴隶制度临近崩溃、封建制度开始形成的社会”。[③]周族的古公亶父在被戎狄侵略威胁的情况下，为缓和内部矛盾，采用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的生产关系”，并建立起一个初具规模的周国，封建制度开始萌芽。“这个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是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的，因而产生了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文王时封建制度已形成，其政治也对邻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但还只是一些原始的制度，显著的发展是在武王克商以后。武王克商后，开始分封诸侯。周公杀武庚，灭东方十七国，才实行大封建。由此，封建制度扩大到周势力所达到的所有地方，在奴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许多封建制度的国家，整个社会组织贯彻着封建精神。不过，奴隶依然大量存在，用途是从事手工业、商业、农业劳动，并且供封建主家庭役使，仍是构成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在庶民总数中，奴隶数量是较小的。[④]

“东周是初期封建社会发展并开始转化的重大时期，推动的力量主要是大小宗族间的兼并战争”。频繁的战争逐渐破坏了旧制度，产生了新制度。新旧制度最基本的变化，是旧宗族制度逐渐在破坏，新家族制度逐渐在兴起，即旧的领主阶级逐渐被新的地主阶级所代替，旧的农奴阶级逐渐被新的农民阶级所代替。跟着这个最基本的变化，其他制度也变化了，由此产生地主统治的封建社会。“西周领主统

---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30—31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39、42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53页。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66—69、73—76、103—104页。

治与秦汉地主统治的中间,东周和战国,正在进行着两种统治的交替运动,东周则是这个运动的开始”。①大小宗族间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期发展到了剧烈阶段。“战国将近二百年的长期战争,本质是地主政权代替领主政权的战争,是家族制度代替宗族制度的战争,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代替诸侯割据称雄的战争”,结果“基本上是地主政权的秦”战胜了“领主地主混合政权的山东六国”,“出现了统一全国的封建地主皇朝——秦朝”,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成就”。②

秦朝结束了西周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以“地主政权代替领主政权”,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开始成为伟大的统一国家。③这是中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中期阶段的开始。西汉时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东汉则建立了地主式剥削与商人式剥削同时并行的中央集权国家。④但由于封建国家的统一,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割据的状态,因此,自东汉末年起,爆发了统一与割据两种势力的斗争,再加上汉族与非汉族的斗争,造成长期战乱的局面,黄河流域遭受破坏极其惨重。汉族政权的被迫南迁,使得长江流域的开发加速起来。北魏后期,黄河流域经济逐渐恢复。两大流域的合并,大大扩展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基地,推动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中期的后段。⑤

隋文帝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重新统一了全国,并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⑥即中期封建社会后段。唐朝遵循隋朝制度,又接受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使农民获得土地并减轻赋税,农业生产从而发展起来,使唐前期出现了国内安宁、四裔宾附、富强无比的良好局面,但腐朽势力也在滋长。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政治上腐朽势力占有优势,强盛的唐前期也就开始转入外强中干的唐中期。腐朽势力占优势的唐中央政权和吐蕃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进行长期的战争,是唐中期的特征。后期,宦官掌握皇帝本人的生杀予夺权,唐朝廷实际上是宦官政权,更加腐朽,最终引起了农民大起义,加速了唐朝的灭亡。起义失败后,割据势力乘机混战,造成一片大混乱,最终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五代十国存在着许多有利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186、144、108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274、188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4、35页。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174、343页。
⑤ 范文澜:《第二编说明》,见《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
⑥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4、111页。

于南北统一的因素，因之分裂只能是暂时的”。这期间，北方遭受将近一百年的破坏，南方在同时期内，基本上得免战祸，从此，经济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人口比例也变为南方大于北方。①

范文澜指出：“赵宋统一中国后，政治上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抑制割据势力。”此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愈益强固。宋朝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但落后的女真族统治者的入侵造成了很大破坏作用，紧接着元朝又统一中国，破坏作用比金更强烈，社会发展受阻。朱元璋领导的农民战争击败元朝，结束了元朝的野蛮统治，社会才又走上发展的阶段，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后期封建社会。②

明朝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极高的程度，在某些地方的手工业和商业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现象，不过“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里还只是极微小的胚胎或萌芽，同时还混合着浓厚的封建成分，但是，这是极可珍贵的胚胎或萌芽”。清朝统治全国后，由于疆域扩大，封建地主经济比明朝更加繁荣，“若干地区正在发芽的”、“鹅行鸭步地在前进”的资本主义因受到严重压制，发展的速度迟缓，不可能顺利地发展起来，因而，虽然“鸦片战争前中国‘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存在着的，但同时必须确认，中国仍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又必须确认，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经济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性，某些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存在，但对整个封建社会并不曾发生破坏作用”，“微弱的资本主义还不能对封建主义的大局起什么影响”。③在《中国通史》中，续修者们在讲述明代经济时，没有提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在讲述清代经济的专章中，则坚持了范文澜的观点，明确指出：“清代的工商业，自清初至嘉庆时期有所发展，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处在发生或成长的过程之中。但发展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在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封建经济仍然居于支配的地位。”④

以上就是范文澜以中原王朝为中心，把唯物史观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而给中国古代史画出的基本轮廓，如此详细而具体、清晰而明确的论述，不但在他所处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第 425—427、524—525 页。
②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③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06 页。

的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相当不容易做到的，直到现在也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除此以外，范文澜等人还对那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的社会发展规律、基本轮廓也极为重视，在书中进行了细致阐述。例如对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作者分为"统一黄河流域以前的代国"、"强盛的魏国"、"由衰至乱的魏国"三小节，详细讲述其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作者指出，鲜卑族是在东汉时逐渐兴起，成为汉魏北边新起的大敌，但鲜卑族长期停顿在原始社会阶段上，以畜牧射猎为业，生活简单朴陋，刻木作符信，没有文字。檀石槐以后，开始行世袭制度。继起的强大部落有慕容氏、拓跋氏等。其中慕容部接受汉文化，迅速进入封建社会，在辽河流域建立燕国，占领中原五六十年；但拓跋部和慕容部走着不同的道路，对汉文化有缓慢的接受又有顽强的抵抗，尽量保持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到两晋时期，才开始在经济政治方面有显著的变化，酋长猗、猗卢、什翼犍得到汉族士人的辅助，逐渐成为封建专制性质的国王。"虽然原始社会的残余和奴隶制度的趋向同时并存，但并不能阻止鲜卑社会的封建化"，"是在封建制度社会内部发展奴隶制度的国家"。国王代表国家统一的新趋向，贵族(诸部落大人)保持原始社会的旧惯例。国王与贵族间存在着矛盾，使得国家形成一次、溃散一次，不能稳定下来。到魏道武帝时，统一的国家稳定下来了，但统治阶级仍然采用两种剥削方式。多数人受田当农户，大体上属于封建关系，另一种是完全的奴隶生产，因而奴隶制度在魏国更发展起来。不过，从魏国的整体来看，它还是一个封建国家。魏太武帝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魏国武功极盛，封建制度社会内部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度。魏末大乱，北齐又以鲜卑习俗立国，奴隶制度更有所发展，奴隶数量巨大。不过，奴隶经济比起封建经济来，还是次要的，齐政权依然是封建性质的政权。北周在周武帝以前，也是一个掳掠人口当奴隶的国家，奴隶数量比齐国却少得多。[①]对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社会发展进程，理清脉络，分清主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作者一手写来，却能清晰连贯、毫无混乱之感。

关于唐朝时期吐蕃国社会的发展，作者从其族源开始叙述，指出羌族是中国西北的一个古老的大游牧族，在远古传说时代就已经和汉族往来，商朝时屡见于卜辞，周朝以下，史书记载愈益详备。羌族居地以西海(今青海)为中心，向四方伸展，主要是向西方伸展，因东面以及南北面都受到汉族的遏阻。到东汉末年时，羌族社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569—571、677—679页。

会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上，部落随强弱或分或合，大小无常，没有君臣上下，经济文化都很落后。西晋以后，羌族从一百几十个聚散无常的原始部落进而组成吐谷浑、吐蕃等国家。吐谷浑国不断吸收汉族文化，建立起封建制度的游牧国家，这是羌族"社会发展中一个光辉的标志"，但仍保存着极浓厚的原始社会残余。隋末唐初，吐蕃勃兴，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并扩地到吐谷浑境，建立起大吐蕃国。其继承人弃芒论芒赞灭吐谷浑国，完成了建立统一的羌族国家的任务。此时，大相禄东赞祖孙三世执掌国政，他们推行一些制度，使得不发达的奴隶制国家逐渐变成低级的或者说是早期的封建制国家。当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能不保存着浓厚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残余，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割据状态。不过，经过这一百几十年的强盛时期，羌族人逐渐产生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融合成为蕃族，以此为基础，形成后来的藏族。此后，趁唐朝内乱，吐蕃夺得唐朝一些地区，对其农业发展和文化进步有很大益处，但在军事上却是极重的负担，其人力和物力都感到困难，或者说力难胜任，开始由盛转衰。不久四面受敌，处境更加困难，强盛时期结束，进入衰亡时期。但统治阶级内部继续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最后大吐蕃国分裂崩溃，出现贵族领主割据称雄而没有大君长的局面。①

回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时，但直到唐初吐迷度称汗建国以前，回纥社会还没有形成阶级，一千年间一直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公元 647 年，吐迷度建立汗国，是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标志，由于内部缺乏发展奴隶制度的条件，来自唐朝封建社会的影响又特别强大，因而封建制度在回纥社会里发展起来。②也就是说，回纥社会没有经过奴隶制阶段，就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了。而同时期的南诏则是封建制奴隶制并存、奴隶制占较大比重的国家；南诏之后的大理国因停止向外攻掠，奴隶来源减少，应是封建制占较大比重的国家。③这些情况，既表明不同条件下各族、各地区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必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族的统治者先后建立了辽、夏和金朝。书中指出，辽、夏、金三朝和中国许多民族一样，也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都经历了从原始的氏族公社制经过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的历史过程。当他们开始建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2 版，第 3—8、57—59 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2 版，第 87—88 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2 版，第 127 页。

国时，都还是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的国家。但当各族奴隶主进入汉族地区和汉族地主一起统治了汉族人民，这些民族便不能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逐渐采用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从而由奴隶制较快地过渡到封建制。其中，辽朝在景宗到圣宗时期，西夏在崇宗到仁宗时期，金朝在海陵王到世宗时期，逐步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这个转化过程不能不伴随着两种制度、两种文化之间的斗争。斗争反映到统治集团的内部，他们各自依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形成各具特点的发展道路。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推动了这个过渡的进程。①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结束了草原长期以来的部落纷争，蒙古社会由此进入阶级社会，确立了奴隶制”。元朝灭宋后，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标志着从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到封建制国家转化的完成”，但蒙古奴隶主所建立的国家，在统治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封建制的地区后，不能不经历一段对新的生产方式的适应和过渡的过程。奴隶制因素的注入，使得宋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遭到挫折，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奴隶制与封建制度的并存，在蒙古贵族内部形成代表不同集团利益、不同政治主张的对立的势力，不断酿成经济的、政治的斗争。蒙、汉贵族地主间的矛盾与斗争，往往和蒙古贵族内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这些不断出现的反复的斗争，使元朝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蒙古统治者也没有像前朝的女真和后来清朝的满族那样接受汉族的文化。元朝的统治因而不能维持长久，但蒙古民族却因而在元朝亡后能继续保持本民族的传统，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②

明朝灭元并统一东北后，那里的女真诸部落在同蒙、汉各族的交往中，逐渐发展了它的社会生产力，从原始部落发展到奴隶占有制。努尔哈赤在同各部落的斗争中，逐渐成为建州最强大的奴隶主贵族，建立起奴隶制国家——金国，“标志着满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也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国继续发展奴隶主的利益，对外掳掠奴隶和扩大土地的占有，而明朝以封建的统治方法压迫女真人民，双方矛盾日益不可调和，最后战争迭起。皇太极改金为清，到其子顺治时建立起统一全国的清王朝，此后到康熙统治的四十年间，清朝经过与被统治民族汉族的反复斗争，巩固了它的统治，同时也不能不从实践中逐步放弃了满

① 蔡美彪等:《第六册说明》，见《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蔡美彪等:《第七册编写说明》，见《中国通史》第七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引文见该册第 31、97、162 页。

族传统的奴隶制，“全面接受了汉族的封建统治制度和统治方法”，“虽然传统的奴隶制残余，仍在某些方面继续存在影响”，但清朝从整体上已经是一个封建王朝了。雍正即位后，进一步发展封建统治制度，限制满洲贵族势力，“残余的满洲奴隶制因而更加削弱了”。①

以上这些对少数民族政权社会发展进程的探讨，既说明了中国历史是由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也表现了各地区、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为认识和把握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提供了实例和借鉴。而这些内容和前述范文澜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而给中国古代史画出的基本轮廓相契合，以发展和联系的观点，从纵向与横向、“直通”与“旁通”两个方面，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整体、全面的把握，揭示了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和走向，在“直通”与“旁通”的基础上，达到了“会通”中国历史的目的。

第二，关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形态。范文澜指出，西周是初期封建社会，整个社会组织贯穿着封建精神，而其“最真实的经济基础自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的宗族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占有制度，以封建剥削为其内容，以氏族组织为其外壳，宗子则是宗族全部土地的所有者。卿大夫受封土作为自己的采邑，在采邑内可以收族聚党。受封人的嫡长子世世相传为宗子，其余子孙以及异姓的姻亲称为族党。他们多数耕种宗子的土地，身体被束缚不能自由迁徙，精神上也被尊祖敬宗的信条所束缚，惟恐自己失去了宗族的庇护”。东周时，“家族制度代替宗族制度，也就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度代替以一个宗族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度”，“这是领主土地所有制转化为地主土地所有制”，从此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作者认为，“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向个人私有可以买卖的家族土地所有制转化，成为东周社会各种变动中最基本的一个变动”，“建立在宗族制度上的旧国家因之也就逐渐变为建立在家族制度上的新国家”。②秦朝建立后，“土地个人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在这个法令下，地主和有田农民自动陈报所有土地实数，按定制缴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③西汉建立后，“劝告流亡民众归还故乡，领取原有田

---

①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九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17、27—28、266、297、395—401 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第 76、105—108、186 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第 13 页。

宅。……土地大量荒废,农民在轻税下,可以按人力多少开辟荒地”。[①]也就是实行地主土地私有制。此后一直到清朝,“绝大部分土地始终集中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由地主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自耕农所占的土地,只是耕地的一小部分”。[②]期间,明朝由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而建立,但这“并不能改变原有的土地占有制度,新建的明王朝依然建立在地主占有制的基础上”。[③]地主占有土地,以征收地租田赋的方式剥削农民。不过,各朝政治形式有所不同,剥削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如东汉是以南阳豪强为基干建立起来的豪强统治政权,南阳豪强多兼营商业,“因之东汉的统治,是地主式的剥削和商人式的剥削同时并行,这和西汉统治以重本抑末为名,地主式剥削比商人式剥削较占优势的情形多少有些不同处”。[④]宋代时,地主以租佃方式剥削佃农成为对农民的主要剥削形态,剥削方法是采用分成地租和定额地租两种。而随着租佃制关系的发展,地主放高利贷也成为对佃农的重要剥削手段,“高利贷像是一副枷锁,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世世代代无法挣脱。在宋代社会经济中,高利贷剥削日益成为极为突出,极为严重的问题”。[⑤]在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比分析中,使读者更为清晰地把握不同时代的发展特色。

第三,强调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当然重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作用,他在序言中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期四段,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的。他还进一步认为,因为有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自北宋起,全国范围内经济联系加强了,这个共同体也更趋于稳定,这就是中国自秦汉起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在论述民族融合问题时,作者指出:“诸族融合的规律,人数少的族往往融合于人数多的族,但不算是最主要的规律。最主要的规律是经济文化低的族融合于经济文化高的族。因为水总是向低处流,社会却总是向高处走,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长久遏阻这个趋势。”[⑥]显然,这都是强调经济因素对国家形成和民族融合的强大基础作用。

在范文澜完成的四册书中,不但对原始社会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情况有具体描

---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第 40—41 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4 页。
③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3 页。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第 343 页。
⑤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7—38 页。
⑥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2 版,第 125 页。

述，而且对宋朝以前的各朝各代及少数民族政权，都尽可能地单独设立专节，讲述其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状况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阶级结构、阶级关系等内容，其中西汉部分设立"农业与农民"、"工商业与工商"、"地主、大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奴隶主"三节，近四十页篇幅；"唐代经济"则以上下两节，近百页篇幅，分别讲述汉唐盛世时期的经济状况。从第五册开始，续修者们对宋、元、明及其他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经济史叙述，一般不再沿袭范文澜及其他学者对政治、经济和思想斗争分别并列的叙述方法，而是基本上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将经济史穿插于政治史之中，结合起来叙述，以便于说明事件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但仍对经济发展和社会阶级结构等内容有专节讲述。考虑到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的衰落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有必要以较多篇幅对其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作出较为详细的叙述，以便使读者对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前的状况得到较全面的了解，于是作者们对清代经济状况的论述单独列为一章，这是全书十册中唯一的变例，但其重视经济基础作用的意旨则更加凸显。可以说，范文澜及其后续者们对经济史内容的不同处理方式，体现了变通而为，但变例而本质不变的精神实质，可谓深得"直通"与"旁通"相结合的"会通"之道。

第四，在民族问题上，本书坚持"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我们应该平等对待国内诸民族"的观点，[①]认为"中华民族的悠久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②]书中不但有许多专节，更有专章的形式，以相当的篇幅记述了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发展历史，借以表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当时的中国就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国。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们高度肯定了这些少数民族的自身发展对中国历史全局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如论羌族时称："羌族在青海建立起吐谷浑国，是社会发展中一个光辉的标志。羌族一部分自青海进入西藏，一部分迁徙到蜀边境内外，也陆续进入西藏，广阔遥远的中国西部从此逐渐得到开发，羌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唐时吐蕃国勃兴，分立的诸国合并成为统一的大国，尤其是社会发展中一个更光辉的标志。中国西部出现吐蕃国，无疑是历史上的大事件。"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并扩地到蜀和吐谷浑境，建立起大吐蕃国。……他在位的时候，创造文字，制定制度和法律，与唐和亲，吸收汉文化，原来寂寞无所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国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了。这是吐蕃历史的大进步

---

① 范文澜：《第三编说明》，见《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2 版。

② 蔡美彪等：《第六册说明》，见《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时期，也是中国西部居民开始参加历史活动的时期”。总论回纥与吐蕃国说：“回纥和吐蕃在唐时建国，对中国历史都是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单从汉族历史看来，吐蕃兴起，只是唐朝感到西方出现一个强国。从中国历史看来，却是广大西部地区的居民，从此参加了历史活动。回纥的重大意义在于，自迁入西域后，逐渐成为西域的主要居民，而原来居住地漠北，逐渐为蒙兀室韦所占有。从此，大漠南北和天山南北都固定了居民，改变过去游牧族流动的常例，此后许多历史事件是在这个情况下表现出来的。”[①]对于南诏国的历史作用，书中指出：“南诏是封建制奴隶制并存、奴隶制占较大比重的落后国家，尤其是八三〇年以后，掳掠大量唐人，愈益增加了奴隶制成分。但在另一方面，云南境内落后的和非常落后的许多蛮部，都被它搜寻出来，迫使接受统治，在经济和文化上获得不同程度的提高。尽管这种统治带着残暴性，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来，却也含有进步意义，不容否认它对蛮族社会的贡献。”[②]

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奴隶主的国家辽朝，虽然当时还只是初具规模，但比起原始的氏族部落制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无疑是契丹族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契丹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辽代契丹、汉族等各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辽文化。在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辽文化有一定的贡献。”[③]元昊采取一系列建置，完成了建立西夏国家的巨大事业，“这是党项族历史发展中的一大事件，也是中华各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夏国的出现，对我国各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国在党项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和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为具有民族特点的夏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一时期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夏国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④]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在我国北方延续了一百二十年之久，最后被元朝灭亡，“女真族人民在和汉族人民长期相处中，交流了经济和文化”，“并为元代的北方文化奠立了基石”。“在元朝统治下，女真族逐渐与汉族融合，和各族人民一起，继续展开了反抗元朝地主阶级统治的斗争。”[⑤]总之，“契丹、党项、女真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开发了我国北部的广

---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2 版，第 5、58、61 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2 版，第 133 页。

③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3、34、141 页。

④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2、200、226 页。

⑤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第 454 页，《第六册说明》，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大地区，发展了社会生产，也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①

元朝作为一个统一王朝来说，统治时间不到百年，并不很长，但元朝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书中指出，“它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方面是：元朝结束了宋、辽、夏、金以及吐蕃、大理等长期并立的局面，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从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多方面的联系，并且基本上奠立了中华民族的版图。另一个方面是：蒙古奴隶主所建立的国家，在统治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封建制的地区后，不能不经历一段对新的生产方式的适应和过渡的过程。奴隶制因素的注入，使得宋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遭到挫折，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无疑是阻碍了汉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元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总的说来，并没有超越南宋时期的生产水平。只是若干部门，如棉纺织业、印刷业和火炮制造业的生产技术有所前进。但是，由于元朝幅员的广阔和交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以及元朝与西域、南海各国之间，加强了贸易往来。因此，元代的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得到较大的发展。……元代江南的商业城市，以杭州为代表，在当时的世界上是较为发达的”。②

由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朝，曾经使中国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作者也对其前期历史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肯定了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积极贡献。书中指出，清朝到康熙帝时进一步建立起完整的封建政治制度，并采取措施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在多民族国家发展方面，则是建立了对边疆各民族地区的统治，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基本上奠立了中国的版图”。③发展到乾隆时，清朝“已经完全确立了自己的版图。生活在今天中国境内的五十几个民族，都已处于清朝的统治范围之内”。而社会经济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发展，也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处在发生或成长的过程之中”。④

第五，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阶级斗争问题。范文澜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否定以帝王将相作为历史主人的观点，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肯定农民反对剥削压迫的斗争的正义性，肯定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

---

① 蔡美彪等：《第六册说明》，见《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蔡美彪等：《第七册说明》第 163 页，见《中国通史》第七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③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九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20 页。

④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6、4、406 页。

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如对商周文明，书中明确指出："(商朝)奴隶劳动产生了相当高度的古代文化，特别在手工业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周朝封建文化的一部分，继承商百工技术的优秀传统，才得到发展。"[①]认为西周自由民阶层在逐渐扩大，"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产生地主、推到领主的有力阶层"，指出"周初大封建之所以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农业奴隶被释放，获得了农奴的地位"。[②]战国时，束缚在宗族里的大量农奴"大体变为农民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下，战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生产力前所未有地提高了"。[③]而在谈到秦国统一的原因时，作者用很多篇幅，特别提出"劳动人民要求统一"是"有巨大作用"的两个原因之一。[④]对隋文帝，作者指出："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认为隋文帝为巩固国家统一有三大贡献，第一条就是"厉行节俭政治，使民众在较轻的剥削下得以发展生产"。[⑤]这些论述，都鲜明体现了作者的人民史观。

对于汉唐之间的历次农民起义，范文澜在书中都设有专节讲述，不但如实记述了起义的原因，详细记述了起义的发展过程、结果，而且对起义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失败的教训也就是农民起义军的局限性，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对其历史意义给予了总结。如对秦末农民起义，书中指出，其后果是迅速推倒了秦朝的统治，使"较多地代表农民阶级的政治要求"的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巩固了统一国家，这是"农民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的"第一次显著的表现"。[⑥]东汉前期，因王莽时期的农民战争的推动，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主要表现为西汉后期极其紧张的土地与奴婢问题得到了部分的解决，依靠这个解决，东汉才建立起将近二百年的统治。[⑦]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黑暗的东汉朝廷也被他们推到了。[⑧]隋末农民起义，"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使得唐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改善，农民付出的代价固然不小，但终究产生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⑨]唐朝取代隋

---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64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82—83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200、274页。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233—234页。
⑤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第4、25页。
⑥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174、35页。
⑦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177、179页。
⑧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263—264页。
⑨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第88页。

朝，但直到唐太宗登帝位，才开始盛大起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前后不同的历史转变，那是因为："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①

对于宋朝以后的农民起义，续修者们一般不再列专节单独讲述，而是依据年代先后，将其与该朝政治、经济结合在一起，在把握各种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次第加以叙述，借以表明阶级斗争是怎样一步又一步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如对北宋初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作者夹叙夹议地详细记述了起义发展的全过程，充分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意志和革命精神，最后指出："在宋朝建国后不久就爆发的这次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也为后来农民阶级的斗争开辟了先路。宋太宗的残酷镇压阻挡不了农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洪流。赵宋一朝，全国各地规模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地兴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②对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作者指出，方腊在起义誓师时对宋朝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控诉，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声，因而立即获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不断取得战争的胜利，最终虽因各种原因被统治者镇压下去，但"起义军前仆后继，英勇反抗的战斗精神，又一次显示了中国农民的光荣传统"。③肯定了人民群众斗争的正义性。作者在书中对北宋和南宋时期影响较大的农民战争多有叙述，并各自进行了结论性的简短总结，如论北宋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浪潮，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宋朝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腐朽的北宋王朝，灭亡的日子临近了。"论南宋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这些斗争事迹已足以表明，不能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大众多么英勇地向地主阶级展开了反复的斗争。在强大而凶恶的敌人面前，分散各地的起义群众虽然获得了不少振奋人心的胜利，终不免遭到镇压而失败。但是，革命的农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前仆后继，斗争，失败，再斗争，有如大海的怒涛，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南宋王朝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2 版，第 116 页。

②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8—59 页。

③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07—214 页。

的黑暗统治。”[1]面对元朝的腐朽残暴统治，韩山童、刘福通领导农民发动了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队伍不断壮大，进展十分迅猛。这反映了反抗元朝统治的起义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2]最后由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领导起义军，灭亡元朝，建立明朝。“战争破坏了元代的大土地占有关系，无数农民在斗争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田地，垦复荒田，开发新田”。明朝政府也承认了战后农民对既得土地的占有权、耕种权，开垦荒地归垦者所有，并规定新开垦的田地“永不起科”，这些都“加速了农业生产的恢复”，而“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后，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渐趋停息”。[3]但是，那些未经元末农民起义扫荡的地区，“地主豪强与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并没有因为明朝的建立而得到缓解，反而由于战乱对经济的破坏而更加激化”。于是，在豪强势力较强、土地兼并较重的地区，遭受残酷压榨而走投无路的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直到五十年以后，这些地区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农民得到较多的谋生之路，起义的风暴才渐趋息止。[4]后来，由于土地兼并和残酷剥削等重重压迫，明朝末年又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并在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以后，转变为以抗清为主的民族斗争，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在这历时半个多世纪的长期斗争中，豪绅地主阶级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赶出霸占的土地，胜利的农民就成为这些土地新的主人。“可见，农民获得土地，地主丧失土地，首先是农民斗争的结果”。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绝大部分土地始终集中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由地主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自耕农所占的土地，只是耕地的一小部分。但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可能出现一个短暂的时刻，这时的地权分配发生有利于自耕农或小土地所有者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出现在一次农民斗争的风暴之中”。[5]

以上这些论述，与 20 世纪末否定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论调截然相反，但是揆诸历史实际，又怎能说不是历史事实呢！农民战争既然是战争，就肯定会对社会的正常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都有破坏作用。但是，农民起义是官逼民反，是统治者首先破坏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农民起义则是通过战争的极端形式，迫使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促使社会发展由不正常向正常转化。

---

①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18、418 页。
②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七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8 页。
③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5—116 页。
④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1—142 页。
⑤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4—275 页。

第六，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同时，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进行客观评价，承认他们对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并在历史比较中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范文澜曾经多次"自我检讨"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的两个缺点，即以片面"反封建"和"借古说今"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且头绪紊乱。在范文澜和续修者们共同完成的这部《中国通史》中，这两个缺点都得到了克服，不但罗列孤立现象、头绪紊乱、缺乏分析的叙述没有出现，而且有影射内容的"借古说今"也完全绝迹，更有意义的是，以前因片面"反封建"而造成的否认或缩小封建统治阶级中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的内容得到了彻底修正，代之以对历史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的、历史主义的评价。例如，在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中，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人的历史贡献都是被否认或缩小的，但在《中国通史》中，情况则已不同。书中在揭露秦始皇是暴虐皇帝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个皇帝在历史上应得的评价，只能依据他的表现来加以判断。如果表现得好（当然不可能有完全的好），那就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他的专制主义的广大权力，也就得到当时社会的承认，他所发起或完成的某些有益事业，也就作为积极的因素而被珍重。秦始皇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尽管他是个暴君，但是，他建立地主政权代替领主政权，建立统一的大国代替割据的小国，比起秦以前的封建时代来，显然是进入了新的时代，他和他的统治机构，显然比前一时代的封建国家起着较多的作用。因此，他创建的许多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的。后来延续二千年之久的封建体制，基本上是秦制的逐步演变。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秦朝首尾仅十五年，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做成了许多有利于统一的重大事业"，"对历史有巨大贡献"。[①]对汉武帝，书中在指出其对内残酷剥削、对外穷兵黩武从而激化了国内各种矛盾的同时，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总结了他的统治成就和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明确指出："杰出的汉武帝推动西汉朝进入全盛时期"，"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有特殊功勋的伟大人物"。[②]隋炀帝是历史上的暴君，他为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和残虐政治，开凿了大运河，"伤害大量民命，罪恶极大，但运河修成后，南北交通有显著的改进，对经济联系、政治统一都起着广泛的作用。河北、河南、淮北、淮南、江南人民通过隋炀帝的发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从长远的利益来看，当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4、35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49、174—175页。

时人民所受伤害是取得了补偿的”。[1]这就从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肯定了开运河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改变了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根本不提其积极一面的“看问题不够全面”[2]的失误。连暴君都能得到历史主义的公正评价，其他历史人物自然更是如此。

在论述和评价人物的过程中，作者往往用比较方法，在两相对比中清晰地揭示和把握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如论秦末农民起义的三大领袖：“当时三个起义首领，陈胜缺乏政治军事经验，虽然失败了，号召反秦的功绩是巨大的。项羽借钜鹿一战，摧毁秦主力军，对农民起义是一个大贡献。但是，他代表领主残余势力，要把社会倒退到秦以前的旧时代去，阻挠历史前进的趋势，他只能成为一蹶不振的可怜虫。农民起义的果实自然要落到本身地主阶级化但也代表农民部分利益的刘邦手中。”之后又单论刘邦：“刘邦是胜任的起义首领，他比陈胜、吴广、项羽较多地代表农民阶级的政治要求，因而得到农民的支持，终于击败强大的项羽军，成为最后的成功者。”[3]隋文帝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但整个朝代却二世而亡，书中论述隋朝的两位皇帝说：“隋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皇帝。因为节俭，剥削比较减轻，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开皇年间，户口和财产都有巨大的增进。隋炀帝置兴洛、回洛两大仓，正说明隋文帝时财富的积累何等雄厚。隋炀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为奢侈，民众被剥削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民众只有起义推翻隋统治，才能找到生路。”[4]于是隋朝就这样灭亡了。隋末农民起义的规模非常大，可是缺少能胜任的起义领袖。“起义农民是推倒旧政权的根本力量，但必须再加上领导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李密、窦建德起初是农民领袖，后来起义旗帜愈举愈低，不可能获得胜利。唐朝廷虽然是贵族官僚集团，但人们认为它是未来的统一者，各州郡纷纷向它降服，它的文武官员很少投降别人，正好说明唐朝君臣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因而起义的果实，最终不得不归于北周旧贵族李渊所建立的唐朝。“农民起义军既然缺乏足以取胜的领导人，而唐朝恰恰具备着取胜的条件，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果实归于唐朝，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可以理解的”。[5]这一

---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第 33 页。

②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第 35、174 页。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2 版，第 111 页。

⑤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2 版，第 111—112 页。

比较，有如层层剥茧一般，让人们在理论与史实的综合分析中，从深层次上把握住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唐朝的历史发展也是这样，“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就显出他是弱点最大的一人。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唐玄宗恰恰相反，在励精求治取得成就以后便精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元时期才达到极盛的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唐太宗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开元时期正是从治安转向危亡的过程，唐玄宗的骄侈心又正是这个转向的关键”。①唐朝为什么会一步步兴盛起来，又为什么在国势发展到最盛的皇帝手中很快衰落下去，这一比较，清晰准确地揭示了原因。以上这些对比论述，不但让人们清楚明白地看到了不同历史人物成功与失败的缘由，更使人很容易地从历史比较中看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那就是，个别历史人物只有重视民心向背，重视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才能使自己的行为和事业取得成功；只有励精图治，慎始慎终，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功。简言之，人民群众最终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顺应这一发展要求，个别人物就可以推动历史迅速向前发展。显然，书中的这些要言不烦、精到高明的比较分析，是其“直通”与“旁通”基础上达到“会通”的又一突出表现。

第七，相对于其他通史著作，大篇幅地讲述各个时期的学术文化史是本书的一大明显特色，不但此前的所有通史著作不能与之相比，就是后来的多卷本通史著作也难以企及。范文澜本是国学造诣相当深厚的学者，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各个领域内都有独到研究。在延安写作《中国通史简编》时，就以自己渊博的国学底蕴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精要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学术文化史内容。在重新修订过程中，这一方面的内容更得到大大扩充。其中，西周、春秋、战国的文化史部分，原来只有“周代思想概况”一章，包括“孔子”、“儒家及其所传经典”、“墨子及墨家”、“老子及道家”、“孟子与荀子”五节，后面附录一个“简短的结论”提炼本章内容。增修以后，西周一章增写了一节“统治阶级的敬天保民思想”，使原来没有的文化史内容在这一章得到了增加；东周一章增写了“古代文化的创造”一节，其他三节“孔子及其所创儒家学说”、“儒家学派与儒经”、“墨子及其所创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第145页。

墨家学说”，也都在原有各节基础上做了不同程度的增写修订；战国一章的文化史内容增写后成为“孟子与邹衍”、“老子与庄周”、“荀子与韩非”、“散文与诗赋”、“战国文化的一般状况”五节，显然是大大扩充了。秦汉至南北朝部分，原来只有一章“秦汉以来文化概况”和南朝部分一节“南朝文化的发展”。“秦汉以来文化概况”包括“儒家学派”、“道家与道教”、“佛教”、“儒佛道的斗争”四节，也就是说，原来秦汉至南北朝的文化史部分只有五节，范围也相对狭小。增修以后，西汉一章的文化史内容有两节，分别是“经学、史学、历数学、诸子”和“文学”，东汉三国一章的文化史内容也有两节，分别是“经学、哲学、科学、宗教”和“史学、文学、艺术”，西晋十六国一章包括“西晋文化”和“十六国时期的文化”，东晋和南朝一章还是“南朝文化的发展”一节，但篇幅由原来的 6 页增加到 55 页，[①]北朝一章则增加了一节“北朝的文化”。隋唐以下，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原来只有一章“隋唐以来文化概况”，包括“佛经的翻译”、“佛教的盛行”、“道教”、“儒佛道混合物——宋学”、“正统派宋学”、“反对派宋学”、“卓越的思想家”、“考据学派”、“文学史略说”九节，后面附录一个“简短的结论”，总计 45 页。隋唐五代部分经过范文澜增修后，隋朝一章增加了一节“隋朝的文化”，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和大理国三章各自增加了宗教与文化史内容，“唐五代的文化概况”单设一章，下设八节，即“佛教各宗派”、“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儒学由旧的汉学系统开始转向新的宋学系统”、“道教的流行”、“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近体文与古文”、“唐朝的史学、科学、艺术”、“唐代长安——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后面附“简短的结论”，仅这一章即达 323 页，而其中关于佛教的两节，则是在百余万字的资料长编中提炼出来的几万字，足见作者增修过程中的呕心沥血和取精用弘。

续修者们对宋代以下各时期的文化史内容也是尽量予以详细阐述，并注意揭示文化发展演进中的前后联系。如辽朝和西夏的文化，书中都有专门论述。北宋、金朝、元文化，专列“宋金元时代的文化概况”一章，下设“经学、哲学、理学”、“文学与艺术”、“学术著作”、“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五节二十三目，予以综合论述，篇幅达 196 页。明清时期，学术文化经历曲折的道路而出现繁荣，作者根据全书断限，设立“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文化概况”一章，下分“理学、哲学与经学”、“学术著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四节十八目，篇幅达 147 页。纵观全书，如此大篇幅

① 这个页数对比，是据 1948 年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20 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的《中国通史》第二册；本段内的所有目录章节对比也是据此二书。

的展开对中国古代文化史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论述，可谓无前人、少来者。

除了以上几个宏观方面外，本书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有许多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因学界对此已多有论评，本文不再赘述。由于本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因而全部完成后，很快获得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此后还多次印刷发行。2004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发起并组织实施《中国文库》工程，旨在整理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优秀的文化成果和出版成果，第一辑百种中史学著作占9种，本书即赫然在列。这些荣誉，当然是对该书价值的大力肯定。

此外，本书还有另一重要学术价值。十册全书成于两代史学家之手，时间跨度长达43年，期间整个大陆学界的学术风气多有变化，这当然会影响到本书的写作。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范文澜完成的前四册，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有关论述时，都用黑体字印刷，以示与其他文字在形式上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各种论著中大量引用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说成为一时风尚，范文澜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将引用语以黑体字来表示，正是当时学术风气的鲜明表现。后来的续修者们虽然也引用了不少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但都与其他文字一样，并无形式上的特殊之处。续修者们在以《中国通史》的书名陆续出版全书之时，对范文澜完成的四册并不作任何改动，第五册完成于"文革"期间，后来虽有修订，但基本内容没有大的变动。因此，这十册全书也就给后人留下了探讨和研究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史学风气转变的第一手资料，其本身即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但目前学界对此尚缺乏足够认识，在此提一下，以请学界重视。

五、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

(一) 郭沫若生平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有沫若、麦克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四川乐山人。少年上私塾时，已就先秦学术和文化知识打下良好基础。1914年春，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因接受斯宾诺沙、惠特曼等人思想，弃医从文。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并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1923 年,郭沫若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等,并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 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 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郭沫若公开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受蒋通缉。同年 8 月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郭沫若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避居日本,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并于 1930 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被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此外,他还陆续推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甲骨文、金文著作。

1937 年 7 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激于民族大义,已在日本组织家庭近十年的郭沫若,毅然弃家回国,投身抗日战争,先后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1948 年,郭沫若被选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但他拒绝了这一当时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这一阶段,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很有影响的论著。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为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出版有《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等论著。1978 年 6 月 12 日,在北京病逝。

郭沫若著作等身,除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外,其个人作品被编为《郭沫若全集》38 卷,其中文学编 20 卷、历史编 8 卷、考古编 10 卷,1982 年起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他的许多作品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二)《中国史稿》的编纂

《中国史稿》的编纂,无论从编写人员,还是从出版情况上说,都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 1958 年 12 月至 1971 年前,是《中国史稿》的初修及内部出版时期;第二阶段是 1971—1976 年"文革"结束前,是《中国史稿》的修订重编及公开出版时

期;第三阶段是1976年10月到1995年4月,是《中国史稿》的修订完成时期。

1.《中国史稿》的初修及内部出版时期:1958年12月至1971年前。

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的观点。但其全书只是由一篇导论和四篇分论性质的论文结集而成,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并没有系统详细的梳理,因此作者在1947年4月10日为该书重版所写的《后记》中,谦称该书只是其"研究过程中的初期阶段","是应该重新写过的"。紧接着,他笔锋一转,说道:"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把社会分析、思想批判等,通统包括在里面。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①]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部论文集,每篇文章都是用论说体写成,而像《中国古代史》这样的著作,其中虽可以有作者自己的评论,但毫无疑义要以叙述体为主。因此即使郭沫若想"重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不会写成"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的《中国古代史》,这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著作。所以,郭沫若一度产生写作《中国古代史》的念头,与他想"重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关系不大,而是受到了其他因素的感染和刺激,他所说的"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也应该是有所指的。1947年以前,《中国古代史》、《中国通史》之类的著作已经很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在郭沫若之后并受到郭沫若影响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也已经纷纷写出了名为"中国通史"、但实际内容为"中国古代史"的著作。郭沫若产生写作中国古代史的想法,应与这三人著作的陆续出版有关。但他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没有着手",而且在他自己"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郭沫若自己虽然不会主动着手,但并不能阻止外力推动他进行。

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向郭沫若提出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的希望。此后,经过有关方面初步商议,在1956年2月提出了一份《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计划草案》,主要内容包括:第一,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1—312页。

全书的叙述范围是从旧石器时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字暂定为100万字；第二，由全国史学家36人组成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以郭沫若为召集人，负责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第三，殷周组由尹达负责召集，秦汉组及魏晋南北朝组由翦伯赞负责召集，隋唐组由向达负责召集，宋辽金元组由邵循正负责召集，明清组由吴晗负责召集，近代现代组由范文澜负责召集。教科书中的插图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地图由谭其骧负责，索引、年表由聂崇岐负责；第四，由郭沫若、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7人组成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的编审小组，负责组织写稿和审稿的工作，由郭沫若主持；第五，教科书中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采用郭沫若的主张，即殷周为奴隶社会，战国以后为封建社会；第六，关于教科书的体例，文字要现代语化，不直接引用原始材料，必要时加注释；第七，关于编写的时间进度，规定1957年初完成初稿，"经过征求意见和反复讨论，三年到五年最后定稿付印"。①

四个月之后，即1956年6月，编辑委员会增为40人。7月1日，郭沫若邀请了50多位史学家和哲学家座谈编写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讲了编写这两部书的意义后，又一次提出了请"郭老来领导编写这本历史教科书"的希望。范文澜、吴晗、翦伯赞等先后发言，认为中国历史必须有一本教科书，而且教科书的观点应该"定于一"，要刚刚到大学来的学生接受学术上的各种意见是不行的。郭沫若在讲话中认为，教科书应该"百家争鸣"，强调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办法，表示同意在集体编写完成后，由他"做整个书的校对工作"。会上确定，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任务交给中国科学院负责。

1957年初，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三所分工负责古代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到鸦片战争、近代和现代部分的编写。1958年，该书列入国家计划，分工相应调整。全书的编辑工作在郭沫若领导下，由尹达、田家英、刘大年、侯外庐共同组织。第一、二所即后来的历史研究所负责远古至鸦片战争部分，第三所即后来的近代史研究所负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部分，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部分。此间，尹达受郭沫若委托，就全书编写计划、指导思想和体例、历史理论的处理以及人员调用等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和多方努力；而在此后的具体编修过程中，尹达也是实际负责人。

---

① 本段据谢保成：《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载《郭沫若研究》第10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264页。

1958年12月，筹备工作大体就绪，各部分开始编写提纲，后来郭沫若在第一册初版“前言”中将此列为编写工作的正式开始。1959年初，各部分先后拟出较详细的大纲征求意见。3月召开了中国历史提纲草案座谈会，主要讨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部分的提纲草案。参加座谈的有陈垣、范文澜、吴晗、翦伯赞、侯外庐、尹达等中外历史学家60余人。范文澜、吴晗、翦伯赞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等先后讲话，郭沫若则先后两次讲话，希望除执笔者外，还要有参谋部，请到会的专家作参谋部的“诸葛亮”；强调在不同意见中尽可能采取辩证的办法取得“同”，不应该让小异长期“异”下去，必须努力求其“同”。同时，他还指出编写任务的艰巨：100万字，几千年的历史，要照顾到各个时代经济、政治、思想、学术等方面，并不是容易的事，民族问题的处理很难、很复杂；小组分头写，以后如何统一也有困难；并提到应注意工艺史的问题。在集中会上各种意见之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小组又请郭沫若专就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讲述他的系统意见，郭沫若讲了他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和古史分期问题的看法，形成《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文。随即，开始了全书的编写工作。

1960年春写成了初稿，印送给部分史学工作者和有关单位进行讨论，收到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经过认真研究，编写组对初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形成二改二印稿，即《中国历史初稿》。12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尹达代表编辑小组向郭沫若和学部委员、有关专家汇报了《中国历史初稿》的编写情况、体会和存在的问题。

1961年2月26日，郭沫若看了“奴隶社会”部分的《初稿》后，在给尹达的信中就“所发现的错误和可疑的地方”提出41条具体意见，并建议“加些脚注”。3月21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尹达、黎澍等就《中国历史初稿》交换了意见。当天，翦伯赞又写信给郭沫若，谈了关于《中国历史初稿》的意见。郭沫若在复信中认为“这样的意见，对于执笔者很有帮助”，并表示要“仔细把稿子读它一二遍，再同大家交换意见”。翦伯赞的信，郭沫若通过尹达转给了编写者参考。在此同时，《中国历史初稿》陆续印出后，分发全国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和有关历史研究机构进行讨论。在各单位分别讨论的基础上，六大区又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式组织了进一步的讨论。截至6月初，各地先后提出大小意见7 000余条，比较多的是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鉴于这种情况，编写组准备先集中力量钻研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而不急于修改稿子。但是，就在这时，教育部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又确定将此书初

稿作为大专院校历史系的试用教材。结果，三改、四改的计划不得不变更。在较短的时间内，只能作必要的修改，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史实问题不得不留待以后再研究和讨论了。

经过半年左右的努力，由尹达、田昌五、林甘泉、杨向奎、郦家驹等对第一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第二册（战国至魏晋南北朝）进行统一加工，刘大年负责第四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半部，从鸦片战争写到五四运动前夕）定稿，准备付梓。

1962 年 2 月，郭沫若看到为这部书稿出版起草的《前言》讨论稿，认为“写得不错”。经周扬等修改，3 月 6 日由他本人亲自定稿、署名，并题写了书名。《前言》扼要地叙述了这部书的编写经过和应付高校历史教材急需而匆促付印等情况，强调把“具有正确的思想体系、严密的结构和独创的风格”作为“长远的目标，不断地继续共同努力”，因此目前这部书“作为待增删修订的《中国史稿》”，“希望进一步集合全国史学界的力量来加以琢磨，使它能够成为比较可以满意的定本”。当年 6 月、10 月，作为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史稿》第一册、第四册由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印行，1963 年 12 月，该社又内部出版了第二册。[①]

在 1958、1959 年“大会战”时，参与《中国史稿》编写的人员，除基本队伍外，前后不下几十人。时隔不久又骤然减员，以致每段只留下一两个人，设想经过琢磨而后提高。[②]当时的编写规划是，全书从原始社会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分作六册，其中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册，近代史部分一册，现代史部分二册。[③]但出版第一、二、四册后，其他分册尚未出版，即因“文革”中止。

郭沫若对这一阶段《中国史稿》编写中所起的作用，谢保成根据郭沫若的有关

① 以上内容均据谢保成：《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载《郭沫若研究》第 10 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年版；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5—264 页。内部出版情况见 1979 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二、三册《后记》。郭沫若建议加些脚注的情况见其《致尹达（一函）》（载《郭沫若研究》第 10 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年版），原文是：“我建议全书是否加些脚注，像《资本论》的脚注那样。因为这本书既是一般性的读物，也是学术性的著作。有脚注，便于作进一步的研究或参考。但这恐怕是烦难的工作，全书施注颇不容易。但可考虑作此准备，以便再版时加上。”这个建议也被采纳，第一册内部初版时即已加注。

② 刘重日：《中国史稿》第六册《后记》，见《中国史稿》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郭沫若在 1962 年第一册初版“前言”中说，参加编写的人员“将近百人”，同期的《〈中国史稿〉第一、二、三册编辑工作说明》说是“约达六十余人”，1979 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二册《后记》中也说是“约达六十余人”。

③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前言》；中国历史编写组第一组：《〈中国史稿〉第一、二、三册编辑工作说明》，均见《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书信及其对初稿、清样的修改意见，指出：1961 年 2 月底，郭沫若在审阅《中国历史初稿》第二册《奴隶社会》部分后，提出 41 条 58 则需要修改之处；这与 1962 年 6 月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一册奴隶社会部分比较，除有 5 条 5 则意见未按信中所提改动外，其余的 36 条 53 则意见都程度不同地被采纳并作了相应的改动。1963 年，《中国史稿》第二册封建社会（上）校样仅前五章的 180 页中，留有他的校改笔迹的就有 65 页，其中除个别地方，基本上都是按照他的校改出版的。这些改动的具体内容，涉及提法相矛盾而应当统一的问题；提法值得斟酌的问题；若干重要修改的问题，包括理论认识的修改和重要史实的修改；关于字句、标点的删改问题；一些史实的增补和删改问题。谢保成认为，这些修改意见"足以表明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的工作是多么具体入微，同时更可以理解他关于集体编写完成后'做整个书的校对工作'的全部含义"。[①]不过，和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相比，郭沫若的主编工作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里，不能不提到翦伯赞与《中国史稿》的一段并不愉快的插曲。1961 年 3 月，尹达亲自把征求意见稿送给翦伯赞审阅，翦伯赞阅后，两次当面向尹达、一次向郭沫若提出自己意见。其中一个主要意见是不同意把历代的农民战争写在每一个王朝的开端，主张写在后面，作为王朝的结束。尹达表示不能同意，认为旧的历史编写体系必须要打破，把农民战争放在王朝前边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编写的一种首创精神，正是对旧的历史编写的一个革命。4 月，翦伯赞承担了主编《中国史纲要》的工作，5 月写出了《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跋〈宋司马光通鉴稿〉》，发表于 6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主旨是赞扬司马光真正尽到了主编的责任，赞扬司马光为编纂《资治通鉴》组建了好的写作班子（详前）。[②]联系上述《中国史稿》的编写情况可知，这两条都触到了《中国史稿》的"痒处"，因而《中国史稿》的实际负责人尹达，认为这是搞"影射史学"，是讽刺主编郭沫若和参加编写的青年学者，是要把革命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打下去，并说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此论一出，把当时在场的翦伯赞、范文澜、吴晗等搞得非常紧张，幸亏吴晗及时将此事写成书面报告呈交中宣部，最后由中宣部出面说明各方面情况，才将此事暂时斡旋过去。但据学者考察，尹达并未就此罢休，最终在"文革"开始后将此事

① 谢保成：《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署明：晒姝、应吉），载《郭沫若研究》第 10 辑。

② 翦伯赞：《跋〈宋司马光通鉴稿〉》，见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80—283 页。

上纲上线，攻击翦伯赞。[①]而尹达本人也在不久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工作。从最后的修订成书情况看，在《中国史稿》中，历代的农民战争都写在了每一个王朝的后面，郭沫若也在努力尽到主编的责任，显然，翦伯赞的想法得到了采纳。

2.《中国史稿》在“文革”中的修订重编及公开出版：1971—1976 年“文革”结束前。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71 年请郭沫若重新出山，仍然由尹达负责，重整旗鼓，组织了编写组，以新的提纲，几经讨论，重写全部书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眼看就要成功，不想“四人帮”反周总理，攻郭沫若，尹达也跟着再次变“黑”，编写组被勒令解散，书稿、资料全被查封。[②]

1974 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曾在《十批判书》中“袒护儒家”、“痛恶法家”的郭沫若受到冲击，《中国史稿》第一册也被迫进行了重大修改。1976 年 5 月，《中国史稿》编写组将修订后的第一册及《前言》送交郭沫若审处。《前言》说：“原来的稿子中对于孔丘的评价有严重的错误，这次作了根本的修改。”《后记》中则再次重复了这句话。所谓“根本的修改”是，1962 年版《中国史稿》第一册在指出孔子所具有的时代局限性的同时，对孔子多有肯定，1976 年版则将孔子定性为“日趋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和思想上的代表，一个著名的反动人物”，“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圣人’”，称孔子“挖空心思，妄图用‘仁’作为普遍的道德规范，反对变革和革命，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于不坠”，“总之，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便是孔子‘仁’学的根本宗旨”。[③]对于这一适应政治形势的“根本的修改”，郭沫若没有任何表示，他自己既没有改动，也没有要求编写组再改动什么。7 月，该册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但这次出版，郭沫若没有像 1962 年初版那样在《前言》后面署名，留在 1976 年版《前言》上的，是“《中国史稿》编写组”。如今看来，1976 年的“根本的修改”，“完全是大批判稿，全无学术可言”。[④]对此，“作为主编，郭沫若无疑是要承担主编应负的责任的”。[⑤]但他拒绝在修改稿上署名的无言举动，实际上就是表达了他对修改稿的不满。

---

① 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3—215 页。

② 刘重日：《中国史稿》第六册《后记》，见《中国史稿》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378、380、384 页。

④ 刘统：《20 世纪的中国通史》，载《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12 页。

⑤ 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6 页。

3.《中国史稿》的修订完成：1976 年 10 月到 1995 年 4 月。

《中国史稿》的最初编写和后来的修改、重写，都是在郭沫若领导下，由尹达负责组织，始终是一个集体工作。“文革”结束后，《中国史稿》的修改工作得以继续进行。1978 年 6 月郭沫若去世后，由尹达主持全书的修改工作。①1983 年尹达去世后，主要由各册召集人负责。②

前已述及，《中国史稿》原来是要写成一部贯通古今、从原始社会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通史著作，但在修改时，考虑到全书篇幅较大，决定缩短范围，仅叙述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史，1840 年以后的近代史部分，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稿》，仍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编写并单独出版，现代史部分则暂不组织修改。③

第一册包括两编内容：第一编为述原始社会，下分三章，第一章为中国历史的开端，讲述境内的原始人群及氏族制度的形成，第二章为母系氏族公社的兴盛时期，第三章为父系氏族公社制度、原始公社的解体；第二编为奴隶社会，下分四章，第一章为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奴隶制国家的诞生，第二章为奴隶社会的发展——商代，第三章为强盛的奴隶制国家——西周，第四章为奴隶社会的逐渐瓦解和封建制的出现——春秋。书后附有“大事年表”、“后记”、“插图目录”、“附表目录”、“图版目录”。“大事年表”中除中国史内容外，还有外国史内容，以后各册皆如此，是其体例的明显特色之一。

郭沫若组织人力重新撰写本册是在 1972 年，1976 年 5 月定稿，7 月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参加修改和编写的负责人为尹达、田昌五、李学勤等。④叶桂生指出，这一册是专攻先秦史的郭沫若的重点，郭沫若不但通读书稿，还对《前言》进行细致地审阅。叶桂生还认为，本册是“一部好书”，运用了大量考古、文物上的材料，

①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二、三、四、五册《后记》，见《中国史稿》第二、三、四、五册，人民出版社 1979、1979、1982、1983 年版。

② 何龄修在《中国史稿》第七册《后记》中说，他是在“文革”中重建《中国史稿》写作班子时参加编写工作的，任本册“编写成员召集人”。自郭沫若去世后，全书就没有主编了，第七册由他和郭松义在总体上“承担更多责任”。但尹达在世时，一直由尹达主持工作。因此笔者推测，1983 年尹达去世后，主要由各册召集人负责编写工作。

③ 宋家钰：《郭沫若与〈中国史稿〉》，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④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二册《后记》，见《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中国史稿》第一册《后记》，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负责人”是据宋家钰：《郭沫若与〈中国史稿〉》，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下同。

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认识，但也有错误，最大的失误就是因当时的政治因素，把孔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①

自正式出版后，本册再未重行修订，因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学界多有诟病，但换一个角度说，也有其学术史价值。《前言》前收录有三篇黑体大字的“毛主席语录”，《前言》和正文中多处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论述，全部用黑体字表示，以示醒目；对毛泽东的称呼，除“《毛泽东选集》”为专有名词不能更动外，全部使用“毛主席”一词。第二册以下也引用了他们的有关论述，仍然沿用“毛主席”的称呼，但文字形式与其他正文一样，不再用黑体字表示。这些情况，都是后人了解当时学界风气的第一手材料，为后人研究学术史提供了原始资料。

第二册的内容，1963年内部出版时包括从战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重新修改时做了较大的补充和改动，篇幅增加较多，于是把战国秦汉部分和把魏晋南北朝部分单独分册出版。战国秦汉部分为第二册，定稿于1978年2月，197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参加修改和编写的有林甘泉、田昌五、金自强、田人隆、陈可畏、步近智，科学技术史部分由严敦杰编写，林甘泉为负责人。郭沫若因病重，对本册及下一册在定稿时都未能审阅，但仍十分关心，听取了修改情况的汇报。②从本册开始，叙述第三编“封建社会”的内容，其中本册共分八章，第一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第二章为从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到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第三章为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第四章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第五章为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赤眉绿林大起义，第六章为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和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第七章为黄巾大起义、各族人民反抗东汉统治者的斗争，第八章为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书后附有“大事年表”、“后记”、“插图目录”、“图版目录”。

第三册魏晋南北朝部分的修改稿完成于1978年11月，1979年10月出版。和前两册一样，署名“郭沫若主编”。参加修改的有林甘泉、黄烈、唐耕耦、陈可畏、田昌五、李学勤、步近智，科学技术史部分由严敦杰执笔，林甘泉为负责人。③本册共分六章，第一章为魏、蜀、吴三国的鼎立，第二章为西晋的短期统一、各族人民反抗

---

① 叶桂生：《晚期郭沫若史学的评述》，载《郭沫若研究》第10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②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二册《后记》，见《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宋家钰：《郭沫若与〈中国史稿〉》，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三册《后记》，见《中国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宋家钰：《郭沫若与〈中国史稿〉》，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共同斗争，第三章为“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族的割据政权、东晋的建立和南北战争，第四章为东晋南朝士族门阀的腐朽统治、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五章为各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重新建立，第六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书后附有“大事年表”、“后记”、“插图目录”、“图版目录”。

第四册为隋唐部分，初稿于 1966 年前曾两次铅印、一次打印，分送国内史学界征求意见。修改时，除个别章节外，原稿各章基本上都重新改写，并扩大了篇幅，作为单独一册出版。参加修改的有宋家钰、唐耕耦、方积六、李斌城、何高济，林甘泉、田昌五修改了部分章节，科学技术史部分由严敦杰草拟，宋家钰为负责人。本册定稿于 1980 年 3 月，因主编郭沫若已在 1978 年去世，为对读者负责，从本册起，凡未经郭沫若生前审定的其余各册均由“《中国史稿》编写组”署名。①本册出版于 1982 年 2 月，共分九章，第一章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隋，第二章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第三章为唐前期的政治、封建国家的强盛，第四章为封建地方军阀势力的形成和唐朝统治的衰落，第五章为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第六章为各族社会经济的显著进步和相互联系的进一步加强，第七章为唐末农民大起义，第八章为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第九章为隋唐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书后附有“大事年表”、“后记”、“插图目录”、“图版目录”。

第五册为宋、辽、金、元部分，初稿于 1966 年前曾有过两次排印本、一次打印本，修改时全部改写。参加改写的有吴泰、陈高华、陈智超、郦家驹，科学技术史部分由严敦杰执笔，郦家驹为负责人，定稿于 1982 年 12 月，②出版于 1983 年 6 月。共分十章，第一章为从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到辽、北宋、西夏鼎立，第二章为北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第三章为辽、西夏、吐蕃、回鹘和大理，第四章为宋金南北对峙、金在北方的统治，第五章为南宋在南方的统治，第六章为 10 世纪中叶至 13 世纪我国的社会经济，第七章为蒙古的兴起、元朝的统一，第八章为元代的社会经济，第九章为元末农民战争，第十章为宋、辽、金、元时期的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书后附有“大事年表”、“后记”、“插图目录”、“图版目录”。

---

①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四册《后记》，见《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宋家钰：《郭沫若与〈中国史稿〉》，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五册《后记》，见《中国史稿》第五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宋家钰：《郭沫若与〈中国史稿〉》，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六册为明史卷，定稿于 1986 年 7 月，1987 年出版。从 1958 年开始工作，已经是五易其稿、历时 28 年。参加修改的有刘重日、周绍泉、曹贵林、黄宣民、潘吉星。定稿前，刘重日、周绍泉又将全册再次加工了一遍，某些章节还做了较大删改。而全书的主持者尹达，则抱着未能终卷的遗憾，“这辈子再也没希望看到《史稿》的完成了”，[①]在第五册正式出版后不足一月，即于 1983 年 7 月 1 日病逝。本册共分十章，第一章为明朝的统一与封建秩序的恢复，第二章为明前期的政治，第三章为明前期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第四章为明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五章为明后期的腐朽政治与人民的反封建斗争，第六章为明代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及明朝的民族政策，第七章为明末农民战争，第八章为明朝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和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九章为明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第十章为明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书后附有“大事年表”、“后记”、“插图目录”、“图版目录”。

第七册为清史卷，初稿大体上完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但考虑到“文革”后清史研究的突飞猛进，作者们“想为《中国史稿》的写作画一个较圆满的句号”，因此一直修改，直到 1993 年 9 月才最后定稿。主要编修者为何龄修、郭松义、刘永成、黄宣民，何龄修为“编写成员召集人”。[②]本册内容共分九章，第一章为清朝建立、全国人民的抗清斗争；第二章为康乾盛世的政治(上)：巩固全国统治和维护领土完整的措施；第三章为康乾盛世的政治(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第四章为康乾盛世巩固封建统治的经济政策；第五章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概况、民族间友好联系的加强；第六章为鸦片战争前的社会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第七章为清朝中期的政治、农民阶级斗争的高涨；第八章为鸦片战争前的对外关系、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殖民者的斗争；第九章为鸦片战争前的文化。书后附有“大事年表”、“后记”、“插图目录”、“图版目录”。

何龄修在本册《后记》中还谈到了如何组织好集体修史的工作，他说：《中国史稿》是较早组织的大项目，为什么会成为持久战？“除了客观环境的影响外，我看其中有些可资吸取的经验、可供借鉴的教训。我作为一名参加者的体会，认为想较好完成这样的任务，一要注意贯彻调动参加者积极性的政策，有适当的奖惩，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纠正贬低和蔑视集体项目的错误倾向；二要抓紧抓细，抓人员素质、指导思想、写作体例、章节安排、理论原则、学术观点，一抓到底，规定合理

---

① 刘重日：《中国史稿》第六册《后记》；书首内封，见《中国史稿》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何龄修：《中国史稿》第七册《后记》，见《中国史稿》第七册，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的进度和质量要求，并对有关的参加者具有约束力；三是参加者要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要搞大换班。注意这几点，工作就会顺利得多”。[①]笔者个人也曾多次参加集体写作，感到何先生所言确是深中肯綮的精到之论，值得每一个写作集体引为同道至言！

《中国史稿》第七册出版于 1995 年 4 月，随着这一册的出版，历时三十余年、总计 200 多万字的《中国史稿》终于全部完成，实现了主编郭沫若和负责人尹达的遗愿。

(三)《中国史稿》的编写原则及史学成就

作为《中国史稿》第四册(隋唐部分)的负责人，宋家钰总结了全书的编写原则，主要有七条：

第一，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具体地、科学地阐述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发展过程和历史规律。

第二，力求正确地说明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阶级斗争、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和歌颂各族人民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第三，力求生动地描绘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光辉业绩，正确说明各族人民的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

第四，力求清晰地阐述各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状况、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说明中国古代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在开发祖国的土地、资源上的伟大贡献。

第五，力求充分地叙述中国古代各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科学地分析它们的性质和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第六，力求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正确地叙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成就，恰当地评价它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

第七，力求正确地说明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②]

非常明显，这七条实际上就是对全书主要内容及其史学成就的概括。通观全书，确实很好地做到了这几个方面。

---

① 何龄修：《中国史稿》第七册《后记》，见《中国史稿》第七册，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② 宋家钰：《郭沫若与〈中国史稿〉》，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一,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郭沫若最早提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也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有着一个从原始社会逐步过渡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并最终认为春秋战国之交是奴隶社会的下限,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亦即"战国封建说"。《中国史稿》从一开始酝酿,就决定采用郭沫若的古史分期观点。修订后的全书共七册,在大的框架结构上分为三编,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第一册包括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编,以下各册是分阶段讲述封建社会的历史。显然,这个结构就是以社会发展史的形式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总结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书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许多别的民族一样,曾经历了若干万年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便是氏族公社制度。氏族公社又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而以母系氏族公社制度为其典型的形态"。"我国原始社会从原始人群到氏族制度的转变经过了几十万年,大约从数万年以前开始,逐渐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古人进化到新人,渔猎经济的显著进步,促成了母系氏族公社的最后形成"。[①]"母系大家族是氏族制度繁荣阶段的产物,同时也在氏族内部渗进了离心因素。各个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经济生活,因而在氏族的共同利益内部,还具有本家族的特殊利益。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越往后家族的独立性便越大,终至突破氏族的狭小天地"。"大约从五千多年前起,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显著发展,男子在这些生产部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促成了原始公社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母系氏族社会逐步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从此,原始公社开始解体,阶级社会的因素开始萌芽,并终于取代了原始社会"。[②]在这些转变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不但是"母系氏族公社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的物质基础",而且"为阶级社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前提"。[③]

阶级社会的产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其间出现过许多冲突和战争、曲折和反复,奴隶制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32、17 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47、73 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91 页。

度最后才代替了氏族制度”。[①]到公元前21、22世纪时，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建立，这是“社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奴隶社会开始的标志”。“奴隶制的出现是一种革命，而革命必然通过暴力斗争。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奴隶制代替氏族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夏朝的建立和巩固，又促进了奴隶制的全面发展，创导了我国文明的先河”。[②]

商朝代夏而起，其统治的六百年“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建成了“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特别是盘庚迁殷以后，达到了奴隶制的兴盛时期”。“商代的文明对我国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以后我国的文明奠定了基础”。[③]

经过商朝的大发展，我国古代的奴隶制“到周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周朝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越前代，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但周人与商人一样，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的发展过程，直到古公亶父时才开始自称周人，跨入阶级社会。其孙文王建都丰京，开始形成为商朝西方各方国部落的中心，“成了商朝西方最强的大奴隶制国家”。最后由其子武王完成了剪灭商朝、建立西周的大业。[④]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⑤]在土地制度方面沿袭商朝的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以井田制度为其主干，但比商代有所发展，“是井田制的完备的形态”。[⑥]但到周厉王时，贵族们对私有土地的争逐渐渐发展起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新的剥削关系，已经零星地出现了”。周厉王妄图阻止土地关系上的变化，采取“专利”和高压政策，结果引起国人暴动，“促使奴隶制度走向崩溃，揭开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序幕”。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这是井田制在王畿内开始崩溃的标志，它预示着奴隶制的危机已经到来”。[⑦]很快，西周灭亡，历史进入到一个大动乱时期，即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当时的“社会大变动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⑧]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基

---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9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4、141、140—141、144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5、171、204、169页。

④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5—220页。

⑤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36页。

⑥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6—187、242—244页。

⑦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84—288页。

⑧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93、310页。

础，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土地私有制也进一步发展，土地国家公有的井田制度开始解体，“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主导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它的废弛，标志着我国奴隶制的开始瓦解”。而“伴随着私有土地的出现，封建的依附关系开始发生，并逐步发展起来”。为了生存下去，一些国家相继进行了改革，公元前 594 年，鲁国“初税亩”，接着“作丘甲”，“这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而一律征税，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开始”。这些改革的目的本来是要维护奴隶制社会的旧秩序，但却事与愿违，“结果是打破了奴隶制的堤防，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①从春秋中叶到战国初期，经过二百多年的矛盾斗争，终于完成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过程，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取代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则是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中国历史“在春秋以后就进入了封建社会”。②

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同时也是“从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走向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时代”。③秦始皇统一全国，结束了战国时代，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对我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秦朝以后的各个封建朝代，不管其政治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如何，基本上都是秦朝所建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和进一步发展”。④

在政治制度方面如此，在土地制度方面，也是秦朝奠定了后来的基础。战国时，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生产，成为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土地私有制在各国都得到发展，但封建国家手中还掌握着大量土地，一些自耕农也占有一定土地，但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些自耕农的大多数必然要分化而下降为贫雇农。⑤秦朝统一全国后，“使黔首自实田”，命令有田的百姓向政府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它标志着在战国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统一的全国范围内确认了封建土地私有权”。黔首虽然包括不当官的地主和自耕农，但因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有巨大的优势，真正从这一法令中得到好处的只是地主

---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313—326 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342、355 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7 页。
④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19 页。
⑤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25 页。

阶级，他们只要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赋税，就可以无限制地兼并土地，因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全国得到了迅速发展。[①]与之相随，战国时期出现的封建租佃制也“日益成为农业生产中的支配形态”。[②]从此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地主土地私有制就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基本形式，租佃制也随之成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地租形态则主要表现为实物地租，其次是货币地租，这在唐、宋、明、清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③]

书中肯定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基础作用，重视对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考察。在有关原始社会的三章内容中，都以较多篇幅专门考察各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明确指出：“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母系氏族公社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的物质基础。父系氏族公社的生产水平呈现出了新的发展局面，……这些都为阶级社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前提。”[④]在阐述奴隶社会的四章中，也都有专节讲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生产情况，涉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社会分工情况，生产工具、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主要劳动产品和劳动者数量等等。书中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生产的发展，商人和周人才各自建成奴隶制国家，然后分别灭掉前朝而建立商、周二朝的。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和各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新的不平衡，有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或国家，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和民族融合的新基础上，很快赶上甚至超过了原先较为先进的民族和国家；而中原各国之间也因为政治经济条件不同，呈现了有的强大起来和有的衰弱下去的状态，因而就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把黄河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各国、各族联系起来，诸国林立的情况束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实现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正处于胚胎之中”。[⑤]显然，在作者的笔下，经济发展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全书从第二册开始，以六册篇幅讲述从战国以来到明清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对其间各朝各代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唐朝以前是以专节形

---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1 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4 页。

③ 关于《中国史稿》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宋家钰在其《郭沫若与〈中国史稿〉》一文中论之已详，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76—778 页。

④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91 页。

⑤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93—294 页。

式、唐朝以后以专章形式予以详尽阐述,明确肯定了经济对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如战国初期,各国纷纷变法。魏国实行按封建等级分配土地的制度,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李悝又在此基础上,实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魏国很快富强起来”。再加上吴起、西门豹重视开垦土地、发展水利灌溉,同时,这些人又改革政治和军事,“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一个头等强盛的封建国家”。[①]在当时的变法中,秦国的商鞅变法较为全面,效果也最显著,“可以说是各国社会改革的总结”。书中归纳了商鞅变法的八项内容,其中四项是属于经济方面的内容,包括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农业生产、招揽他国农民而增加劳动力、统一度量衡。“商鞅变法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给奴隶主贵族以沉重的打击,……使得秦国的政权完全转移到了地主阶级手里”,“促进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反过来,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为秦的富国强兵和完成统一六国的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②]而七大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显著的进步,有些地区且已赶上中原,这就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经济基础”。[③]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影响着思想文化的发展。“战国时期,封建制度战胜了奴隶制度,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阶级关系也有了重大变化,于是,一切旧观念、旧思想和旧的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动摇。一个相应的变化在思想领域中也涌现了出来。”而“战国时代是我国封建文化的发祥期,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远远超过奴隶制时代,并打下了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基础”。[④]因此,战国时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此后两千年整个中国封建文化的基础。

秦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但它不恤民力,以苛暴治国,结果仅十几年便被农民大起义推翻。西汉建立后,吸取秦亡教训,着力发展生产,使一度凋敝的社会经济又慢慢恢复和发展起来。到了汉武帝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开始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书中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自秦统一到汉初的六七十年间,物质文化基本上保存着战国时代的面貌;到汉武帝以后,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战国时代原有的地方色彩逐渐消失了,同一的文化等到迅速的发展。”[⑤]可见,正是由于汉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才逐渐消灭了割据状态,真正实现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9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④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83页。
⑤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192页。

了全国意义上的统一。而在中原地区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汉族在和各兄弟民族的交往中，也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各民族就在发展了的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互相影响和吸收有异于自己的养料，共同缔造了“绚丽多彩的祖国历史”。①

到了汉元帝以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由于贵族、官僚、地主等对土地的兼并日益盛行，“吞噬了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民，造成流民和奴婢数量的不断增加，终于导致了社会生产的严重危机”。②王莽趁机夺取了西汉政权，并在内部进行改革，试图解决危机，但适得其反，严重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土地兼并继续发展，压在人民身上的徭役和赋税更加沉重，社会生产被拖入绝境。③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只好以起义来反抗，虽然起义的胜利果实最终被以刘秀为首的地主阶级篡夺，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依然继续下来，但从西汉后期以来的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的趋势有所缓和，大批被逐出生产领域的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社会生产力多多少少较前有所发展。④

以上，就是西汉一朝的简要历史发展过程。显然，经济的发展促成了西汉政权对全国的大一统，而经济生产的破坏则直接促成了西汉政权的灭亡。“经济是历史的骨干”，这是翦伯赞明确表述出来的，《中国史稿》的作者们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他们在书中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共同的特征。

西汉以后的各朝各代历史，一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⑤由于各时期具体情况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也不一样，但经济发展对该时期历史进程的巨大基础作用却是一样的。例如，“包涵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因素”的雇佣劳动，在明朝以前已经存在很久，但它并没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社会经济综合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在一定历史环境下才发生的社会现象”。“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在明代中叶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在江南经济发达区内的手工业当中(尤其是丝棉纺织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⑥到清代前期，“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同明代相比，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总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09 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42 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61 页。
④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73 页。
⑤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78 页。
⑥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7、259 页。

的发展趋势是:地区有了扩大;行业有所增多;手工工场的数目也有了增加;雇工人数在迅速增多,队伍在不断地壮大”。同时,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星星点点地缓慢地成长着”。①总之,“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推移”,“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只是因为封建经济和封建势力的阻挠压抑,这种萌芽“没能成为生产的通常形态,因而改变不了社会的性质”。②最终也未能使古代中国自发地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全书就是这样,在对各个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系统梳理之时,一直肯定和强调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这是作者们从社会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因素——经济角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进行的探索。

第二,关于阶级斗争与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肯定和歌颂各族人民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直接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书中指出:“从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时候起,被剥削者和剥削者、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开始了。从夏代起,我国阶级斗争史的帷幕揭开了。阶级斗争在夏朝统治的 400 多年里,始终没有间断过。每当夏朝统治不稳的时候,奴隶或起而暴动,或相率逃亡,奴隶制贵族不仅要丧失自己的‘臣妾舆马’,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了。”③商朝建立以后,受尽剥削压迫的广大奴隶群众,不断以各种方式反抗奴隶主贵族的血腥统治,其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在商纣王统治的时代“发展到了极点”,“奴隶、平民、和奴隶主贵族的矛盾,被商王奴役的方国部落和商朝的矛盾,都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于是周武王选择这个时机,对商朝发动大规模进攻,“奴隶和平民在战争中举行暴动,调转矛头,联合周武王的武装力量,一举推翻了商纣王的反动统治。长达 600 年的商王朝,在它自己造成的对立面——奴隶、平民和被压迫方国部落的共同打击下,和夏朝一样,彻底被埋葬了。”④

西周奴隶制经济比商代有更大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它“仍然是建立在广大奴隶群众的生产劳动之上的”,“伴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全面发展,根植在奴隶制度中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充分展开了。而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促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深入和激化,终于导致宗周的灭亡。”⑤爆

①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七册,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17 页。
②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9—260 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52 页。
④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84—185、213—214 页。
⑤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60、276 页。

发于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事件",它不仅推垮了周厉王的残暴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周朝的统治体系,使周朝从此衰落下去,逐步发生肢解和分崩离析的现象","而且也动摇了奴隶制的统治基础,促使奴隶制度走向崩溃,揭开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序幕"。①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奴隶制就显得更加荒谬悖理,奴隶和平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作者明确指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程,离开了革命的暴力是不能实现的。革命的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是新社会从旧社会的母胎中诞生时的产婆,这在阶级社会中是一条确定不移的定律。"从西周末年到战国初年,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连绵不断,终于摧毁了奴隶制度,"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是推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飞跃的根本动力"。但因奴隶和平民自身的局限性,他们虽然打垮了奴隶主贵族,"最后却由新兴的地主阶级取得了胜利果实,取代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建立了封建制度"。②

对于封建社会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全书绝大部分都以专章的形式做重点考察和论述。反对剥削压迫,大力讴歌农民起义,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同时指出农民战争的历史局限性,是全书立论的基调。"秦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从陈胜、吴广发动起义到秦朝灭亡,前后不过两年左右的时间,"繁重的赋税徭役和残酷的刑法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在农民战争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应有的改造,这就使得社会生产力在农民战争过后能够获得恢复和发展"。陈胜、吴广作为两位农民革命领袖,在起义后不久就牺牲了,"但是秦朝黑暗统治的覆灭却要归功于他们所首倡的农民起义",他们的名字"将和他们所开辟的道路一起,永远彪炳于史册!"当然,书中不是一味颂扬农民起义,同时也指出了"他们无法克服的局限性"。③

"秦末农民大起义显示农民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西汉初年,封建统治集团内部鉴于秦亡的教训,常常探讨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这促使他们在各个方面调整统治政策,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统治者的残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87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6—327、340、341—342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155页。

酷剥削，最终还是导致了社会生产的严重危机，爆发了以赤眉军、绿林军为中心的农民大起义，这是西汉末年“封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所引起的社会危机的产物，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长期激化的结果”。虽然这次起义因为自身局限性等各种原因而失败了，“但它以暴风骤雨之势，摧毁了王莽的反动统治，给了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由于农民起义的结果，从西汉后期以来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的趋势有所缓和，大批被抛出生产领域之外的流民重新又回到土地上，无情吞噬着破产农民的奴隶制残余也受到了一次大扫荡”。这些都使“社会生产力多多少少较前有所发展”。①

东汉末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大起义。这次起义的组织程度比以前大大提高了，而且明确宣布要推翻反动的东汉王朝，建立农民政权，这比以前的农民起义也是一大进步。虽然它最后遭到了残酷镇压，“但是这一场革命风暴沉重地打击了黑暗的封建统治，使得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它有力地冲击了东汉后期封建生产关系中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这就为当时衰落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②

唐朝后期，“黄巢领导的十年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我国历史上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篇章”。唐王朝经过这次打击，已经名存实亡，不但大长了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志气，而且它“在我国农民反封建斗争史上首次提出了‘平均’的要求。尽管它只是通过义军领导人的称号曲折地表现出来，还不是明确的革命口号，也没有具体的行动纲领，但无疑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反封建斗争，随着封建经济关系和封建政治制度的发展，逐步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③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顺起义，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这在中国农民革命史上还是第一次”。“表明农民在阶级斗争中，‘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这本身就是对封建秩序的大胆否定，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农民革命斗争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④明末李自成大起义，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均田”是农民针对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和集中而力图改变其不均局面的，是对“富

---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73 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25 页。

③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59 页。

④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五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6—97 页。

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不平等现实而产生的平等思想在土地问题上的反映，表达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及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不满；“免粮”是针对地主政权机构对农民的剥削和榨取，反映了农民渴望摆脱繁赋苛役的愿望和要求。因此“均田免粮”口号的提出，“是把农民群众争取土地的斗争，同反抗地主及其国家的剥削和压榨，完全而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是个创举”。[①]显然，这些论述，不只是单纯地从改朝换代、暂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对农民战争进行肯定，而是从更高的反对封建制度的角度来认识农民战争问题的，反映了对问题的全面把握和深入研究。

在肯定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书中对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也进行了客观评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全面、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品格。秦始皇结束了战国以来几百年战乱纷扰的时代，作为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他统一全国和巩固统一的活动，都是靠榨取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血汗来实现的，他也和所有的封建统治者一样，对广大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其思想统治政策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这些在书中都有明确指陈。但秦始皇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刚刚确立不久，正从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走向统一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在这个时代，还是一个进步的、生气勃勃的阶级。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代表，秦始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事业”，接着又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割据势力和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力”，这“自然都是从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封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却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书中对秦始皇的这些措施进行了详细论述，最后得出结论：“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②]这些论述，坚持了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客观、全面的评价原则。

“秦末农民大起义标志着农民阶级的壮大和反抗斗争的加强，它促使封建地主阶级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的阶级”。[③]汉初，被秦末农民起义吓坏了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农民的统治，消弭农民的反抗，力图在继承秦朝制度的基础上，

---

①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72 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31、116、129 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42 页。

对秦始皇专靠严刑峻法的统治措施进行若干修补”,“在和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以及奴隶主的残余势力作斗争方面,比起秦始皇来有所倒退,这也正好说明地主阶级为了对付日益成长壮大的农民阶级,已经带有更多的保守色彩了”。[①]汉武帝通过一系列措施强化了地主阶级专政,但也进一步加深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革命斗争日益发展,地主阶级的反动性也进一步暴露。作为一个阶级,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已经处在重要转变的前夜了”。“到了汉元帝以后,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这一变化,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反映在经济基础方面,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从起初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则是儒家思想取得了正式的统治地位。总之,“西汉后期封建地主阶级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方面已经逐渐趋于凝固化,它的反动性和寄生性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了”。[②]这些论述,从事物发展演变的历史顺序,清晰地梳理和考察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由先进转为落后、由积极转为消极的变化过程,体现了作者们坚持唯物辩证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的一流人物,书中肯定他是当时“一位很有才能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细述了他的种种政治举措,但也明白指出,他虽然“很注意部队的训练,但并不善于指挥作战。特别是他事无大小,都必躬亲,这不仅使自己忙于琐细事务,而且影响了同僚和部下能力的发挥”。[③]这就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诸葛亮的优缺点及其始终未能取得伐魏战争重大胜利的根本原因,即自己能力有所不足,又不放手予以群策群力。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著名政治家,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对中国历史发展有重要贡献。但这也是有渊源的,并非都是他个人的功绩,书中指出:“李渊在位时期,国家重新统一,社会渐趋稳定,典章制度初具规模,这就为‘贞观之治’的出现铺陈了道路。”不过,李渊统治时期主要还处于军事阶段,一切尚属“草创”。“唐朝的进一步巩固,社会经济普遍复兴,是在杰出的政治家李世民统治的二十多年间实现的”。经过他们父子二人“三十多年的治理,唐朝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但是唐太宗统治的后期,“渐渐骄矜,奢侈日盛,战事增多,人民‘疲于徭役’”,以致唐太宗在死前告诫太子不要效法其过错,以免遭速败,“多

---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242—249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7页。

少感觉到了自己的过失和潜伏的社会矛盾。在他死后,统治阶级的内讧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就逐渐激烈起来了”。[①]这些论述,体现原始察终、全面分析问题的研究态度。

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很快上台执政。书中指出,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间,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维护和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时期开始,唐朝进入了鼎盛时期”。但是,“武则天和历史上一切封建统治者一样,是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实维护者。在她统治时期,国家的强盛和封建经济的上升是靠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来达到的。武则天为了攫取最高权力和维护自己的统治,任用特务,陷害无辜,消灭异己,其中也包括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劳动人民”。此外,为了神化自己的威权,武则天大肆崇佛,广建庙宇,劳民伤财,穷奢极欲。这一切不仅加剧了阶级矛盾,也在统治集团内部重新引起了激烈的斗争。[②]书中对武则天的历史功过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可谓实事求是的客观之论。

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扭转当时衰朽腐败的局面,张居正在明神宗即位初期就“以天下为己任”,置个人得失毁誉于不顾,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极力推行改革,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确曾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是一位事功显著的政治家”。但“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就决定了改革的封建性质。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使得改革既不可能彻底,也难以持续和成功。既得利益的地主官僚纷起反对张居正改革;以帝王专制为核心的君主集权,也难以忍受张居正的‘威权震主’,权倾天下。张居正死后,权豪势要群起攻击,终于导致张居正被削爵夺谥,籍没抄家,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悲剧”。[③]这段论述,是有理论深度的。

乾隆皇帝对清代前期“康乾盛世”的局面有重要推动作用,书中指出:“乾隆在位的六十年中,就施政的角度考察,初期沿于宽大,中期后趋向严紧,到了晚期,一方面因为年龄大了,精力不济了,有所倦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积其父祖之荫德,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府库充盈,又自恃文治武功超越前代,自满得意之色溢于言表,结果政纪废弛,吏治败坏,持续了一百来年的‘康乾盛世’终于迅速地走向下坡,大

---

①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0—81、101—102 页。

②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6—117 页。

③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8—269、281 页。

清朝的昔日雄风，再也无法重现了。”[1]这段评论，文字虽不多，但却从整个清代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乾隆帝进行了全面评价，可谓要言不烦，深中肯綮。

第三，关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问题。全书重视少数民族的历史，肯定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书中指出：“民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同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相适应、历史地形成的。”远古时期的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正是汉族的前身。历史上所说的华夏，乃是由他们共同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都具有这样的特点”。[2]这既指出了民族形成的特点，也从源头上指明，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就是由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到西周时期，周朝统治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周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其中特别明显的是西北和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和长江下游以南的一些地方，书中具体考察了他们同周朝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指出：“西周时期，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对祖国历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增多，联系加强，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奴隶制已经达到成熟的时代。”[3]认为民族关系是代表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

春秋后期的兼并和战争，在各族人民频繁往来和互相影响的基础上，加速了各族人民的相互融合的步伐，从春秋末叶到战国初年，华夏族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当时中国境内有些少数民族也在华夏族的推动下，社会经济得到飞跃发展，和华夏族共同走上了封建制的轨道。“这样，在祖国的大地上，就绘出了一幅民族交错、列国纵横的画图，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4]到战国时期，“七大国周边的少数族，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显著的进步，有些地区且已赶上中原，这就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经济基础”。[5]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战国后期，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北起辽东、南达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里，华夏族和一些少数族通过长期的交往，有了日益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稳固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日后的汉族”。[6]

从西汉开始，作者对以后各个时期的少数民族历史都有专门章节的介绍，如西

①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七册，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2 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21 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61 页。
④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309 页。
⑤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7 页。
⑥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14—115 页。

汉部分设有“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西汉抗击匈奴的战争和通西域”一节，强调：“中国境内当时的民族，除汉族外，还有匈奴族、西域各族、越族、羌族，以及西南和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西汉时期各民族的活动，构成了绚丽多彩的祖国历史的重要篇章。”[①]在东汉部分设立“东汉时期各民族间联系的加强、羌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反抗东汉统治者的斗争”一节，指出各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是当时广大人民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在讲述三国时期蜀、吴两国历史时，不但在正文中谈到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开发”等，而且还写入标题。在专门讲述西晋末年各族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共同斗争时，指出：“魏晋时期的民族迁徙，促进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北方久经战乱，人口稀少，内迁各族和汉族一起，对北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推动了内迁各族人民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进步。”[③]

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割据时期，北朝曾出现北魏统一北方的时代，直到隋朝建立才重新建成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作者在叙述由北魏至隋朝这一阶段历史时，一章之内设立两节，讲述“各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魏孝文帝的改革”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认为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族人民大融合的基础上实现的，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标志着进入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过程的完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发生了新的调度”。[④]在整个南北朝时期，除了内迁的民族外，在北方周边和南方地区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同汉族和内迁各族人民友好往来、互通有无，在经济、文化上相互影响，日益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上层统治集团也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共同发展着祖国的历史。[⑤]

隋唐以后，少数民族影响中国整体历史进程的情况越来越显著，不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相互关系更为紧密，而且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还纷纷占领中原地区，并建成统一全中国的一统政权。于是书中就开始以专章的形式，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予以详尽介绍。如讲述唐朝历史时，设立“各族社会经济的显著进步

---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08 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26 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3 页。
④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7 页。
⑤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59 页。

和相互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一章,集中讲述西北、西南、东北各族以及台湾高山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况,重视其民族的自身特点和社会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强调:“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各族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各族在文化上的种种创造也丰富了汉族的社会生活。由于各族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民族间的移民频繁,各族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也比前代进一步加深。各族劳动人民在相互联系加强的基础上,共同开发了祖国的资源,为缔造我们伟大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

辽、宋、西夏、金并立时期,可谓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对这段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权与民族关系,作者用两章分别讲述北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南宋在南方的统治;其他四章中,有两章专门讲述少数民族的历史,分别为“辽、西夏、吐蕃和大理”和“宋金南北对峙、金在北方的统治”,另两章是从总体上讲述“从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到辽、北宋、西夏鼎立”和“10 世纪中叶至 13 世纪我国的社会经济”,包含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历史内容。元朝结束了宋、夏、金并立的时代,第一次建立起由少数民族贵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书中以三章的篇幅,详尽阐述了对它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发展情况的认识。指出由于元朝这一规模空前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各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都得到了大大加强,民族关系发展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特点,即“普遍的民族杂居现象的出现”。这“进一步密切了彼此之间的兄弟情谊”,也使一些在历史上起过很大影响的民族,如契丹、唐兀等,逐渐融合到其他民族中间,自身消失了,而一些新的民族如回族、土族等,由于民族成分的融合而形成,还有的虽保留了原来的名称,如汉族、蒙古族等,但实际上已经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成分,这些都使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从而深刻地影响到后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

明朝代元而起,书中专章介绍“明代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及明朝的民族政策”。清朝是第二个由少数民族贵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书中以“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民族间友好联系的加强”为题,专章讲述满族与其他东北各族、北方和西北各民族、西南各族、南方各族的发展情况及其与中原民族的友好联系。

与强调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相应,书中对处理民族问题作出积极贡献的历史人物也进行了大力肯定。如诸葛亮在蜀国执政过程中,在掠夺南中地区人力

①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72 页。
②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五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94—495 页。

物力的同时，对当地的开发和各族人民的融合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书中认为："诸葛亮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从蜀汉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但他强调'和'与'抚'的方针，在南征的时候，用比较缓和的办法对待夷人，这与另外一些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专以武力镇压，实行斩尽杀绝的血腥手段比较起来，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因此关于他的传说，长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流传着。"[①]作者并没有直接对诸葛亮进行高度评价，而是用传说中长期流传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这既是"寓论断于叙事"的高明写作手法，也表现出对史料驾驭的高超能力。

总之，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而编修的各种中国通史中，重视少数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都是书中的重要内容，但相较而言，本书的这部分内容篇幅之大、论述之详、观点之中肯深刻，都是很有特色的。

第四，重视古代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史成就，揭示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此，全书力求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客观地总结这一伟大成就，并揭示其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作用。作者指出："文明社会的基础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管理国家以及从事科学和文化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分工。到了商代，这种分工已经明确地出现了。那时候，已经积累了专门的科学文化知识，有了受贵族豢养的专业文化人。"[②]这些科学文化知识表现在文字已经基本成熟；天文学、数学都得到了发展；医学方面则表现为对疾病有了一定的分类；乐舞也进一步发达起来；力学方面表现为都市和大建筑物的发展，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有一定的布局结构，"奠定了我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式"；工艺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青铜工艺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纯熟的地步"，铜器作坊"散布在商朝统治的广大地区里，并影响到邻近的方国和部落"；"白陶是和青铜器同样贵重的器物，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光辉创作"；其他骨器业和玉石工艺等也都具有高度的水平，"表现出惊人的技巧和创造力"。"商代文明对我国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影响到东方的广大地区，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地位"。[③]

西周统治者为加强对被压迫阶级的精神统治，极大地强化了奴隶制的国家机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5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0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2—204、169页。

器，而且还相应地发展了奴隶制的思想体系，制定了一套礼乐制度，“这一套思想和制度，怀疑了作为至上神的天的存在，但在客观上要利用它作为统治的工具，主观上却强调着人力；以天道为愚民的政策，以德政为操持这个政策的机柄；从思想上不放松统治的努力，在言行中贯彻礼乐制度”。书中认为，周能够以“小邦”而灭了“大邦殷”，并且得以巩固起来，“这一套思想体系和礼乐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

从春秋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书中对其思想文化与科技成就都有专章专节的叙述。春秋时期的专节是“春秋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和思想斗争”，指出春秋时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开辟了后来的发展道路”；在社会思潮方面，则是“对宗教性的天的信仰的普遍动摇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并开始演出百家争鸣的前奏曲。②

“战国时代是我国封建文化的发祥期”，作者分两节讲述“思想领域中的‘百家争鸣’”、“屈原的《楚辞》和战国时代的文化科学技术成就”，指出激烈的社会变动，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内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不但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而且在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远远超过奴隶制时代，并打下了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基础”，“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是对世界人类文化宝库作出的巨大贡献”。③

秦汉时期，书中设有“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一章，分四节分别讲述儒家经学的泛滥、王充反对谶纬神学的斗争，司马迁的《史记》、文学艺术的发展，秦汉时期的科学艺术成就、杰出的科学家张衡，秦汉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书中在指出秦始皇实行“思想统制政策对于文化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同时，也肯定秦始皇统一文字是“在文化方面的一项重大功绩”，“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和巩固有着重大的意义”。④认为汉武帝表彰儒术，使儒学成为官学，儒学自身也在不断吸收其他不同学派的思想，“逐渐完成了从奴隶制意识形态到封建制意识形态的改造”，到汉元帝时，儒家思想进一步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⑤至于科技水平，秦汉时期大大超过前代，“有些成就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很先进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6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6、366页。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3、96页。
④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123页。
⑤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6、350页。

的”，举世闻名的造纸术和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即是突出代表。[①]而当时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也对邻国起了巨大的影响。同时，由邻国传入国内的外来优秀文化也丰富了我国人民生活的内容。特别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蚕丝的国家。中国丝织品在汉代已经享有国际盛誉。特别是在罗马帝国，人们把中国丝织品当作极珍贵的物品。对于东方‘丝国’充满着憧憬和向往”。[②]

在全书的第三册中，设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一章，第一节讲述玄学的流行和佛教、道教的传播，范缜的神灭论；第二节讲述建安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发展，石窟艺术的兴起和绘画的新成就；第三节讲述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祖冲之的贡献；第四节讲述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共 54 页的篇幅。第四册设有“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和“隋唐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两章，其中前一章分为四节，分别讲述哲学领域的思想斗争，佛教的兴盛，道教的发展，史学、文学和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成就。两章篇幅共达 148 页。第五册中设有“宋、辽、金、元时期的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第一节讲述王安石的新学，理学的形成及其在思想界统治地位的确立；第二节讲述宋、辽、金、元时期的史学、文学和艺术；第三节讲述宋、辽、金、元时期我国境内流行的宗教；第四节讲述宋、辽、金、元时期科学技术；第五节讲述宋、辽、金、元时期的中外关系，共 115 页。第六册专讲明代历史，设有“明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明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两章，前一章三节，分别介绍明初的朱学统治和王学的崛起，唯物主义和“异端”思想以及明末的社会思潮，明代文学艺术的成就；后一章分五节，分别介绍农业和农学著作，医学和药物学，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地理学和水利工程学，手工业技术与技术著作。两章篇幅共 91 页。至于明朝时期的中外交流，则是单独列为一章，题为“明朝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和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共 124 页。第七册为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前期历史，设有“鸦片战争前的文化”一章，分别讲述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潮、清初理学与乾嘉汉学、清代前期的史学、文学艺术的发展（分上、下两节）、科学技术的状况，共 93 页。另设有“鸦片战争前的对外关系、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殖民者的斗争”一章，共 66 页。对这些内容，书中都以客观的批判继承的态度，进行讲述和评论，揭示其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作用。只要我们把其他的同类通史著作拿来对比，即可发现，本书对这些内容的把握和论述，是有其独到的眼光的。此外，

---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70—371 页。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87—390 页。

本书每册附录的“大事年表”中，除中国史内容外，还有外国史内容，通过简要的中外同期历史的对比，直观地显示出中国历史在当时世界历史上的发展状况和历史地位，这是作者为揭示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这一目的，在体例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其不同于其他同类通史著作的别出心裁之举。

总的来看，这部《中国史稿》与范文澜等《中国通史》一样，都是以政治史为叙述的主线，同时对经济史、文化史等相关内容也给予相当关注，不但能清晰勾勒出历史演进的整体历程，也能从多角度、多层面予以探讨，揭示出历史发展演变的整体面貌。本书同范著《中国通史》一样，对中国古代各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以及一些重要统治者的历史活动，都能科学地分析它们的性质和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二者虽然有些具体观点并不相同，但都是在对材料的客观分析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认识的，反映了二书对历史问题的不同把握和认识。[①]二书虽同是多卷本的中国古代通史著作，但却不能取一而废一，二者都有自己的特色，只可互补，不可偏废。

六、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一) 白寿彝生平简介[②]

白寿彝(1909—2000)，字肇伦，又名哲玛鲁丁，河南开封人，回族。1925—1927年，白寿彝就读于上海文治大学和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1928年开始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929年出版《开封歌谣集》，此后还写有多篇有关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论文。同年9月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后来还出版《朱熹辨伪书语》一书。1932年毕业后，陆续创办和主持了《伊斯兰》半月刊、《大河杂志》和《新儿童》半月刊、《云南清真铎报》、《益世报》的《边疆》半月刊，还协助顾颉刚主持文通书局编译所的编务工作。1935年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一文。1937年出版第一部学术研究专著《中国交通史》，不久被日本文学家牛岛俊作译为日文出版。对白寿彝个人治学来说，他“对

---

① 关于《中国史稿》对中国古代各时期政治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宋家钰在其《郭沫若与〈中国史稿〉》一文中论之已详，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78—779页。

② 本部分未注明者，皆据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简编)》，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9—642页；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深切怀念白寿彝先生》，《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同志生平简介》，《回族研究》2000年第2期。

于通史的兴趣，对于划分历史时期的兴趣，对于寻找时代特点的兴趣，都是从写这本书开始的”。①

1938—1949年期间，白寿彝先后任教于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曾主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等课程，出版了有关回教史研究的多部论著，并开始步入史学史研究领域，对历史编纂学多有研究。

1949年7月，白寿彝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参与了中国史学会的筹备工作，被选为常任理事。与侯外庐等共同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并兼任研究员。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创办专史刊物《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起初为内部刊物，后改为《史学史研究》公开发行。1964年，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铅印500份，在一定的范围内流传。从1949—1966年的17年间，先后讲授多种课程，研究重点逐渐集中于回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历史教育，在这四个方面发表了很多论文，并出版了多种著作。

1966年“文革”开始后，白寿彝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1971年起，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过问下，一直在历史系劳改队参加劳动改造的白寿彝才重获工作的权利，代替病中的顾颉刚，实际主持“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

“文革”结束后，白寿彝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担任了两所的首任所长，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全国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副主任等。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白寿彝学术生涯中最光彩夺目的岁月。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复刊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学术影响越来越大；出版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中国史学史论集》等多种著作，主编了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四卷本《回族人物志》等。而对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则是他主编的《中国通史》。

---

① 白寿彝：《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白寿彝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

（二）白寿彝与《中国通史》的编纂

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其编纂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酝酿及前期准备时期，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至1979年；第二阶段是编纂工作正式进行时期，时间是从1979年10月开始，至1989年4月第一册出版前告一段落；第三阶段是继续编纂和陆续出版时期，时间是从1989年4月至1999年3月。下面就按这三期，简述全书的编纂过程。

第一阶段，酝酿及前期准备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1979年。

白寿彝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在一些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讲授中国通史。"从50年代起"，他就因教学及出国作学术访问，迫切感到有必要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通史。[①]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被邀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②]当时，范文澜、翦伯赞等人都已开始进行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但还远没有完成。

1972年，周恩来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这更坚定了白寿彝编写通史的决心。1974年7月，白寿彝作为中国友好参观团成员，随团赴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科威特等国进行访问。[③]当时，巴基斯坦的中国历史课程所用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他们仍然没有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家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的重视，这使白寿彝"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④]再次感到编写中国通史的必要性。

回国以后，经过一番思考，白寿彝于1975年9月牵头成立了中国通史编写组，

① 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简编）》，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页。

② 白寿彝：《白寿彝教授在大会上的讲话》，《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③ 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简编）》，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618页。

④ 白寿彝：《白寿彝教授在大会上的讲话》，《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正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编著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倡议，并得到赞许。当时的动议是编写三种类型的通史著作，一种是大型本即后来的多卷本，一种是中型本，一种是小型本。[①]先从编撰中型本的中国通史入手，经过两年的时间，写出了二百几十万字的草稿，但讨论之后，大家不满意，白寿彝总结为八个字："题无特色，文无新意。"他认为此稿不具备出版条件，于是将其搁下，转而利用此次编撰经验编写小型本。[②]小型本自1977年10月草拟大纲，三年后完成，即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这是白寿彝"通史学发轫的成果，指明了通史学建设的方向"，[③]"为大型本《中国通史》的编写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④]

第二阶段，编纂工作正式进行：1979年10月至1989年3月。

1979年10月，白寿彝主持召开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分卷主编徐喜辰、杨钊、何兹全、陈光崇、王毓铨、林增平、龚书铎、王桧林等几十位专家学者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代表，会上初步确定了《中国通史》的编撰要求、体例、卷数和字数规模等，并对一些史学界长期有纷争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研究，为在通史论述中能达到基本统一而作了认真的探讨。由此，编纂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⑤]

1980年11—12月，白寿彝主持召开了《中国通史》第一卷编写组会议，对撰述宗旨和内容进行了讨论。确定本卷的宗旨是：在贯彻"纵通"和"横通"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若干重要问题的论述，着重从历史理论方面勾勒中国历史的基本轮廓，并力求达到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具体化、中国化。编写原则也进一步明确：一、重在理论说明，同时恰当地引证必要的史料，做到史论结合；二、应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同时也应给人以鲜明的时代感，把庄严的民族自豪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三、各章应有自身的逻辑体系，同时又应与正文各卷铸成一体，把本卷的要求与正文的要求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显然，这第一卷正是全书

---

① 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简编）》，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

② 瞿林东：《关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历史教学》1985年第5期。

③ 吴怀祺：《马克思主义通史学理论的建设》，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页。引文中在"指明"二字前删掉了"《题记》"二字。

④ 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简编）》，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

⑤ 本段据张美娣：《二十年磨一剑——白寿彝与〈中国通史〉》，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4页。

的总纲，对撰写全书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而其后来出版时也名副其实的被定名为《导论》。

白寿彝在会上提出，无论是第一卷的撰述内容，还是各章的编写提纲，目前还只是初步的设想。在撰写过程中，一定的修改和变动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撰写者本身的理论水平、学术见解是不断发展的，同时学术界同行们的批评、指教也是非常有益的。“在编撰中不断修改，在修改中不断提高，采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这就是我们要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①

1980年，《中国通史》第十卷、即后来的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编写组成立。

1981年3月，《中国通史》秦汉卷编写组成立，5月又成立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编写组。白寿彝分别在各卷编写组会议上就全书的指导思想、总体结构、编写要求作了说明，并把各卷讨论情况编写成通讯，促进学者互相交流。

1981年6月，白寿彝等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发表第一卷《导论》的提纲未定稿，提出了有关中国历史的12个方面346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后来考虑到短时间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写入《导论》中的9个方面的内容。而将1981年的提纲附录在《导论》正文之后。②

1983年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编写的重要年头。1月成立了清史卷编写组，4月，白寿彝赴陕西师范大学组建隋唐卷编写组。5月，多卷本《中国通史》规划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通过，并被定为重点项目。7月，新华社向国内外作了广泛报导，《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在第一版刊登了这一消息。10月“邀请有关兄弟单位的专家成立编辑委员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报请教育部备案”。③11、12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将《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对外作了连续报导。同年，多卷本《中国通史》报教育部备案，确定了本书的编撰规模、编著要求、体裁、体例以及各主编和全书编委会委员。在体裁方面，本书参照古今史书体裁的优点，采用一种新的综合性体裁，融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于一书，以章节体的形式写作一部贯通古今的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共12卷22册、

① 以上两段据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简编）》，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5—626页。以下关于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编纂的情况，凡未注明者，均据刘雪英此文。

② 本段据白寿彝为《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所作《题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引文据白寿彝为《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所作《题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约1 200万字(全书出齐后实际为1 400万字)。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各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等四个部分,序说是对于基本史料、研究概况的论述以及本卷的编撰意图和要旨的分析,综述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政治、军事大事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综合论述,典志部分论述经济、政治、法律、军事制度、文化科学技术及其他有关专题研究,传记则主要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各卷都附有图版,专载历代有代表性的碑刻拓片、建筑、雕塑、书画、手工艺作品等,重视选品的系统化,以补充各卷文字表述的不足。在编写方面有三点总的要求,一是理论与实际应有很好的结合,二是通史不是断代史的拼凑,三是重视表述上的科学性和可读性。

本书的各卷主编和编委,大多为各方面的专家,其中有王振铎、王毓铨、王桧林、邓广铭、史念海、刘家和、孙秉莹、孙文良、苏秉琦、何兹全、邱汉生、杨钊、高敏、安作璋、陈振、陈得芝、陈光崇、周远廉、林增平、徐喜辰、章开沅、龚书铎、何绍庚、斯维至、廖德清、施丁等,白寿彝任总主编。

1984年4月,白寿彝赴南京组建元史卷编写组,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了明史卷编写组,6月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所组成中国通史科学技术志编写组,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五代辽宋夏金卷编写组。实现了历史学界与自然科学界联合撰写历史,这在学术界还是少有的合作。

1986年1月,白寿彝开始了对第一卷《导论》的逐章讨论修改,10月全卷完稿。10月15日,白寿彝写成该卷《题记》(1991年3月20日又有所修改),简要介绍了《中国通史》的编纂缘起、分卷内容及体例、本卷内容及分工等情况。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全书的编写要求和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就是:“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①

1987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1919—1949)出版后,成立了《中国通史》近代后编卷(1919—1949)编写组。至此,全书12卷的编写组全部组建完毕。

第三阶段,继续编纂和陆续出版:1989年4月至1999年3月。

1989年4月,具有全书总纲性质的第一卷《导论》正式出版,标志着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开始进入出版阶段。

---

① 本段据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简编)》,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白寿彝为《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所作《题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94年12月出版了第二卷《远古时代》(即原始社会)、第三卷《上古时代》(先秦时期,上、下册)。1995年,出版了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下册)、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下册)。1996年出版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上、下册)。1997年出版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下册)。1998年出版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下册)。1999年出版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下册)、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下册)、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上、下册)、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下册)。至此,从1975年开始启动,1979年开始工作,历经二十余年,有数十位主编、数百位作者集体编写的巨著,终成完璧。

作为全书的总主编,白寿彝不仅是全书二十多年编纂过程中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亲自笔耕不辍的实际参战人员。《中国通史》从一开始酝酿,就是白寿彝首先动议的;之后,他不但亲自南来北往地组织全书的编写队伍,更为重要的是,全书的整体思路、理论框架、章节体例、编纂要求和编纂宗旨等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无一不经过他的缜密思考和精心谋划,并将之贯彻到每一卷的具体写作之中。在实际撰写过程中,他既是全书总主编,又是分册主编,而且还是实际执笔人。不但率先亲自主编了全书第一卷,执笔撰写了该卷第一章,而且还参与了许多章节初稿的讨论,之后再由他本人修改、增删、定稿。以后各卷,他和其他学者共同主编了第四卷上下两册,亲自撰写了部分章节,并亲自审定每一卷书稿。全书责任编辑张美娣以其亲身见闻介绍说,在全书编纂过程中,白寿彝"亲自对各卷书稿做了大量的修改、统稿、定稿和选图编目工作"。由于编纂时间长达二十多年,随着年事增高,起初"事必躬亲"的白寿彝逐渐"不能亲自动笔了,但全部书稿都是由其助手一字一句读给他听,然后根据他的意见作修改"。[①]至于每一卷卷首的"题记",则更是出自这位总主编之手。翦伯赞曾经强调,集体修书,主编要学司马光,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而是一开始就要抓提纲,抓发凡创例,对于全书体例的统一安排、史实的最后校订、文字的剪裁乃至句法的锤炼等,都要负起责任,而不能置身事外。[②]而白寿彝的确是一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主编!而全书出版仅仅一年后,为《中国通史》编纂费

---

① 张美娣:《二十年磨一剑——白寿彝与〈中国通史〉》,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4、546、547页。

② 翦伯赞:《跋〈宋司马光通鉴稿〉》,载翦伯赞著、张传玺编《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0—283页。也可参见本章《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相关部分。

尽心力的白寿彝，即于2000年3月21日与世长辞。

(三)《中国通史》的史学成就

《中国通史》共12卷22册、1 400万字，记载了从远古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历史。它在编撰上的总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历史资料，分析和表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包含各时期的历史特点、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代表人物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①

其中第一卷《导论》由白寿彝主编，撰稿人8名。本卷一册，主要是从宏观上阐述有关中国历史的九个理论性问题。第一章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下分三节，第一节从古老的传说和记录、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民族重新组合的历史记录、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发展、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等方面，对中国民族史撰述进行回顾；第二节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第三节从疆域问题、历史的分期、多民族的统一方面，论述如何进行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第二章是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第一节从中国史学家的有关撰述、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有关论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等几个方面，论述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第二节为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讲述中国地理条件的概貌和特点、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和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多方面的问题。第三章是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第一节从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直接生产者的技术性特点、人口问题三个方面，论述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人的有关问题；第二节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重点阐述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中国生产史上的科学技术及其特点。第四章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第一节为生产关系，从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和矛盾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二节为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重点讲述阶级和等级关系、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第五章是国家和法，第一节为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了专门考察；第二节考察国家的职能；第三节从礼与刑、封建法典、近代的立法和司法三方面，考察和论述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法律特点。第六章是社会意识形态，第一节介绍马克思主义关

① 瞿林东：《多卷本〈中国通史〉编撰情况》，载氏著《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于意识形态的学说；第二节是考察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第三节则从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三方面，论述中国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以上六章，从最基本的物质世界的存在讲起，逐步深入到源于物质而又一定程度上高于物质的精神世界；从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基础，逐步转入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把握和论述；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述，引出对中国历史发展特色的认识，很好地体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研究方式，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理论性认识。第七章是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第一节为历史理论的探索；第二节为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第八章是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第一节为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主要讲述史书体裁综合运用的传统和新综合体的探索两个问题；第二节从以序说开宗明义、以综述反映历史发展的总向、以典志反应对历史现象的剖视、以传记反映人物群像和"通"的要求五个方面，具体阐述《中国通史》将如何以全新的综合体裁，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中国历史的情况；第三节为历史文学，从史学和文学、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三方面，论述史书写作过程中的文字表达问题，提出全书编写的文字要求。很明显，这两章是在总结中国古代丰富的史学遗产的基础上，讲述《中国通史》全书在具体编纂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显示出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新的探索和理论创新。与前六章结合来看，前六章从内容上构成一个单元，更多的是讲述中国历史实际是什么样的，这两章则是讲述如何把中国的历史实际更好地书写出来，前边讲的是客观实际，后边讲的是主观如何反映客观、如何表现客观。显然，这是一个有着严密内在逻辑的精心架构。第九章是中国与世界，第一节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来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第二节为中国史和世界史，指出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具体论述了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这是《中国通史》全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讲述中国历史的最终落脚点，因此列为本卷的最后一章。

以上九个方面，此前学者在各种单篇论文和著述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有所涉及，但像本书这样，将它们按照逻辑顺序有机组合在一起，从不同角度互相配合，既是将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交代清楚，又说明了自己将如何表述这一认识，从而构成一篇宏大的理论序说，来指导一部正在编纂中的通史撰述的工作，是本书的独创。而将民族问题的论述放在全书的第一章，书首收录有毛泽东手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各

民族团结起来"书影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蒙文版、藏文版、维文版书影各一张，显示出本书作者对民族史及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也是本书的独创之举。而此书在内容上也多有重要理论创新，学界对此已多有论述。可见，仅此开篇之卷，即已显现出这部《中国通史》的别出机杼。也正因此，本卷出版后，很多学者纷纷发表书评，予以高度评价。①

第二卷为《远古时代》，由苏秉琦主编，撰稿人3名。本卷一册，内容是根据考古材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中国原始社会的情况，上起原始人类，下与夏商周对接，涉及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各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诸课题。共分四章，第一章是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1万多年前），讲的是考古学上所说的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共分五节，分别介绍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最早的人类及其文化、从蓝田猿人到北京猿人、早期智人的出现、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成。第二章是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0000—前3500年）。第三章为铜石并用时代。第四章是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分东北地区、甘青地区、东南与华南、西南地区四节予以介绍。本卷正文长达549页，"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动态地阐述了我国远古人们创造的历史"，之前还有一篇长达20页的序文，"高度浓缩地阐述了该卷的基本论点，在某些方面还作了重要发挥，系统地表达了著者精湛的体系性认识"。②这是20世纪较为系统、全面、详细地论述中国原始社会的专著。白寿彝在《题记》中认为：本卷的完成，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本卷出版后，学界纷纷发表书评，认为这是首部"植根于史实，自成科学体系的远古时代的力著"，③"是目前一部最具权威的中国史前史"。④

---

① 如薛莹：《新意盎然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吴怀祺：《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的内涵和特征——读〈中国通史·导论〉》，《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1期；高敏：《读白寿彝先生主编之〈中国通史〉导论卷》，《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1期；陈其泰：《理论方向和开拓精神——读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群言》1990年第1期；瞿林东：《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简介》，《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刘统：《历史是人的行为——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读后》，《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吴怀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新时期的通史编撰——再读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② 章华天：《中国史前史建设的力著——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简介》，《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③ 章华天：《中国史前史建设的力著——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简介》，《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④ 王仁湘：《溯渊源于尘壤，化传说为信史——读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第三卷为《上古时代》，由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上册包括甲编序说、乙编综述、丙编典志，有撰稿人 14 名；下册为丁编传记，有撰稿人 12 名。从本卷起，各卷均分上下两册，内容上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编。本卷论述的是中国自有文字以来，一直到战国末年的历史，从历史发展顺序上看，约略相当于一般历史著作中所说的奴隶制时代。但在这个时代，奴隶制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形态，“到了春秋战国，是上古时代向中古时代的过渡，即奴隶制在中原地区向封建制过渡时期”。[①]因而本书采用了“上古时代”的提法，白寿彝认为这样“可能更妥当些”。甲编序说，分五章论述本时期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甲骨文和金文、学界研究概况及本卷的编写旨趣，其中文献资料包括五经、史地书、诸子书、辞赋四个方面；考古资料包括主要都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三部分内容。乙编综述论述了商周时期历史发展的概况，并追述到神话和传说中所反映的一些情况，最后论述了商周时期的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其中商周时期的历史分为商殷时期、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四个发展阶段，各立一章，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以期对这一时代的历史勾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丙编典志，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政治上、经济上的制度性历史现象的探索，重点探索了农牧林渔蚕桑、手工业、商业、货币、道路、交通及都邑发展的水平和特点，探索了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都鄙和国野、阶级和等级，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丁编传记又分为上下两编，主要记载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但不仅限于人物传记。上编以国别立传，简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历史；下编前十四章以历史人物立传，入传人物 41 位，另有一类“墨家辩者”，然后是以学术专业为传的三章，包括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学、物理学、医学等专业，最后是妇女传和杂传 15 人，人物传以 2—4 人为一章，属于传统史学上所说的合传，后两类则属于传统史学上所说的类传。书后附录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两篇文章，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门阐述。白寿彝认为，本卷对商周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论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一些新材料和新论点，对有关问题的探索和解决有积极意义。[②]本卷出版后，被认为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收获”，是“中华早期文明的全景画”。[③]而以一章的篇幅，通过世界

---

①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1 页。

② 参见白寿彝为《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所写《题记》及该卷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③ 晁福林：《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收获——读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三卷》，《史学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刘统：《中华早期文明的全景画——白寿彝先生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读后》，《史学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最古老的文明和商周时期的中国、西周文明和同时期的世界、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和当时的世界这三节内容，以历史比较的方法，阐述这一时期的中国在上古世界中的地位，更是所有同类通史著作所没有。

第四卷为《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包括序说、综述、典志三编，由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撰稿人26名；下册为传记编，由白寿彝、廖德清、施丁主编，撰稿人17名。本卷论述的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成长时期，相当于秦汉皇朝统治时期的历史。所谓中古时代，是指以封建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有别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时代。秦汉皇朝统治时期，上限起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下限到公元196年汉迁都许昌。此后汉朝虽仍保持着它的朝代称号，但实际上大权已归曹操掌握，历史已进入另一个时期。甲编序说，分四章对本时期的基本史料、学界研究概况以及本卷的编撰意图和要旨进行分析论述。乙编综述，分九章对本时期的民族关系、政治、军事大事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论述，包括秦汉时期的民族，秦封建王朝的建立，秦的暴政与秦末农民战争，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西汉盛世，西汉的衰落，东汉皇朝的建立，外戚、宦官、党锢、黄巾大起义，秦汉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丙编典志，论述本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法律制度等内容，包括农牧业，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官私手工业，手工业技术，商业和货币，都会与里(坊)市制度，国内外交通，户籍制度，上计制度，赋税制度，徭役制度，朝廷、郡县和封国，官吏的选用、考核及其他制度，兵制，刑法等十五个方面的专题。丁编传记，前三十八章是以一人为一章的人物专传和以二人以上为一章的人物合传，共有90人；其次是党锢、宦者两篇类传，共有21人；然后是经学、方士、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技艺等学术传记；最后是妇女传和杂传两篇类传，收录十余人。书后附录有一篇"秦汉礼俗"，专门讲述秦汉时期的衣、食、住、行、嫁娶和丧葬等状况。白寿彝在《题记》中认为，序说编"内容翔实"，典志编的内容"相当广泛和深入，为通史撰述中所仅见"，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本卷出版后，林甘泉发表书评，认为本卷对秦汉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比以往一些同类著作深入得多，有更大的说服力；全书内容也比以往同类著作更加丰富充实，提供了一幅秦汉时期绚烂多彩的历史画卷。对本卷的不足或值得商议之处，文章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最后特别对白寿彝亲自动手，统一修改和定稿《中国通史》各卷的献身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予以高度赞扬。[①]

① 林甘泉：《继承·探索·创新——读〈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第五卷为《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包括序说、综述、典志编，由何兹全主编，撰稿人 20 名；下册为传记编，由黎虎主编，撰稿人 25 名。本卷和下卷（第六卷）都是论述中国中古时代发展时期历史的。白寿彝在《题记》中指出：这是一个全国性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在其前期，也就是本卷所要论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重新组合现象在展开；在其后期，也就是下卷所要论述的隋唐时期，民族重新组合的现象逐渐告一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于公元 196—589 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三国的鼎立；第二，西晋短暂的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第三，南北朝的对峙；第四，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从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上看，这个时期历史形成的脉络还是相当清楚的。这种划分是从历史发展的全局上看，而不是简单的作为割据的历史来处理的。甲编序说，分四章对该时期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学界研究概况以及本卷的编撰旨趣进行论述。乙编综述，先按上述四个阶段，分四章纵向梳理和论述各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军事大事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然后以两章横向总结本卷所包括的整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文化发展的总形势。这样就以纵横结合的表述形式，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大势勾勒出来。丙编典志，由七章组成，即农业、手工业、门阀制度、户籍制度、赋役制度、法制、兵制，分门别类地论述本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等制度性内容。丁编传记，前二十二章是 71 位历史人物的合传，其次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的学术传记，最后是 4 位妇女的类传。本卷“抓住了由分裂到统一，由民族冲突到民族融合这条主线”，“不仅生动再现了历史现象，而且注重揭示历史规律”，①气势恢宏，论述精湛，文风朴实，写出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②

第六卷为《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包括序说、综述、典志编，由史念海主编，撰稿人 22 名；下册为传记编，由陈光崇主编，撰稿人 24 名。本卷论述了隋开皇元年（581 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 年）的历史。这是中国中古时代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后期的历史。甲编序说，分四章对本时期的基本史料、考古资料、学界研究概况以及本卷的编写旨趣进行分析论述。乙编综述分别是年代与历法，自然环境

---

① 刘统：《历史统一大趋势的展示——白寿彝先生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读后》，《史学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② 陈琳国：《写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五卷读后》，《史学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的利用和变迁，疆域和行政区划及其变迁，隋唐各民族的分布及迁徙，隋的统一，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朝的建立，强大的封建专制国家（武德、贞观到开元），唐中叶的变乱（天宝到元和），唐皇朝的没落（元和末年以后）、唐末农民大起义，封建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的发展，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从这十二个方面，论述隋唐历史的发展演变脉络，其中前三章和最后一章都是其他同类著作极为欠缺的内容。丙编典志先后考察和论述了这一时期农牧地区的演变及其影响，农学和农业技术，官私手工业，工程、手工业技术，户籍·田制·赋税，交通与都会，长安和洛阳，隋唐科举制，隋唐官制，隋唐兵制，隋唐律令，隋唐音乐，隋唐礼俗等内容。丁编传记，前四十六章是83位历史人物的专传与合传，其次是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的学术传记，最后是妇女传，记述冼夫人、平阳公主、妇女书和宋氏姊妹的事迹。白寿彝在《题记》中指出：本卷所重视的，是要写成中国通史中的隋唐史。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田制、税制、官制、军制、法制、选举制度、行政区域的划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民族的重新组合，社会阶级、阶层所发生的新的变化，都是应当予以阐明的历史性重点。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这样的盛况，在其他历史时期是很难见到的。要写好一部唐史，必须有深厚的功底、高屋建瓴的历史见识、简练生动的表述。但这需要长期不断的积累，也不能要求这些条件都具备于一人之身，而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的。在本卷的编写中，有名家的精品，也有水平一般的作品，这是现阶段的正常现象，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才能有所改变。本卷出版后，刘统发表书评，认为本卷汇集了史学界、考古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历史地理、民族关系、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中外交流等方面显示出自身的特点，视野宽广，论证坚实，观点新颖，不仅完整地阐述了隋唐的历史过程，而且从多方面、深层次探索了隋唐强盛发展的内在原因，是对隋唐强盛的深层探索。①

第七卷为《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陈振主编，上册包括序说、综述、典志编，有撰稿人24名；下册为传记编，有撰稿人27名。本卷论述906—1279年的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时期的历史，也是中国各民族又一次重新组合时期的历史。甲编序说，分四章对本时期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学界

---

① 刘统：《隋唐强盛的深层探索——多卷本〈中国通史〉第六卷读后》，《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研究概况以及本卷的编写旨趣进行分析论述。乙编综述共十四章，第一章是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崛起，这是第一部分；第二至七章是第二部分，主要是讲辽、北宋各自发展及二者之间的矛盾；第八至十二章是第三部分，主要是讲南宋、金各自发展及二者间的矛盾；第十三至十四章是第四部分，论述西夏、周边民族及其政权。白寿彝认为："这样的安排似乎比较清楚，对读者比较方便。"丙编典志，分别讲述农业和农学技术，官私手工业，手工业、工程技术，商业与货币，城市和镇市，交通与邮传，赋税和役法，政治制度，军制，法律，科举与教育，社会风俗和宗教，学术、文化等内容。丁编传记，前八十七章是对 200 位历史人物的专传与合传，其次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医药学的学术传记。白寿彝指出：这一时期，汉族地区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海贸易的畅通，边疆民族地区封建化的加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学术文化方面，文、史、哲、理均有巨著，且树新声。我们应该看到这时期有关的各民族在政治上都应有他们平等的地位，都各有他们对历史的贡献。旧说简单地认为这段时期的历史是混乱、分裂的历史，只能是皮相之谈，是不足取的。本卷在表述这些认识过程中，"文清如水，骨架分明"。[①]主编陈振在本卷出版后，写专文谈了自己的编写体会，通过对比同类著作，他指出："白先生所设计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不仅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全貌，也更好地体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民族平等思想。"认为本卷对中国境内当时的其他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比已出版的其他《中国通史》（包括《中国全史》）作了更多的安排，不仅对五代、辽、宋、夏、金统辖区以外的回鹘、喀喇汗王朝、吐蕃、青唐羌、大理等各民族及其政权安排了专节，作了较多的叙述，还对统辖区的奚、鞑靼、壮族，也安排专节进行叙述，而且也如同对待辽、宋、夏、金史的撰写一样，都是请相关的专家撰稿，以尽可能多地、高水平地反映当时各民族及其政权的概貌，反映他们各自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典志部分，也没有简单地吸收他人研究成果，而是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他人成果，并尽可能地撰写得具有自己的特色。[②]刘统发表书评，认为本卷汇集了当代研究的最新成果，融会贯通，是目前该领域最全面、最完整的一部断代史。[③]王曾瑜也在书评中指出：此书在篇幅上大大超过了前人相应的

---

① 引文见白寿彝为《中国通史》第七卷所写《题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陈振：《谈谈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中的民族平等思想——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的一点体会》，《史学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③ 刘统：《白寿彝先生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读后》，《回族研究》1999 年第 3 期。

断代史著作，并且是综述整个断代史，涵盖了一个时期中国境内各王朝、各政权史，尽管有些不足，但确是比以往的一些高水平的、相应的断代史作品有了新的开拓和提高。①

第八卷为《中古时代・元时期》，由陈得芝主编，上册包括序说、综述、典志编，有撰稿人23名；下册为传记编，有撰稿人26名。本卷论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到元顺帝退出中原的历史。大蒙古国建立于1206年，这是蒙古人建国之始，也可说是蒙古人由许多分散的部落转向统一民族的重要标志。1271年忽必烈又建大元国号，而原来的国号仍未废弃，全称为“大元大蒙古国”。元顺帝于1368年退出中原。此后，元廷迁往漠北，继续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但元廷自中原的退出就意味着它在全国性统治地位的终结，而逐渐成为明代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甲编序说共八章，分别介绍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汉文资料，蒙、藏、回鹘文资料，国外资料，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20世纪20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蒙元史研究，国外的蒙元史研究以及本卷的编写旨趣。乙编综述共十三章，分别是：国号、年代和分期，疆域与政区，民族，蒙古的兴起，蒙古国的强盛，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建和忽必烈时期的元代社会，成宗“守成”与武宗时期朝政的衰驰，从变通祖述到粉饰文治，元朝统制的衰败与元末农民大起义，西北宗藩，文化的发展，宗教的兴盛，中外关系。丙编典志，分别讲述农业、畜牧业，土地制度与地租，户籍、赋役，手工业、工程，商业与市镇，运河与海运，钞法，职官制度，军事制度，分封制度，元代的法律，元代的礼俗。丁编传记，前二十一章是对90位历史人物的合传，其次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医药学的学术传记。在已出版的各种同类著作史中，从未有将元朝作为一个时期而单独列为一卷的，这说明作者们对这段历史在中国通史中的地位有着独到认识。白寿彝在《题记》中认为：“本卷的特点是：史料搜集得广，考核精审，立论平实，可说功力相当深厚。”屈文军在书评中对本卷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价，认为此书是元史研究的力作，其中对元中期史的叙述达到了这一领域前所未有的水平，对元时期西北宗藩的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内的许多空白，全书虽有些不足，但也达到了当前元朝断代史著作所能达到的高水平。②陈建勤也认为，此书资料翔实、考论精审、论述全面，

---

① 王曾瑜：《评〈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屈文军：《元史研究的力作——评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几乎无所不及，不少问题为以前通史著作中不载或未能详述者，是迄今内容最宏富的元史著作。①

第九卷为《中古时代·明时期》，由王毓全主编，上册包括序说、综述、典志编，有撰稿人 24 名；下册为传记编，有撰稿人 37 名。本卷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衰弱时期明代的历史。明代是继秦汉、隋唐、宋元之后又一个统一的皇朝，有许多新的东西是以前所没有的，这表明了它在历史上的进步。甲编序说分三章论述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学界研究概况和本卷编写旨趣。乙编综述共十二章，分别论述明朝的建立与北元的覆灭，明朝的兴盛，明朝的中衰，明朝的灭亡，明代的农民起义，南明政权及各地的抗清斗争，明代军政体制的变化，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朝的民族关系，明朝的对外关系与中西文化交流，明代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内容。丙编典志，分别讲述农学和农业技术，土地制度，户口制度，赋役制度，官私手工业，手工业、工程技术，阶级结构，商业，教育、科举与铨选、考核制度，明代的宗教。丁编传记，前五十四章是对 111 位历史人物的专传和合传，其次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医药学的学术传记。本卷出版后，刁之发表书评，对其四编内容分别进行了评论。②

第十卷为《中古时代·清时期》，由周远廉、孙文良主编，上册包括序说、综述、典志编，有撰稿人 40 名；下册为传记编，有撰稿人 33 名。本卷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衰弱时期清代的历史，上限为努尔哈赤的建国，下限为鸦片战争开始。甲编序说，分三章介绍有关这一时期的基本史料、学界研究状况、本卷编写旨趣。乙编综述十章，分别叙述后金的兴起，清朝的确立，入主中原，康乾盛世，嘉道渐衰，白莲教和川陕楚农民起义，天地会，少数民族，台湾的开发，中俄关系等内容。丙编典志，分别讲述农学和农业技术，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手工技术及有关的工程，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商人、商业、商镇，政权机构及其职能，军制和法制，礼俗，官修图书。丁编传记，前四十六章是对 48 位历史人物的专传和合传，其次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化学、生物学、医药学的学术传记。白寿彝在《题记》中指出：清代在历史上有其成就，但也不可估计太过高，因为它毕竟已处于封建社会的衰老阶段。清代的民族关系相当复杂，民族多，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本卷重视民族关系的主流，力求贯彻民族平等原则，防止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偏向。认为清代是中国在国际地位上变化的

① 陈建勤：《评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元史卷〉》，《江海学刊》1998 年第 3 期。

② 刁之：《读〈中国通史·明时期〉卷》，《回族研究》1999 年第 3 期。

关键时期，并对此作了适当的论述。本卷出版后，阎崇年发表书评，认为此书是一部高水准的学术巨著，体现了 20 世纪国内外清史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水平，为此后清朝通史编修、断代历史撰修、中国通史纂修，提供了一种可资参酌的楷模。①

第十一卷为《近代前编(1840—1919)》，由龚书铎主编，上册包括序说、综述、典志编，有撰稿人 39 名；下册为传记编，有撰稿人 44 名。本卷和下卷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时期历史的，本卷记述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至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夜近 80 年的历史。甲编序说，分三章介绍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学界研究状况、本卷编写旨趣。乙编综述十六章，分别为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起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政局的变化，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外国的经济侵略和官员的洋务活动，商办企业的出现、新阶级的产生、思想文化的变化，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清廷的"预备立宪"，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革命的新曙光。丙编典志十八章，分别讲述近代农业和农学技术，手工业，工业，工业工程技术，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的演变及自然经济的瓦解，商业，交通邮电，河工、漕运、盐政的衰败，海关、关税和子口税，法制，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宪政，兵制，秘密结社，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学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内容。丁编传记，前三十二章是对 35 位历史人物的专传和合传，其次是数学、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医药学、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的学术传记。白寿彝在《题记》中指出：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因而这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本卷出版后，史革新等发表书评，认为这是一部充满新意的著作，无论在对所述内容的安排设计，还是在编写体例的更新方面，都突破了旧的模式，体现了总主编白寿彝关于编写新时期通史对于"通"的要求，给读者以全面、丰富、鲜活的历史概念。②

---

① 阎崇年：《读〈中国通史·清时期卷〉》，《史学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② 史革新、张林：《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和创——读多卷本〈中国通史·近代前编〉卷》，《回族研究》1999 年第 3 期。

第十二卷为《近代后编(1919—1949)》,由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主编,上册包括序说、综述、典志编,有撰稿人36名;下册为传记编,有撰稿人54名。本卷论述的是1919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在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上,同上卷一样,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也仍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不同的是,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最后胜利。甲编序说,分三章介绍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学界研究状况和本卷编写旨趣。乙编综述十九章,以"近代世界历史进程向中国提出来的主要问题"开篇,然后分别叙述新的政治分野的出现,改造中国的各种政治主张的纷陈和人民的历史的选择,革命斗争形式的演变和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现,国民党南京政权独裁统治的确立,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对中国出路问题的反思与探索,国民革命失败后中间政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中原大战及其结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及各政派的实际反应,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问题上的汇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总格局的形成,欧洲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先后爆发与国共两党世界战略的变化,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消长,世界格局的根本转变和各党派对建国主张的阐发,抗日战争的胜利,一个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政治协商会议,中间路线的破产和"南北朝"的幻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最后一章是对以上所有内容的扼要回顾和总结——"三十年的基本总结: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这一章是以前各卷都没有的,体现了作者们在修撰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的处理方式。丙编典志,分别介绍农业和农业科技、工业工程技术、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外国对华投资、国家垄断资本、民族资本、新民主主义经济、北洋政府的机构和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机构和制度、解放区的政权机构和制度、汪精卫伪南京国民政府等内容。丁编传记,前五十四章是对57位历史人物的专传和合传,其次是数学、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医药学、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的学术传记。在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类著作中,只有本书记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国和国成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特别是本卷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记述1919—1949年的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更是少有同类参考著作,正如白寿彝在《题记》中所说:"本卷的编撰是在几乎全无依傍的情况下编写的。"这既给本卷的编写增加了难度,也使其在学术

创新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本卷出版后，朱汉国发表书评，从新体例、新视野、新观点三个方面总结了本卷的主要成就。[①]

综览全书，《中国通史》成就主要有如下几项：

首先是体裁、体例上有重大创新。全书十二卷，第一卷为《导论》，以 27 万字的篇幅，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从宏观上阐述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同时又说明了本书将如何表述这一认识，从而构成一篇宏大的理论序说，来指导以下各卷的具体编撰工作。这在此前的通史编纂中是没有先例的。范文澜、翦伯赞在编写通史的过程中，曾各自写过有关编纂原则的理论文章，但与此书相比，篇幅既小，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也远远不及。这是本书在卷别设置上的独创之处，既是全书内容上的创新，也是全书体裁上的一个创新。

第二卷是《远古时代》，是从考古材料探索中国原始社会的状况，因内容特殊，直接沿用了章节体的原有形式，以时间为序，分章节展开论述。这与以下各卷明显不同，虽无体例创新，却显示出在体裁运用方面的灵活性。

第三卷以下，每卷内容都分成序说、综述、典志、人物传记四个部分，然后再细分章节展开论述。白寿彝对中国史学史的几十年深入研究，使他“深感到一种单一的体裁，决不足以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因此他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决心“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②]于是创设了这种四种体例有机配合的新综合体。其中“序说”放在全卷之首，内容有三：一是论述该卷历史研究所涉及的基本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在大量资料中选出重要者来论述，以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研究；二是简述已有的主要研究成果，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三是扼要说明该卷的编写旨趣和编纂上的具体问题。这在所有通史、断代史著作中都是“前所未有的特色”。[③]“综述”是各卷的主干部分，吸取本纪、编年和章节体的长处而加以发展，从而在这一部分写出各卷历史的发展总向，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多方面内容，但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紧紧抓住该时期历史的总纲，描述大的发展脉络，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典志”是对各种制度、各种行业等进行专题剖视，在改造和发展传统的纪传体书志内容的基础上，动态地论述经济、政治、法律、军事制度以及文化科学技术等有关专

---

① 朱汉国：《在开拓中创新，从史实处求是——读〈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回族研究》1999 年第 3 期。

②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0 页。

③ 王曾瑜：《评〈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题,并考察它们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这些社会剖面来反映该历史时期的特点。相对于"综述"更多地从纵向勾勒历史的发展线索来说,"典志"部分主要是从横向上展示该历史阶段的各个层面的内在特点。"人物"是用来反映人物的群像,历史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在史书中看到历史人物的群像,就会愈益感到历史的丰富性。但要有选择、有主次,而且要在写出历史人物作用的同时,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要从人物身上看时代,把人物放在时代的发展中来写。这四种体例互相配合,熔于每一卷之内,凡内容有交叉者,各自选取自身所在位置的主要内容,尽量避免重复,这既使四个部分成为一个有机组合体,也更能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显示该卷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全貌,既可反映历史的规律性,又可以充分地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便于形成对该时期历史的全面、立体而动态的认识。而将这些内容前后相续地连接起来,便形成了对整个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的全面、立体而动态的认识。可见,这种博采古今史书体裁之长而形成的新的综合性体裁,比以往的任何一种史书体裁都更能增加史书内容的含量,更能反映每一历史阶段发展的全貌。无疑,这是中国历史编纂学上的集大成之举,是史书体裁上的重大创新。也正因此,从第三卷一问世,各卷书评都对这一体裁的运用给予了重点关注,高度评价了这种新综合体在反映历史的广阔和深度方面的创新意义。

其次,全书在内容上有重要创获。体裁、体例不管如何完善,毕竟只是外在的表述形式,如果书的内容没有自己的新的研究成果,观点一般,那也只能是空有一副皮囊,依然不能在学术界站稳脚跟。白寿彝之所以将二百多万字的中型本通史著作断然停修,就是因为它"题无特色,文无新意",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创新可言。而此后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之所以能够获得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最主要的就是在内容上有新的重要创获,"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①这既反映在与新体例的运用直接相关的内容,主要是"序说"、"典志"和"传记"部分,也反映在与其他同类著作内容大致相当的"综述"部分。在"序说"中,以有限的篇幅,将各种传世文献的来龙去脉、史料价值讲述清楚,将近百年来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梳理明晰,已经很费心思,而更重要和更难得的是,还将"近百年来所有重要的,而且是十分散漫、难于整理的考古资料,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博而得其要,简而周其事,其实是给读者描绘了一幅

① 瞿林东:《卓尔不群的巨著——谈〈中国通史〉的特点》,载氏著《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考古成就的清晰的鸟瞰图，是十分不易的”。[1]而对学术界重要研究成果的精当介绍，也使读者对该卷历史的研究有了清晰地了解。这些内容既为读者阅读本书、了解本书对该段历史的独到认识提供了方便，又对有志于该段历史研究的读者，尤具深远的指导性意义。

“典志”部分，对一个时期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制、军制、教育、社会风俗、宗教等，论述得相当全面，而且许多是以前各种通史、断代史中所没有和很少论及的内容，这使“典志”部分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从全书来看，这部分不但内容详细周全，这在上面所列举的各卷章节目录中即可以清晰地显现出来，而且脉络分明，考证精审，因而各卷书评都对此予以了专门评价。

“传记”部分，充分显示了作者对人类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的肯定与重视。白寿彝认为：“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却是可取的。”而几十年来，史学界在重视阐述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都忽视了人物传记的编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于是他主张在通史中写人物传记，而且“要给传记以较多篇幅”。[2]第三卷以下正是这样做的，每卷下册都是人物传记的内容，而且篇幅都不少于上册，在写法上也完全贯彻了白寿彝的指导思想。事情都是人做的，但长期以来，记述这些事情的史书中却没有做事情的人，而此书则一举彻底打破了百年来通史、断代史著作中有事无人的局面，不但在形式上令人耳目一新，使全书鲜活起来，而且在内容上也使全书进一步丰富起来，立体感增强。而其中的“一大优点，是尽可能多地为当时教科文的重要人物立传”。对少数民族人物，由于史料较少，作者们广泛网罗史料，并进行了细致的考订工作，有很多“见功力之作”。[3]这都使这部分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相较而言，“综述”部分最难创新，因为这部分与此前出版的大量通史、断代史著作的内容重复较多，换句话说，此前出版的通史、断代史著作的主要内容即相当于本书的“综述”部分。这样一来，它必然“在相当多方面沿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对相当多的基本史实的叙述事实上是不可能创新的。但是，如果不能在某些方面提供独到的、创新的研究，一切都是改头换面地复述以往的研究成果，也就丧失了出

---

① 王曾瑜：《评〈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笔者以为，王先生的这一评论虽然是针对第七卷说的，但适用于第三卷以下的每一卷，故在正文中采取了截取其文的做法。

②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页。

③ 笔者以为，王先生的这一评论虽然是针对第七卷说的，但适用于第三卷以下的每一卷，故在正文中采取了截取其文的做法。

版的价值"。[1]可喜的是,从这各个意义上衡量,这部《中国通史》也是有其成功之处的。首先看体例没有任何创新的第二卷《远古时代》卷,通过前面对本书体裁体例的介绍,很容易看出,这一卷实际上就是整卷的形式来写第三卷以下各卷的"综述"部分。此前当然出版过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全面论述的著作,但与此书相比,确实是大为逊色。对本卷的成就,白寿彝在《题记》中就以"举贤不避亲"的形式,直言称道它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认为这在以往通史中是没有先例的,在考古学上也是一项创举。学者们在评论中肯定了白寿彝的论断,认为本卷"具体地独到地论述了中国远古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途径",[2]是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新贡献,也是一次阶段性的研究总结,是目前最具权威的中国史前史。[3]再如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林甘泉在前引书评中,专门阐发了"综述"部分"比起以往同类著作来,内容更加丰富充实,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秦汉时期绚烂多彩的历史画卷"的学术价值,并认为这些都是比较公允平实而且是以往一些通史著作中注意不够的。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综述"的开篇两章"年代与历法"、"自然环境的利用与变迁"都是以前通史、断代史著作中极少出现的内容。在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中,"综述"部分广泛吸收了明史研究的新成果,完整展现了明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许多过去通史中存在的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集中反映"了当前高水平的研究成果。[4]第十二卷《近代后编》被学界誉为"从史实处求是",主要体现在"综述"部分的"新观点"上。[5]其他各卷的书评,也都对该卷"综述"部分取得的成就予以肯定和赞誉。

在全书各卷的"综述"中,民族史内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此前的各种通史、断代史著作特别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著作中,民族史内容已经得到重视,但与此书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这既与总主编白寿彝出身于少数民族,在生活上与思想上感触更深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与他对中国民族史研究造诣精深和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有关。白寿彝在第八卷《题记》中说:"民族史是本书计划中的重点。"翻看全书,确实如此。全书第一卷《导论》第一章就是以8万字的篇幅,讲述对

---

① 王曾瑜:《评〈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吴怀祺:《当代史学上的创举——关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二卷的认识》,《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③ 王仁湘:《溯渊源于尘壤,化传说为信史——读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④ 习之:《读〈中国通史·明时期〉卷》,《回族研究》1999年第3期。

⑤ 朱汉国:《在开拓中创新,从史实处求是——读〈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回族研究》1999年第3期。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的认识，是全卷九章中篇幅最多者。秦汉时期我国形成了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四卷的"综述"就是以"秦汉时期的民族"开篇，而且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放在同一章之内分列几节叙述，显示了编撰者对于如何论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颇具匠心。对各少数民族的族源、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也都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①第六卷"综述"第四章为"隋唐各民族的分布及迁徙"，专门讲述这一时期的民族状况，同时它还与第三章"疆域和行政区划及其变迁"、第七章"强大的封建专制国家"、第十章"封建经济的发展"，都谈到唐初在周边少数民族区域建立羁縻府州的情况，并称"这是唐代特有的制度"。在这些章节中，以大量事实说明：唐朝前期的强盛，得益于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成功，主要是唐朝统治者能以包容宽厚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这种民族政策，使其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强盛帝国。本卷对隋唐民族关系的研究和总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②第七卷是《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史料的缺乏，对这一时期中国境内若干少数民族历史的叙述，向来是较为薄弱的，而此书乙编第十四章对奚族、鞑靼、回鹘、喀喇汗王朝、吐蕃、青唐羌、大理、壮族历史的细致论述，就显得珍贵"。③第八卷专门论述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的历史情况，在已出版的各种同类著作史中，从未有将元朝作为一个时期而单独列为一卷的，而且也从未有像本卷这样详尽的元史著作，这表明本书对这段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历史在中国通史中的地位有着独到认识。而其"综述"中的"民族"一章，深入具体地记述了蒙古族、回回族、藏族、畏兀儿族的族源、历史演变、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元朝对他们的管理等，此外对云南和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作了描述。这就使多年来除对蒙古族、回回族研究比较充分外，对其他民族的研究都还很不够的局面得到了很大改观。④同样，其他各卷中也都对民族史内容进行了详尽梳理和论述，篇幅和水平都超过了以往通史和断代史著作。

另外，本书的一些"综述"中，还有一个独特的内容，这就是专门设立了一章"中国与世界"的内容。全书第一卷《导论》中曾以此章殿后，指出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

---

① 林甘泉：《继承·探索·创新——读〈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② 刘统：《隋唐强盛的深层探索——多卷本〈中国通史〉第六卷读后》，《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③ 王曾瑜：《评〈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④ 屈文军：《元史研究的力作——评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景考察之必要，具体论述了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第三卷《上古时代》(先秦时期)、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的“综述”中，最后一章分别论述商周时期、秦汉时期、隋唐时期的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前此所有同类通史、断代史著作所没有的。其他各卷虽然没有直接设立这一章，但也对中外文化交流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述。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没有新意的学术成果虽然在学术长河中常有出现，但都很快在学术长河中被淹没，或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那些真有新意的作品，却常常余音绕梁，值得人们时时咀嚼。《中国通史》以其新见迭出的学术成就和获得的良好的学术声誉，很好地对此做出了诠释。

第三，重视对中国历史特点的宏观理论探索，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是《中国通史》的另一特色。对此，瞿林东将这一特色概括为“鲜明的理论体系”。他指出：《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性认识。这些认识贯串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中做了系统充分的阐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认识的最有分量的著作。认为这对帮助人们以科学的态度认识中国历史方面有指导意义，对历史理论研究和中国通史编纂也都具有较高的科学参考价值。[①]吴怀祺也以《马克思主义通史学理论的建设》为题，专门撰文，对《中国通史》关于中国历史特点的理论探索和成就进行阐发。[②]林甘泉则从历史分期的角度，专题讨论了《中国通史》的理论色彩。他说：《中国通史》对历史阶段的划分，沿用了以往有些史书曾经采用过的“远古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命名。但是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基本线索的。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既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只有掌握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和”这一基本线索，才能揭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中国通史》在分析不同时代的社会性质时，既着眼于决定社会经济形态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注意到一些社会转型时期“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历史特点，这就避免了以往一些通史著作所存在的公式化和简单化的毛病。比如书中

---

① 瞿林东：《卓尔不群的巨著——谈〈中国通史〉的特点》、《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简介》，载氏著《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吴怀祺：《马克思主义通史学理论的建设》，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认为秦汉时代封建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占主导地位，但又指出当时还存在着不少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在分析秦汉农民的身份地位时，指出当时既有由官府授田的农民和租佃官田的农民，也有地主佃户和雇工，还有其他形式的依附农民和有较多人身自由的自耕农；同样是雇农，有的身份比较自由，有的与主人之间则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对农民阶级所作的这种具体分析，使读者有可能从总体上认识当时封建制生产关系虽然已经占主导地位，但并不排斥奴隶制关系的存在，而且农民的经济地位和人身依附程度也是有许多差别的。这就避免了把阶级关系作简单化的理解。[①]此外，还有许多学者纷纷对书中的理论特色进行了总结归纳。

第四，它是真正的中国通史。这一点，以戴逸的评价最为简明扼要而又全面精到。他说：中国通史在市场上很多，连讲义、教材加起来恐怕要上百部。但是只有这部是最详尽最丰富的中国通史，1 400 万字，一直写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以至礼仪风俗等等无所不包。不仅时间上是贯通的，而且在空间上也是贯通的，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其他通史很多只有古代，或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而这部书克服了这些缺点，而且有创新、有新意、有特色，所以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 20 世纪"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的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是 20 世纪"历史学的压轴之作"。[②]

总之，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具体而鲜明地勾画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③]第九卷主编王毓铨在全书完成之后，高兴地写下了两句贺诗："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④]高度肯定了这部集体智慧结晶的学术著作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诚如瞿林东所言，这部著作以其总结性和创造性，"开辟了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道路"。[⑤]

---

① 林甘泉：《一部代表通史研究新水平的力作》，见《皇皇巨著，史学丰碑——〈中国通史〉五人谈》，《求是杂志》2000 年第 22 期（总 1489 期）。

② 见向燕南：《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综述》，《回族研究》1999 年第 3 期。

③ 林甘泉：《一部代表通史研究新水平的力作》，见《皇皇巨著，史学丰碑——〈中国通史〉五人谈》，《求是杂志》2000 年第 22 期（总 1489 期）。

④ 见陈其泰：《史学体系的重大创——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成就略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⑤ 瞿林东：《卓尔不群的巨著——谈〈中国通史〉的特点》，载氏著《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关于《中国通史》的不足之处，总主编白寿彝在各卷《题记》中大多有所说明，学术界发表的各卷书评也都予以指陈，此外，关增建还发表有专文《白璧中的微瑕——对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中科技史知识的"吹毛求疵"》一文，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第六章　中国断代史研究

一、先秦史研究①

先秦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断代史的一点是，先秦并不单单指一个朝代，而是总括秦朝之前的中国社会，其中的原始社会、夏、商、周等都属于研究范围。而且，先秦史的研究往往涉及考古断代、原始宗教习俗、社会形态、文字解读等方面，这又使得这一时段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片段性和不确定性。加之先秦史资料的稀少，增加了先秦史研究的难度。

以下分三个阶段对 1949 年 10 月至 2000 年的先秦史研究进行概述。

(一) 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5 月

1. 原始社会研究

中国史学界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在 20 世纪上半期即已开始，主要代表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在 1934 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这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著作，具有开创意义。1961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此书的增订本，增加了作者的两篇相关论文。与此相类，由于材料所限，这一时期研究原始社会的著作，有一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著的修订再版，如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 1950 年修订第 2 版)、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 1960 年增订本)。还有一些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的著作，如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 1955 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61 年版)、夏鼐主编的《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历史教学社 1964 年版)

① 本节参考了以下论著：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徐义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先秦史研究》，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 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朱乃诚主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谢保成等：《中国史书目提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朱凤瀚等：《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等。

等。属于新出版的则有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和《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均为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4 年版)、贾兰坡《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及其《中国猿人》(龙门联合书局 1950 年版)、《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中华书局 1964 年版)、《"北京人"的故居》(北京出版社 1958 年版)等。

这一时期在中国台湾地区,有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1954 年版)、黎东方《中国上古史八论》(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1957 年版)等。

2. 夏商周政治史研究

杨宽《商鞅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一书,对商鞅变法进行了全面研究,学术价值很高。此外还有朱明《战国七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周自强《城濮之战》(中华书局 1964 年第 1 版、1965 年第 2 版)、林汉达《春秋五霸》(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等。吴恩裕在 1956 年出版了《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利用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陆第一部专门以"国家起源"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港台地区出版的相关论述有周鸿翔《商殷帝王本纪》(香港中文大学 1958 年版)、刘伯骥《春秋会盟政治》(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62 年版)等。

3. 夏商周社会形态研究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十分火热,郭沫若将旧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修订后,1954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将奴隶社会的下限定在春秋战国之交,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第 1 版、1963 年第 2 版)是在旧作《中国古代社会》基础上修订而成,书中的"古代社会"是指奴隶制社会。作者在自序中说,他从事这项研究一是步王国维和郭沫若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力求在这两个方面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认为本书是"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将人类社会一般规律与中国社会特殊规律自觉地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认为奴隶社会始于商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终结。此书显示了作者独到的研究路径,因而在世纪末被列为"20 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之一。王承祒《中国古代社会史试论》(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版)由四篇论文组成,专门讨论商、西周、战国时期的奴隶与奴隶制问题。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认为,如果某一社会形态符合马克思所描述的封建特征,就能

确定这个社会是封建社会了。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比，说明周代已经是封建社会。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华书局1962年版）集中讨论了中国奴隶社会的特点和上下限问题，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自夏朝初期开始，经历夏商周三代，至秦统一全国为止。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包括《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五部著作，认为殷商是奴隶社会，西周灭商后巩固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周厉王后才开始变为封建社会，周宣王后走上典型的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束世澂《中国封建社会及其分期》支持吕振羽、范文澜等人的观点，认为西周是封建制形成时期。

4. 夏商周经济与社会生活研究

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殷代的社会生活，包括殷族的起源、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天文历法以及艺术建筑和生活习惯等方面，认为商朝处于奴隶制的高级阶段，书后跋文还陈述了其对商代社会的基本观点。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论述了青铜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相当于历史上的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出现和使用，封建社会便取代了以青铜为代表的奴隶社会。全书阶段划分鲜明，学术价值较高。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也是一部论文集，收入14篇论文，有《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等，对西周时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论述，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有益探索，有重要学术价值。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论述从殷代后期到东汉末年的中国经济史，其中前两编为先秦时期的内容，书中利用丰富的材料，加上作者缜密的分析，同时吸收了当时许多新的史学理论成果，对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详细论述了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具有开创性价值。吴大琨《中国的奴隶制经济与封建制经济论纲》（三联书店1963年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态势，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国家形成于春秋战国间。此外还有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制度》（附《殷商氏族方国志》）（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容庚等《殷周青铜器通论》（科学出版社

1958年版)、陈邦怀《殷代社会史料徵存》(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则专门探讨了秦朝以前货币特别是金属货币的起源、发生、发展等问题。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海三联书店1958年版)梳理了从氏族社会后期货币起源到战国时期货币发展的演进变化情况。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主要研究西周末年到战国末年我国少数民族的居处相互关系和迁徙情况,认为西周末年,由于北方大旱而淮河流域丰稔,人民自然向南迁徙,西周政权也向南开拓和移民,因而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频繁活动。

5. 夏商周思想文化研究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50年版)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姊妹篇,全书共分十三章,论述了自西周到秦统一前的社会思想。作者将解决思想史上的难题作为重点,同时注意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将思想史研究放在社会史的背景下加以研究。侯外庐还主编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对先秦时期的思想史进行了全面研究,迄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古代先秦思想展开研究,论述的时代大体上是战国时代,分析了其中各家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进行论述,认为先秦各家在相互批判的过程中也在相互渗透着各自的思想,各派之间有着很大的联系。此外还有王荫铎《孔子的学术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严北溟《孔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李德永《荀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任继愈《老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车载《论老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喻松青《老子》(中华书局1962年版)、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谭戒甫《墨辩发微》(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周钟灵《韩非子的逻辑》(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任继愈《韩非》(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关锋《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和《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中华书局1961年版)、刘及辰《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与思想体系》(新潮书店1951年版)、余书麟《先秦教育思想》(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7年版)、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许顺湛《烂灿的郑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嵇文甫《春秋战国思想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年版)、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党晴梵《先秦思想史论略》(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北京三联书店 1954 年版)、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册(先秦部分)(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先秦部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等。

其中,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对近代以来所取得的甲骨文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在甲骨的整治与书刻、甲骨文的出土与研究、甲骨文的构造与文法、殷代的历史断代、天文历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旧臣、先王先妣、亲属百官、农业生产、宗教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与研究,堪称甲骨文研究的百科全书,是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权威著作,至今仍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上册乙编是关于思想史的研究,着重说明了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认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振兴者,他使传统的思想体系从"天人之际"为中心的思想变作"人人之际","仁者爱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是划时代的,人是宇宙的主宰,逐渐代替了"天",从他开始,儒家思想体系更加健全、影响更大。此书很受社会重视,出版后颇为畅销。

6. 通论性断代史著作

首先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先行问世(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1964 年第 4 版),记述了从原始社会到秦灭六国的历史,叙述了各个时期的政治概况、经济发展、社会面貌、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等内容。这是范文澜考虑最久、研究最深入的一段历史,是其中国古史研究精华所在。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论述了自原始社会至秦朝统一中国这一时期的历史。第一章论述原始社会的公社制度,第二至五章为商代、周代、春秋、战国的历史。书中着重强调中国上古时期的辉煌成就,在古史分期上主张西周封建说。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全面论述了战国时期的历史,认为战国开始的年代为公元前 453 年。书中采用西周封建说,论述了诸侯国由封建领主经济变为封建地主经济的形式和过程,分析了秦国崛起和统一全国的条件和原因。但后来作者改从战国封建说,出版了修订本。此外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学小组编写的《先秦史》(东北师范大学 1958 年印)、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棠棣出版社 1949 年版)、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 1960 年版)等。

7. 重要论文集

郭沫若在论文集《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中，最终确认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岑仲勉《西周文史论丛》(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收录论文 21 篇，内容涉及周族的起源、文化、宗教、民族等方面，此书旨在反对周代文化落后于殷的观点，故将西周论文成果编为一书。此外，较重要的个人文集还有陈梦家《六国纪年》(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版)、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1955 年版)和《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周谷城《古史零证》(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郑振铎《汤祷篇》(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罗根泽《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刘节《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和《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1962 年版)、顾颉刚《史林杂识》(中华书局 1963 年版)、史念海《河山集》(北京三联书店 1963 年版)、关锋等《春秋哲学史论集》(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等。《历史研究》编辑部连续编辑了《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北京三联书店 1956 年版)、《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 1957 年版)、《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 1957 年版)，对当时的历史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哲学研究》编辑部相继编辑出版了《老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孔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 1962 年版)，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孔子讨论文集》第一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等，对推动当时的思想文化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还有台湾大陆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先秦史研究论集》(二册)(台北大陆杂志社 1960 年版)等。

(二) 1966 年 5 月至 1978 年 12 月

这个阶段包括了整个“文革”及“文革”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时间。在这十余年中，政治运动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成为中国大陆的主题。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搞儒法斗争史。出版的著作，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只有张景贤《中国奴隶社会》(中华书局 1974 年版)、顾维勤《从考古资料中看商周奴隶社会的阶级压迫》(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等，还可以看一看。“文革”后，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中国原始社会》(文物出版社 1977 年版)、上海博物馆《中国原始社会参考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等，也算较好者。

这一时期，台湾地区出版的相关论著有：曾松友《中国原始社会之探究》(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66 年版),许倬云主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辑》第一、二册(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 1966 年版),黄煌雄《论战国时代的合纵与连横》(1975 年自印),刘德汉《东周妇女生活》(台湾学生书局 1976 年版),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台北市牧童出版社 1976 年版),席涵静《周代祝官研究》(台北县励志出版社 1978 年版),李唐《战国七雄》(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 1978 年版)和《春秋五霸》(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 1978 年版)等。

(三) 1978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 原始社会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考古工作迅速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随着各类考古发掘成果不断涌现,中国考古学进入了“黄金时期”。学者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新近发现的考古遗迹和文物,对原始社会和先秦史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这一时期有关原始社会的代表作有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梳理中国原始社会的大体脉络,探讨了原始社会以及母系氏族等方面的历史,是比较完整、系统地将文献、考古和民族学、人类学等资料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著作。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 1984 年版)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利用当时最新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力图还原中国原始社会的社会风貌,就许多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著作。其他的有关著作还有余继林《原始社会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吕光天《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 1981 年版)、岑家梧《中国原始社会史稿》(民族出版社 1984 年版)、李友谋《中国原始社会史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时佑平《原始社会史辩》(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李根蟠等《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张维罴《原始社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等。石兴邦《半坡氏族公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是一部根据考古资料研究母系氏族制度的专著。1994 年,由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根据考古材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中国原始社会的情况,是较为系统、全面、详细地论述中国原始社会的专著,是极具权威的中国史前史著作。

在探索原始社会文化方面,也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何新《诸神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 1986 年版)以研究中国上古太阳神崇拜的问题为纲,力求系统

地探求和追溯中国原始神话、宗教以及一些基本哲学概念的起源。李衡眉《中国史前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虽为普及读物,但却是一部自立新体系的学术专著,在探索原始社会文化方面很有特色。柳村《中国原始社会哲学思想萌芽》(党建读物出版社 1993 年版)也是研究中国早期社会思想文化的著作。此外,还有张之恒等《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版)、王仁湘主编《中国史前饮食史》(青岛出版社 1997 年版),以及一些考古学家的论文集,如《裴文中科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等和一些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值得一提的是,《史前研究》于 1983 年创刊,至 1987 年停刊,共出版 18 期;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史前研究辑刊》(1989 年)、《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建馆 30 周年纪念特刊》、《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建馆 40 周年纪念文集》,另有《文博杂志史前研究专号》(1990 年)及《专辑》(1995 年)等期刊、专辑,为中国的原始社会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 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

国家和文明的起源是先秦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通过考古发掘与研究,此项研究也不断的深入和发展。在很长时间里,受古史辨派的影响,学者们把商代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对以前的观点进行了反思。

这一时段出版了一些相关著作,比较有影响的首先是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全书三章:第一章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第二章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第三章中国文明的起源。作者通过种种考古证据,指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附录中还包括 1949—1984 年《中国考古、发掘简略年表》,以及近 60 幅各类文物图。“酋邦”理论是张光直从美国引进的概念,指的是人类历史从氏族部落到国家之间的阶段。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中就利用酋邦理论,讨论中国早期历史,认为中国从黄帝到尧舜为酋邦时代,夏朝进入国家阶段。但葛志毅认为,酋邦概念即使再完善,也只是西方文化人类学中的舶来品,除具研究上的借鉴意义外,原非中国的本土理论,绝不足以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认为,与酋邦概念相比,用早期分封的理论解释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应该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他出版有《周代分封制度研究》(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认为分封制是周代特有的政治制度，对周代分封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功能及其解体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索，通过这一研究，认识到对周代之前的早期分封制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 2004 年的修订本《后记》中特别指出了对周代之前的早期分封制度研究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上的关键作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是一部大众化的自述体裁的著作，通过《两个怪圈》、《学读“天书”》、《解悟和顿悟》、《“条块”说》、《满天星斗》、《三部曲与三模式》和《双接轨》等七节，讲述了作者探索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起源的过程中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集中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成果，将其一生所得所知简洁地表达出来，对考古学界、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乃至普通民众都有很多启示，特别是其中的满天星斗说、[①]三部曲说[②]和三模式说，[③]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誉为“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意义深长”。[④]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问世，如高光晶《中国国家起源》（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陈胜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版）、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

3. 夏商周政治史研究

关于三代的政治研究也是这个时期的重点，涉及政治制度包括政治体制、职官制度、礼乐制度以及政治发展等方面。其中政治制度史著作大部分为专题史研究性质，主要有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张秉楠《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张荣明《殷周政治与宗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1997 年版）、谢华《论西周封建》（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陈

---

① 满天星斗说：苏秉琦指出：在距今 6 000 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详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五章《满天星斗》，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② 中国国家起源的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详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六章《三部曲与三模式》，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③ 中国国家发展的三模式：苏秉琦的大意是：原生型：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导致阶级产生，这是由氏族到国家产生的一般道路，如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次生型：原生型国家受到外力推动，产生了第二次的阶级分化，如受到洪水发生与治水的推动产生了新的首领，建立了新的政治实体。这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续生型：指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后在中原国家基础上建立的新国家，这些国家在建立过程中吸收了原国家的文化。这以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和清朝等代表。详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六章《三部曲与三模式》，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④ 费孝通：《北大百年与文化自觉》，1998 年 6 月 8 日《光明日报》。

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 1986 年版)、张亚初等《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 1986 年版)、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钱杭《周代宗法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0 年版)、吕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版)、葛志毅《西周分封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李衡眉《西周昭穆制度研究》(齐鲁书社 1996 年版)、李力《出土文物与先秦法制》(大象出版社 1997 年版)、巴新生《西周伦理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王德培《西周封建制考实》(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等。这些著作都是专门深入研究的结果,很有学术价值。王宇信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则全面考察和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各种政治制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通论性著作。

冯卓慧等《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1997 年重订本)、黄中业《战国变法运动》(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 1990 年版)、李向平《王权与神权:周代政治与宗教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裴默农《春秋战国外交群星》(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杨升南《中国春秋战国政治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李瑞兰《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杨柳《先秦游士》(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周亚非《中国先秦帝王传略》(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张闻玉《西周王年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等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史研究著作。其中,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充分利用了作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即形成的历史考据学的三重证据说,即文献材料、考古发掘及民俗调查。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题为《宗周社会》,从“氏族篇与地理篇”、“建国篇”、“社会篇”三部分予以论说,下卷题为《宗周的礼乐文明》,从“礼的起源”、“周公对于礼的加工与改造”、“孔子对于礼乐的加工与改造”三部分展开论述。上卷从宗周的氏族谈起,认为夏周两代为黄帝系统,虞商为东夷系统(炎帝为其始祖),黄帝系统和东夷系统共同构成了华夏族。认为,文王演《易》之说虽有争论,但当无疑问。认为文王演《易》实为人类文明之开端,文王乃宗周一统天下之奠基者,也是宗周礼乐文明之开创者。周公继文王之后,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

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认为商是奴隶社会，周在没有灭商以前建立的国家是由氏族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邦，灭商以后，在宗周直辖范围内是从封建社会发展起来的，已经不是城邦国家了，但就全国论，发展极不平衡，自氏族社会到宗法封建都存在着。认为西周是“宗法封建制”，即“前期”封建制，它们自氏族社会转变而来，没有经过奴隶制。在下卷中，重点考察了周公与孔子对礼的加工与改造。认为周公对于原始礼仪有过加工，把它们伦理化了，认为周公以“德”代礼有强调人间德政的意义，以削减上帝权威，这在思想史、政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由此，传统的“天人之际”逐渐失去颜色。认为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主要目的是教人成人，为此他从中国的传统礼乐文明中寻找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于是他选中了周公和诗、书、礼，在周公的基础上，对礼进行了第二次加工改造，提出了“仁”，这时的“仁”已起到了约束自己以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作用。“仁”的提出，使孔子的“礼”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也使人们从神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使传统的“天人之际”走上了“人人之际”。本书的论说建立在扎实的考证基础上，观点鲜明，独树一帜，具有重要价值。

4. 夏商周社会形态研究

“文革”后，古史分期问题不再是学术界理论争论的重点，但仍有学者在继续研究，并出版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首先是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此书在“文革”前即已写成，作者持西周封建说，但在具体分析上又明显不同于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说法，他认为殷代已经具备了径直走向封建社会的条件，无需再经过什么古典的劳动奴隶制阶段。武王伐纣，推翻了殷代奴隶制政权，为新社会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周公摄政当国，采取一系列政策，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使早已存在的农奴制成长起来，取代了殷代的奴隶制，从而使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然后以较多篇幅从周代的土地所有制度、劳动者的身份、典章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探讨和证明周代社会的封建性。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分为五章，每一章的标题就是作者的观点：夏是氏族向奴隶制过渡时期，商是奴隶制形成和发展时期，西周是全盛时期，春秋衰落，到战国正式瓦解。此书观点鲜明，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魏晋封建说”的代表著作。全书第一编为“由部落到国家”，是论述商周和春秋时期的社会；第二编为“中国古代社会”，论述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第

三编是“古代到中世纪”，论述汉末魏晋时期的社会变化。此书是作者五十余年研究的集中表述，自成一家，很有学术价值。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通过整体考察夏商周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发展，认为夏商是氏族封建社会，西周是宗法封建社会，东周后逐渐进入地主封建社会。胡庆钧等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首先从奴隶占有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古希腊罗马史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若干问题、关于奴隶制社会的若干札记、早期奴隶占有制下的等级结构、奴隶与农奴纠葛的由来与发展等五个方面，对奴隶制社会进行综合性的宏观论述，然后分四个专题，对中国商代、希腊荷马时代、罗马王政时代、恺撒与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的早期奴隶制社会面貌进行比较研究，为从中西对比的角度认识中国奴隶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其他著作有许顺湛《中国奴隶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张广志《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等。田昌五的三部论文集《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 1992 年版）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5. 夏商周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外交流的广泛进行，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等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以下从几个方面简要概括本期的研究状况。

（1）断代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

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全面探讨了西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涉及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井田制度与领主制经济、西周时期一般社会经济的发展、井田制度的破坏与土地私有制度的代兴、东周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吴才麟等主编《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夏、商、西周时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杨生民《中国春秋战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等，都是各自领域的第一部断代经济史研究著作。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为先秦两汉部分，也涉及相关内容。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虽主要是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及古史分期问题，但相当篇幅也是在论述经济史内容。2000 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

先秦经济卷》，其中第一编考察从远古到夏商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分别论述了从原始时代到文明时代，商代社会概况与自然环境，商代的土地制度，商代的农业、畜牧业、渔猎业、手工业、商业、城市与交通以及商代的财政制度等问题；第二编考察了西周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分别论述了西周王朝的建立与奴隶制的发展，土地所有制形式，“大田”农场、“授田”制农业经济形式，农民的类型和小农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交通以及西周国家财政等问题；第三编考察了春秋时期经济的发展状况，分别论述了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奴隶制的逐步解体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春秋时期的农业，列国手工业、商业、城市和交通以及列国财政等问题；第四编考察了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状况，分别论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替、土地所有制形式与阶级关系、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经济、商品货币经济与城市、交通以及战国财政等问题。本书材料丰富，论述详明，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和新见解，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的先秦经济史研究著作。

在经济思想史方面，最主要的专门研究著作是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这是作者计划的多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第一卷，上篇研究夏商西周时期的经济状况及经济思想，中篇研究春秋时期的经济状况及经济思想，下篇研究战国时期的经济状况及经济思想，各篇都设“总论”一章，论述各个时期物质生产、政治经济制度及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以便为各时期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总的背景。书后还附录一篇“中西古代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绪论”，通过中西对比的方式，揭示中国先秦时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其他如王廼琮等《先秦两汉经济思想史略》（海洋出版社 1991 年版）、周道生《先秦两汉赋税思想史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马伯煌主编《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等，也都有相关章节论述先秦经济思想。此外，巫宝三编辑《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是专门的资料汇编著作。在台湾，则有侯家驹《先秦法家统制经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5 年版）等。

（2）土地制度史

关于井田制的研究和土地私有化的研究，代表著作有金景芳《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 1982 年版）、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吴慧《井田制考索》（农业出版社 1985 年版）、马曜等《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

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李朝远《西周土地关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其中,马曜等《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西周封建说进行了很有特色的论证。李朝远《西周土地关系论》是第一部专门研究西周土地关系史的专著,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角度,探讨西周的阶级和阶层结构,揭示一个带有浓厚原始色彩的亚细亚的农业社会如何向领主制农业社会变迁的过程。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对西周、东周的土地制度及相关问题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对西周至宋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

(3) 城市及城市经济史

主要有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也有一些章节讨论先秦时期的都城制度。

(4) 社会史

由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第 1 册《先秦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全面考察了这一时期社会史的各个方面,是一部通论性著作。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是史学界第一部对商周家族作系统、深入研究的专著,书中运用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考古的方法,分为商晚期、西周、春秋三个阶段,对该时期家族形态的内涵分阶级、阶层做了断代研究,对家族形态的演化规律与发展趋势作了深入探讨。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古文字研究成就,论述上古先民在不同阶段的居住环境与居宅及聚邑、人口、婚姻、交通、饮食与服饰、医疗保健、宗教信仰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部相当系统全面的著作。此外还有李民主编《殷商社会生活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李玉洁《先秦丧葬制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赵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蔡万进《秦国粮食经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傅兆君《春秋战国社会经济形态史论》(黄山书社 1998 年版)等。

6. 夏商周军事史研究

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不多,通论性著作主要有高锐《中国上古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陈恩林《中国春秋战国军事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以及

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通史》第 1 卷《夏商西周军事史》、第 2 卷《春秋军事史》、第 3 卷《战国军事史》(均为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其中后者分三卷详细叙述了先秦时期的各种军事情况,篇幅最大,水平最高。研究军制的主要有兰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先秦军事研究》(金盾出版社 1990 年版)、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方克《中国军事辩证法史·先秦》(中华书局 1992 年版)则是研究先秦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是一部视角独特的著作。

7. 夏商周思想文化研究

先秦思想文化一直是研究中的重点领域,除了各种相关通史著作中论及先秦外,还先后出版了大量通论性的断代思想文化史著作。如李民《夏代文化》(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夏代文化的诸多方面。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介绍了周原遗址的发掘及西周的建筑、农业、手工业、甲骨文和陶器等文化。其他有赵吉惠《中国先秦思想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丘陶常《先秦思想史概要及资料选注》(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赵忠文《先秦思想史要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孟世杰《先秦文化史》(上海书店 1992 年版)、丁祯彦等《春秋战国时期观念与思维方式变革》(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和《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4 年版)、汪延《先秦两汉文化传承述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齐文心等《商西周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吕文郁《春秋战国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刘红星《先秦与古希腊:中西文化之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等。其中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在掌握大量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将考古成果与历史理论和文献相结合,先以诸侯国为单位,分述东周与秦代各诸侯国的文物考古材料及有关历史问题,然后分类研究当时的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丝织品及制造技术、货币、玺印、简牍、帛书、帛画、文字等,全面勾勒处于巨大变革时期的东周和秦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是一部材料丰富,观点鲜明,学术性与可读性均为上乘的考古和文化史专著。其他如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四册清代、近代部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等通史性著作中,也都有相关内容。

在先秦诸子研究方面,综合性著作主要有祝端开《先秦社会和诸子思想新探》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 1982 年版)、刘毓璜《先秦诸子初探》(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周瀚光《先秦数学与诸子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曹大林《中国传统文化探源:先秦儒墨法道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余宗发《先秦诸子学说在秦地之发展》(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8 年版)、李玉洁《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关于先秦道家研究,主要有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张智彦《老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北京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王翔《逍遥人生:先秦道家的人格理想》(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张运华《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颜世安《庄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至于以《庄子与中国文化》为题的著作则更多。关于先秦法家研究,主要有龚群《韩非子传》(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郑良树《商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关于先秦兵家研究,主要有杨善群《孙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张连城《先秦兵法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年版)。关于先秦墨家研究,有杨俊光《墨子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刑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孙中原《墨学通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关于先秦名家研究,主要有许抗生《先秦名家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周山《智慧的欢歌:先秦名辨思潮》(北京三联书店 1994 年版)、张晓芒《先秦辩学法则史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李耽《先秦形名之家考察》(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先秦儒家一直是研究的热门,出版的著作相对较多,主要有俞启定《先秦两汉儒家教育》(齐鲁书社 1987 年版)、邹化政《先秦儒家哲学新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钱逊《先秦儒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李耀仙《先秦儒学新论》(巴蜀书社 1991 年版)、王志跃《先秦儒学史概论》(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 1996 年版)、商国君《先秦儒家仁学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姜林祥《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 1985 年版)、张秉楠《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金景芳等《孔子新传》(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赵光贤《孔学新论》(巴蜀书社 1992 年版)、孟贵民《孔子学说初探》(首都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韩永贤《孔子溯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吕涛《孟子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奇伟《亚圣精蕴：孟子哲学真谛》（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刘鄂培《孟子大传》（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孟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在以上诸书中，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张恒寿《庄子新探》、郑良树《商鞅评传》、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匡亚明《孔子评传》、金景芳等《孔子新传》、赵光贤《孔学新论》、张奇伟《亚圣精蕴：孟子哲学真谛》、刘鄂培《孟子大传》等，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在其他有关先秦思想文化史的专题研究方面，主要有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周云之等《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方克《中国辩证法思想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朱伯昆《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康学伟《先秦孝道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冯克诚等主编《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实践和道德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杨鹤皋《先秦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游唤民《先秦民本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燕国材《先秦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杨荣春《先秦教育思想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王炳照等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先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廖其发《先秦两汉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王德裕《先秦哲学史论》（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辛冠洁等《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先秦部分）（齐鲁书社1980年版）、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等。在这些研究中，刘泽华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别具特色，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深入考察了诸子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的联系。与此相类，徐卫民出版有《秦政治思想述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在先秦思想文化研究方面，还有两部著作富有鲜明特色，一部是刘泽华主编《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部是王廷洽著《中国早期知

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从士人也就是早期知识分子的角度探索先秦社会的思想文化，既是文化史研究，也是社会史研究的力作。

8. 夏商周民族与地方史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逐渐繁荣，民族史和地方史、区域史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和深入，一些地区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地方文化研究机构，出版了不少民族与地方史研究著作。

巴蜀地方史方面，有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李绍明等《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屈小强《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陈德安等《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等。

秦国史方面，有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和《秦国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等。

晋国史方面，有李孟存等《晋国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齐鲁地方史方面，有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 1983 年版)、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 1983 年版)、逄振镐《东夷古国史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和《东夷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王阁森等主编《齐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郭克煜等《鲁国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吴越地方文化方面，有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蒋炳钊等《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 1988 年版)、宋蜀华《百越》(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张荣芳等《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等。

燕赵地方史方面，有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何光岳《秦赵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张午时和冯志刚《赵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

楚国史则有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 1990 年版)、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和《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何光岳《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姚汉荣等《楚文化寻绎》(学林出版社 1990 年版)、巫瑞书《楚文化探

踪》(岳麓书社1996年版)等;20世纪90年代,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正明主编《楚学文库》丛书,计有专著18部,包括张正明《楚史》、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高至善《楚文化的南渐》、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涂又光《楚国哲学史》、刘玉堂《楚国经济史》、赵德鑫《楚国的货币》、宋公文等《楚国风俗志》、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高介华等《楚国的城市与建筑》、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以及有关文学、艺术、歌舞、纺织与服饰等著作,在区域史研究中影响很大。

地区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有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

在通论性著作方面,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是总体论述先秦时期各民族历史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具有开创性价值。李民等《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专门论述夏商周三族起源、发展与融合的专著,认为夏商周三族始源地相互毗邻,认为三族的最早发祥地是在今晋陕豫邻近的地区,亦即汾、渭、河、洛诸水汇流的中心区域。此外,唐嘉弘《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江应樑主编《中国民族史》上册(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也都对先秦时期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9. 夏商周历史考古研究

在这方面,首推李济《安阳》(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出版社1977年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汉译本)一书,这是一本向国外宣传介绍现代中国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状况的入门指导书,全书十五章,以亲身经历对安阳十五次发掘的历史背景和经过做了详尽叙述,对有关的历次田野发掘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以及采用方法的改进乃至整个考古组的历程做了清楚明晰的介绍,对十五次发掘的收获和研究成果做了概要的回顾和总结,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且比较易懂、论述和史料兼备的著作。[①]此外有陈显泗《郑州商代城遗址》(中华书局1981年版)、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高木森《西周青铜彝器汇考》(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年

① 李光谟:《安阳·前言》,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安阳》书首。

版)、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徐锡台《周原甲骨综述》(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版)、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黄天树《殷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1 年版)、尹盛平《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2 年版)、方述鑫《殷墟卜辞断代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版)、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镐京西周宫室》(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李学勤等《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王宇信等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徐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等,这些著作既体现作者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强的资料价值。

10. 通论性断代史著作

断代史著作中包含先秦通史以及只涉及其中某一个朝代的历史著作。通史性著作如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在 1978 年公开发行(人民出版社),记述了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末年的历史,战国部分则在第二册(详前)。1994 年,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出版第三卷《上古时代》,以上下两册、近百万字的篇幅,论述中国自有文字以来,一直到战国末年的历史,并追述到神话和传说中所反映的一些情况(详前)。此后有肖潘《先秦史》(台北长桥出版社 1979 年版)、王明阁《先秦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詹子庆《先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黄中业《三代纪事本末:夏・商・西周》(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其中,王明阁《先秦史》是在讲义基础上,吸收了已有研究成果而形成的,是本期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先秦史著作。王玉哲《中华远古史》是从中国的原始社会至西周末这一段的"断代史"。在内容叙述上,此书比过去同类著作有一些新的变革,重要者如书中对有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包括帝王将相在内,都适当地给以评述;在社会发展的质变和量变问题上,着重"过渡时期";提出远古时中原是诸氏族或民族杂处的时代;提出应辨明"夏文化"与"夏时文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夏文化"主要是指夏族人自己的文化,尤其是自夏禹至桀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夏族人所创造的文化,强调的是"夏族";而"夏时文化"则是指夏禹至桀这一时期内与夏族并存的许多文化高低不同的氏族(包括夏族、先商族以及其他族)所创造的文化,这一词组强调的是"夏时",只要把某一文化遗址,经过碳

十四的测年方法，证明其时代在夏代范围之内，就是“夏时文化”了，至于这个文化到底是什么族人创造的，则是另外的问题。中原地区在夏、商、周三代时是群族杂处的时代，除了夏族、商族以外，还有不少其他族在内，所以在审核文化遗址时，不能轻易地认为不是商文化就是“夏文化”。此外，作者还提出了研究先秦史利用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主次问题，认为应以传统史料为基础，尽量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古、民族学、古文字学等有关的资料结合起来，交相印证。书中的商、周部分是全书重点所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作者自己的新体系，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夏商史方面，有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何光岳《夏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严一萍《殷商史记》(艺文印书馆 1989 年版)等。其中，郑杰祥《夏史初探》是第一部断代性的夏史专著，运用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对夏族的起源、夏朝的兴亡、夏代的社会性质与疆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对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分析，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彭邦炯《商史探微》是第一部对商代历史进行全面论述的专著，涉及到商代的政治兴亡、阶级关系、疆域四至、社会生产、经济生活、交通城邑、意识形态、文化科技等内容。周史研究的专著有许倬云《西周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4 年版)和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等。许倬云《西周史》共分九章，首先追溯了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历史，然后论述了周族的起源、灭商建国、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衰亡东迁等内容，注重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核心集中在“华夏国家”在西周时代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由西周的发展，观察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逐渐成形的过程。杨宽《西周史》集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对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对西周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考察，尤其在土地制度、社会生产、政权结构、军政大事等方面作了充分的阐述。

11. 年代学

年代学是历史学的重要辅助学科，对先秦史来说，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没有明确的纪年，因而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从而也就成为 20 世纪后半期先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也主要是为了确定三代的纪年问题。已出版的相关著作有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 1987 年版)、何幼琦《西周年代学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李仲操《西周年代》(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写《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朱凤瀚等《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江晓原等《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年版)等。

12. 重要论文集

本期的论文集涉及方面广泛,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考古、年代学等。主要有中国先秦史学会编辑出版《夏史论丛》(齐鲁书社 1985 年版)和《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 1996 年版)、郑杰祥编选《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编辑《大禹及夏文化研究》(巴蜀书社 1993 年版)、李民《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胡厚宣等《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 1982 年版)、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1—3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1986、1991 年版)、《殷都学刊》编辑《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艺文印书馆 1989 年版)、曹定云《殷商考古论丛》(艺文印书馆 1996 年版)、《人文杂志》编辑部编辑《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编辑部 1984 年版)、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高广仁《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 1981 年版)、赵俪生《寄陇居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1 年版)、张永初主编《勾吴史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赵国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 1992 年版)、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 1995 年版)、李衡眉《先秦史论集》(齐鲁书社 1999 年版)和《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 1998 年版)、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版)、李学勤《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等。另外,各种学术研讨会也相继出版了多种论文集。这些都是先秦史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1992 年,李学勤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发言,随后公开发表,1995 年,他出版论文集《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又出版修订版,增加了《谈

“信古、疑古、释古”》和《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个说明》两文，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但此说在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的同时，也不断受到学术界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不过，无论如何，通过先秦史的研究，重建可信的中国古史，却是人们的共同心愿。

二、秦汉史研究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以下分三个阶段概述之。

(一) 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5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学界开始普遍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秦汉史，旧社会的旧史学开始向新社会的新史学转变。在转变初期，虽然出现了一些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但总的来说，成果还不是很多。

1. 通论性断代史著作

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以专题形式写成，不分章节，只是列出 23 个小标题，按照时间顺序，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发展状况，并对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作了重点分析和研究。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是在大学讲课稿基础上写成的，以章节体形式，全面论述了秦汉时期的政治演变、经济发展、民族关系、社会阶级矛盾与农民战争、秦汉时代的文化等问题，在全国高校中具有广泛影响。此外，范文澜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秦汉至南北朝)(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战国至魏晋南北朝)(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中，也都有相关内容。

2. 经济史研究

有代表性的是贺昌群《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 1957 年版)。前书具有专题研究性质，后书则是全面论述秦汉经济史的专著。更有特色的是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此书是一部专题论文集，由《西汉屯戍研究》、《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两汉工人的类别》、《两汉工人题名表》、《盐铁及其他

---

① 本节参考了下列论著：周天游等：《20 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杨振红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秦汉史研究》，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谢保成等：《中国史书目提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周天游：《秦汉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等。

采矿》、《关于两汉的徒》、《汉代的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等文章组成，运用文献和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对过去史书中很少记载的两汉下层民众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与工作、他们的日常生活等相关问题，作了极有价值的探讨，奠定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基础。此外，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和《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也都涉及到相关内容。

3. 政治史研究

主要是政治人物的传记和农民战争史研究著作。前者有王业猷《项羽和刘邦》（中华书局 1964 年版）、杨宽《秦始皇》（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周琤杰《秦始皇》（中华书局 1959 年版）、张维华《论汉武帝》（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范福元《汉武帝》（中华书局 1960 年版）、赖家度《霍去病》（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汪崧生《苏武》（安徽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李鼎芳《王莽》（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任强《王莽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后者有习之《陈胜吴广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刘开杨《秦末农民战争史略》（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漆侠等《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 1962 年版）、张志康《绿林赤眉起义》（中华书局 1964 年版）、陈荔《黄巾起义》（四联出版社 1954 年版）。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是漆侠等《秦汉农民战争史》，书中详细论述了秦汉农民战争的具体过程，从每一段历史实际出发，把农民革命斗争与全部政治经济关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中进行动态考察，揭示了这一时期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线索及其时代特点。台湾学者严耕望则出版有《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1 年版）等。

4. 民族史研究

出版的著作相对较多。如纪庸《汉代对匈奴的防御战争》（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版）、陈竺同《两汉与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这两部书都具有专题研究性质。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全面探讨了两汉统一西域的经过、西域都护等行政机构的设置，以及两汉与西域的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情况，很有学术价值。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北京三联书店 1962 年版）和《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则是专门研究这几个少数民族历史的力作。

5. 思想文化史研究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影响较大的是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撰写的第一部秦汉思想史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在专门或专题性研究中，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受到极大关注，先后有关锋《王充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郑文《王充哲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田昌五《王充及其〈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三部研究著作问世。此外还有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赖家度《张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等。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乙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等，也都有相关内容。

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季镇淮《司马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从梳理司马迁的家世入手，记述了他的生平，重点是论述其作为历史家和文学家的学术贡献，揭示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全书篇幅不大，但却是一部极其精彩的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此外有，贺次君《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杨树达《汉书窥管》（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属训诂考据之作，从词义、语法分析考究《汉书》文句的正确解释。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取资古器物以考证《汉书》，在考证汉代典制、地理、姓氏、人名、宫殿名称、汉代物价、古字古义、避讳义例、习俗用语、军事设置及旧注错误等方面，多发前人所未言，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

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从冷暖和干湿两大气候要素的变动方面，对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变化情况进行探析，认为汉代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变迁虽与现代有一定的差异，但实际上与现代相差不很大，与蒙文通、胡厚宣等所称日渐干寒不符合，也和竺可桢等的脉动说有些不同。

6. 重要论文集

安作璋在1955年出版《汉史初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研究汉代历史的个人论文集。台湾的大陆杂志社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秦汉史及中古史前期研究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60年版）。

（二）1966年5月至1978年12月

“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史学界大搞儒法斗争史，秦汉史研究领域几乎没有学术

成就可言。台湾在这一时期的秦汉史研究著作也很少，只有姚季彦《秦汉史》（台北三民书局1975年版）等。

“文革”结束后至1978年12月，是一段过渡时期，学术界仍比较沉闷。

(三) 1978年12月至2000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潮流，学术研究开始健康发展，中国的秦汉史研究出现了大繁荣，研究领域不断扩大，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不断产生。

1. 通论性断代史著作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断代史著作。如台湾学者邹纪万《秦汉史》（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年版）。在大陆，则是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秦国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捷足先登，其中《秦史稿》是第一部对秦人早期开发史、秦建国史以及秦统一、秦帝国成立以至最终覆亡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总结、论述的专门著作。作者大量运用出土文献资料，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全书分纪、传、志、表四部分，搜罗史料非常丰富。王云度《秦史编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编年体的形式汇集所能见到的秦史资料，其中以《史记》的《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为主，收录文献二十多种，并吸收了有关考古资料，因而实际上是以原始资料编写的一部编年体秦史，在史书编纂上有其新意。1989年，林剑鸣又出版了《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在吸收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中外交流等各方面的情况，有许多新的独到见解，是秦汉断代史著作中的重要成果。此外，同类著作还有田昌五和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颜品忠等主编《新编中国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林剑鸣等《秦汉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①王云度等主编《秦帝国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一些多卷本通史著作，如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也记述了秦汉时期的历史，而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则都是关于秦汉历史的独立分册。

① 林剑鸣还有《秦史》、《新编秦史》、《秦汉史》，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1995、1995年出版。

2. 经济史研究

关于秦汉经济史的通论性著作出版了几部，首先是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全面探讨了秦汉时期的各种经济现象，包括当时的经济区及其变化发展、土地制度和土地问题、劳动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经济与货币制度、货币财富的形成与积累、秦汉时期的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等，是秦汉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全面论述了秦汉时期的基本经济区、生产单位、产业结构、经济类型、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并对此前学术界较少涉及的财富分配、生活消费、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而是自给性生产，封建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互相补充。此外还有曾延伟《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编论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大部分内容属于经济史研究的范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秦汉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谢天祐《秦汉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史稿：兼评自然经济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则是专门探讨秦汉时期经济思想的代表著作。其他如赵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也都有相关内容。

有关秦汉经济史的专题性研究著作更多。其中，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各种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秦汉时期的土地、赋税和户籍等制度，对当时的地主、农民、奴隶等各个阶级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专门探讨汉代在西北的屯田情况，对汉代是否存在民屯、屯田劳动者的身份以及农业管理系统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此外，还有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于琨奇《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黄山书社1991年版)、张南《秦汉货币史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版)、宋治民《汉代手工业》(巴蜀书社1992年版)、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等。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全面考察了秦汉时期道路建设、桥梁设置、车船制作、水路运输等交通形式,对都市交通管理、产业布局和运销区划等问题都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是第一部有关秦汉时期的断代交通史著作。宋杰《〈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则是专门考察《九章算术》中有关汉代社会经济的各种情况,包括农业、商业、徭役、赋税等方面。另外,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林甘泉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 1984 年版)、齐涛《汉唐盐政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等著作中,也都涉及秦汉时期的内容。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结合大量出土文物,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介绍了汉代农业、手工业的成就,可谓蹊径别出。

3. 政治史研究

陈玉屏《西汉前期的政坛》(成都出版社 1996 年版)专门论述汉高祖至武帝间西汉前期的政治斗争,作者认为西汉前期先后形成了四种集团,即异姓诸王集团、功臣集团、刘氏宗王集团、吕氏外戚集团,中心就是探讨这四种集团之间的力量消长,并对汉初思想从"清静无为"转向"独尊儒术",提出了新的认识。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全面论述了秦朝以前士大夫政治的前身及其政治文化传统、秦朝至东汉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迁及士大夫政治的形成过程,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高水平政治史研究著作。此外还有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等。

其他有关著作,可以按其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 政治制度史

对大陆学者来说,政治制度史是这一时期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先是朱绍侯著有《军功爵制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对秦汉的军功爵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 1984 年版)分"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官吏的选用、考课及其他各项制度"三编,系统考察了秦汉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设置及其变化。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是以考古材料为基础,系统梳理了秦代的法律制度,阐明了秦代法律的理论原则。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系统考察了汉代察举制的变迁及其逐

渐向科举制的过渡过程，认为士人及文化传统因素是选官制变迁的重要动因之一。此外，有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孔庆明《秦汉法律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安作璋等《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陈戍国《秦汉礼制研究》(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涉及两汉时期宰相制度的问题。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洛阳市文物局等《汉魏洛阳故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也与政治制度史研究有关。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分别论述了西汉、东汉两朝政区地理情况。

(2) 军事史、农民战争史

在通论性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军事科学院组编《中国军事通史》第4卷《秦代军事史》、第5卷《西汉军事史》、第6卷《东汉军事史》(均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全面系统的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军事发展史，篇幅最大，水平最高。此前有编写组编纂《中国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1983—1991年版)。

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秦汉时期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包括士兵、常备军、野战军、边防军、军兵种、装备、军马、给养、营垒、军法、兵法等，都有专章论及，把秦汉军事制度置于当时整个社会发展中去考察，特别注意它与秦汉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对军事史和制度史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此外，黄今言著有《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并与人合著《东汉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在秦汉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主要有田昌五《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孙达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朱大昀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

(3) 政治人物

这一时期，秦汉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一般都有传记出版，有的还有多种传记

出版。主要有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李存山《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丁毅华《商鞅:权霸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和《商鞅传》(重庆出版社 1999 年版)、林剑鸣《吕不韦传》(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安作璋等《汉高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于琨奇《汉高祖刘邦》(哈尔滨出版社 1997 年版)、刘修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林剑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 1981 年版)、安作璋《桑弘羊》(中华书局 1983 年版)、孟祥才《王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周桂钿《王莽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葛承雍《王莽新传》(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刘修明《汉光武帝刘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张启琛《汉光武帝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张鹤泉《光武帝刘秀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安作璋等《汉光武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由于人物传记市场广大,因而这类书层出不穷,但论题重复,就免不了鱼龙混杂,上面所述只是其中比较主要者。

4. 民族、边疆史研究

田继周《秦汉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是第一部关于秦汉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的断代史著作,内容包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汉族人民共同体的发展、匈奴民族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兴衰、西域诸族、东北诸族、氐羌族系等,基本上涉及当时的所有少数民族,内容全面系统,有很高学术价值。其他著作则多是各族专史,主要有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张荣芳等《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周锡银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4 年版)、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等。此外,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陈连庆《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也都涉及这一时期的主要少数民族的历史。

袁祖亮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从秦汉时期的边疆地区民族人口写起。作者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边疆地区民族人口的数量规模,特别是边疆草原地区民族人口的数量规模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下,它的数量规模是一个定值,也就是说有一个极限,如果人口数量规模达到此临界线,草原上的生态平衡就会遭

到破坏，随之而来的是灾荒疾疫的袭击；二是认为，边疆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融合以及这些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数千年来通过征服、迁徙、通婚、文化传播、商贸等形式在不间断地进行着。这种融合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和凝聚力，形成了以汉、回、蒙、藏等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处的大家庭，大家为中国经济文化之发展、社会之进步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这些观点，对推进民族史研究有重要价值。

5. 社会史研究

在通论性著作中，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是较早出版的两部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其中，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共分八章，即汉代社会概况，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中的衣食，人民生活中的住行，文化艺术，歌舞及文娱活动，汉代统治人民的方式，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和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详细介绍了汉代的民族、交通、经济、生活习俗、建筑和文艺生活等，涵盖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关于汉代社会研究的重要著作。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首先概论了秦汉文明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然后对秦汉时期的社会物质文明状况加以考察，包括秦汉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城市建设、服饰、饮食、居住条件及交通运输等，最后对秦汉时期的社会精神文明状况进行考察，包括秦汉时期的迷信、信仰、祭祀、婚丧礼俗和精神风貌等。此外，由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第 2 册《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也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通论性著作。

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生活》（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尽可能地收集了四川出土的不同题材的汉代画像砖的绝大部分图片，并广泛吸收美术、考古工作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辅之以同时期出土的其他文物，运用文献资料加以印证说明，以画证史，以史论画，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全书将四川画像砖分为六大部分，进行专题研究：一、郡县制政治生活的侧影；二、农业生活的画像；三、城市、商业与水陆交通；四、地主官吏的生活；五、舞乐百戏的发展；六、画像砖中的神话题材。通过这六个方面的论述，展示出汉代地方的政治生活、城乡生活、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以及商业、水陆交通和音乐舞蹈等方面，是一部视角独特的汉代社会史研究专著。与此相类似的有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0 年版）。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通过对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

资料的分析,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汉代婚姻形态,把汉代婚姻关系放在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说明,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一研究领域的第一部著作,具有开创性价值。此外,彭卫还出版有《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 1998 年版)和《古道侠风》(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年版),也都是探讨汉代社会史的重要著作。

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 1997 年版)系统研究了两汉乡村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全面展现了两汉乡村的社会风貌,并对生产环境、民谣民谚与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是第一部断代人口史研究专著,对西汉时期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人口迁移等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述和深入研究。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其中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是重点内容之一,厘清了这一时期人口迁徙与移民之间的异同关系,勾画了这一时期移民史的基本轮廓。

6. 思想文化史研究

通论性著作主要有韩养民《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1997 年修订版)、祝瑞开《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熊铁基《秦汉文化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等。更多的是专题性研究论著,主要有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熊铁基《秦汉新道家论略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1995 年版)、华友根《西汉礼学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等。此外,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 1992 年版)、葛兆光《7 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刘泽华主编《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也都有相关内容。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则是第一部关于秦汉时期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

在思想家研究方面,西汉的董仲舒和东汉的王充自然是研究的重点对象。关

于前者，主要有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和《董仲舒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以及他与吴锋合著《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黄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思潮》(岳麓书社 1999 年版)等；关于后者，周桂钿出版有三部著作，即《王充哲学思想新探》(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王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此外，还有陈广忠《刘安评传——集道家之大成》(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王云度《刘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黄朴民《何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苏诚鉴《桓谭》(黄山书社 1986 年版)、钟肇鹏《桓谭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王振民主编《郑玄研究文集》(齐鲁书社 1999 年版)等。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从剖析《周礼》的思想体系入手，判定其由儒、法、阴阳五行三家熔铸而成。但三家学说，原本各为畛域，儒与法结合始于荀子，阴阳与五行结合始于邹衍，故此书不会早于战国。儒、法、阴阳、五行四家思想融为一体，在《吕览》之后；文景之时，黄老盛行，而此书无黄老痕迹，故推定此书成于道家思想未成为主流前的西汉之初。

史学史研究方面，司马迁是研究的热点所在，出版的各类著作有几十部。其中，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是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之外，再用考古资料对《史记》加以解释，取材广泛，考证精到，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在《史记》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 1981 年版)，是 1963 年他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讲授《史记》时的讲课稿，全书篇幅不大，却是《史记》研究的重要成果，开创了《史记》研究的新局面。其他主要研究著作有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东师范大学 1989 年版)、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许凌云《司马迁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以及《历史研究》编辑部《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等。关于班固，有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等。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是第一次从史学批评史视角研究司马迁的史学理论，也是这一时期第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的著作。

7. 重要论文集

主要有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 1980 年版)、高敏《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 1982 年版)和《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1995 年增订版)、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 1986 年版)、邢义田《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7 年版)、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 1988 年版)、逄振镐《秦汉经济问题探讨》(华龄出版社 1990 年版)、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 1993 年版)、高恒《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 1995 年版)、张荣芳《秦汉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张建国《帝制时代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等。此外，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 1985 年版)、史念海《河山集》(2～9 集)(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等，1981—2006 年版)、谭其骧《长水集》、《长水集续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1994 年版)、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等，也都收录许多秦汉史研究论文。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从 1981 年开始编著《秦汉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以来，陆续出版了十余辑，其他各种学术会议论文集也相继出版。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研究领域。

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以下分三个阶段概述之。

(一) 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5 月

1. 通论性断代史著作

代表著作有三部。最早的是劳干《魏晋南北朝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 1955 年版)。第二部是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这是作者在讲课稿基础上写成的，以章节体形式，分三章叙述了这一时期复杂多变的政治演变和文化发展等情况，简明扼要地表述了作者对这一时期历史发展脉络的

① 本节参考了下列论著：曹文柱等：《20 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戴卫红：《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谢保成等：《中国史书目提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认识。另一部是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分七章系统全面地讲述了从三国分立到隋朝统一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历史,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农民起义等各个方面。注释相当丰富,是其一大特色。此外,范文澜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秦汉至南北朝)(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战国至魏晋南北朝)(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中也都有相关内容。

2. 经济史研究

韩国磐先后出版《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和《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南朝、北朝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及其发展演变进行具体分析和全面研究,是南北朝时期断代经济史研究的开创之作,也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较早著作。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 1959 年版)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更为系统的论述。此外,唐长孺《3 至 6 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都专门探讨了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问题。马智修《曹魏之经济基础》(著者 1968 年印行),则专门探讨了曹魏的经济发展问题。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二部分,专门探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

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梳理了商朝到魏晋时期的经济发展脉络,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魏晋时期开始,从殷商一直到东汉都是奴隶社会。

3. 政治史研究

在政治制度史研究方面,岑仲勉《府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详细考察了府兵制的起源,西魏、东魏和北齐的府兵制度,府兵在北周和隋朝的延续,唐代开元以前的府兵,府兵制与均田制的关系及其崩溃等情况,认为府兵制是略为变通的世兵制,不是兵民合一,更不是兵农合一,兼负有禁军和征行两种职务,只适应于游牧社会,不适合于封建社会。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以考释为主,适当加以论述,详细梳理了府兵名称的由来及其演变,西魏、北周时期府兵制度的形成,府兵制与魏晋以来封建兵制及鲜卑拓拔兵制的渊源关系,隋朝卫府制度的确立和军户的废止,唐初府兵制的恢复及其全盛,府兵制与均田制及封建国家职能的关系,府兵制的破坏等问题。

4. 军事史研究

在军事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张习孔《官渡之战》（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羽白《赤壁之战》（中华书局 1965 年版）、李庚序《彝陵之战》（中华书局 1965 年版）、何兹全《祖逖北伐》（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李季平《淝水之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汤冰《淝水之战》（安徽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孟岩《淝水之战》（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等。

5. 民族史研究

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的"后编"，专门论述北魏拓跋族的社会制度，分析了拓跋族侵入中国北部之后，与汉族的封建制社会接触时所发生的各种经济现象，涉及拓跋族转型期的婚姻现象、俘虏、奴婢、童仆、隶户、均田制及农民的负担、佛寺及其他各种封建的土地占有、军事组织等内容。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分内外二篇，内篇所考为《魏书・官氏志》所载诸胡姓，外篇所考为未见官氏志诸胡姓，一一考其原义、种族、居地，以及改姓之人证，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少数民族姓氏的专著。此外，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则是专门研究乌桓与鲜卑历史的力作。

6. 思想文化史研究

通论性著作主要有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是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史的著作，直到现在仍然是同类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专论性著作有汤用彤和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李曰华《范缜：南北朝反对佛教斗争中长大的唯物论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陈元晖《范缜的无神论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申先哲《范缜》（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等。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则分十章探讨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发展状况。

7. 人物研究

在人物研究方面，曹操是当时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王仲荦《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一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有关曹操的研究著作，肯定曹操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第一流的军事家和第一流的文学家，同时也描述了他的封建专制的残酷性格，在当时产生很大反响。1959 年，郭沫若发表《替曹操翻案》

一文，提出要给在历史上受了委屈的曹操翻案。对此，王仲荦又在此书修订本《续后记》中专门指出：替曹操翻案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是还原历史真面目，但也不能因为拥护这一新说法，而把曹操那种毒辣的个性完全抹掉，否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伴随着对曹操评价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曹操论集》(1960年版)。此外还有张习孔《曹操》(中华书局1959年版)、马植杰《诸葛亮》(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柳春藩《诸葛亮》(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曹增祥等《诸葛亮》(中华书局1962年版)、张芝《陶渊明传论》(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等。

8. 重要论文集

主要有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缪钺《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任继愈《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等。

(二) 1966年5月至1978年12月

“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史学界大搞儒法斗争史，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除了“二十四史”中的南北朝八史及相关古籍由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出版整理点校本外，在研究方面几乎没有成就可言。

“文革”结束后至1978年12月，是一段过渡时期，学术界仍没有起色。

(三) 1978年12月至2000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潮流，学术研究开始健康发展，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逐步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研究水平大幅度上升，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学术价值高的著作。

1. 通论性断代史著作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是在其1961年出版《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其中前七章主要是对旧作的修订，后五章是增补的内容，包括这一时期的边境各族、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哲学思想与宗教、经学史学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内容，于是此书就成为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第一部断代史著作，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也是全面论述这一时期历史的通论性断代史著作，也有很高的学

术声誉。万绳楠整理出版《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 1987 年版)，则是作者听陈寅恪讲述魏晋南北朝史时所作的笔记，比较系统地记录了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精彩论述。此外，还有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台北至大公司 1977 年版)、邹纪方《魏晋南北朝史》(台北长桥出版社 1979 年版)、周远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三国魏晋南北朝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王连升等《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高尚志《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等。一些多卷本中国通史著作，如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也有相关内容，而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则都是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独立分册。

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分裂，出现了许多各自独立的民族政权，因而也有很多学者写出了分论南北各朝的断代史著作。其中，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全面论述了魏、蜀、吴三国政治的演变轨迹、经济发展、职官制度、文化特点以及民族政策等，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何兹全《三国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将三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学术思想等内容，分为 20 个专题进行论述，认为三国时期是由古代社会进入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时期，并对此作了集中阐述。张承宗主编《六朝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从政治、地理沿革、土地关系、阶级结构、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等方面，对六朝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探索。此外，还有简修炜等《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社 1994 年版)、杜士铎《北魏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2 年版)、洪涛《三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和《五凉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李祖桓《仇池国志》(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年版)、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雷依群《北周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等。李唐则在 1978 年出版了《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等系列著作(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

2. 经济史研究

在通论性著作中，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从探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概况及其特点入手，分别考察了这一时期几个主要经济区域的变迁、空前巨大的经济波动、劳动制度与剥削关系、土地制度与土地问题、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等经济现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

经济发展态势。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朝代、各个国家与经济有关的各种问题,包括户口、户籍制度、封建国有、私有土地制度诸形态及其演变、封建土地私有制度的表现形式与发展趋向、租调制度及其演变、杂税制、徭役制度、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状况、官私手工业与商业状况、货币制度以及经济思想等内容,并进一步探索其发展演变的规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此外,还有韩国磐《南北朝经济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朱大渭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编》(齐鲁书社 1996 年版)、《中国历代经济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文津出版社 1998 年版)等著作。

在专题研究和区域经济史研究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陈连庆《魏晋时期盐铁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齐鲁书社 1991 年版)、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许辉和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陈明光《六朝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等。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是"魏晋封建说"的代表性著作,全书第三编从城市经济的衰落、依附关系的发展两个方面,论述了汉末魏晋时期的社会变化。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张尚谦《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周国林《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等,则是研究这一时期经济史内容的专题论文集。

3. 政治史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因而对门阀士族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政治史研究的重点。早在 1966 年,毛汉光即在台湾出版了研究专著《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大陆学者则以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一书最为有名,此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东晋历史上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深入探索,认为中外学者所惯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流变,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这是对当

时政治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苏绍兴《两晋南朝的士族》（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 年版）、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9 年版）、王大良《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邪王氏为主的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等，也都是专题性研究著作。张傧生《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郭建《沧桑分合：魏晋南北朝兴衰启示录》（年轮文化事业公司 1998 年版），则是通论整个南北朝时期政治史的著作。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则是专门考察北魏政治史的重要著作。

在政治制度史研究方面，也出版了很多著作。主要有沈任远《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陈琳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四卷“魏晋南北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97 年版）、李则芬《九品中正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稻禾出版社 1995 年版）、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 1979 年版）、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 1999 年版）、张建国《两汉魏晋法制简说》（大象出版社 1997 年版）、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以及杨鹤皋《魏晋隋唐法律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等。

4. 军事史研究

在军事史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军事科学院组编《中国军事通史》第 7 卷《三国军事史》、第 8 卷《两晋南北朝军事史》（均为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全面系统地讲述了这一时期的军事发展史，篇幅最大，水平最高。此外，还有张晓

生等《中国古代战争通览·西晋时代—五代》(云龙出版社1991年版)等。在军事制度方面,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陈高华等《中国军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等都有相关内容,而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则是以专题为线索、以论文形式来阐述魏晋南北朝的兵制,有很高学术价值。

在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有,顾奎相等《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张泽咸等《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此后朱大渭又撰写了《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对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的发生背景、发展过程及其结果、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

5. 社会史研究

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由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第2册《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朱大渭和梁满仓等人《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都是通论性著作,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梁满仓《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也都是相关问题的重要著作。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问题是重点内容之一,厘清了这一时期移民史的基本轮廓。此外,周征松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 民族史研究

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是通论性断代民族史著作,从整体上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各个民族的发展面貌。更多的是分论各个民族的研究成果或区域性研究成果,主要有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版)、冉光荣《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段连勤《丁零、高昌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和《两汉魏

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陈连庆《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王素《高昌国史稿·交通篇》（文物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周伟洲则一人出版五部著作，包括《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并出版有专题论文集《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此外，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也都涉及这一时期的主要少数民族。

7. 思想文化史研究

在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通论性著作主要有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和《中国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 1992 年版）、许抗生《魏晋思想史》（桂冠图书公司 1992 年版）、辛旗《中国历代思想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等。此外，还有陈西尧等人《三国文化概览》（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葛兆光《7 世纪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以及郑师渠主编、曹文柱等撰写《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年版）等。

在专题性研究方面，主要有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 1982 年版）、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 1986 年版）、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和《郭向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王葆玹《正始玄学》（齐鲁书社 1987 年版）、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 1991 年版）、田文棠《魏晋三大思潮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齐鲁书社 1991 年版）、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高峰《魏晋玄学十日谈》（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7 年版）、刘泽华主

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

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对《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和《北史》等12部正史中所涉及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言等内容,作出训诂注释,以考订为主,间有议论,是一部形式独特的史学史著作。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则是专门考察汉唐之间史官制度的发展演变。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他》(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是其专论这一时期史学史内容的论文选集。

8. 人物研究

在对政治人物的研究方面,出版了很多人物传记,主要有章映阁《曹操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亚新《曹操大传》(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和《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刘光义《魏武帝曹操》(建宏出版社1999年版)、尹韵公《孙权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章映阁《孙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管芙蓉《北魏政治女杰冯太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肖黎《魏孝文帝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精诚《魏孝文帝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程维荣《拓跋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9. 重要论文集

主要有陈寅恪《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连庆《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卞孝萱《六朝史论集》(黄山书社1993年版),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陈玉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培栋《魏晋南北朝史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张大可《三国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熊德基《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版),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另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著《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1983 年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以及各种会议论文集等。

四、隋唐五代史研究[①]

20 世纪上半期的隋唐五代史研究,虽然有着比较明显的旧的时代特征,其主要内容在于考证文字、史籍考订或是人物研究,但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从事唐史研究的学者,运用西方的理论方法,提出许多新问题,在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开创了唐史研究的新篇章。如果说 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是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一个高潮的话,那么,20 世纪后半期则是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以下分三个阶段概述 20 世纪后半期的隋唐五代史研究。

(一) 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5 月

1. 通论性断代史著作

建国初期的隋唐五代断代史研究著作,主要有岑仲勉《隋唐史》(卷一、卷二)(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 1954 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 年版)、韩国磐《隋朝史略》(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傅乐成《隋唐五代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1957 年版)、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章群《唐史》(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版)、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 1959 年版)、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北京三联书店 1961 年版,人民出版社 1977 年修订版、1979 年第 2 版)、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的第三编(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其中,岑仲勉《隋唐史》按照专题论文形式撰写,全面深入地论述了隋唐历史上的各个方面问题,集中反映了他几十年研究隋唐史的心得体会,有很多独到的观点,发前人所未发,因而在世纪末

---

① 本节参考了以下论著:张国刚:《20 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牛来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谢保成等:《中国史书目提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等。

被列为“20世纪史学名著”之一。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以史料分析著称,但其中也多有作者自己的观点。

2. 经济史研究

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制度研究方面,这些著作主要有: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主要介绍了隋唐均田制的发展以及破坏的过程;此书后修订为《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补充了战国以来至北朝时期土地制度的情况,使得均田制的研究更具有瞻前顾后的特点。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汉唐土地国有制的变迁,下篇主要以占田和均田为代表,通过土地制度在时间上的纵向发展,梳理汉唐之际土地制度的发展情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府兵制等上层建筑的关系;其《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也是关于唐代土地制度研究的力作。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系统论述了隋唐社会经济在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发展与变化,也是探讨这一时期经济史的重要著作。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三部分,专门探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

3. 政治史研究

首先是关于党争的研究。唐代后期党政比较激烈,一些通史类的著作中对此多有涉及。例如岑仲勉《隋唐史》主张李德裕不应该算入党争,旧史中“牛李”的李指的是李宗闵。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认为,牛党为进士科出身的庶族地主的代表,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是门阀士族地主的代表。

其次是人物研究,韩国磐《隋炀帝》(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漆侠(署名万钧)《唐太宗》(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袁定基《唐太宗》(中华书局1963年版)、万绳楠《文成公主》(中华书局1959年版)、吴慧《唐代理财家刘晏》(中华书局1963年版)等,都是此期出版的有关著作。其中漆侠《唐太宗》一书,是较早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唐太宗展开研究的专著,虽然篇幅不大,但对后来的唐太宗研究有重要影响。

4. 政治制度史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章群《唐代考选制度考》(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年版)、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版)、唐长

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戴炎辉《唐律通论》(台北正中书局 1964 年版)和《唐律各论》(台北三民书店 1965 年版)等。

5. 社会史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著作很少,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定稿于 1957 年,但 1990 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基本依据文献资料讨论古代婚姻制度,其中涉及有隋唐时期的内容。此外吴章铨出版有《唐代农村问题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 年)。

6. 民族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这方面著作中,主要以资料见长。如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 1958 年版)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以资料见长,但也有一定的研究性;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 1958 年版)。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是关于突厥与南诏历史的综合性论著。李符桐《回鹘史》(台北文风出版社 1963 年版)是回鹘的民族史。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运用大量汉藏文资料来分析《新唐书·吐蕃传》。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 1963 年版)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王忠还写有《松赞干布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 1958 年版)、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 1958 年版),论及公元 6—8 世纪中国与西域的关系。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 1957 年版)介绍了有关流寓长安的西域人的丰富材料。

对外关系方面,有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概述性著作。

7. 思想文化史研究

最主要的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其中研究隋唐五代的内容有七章 350 多页的篇幅,而且代表了当时最高研究水平,就是现在也仍然是研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最重要著作之一。1963 年,任

继愈出版《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北京三联书店 1963 年版)主要内容为唐代佛教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73 年此书又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为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增订第 2 版,1994 年又出第 4 版,虽是一部论文集,并非系统研究的专著,但学术价值很高,被学界誉为一代名著。其他研究著作主要有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 1963 年版)从“三洞四辅经之渊源及传授”、“历代道教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两个部分研究了唐代道教经典,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五篇专论隋唐五代的哲学思想。此外还有田光烈《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中之辩证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等。傅振伦《刘知幾年谱》(中华书局 1963 年版)虽以资料见长,但也有研究性内容。

8. 农民战争史研究。

主要有漆侠《隋末农民起义》(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万绳楠《隋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 1961 年版)、习之《黄巢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宁可《黄巢起义》(中华书局 1959 年版)、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赵俪生《王仙芝和黄巢》(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等著作。

(二) 1966 年 5 月至 1978 年 12 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隋唐五代史研究基本上没有学术研究性著作出版。而港台地区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仍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断代史研究方面,出版了林天蔚《隋唐史新编》(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 1968 年版)。在经济史研究方面,有黄敏枝《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台湾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在政治史方面,成果较多,主要有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 1969 年印)、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 1971 年版)概述了宦官内侍省的组织以及宦官权势的演变。另有仲伟烈《隋文帝家世史料笺注稿》(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侯绍文《唐宋考试制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侯忠义《黄巢起义》(中华书局 1974 年版)、汤承业《李德裕研究》(台湾台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 1973 年印)等。在文化史研究方面,有王云五《晋唐政治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9 年版)、孙广德《晋南北朝隋唐俗佛道争论中之政治课题》(台湾中华书局 1972 年版)。在民族史方面,有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吴大学 1976 年版)等。

“文革”结束后至1978年12月，是一段过渡时期，学术界仍比较沉闷。

(三) 1978年12月至2000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潮流，学术研究开始健康发展，隋唐史研究也开始大发展。

1. 通论性断代史著作

重要者首推林天蔚《隋唐史新论》(台北东华书局1978年版)，此书涉及隋唐史资料研究与外国研究成果，探索隋唐史的发展特点，以及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外交贸易等问题，对政治、经济制度、文化领域、隋唐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五代十国等诸多方面做出深入研究，学术视野宽阔，善于从宏观角度把握隋唐史的特点。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990年版)，详细叙述了这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事实，其中在文化方面尤为突出。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专题性质的研究著作。谢保成《新编中国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宗教、习俗、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十个专史类别，详细、系统地分析了隋唐五代史。周远廉主编《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隋唐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通过隋朝、唐之开国、唐之鼎盛、唐之中兴、唐之衰亡五个部分，详细地叙述了隋唐时期的历史，从而力求得出王朝的盛衰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这一符合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线索。在已经出版的各种断代史著作中，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上下两册，采取了序说、综述、典制、传记等新体例，对隋唐历史时期的各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许多新认识，对隋唐史研究有重要影响；其第七卷为《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对五代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详细论述。

此外，还有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王寿南《隋唐史》(台湾三民书局1989年版)，这是台湾地区的大专教材；金宝祥《隋史新探》(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杨根相等《大唐兴亡三百年》(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杨伟立《前蜀后蜀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诸葛计、银玉珍《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闽国史事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西汉至唐朝

几百年间的历史演变进行探讨，意图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封建前期发展过程和特点予以深入研究。作者持"魏晋封建论"，本书就是他第一次正面、系统地阐述自己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本书不同于上述各种断代史著作，但也属通论性质。

2. 经济史研究

在通论性著作方面，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隋唐五代时期的经济地理与人口，隋唐五代时期的交通、劳动、土地制度与土地问题、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与物价，隋唐五代时期经济的巨大波动等方面，对隋唐五代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武金铭《中国隋唐五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大陆第一部把隋唐五代作为一个历史时段，专门探讨其经济发展史的著作。宁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从农业、土地关系、手工业、商业、货币与物价、城市与交通、区域经济、财政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过程，提出了很多新观点，代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较高水平。

更多的著作是属于专题性研究，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下列几方面：

（1）土地制度

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以户籍法为研究对象，从均田令中发现了已受田的私田性质，对研究唐代土地制度有重要意义。此外还有金宝祥《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齐陈骏《隋唐西北的屯田》（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在肯定均田制土地国有性质的同时，通过对四至和自田的深入考察，认为永业、口分田之外仍然存在私田的现象；张泽咸《中国屯垦史》（中册）（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从隋唐五代时的政治军事形势、隋代屯田、唐前期的屯田、中唐以后的屯田等几个方面，分析了隋唐五代时期的屯田制度；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也对均田制下的永业田和口分田进行分析，提出了两者具有国有和私有双重性质的看法；李锦绣在《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把职田作为官府财政的问题来处理。

（2）财政制度

蔡次卿《隋唐五代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概述了隋唐五代时期的财政制度。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版、1999年修订版），试图从国家财政预算的角度，来把握唐代财政制度及其变化。李锦绣《唐

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广泛征引敦煌吐鲁番文书和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唐代前期的财务行政机构、财政收入以及财政支出等问题。此外,张弓《唐代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 1985 年版)、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三秦出版社 1991 年版),分别探讨了唐代财务工作中的仓廪与国库的出纳管理等问题。

(3) 赋税与徭役制度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 1986 年版)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详细地论述了赋税和徭役问题。其中,赋税包括租庸调、地税户税、资课勾剥、两税法、工商税杂税、土贡进奉、和籴和买、常平仓义仓等;徭役包括力役、杂徭、色役、和雇、兵役等,对唐五代赋役史上一些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是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修订重版),是一部关于中国赋役制度的专著,其中论述隋唐五代赋役制度的部分,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也有创新之处。此外,周国林也出版有《隋唐均田制时期编户田租负担探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专门讨论均田制下在籍农民的田租负担问题。

(4) 农业

韩国磐《隋唐五代的生产力发展》(三联书店 1979 年版),是一部综合论述该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著作。李伯重在《唐代江南的农业发展》(农业出版社 1990 年版)一书中,以扎实的史料分析为基础,从农业发展的背景、生产技术的进步、集约化水稻农业的形成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唐代江南农业变革的观点,并对江南水稻产量进行了量化分析。张泽咸《隋唐时期农业》(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9 年版),也是关于隋唐农业的研究力作。此外还有余扶危等《隋唐东都含嘉仓》(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5) 手工业

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三秦出版社 1992 年版),所引文献和考古资料十分丰富,主要研究了唐代丝绸的生产与产量情况,指出了丝绸生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卢华语《唐代桑蚕丝绸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着重探讨了唐代蚕桑丝绸业的产地分布、丝绸的图案特色以及丝绸的用途等。

杨远《唐代的矿产》(台北学生书局 1982 年版),着重分析了矿业生产与分布的情况。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讨论了官工业的组

织、私工业的组织、私工业成品销售方式及流动资本之考察、工业种类等问题。魏明孔《隋唐五代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资料十分丰富,涉及手工业中采掘与冶炼、铸铜、铁器制造、兵器制造、金银器制造、建筑、造船、纺织与印染、陶瓷、制茶、制盐、粮食加工、漆器、造纸与印刷等诸多方面,并着重分析了手工业在唐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陈衍德等《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对于盐业产地与制盐技术进行了深入探讨。魏明孔《隋代军事手工业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是专门讨论隋代与军事有关的手工业发展情况。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于餐饮业及食品加工业都有详细的论述。季羡林《糖史》以及相关论文,分析了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等问题,是制糖业研究的重要成果。

(6) 商业与货币

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论述了商品与市场、流通与资本、管理与经营等商业问题。张泽咸在《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介绍了国内商业、边境互市和对外贸易三种商业类别。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中古时期的农村、城市市场均进行了集中的叙述。

(7) 交通运输

这方面的著作较少,主要有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等。

3. 政治史研究

谢保成《中国隋唐五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全面探讨隋唐五代政治史的综合性学术论著,具有开拓意义。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志贵《贞观之治新探:唐太宗政绩兴与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王涤武《武则天时代》(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都是专门论述某个历史时期政治发展史的著作。但更多的著作则是属于专题研究,按其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 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曾经被认为是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版)运用统计的方法,将藩镇对中央的态度进

行划分，认为大多数藩镇对中央的态度是恭顺的（如西北藩镇），跋扈割据只发生在特定时间（如德宗贞元间和僖宗以后）与特定区域（如河朔地区）。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对藩镇形成原因、社会基础、类型、动乱特点及长期存续的原因，根据地域和功能进一步将藩镇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分别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对于唐代藩镇的宦官监军制度、进奏院制度、使府辟署制度、财政体制、进奉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是关于唐代藩镇问题的权威著作之一。

（2）党争与宦官

关于党争研究的专著主要有：王炎平《牛李党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通过考辨牛李党争中的人物与事件，提出了李德裕父子并未结党的观点，并将牛李之争定性为“朋党乱政和李德裕反朋党的斗争”。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 1984 年版，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再版），从整个中晚唐的社会背景，深入阐述了李德裕政治革新的经过及意义。丁鼎《牛僧孺年谱》（辽海出版社 1997 年版）通过对谱主生平事迹及当时许多重大事件的考察，旨在澄清牛李党争的真相。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主要分析了南唐党争的地域特征，指出土著和侨寓的不同地域集团围绕各种利益展开斗争。此外，宋德熹《唐代后半期门阀与官宦之关系》（台湾学生书局 1990 年版）对于唐代宦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3）政治人物

先是吴枫出版了一代名臣魏徵的传记《魏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随后几部皇帝传记陆续问世，如袁英光等《唐太宗传》、《唐明皇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1987 年版），赵克尧等《唐太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都受到社会以及学界的广泛好评。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 1984 年版）对唐太宗的分析较为全面，将他的局限性与贞观之治的背景条件都进行了分析。胡戟《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 1986 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在肯定武则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她的酷吏政治的残酷性，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诸葛计《南唐先主李昪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重点研究了南唐前期的历史，尤其是突出了建国者李昪的生平事迹。田居俭《李后主新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叙述了南唐李煜作为绝代才子和薄命君王的复杂一生。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充分肯定了隋文帝的开皇政治和统一事业。胡戟《隋炀帝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一

改以往人们对于隋炀帝的否定性认识,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牛志功《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充分肯定了李渊在建立唐朝过程中的功绩,对史书中美化袒护李世民做出批评指正。黄约瑟《薛仁贵》(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澄清了关于薛仁贵的一些夸张与粉饰,力图以点带面,通过他的事迹展现唐代前期军事与外交方面的史实。马驰《李光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通过描述一个蕃将的身世与战功,再现了中唐平定安史之乱的复杂斗争。此外,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著作还有黄中业《隋文帝杨坚传》(吉林人民出版 1997 年版)、韩隆福《隋炀帝研究》(岳麓书社 1999 年版)等。吉林文史出版社在 1995 年以来出版了“唐帝列传”丛书,以传记形式,将唐朝各位皇帝生平及其在位时期的国家状况予以描述。与此相类,三秦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隋唐历史人物丛书”,其中有宁志新《李勣评传》、王元军《怀素评传》、穆渭生《郭子仪评传》(均为 2000 年版)等。

4. 政治制度史研究

(1) 职官制度

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 1986 年版),论述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历史发展过程,即魏晋南北朝的酝酿、隋代建立、唐初发展成熟以及唐五代遭到破坏的历史发展过程。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版),全面论述和介绍了唐代官吏的设置、职能、选拔、管理、俸禄、考核、退休的制度变化及其情况。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从官制角度,研究了尚书都省和财务系统对文书的勾稽检核工作,是一部有原创性的专著。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版),对唐代中央的皇帝御前决策、政事堂宰相会议决策等不同层次的决策形式和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御史台及其属官的监察职能,并运用列表的方法,使得大夫、中丞和三院御史的任职人员与年代情况一目了然。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 1993 年版),从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选举制度、俸禄制度等角度,整理了当时的研究成果,并对唐代使职差遣等问题做出进一步探究。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对三省制到翰林学士的变化、枢密使和中书门下组成的新的中枢决策体制变化等方面,做出研究与分析。王颖楼《隋唐官制》(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根据台省官与寺监职官的主管内容进行分类与概述。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 年版),从行政学的角度,分析揭示隋朝

及唐初人事结构、权力运作及其与政治演变的关系。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五卷《隋唐五代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论述了隋唐五代的皇帝制度、中央决策机构及其运行机制、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体制、监察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财政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少数民族政权等,把传统的静态缕述,推向动态研究,总结出隋唐五代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重要影响及其历史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还有任爽《唐朝典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 2000 年版)、李锦绣的专题论文集《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2) 科举与选官制度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在考证科举制度基本内容的同时,对其运作情况做出深入的分析。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9 年版),在介绍隋唐贡举和武举制度的同时,还进一步揭示出唐代贡举制度对儒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对韩国和日本的影响。宁欣《唐代选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5 年版),对唐代散官问题有精深独到的研究。穆舜英《隋唐五代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以专题与编年相结合,在引用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简要的概括和说明。

(3) 军事制度

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 1990 年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1 年版),系统研究了唐代烽堠制度这一军事警报系统。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是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府兵、兵募、健儿、防丁等兵员的研究,同时还涉及对北衙六军、神策军、藩镇军队体制及其出征制度的分析。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5 年版),是书对唐代前期战争动员状态下的军队及其集兵、作战等制度做出深入研究。马俊民等《唐代马政》(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5 年版,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在分析马政的同时,还论述了马政与边防、内政和外交的关系,视野较为开阔。

(4) 法律制度

倪正茂《隋律研究》(法律出版社 1987 年版),对隋律制订的背景、内容、阶级本质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都做出系统论述。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以论文集的形式讨论了唐律的渊源、制作年代、社会基础、阶级本质以及主要内容等。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上篇探讨唐律的立

法原则，下篇探讨《唐律疏议》中规定的犯罪种类和诉讼程序。韩国磐《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是关于中国法制史的通史性著作，其中也论及隋唐的法律问题。此外，还有王立民《唐律新探》(上海社会科学院 1993 年版)、钱大群《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钱大群等《唐代行政法律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这些书大多从现代法学角度研究唐代法律，与历史学家主要擅长文献和史实的考订与说明有所不同。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9 年版)，是作者多年研究唐代法律的成果总结。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四卷“隋唐”(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对隋唐两朝各方面的法制建设亦有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

(5) 礼制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中的“礼乐文明”部分，运用敦煌文献对唐代礼乐制度做出分析与探讨。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分为“隋朝礼仪”、“唐礼”、“五代十国礼仪”和“余论”几个部分，对与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有关的传统文献以及文物考古资料做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者从礼制、礼俗角度认识当时的思想政治与经济文化，为勾勒中国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礼制的大体轮廓，解决礼制史及相关学科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提供了一些带有探索性的意见。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主要介绍了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等唐代礼制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以及唐代的礼制与唐代的法律、社会、政治等的联系。

5. 军事史与农民战争史研究

在通论性军事史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军事科学院组编《中国军事通史》第 9 卷《隋代军事史》、第 10 卷《唐代军事史》、第 11 卷《五代十国军事史》(均为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全面系统地讲述了这一时期的军事发展史，篇幅最大，水平最高。

王永兴的论文集《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主要研究河西、北庭、安西、朔方等节度使的军镇设置情况，对出土文书中涉及军制的内容也进行了阐述。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在对军事文书进行考释的同时，还涉及关于府兵、兵募和健儿等兵制的相关细节。

陶懋炳《窦建德、李密、杜伏威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是考察隋末

农民起义的论著。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79年版),特别注重对战争前阶级状况和战争后社会变动的分析,对于唐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原因与战争结果有深入研究。李斌城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概述了这个时期各种农民起义的发展情况。俞兆鹏《黄巢起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方积六《黄巢起义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专门论述黄巢起义史事。诸葛计《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试图从军事学角度,探讨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

6. 社会史研究

由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第三册《隋唐五代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是一部综合性的社会史专著。其他社会史著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记述。

(1) 社会结构

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对唐代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状况做出深入系统的分析,探讨了冠户、寄庄户、客户等方面的问题,所提出的乡村上户、乡村次户以及乡村下户等概念对于研究乡村社会的构成很有帮助和启发。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从总体上讨论了这一时期家族和士族的演变,并对崔卢李郑王等山东大族和琅琊王氏、兰陵萧氏、吴郡陆氏等展开个案研究。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分"研究篇"和"史料篇",辑录了25类工匠的史料及其技术级别,例如"都料"、"博士"、"师"、"匠"、"工"等,对其身份和生活状况做了论述。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版),使人们对于寺户、梁户的认识更加具体、系统和深化。他还研究了寺户等向常住百姓的演变,认为这反映了寺户制度的衰落。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论述敦煌地区俗人到僧人这一转变过程的同时,还描述了该地区僧尼的生活方式、财产关系、宗教活动和收入以及僧尼的遗产处理和丧葬等问题。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对奴婢的来源、类别、名色、役使状况、地位、待遇以及奴婢的反抗斗争,进行了深入研究,是研究唐代奴婢制度的力作。

(2) 人口

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对《旧唐

书·地理志》贞观十三年大簿的户口数进行考订;其《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是对天宝十二载户口情况进行考订;他的论文集《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5 年版)中也收入了多篇考察唐代人口问题的文章,其中关于唐代人口的职业构成的文章很有新意。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重点研究了隋代户口数的增长、唐代人口的升降、唐代人口的分布、唐代人口的迁徙和唐代人口的结构等。其中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统计出唐代西州的家庭平均人口在 4—5 人、沙州大约为 5 口,与内地的平均人口差别不大,是迄今研究唐代人口问题的力作。李燕捷《唐人年寿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从碑传资料中辑录出唐人年寿资料,并制为总表,然后运用统计学和抽样分析的方法对唐朝人的平均寿命以及各阶层人士的享年及其原因进行了考察,具有创新性。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论述了隋唐五代时期周边民族的内迁、唐后期五代北方人民的南迁等人口迁移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移民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3) 家庭、婚姻及妇女问题

杨际平等《5—10 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 1997 年版),通过对敦煌文书中较完整的 126 户家庭资料的统计,得出核心家庭占 52.4%、主干家庭占 16.7%的结论。此外,该书还对家庭的功能、家族生活及家庭与家族的关系等问题做出分析。向淑云《唐代的婚姻制度与婚姻实态》(台北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全面地介绍了唐代婚姻关系中的各方面问题。牛志平《唐代婚丧》(三秦出版社 1996 年版),通过探讨唐人婚姻观念、心理和风气来深入分析唐代婚姻文化中深层社会因素。谭婵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在汇录敦煌婚姻关系的文献与壁画的同时,对敦煌地区唐代婚姻制度、婚姻类型、婚姻仪式和生育及离异问题做出分析。

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日本岩波书店 1999 年日文版),通过对零散资料的整理,对唐代各阶层妇女的基本面貌、生活状况和各方面的业绩做出系统论述,指出唐代妇女的特殊风韵。这是当代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妇女的专著,对唐代社会史研究有重要影响。

(4) 社会生活

臧嵘等《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做出概括。陈明伟《唐宋饮食文化史》（台北学生书局 1995 年版），介绍了这一时期饮食文化。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深入考察了唐人日常物质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运用农学及营养学的相关知识，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烹饪技术的发展以及饮食文化等问题。

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是迄今最系统翔实的关于这一时期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风俗礼仪等社会生活的著作，许多章节是作者专门研究的成果。此外还有王家广《唐人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周峰《中国古代服饰参考资料（隋唐五代部分）》（燕山出版社 1987 年版），将服饰风格分为隋—盛唐、中唐—五代两个时期，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各时期男女服饰的流行与发展变化情况。段文杰《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根据敦煌壁画分析了唐代妇女的衣装和化妆的演变。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 1993 年版），上篇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探讨了唐代的车马革带、幞头和妇女服饰等问题，下篇对《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做出全文校释。

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 1989 年版），对于唐代金银器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分析了唐代金银器及其与西域地区的文化关系。宁可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共收录社邑文书 345 件，为该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肃《唐代之长安研究》（台北大立出版社 1983 年版），旨在探讨唐代长安的市民生活。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 1991 年版），利用考古资料对唐代城市建筑和坊市布局进行研究。黄新亚《消失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 1996 年版），从外来文化的输入、城市布局设施、市场的繁华与活跃、科场的士子与求学的少年、佛教信仰与佛寺文明、节日与休闲活动等，描述了以首都长安为典型的城市生活的基本情况。程蔷等《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从岁时节日、都市民俗、妇女生活习俗、文人士子风貌、神灵崇拜与巫术禁忌、民间文学与技艺六个部分描述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

7. 民族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1) 民族关系

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分析了唐代和亲的史实和政策;其《隋唐民族关系史探索》(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对很多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问题作了深入探索。王小甫《唐、吐蕃、大食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论述 7—8 世纪唐朝、吐蕃、大食之间在西域的各种复杂关系,诸如吐蕃向西域扩展势力及其与唐朝的争战、西突厥的兴衰、大食的东方扩张等。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的影响。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卢勋等《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描述了隋唐时期中国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上篇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此外还有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

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介绍了突厥的族源、突厥族的兴起及其社会制度、突厥的文化和习俗等,并附有突厥文碑铭译文等。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从突厥先世、突厥汗国、突厥内战、东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大漠南北的唐朝羁縻州府、后东突厥汗国、唐朝治下的后西突厥诸羁縻政权和突厥文化等几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描述了突厥的历史,书中并附有照片和地图。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是系统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研究了突厥汗国在东亚政局中的作用、隋唐统一之初时经营西域的活动以及与突厥的关系等。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 1998 年版),是作者潜心研究西域史之心得,分为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展开论述。此外还有王小甫《唐朝对突厥的战争》(华夏出版社 1996 年版)。

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对正史中回纥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涉及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等领域。林幹主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 1987 年版)，收录了 1981 年以前的重要论文。

王尧等《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是 1983 年出版《敦煌吐蕃文献选》的续编，分为汉文和藏文两个部分。内容包括吐蕃时期宗教、社会经济、民族关系、语言文字、占卜、伦理道德、兽医、驯马等几个方面。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版)，是作者的论文汇编，多数论文是关于吐蕃职官制度及吐蕃与唐朝关系等问题。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是一部关于吐谷浑的概述性著作，其《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是对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概述了党项的早期历史和社会状况及其与吐谷浑、唐朝的关系。

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 1978 年版)，对南诏历史做了概括性叙述。杨仲录《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 38 篇，书末有 1936—1988 年有关南诏史的论文索引，是书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大理国梵像卷》。

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 1984 年版)、李殿国等《渤海国》(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等都是关于渤海史的概述性著作。王承礼等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收录了 1986 年以前代表性论文 48 篇，书后附录截至 1986 年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

(2) 中外关系

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以及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等。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1990 年版)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 1990 年版)，都指出了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蕃胡”并不都是外国人，有些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

黄约瑟《黄约瑟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 1997 年版)中的“学术篇”的部分论文涉及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 1997 年版)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

耿昇翻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 1993 年版)、吴玉贵翻译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等,都是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的代表。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5 年版),是关于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 10 多篇论文的汇编。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研究了 7 世纪中叶到 8 世纪末叶的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运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进了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

孙毓棠等校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 1983 年版)、范祥雍校点《释迦方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 1988 年版)、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 1994 年版)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这些著作以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上册第三部分"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关于南亚资料。

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新增史料十余条,把这些事迹分为 53 个条目,史料置于文首,后附按语与说明。书中还有四篇关于王玄策事迹的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是研究王玄策出使印度及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著作。

8. 思想文化史研究

(1) 综合性论述

关于文化史的专著,首推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这是一部全面描述隋唐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谢保成《中国隋唐五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也是一部综合性著作。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 1992 年版),综论了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轨迹、从制度文化的建设到精神文化的发展、汉唐文化发展的特点、国内各民族各地区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内容,分论了家庭、经学、社会思潮、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问题,论述比较深入,但其内容详于汉而略于唐。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从"教育与科举"、"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宗教"等部分描述了隋唐

五代文化史的内涵，并论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以及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

（2）哲学与学术思想

目前尚无专门的隋唐五代哲学史性质的著作，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这样的通史性著作中都有相关内容。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的隋唐卷（第4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葛兆光《7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涉及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等问题。

（3）关于经学与儒教

主要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

（4）佛学

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年版），对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而对佛教本身的论述相对不足。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考订了汉唐时期佛教的若干史实。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依次阐述了隋唐时代佛教势力的消长、隋唐佛教传译情况、隋唐佛教撰述、隋唐佛教宗派、隋唐佛教传布等方面的内容，叙述细致翔实，学术价值很高。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是关于佛教社会史研究的论文集。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隋唐时期的禅宗思想多有研究。严耀中《汉传密宗》（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对密宗做了深入研究。这方面的著作还有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等。玄奘研究的著作有十余种，如苏渊雷《玄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杨廷福《玄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版）、钱世明《玄奘传》（中国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马佩主编《玄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许凤仪《鉴真》（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孙蔚民《鉴真和尚东渡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则是有关鉴真的专门研究著作。

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分寻蓝篇、造设篇、基壤篇、僧伽篇、科门篇、妙相篇(上、下)、文苑篇、艺技篇、辅世篇9篇,是迄今篇幅最大的关于中古佛教寺院文化的研究专著,既有综合概括前人成果之处,又有作者长期深入研究的心得,体现出作者试图全面地展示中古佛教寺院文化内涵的努力和成就。

(5) 史学史

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收集了作者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是一部十分完备的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不仅总结了这一时期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而且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进行具体讨论,并以专章形式对隋唐五代十国的史学进行论述,在断代史学史著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考证史实为主,并以按语进行评议;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和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皆以注释考辨为主;赵俊《〈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则是专门从理论上研究《史通》的重要著作。

9. 重要论文集

在个人文集方面,首推蒋天枢编订《陈寅恪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其中《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是陈寅恪历年发表的论文合集,其中收录了陈寅恪晚年所写的隋唐史论文。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他的隋唐史研究论文被编为《汪篯隋唐史论稿》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此外,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金宝祥《唐史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唐长孺《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牛致功《唐代的史学与通鉴》(陕西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隋唐政治史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永年《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等等,都是这一领域出版的重要论文集。集体论文集,则有唐史研究会编辑的多种会议论文集《唐史研究会论文集》、《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等,另有连续出版《唐研究》、《唐史论丛》等,这些都是已经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

五、宋史研究①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宋史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但总的研究却呈现出零散、孤立的状况，对问题的研究深度和领域的广阔度上，都存在很大发展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宋史研究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以下分三个阶段，对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宋史研究状况作一总结。

(一) 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

和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这一时期的宋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既没有出现通论性的断代史研究著作，在研究领域方面也显得过于狭窄，远没有其他断代史研究兴旺。

1. 经济史研究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系统梳理了两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发展过程，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也是经济重心完成其南移行程的时代，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从此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完全超过北方，中国进入南盛北衰的新阶段。此书篇幅不大，但学术价值很高，影响很大。戴裔煊《宋代盐钞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则专门对宋代盐钞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及其与时代客观环境的交互关系进行研究，并说明这一制度在宋代各个时期所起的作用与影响。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从农业、手工业、货币、商业、土地与农民关系等方面，论述了宋朝及其以后中国经济的各方面发展状况，但它是以内容划分章节，并非是以时代分章节讲述的，因而并无系统的宋代经济史专章。

2. 政治史研究

主要成果是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此书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为指导，紧紧抓住贯穿变法全过程中的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线索，分析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实质、变法过程中的斗争、新

---

① 本节参考了以下论著：王曾瑜：《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朱瑞熙等：《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江小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宋史研究》，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天石等：《宋辽金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谢保成等：《中国史书目提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20世纪后半期港台的宋史研究，王曾瑜的文章中有专节集中介绍。

法的废除和反动的封建统治势力的高涨等问题，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宋代封建专制统治极端虚弱下的一个政治改良运动，是地主阶级的一次自救运动。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之间的斗争，是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此书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相当深入，学术价值极高，超过了前此所有同类著作，在海内外均有重大影响。书后还附录了王安石新法的部分校勘资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张文清《宋代太学生的救亡运动》（上海大中国书局1953年版）专门研究宋代太学生与宋代政治的发展情况。

3. 农民战争史研究

农民战争史研究是当时的"五朵金花"之一，出版著作较多。主要有杨威民等《王小波李顺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刘知渐《王则起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方诗铭《方腊起义》（四联出版社1954年版）、云川《方腊起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齐治平《方腊起义》（中华书局1960年版）、任强《宋江和方腊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张文清《钟相和杨幺》（四联出版社1954年版）、邓潭洲《杨幺起义的故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

4. 民族关系及战争史研究

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各民族间的战争，出版的通论性著作有沈起炜《宋金战争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对宋金之间的战争全过程进行了简要梳理，认为宋金战争是悲壮的史诗，历史证明了人民的爱国精神，也证明了历史上的侵略战争违反各民族（包括侵略者的民族）的利益。更多的著作属于专题研究性质，如雷大受《采石之战》（中华书局1962年版）、陈鸣钟《毙亮记：南宋时汉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汤志钧《袈裟塔：宋末常州人民抗元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

5. 文化教育史研究

主要有张岱年《张载——11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张家驹《沈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等，顾树森编《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下册"汉唐宋明各家"（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是一部资料汇编，李长博《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熊伯履与井鸿钧合编《开封市胜迹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则对宋代开封的历史地理情况进行了考证。

6. 人物研究

重要者有张家驹《赵匡胤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沈起炜《杨家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郝树侯《杨业传》（山西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湛之《寇准》（中华书局 1962 年版）、袁行云《欧阳修》（中华书局 1961 年版）、张毓芬《李纲和宗泽的抗金斗争》（四联出版社 1954 年版）、胡昭静《李纲和宗泽》（中华书局 1960 年版）、丁慰长《宗泽》（浙江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吴太等《宗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王平《岳飞》（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史崇书《岳飞》（中华书局 1965 年版）、何竹淇《岳飞抗金史略》（北京三联书店 1959 年版）、齐治平《陆游传论》（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朱东润《陆游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0 年版）和《陆游研究》（中华书局 1961 年版）、钱东甫《辛弃疾传》（中华书局 1961 年版）、唐圭璋《辛弃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沈起炜《文天祥》（中华书局 1962 年版），邓广铭则出版有《王安石》（北京三联书店 1953 年版）、《岳飞传》（北京三联书店 1955 年版）和《辛弃疾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等多部人物传记著作。

（二）1966 年 5 月至 1978 年 12 月

“文革”期间，宋史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领域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学术成就可言，但何竹淇编辑出版《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1976 年版）、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选注《王小波李顺起义资料选注》（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等资料选编，还算略有价值。

“文革”结束后至 1978 年 12 月，是一段过渡时期，学术界仍比较沉闷。

（三）1978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潮流，学术研究开始健康发展，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宋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成果丰硕，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开始跃居各断代史研究的前列。

1. 通论性断代史著作

独立而又完整的通论性断代宋史研究著作，首推周宝珠等主编《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其内容包括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科技成就、思想文化成就及其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等情况。此前，蔡美彪等合著《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专门记述两宋时期的政治演变、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和民族关系等内容，思想文化部分则在第六册与金、元两朝的相关内容一起叙述，但这毕竟还是多卷本中国通史中的一部分。《中国史稿》编写组编

写《中国史稿》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则是统论宋辽金元四朝的历史。此后,陈哲夫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六卷《辽宋夏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张邦炜《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沈起炜主编《华夏五千年——辽宋金元》(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周宝珠等新撰《二十五史新编:北宋史·南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也相继问世。其中,由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汇集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何忠礼等《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关于南宋历史的第一部断代史著作,可惜各种硬伤较多,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

2. 经济史研究

"文革"之后的宋代经济史研究,首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版)。此书分五编,从宋代农业生产与土地诸关系,宋代手工业生产以及手工业诸关系,宋代茶、盐、酒、矾的生产和封建国家的专利制度,宋代商业的发展及其与周边诸族、海外诸国的贸易关系,宋代社会经济思想等方面,对宋代经济史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地位,作出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有许多精彩的理论阐述和总结,是20世纪以来第一部宋朝断代经济史研究的巨著,既总结了过去,也开拓了未来。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也是专门论述宋代经济史的著作,从宋代的经济地理、交通运输、土地制度与土地问题、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商品生产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九个方面,对宋代经济史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鲁亦冬《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吴晓亮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乔幼梅《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齐鲁书社1995年版)等论文集,也都可以看作是有关这一时期经济史研究的通论性著作。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则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宋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各种情况。

在专题研究方面,关于宋代商业贸易和商业制度研究,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是一部对宋代经济史做更深层次探索的重要著

作。中国古代商业信用出现很早，但像宋代商业信用关系的发展程度，则是此前各代从未有过的，它的发展既反映了宋代城镇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也说明了中国最早的纸币只能在宋代而不能在此前产生出来。该书对宋代民间的赊卖赊买、宋政府向民间提供的赊卖、官府赊买、发展了的派生的商业信用—预付货款、商业信用中的牙人和担保问题、信用证券—交引、交引买卖市场、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影响、宋代的榷货务与商业信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总结了宋代商业信用区别于前代的特点，分析和论述了宋代商业信用在消费领域、流通领域、生产领域的作用和影响，指出宋代商业信用已经从消费领域发展到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能远远超过以前的汉唐盛世，商业信用的空前发展是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有，郭正忠《3 至 14 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则专门讨论了宋代市镇、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问题。

关于财政货币方面，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 1994 年版），从财政发展沿革、财政收支、财政管理体制三个方面，对宋代财政史作了系统研究。此外，刘森《宋金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 年版）、李梁等《宋钱大观》（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车迎新主编《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 年版）、李埏等主编《宋金楮币史系年》（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版）以及高聪明的个人文集《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对宋代的货币和货币思想作了全面介绍。白秦川《宋代货币史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都是重要的资料著作。

关于手工业方面，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研究了宋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两个重要来源——盐、酒的生产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关于区域经济研究方面，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是较早以地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而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则首次对两宋时期的区域经济作了全方位的探讨和研

究,对宋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域不平衡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则从技术进步入手,深入研究了南方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及发展状况。

3. 政治史研究

在通论性政治史研究方面,王瑞明《宋代政治史概要》(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是较早出版的代表性著作,全书以宋代政治的发展演变为主线,对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军事、文化以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论述,是对宋代政治史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著作。赵绍铭《中国宋辽金夏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宋代政治的发展史。此外,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11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版)、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著作,从专题的角度对宋代政治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则是其关于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的专题论文集,也有很多独到见解。李华瑞等《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则专门考察了两宋三百年间的各种变法改革,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宋代政治史著作。

在政治制度史研究方面,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宋代政治制度史的各个层面,是这一领域的第一部通论性著作。之后,张希清等《宋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也对宋代政治制度进行了全面介绍。更多的著作则属于专门研究性质,主要有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巴蜀书社1995年版)、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齐鲁书社1997年版)、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勇先《宋代添差官制度研究》(天地出版社2000年版)等。龚延明先是出版了《宋史·职官志补正》(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随后又出版了《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前者重在资料,后者则是工具书,但都有研究性,对宋代政治制度的研究都很有价值。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论著的研究范围虽

不以宋代为限，但却对宋代的相关内容有深入把握。

4. 法制史研究

在法制史研究方面，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宋代司法制度，是该领域的第一部研究著作。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不仅对宋代各项法律制度作了系统论述，而且对法律变化的背景作了深入考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还有赵晓耕《宋代法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薛梅卿《宋刑统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等著作。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五卷“宋”（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对宋代各方面的法制建设亦有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戴建国则有专题论文集《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汪汉卿主编有《包拯法律思想与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5. 军事史研究

在军事史研究方面，王曾瑜率先出版了《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 1983 年版），按现代军制学的规范，重新研讨宋朝军制，其中前五章主要介绍正规军，即北宋禁兵和南宋屯驻大兵的演变情况，以及编制、指挥系统等等问题，后五章介绍募兵制、装备、通信、后勤、军费、军法、军政等方面。此书内容系统完整，大体完成了断代军制史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轨，有开创性意义。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通史》第 12 卷《北宋辽夏军事史》、第 13 卷《南宋金军事史》（均为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刘庆等《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等，都全面介绍了两宋与对立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及战争情况。此外，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也都是重要的专题研究著作。

在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通论性著作主要有赵继颜《中国农民战争史·宋辽金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对宋、辽、金、元四朝的农民战争情况进行了详细探讨。由于时代的变化，农民战争不再是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宋代的农民战争研究也逐渐趋于冷落，出版的著作主要集中于钟相杨幺起义问题，如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写组《钟相杨幺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白钢《钟相杨幺佚事及其史料价值》（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陈士谔等《钟相杨幺起义考》（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等。

6. 社会史研究

通论性著作中，最早出版的是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从宋代社会经济、家族组织等十个方面，对宋代社会进行研究，并对宋代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由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第4册《宋元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则全面介绍了两宋时期的社会状况。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利用各种文献资料及实物，深入考察了该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专题性研究论著中，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柯大课《中国宋辽金夏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林正秋《宋代生活风俗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宋辽金元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则从移民的角度对两宋社会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入探讨。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从乡村户与坊郭户、官户与民户等对称户名中提出户口分类制度的概念，认为宋朝社会的阶级结构包括主体阶级和非主体阶级两大部分，主体阶级指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非主体阶级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奴婢、人力和女使等阶层，对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生活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分析和评述。书中不采用他认为不科学的"封建社会"一词，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命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从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五等户定制及其细分化形式化倾向、五等下户的经济地位和所占比例、乡村客户的侨寓特点和主要构成、客户诸称辨析、土地买卖的盛行及其社会影响、分种和租种两种租佃基本形式、夫役征发的形式和承担者、身丁钱物的除放过程、两税法的演进、阶级对抗的若干新现象等问题，对两宋时期的阶级关系进行专题性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从唐宋之际婚姻制度、婚姻习俗和婚姻观念的变化入手，对宋代婚姻与社会的情况进行探讨，是第一部研究宋代婚姻与社会的专题著作。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则专门考察宋代的宗族和宗族制度，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与此相关，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中也有研究宋代家族制度及

其相关内容。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打破王朝界线,主要依据自然地理和王朝疆域、政区情况,将研究的主要范围划为 16 个区域,比较详尽地讨论了各区域在辽宋金元时期的人口发展过程、人口分布状况,以及影响区域人口发展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对认识当时各区域的历史提供了独到的视角。

在都城、城镇的研究方面,开封市博物馆编辑出版了《古都开封》(中州书画社 1982 年版)、河南师大地理系编有《古都开封》(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2 年版)、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这些著作对北宋都城开封进行了介绍。对南宋都城临安的介绍有林正秋等《南宋故都杭州》(中州书画社 1984 年版)、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西泠印社 1986 年版)、周峰主编《南宋京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1988 年版)、谢家贤《南宋临安外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 年版)。屈春山《宋都风情》(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李春堂《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则是从宏观上讲述宋代都城的社会生活。

7. 民族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在民族史研究方面,通论性著作主要有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将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活动过的所有民族,全部纳入研究范围,对每个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政权的结构和兴亡、经济文化的变迁与进步及其同毗邻民族的关系等,进行了详细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论证了各个民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总结了其中规律,评价了他们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肯定了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和睦相处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主流地位。此外,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胡昭曦等《宋蒙(元)关系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8 年版)、顾宏义《天裂:12 世纪宋金和战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等也都是学术价值很高的专题研究著作。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主要有陈高华等《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该书编写组《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等著作。

8. 思想文化史研究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石训等在《北宋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的基础上,于 1992 年出版了《中国宋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宋代哲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专著,把宋代社会发展与哲学思潮演变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社会经济基础、政治斗争背景、思想理论渊源方面,揭示了理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通过对理学范畴分析,充分肯定其理论思维的建树,详尽地分析了各个流派对中国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此外,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4、1987 年版)、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也都从宏观上阐述了宋代理学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文津出版社 1991 年版)、胡昭曦等《宋代蜀学研究》(巴蜀书社 1997 年版)、郭鹏《宋元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顾吉辰《宋代佛教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也都是具有通论性质的专题研究著作。

在文化史研究方面,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是第一部有关两宋文化史研究的通论性断代著作,详细阐述了宋代文化的丰富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杨渭生主编《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从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风貌、各种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宋代文化的各个层面,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石训、朱保书《中国宋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在利用文献资料分析宋代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辉煌成就的同时,利用大量考古新成果来分析宋代文化,考察了当时境内各民族间及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情况,对宋代文化的创新精神予以高度评价,并在考察宋代哲学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宋代哲学对宋代文化走向繁荣的引导作用。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宋代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年版),论述了宋代各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将宋代文化的时代精神概括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经世观念、文化上的创新与兼容精神、都市文化蓬勃发展三个方面,并从宏观

理论上分析了社会变动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这是其区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之一。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则是专门考察北宋一百多年间文化的发展演进情况。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以空间为线索，研究两宋时期各地区的文化发展及其特色，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南北两大地区文化的比较问题。郭学信《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与心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则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及其心态，置于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此外，还有叶坦《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张全明编著《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宋元部分）》（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9 年版）等著作。

9. 教育史研究

在教育史研究方面，通论性著作主要有袁征《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乔卫平《中国宋辽金夏教育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陈学洵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0 年版）等，都对宋代教育的发展及其成就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其他专题性研究论著主要有张先觉《王安石之教育思想》（文史哲出版社 1982 年版）、王凤岭《王安石人才思想论稿》（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罗传奇等《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杨金鑫《朱熹与岳麓书院》（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6 年版）、周德昌编《朱熹教育思想述评》（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李邦国《朱熹和白鹿洞书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韩仲文《朱熹教育思想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朱瑞熙主编《朱熹教育和中国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1 年版）、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0 年版）、郝万章《程颢与大程书院》（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等。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陈谷嘉等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等著作，也都有相关内容。

10. 史学史研究

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史学思想、史官制度、重要史学家个案研究等领域都有重要收获。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 1992 年版），从史学与哲学特别是理学、史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入手，详细分析了两宋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特色，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是第一部有关宋代史学思想史研究的著

作。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宋立民《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刘芃《论宋人撰集当朝史》(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等,对宋代官方修史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重要的史学家研究,司马光和郑樵无疑是宋代史学研究的两位重量级人物,研究著作很多。司马光研究有顾奎相《司马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季平《司马光新论》(西南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宋衍申《司马光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和《司马光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程应镠《司马光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冯惠民《司马光和〈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1年版)、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锦贵《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陈光崇个人专题论文集《通鉴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郑樵研究有黄玉石《郑樵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吴怀祺《郑樵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徐有富《郑樵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此外,还有王云海《宋会要辑稿研究》(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1984年版)、《宋会要辑稿考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陈智超《解开〈宋会要〉之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裴汝诚等《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巴蜀书社1990年版)、李勇先《舆地纪胜研究》(巴蜀书社1998年版)、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2000年版)等。

11. 人物研究

人物传记类著作颇受社会欢迎,特别是那些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更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出版有多部传记著作。如龚延明《宋太祖》(中华书局1983年版)、刘耕荒《宋太祖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雷家宏《奠基陈桥驿:赵匡胤的治国谋略》(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张其凡《赵普评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常征《杨家将史事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郝树候《杨业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王晓波《寇准年谱》(巴蜀书社1995年版)、蔡东洲《宋代阆州陈氏研究》(天地出版社1999年版)、李涵《范仲淹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程应镠《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孔繁敏《包拯年谱》(黄山书社1986年版)和《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进德《欧阳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姜国柱《李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邓广铭《北宋政

治改革家王安石》(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赵益《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曾枣庄“三苏评传”(包括《苏洵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修订版;《苏辙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许序雅等《宗泽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邓广铭《岳飞传》(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增订本)、龚延明《岳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王曾瑜《岳飞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修订版《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郭光《陆游传》(中州书画社 1982 年版)、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巴蜀书社 1995 年版)、杨倩描《吴家将》(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陈世松《余玠传》(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陈清泉《文天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万绳楠《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杨正典《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齐鲁书社 1992 年版)、俞兆鹏《谢枋得年谱》(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和《谢叠山大传》(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曾琼碧《千古罪人秦桧》(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韩酉山《秦桧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以及黄锦君《两宋后妃事迹编年》(巴蜀书社 1997 年版)等,都是比较重要的。此外,吉林文史出版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了《宋帝列传》丛书,对宋朝各代皇帝的生平、时代及其政治是非功过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在思想家研究方面,出版著作更多,学术价值较高者主要有梁绍辉《周敦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唐明邦《邵雍评传附陈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姜国柱《李觏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和《张载的哲学思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马振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李之鉴《王安石哲学思想初论》(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版)和《陆九渊哲学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师大出版社 2000 年版)、刘象彬《二程理学基本范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潘富恩《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蔡方鹿《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徐洪兴《旷世大儒:二程》(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杨天石《朱熹及其哲学》(中华书局 1982 年版)、陈

正夫等《朱熹评传》(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吴以宁《朱熹及宋元明理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版)、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郭齐《朱熹新考》(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蔡方鹿《朱熹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张锡勤《陆王心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崔大华《南宋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 1992 年版)、陆玉林《陆九渊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祁润兴《陆九渊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潘富恩等《吕祖谦思想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和《吕祖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蔡方鹿《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巴蜀书社 1991 年版)和《魏了翁评传》(巴蜀书社 1993 年版)、周梦江《叶適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和《叶適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方如金主编《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等。

12. 重要论文集

个人文集有聂崇岐《宋史丛考》(中华书局 1980 年版)、华山《宋史论集》(齐鲁书社 1982 年版)、陈乐素《求是集》上下两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和《宋元文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关履权《两宋史论》(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大出版社 1994 年版)和《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漆侠《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和《知困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以及《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邓广铭和漆侠合著《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程应镠《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徐规《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裴汝诚《半粟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李裕民《宋史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

集体论文集有邓广铭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和《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1984、1987、1992 年年会编刊)、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1—4 辑(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0、1993、1999、2001 年版)和《宋史研究论文集》(1994、1996、1998 年年会编刊)、邓广铭和漆侠主编《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和《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徐规主编《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陈乐素主编

《宋元文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等。此外,岳飞研究会编辑出版了《岳飞研究》1—4 辑(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中华书局 1990、1992、1996 年版)、四川大学古籍所编辑了《宋代文化研究》1—9 辑(1991—2000 年分别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巴蜀书社出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有《宋辽金史论丛》第 1、2 辑(中华书局 1985、1991 年版)、中州书画社出版有《宋史论集》(1985 年版)等。

六、辽西夏金元史研究①

以下分三个阶段概述 20 世纪后半期的辽西夏金元史研究。

(一) 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5 月

这一阶段,辽西夏金元史研究不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都很少。

1. 辽史研究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 1963 年版),分五章,依次论述了契丹国家的性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级与土地关系、京邑城镇的营造及其意义、国内外贸易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等问题,认为契丹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由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社会经济的多种结构和复杂性,是一种过渡阶段的社会,最终因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经济基础而瓦解。此书学术价值很高,是本阶段辽史研究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陈述在前人基础上,以传世的辽代碑志铭文等石刻史料为主,编辑出版了 12 卷本的辽代总集《辽文汇》(中国科学院出版局 1953 年版),为辽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方便。冯家昇则汇集自己的三部著作而出版《辽史证误三种》(中华书局 1959 年版),对《辽史》的纂修经过、缺略与讹误等问题进行梳理考证,为学界使用《辽史》提供了方便。

港台地区出版的著作有林旅芝《契丹兴亡史》(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1957 年版)、李唐《辽太祖》(香港宏业书局 1965 年版),论文集有大陆杂志社《宋辽金史研

---

① 本节参考了以下论著:李天石等:《宋辽金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李治安等《元史学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宋德金:《20 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李锡厚等:《辽西夏金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刘晓:《元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关树东:《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辽金西夏史研究》和刘晓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元史研究》,均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谢保成等:《中国史书目提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 1960 年版)等。

2. 西夏史研究

由于资料、语言文字等原因,西夏史研究历来十分薄弱。20 世纪上半期,已经有学者出版西夏史研究的著作,随着西夏文字、文献被发现与释读,西夏学开始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学者主要利用汉文文献史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历史进行研究,发表了一些重要论文,但尚未有专著出版。

3. 金史研究

出版有两部著作,一是沈起炜《红袄军》(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记述了金末李全夫妇领导的红袄军的反金斗争,对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客观分析;另一部是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 1960 年版),包括《金史氏族表》、《女真汉姓考》、《金赐姓表》、《金史同姓名表》和《金史异名表》五种,是研究金代历史的重要工具书。

4. 蒙元史研究

这一时期的元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李剑农出版了《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 1957 年版),对元代农业、手工业、货币、商业、赋役等经济史内容进行了梳理。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是依据《元史》、《经世大典叙录》和有关集部、杂著中所见的元代傣族史料,写成的编年纪事和地理考释著作,对研究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很有价值。端已《红巾军》(四联出版社 1954 年版),阐述了元末红巾军起义的原因、发展及最后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台湾大陆杂志社编《元明史研究论集》(台湾大陆杂志社 1960 年版),收录了关于元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的多篇论文。

在人物研究方面,出版了一些传记著作,主要有周庆基《成吉思汗》(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版)、余元庵《成吉思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洪源《赛典赤》(中华书局 1962 年版)、邱树森《张士诚》(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李迪《郭守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等。

在资料建设方面,蔡美彪编著出版了《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谢再善翻译出版了《蒙古秘史》(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二) 1966 年 5 月至 1978 年 12 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辽、西夏、金、元史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港台地区则成果不少,如辽、西夏、金史方面,断代史有张其昀等主编《金史》

(台北"国防研究院"出版部1970年版)。法律制度史有叶潜昭《金律之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民族史方面有李符桐《回鹘与辽朝建国的关系》(台北文风出版社1968年版)、程光裕《宋太宗对辽战争考》(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等。论文集有大陆杂志社编《辽金元史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年版)、存萃书社编《宋辽金元史论集》(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版)、王民信《契丹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73年版)、陶晋生《边疆史研究集:宋金时期》(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等。资料汇编有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11辑(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版)和《辽金元艺文志》(台北世界书局1976年版)、谢昭男《五代时期各国关涉契丹史事系年》(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版)等。

元史方面,断代史著作主要有黎东方《细说元史》(台北"国防研究院"出版部1966年版)。政治史著作有肖启庆《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年版)、杨培桂《元代地方政府》(台湾浩瀚出版社1975年版)。经济史论著有周康燮的专题论文集《元代社会经济史论集》(香港崇文书店1975年版)。文化史有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版)、王云五《宋元政治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孙克宽则有多部著作,包括《宋元道教之发展》(台中东海大学1968年版)、《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北中华书局1968年版)、《元代金华学术》(台中东海大学1975年版)等。中外交流方面有王仪《蒙古元与王氏高丽及日本的关系》(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论文集则有袁冀《元史研究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等。

"文革"结束后至1978年12月,是一段过渡时期,学术界仍比较沉闷。

(三)1978年12月至2000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潮流,学术研究开始健康发展,大陆的辽、西夏、金、元史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中国辽金史学会、中国蒙元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等的成立,学会会刊《辽金史论集》、《蒙古史研究》、《元史论丛》等相继出版,都极大地推动了辽西夏金元史研究快速发展。

1. 通论性断代史著作

首先出版的是蔡美彪等合著《中国通史》第六册、第七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六册专门论述辽、夏、金三朝历史,其中辽朝和西夏部分全面叙述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金朝的经济发展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结合政治状

况综合叙述，但因金朝文化基本上是北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为元代的北方文化奠立了基石，因此不在本册内讲述，而是放在下一分册与宋、元文化一并叙述，以便表明前后的联系和发展。第七册专门讲述元朝历史和宋金元时期的文化。《中国史稿》编写组编写《中国史稿》第五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则是统论宋、辽、金、元四朝的历史。杨树森等《辽宋夏金元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刘凤翥等《二十五史新编·辽史、金史、西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沈起炜主编《华夏五千年——辽宋金元》（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等著作，也都对辽夏金元历史作了全面叙述。篇幅最大的是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全面论述了该时期的历史，代表了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专论各朝历史的断代史著作，辽史研究方面，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 1979 年版）最先出版，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契丹族的兴起、辽朝的建立及其发展、衰败和灭亡的过程，包括辽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科学文化、民族关系以及它与当时其他并立政权的关系等内容，是第一部辽朝断代史著作。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和《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黄山书社 1998 年版）、黄凤岐《契丹史研究》（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年版）等，也都是全面研究辽朝历史的著作。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则是专门考察西辽由建立到灭亡的历史过程。此外，李锡厚《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辽金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则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习俗和民族关系等方面，综合叙述了辽、金两个王朝的总体情况。

金史研究方面，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研究金朝历史的断代史著作，对金朝建国以前女真人的历史，金朝的建立与发展，金朝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等内容，都有详明的论述，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此后，张博泉又与他人合著出版了三卷本《金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1992、1993 年版），其中第一卷为绪论、女真部族制度和猛安谋克制度，第二卷为金代人物与社会改革、经济和政治制度，第三卷为金宋和战、历史地理和文化，全书就金史中若干重要专题，分为若干篇章进行系统

深入的研究，每个篇章都具有独立性，既不同于断代史，亦非论文集，而是专题研究的著作。这是目前金史研究中篇幅最大、内容最全面的高水平著作。此外，还有何俊哲等《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以及上面提到的李锡厚《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辽金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等著作。

西夏史研究方面，钟侃等《西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是第一部断代西夏史著作，简明扼要地梳理了西夏历史的发展脉络，对西夏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阶级关系状况、礼仪制度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但因篇幅短小，很多问题没有展开或涉及。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则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西夏历史的方方面面，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西夏史论著之一。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也是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写成的西夏断代史著作，很有学术价值。此外还有白滨《党项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等著作。

蒙元史研究方面，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从蒙古国家的建立、蒙古征服战争、蒙古国的统治、元朝的建立、元代社会经济、元朝社会矛盾的发展、元末农民大起义、元代的边疆各族、元代的文化科学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对元朝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是元史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周良霄等《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从蒙、汉两种文化的特质，以及它们相互吸收和融合、对立、排斥的发展过程出发，对蒙元史作了深入剖析，在很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此外，还有王慎荣《元史探源》（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佟德富《新编中国元代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等。港台出版的则有李泽芬《元史新讲》（台北中华书局 1978 年版）、黎杰《元史》（台北大新书局 1984 年版）等著作。

2. 经济史研究

在综合性通论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漆侠等《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1998 年修订二版，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以《中国经济通史·辽夏金经济卷》为名收入该丛书出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辽、夏、金三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作为中国北方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当时经济发展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是全面研究辽、夏、金三朝社会经济问题的开拓性著作，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

析》(武汉出版社 1991 年版),以两宋经济研究为重点,通过对宋代的农业革命、煤铁革命和都市化进程,辽夏金及周边地区的边疆开发、经济成就及其与内地经济联系的加强等问题的研究把握,试图用简洁的笔墨勾勒出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及其基本格局,勾勒出当时区域经济的不同状况和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结构。此外,鲁亦冬《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乔幼梅的专题论文集《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齐鲁书社 1995 年版)也都叙述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的状况。

辽代经济史的专题研究著作有田广林等《契丹货币经济史》(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其中,前者专门考察辽朝货币的生产、流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后者则从现代"大农业"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全面地复原辽金时期各种农业生产部门,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林业、渔业等众多生产部门的空间分布格局,探讨这一历史时期内辽、金两朝疆界内大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以及自然、社会等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这是作者继《宋代农业地理》之后,研究两宋时期农业地理问题的又一项课题,是运用现代地理学方法研究辽、金农业的首次尝试,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专论金代经济史的研究著作有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对金朝的人口分布、土地占有制度、赋役制度、农作物的分布与产量、工矿业的分布与发展水平、商业与货币等各种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揭示出金朝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面貌,认为金朝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刘森出版有《宋金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 年版),运用钱币学与货币史、经济史、印刷史、文化史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讨了宋金纸币的产生、发展、消亡及其作用,涉及纸币的版(票)式、印刷、防伪、发行量、流通区域、币值、纸币管理制度和思想、纸币与铜钱、铁钱及银的关系,以及纸币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此外有李埏等《宋金楮币史系年》(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李侠等《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也涉及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相关内容。

专论西夏经济史的研究著作有杜建录的专题论文集《西夏经济史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8 年版),作者主攻西夏经济史多年,对前人论述简略或很少探讨的西夏各种经济制度做了深入研究。

专论元代的经济史的研究著作,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元朝经济史的断代通论性著作，对元朝的土地制度、农业经济、畜牧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海外贸易、交通运输、货币、赋税等问题都有详细阐述。陈喜忠《中国元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采用经济发展事实与经济管理思维模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梳理了元朝经济的发展过程，注重挖掘元朝经济史中对当代经济管理有借鉴价值的内容。陈高华等《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 年版)虽晚出，但后来居上，从生态环境，人口、民族和阶级，经济管理机构，农业生产概况，农业政策与管理，土地制度，手工业，牧业和渔业，交通运输，货币制度，商业和高利贷，海外贸易，户籍制度，税粮制度，科差制度，诸色课程，杂泛差役，和雇、合买与和籴，财政等方面，系统、全面地考察了元代经济的生态环境、经济制度、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管理机构等问题，全面提升了元代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此外，吴宏歧《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7 年版)、高树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修晓波《色目商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等论著，也都是研究元朝经济史的专题性著作。

3. 政治史研究

通论性著作中，最先出版的是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对契丹民族的构成、建辽以前的汗位继承、建辽初期的帝位继承与纷争、辽朝统治政策的演变与汉人地位的提高、辽朝后期的内部政治斗争与西迁、辽朝瓦解以后的契丹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赵绍铭《中国宋辽金夏政治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重点叙述了宋、辽、西夏、金等国各自建立的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政治法律制度，认为各个政权并立、军事上相互征伐、经济上互通有无、相互交往不断扩大，为各民族融合和统一创造了重要条件。高树林等《中国改革通史》第 6 卷《辽夏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论述了辽、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改革情况；王岗《中国元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从政治事件、典章制度和政治人物三个方面分析了元朝政治发展概况，对元朝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政治事件和人物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政治制度史研究方面，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 7 卷《辽金西夏卷》、第 8 卷《元代卷》(均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对辽、金、西夏和元朝的政治制度作了全面梳理，是为综论性的代表著作。在专论著作中，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上编通论女真奴隶制国家政治制度和金王朝封建

政治制度，下编分论金朝封建汉官制度中的女真族特色和综论金朝政治制度的演进、结构及其历史地位，从不同国体与政治的角度对金朝政治制度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整体论述。关于元朝的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主要有孟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中华书局 1980 年版)、高文德《蒙古奴隶制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 1987 年版)、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张金铣《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舒炳麟《元典章研究》(黄山书社 1995 年版)、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则全面阐述了元朝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4. 军事史研究

在军事史研究方面，通论性著作以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通史》第 12 卷《北宋辽夏军事史》、第 13 卷《南宋金军事史》、第 14 卷《元代军事史》(均为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为代表，系统、全面地讲述了这一时期的各种军事情况，篇幅最大，水平最高。此外还有刘庆等《中国宋辽夏金军事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吴秀永《中国元代军事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张晓生等《中国古代战争通览(三)北宋辽西夏金代——清代》(云龙出版社 1990 年版)、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等。在军事制度研究方面，则有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和王曾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赵继颜《中国农民战争史・四・宋辽金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则系统讲述了宋辽金元时期的农民战争情况。

5. 法制史研究

在法制史研究方面，出版著作不多，主要有曾代伟《金律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1995 年版)、王天顺主编《西夏天盛律令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8 年版)、奇格《古代蒙古法制史》(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吴海航《元代法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六卷

“元”(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对元代各方面的法制建设亦有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史金波等将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译成汉文出版(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为研究西夏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6. 社会史研究

在综合性著作中,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第四册《宋元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全面考察了这一时期社会史的各个方面,具有很高学术价值。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作了全面叙述。柯大课《中国宋辽金夏习俗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则主要是讲述当时的社会习俗问题,认为当时的习俗有两大特点,一是城市习俗兴旺发达,二是多民族习俗大交流、大融合。

专论辽朝社会史的研究著作,主要有田广林《契丹礼俗考论》(哈尔滨出版社 1995 年版)、张国庆等《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版),分别对辽朝社会的礼俗和生活习俗进行专门研究。

专论金朝社会史的研究著作,代表作是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此书以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金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金朝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的地位与生活,金朝的饮食与衣着、住所与交通工具、婚丧礼俗、宗教信仰、学校教育与伦理道德、文娱与体育、岁时风俗与其他相关内容,着力介绍了金朝统治下汉族与女真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认为女真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既有民族压迫的因素,也是民族融合的表现。王可宾《女真国俗》(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分上、中、下三编,分别探讨了辽金时期女真人的婚姻家庭形态、民族社会制度以及命名、继承等民族社会习俗。于杰等《金中都》(北京出版社 1989 年版)、景爱《金上京》(北京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白玉奇主编《大金国第一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则考察了金朝中都与上京两个都城的情况。

专论元朝社会史的研究著作相对多一些,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和秦新林《元代社会生活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对元朝的行政区划与生态环境、人口分布与身份职业、民族分布与文化交流、婚姻与家庭、服饰、饮食、皇室住房与御用品、居民的居住条件、民间主要生活用具、交通与通信、丧葬习俗、礼节等内容,按照各自的理解,进行了详细论述。此外,那木吉拉《中国元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刘晓《元朝的家庭、家族与社会》(中

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和《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 1996 年版)、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等著作,从生活习俗史、家庭家族状况、城市史以及思想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方面,梳理和分析了元代社会的基本面貌。

7. 民族史、边疆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

在民族史和边疆史研究方面,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综合论述了契丹、女真、奚、渤海、乌古、沙陀、党项、回鹘等民族的各自形成与发展过程。罗贤佑《元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对元朝统治下的各少数民族状况进行了全面考察。此外,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王慎荣等《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王禹浪《金代黑龙江述略》(哈尔滨出版社 1993 年版)、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田卫疆《蒙古时期维吾尔族人的社会生活》(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5 年版)、尚衍斌《元代畏兀儿研究》(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等,都是研究这一时期民族和边疆史的专题著作。邱树森《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杜玉亭等《云南蒙古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申友良《中国北方民族及其政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都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少数民族进行了详细论述。王玲《北京通史·辽代卷》、于光度等《北京通史·金代卷》(均为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则分别论述了辽、金统治下北京的历史发展面貌。

在民族关系史研究方面,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4 年版),从宋辽关系的历史背景,宋辽间的平等外交关系——澶渊盟约的缔订及其影响,辽的对宋政策与贸易,北宋庆历改革前后的外交政策,北宋朝野人士对于契丹的看法,王安石的对辽外交政策,宋、高丽与辽的三角外交关系,从宋诗看宋辽关系,对于北宋联金灭辽政策的一个评估九个方面,全面勾勒了宋辽关系史的发展历程,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版)，从民族平等的观念出发，以北宋政治运行机制为切入点去探寻宋与西夏交往的发展轨迹，紧紧抓住“时战时和”这一宋夏关系的最重要特征，分别论述了北宋对西夏政策的演变、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宋夏间的战争和贸易、宋夏缘边的边城寨堡、辽朝和吐蕃与西夏的关系、宋夏交聘等问题，再现了宋夏交往的历史全过程，深入探讨了宋夏战争的目的、宋朝未能吞并西夏的原因及宋夏关系对当时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对西夏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对西夏与宋朝、吐蕃、回鹘、金朝、蒙古之间的民族交往进行了研究。赵永春的专题论文集《金宋关系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通过考察宋金“海上之盟”、金宋和战、宋金交聘制度与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对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及其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胡昭曦主编《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将南宋与蒙古、元朝关系的发展分为七个阶段，详细梳理了双方和战关系的始末经过及最后元朝灭宋、统一全国的过程。此外，王辅仁等《蒙藏关系史略》(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都专门谈到这一时期主要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问题。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陈高华等《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从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活动状况、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和法令、各贸易港口的发展状况、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原因及其对宋元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系统论述了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情况。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则专门探讨元代一朝海外贸易的发展情况。

8. 思想文化史研究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通论性著作主要有周湘斌等《中国宋辽金夏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秦志勇《中国元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此外，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也有相关内容。

在宗教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张践《中国宋辽金夏宗教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苏鲁格《中国元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郭鹏《宋元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王宗维《元代安西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甘肃文化

出版社 1998 年版)等。

在科技史研究方面,管成学《宋辽夏金元科学技术史》(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年版),综合论述了宋、辽、夏、金、元各代的数学、天文、医药、地学与水利、矿冶与陶瓷、建筑、纺织、酿酒、农学等领域的成就,并探讨了这一时期的科学思想。此外,还有郭志猛《中国宋辽金夏科技史》、云峰《中国元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则是对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展开专门研究。

在文化史研究方面,冯继钦等《契丹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孟广耀《儒家文化:辽皇朝之魂》(哈尔滨出版社 1994 年版)、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等著作,分别探讨了辽朝和西夏的文化发展情况。

在教育史研究方面,主要有方平《辽金元教育史》(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后者全面考察了元代书院的创办、建设情况,认为元政府在鼓励书院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书院的官学化,扼杀了书院的独立性。

在史学史研究方面,主要有王瑞明主编《〈文献通考〉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等。

9. 人物研究

政治人物研究方面,主要有买群《辽太祖阿保机》(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李锡厚《耶律阿保机传》(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张桂岩《耶律阿保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年版)、张廷荣等《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纪宗安《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刘肃勇《金世宗传》(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版)、王占君《契丹萧太后》(华夏出版社 1991 年版)、王德忠《萧太后传》(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李丹林等《萧太后评传》(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郭长海等《金帝后妃全传》(哈尔滨出版社 1998 年版)、郭长海《金代名臣名将传》(哈尔滨出版社 1998 年版)、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韩儒林《成吉思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朱耀廷《成吉思汗全传》(北京出版社 1991 年版)、周良霄《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黄时鉴《耶律楚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陈庆英《元朝帝师八

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王启龙《八思巴评传》(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版)与《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纳为信《元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世家》(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邱树森《妥懽帖睦尔传》(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等。穆鸿利等《金代人物传》(学苑出版社 1992 年版)、白寿彝主编《回回人物志》第一册"元代"(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则是包括各类人物的综合性传记著作。

在思想家、科学家研究方面,有商聚德《刘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陈正夫等《许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潘鼐等《郭守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孔国平《李冶传》(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则是两位科学家的人物传记著作。

10. 重要论文集

集体性文集主要有《历史研究》编辑部《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史论丛》(第 1、2 辑)(中华书局 1985、1991 年版)、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3 辑(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于 1987 出版)、中国辽金史学会编辑《辽金史论集》(第 4、5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文津出版社 1991 年版)、张畅耕主编《辽金史论集》第 6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穆鸿利等主编《辽金史论集》(第 7 辑)(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干志耿等主编《辽金史论集》(第 8 辑)(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徐振清等主编《辽金史论集》(第 9 辑)(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宋德金等编辑《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鲍海春等主编《金史研究论丛》(第二届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哈尔滨出版社 2000 年版)、纪兵等主编《阜新辽金史研究》(1—4 辑)(分别为香港新天出版社 1992 年版,1995、1997 年内部出版,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 年版)等。个人文集主要有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 1984 年版)、冯家昇《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 1987 年版)、张博泉《女真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

关于西夏史研究领域的论文集,集体性文集主要有白滨编辑《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宋德金等编辑《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等。个人文集主要有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等。

关于元史研究领域的论文集，集体性文集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史论丛》(第1、2辑)(中华书局1985、1991年版)、中国元史研究会主办《元史论丛》(7辑)(第1—4辑由中华书局1982、1983、1986、1992年出版，第5、6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997年出版，第7辑由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以"南京大学学报专辑"的形式主办了《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3辑(2001年前)，中国蒙古史学会主办了《蒙古史研究》6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5、1986、1989、1993、1997、2000年版)，沙日勒带等组稿编辑了《成吉思汗研究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个人文集主要有：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杨志玖《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版)，袁冀《元史论丛》、《元史研究论集》(均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元朝史新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王明荪《宋辽金史论文稿》(台湾明文书局1981年版)等。

七、明清史研究①

以下分三个阶段概述20世纪后半期的明清史研究。

(一) 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

1. 通论性断代史著作

这一时期出版的明清断代史研究著作不多，主要是由一些专家的讲稿修订而成。最先出版的是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是在大学讲义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的明清史著作。叙述了从元末农民起义到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四百多年的明清历史，史料翔实，并根据两朝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将这一时期的历史分成五个时期，有较高理论水平，是50年代、60年代高校明清史教学的主要参考书。谢国桢《南明

① 本节参考了以下论著：南炳文：《20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李小林等主编：《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陈生玺等：《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钞晓鸿：《明清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万明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明史研究》，林存阳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清史研究》，均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谢保成等：《中国史书目提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主要论述和评介了南明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历诸政权的兴亡变迁,兼及荆襄巴东的农民起义、韩王政权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因此是一部较完整的明清之际的政治变革史。郑天挺《清史简述》,是他1962 年在中央高级党校所作学术讲演的记录稿,1980 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的清朝断代史。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清朝入关以后到鸦片战争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高屋建瓴,总揽清朝特点,抓住关键问题,尽管简单,但还是有很多创见,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此外,还有李光壁《明朝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包遵彭主编《明史》(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部 1962 年版)等。

2. 经济史研究

(1) 明代经济史

主要著作有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等,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 1957 年版)中也有相关内容。其中,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系统论述了该制度的产生、演变和破坏过程,分析了粮长的职务、特权和经济掠夺方式,阐明了粮长制度和里甲制度的关系及对人民的祸害。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主要论述黄册制度的形成及其内容、黄册制度建立初期所起的作用、黄册的管理工作情况、从黄册制度看明代官僚政治、黄册制度的瓦解等。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上编叙述明代军屯的制度和作用,主要内容是军屯的历史渊源、建置、经营、旗军拨屯比例、军余顶种、军屯分地、屯田子粒、军屯作用等,下编叙述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及军屯的破坏。

(2) 清代经济史

主要著作有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 1957 年版)、徐兆奎《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景苏等《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三联书店 1962 年版)、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周宪文《清代台湾经济史》(台湾银行 1957 年印)、刘家驹《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台湾大学文学院 1964 年印)、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3 年印)等。其

中，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是系统研究清朝关税的重要著作，不但扼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户部关和工部关的设置及征税制度，而且也论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和关税权被侵占的史实。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系统论述了清代制钱的铸造、制钱的重量、制钱的成分、制钱材料的采购、私铸与私销，银两在清朝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称量银两的各种"平"（库平、漕平、广平、关平等）、银钱比价的变动，晚清的通货膨胀，传统的金融机构以及外国金融势力的侵入等问题，条分缕析，甚为详细。

（3）明清两代经济史

主要著作是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 1960 年版），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等。傅衣凌上述两本著作和其《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主要论述了他对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孔经纬《中国经济史略》（明清至抗战前）（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的第一、二章论述了鸦片战争以前明、清经济发展问题。

这一时期，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主要著作有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1956 年版）、傅筑夫等《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吴海若《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萌芽》（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傅筑夫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关梦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等。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二册）（北京三联书店 1957 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北京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等。

3. 政治史研究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北京中外出版社 1950 年版），从各个角度对明朝的中央集权状况、特务政治、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等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特务机关的设置以及他们对政治的控制、对经济的搜刮、对军事的监督、对官员的侦缉与残杀等，此书影响深远，至今仍是研究明代政治的重要参考书。李棪《东林党籍考》（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以人物传的形式，每人各为一传，考证东林党人的事迹。此外还有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版）、朱

杰勤《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方文图《郑成功收复台湾》(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等。

(1) 政治制度

主要有任长正《明清的内阁制度》(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版)、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三联书店1959年版)等。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是作者搜集各种事例、章程及诸家零星笔记所编而成,分为沿革、组织、影响三篇,介绍捐纳制度的利弊得失,内容详细,资料丰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2) 军事史、农民战争史

主要有刘阶平《从白阳传疏论晚明军政》(台北华国出版社1951年版)、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张毓芬《李自成起义》(大中国图书局1952年版)、新兴《李闯王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邢汉宸《李自成》(中华书局1959年版)、袁定基《张献忠》(中华书局1963年版)、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中华书局1960年版)、胡亦声《李定国》(中华书局1960年版)、林振镛《张煌言抗清十九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云川《吕梁英雄抗清兵》(山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端已《西北回族的反清斗争》(上海四联出版社1954年版)、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林幹《清代回民起义》(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胡大冈《林清李文成起义》(中华书局1964年版)等。其中,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主要包括明末社会的主要特点,明末农民战争的发展阶段,从陕西起义到李自成、张献忠两大主力集团军的形成,农民军粉碎明朝封建统治的决定性阶段,清军入关后农民战争形式的转变及其失败,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明末农民战争的几个问题七个部分,是一部资料翔实的力作。

(3) 政治人物

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吴晗第四次修订的《朱元璋传》(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记述明代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生平事迹,从年轻时的苦难生活,到走上农民革命战争道路,再到成为皇帝后的种种事迹。此书不但叙述生动翔实,而且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等人的传记,如丁慰长《于谦》(浙江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赖家度等《于谦和北

京》(北京出版社 1961 年版)、蒋星煜《海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和《况钟》(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谢承仁等《戚继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徐素《袁崇焕》(香港中华书局 1959 年版)、北京市第一〇一中学历史组《袁崇焕》(中华书局 1960 年版)、金家瑞《张煌言》(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版)、李振华《明末孤臣张苍水传》(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 年版)、方白《郑成功》(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5 年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郑成功传》(台北台湾银行 1960 年版)、李树桐《郑成功》(台北华国出版社 1953 年版)、朱偰《郑成功:明末解放台湾的民族英雄》(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张习孔《史可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魏宏运《史可法》(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版)、邢露申《夏完淳》(中华书局 1960 年版)、胡昭静《努尔哈赤》(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等。

4. 民族史与对外关系史研究

(1) 民族史

莫东寅《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从明初女真族的社会形态、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八旗制度、清初满族的萨满教四个方面,研究了满族历史的发展变化。

赖家度等《明朝对瓦剌的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论述了蒙古族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与明朝的和战关系、经济交流情况,对 15 世纪中叶明朝抵御瓦剌来犯的活动给予赞颂。此外,周一良《明代元朝抗倭战争》(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简要介绍了战争的背景、经过及其结果。

(2) 对外关系史

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版),从政府和私人两方面简要概括了明代的海外贸易状况。田汝康《17—19 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从帆船这一独特视角,探索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此外还有陶秋英《郑和下西洋》(上海四联出版社 1954 年版)、朱偰《郑和》(北京三联书店 1956 年版)、李光壁《明代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三联书店 1959 年版)、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等。

5. 思想文化研究

侯外庐在 1956 年将旧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充实修改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对 17—19 世纪中叶的启蒙思想作了详细的介绍,

对这一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龚自珍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后，他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都是论述明清时期思想史的力作，至今影响不衰。谢国桢出版修订版《黄梨洲学谱》（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加强了对黄宗羲著作和思想的分析批判。此外还有谢国桢《顾亭林学谱》（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张舜徽《顾亭林学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和《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汪毅《王船山的社会思想》（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郭霭春《颜习斋学谱》（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下册乙编也都有相关内容。目录学家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错误之处进行辨证。嵇文甫《王船山史论选评》（中华书局1962年版），选取王夫之的史论文章，逐篇加以评论，重点是阐发王夫之的政治思想和历史哲学思想。

在台湾地区，主要有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版）、吴康《宋明理学》（台北华图出版社1955年版）、丁仁斋《王阳明教育学说》（台北复兴书局1955年版）、钱穆《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版）、张君劢《比较中日阳明学》（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等。其中，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分五十六目，自宋学之兴起，下迄晚明遗老，将此六百年间理学发展衍变之迹，溯源穷流，作简明扼要的叙述；《阳明学述要》则把王阳明置于理学发展史中加以考察，以精练的笔法，勾勒王学之大纲与流变，指出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等问题，贡献了独特的“良知”理论。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许多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药学家、地理学家的传记，主要有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50年版）、朱谦之《李贽：16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容肇祖《李贽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张慧剑《李时珍》（上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赵俪生《顾炎武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汪江《顾炎武》（中华书局1965年版）、周中民《王船山》（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周辅成《戴震：18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杨培之《颜习斋与李恕谷》（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陈登原《金圣叹传》（香港太平书局1963年版）、宋越伦《朱舜水传》（台北“中央

文物供应社”1953年版)、侯仁之《徐霞客》(中华书局1961年版)等。此外还有综合性的人物传记,如杨廷福《明末三大思想家》(上海四联出版社1955年版)等。

在科技方面,傅振伦出版有《明代瓷器工艺》(北京朝花美术出版社1955年版)。

6. 重要论文集

这一时期出版的论集主要有吴晗《读史札记》(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李光壁编《明清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王钟翰《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秦佩珩《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黄云眉《史学杂稿订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侯仁之《步芳集》(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王船山学术讨论集》二册(1965年版)、台湾大陆杂志社编《元明史研究论集》(台湾大陆杂志社1960年版)等。中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孟森的明清史研究论文,也由其学生商鸿逵整理出版了论文集《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

(二) 1966年5月至1978年12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明清史研究几乎没有学术成果可言。

“文革”结束后至1978年12月,是一段过渡时期,大陆学术界仍比较沉闷。

台港的明清史研究,则成果不少。

断代史方面出版有汪荣宝《清史讲义选录》(台湾银行1966年印)、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四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胥端甫《明清史事随笔》(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毛一波《南明史谈》(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苏同炳《明史偶笔》(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存萃学社《清代掌故缀录》(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版)、肖一山《清代通史》(1—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庄练《明清史事丛谈》(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版)、彭国栋《重修清史本纪》(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民族与华侨研究所东北研究所1977年版)、陈捷先《清史杂笔》(二册)(台北市学海出版社1977年版)等。

政治史方面出版有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陶希圣等《明清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余贻泽等《明代土司制度》(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钱穆等《明代政治》(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苏同炳《明代驿递制度》(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9年版)、王云五《明代政治思想》(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69 年版）和《清代政治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0 年版）、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台湾人事行政月刊社 1971 年版）、徐炳宪《清代知县职掌之研究》（台湾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 1974 年版）、马起华《清高宗朝之弹劾案》（台北华冈出版部 1974 年版）、张溯崇《清代刑法研究》（台北华冈出版部 1974 年版）、罗云《细说清代国防》（台北祥云出版社 1975 年版）、刘兆璸《清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77 年版）、凌林煌《清代内阁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等。

军事史、农民战争史方面出版有罗云《细说清代战争》（台北祥云出版社 1975 年版）、智夫成《李自成农民起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翟玉树《清代新疆驻防兵制的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 1976 年印）等。

民族边疆史方面出版有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之二十，1966 年印）、张德昌等《明代国际贸易》（台湾学生书局 1968 年版）、杨中揆《中国·琉球·钓鱼台》（香港九龙友联书报发行公司 1972 年版）、杨正孝《清代理藩院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民族与华侨研究所 1974 年版）等。

经济史方面较少，有孙媛贞《明代经济》（台湾学生书局 1968 年版）等。

文化思想史方面出版有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清职贡图选》（台湾银行 1963 年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清奏疏选汇》（台湾银行 1968 年印）、高准《黄梨洲政治思想研究》（台湾阳明山华冈文化书局 1967 年版）、陶希圣等《明代宗教》（台湾学生书局 1968 年版）、高广孚《陆王教育思想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 1970 年版）、黄公伟《宋明清理学体系论史》（台湾幼狮书店 1971 年版）、王云五《明清教学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台湾中华书局 1971 年版）、王开府《王阳明致良知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3 年版）、麦仲贵《王门诸子致良知学之发展》（香港中文大学 1973 年版）、蔡仁厚《王阳明哲学》（三民书局 1974 年版）、王云五《王阳明教学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刘昭红《戴东原思想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 1974 年版）、方俊吉《高邮王氏父子学之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74 年版）、邓元忠《王阳明圣学探讨》（台北正中书局 1975 年版）、陈忠成《王船山研究》（台北撰者 1975 年印行）、丁榕萍《明代国子监教育与科举之研究》（台湾华光书局 1975 年版）、徐玉虎《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 1976 年版）等。

人物传记方面出版有苏雪林《南明忠烈传》（下）（台北商务印书馆 1966 年版）、

徐宗泽《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0 年版)、方闻《傅青主先生大传》(台北中华书局 1970 年版)、金云铭《陈第年谱》(台湾银行 1972 年印)、姜公韬《王弇州的生平与著述》(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三十九,1974 年印)、高阳《明朝的皇帝》(台湾学生书局 1974 年版)、陈忠成《王船山研究》(台北撰者 1975 年印行)、周荣静《张江陵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 1975 年版)、金儒杰《李贽新评》(香港神州图书公司 1975 年版)、黄典权《郑成功史事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古清美《黄梨洲之生平及其学术思想》(台北撰者 1975 年印行)、褚向鹃《黄梨洲学术思想研究》(台北"中央图书出版社"1976 年版)、李光涛《熊廷弼与辽东》(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6 年版)、王进祥《朱舜水评传》(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蔡营源《钱谦益之生平与著述》(台湾苗栗县撰者 1977 年印行)、张西堂《王船山学谱》(台北文星书店 1965 年版,台北商务印书馆 1967 年版)等。

论文集有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香港崇文书店 1—2 集 1972 年版,3—5 集 1974 年版)、周康燮主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六,章学诚研究专辑,香港崇文书店 1973 年版)、台湾大陆杂志社编《明清史研究论集》(台湾大陆杂志社 1967 年版)、李光涛《明清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傅崇懋《清制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等。

(三) 1978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潮流,学术研究开始健康发展,大陆的明清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全新阶段。

1. 通论性断代史著作

这一时期,在断代史研究方面出版著作很多,主要有吴晗《明史简述》(中华书局 1980 年版)、辽宁清史简编编写组《清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 1980、1984 年版)、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和《清朝兴亡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清史编年》(1—12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2000 年版)、汤纲等《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册 1985 年版,下册 1991 年版)、李洵等主编《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1—10 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1993 年版)、南

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杨国桢等《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史仲文等《新编中国明代史》(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张仁忠《明清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王戎笙主编《清代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魏千志《明清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戴逸主编《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杨钟贤《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戴逸等主编《清通鉴》22 册(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章开沅主编《清通鉴》4 册(岳麓书社 2000 年版)、吴孟雪《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等。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996 年版)记述了明朝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前期的历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则是记述晚清即近代时期的历史。范文澜和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共三册(人民出版社 1986—1993 年版),《中国史稿》编写组编写《中国史稿》第六册、第七册(人民出版社 1987、1995 年版)分别记述了明朝和清朝的历史。在台湾出版有黎杰《清史》(台北九思出版社 1978 年版)、吴漱溟《大清》(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 1978 年版)、姜公韬《明清史》(台北长桥出版社 1979 年版)等。

在以上诸书中,戴逸主编《简明清史》首次以 2 册、72 万字的篇幅,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清朝从兴起、发展、繁盛以至鸦片战争前衰落的历史,对经济发展、阶级关系、边疆统一战争、农民起义、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都做了重点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观点,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准的清朝断代史著作。辽宁清史简编编写组《清史简编》也很有特色,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评价。汤纲等《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出版的第一部明朝断代史,填补了明史研究中的空白,详细论述了明代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各阶级阶层的地位、人民的反抗斗争、上层建筑的各种演变,以及各种人物的具体活动,并善于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理论分析和概括,有很多独到的见解。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是根据郑天挺生前拟定的提纲,遵循他的清史见解,由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写而成。依各个皇帝在位的朝代设章分节,全面叙述了从满族兴起到鸦片战争前的清朝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同时又注意以专门章节集中叙述相关专题,重点突出而又内容丰富,并善于挖掘清代历史中富有特色的内容,在朴素扎实的史实陈述中显现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10

卷，自满族兴起写到清朝灭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风俗等各个方面，资料翔实可靠，论证周密严谨，并吸收了当时国内外的清史研究成果，是一部有很高研究水平的大型断代清史著作。顾诚《南明史》记述了从1644年大顺军占领北京至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倾覆的历史，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郑成功队伍等民众的抗清斗争为论述的主线，使该书的论述范围得到扩大，对许多问题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被认为是代表了南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另外，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分为清史简况、典章制度、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学术文化四编，简要叙述清朝从兴起到灭亡的历史，重视制度史与社会生活，是其区别于其他同类著作的鲜明特色。

2. 经济史研究

（1）断代经济史

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系统论述了明清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繁荣、萧条、危机和衰落的过程，考察了多种经济形态的产生和演变，探索了明清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此后有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三谋《明清财经史新探》（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郭蕴静《清代经济史简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清代商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吴量恺《清代经济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庞毅《中国清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高王凌《18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对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方行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等。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明朝经济史的断代著作，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从社会构成与经济变迁的角度探索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认为明清社会经济是一种倾斜型的经济形态。其中郭蕴静《清代经济史简编》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清朝经济史的断代著作；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从明代的疆域和资源入手，全面考察了这一时期土地的整理与经营，赋役制度，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官府手工业、民间手工业的规模发展，商业的繁荣与兴盛，货币政策与货币运行，交通、市镇经济的发展，食盐生产与运销，茶业管理体制与贸易以及明代的经济思想等内容，资料丰

富，论述详明，有很多独到观点，代表了目前明代经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方行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分为农业、手工业、商品流通、土地分配、地主经济、农民经济等六篇，对清代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经济机制和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地研究，提出了很多新资料、新问题和新观点，代表了目前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2）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时期也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中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是关于农业领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第一本专著，对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前提和表现提出了新的见解；李文治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系统阐述了明清时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该领域的代表作品。此外还有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3 年版）、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其中以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最为系统全面。

（3）土地赋税

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明代的官田和民田、均田和均粮运动的由来、发展及意义等问题。此外，周远廉等《清代租佃制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袁良义《清一条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等都是专题研究的代表作品。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则具有通论性质。其中，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

纲》，详细考察了明清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地主阶级与地主经济、农民阶级与农民经济、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农民生产的发展与后期封建经济社会等问题，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从社会经济结构探讨社会变革和动乱，从阶级结构、阶级斗争说明它如何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而又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主要是考察明清时期封建土地关系的发展趋势，全书从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入手，详细考察了当时的地租情况，最后对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展开讨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4）盐铁漕运

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等《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张学君等《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黄启臣《14—17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文治等《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明代茶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其中，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李文治等《清代漕运》是专门研究明清两代漕运制度发生和演变的高水平著作。

（5）地方经济

地方经济的研究多集中于南方地区，其中又以江南市镇经济的研究用力最勤、成果最多。同时，学者们对于某一城镇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类著作有广东历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14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傅衣凌等《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彭雨新等《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

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罗仑《苏州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范金民等《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 1993 年版)、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王致中等《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 1989 年版)、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吕卓民《明代西北农牧业地理》(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0 年版)、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杨余练主编《清代东北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栾凡《一种文化边缘地带的特有经济类型剖析:明代女真族的多元经济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等。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是有关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综合性论著。

(6) 农村经济

主要有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5 年版)、王晋新《15—17 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戴逸主编《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等。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是一部论文集,但主题比较集中,主要是论述农业商品生产与社会经济结构、城乡农副产品加工工业的商品生产、市场网络与市镇群体、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意识与民情风俗的冲击等内容。

(7) 其他

其他明清经济史类著作还有柳义南《李自成经济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刘翠容《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1992 年版)、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 1993 年版)、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李绍强《明清工商业形态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等,这些专著从不同角度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其中,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是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也是专门研究该问题的惟一著作,其导论部分论述了高利贷资本的概念、历史作用及其向近代借贷资本的转化等理论问题,然后分章论述了明清官府及民间各类财富向高利贷资本的转化,估算了清代典当资本的总量及典当资本的城乡分布问题;叙述了明清高利贷资本的组织方式的变化,主要论述了合伙制的类型及其在工商业、高利贷中的活动,分析了存款、放款的各种形式,探讨了明清两代放款利率的情况、政府利率管理政策及利率的层次结构、演变趋势;叙述了明清时期农村和城市中各种生活性借贷和生产性借贷的情况,探讨了明清高利贷资本与农村小农再生产的关系,与城市手工业、商业以及矿冶、航运等各行业的关系,揭示了一些地区行业中存在的资金供求关系走向稳定化及高利贷资本向近代借贷资本转化的历史趋势。以往关于高利贷资本的研究,多从高利贷利率的高昂及其对小生产者剥削的残酷性出发,对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本书则将高利贷明确区分为“生活性、消费性”借贷和“经营性、生产性”借贷两种不同性质的借贷关系,指出前者对社会生产造成危害,后者则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观点和理论上都实现了突破,这是此书最主要的学术贡献。

3. 政治史研究

毛佩琦等《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明代政治发展演变过程,是该领域较早较有分量的著作。赵轶《宸衷独断:明初皇权政治及其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严嵩与明代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冷东《叶向高与明末政坛》(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尚英《明末东林党》(中华书局1983年版)、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温功义《明代的宦官和宫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则是是从某一个角度,探讨明代政治及政局变动的专门著作。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政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是专门研究18世纪的清朝政治史的著作。郭成康等《清朝文字狱》,是专门考察清代文字狱这种政治现象的著作。更多的著作则是关于明清两代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人物的传记等。

(1) 政治制度史

关于明代政治制度史，先后出版有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韦庆远《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中华书局1985年版)、龚荫《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王春瑜《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温功义《明代的宦官和宫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梁希哲和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薇言《明代的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关文发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罗东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怀效锋《明清法制初探》(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王兴亚《明代行政管理制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其中，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明代国家各级机构的设置、职能、特点及运转，剖析了明代国家机构的实质和作用；关文发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明代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第二部分则考察明朝对各级、各类官员进行培养与管理的辅助性体制，作者认为，明代政治制度的变革，始终围绕着强化皇权进行，其中含有极其丰富的制衡与均衡的关系。王兴亚《明代行政管理制度》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对明代的政治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总结了明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基本特点。

关于清代政治制度史，主要有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杨启樵《雍正帝及其秘折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张晋藩等《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玉芬《清朝皇嗣制度》(大连出版社1991年版)、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苏发祥《清代治理西藏政策》(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等。其中,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分中央系统各机关、地方各机关、清末新设与改革的各机关三编加以考察,各类机关之叙述,按其重要性分别详略;对各机关的沿革只叙述其主要变革,着重在环节性的改革;在介绍机关总人数时,分别注明满、蒙、汉籍,亦略述其职官人数,以见其用人行政之政策和规模;对一些机关的重大变革,尽可能找出它们各自具体的原因如政治、军事、经济之变化等,以见其发展情况,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是研究清朝鼎盛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思想,视角独特,影响很大。

这一时期,台湾出版的相关著作有王寿南和陈水逢《明代中央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杨雪峰《明代的审判制度》(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8年版)、傅显达《明代翰林院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1978年版)、朱沛莲《清代之总督与巡抚》(台北编者1979年印)、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版)、杨树藩《明代中央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和《清代中央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张伟仁《清代法制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庄吉发《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等。

(2) 军事史、农民战争史

军事史方面的著作,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通史》第15卷《明代军事史》、第16卷《清代前期军事史》(均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全面叙述了明清时期的各种军事情况,篇幅最大,水平最高。此外还有戴鸿义《明代庚戌之变和隆庆和议》(中华书局1982年版)、杨旸《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赖福顺《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罗尔纲《绿营兵制》(中华书局1984年版)、孙文良《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毛佩琦等《中国明代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军事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等。其中毛佩琦等《中国明代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简明论述了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制度和重大战役。

对明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末农民起义,如高言弘等《明代广西农民起义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4 年版)、王纲《明末农民军名号考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 1987 年版)、李文治《晚明民变》(香港中华书局 1989 年版)、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王兴亚《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方福仁《李自成史事新证》(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谢承仁《李自成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李登弟《李自成年谱》(三秦出版社 1986 年版)、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等。

对清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主要有南炳文《清代苗民起义》(1795—1806 年版)(中华书局 1979 年版)、刘如仲《台湾林爽文起义》(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蒋维明《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吴万善《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等。

(3) 政治人物

有关政治人物的各种传记的出版,是本期明清史研究的一大特色,不但入传的人物很多,而且还往往一人多传,但质量也参差不齐。因为皇帝往往关涉到全国政局,因而成为人物研究的热中之热,总述明朝皇帝的有许大龄等《明朝十六帝》(紫禁城出版社 1991 年版),个人传记则有李唐《明太祖》(香港宏业书局 1978 年版)、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陈悟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和《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万明《明太祖本传》(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黄冕堂《朱元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 1989 年版)、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胡凡等《明成祖本传》(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何宝善《嘉靖皇帝朱厚熜》(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 年版)、何宝善《万历皇帝朱翊钧》(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版)、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和《崇祯传》(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等。20 世纪 90 年代,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明帝列传",包括赵毅等《正统皇帝大传》、李洵《正德皇帝大传》、林延清《嘉靖皇帝大传》、林金树等《天启皇帝大传》、张德信等《崇祯皇帝大传》(以上 1993 年出版)、吕景琳《洪武皇帝大传》、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赵中男《宣德皇帝大传》、方志远《成化皇帝大传》、郭厚安《弘治皇帝大传》、曹国庆《万历皇帝大传》(以上 1994 年出版)、韦庆远《隆庆皇帝大传》(1997 年)。此外,还有一些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明帝列传"之类的丛书。

清朝皇帝的传记有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涴《皇太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周远廉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钱宗范《康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白新良主编《康熙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白新良《乾隆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吉林文史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套"清帝列传",从建国皇帝努尔哈赤到末帝溥仪,全都写成传记出版。此外还有一些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清帝列传"之类的丛书。

关于朝廷重臣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相关论著有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刘志鹗《郑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张德信《明史海瑞传校》(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锦全《海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曹国庆《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曹国庆《严嵩年谱》(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肖少秋《张居正改革》(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隋淑芬《张居正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计红绪等《戚继光》(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范中义《戚继光评传:继往开来的军事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贾征《潘季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韩大成等《魏忠贤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李廷先等《史可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佩琦《郑成功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杨友庭《明郑四世兴衰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岳麓书社1998年版)、李治亭《吴三桂大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冯佐哲《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等。

此外,还有李侑霖、詹顺裕《开国英雄传·明清编》(台北庄严出版社1978年版),王思治等在1984年开始出版的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中华书局),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明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这些著作都属于综合性人物传记。

4. 社会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包括对社会群体的研究、对家族、宗族的研究以及对于区域社会状况的研究,这些都是明清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并且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由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第五册《明代卷》、第六册《清前期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这一时期社会史的各方面情况，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通论性著作。

其他综合论述明清两代的相关著作有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明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朱契《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住址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1992 年版）、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 1996 年版）、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曾少聪《东洋航海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年版）、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

专论明代社会史的著作有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 1991 年版）、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王熹《中国明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郑利华《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生活形态》（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 1996 年版）、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牛建强《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社会风尚理论拟构及其运用》（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7 年版）和《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杨国桢《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吴调公等《自在自娱自新自忏：晚明文人心态》（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

专论清代社会史的著作有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韦庆远《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杨学

琛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滕绍箴《清代八旗子弟》(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89 年版)、冯尔康等《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万依等《清代宫廷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李中清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钱杭等《17 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郝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清前期卷和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戴逸主编《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社会卷》(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高翔《近代的初曙: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王跃生《18 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 1781—1791 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等。

5. 民族、边疆与对外关系史研究

杨绍猷等《明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是第一部全面论述明朝境内各个少数民族状况的断代史著作。马汝珩等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马汝珩等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王戎笙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赵云田《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马汝珩等主编《清代边疆开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等,是全面论述清代边疆开发问题的通论性著作。其他有关明清民族与边疆史的研究著述主要有《满族简史》编写组《满族简史》(中华书局 1979 年版)、杨英杰《清代满族风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杨旸《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和《明代东北史纲》(台湾学生书局 1993 年版)、罗运治《清高宗统治新疆政策的探讨》(台湾里仁书局 1983 年版)、《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张羽新《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何耀彰《满清治蒙政策之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国学术

著作奖助委员会 1978 年版)、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顾祖成《明清治藏史要》(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7 年版)、高孔廉主编《明代蒙古史论》(台北"蒙藏委员会"1998 年印)、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 1989 年版)、乌云毕力格等《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戴逸主编《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境民族卷》(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等。

在对外关系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水平也超过了以往。相关成果有范中义等《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 1982 年版)、刘如仲《郑和下西洋》(中华书局 1983 年版)、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 1985 年版)、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 1993 年版)、姜龙范等《明代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王漪《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 年版)、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版)、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计文德《从四库全书探究明清间输入之西学》(汉美图书公司 1991 年版)、杨国桢等《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8 年版)、王亮《清季外交年鉴》(四卷)(台北"中央图书馆"1980 年版)、戴逸主编《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等。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从对外政策、涉外体制、中外关系重要事件、中外贸易四个方面,对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进行全面性的整体把握和研究。

6. 文化思想史研究

对明清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最多,而且由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不但开拓出实学思潮、心理思想等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多能突破旧说,提出新的认识。

属于通论性的著作主要有: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吴智和《明代的儒学教育》(台北学生书局 1991 年版)、张建仁《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汪前进《中国明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何其敏《中国明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祝平次《朱子学与明初理学的发展》（台北学生书局 1994 年版）、商传《明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龚鹏程《晚明思潮》（台北里仁书局 1994 年版）、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 1994 年版）、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燕国材《明清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何冠彪《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研究》（台北学生书局 1991 年版）、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广文书局 1978 年版）、杨向奎等《清儒学案新编》8 卷（齐鲁书社 1985—1994 年版）、南炳文《清代文化：传统的总结和中西交流的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 1989 年版）和《中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王俊义等《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姜广辉《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陈祖武《清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戴逸主编《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王成勉《明清文化新论》（台北文津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其他各种通史性论著如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也都有相关内容。其中，杨向奎等《清儒学案新编》，利用传统的学案体，以清代学术源流为纲，选取足以反映当时学术思想风貌的学者，每人各立一个学案，记述其师承、家学和交游等情况，论述其学术思想，并选录其主要观点和代表性论著原文，既对清代学术思想、哲学思想作出了总结，又起到了学术思想史料选编的作用，是一部集研究与资料于一体的学术史著作。

在专题研究方面，有关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的著述有沈善洪等《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张锡勤等《阳明心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邓艾民《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上海三联书店 1990 年版）和《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北京三联书店 1997 年版）、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方国根《王阳明评传：心学巨擘》（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吴光《阳明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等。

关于理学研究，主要著作有蒙培元《理学的流变：从朱熹至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版)、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张立文《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万卷楼图书公司 1993 年版)等。

关于其他哲学家的研究有姬秀珠《明初大儒方孝孺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1 年版)、张建业《李贽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禹克坤《李贽》(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敏泽《李贽》(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孙官生《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陈清辉《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衷尔钜《吴廷翰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姜国柱《吴廷翰哲学思想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李庆元《明代理学大师——薛瑄》(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3 年版)、葛荣晋《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和《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华书局 1990 年版)、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林子秋《王艮与泰州学派》(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古清美《黄梨洲之生平及其学术思想》(台湾大学文学院 1978 年版)、姚一苇《傅青主》(台北远景出版社 1978 年版)、高准《反专制主义大师黄梨洲》(台北大汉出版社 1980 年版)、黄秀政《顾炎武与清初经世学风》(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赵俪生《顾亭林与王山史》(齐鲁书社 1986 年版)、陈祖武等《旷世大儒——顾炎武》(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曹国庆《旷世大儒——黄宗羲》(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林继平《李二曲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王茂《戴震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郑涵《吕坤年谱》(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等。另外,匡亚明主编了一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其中涉及多位明清时期的学者。大抵这类人物传记著作相当繁复,可谓举不胜举,但其中内容也多有重复,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其他思想文化史著作还有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17、18 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版)、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林仁川等《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朱义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姜生等《明清道教伦理及其历史流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唐大潮《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至于文学、艺术等研究著作之多,更是难以指陈。

史学史研究方面,主要有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版)、庄吉发《清代史料论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彭国栋《清史文献志》(修订一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年版)、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4年版)、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清史史料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邢永福主编《明清档案通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版)、叶树声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中涉及的多为明清时期的史学名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

科学技术等研究方面,主要有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杨维增《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释》(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杨维增《天工开物新注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版)和《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施宣圆《徐光启》(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王欣之《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金涛《探索者的

足迹:大地理学家徐霞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杨文衡等《徐霞客》(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年版)、姚载熙《徐霞客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田尚等《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北京旅游出版社 1987 年版)、于希贤《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7 年版)、唐锡仁等《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吕锡《徐霞客家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钱远铭《李时珍研究》(广东科技出版社 1984 年版)、李裕等《李时珍和他的科学贡献》(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年版)、唐明邦《李时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戴念祖《朱载堉:明代的科学与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李迪《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等。

7. 重要论文集

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明清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重要领域,积累既厚,成果亦多,论文集出版方面有非常丰富的成果面世,主要有郑天挺《探微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和《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赵俪生《寄陇居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1 年版)、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7 年版)、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黄云眉《史学杂稿续存》(齐鲁书社 1980 年版)、王毓铨《莱芜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明清人物论集》(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黄冕堂《明史管见》(齐鲁书社 1985 年版)、李焯然《明史散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 1987 年版)、杨永安《明史管窥杂稿》(香港先锋出版社 1987 年版)、王毓铨主编《明史研究》(第三辑)(黄山书社 1993 年版)、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和《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及其《明清史新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陈文石《明清政治社会史论》(台北学生书局 1991 年)、刘家驹《清初政治发展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版)、存萃学社《清代学术思想论丛》(第一集)(台湾大东图书公司 1978 年版)、罗炳锦《清代学术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 1978 年版)、周康燮主编《历代农民起义论丛:清—民国》(香港大东图书公司 1978 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论文选集》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戴逸《履霜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王思治《清史论稿》(巴蜀书社 1987 年版)、王钟翰《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黄冕堂《清史治要》(齐鲁书社 1990 年版)、赵秉忠和白新良《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李洵《下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王春瑜《明清史散论》(东方出版中心 1996 年版)、南炳文《明清史蠡测》(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许大龄《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 年版)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自 1980 年以来一直编辑出版《清史论丛》(中华书局),各种学术讨论会也都相继编辑出版了论文选集。

李小林等主编《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陈生玺等《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是关于明清史研究动态的综述性工具书著作。

八、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史,当今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是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阶段的历史,也有认为下限至 1919 年五四运动。[①]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如果就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的历史事件来说,开始是较早的,比如研究鸦片战争,魏源 1842 年写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就是研究鸦片战争史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稍长时段的中国近代史,出版最早的著作是李平心(署名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 1933 年版),以后有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1946 年延安初版)等。相近的有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延安解放社 1938 年版)等。这些著作的理论框架、立场观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重要影响。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50 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时期:一、1949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二、1978 年 12 月至 2000 年。

---

①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下限的不同意见,可参见张海鹏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章第一节,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梁景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一) 1949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

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1. 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5 月

因为中国近代史包含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包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有重大的政治关系，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对现实有重大影响，并成为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的重要资源，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体现出了日益强烈的政治色彩。

1950 年 5 月从解放区进入北京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建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最早的研究所之一，①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最早设置的历史学专业研究机构。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设立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这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推动了相关人才的培养及研究队伍的建设。

政治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主流、主潮。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毛泽东著作蔚然成风，用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论断论述中国近代史成为时尚。唯心史观、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歪曲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美化帝国主义侵略、美化封建统治者等等思想观点被批判。这对于建立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历史研究的教条主义色彩、倾向。

为了按照历史研究的规律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相关资料工作大规模开展起来。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资料建设工程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详前)。此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一批中国近代档案史料，如:《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958 年出版)、《义和团档案史料》(1959 年出版)、《宋景诗档案史料》(1959 年出版)、《19 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1959 年出版)等。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整理出版也有丰硕成果(详前)。还重新影印出版了一批近代报刊，如《东方杂志》、《新青年》等等。国外的资料也略有搜集、整理、出版，如:《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资料选译》(1957 年)，《德国外交文件中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960

① 张海鹏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1 页。

年),等等。以上这些史料建设工程,不仅对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以后的研究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大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不少。以“中国近代史”为名的书约有70种左右,如:彭明《中国近代简史》(天津联合图书出版社1950年版;新华出版社1951年版;上海实习出版社1952年版),胡绳《中国近代史提纲》(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56年版),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上、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等。中国通史著作中的近代史部分有: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此册由刘大年主持编写)(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此册由邵循正、陈庆华编写)(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等。中国近代历史事件、人物的书出了100余种,如:姚薇元《鸦片战争史考》(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牟安世《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贾逸君《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陈旭麓《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章开沅《武昌起义》(中华书局1964年版),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汪永立《五四运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等。而“太平天国”的书出了30余种。其中有: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版27卷;中华书局1955年版33卷;中华书局1957年增订本版34卷),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等。还有《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等。表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展很快。

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基本线索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取得重要成果。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下限,20世纪50年代,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学术界大多定在1919年五四运动。①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基本上形成了:“一条主线”(阶级斗争);“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

①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下限的不同意见,可参见张海鹏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章第一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团运动、辛亥革命)。[①]这样的认识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色彩,但这样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历史还是有局限性的。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宁左勿右"社会心态的形成,及与之相伴随的引经据典风气、走极端的大批判论述方式,对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有影响,如1964年讨论李秀成功过就可看到此类影响。[②]

这一时期中大陆出版的较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主要是:

(1)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此书1946年延安初版后,就不断修订,至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9版。《中国近代史》(上册,初名"上编第一分册")论述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01年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其后的历史未及续写,即下册没有完成,甚是遗憾。此书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论"百年来的革命运动"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③]为理论框架论述了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把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清朝政府英勇斗争。从章节标题"可耻的鸦片输入者"、"腐烂的'天朝'"、"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所走的不同路线"、"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及附录《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就可以看到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和鲜明的人民群众立场观点。这对于把被剥削阶级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有重要意义。

当然也受到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局限。如第七章第六节"康梁维新派堕落成反动集团",政治观点鲜明,却未免否定太过,有失实事求是之意。这样的认识与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是密切相关的。此书依次写了鸦片战争(第一、第二章)、太平天国运动(第三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第四章)、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第五章)、甲午中日战争(第六章)、戊戌变法(第七章)、义和团运动(第八

---

① 参见张海鹏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四章第三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参见张海鹏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336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章),形成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来记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模式,对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2)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此书 1948 年由香港生活书店初版后,不断修订,至 1963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5 版(1996 年出版第 7 版)。并被翻译成英、俄、德、西班牙文。论述起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止于 1925 年五卅运动前夕。此书没有以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事件为章节的标题,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为主线,论述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历史事件,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在论述孙中山时谈到:“从孙中山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曾经在有些时候表现着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而在那样的时候,他就只能向封建军阀旧势力妥协,而并不能真正唤起广大人民来从事坚决的革命斗争。但他终于能接受失败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打破了这种幻想。他终于不顾一切地和工人阶级政党结成联盟,从而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立了起来,并且他这时已能明确地看出,只要真能依靠人民力量,帝国主义力量虽然强大,然而是不足惧的。这正是孙中山的伟大处。”①在论述五四运动时写道:“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彻底地反帝国主义的性质的人民爱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展开了。”“五四运动后二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人民清楚地看到,强大的帝国主义的阵营并不是不可以打破的。中国的革命既然开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并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中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就不能不展开新的面貌。”②这些论述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色彩。也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论断在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指导性地位。此书的理论观点、论述方式对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重大影响。

(3)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此书记述近代中国 1840—1919 年历史。尽管仍然以“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为框架,但也注意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化等的论述,并且论述了民族史。如第二章第三节“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早期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五

---

①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6 年第 7 版,第 195 页。
②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6 年第 7 版,第 164 页。

节“8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第三章第七节“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主要论述了经济的变化、发展。第一章第六节“19世纪中叶的文化和思想”，第二章第九节“19世纪后半期的科学和文化”，第三章第八节“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和思想变迁”等，主要论述思想、文化的变化、发展。第一章第五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西藏……”，第二章第二节“60至80年代的西南、西北各民族”。这使中国近代史的论述、编纂向横向贯通的“中国近代通史”方向发展。这是编纂“中国通史”，给中国近代史的论述、编纂带来的新气象。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论述中国近代史也注意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等的论述。这给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重大影响。

2.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文革”时期，一批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遭到迫害。李平心1966年6月15日含愤自尽。翦伯赞1968年12月18日含愤自尽。范文澜1969年7月29日抱憾辞世。华岗1972年5月17日被迫害致死。刘大年、黎澍、丁守和等遭批判，林增平、戴逸等也遭批判，停止中国近代史研究。

“文革”时期，因为政治的需要，也发表了一些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工农兵上大学后，中小学复课后，因为教学的需要，出了一些中国近代史的教材，如：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近代史》(1973年印)、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1973年印；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吉林师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1973年印)、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编写小组《中国近代史讲稿》(1974年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组《中国近代史》(试用本)(1974年印)、北京师范学院等《近代中国史稿》(1974年印)、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1975年印)、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简明中国近代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张玉春等《简明中国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还有沈阳站工人理论组、辽宁大学大批判组《中国近代史上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等。

出版事件史的书有：上海师范学院编写组《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编《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吉林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鸦片战争虎门人民抗英纪

念馆《鸦片战争虎门人民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编《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齐钟久《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关捷等《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中华书局1975年版),苑书义《太平天国反孔斗争》(河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北京化工设备厂工人理论组、北京师范学院师训班理论学习小组《太平天国反孔斗争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三结合编写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关捷等《袁世凯尊孔复辟丑剧》(中华书局1975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编写《辛亥革命后的几个短命政权(1911—1949)》(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等等。

这些书基本上都纳入了"文革"的政治轨道,政治色彩特别浓厚。主要特色是:应用领袖的论断论述中国近代史;用路线斗争史模式论述中国近代史;用儒法斗争史模式论述中国近代史;用大批判方式论述中国近代史。

此外,反帝斗争史、沙俄侵华史方面也出了一些书: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1840—1919)》(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史达《沙俄侵华简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历史真相不容歪曲》(1976年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戎疆《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辽宁师范学院政史系历史教研室《沙俄侵占旅大的七十年》(中华书局1976年版)……

这些书批判了西方国家、当时苏联对中国近代史、对中俄关系史的歪曲,政治色彩浓厚。同时,资料工作做得较扎实,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现以北京师范学院等《近代中国史稿》(1974年印)为例,看一下当时的中国近代史书是什么样的。

北京师范学院等《近代中国史稿》,是由北京师范学院、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学院和南开大学部分中国近代史教师组成的《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写的,自然也就是这六所学校都用的教材。

此书的扉页是"毛主席语录",选录了五条,其中有:"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

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①这表明，领袖的论断是此书论述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

从此书的章节目录来看，标题有："反鸦片侵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第一章第二节），"反对英法联军侵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第三章第一节），"路线斗争的激化和天京的变乱"（第四章第一节第一小节），"民族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两条路线的出现"（第七章第二节），"反抗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第八章第二节），"立宪派的请愿活动和革命派的武装起义'革'与'保'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第十章第三节）……以上可见把中国近代史写成两条路线斗争史。论述太平天国的标题有"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揭开反孔运动的序幕"，"金田起义与北上途中的反孔斗争"，"农民阶级反孔斗争的高峰"，"中外反革命以尊孔为纽带结成反动同盟"，"反对李秀成尊孔投降路线和抗击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等，此外"尊孔崇洋卖国反革命的洋务活动"（第五章第一节），"尊法维新的改良派和尊孔守旧的顽固派的大论战"（第七章第三节），"中外反动派联合尊孔绞杀义和团和《辛丑条约》的订立"（第八章第三节第一小节），"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成立，革命反孔和保皇尊孔的两条路线斗争"（第十章第二节），"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尊孔复辟的斗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第十二章），"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尊孔复辟的斗争"（第十二章第一节）……以上可见，把中国近代史写成了儒法斗争史。论述李秀成的标题有"江浙根根地的开辟和李秀成施'仁政'于地主官绅"，"洪秀全保卫安庆的战略决策和李秀成的消极对抗"，"抗击中外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和李秀成的叛卖活动"，可见对李秀成的全盘否定和走极端的大批判方式。在书中更是说：李秀成"从登上太平天国中央领导岗位开始，就力图推行一条保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尊孔投降路线"，"逐渐变成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地主阶级在太平天国内部的代理人"。②这不仅是对李秀成全盘否定的大批判，也包含了一些影射含义。"复辟"、"反复辟"、"革命"、"保皇"、"崇洋卖国"等，是"文革"时期的热门词语、话题，并有影射含义。

---

① 北京师范学院等：《近代中国史稿》，北京师范学院1974年印，扉页。
② 北京师范学院等：《近代中国史稿》，北京师范学院1974年印，第162页。

同时期，台港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但在正常进行，而且出版了一些成果。如黄大受《中国近代史》（上、中、下）（台北大中国图书有限公司 1969 年版）等等。

3. 1976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

“文革”结束后的最初两年，“文革”时期编的中国近代史书，仍在印，仍在用。如 1974 年印的北京师范学院等《近代中国史稿》，1975 年修改成上、下两册，1976 年 12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基本上还是用路线斗争史模式、儒法斗争史模式论述中国近代史；用走极端大批判方式论述中国近代史。标题中还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战与抚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一章第二节），“反对李秀成投降路线和抗击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第四章第二节），“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的两条路线”（第八章第一节），“尊法维新与尊孔守旧的大论战”（第八章第二节），“反抗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第九章第二节），“‘革’与‘保’的路线斗争”（第十一章第三节），“反击袁世凯尊孔复辟逆流”（第十三章第一节），……①

不过，这两年拨乱反正的力量日益积聚并爆发质变的能量。1978 年 5 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否定了“文革”，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走上真正、全面拨乱反正的健康之路。

（二）1978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拨乱反正。随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治路线的确立，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步入全面繁荣阶段。

首先表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机构、学术团体不断发展，学术队伍不断壮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力量得到了充实，所内成立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现代史、中国通史、国外史学动态等研究室及《近代史资料》编辑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各省、市社科院相继恢复或设立了历史研究所，绝大多数省市属历史研究所内都设有近代史研究室，广东社会科学院设了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高等院校历史系原有的近代史教研室恢复并不断充实，有的还设置了中国近代史或分支学科的研究所、研究室，如华中师范大学设中

---

① 张海鹏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章第二节“‘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个案分析——以《近代中国史稿》为例”（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将 1976 年 12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师范学院等《近代中国史稿》，作为“文革”时期的出版物进行分析，可以参见。

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设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孙中山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团体陆续建立。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华民国史研究会、抗日战争史学会等等相继建立。这些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学术活动的活跃，也是学术队伍不断发展的标志，不仅推动了各自领域的研究，也大大推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已有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点几十个、博士点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近十个，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研究人员。近代史研究所 1979 年创办的《近代史研究》，1980 年创办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大大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也为培养中国近代史研究队伍做出了贡献。

其次，不仅中国国内的学术研讨、交流，中外学术研讨、交流都空前发展。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等，分支学科如中国近代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等；近代社会史、会党史、教案、租界等，人物如林则徐、左宗棠、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锷、张謇等都召开过学术讨论会，有的是国际学术讨论会。大陆学者与台港学者相互参加学术讨论会、相互讲学，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相互参加学术讨论会、相互讲学、著作互译，空前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其中有：(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1988 年)、(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1990 年)、(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90 年)、(英)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1991 年)、(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1997 年)、(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998 年)、(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1999 年)等。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起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其中有：(美)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1988 年)、(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89 年)、(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1990 年)、(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1993 年)、(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1993 年)、(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94 年)、(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94 年)、(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96 年)、(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1997

年)、(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8 年)、(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1998 年)、(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1999 年)、(英)冯克《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1999 年)、(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2000 年)等。此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0—1995 年出版了 27 辑,也译介了大量外国学者的论著。外国学者的论著,给中国学者不少启发,也大大鞭策了中国学者。

再次,"文革"时期停止了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整理出版重新上马,飞速发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20 世纪 60 年代初已编成,因"文革"未出版,1978 年开始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第 12 种《北洋军阀》(1988 年开始出版)、第 13 种《抗日战争》(1997 年),陆续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也陆续出版,其中不仅有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已出版资料的续集,如《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续集,也新增了《清末教案》(1996 年开始出版)等。档案史料等也一批批整理出版(详前)。[①]

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国外的资料也被不断搜集、翻译、出版。如:广东文史研究馆编译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1983 年)、吉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了《1900—1901 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1981—1982 年出版)。还有《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 年)、《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1984 年),等等。

中国近代人物资料的整理出版空前发展。很多人物的全集、文集整理编辑纳入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1981—1998 年出版了 30 余种)、"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1987—1998 年出版了近 10 种)。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民国名人日记丛书"(1990—1993 年出版了 4 种)。各地方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大批各种近代人物资料。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的《孙中山全集》(11 卷)(中华书局 1981—1986 年出版),比台湾 1973 年出版的《国父全集》多 100 余万字。[②]《蔡元培全集》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首次编纂,前后出了两种版本,

---

① 参见庄建平:《近代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载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参见庄建平:《近代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载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先是中华书局1984—1989年作为"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出版的七卷本（高平叔编），后是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1998年出版的十八卷本（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足见人物资料编纂成果的丰硕。

1978—1999年，新出版的资料约上千种。①

以上这些新气象，不仅是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繁荣的表征，同时也是繁荣的重要条件。而繁荣的最主要体现是研究成果的丰硕。

首先是中国近代通史研究成果众多。二卷本以上的著作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人民出版社1978—1984年版），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上、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人民出版社1981—1988年版）、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十册）（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单卷本的著作、教材有数十种，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

其次，中国近代史各领域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太平天国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已出了不少著作，90年代更是获得大丰收，有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四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三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太平天国史丛书》，收入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1991年版）、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1991年版）、华强《太平天国地理志》（1991年版）、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1992年版）、祁龙威《太平天国经籍志：外一种》（1993年版）、周新国等《太平天国刑法历法研究》（1993年版）、史式等《太平天国词语研究》（1993年版）、苏双碧《太平天国史综论》（1993年版）、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1994年版）、梁义群《太平天国政权建设》（1995年版）、郭豫明《太平天国与捻军》和刘佐泉《太平天国与客家》（两种合订一册）（1996年版）、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史》和朱哲芳《太平天国西征史》（两种合订一册）（1997年版）、郭存孝《太平天国博物志》（1997年版）、盛巽昌《太平天国职官志》（1999年版）等。此外，还有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年版）、李

---

① 参见庄建平：《近代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载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文海等《太平天国社会风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和《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 1998 年版),等等。可以说太平天国史研究在 90 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

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样,也发展较快。二卷本以上的成果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3 册)(人民出版社 1980—1981 年版),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1991 年版),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2 册)(中华书局 1981—1982 年版)等。单卷本的成果有不少,如林家有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贺觉非等《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等。其他还有: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林家有《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河南出版社 1981 年版),胡绳武、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皮明庥《辛亥革命与近代思想:近代历史探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洪丝丝等《辛亥革命与华侨》(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杜永镇《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1 年版),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林家有《辛亥革命与民族问题》(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邱远猷等《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赵金钰《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等。地方辛亥革命史著作也出了不少,如冯祖贻等《贵州辛亥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隗瀛涛主编《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成都出版社 1991 年版)、孙志亮等《陕西辛亥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刘存善《山西辛亥革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云南省历史学会等《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曾绍敏等主编《荣县首义与辛亥革命》(成都出版社 1994 年版)、刘同钧等主编《莱海招抗捐运动与辛亥革命》(北京理工大学出

版社 1994 年版)等。人物研究的著作也不少,研究孙中山的就有吴雁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孙占元主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金冲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等。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对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作用有了较充分的肯定,对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和革命中的作用也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洋务运动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3 年版)等。对洋务运动、洋务派的评价有了争鸣,总体评价趋于客观。

戊戌变法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王栻《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刘振岚《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有了不少新看法。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也有不少成果。

此外,新的研究领域有了开拓。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 1985—1993 年版),林代昭等《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 1983 年版),谭双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朱建华等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1840—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范明辛等《中国近代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潘念之主编《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1993 年版),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近代战争史》(3 册)(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1985 年版),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 1994 年版),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版),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8 年版),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尚克强等主编《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徐永志《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杨秉德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1840—1949》(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3 年版),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谢本书等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夏林根《旧上海三百六十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吴承联《旧上海茶馆酒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郭绪印主编《旧上海黑社会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信之等主编《旧上海社会百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 1987 年版),周育民等《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 1985 年版),吴廷嘉《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王继平《嬗变与回归: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和模式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4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胡伟希等《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陈少峰《生命的尊严: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94 年版），李华兴《中国近代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彭明等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冯契《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郭朋《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巴蜀书社 1989 年版），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徐善广等《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胡庆云《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张锡勤《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张岂之等《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华书局 1993 年版），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赵利民《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1983 年第 2 版），颖之《中国近代留学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吴洪成《中国近代教育思潮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以上有很多研究领域都是新开拓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它带动了很多相关领域研究的兴起。

再次，中国近代史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火爆。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关于侵略与反侵略的认识，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认识，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关于维新运动的评价，关于近代人物的评价，等等，都展开了畅所欲言的讨论（关于讨论的基本情况可参见张海鹏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六章第二、三节，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梁景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下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这一时期，不仅研究成果极为丰富，理论、方法趋于多元化，而且观点精彩纷呈，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学术讨论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以现代化为线索写中国近代史，基本达成共识，这有重大意义。张海鹏等指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克服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在运用唯物史观时过于注重生产关系尤其是阶级斗争而忽视生产力发展的不足"。它"丰富了原有的学科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

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既冲击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也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始出现多种范式并存和互相竞争的局面,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新和繁荣”。①理论往往会成为实践的先导,对现代化理论认识的提高,伴随而来的是以现代化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著作陆续问世,如章开沅等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许纪霖等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周积明《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陈勤等《中国现代化史纲》(上、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史远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的下限至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基本达成共识,这可以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有一个完整的描述。

这一时期中大陆出版的较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主要是:

1.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中国少年版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2 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红旗出版社 1982 年版、1990 年第 3 版)。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下限应至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而 1840—1919 年的历史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历史,所以书名不用“中国近代史”,而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②

此书,1973 年开始写,1979 年完成,基本体系是胡绳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即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这在章节安排上可以明显看到:

上册:绪论
第一编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第二编　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
下册:第三编　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
第四编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
第五编　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

此书的理论分析有深度,文字亦活泼生动、深入浅出。如书中论述辛亥革命的失

---

① 张海鹏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23—425 页。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序》第 1 页。

败说：

> 通过辛亥革命这一场剧烈的阵痛，没有能产生预期的独立和民主，但是这场阵痛并不是白白地度过了的。把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推翻，在中国的国土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从此以后，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政治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
>
> 辛亥革命，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都含有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封建势力的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确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①

以上略微可见此书论述的特色、风格。也可看到，以毛泽东的论断论述中国近代史风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仍然存在。

此书在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第 2 版时，中国近代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已日益深入，胡绳与时俱进，对中国近代史也有了新的理论认识，特别是赞同了以现代化为主题叙述中国近代史（详见《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

2. 胡绳《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此书主要是课题组成员丁伟志等根据胡绳 1995—1998 年的谈话写成，成稿在 2000 年，出版在 2001 年，可以把它作为 20 世纪末的成果。

胡绳在完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就想续写 1919 年以后的 30 年，以把中国近代史打通，1995 年初，胡绳邀请丁伟志、徐宗勉一起开始着手写此书。1996 年，"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立项（编号：96AZS 001）。2000 年 11 月 5 日胡绳逝世，生前没有亲自完成、审阅此书。此书可以说是以一部未完成的残稿形式出版的，但胡绳的一些新思想、新观点已在这部残稿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书中，胡绳重申并赞同了以现代化为线索写中国近代史，并强调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在具体写法上，胡绳提出了要解决好四个问题：第一，现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问题联系在一起。胡绳认为民族不独立，固然也可能搞一些

---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28 页。

现代化,但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彻底、不平衡的。要真正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中国讲现代化的,第一代是洋务派,从中分化出第二代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二代中分化出的第三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然后又分化出第四代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代比一代前进,至少有一个标志就是民族独立问题。第二,发展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传统的说法,五四运动以前要求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而五四以后要求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就不正确了。胡绳认为这些说法不正确。认为五四以后的问题主要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问题。第三,怎样才叫做真正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这就要独立,要反帝,要反封建。国民党统治时期,不能说毫无作为,应该说比北洋军阀时期还稍微进步一点,但不能说真正为现代化做出什么成绩了,因为它没有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一个不反帝,一个不反封建。第四,中国共产党怎么认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与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站在什么立场上。胡绳认为一方面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一方面又是社会主义前途,这个关系中国共产党很长时期没有处理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次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但没多久,又糊涂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才重新清理。①

书中,胡绳提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要一分为二看。"过去书上(包括我自己写的书)把外国商品、资本输入,到中国设银行都简单地说成是侵略。这就使人对今天的对外开放发生疑问。所以,这类问题要重新研究"。②胡绳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还起过积极作用,我觉得,没有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靠中国人自己发展,晚一两百年都有可能。"但如果认为中国再早几十年变成殖民地就好了,就现代化了,这要驳斥。帝国主义在中国搞现代化是有限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最大利益。帝国主义希望中国有某种程度的现代化,这个程度就是维持中国封建的落后的统治,以便让这个政府能够生存,并从全国人民中间收集财富,用来向外国买东西。帝国主义要你的军队现代化,就是要你购买外国的枪炮、军火。③

胡绳在书中还提出了很多新观点(详见周一平《史学研究创新之作——读〈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5 期),此书在中国近代史界、中共党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

① 胡绳:《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51 页。
② 胡绳:《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页。
③ 胡绳:《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2—43 页。

3. 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10 卷)（红旗出版社 1997 年版）。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与边疆危机”、“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民国初年”、“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0 卷。每卷又分为“总论”、“重大事件”、“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大事记”、“文献史料”六篇。“总论”，论述历史发展的进程，如“太平天国”卷论述太平天国历史及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为论述体。“重大事件”，记述各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为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记述法律、法规、条约、机构、职官、制度（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婚姻等各方面制度），为典志体。“思想文化”，记述各历史阶段的思想文化发展及重要人物的思想。如“鸦片战争”卷，第一节“思想文化”，为论述体，有“鸦片战争前后的经学”、“嘉道年间的士林风气和经世思潮的兴起”、“鸦片战争时期的‘开眼看世界思潮’”、“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魏源的哲学思想”、“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思想”、“危机意识与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北舆地学”、“鸦片战争时期的史学与文学”等 13 小节。第二节“典籍、文献”，有“《乙丙之际箸议》”、“《畿辅水利议》”、“《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中西纪事》”、“《瀛环志略》”、“《朔方备乘》”、“《蒙古游牧记》”、“《植物名实图考》”、“《中国丛报》”等 24 小节，这部分有“经籍志”意味。“大事记”，记述各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为编年体。“文献史料”，介绍、辑录与各历史阶段历史相关的主要史料。传统的“通鉴”，一般为编年体，而此书融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章节体等为一体，在“通鉴”编纂体裁上是一个创新，也在全方位反映中国近代历史面貌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在记述中较实事求是、较客观，有一些新观点。如论述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时说：“当时中国的自然经济正在瓦解，资本主义萌芽正在成长，太平军占领的江南一带正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比较发展的地区，《天朝田亩制度》要使自然经济固定化，自给自足，必然要破坏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必然要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之，从占有、分配、生产诸方面看，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背道而驰的，它只能是一种空想，如果强制推行，只能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停滞和倒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反动的。”①

① 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太平天国》，红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8 页。

4. 白寿彝总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上、下册)(龚书铎分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下册)(王桧林等分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近代前编》、《近代后编》都由四部分组成：甲编“序说”、乙编“综述”、丙编“典志”、丁编“传记”。甲编“序说”，分“文献资料”、“研究概况”、“编写旨趣”三章。乙编“综述”，论述历史发展进程。丙编“典志”，记述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丁编“传记”，记述人物、机构、团体等。这是将章节体、典志体、传体等融为一体的新的通史体裁。这种新的通史体裁比传统的章节体通史体裁的容量更大，可以比较全面地体现“通史”的纵向贯通与横向贯通，能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面貌。当然，书中所设之志、所立之传还不十分全，可以做一些补充。书中除了对农业和农业科技、工业工程技术等分别分章记述外，对自然科学史，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地学、生物学、医药学、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等也都分别分章记述，这在中国近代通史的研究中还是第一次，也体现了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成功合作。

此书与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比较，此书有“研究概况”、“传记”无“重大事件”、“大事记”，《中国近代史通鉴》无“研究概况”、“传记”，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果此书增设“大事记”编，《中国近代史通鉴》增设“传记”篇，或许两书都可以更加完美。

此书在记述中较实事求是、较客观，有不少新观点。某些地方还有意识形态色彩、感情色彩。如《近代后编》下册丁编“传记”，写了郭沫若，没写钱穆；写了鲁迅、沈雁冰，没写林语堂；写了徐悲鸿、齐白石，没写张大千。“传记”共五十四章，只有三章为两人合一章，其他都为一人一章。章的排列，第一章毛泽东，第二章周恩来，第三章刘少奇，第四章朱德，第五章李大钊，第十章陈独秀，第十一章王明，第十二章蒋介石，……这样的前后排序显然反映了意识形态色彩、感情色彩。

九、中华民国史研究

中华民国史，中国大陆学者认为其上、下限是 1912 年 1 月 1 日至 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至迟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就开始了，191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二册，1914 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谷钟秀

《中华民国开国史》，就是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华民国史，如就研究中华民国年间的史事而言，早就开始了，恽代英1926年写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广州国光书店1927年版），就研究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即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已涉及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内容。但，明确以整个中华民国史作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传统易代修史的观念论，修中华民国史是迟早的事，待经济恢复后、待条件成熟后总是要修的。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论，研究、编写中华民国史也是必要的，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服务。从学术研究论，从填补学术研究空白论，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应该开拓，中华民国史学科应该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修中华民国史，酝酿启动在20世纪50年代，而真正启动，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文革”中期。

周振刚说：“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央领导人对修史就十分重视，提出了修中华民国史的任务。1949年毛泽东曾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三项任务：一是写一部中共党史，二是写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三是写一部中华民国史。”[①]这里所说不知是否有据？说“1949年毛泽东曾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三项任务……”应该有误，因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组建的，[②]交给近代研究史所任务也应在1950年5月及以后。

主持中华民国史研究启动的李新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即很重视。1956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中华民国史》被列入重点项目，仅放在《中国近代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书之后。1961年为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我国掀起了研究辛亥革命的高潮，史学家写的论文和专著，辛亥老人写的专文和回忆录，已出版的不下一千余万字，全国政协、各省市政协、文史馆和各出版社收存的稿件，更不计其数，真是盛况空前。就在这年，董老（必武同志）提出要专修民国史和重修清史。随后周恩来总理也曾一再提到要修民国史。1971年在周总理领导下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制订了出版

① 周振刚：《中华民国史研究及其在海内外反映》，《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② 张海鹏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计划,《中华民国史》就是 1972 年列入这次出版计划的。是年秋,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设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编制五十人),专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经过一场争论,大家才明确地认识到:……民国史应着重地写民国时期统治阶级方面的历史,……不但要敢于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树碑立传,而且要敢于给反动派以至给汉奸卖国贼树碑立传。因为反面教员是绝不可少的。为此,我们拟的一千人的传记名单中,既有袁世凯,也有汪精卫,……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就是要写真史,写信史,注重调查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在确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叙述历史、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历史,反对任何主观与臆造。

……我们制订了一个编写中华民国史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首先要编三部资料书:一、中华民国大事记(估计编成后约二百万字,初稿字数更多);二、中华民国人物志,其中人物传记约一千人(每人平均写三千字),人名辞典约四千人(每人平均一二百字);三、专题资料,现拟出专题约六百个,每个专题字数不定,以少而精为原则。在资料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即着手写一部书(六卷),定名为《中华民国史》。分三编(六卷):第一编为中华民国的创立(一卷,1905—1912)。第二编为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分二卷,1912—1928)。第三编,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分三卷,1927—1949)。为了便于推动工作,展开全国协作,集中资料和征求意见,从 1973 年起,由中华书局为我们出版了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开始每集印四千份,后增为八千份(由中国书店内部发行)。

……一个时期,有人说我们犯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错误,要我们以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为榜样,我们没有听话。又有一个时候,有人不要我们写民国史,甚至说《中华民国史》这个名称就是错误的,应该写现代史,我们也没有听话。……但是,在 1972—1976 年这段时期中,当"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工作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工作进度很慢,研究成绩不大,就是显著的证明。①

李新所说的,基本上就是 1978 年以前中国大陆中华民国史研究、编纂的情况。

① 李新:《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简介》,《历史教学》1979 年第 2 期。

就中华民国史涉及的历史的研究，如对辛亥革命的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已有一些成果，著作如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陈旭麓《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章开沅《武昌起义》（中华书局 1964 年版），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等等。文章更多，如李新说的 1961 年前后"掀起了研究辛亥革命的高潮"。但当时研究辛亥革命史，并非被视为、被纳入中华民国史研究，而是被视为、被纳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革命史研究。所以，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尽管已有研究中华民国史的计划，但并没有真正启动。而"文革"中期开始实质性启动中华民国史研究，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被认为是为国民党"唱赞歌"，是"白线"、"黑线"挂帅的中华民国史研究[①]竟得以启动，大概主要得力于党政高层的推动。虽然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文革"中期开始实质性启动，但当时的主要工作还是中华民国史编纂的前期工作，也可以说是准备工作，要真正写出学术性的《中华民国史》专著，在当时条件是不成熟的，如李新说的，当时是阻力重重、"进度很慢"。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大陆启动修中华民国史后，台湾当局也开始启动修中华民国史，1974 年由"中央文物"供应社开始出版《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即大事记。

1976 年 10 月"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拨乱反正。随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治路线的确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开始全面启动。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民国史研究队伍，大家解放思想，创新思维、思路和方法，拓宽研究领域、范围，中华民国史研究不仅从无到有实现零的突破，而且飞速发展，中华民国史开始作为一个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建立起来，并很快成为一个有国际学术地位的热门学科。

中华民国史研究及其学科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学术机构、学术团体不断发展，学术队伍不断壮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得到充实，1996 年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建设的学科和研究室之

① 参见魏久明：《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李新》，《炎黄春秋》2005 年第 3 期。

一。近代史研究所的其他研究室,如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经济史研究室、文化史研究室、思想史研究室、革命史研究室等,也开始转向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①]一些高校和省市社会科学院也建立了民国史研究和相关研究的机构。如南京大学1984年设立历史研究所,所内设中华民国史研究室。1993年,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立,2000年,该中心成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中山大学1986年成立孙中山研究所,武汉大学1987年成立黄兴研究室,江汉大学1993年成立黄兴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成立辛亥革命史与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89年成立(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广东社科院成立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学术团体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是1984年10月10日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成立。此外,有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孙中山研究学会、黄兴研究会、西南军阀史研究会、抗日战争史学会等等。高等院校历史系相继开设了多种中华民国史课程。恢复研究生招生后,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几十个硕士点、十几个博士点、近十个博士后流动站中大部分都有民国史研究方向,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民国史研究人员。以上都成为推动中华民国史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

其次,一些中华民国史研究类的刊物陆续创办。198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创办了《民国档案》。1987年,《民国春秋》在南京创办。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1978年)、《辛亥革命史丛刊》(1980年)、《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1983年)及《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3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1983年创办《孙中山研究论丛》等刊物。1991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创刊。1994年,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开始定期出版《民国研究》。此外,《近代史研究》较多发表中华民国史研究论文,《历史研究》等社科类杂志,高等院校学报也发表不少中华民国史研究论文。很多报纸也发表中华民国史研究文章,如《人民日报》1982年6月至1983年9月开辟了"学点民国史"专栏,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后这些文章汇辑成册,题为"学点民国史",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些报刊不仅大大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也为培养民国史研究队伍做出了贡献。

再次,不仅中国国内的学术研讨、交流,中外学术研讨、交流都空前发展。1984

① 张海鹏:《民国史研究的现状及几个问题的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年、1987年、1994年、2000年在南京召开了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及其他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此起彼伏。大陆学者与台港地区学者相互参加学术讨论会、[1]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相互讲学、著作互介，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相互参加学术讨论会、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相互讲学、著作互译，空前发展。1992年6月、1994年1月，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两次联合举办孙中山学术讨论会，这是史无前例的。1993年1月，社科院近代史所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美国华人组织的日本侵华暴行研究会联合召开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外国学者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的有：(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99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起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其中有：(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96年)、(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1989年)、(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1993年)、(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1999年)、(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1999年)、(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94年)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回看20世纪中国译丛》，其中有(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1997年)，此外有(美)劳埃德《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1992年)，等等。

最后，民国史资料工作大规模展开。"文革"时期，在李新的主持下，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资料工作已开始进行，但不能公开发行。"文革"结束后，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资料工作全面推进，并开始公开出版发行。其他各地的民国史资料工作也相继上马。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一种《人物传记》第一辑，1973年由中华书局内部发行，1978年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了《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署"李新、孙思白(主)编"。至2000年《民国人物传》第十卷出版，署"娄献阁、朱信泉主编"。2005年《民国人物传》第十二卷出版，署"朱信泉、娄献阁主编"。

---

①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海峡两岸学者互不往来。在大陆修民国史以后，台湾学者持对立的态度。1981年一些日本学者曾发起在东京举行辛亥革命学术会议，邀请了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学者。大陆学者参加了东京会议，台湾学者却和另一些日本学者在横滨举行辛亥革命研讨会，而不参加东京会议。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废除在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令"，随后开放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两岸关系开始缓和。1989年才开始有台湾学者参加大陆的学术会议。1990年开始有大陆学者参加台湾的学术会议。详见金仁芳《台湾民国史研究概况》，《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2期。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一种《大事记》第一辑，1973年由中华书局内部发行，199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中华民国大事记》五册（800余万字），署“李新总主编”。这两套大书，既是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成果，也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基础资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还有“专题资料选辑”、“译稿”、“电稿”三种，都是多卷本。作为《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公开出版发行的还有：杨天石等编《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1976年内部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等《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陈民编《中国致公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陈民等编《九三学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申仲铭编著《民国会门武装》（中华书局1984年版），等等。编纂《中华民国大事记》的重要参考资料《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100册，也在李新等的支持下作为“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季啸风等主编）于1997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满铁史资料》也在李新等的支持下，1979年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

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丛刊》（1979年开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辑，第三辑开始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至2000年出版第五辑第三编）。第二历史档案馆等还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198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档案出版社等出版），其中有《直皖战争》（1980年）、《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1981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1982年）、《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1985年）、《善后会议》（1985年）、《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986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987年）、《护国运动》（1988年）、《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1991年）、《护法运动》（1993年）、《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1993年）等。各地编纂出版的资料很多，如湖北省政协等编纂了《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卓兆恒等编《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

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其中有《黄兴集》（1981年）、《廖仲恺集》（1983年）、《邵力子文集》（1985年）、《陶成章集》（1986年）、《伍廷芳集》（1993年）、《李烈钧集》（1996年）等，还有《孙中山全集》（1981—1986）、《蔡元培全

集》(1984—1989)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其中有《雷铁厓集》(1986年)、《经元善集》(1988年)、《居正文集》(1989年)、《吴禄贞集》(1989年)、《戴季陶集》(1990年)、《马君武集》(1991年)、《卢作孚集》(1991年)、《刘揆一集》(1991年)、《周学熙集》(1999年)、《宗仰上人集》(2000年)等。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其中有《李星源日记》(1987年)、《郑孝胥日记》(1993年)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民国名人日记丛书”，其中有《蒋作宾日记》(1990年)、《白坚武日记》(1992年)、《冯玉祥日记》(1992年)、《胡景翼日记》(1993年)等。

上海书店1989年起推出《民国丛书》，将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影印再版，其中有大量民国时期的学术史资料，也有大量的人物资料。如：张季鸾《季鸾文存》(1989年)，邓演达《邓演达先生遗稿》、毅君编《邓演达纪念集》(合一册)(1990年)，沈钧儒《中鱼集》、章乃器《章乃器论文集》以及王造时《荒谬集》(合一册)(1990年)，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谢彬《新疆游记》(合一册)(1990年)，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邹鲁《回顾录》(合一册)(1990年)，黄绍竑《五十回忆》(1996年)，等等。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资料，中共各位领导人著作、中共中央文件，越来越多地被整理出版。各方面、各层次人物的日记、书信等越来越多地被整理出版。建党以来历次重要事件资料、各地区(根据地)资料、各部队和各团体资料，也越来越多地被整理出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组织史资料、各省市组织史资料，以至各地县组织史资料陆续整理出版。

各种回忆录出了一大批。个人回忆录如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政海秘辛》(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3册(中华书局1983—1994年版)等。专题回忆资料有：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武博山《回忆冀南银行九年：1939—1948》(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卢广绵《回忆中国工合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丛书编委会《回忆南方局》(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回忆史料》中有《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1993年)、《红军反“围剿”》(1994年)、《红军长征》(1992年)、《八路军》(3册)(1990—1991)、《新四军》(2册)(1990年)、《解放战争战略防御》(1994年)、《解放战争战略进攻》(1997年)等。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了《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徐州会战》(1985年)、《南京保卫战》(198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1987年)、《武汉会战》(1989年)、《远征印缅抗战》(1990年)、《晋绥抗战》(1994年)、《湖南四大会战》(1995年)、《中原抗战》(1995年)、《粤桂黔滇抗战》(1995年)、《闽浙赣抗战》(1995年)等。还编了《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丛书》，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1991年)、《辽沈战役亲历记》(1985年)、《平津战役亲历记》(1989年)、《淮海战役亲历记》(1983年)、《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1992年)等。

台湾也出版了一大批回忆录，如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陈香梅《留云借月：陈香梅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年版)，等等。再版的回忆录也有一批。

以上这些新景象，不仅是新时期民国史研究发展的表征，同时也是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发展的最主要的体现是民国史研究著作一批一批出版。

(一) 中华民国史通史型著作问世

由李新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下册，1981—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三编12卷2006年出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有中华民国史新学科建设意义的第一部著作。其他有：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005年扩充为四卷本《中华民国史》)、王作坤主编《中华民国简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高庆达等《中华民国简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罗元铮总主编《中华民国实录》五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台湾出版的著作有：贺允宜等《中华民国史建国史纲》(台湾黎明文化出版社1984年版)、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等。[①]多卷本由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主编、编译馆出版《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一篇《革命开国》(1985年)、第二篇《民初时期》(1987年)、第三篇《统一与建设》(1989年)、第四篇《抗战建国》(1990年)、第五篇《戡乱与复国》(1991年)。台湾“国史馆”还编印了典志体《中华民国史》，至2000年出版了《地理志》(1990年)、《公职志》(1990年)、《教

① 关于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成就，可参见黄自进等《张玉法教授的史学人生》，《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育志》(1990 年)、《内政志》(1992 年)、《法律志》(1994 年)、《民族志》(1995 年)、《文化志》(1997 年)、《社会志》上下册(1998—1999 年)等。

这表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中华民国史研究都很快发展起来,并有“争夺民国史解释权”之势。①

(二) 中华民国史丛书陆续推出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起推出“中华民国史丛书”,至 1998 年出版了 40 余种。其中有史全生等《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1987 年)、丁永隆等《南京政府的覆亡》(1987 年)、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1987 年)、郭绪印等《爱国将军冯玉祥》(1987 年)、黄美真等《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1987 年)、梅臻等《海上闻人杜月笙》(1987 年)、王鸿宾主编《张作霖和奉系军阀》(1989 年)、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1990 年)、吕伟俊等《冯国璋和直系军阀》(1993 年)、陈宁生等《蒋介石和黄埔系》(1994 年)、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1993 年)、张圻福等《火柴大王刘鸿生》(1990 年)、李占才等《著名实业家荣氏兄弟》(1993 年)、陈正卿《味精大王吴蕴初》(1998 年)、周凝华等《卢作孚和民生公司》(1998 年)等,涉及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起推出“民国春秋丛书”,至 1997 年出版了近 20 余种。其中有:(日)犬养健著、任常毅译《诱降汪精卫秘录》(1987 年),(英)庄士敦著、孟国祥等编译《紫禁城的黄昏》(1990 年),(日)西义显著、任常毅译《日华“和平工作”秘史》(1992 年),徐矛等《国共合作史话》(1988 年),申晓云《李宗仁与桂系》(1997 年),张庆军等《民国司法黑幕》(1997 年),经盛鸿《民国暗杀要案》(1989 年),吴雨等《民国黑社会》(1988 年),苏辽《民国匪祸录》(1991 年),王邗华等《民国名人罗曼史》(1990 年),冯治等《民国名人逸闻录》(1992 年),朱剑等《民国影坛》(1997 年),等等。有译著,也有通俗读物。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起推出“民国人物大系丛书”,不仅收入了民国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人物传记,也收入文化方面的人物传记,如李仲明《梨园宗师—梅兰芳》(1996 年)、朱剑《电影皇后——胡蝶》(1996 年)、白巍《艺苑奇葩——齐白石》(1996 年)、白巍《画坛巨匠——张大千》(1997 年)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起推出《民国人物系列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起推出“孙中山基金会丛书”,

① 详见李学通:《“40 年来台湾史学”座谈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 年起推出《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丛书》。

抗日战争研究，先后推出了多种丛书，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抗日战争史丛书》(1993—1995 年)、北京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1995 年)、湖南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抗战纪实丛书》(1995 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1995 年)、山西教育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大写实丛书》(1995 年)、军事科学出版社《纪念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丛书》(1995 年)、重庆出版社《重庆抗战丛书》(1995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东北抗战纪实丛书》(1995 年)、人民出版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配图纪实丛书》(1998 年)、新华出版社《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系列丛书》(2000 年)等。关于解放战争先后推出了多种丛书:有黄河出版社《中国解放战争报告文学丛书》(1993 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城市解放纪实丛书》(1997 年)、河北人民出版社《三大战役实录书系》(1997 年)、中国工人出版社《解放全中国丛书》(1998 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抗日战争丛书、解放战争丛书，以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主，也涉及国民党历史、中华民国历史。

(三) 中华民国史专史著作遍地开花

1. 中华民国经济史研究

1978 年以前，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著作出版很少，以“民国经济史”为题的书基本没有。1978 年以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著作相继出版，其中都包含了民国经济史，以“民国经济史”为题的书也陆续出版。如杨荫溥《民国财政史》(1985 年)、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1989 年)、陆仰渊《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 年)、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1993 年)、郭飞平《中国民国经济史》(1994 年)、张连红《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1999 年)等，还有王晓华等《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1993 年)等，这些民国经济史著作大多填补了研究空白。董长芝等《中国现代经济史(1919—1949)》(1988 年)，实际上就是一部民国经济史著作。此外，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82 年)、陈翰生《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83 年)、杜恂诚《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旧中国政府》(1996 年)等，实际上也有大量的篇幅研究民国经济史。

民国阶段性经济史著作有匡球《中国抗战时期税制概要》(1988 年)、该书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1988 年)、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1995 年)、崔国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1995 年)、李平

生《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经济》(1995年)、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1937—1945》(1998年)、周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1998年)、唐凌《开发与掠夺: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2000年)等。

地方经济史、企业史的著作也出版了不少,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厂史(1865—1949.5)》(1984年)、解学诗等《鞍钢史(1909—1948)》(1984年)、许维雍等《荣家企业发展史》(1985年)、张仲礼等《沙逊集团在旧中国》(1985年)、孔经纬《东北经济史》(1986年)、段本洛等《苏州手工业史(1918—1949)》(1986年)、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居之芬等《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1997年)、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二卷(1895—1927)》(1997年)、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民国经济》(1999年)、徐永志《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2000年)等。①

以上表明,民国经济史研究在不断向广度深度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很多,与经济建设需要总结和借鉴经济建设历史经验是密切相关的。

2. 民国政治史、政治制度史、政党史、法制史研究

1978年以前,专题研究民国政治史、政党史的著作很少,专题研究民国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的著作几乎是空白。1978年以来,思想解放了,实事求是地研究民国政治史、政治制度史、政党史、法制史开始发展起来,出版的著作日益增多。

政治史著作有:贾逸君《中华民国政治史》(1990年),是第一部以"民国政治史"为书名的著作,此外有许放《中国民国政治史》(1994年)等。相关的有朱宗震《民国初年政坛风云》(1990年)、唐宝林等《共和与专制的较量》(1996年)、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上、下)(2000年)、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1996年)、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1986年)、史全生等《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1987年)、朱汉国《南京国民政府纪实》(1993年)、张同新《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1988年)、张明楚等《在历史的漩流中: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1993年)、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1993年)、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1980年)、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1995年)等,还有郑德荣主编《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1927—1937)》(1990年)等。

① 关于民国经济史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可详见黄逸平《民国经济史研究述评》,载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政治制度史著作有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1984 年)、袁继成《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1991 年)、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1992 年)、林炯如等《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1995 年)、孔庆泰等《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1998 年)等,此外还有王永祥《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1996 年)等。

政党史著作有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1894—1949》(1991 年)等。[①]中国国民党史、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迅速发展起来,著作很多,如李友仁等主编《中国国民党简史:1894—1949》(1988 年)、肖效钦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89 年)、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0 年)、苗建寅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894—1988》(1990 年)、季鸿生《中国国民党史纲》(1990 年)、彦奇等《中国国民党史纲》(1991 年)、马尚斌等《中国国民党史纲》(1992 年)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年起推出《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其中有彦奇等《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1984 年)、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1993 年)、王德夫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研究》(1994 年)、曹健民等《中国民主同盟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1994 年)、周淑真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历史研究》(1996 年)等,另外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出版了《中国民主同盟简史:1941—1949》(1991 年)、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出版了《九三学社简史》(1998 年)。综合性的民主党派史著作有十余种,如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1986 年)、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1987 年)、杨育光等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88 年)、刘秉扬《中国民主党派史纲:民主革命时期》(1989 年)、孙晓华《中国民主党派史》(1999 年)等。[②]

台湾出版的有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5 年)等。

民国法制史研究著作也实现了零的突破,主要有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1986 年)、余明侠《中华民国法制史》(1994 年)、邱远猷等《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1997 年)等。

改革开放以来,民国政治史、政治制度史、政党史、法制史研究的发展,与为新

---

① 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国政党史研究的情况,还可参见别琳《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初政党政治史"研究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

② 关于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可详见邱钱牧《民主党派史研究述评》,载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建设提供历史经验教训是密切相关的，其社会价值不可小视。

3. 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

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在1978年以前基本上是空白，1978年以后，随着民国史研究及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也兴盛起来，取得不少成果。除了一些中国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的著作也涉及民国中外关系史外，民国中外关系史的专著有：曹学恩等《民国外交简史》（1989年）、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1990年）、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1994年）、张圻福《中华民国外交史纲》（1995年）、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1997年）、孙莹等《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1997年）、陶文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1995年）、尹家民《谁为中国声辩：八年抗日外交风云录》（1995年）等。

在双边关系的研究中，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著作最为丰富，如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1993年）、王淇《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1996年）、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1996年）、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1987年）、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1988年）、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1988年）、项立岭《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1997年）等。①

中日关系史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如曹振威《侵略与自卫：全面战争期间的中日关系》（1994年）、余辛焞《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1997年）等。大量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著作其中大都涉及中日关系史研究。还有刘惠吾等主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1984年）、张振鹍等《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年）、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1997年）等。②

中苏关系研究，20世纪50年代在“一边倒”方针的影响下，基本上是称颂苏联的，如《中苏友谊史》（1957年）等。此后中苏关系恶化，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也随之逆转，出版了《沙俄侵华史》（1975年）等。总的来说，1978年以前，对中苏关系史的

---

① 关于民国时期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可详见陶文钊《民国时期中美关系史研究述评》，载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关于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可详见易显石《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载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研究感情色彩浓厚，还不能做到实事求是。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先是中苏关系逐步改善，随后苏联解体，中俄关系正常化发展，意识形态日益淡化，实事求是研究中俄关系、中苏关系开始发展起来。已出版的民国中苏关系史著作主要有田保国《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1917—1949)》(1999 年)、李嘉谷《中苏关系史(1917—1926)》(1996 年)、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 年的中苏关系》(1996 年)、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1993 年)等。涉及民国中苏关系史的著作还有：刘志清《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 70 年》(1998 年)等。①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在 1978 年以前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思想解放了，另一方面原苏联大量档案资料整理出版，使得这方面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如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1983 年)、陈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87 年)、朱铃等《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史略》(1988 年)、杨云若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88 年)、孙武霞《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1988 年)、张庆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简史》(1988 年)、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下)(1989 年)、周域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1990 年)、杜文焕等《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1991 年)、李超钢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91 年)、王廷科《共产国际、斯大林和中国革命》(1992 年)、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1994 年)、刘宗尧《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论》(1998 年)、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1983 年)等。

民国时期中英关系的研究著作略少，有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1994 年)、张宗保等《蒋介石与丘吉尔：民国中英关系研究》(1998 年)、萨本仁等《20 世纪的中英关系》(1996 年)等。

民国中德、中法关系史著作更少些，民国中德关系著作仅有马振犊等《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1997 年)、马振犊等《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1998 年)等。涉及民国中法关系史著作有杨元华《从黄埔条约到巴拉迪尔访华：中法关系 1844—1994》(1995 年)等。

1992 年 8 月中韩建交，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中韩关系史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1989 年 10 月，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成立。1992 年 10 月，复旦大学建立韩国研究中心。已出版的中韩关系史著作有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

---

① 关于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可详见李嘉谷《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研究述评》，载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1996年)、宋成有等《中韩关系史·现代卷》(1997年)等。中朝关系史的著作则有杨昭全等《中朝关系简史》(1992年)、编写组《中朝关系通史》(1996年)等。以上都涉及了民国时期的两国关系。

其他双边关系的研究著作中直接研究民国双边关系的很少了,涉及的则有黄国安等《中越关系史简编》(1986年)、艾周昌等《中非关系史》(1996年)、侯敏跃《中澳关系史》(1999年)、宋家珩等《中国与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历史回顾》(1993年)等。

当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双边关系史研究空白还很多,民国双边关系史的专题研究空白更多。

4. 民国军事史、军阀史研究

1978年以前,政治上忌讳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书很少,而以"民国军事史"为名的书没有。1978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著作出版了四十余种,还有多种丛书出版。以民国军事史为题的书也陆续出版,如: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四卷(1987—1991年),是大陆第一部民国军事全史著作。还有陈书麟等《中华民国海军通史》(1993年)、何布峰等《中国民国军事史》(1994年)等。民国政府军队史的著作比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史著作还是少得多。

民国战争史的著作不少,如陈志凌《新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稿》(1981年)、胡之信《北伐战争》(1985年)、毛振发《护法战争史略》(1989年)、曾宪林等《北伐战争史》(1991年)、齐庆昌等《直奉大战》(1993年)、王晓华等《中原大战》(1999年)、郭润宇《陕西民国战争史》(1993年)等。抗日战争史的著作很多,如龚古今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1983年)、何理《抗日战争史》(1985年初版,2005年修订版改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罗焕章等《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1987年)、张宪文《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1987年)、陈小功《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1987年)、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1988年)、李振民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纲》(1992年)等。其中,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1991—1994年出版,2005年出版修订本),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抗日战争史的重要著作。解放战争史的著作也有数十种,如廖盖隆《全国解放战争史》(1981年)、黄友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1992年)、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五卷(1993—1997年)等。

军阀史研究,如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长期以来被冷落,而且不能客观评价。

1978年以后，解放了思想，研究日趋活跃，评价日趋客观，广度深度都不断拓展，著作一批批出版。如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缪新权《北洋军阀军事经济史》（1992年）、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1984年）、章伯锋《皖系军阀和日本》（1988年）、王鸿宾《张作霖和奉系军阀》（1989年）、孔经纬等《奉系军阀官僚资本》（1989年）、吕伟俊等《冯国璋和直系军阀》（1993年）等。

西南军阀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片空白。1979年成都举行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建议西南地区的学者联合起来开展这方面研究。很快，西南军阀史研究会、贵州军阀史研究会等相继成立，1982年开始出版《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专著也陆续问世，如肖波《四川军阀混战：1927—1934》（1984年）、《四川军阀混战：1917—1926》（1986年）、贵州军阀史研究会《贵州军阀史》（1987年）、谢本书等《西南军阀史》三卷（1991—1994年）、莫济杰等主编《新桂系史》二卷（1991—1995年）、谢本书《西南十军阀》（1993年）、匡珊吉等《四川军阀史》（1991年）等。

综合性著作有张鸣《武夫治国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社会作用》（1989年）、李文《中国近现代军阀的兴亡》（1989年）、刘志超《民国军阀史略》（1998年）、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1982年）等。

5. 民国文化史研究

从20世纪50—70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民国文化史的研究无人问津。[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的发展也受到重视，文化、文化史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民国文化史研究也陆续有著作出版。如：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1990年），对民国文化史的理论研究有开创之功。郑师渠《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2000年），也是很有价值的著作。此外还有：李少兵《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1994年）等。研究抗日战争文化史的著作有肖效钦等《抗日战争文化史：1937—1945》（1992年）、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1995年）等。

此外，研究民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史学史、学术史、教育史、新闻史的著作也不少。限于篇幅从略。

---

① 董楚平曾谈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农民战争史曾是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热门，文化史是个冷门，当时甚至没有“文化史”这一“门”。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史成为最大热门，农民战争史变成最大的冷门（详见董楚平《农民战争补说》，《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

6. 民国社会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社会学研究一度中断，1979 年重新恢复。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研究也兴盛起来，民国社会史很快成为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一大批中国近代社会史的著作都涉及了民国社会史。对民国社会进行总体研究的著作有张静如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1992 年)、张静如等《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1993 年)、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1996 年)等。专题研究民国社会史的著作很多，如吴雨等《民国黑社会》(1988 年)、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1993 年)、赵凯《民国帮会：秘闻与纪实》(1994 年)、苏辽《民国匪祸录》(1996 年)、王金《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1996 年)、曲彦斌《行会史》(1999 年)、牟钟鉴等《中国民国宗教史》(1994 年)等，此外有：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2000 年)等。研究民国地方社会史的著作有白振声等《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1912—1949)》(1992 年)、朱德新《20 世纪 30、40 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1994 年)、魏宏运《20 世纪 30、40 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1996 年)、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 9 卷《民国社会》(1999 年)等。民国地方社会史研究随着地方史研究、地方志研究的发展，正在不断发展。胡铭《民国社会风情图录》(2000 年，分《服饰卷》、《建筑卷》、《戏剧电影卷》等)，是民国社会史的形象史料。民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展开的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

(四) 其他研究

如各种专题研究、各阶段史研究、各事件史研究都有很多成果。辛亥革命研究(详见《中国近代史研究》节)、护国运动研究、护法运动研究、五四运动研究、大革命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解放战争研究等等，都有大量成果。

民国人物研究日益火爆。1950—1978 年间，因为受到“左”倾思想束缚，中国大陆的民国历史人物研究沉寂。中国共产党人物的研究尤有忌讳，只有毛泽东等极少数人有研究论著发表、出版，何谈民国人物研究。1978 年以后，思想路线端正了，学术研究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研究全面开花，民国人物研究也全面开花。先是《民国人物传》一卷一卷出版，继之民国人物研究的专著也一本一本出版，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人物；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人物，都有研究的专著出版。以上丛书出版中举了一些民国人物研究的专著，即可

见一斑。①

(五)中华民国史的理论研究有不少进展

如关于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已达成共识,即中华民国史是继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华民国时期的断代历史,而不只是中华民国时期统治阶级活动的历史,也不是"带有专史性质的断代史",更不是政治性的专史,中华民国史是中华民国时期的通史,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面历史,它应包括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内容,不仅要研究统治者,而且要研究被统治者,包括人民革命的历史,包括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各政党的历史。②

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李新等指出: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由扩大、深入而逐渐被赶走和被消灭;封建主义如何由没落而走向灭亡;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发展和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又怎样在受压迫、排挤中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力量的消长兴亡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就构成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③

关于中华民国史与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关系,李新等指出:中华民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一个长时期的人民大革命的过程中把它推翻的,这个过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民国覆灭的过程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任务。(中华民国史)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为前提的。写民国史离不开革命史,正如写革命史离不开民国史一样。中华民国之亡以中国人民革命之兴为前提,中国人民革命之兴则以中华民国之亡为背景。民国史与革命史二者密不可分,但又各有其侧重点。也可以说,它们研究的对象有联系,但还是可以区别而且是应该加以区别的。④

关于评价民国史的标准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不能用"革命"还是"反动"作为民

① 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进展,可参见曾景忠《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

② 参见曾景忠《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

③ 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序》,第一编上册卷首,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序》,第一编上册卷首,中华书局1981年版。

国史唯一评价标准，不应该用一种单一的政治标准去评判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至无所不评，不能失去应有的学术判断。[①]有的学者指出：国共两党斗争，“不应简单地以‘革命战胜了反动’而一言以蔽之”，“国共之争是实现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之争，一个要引向资本主义，一个要引向社会主义。无论哪个目标都高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都是要把中国引向前进。这二者都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探索。……完全可以以更科学的方法向人们揭示，人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国民党的治国方案有哪些重大缺陷，它本身又具有哪些致命弱点？”[②]有的学者指出：1928 年国民党政府北伐完成全国统一，如果单纯从国共两党关系着眼，这次统一增强了国民党统治的力量，自然对共产党不利，但不能由此而否定这次统一的历史进步作用。其他如国民党政府时期改订新约、收回关税主权、统一全国货币发行等等，为什么不能肯定呢？为什么反倒指责其没有废除不平等条约呢？[③]有的学者指出：民国时期基本上是近代中国的上升期。[④]

有的学者提出一些历史称谓应更客观些。如：对抗战前十年，台湾学者称“十年国家建设时期”，大陆学者称“十年内战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称“国民政府前期”，就客观些，两岸学者就都能接受。对抗战胜利后的阶段，大陆称“解放战争时期”，台湾称“戡乱建国时期”，称“国民政府后期”，两岸学者就都能接受。[⑤]

关于北洋军阀政府的评价，关于国民党政府的评价，关于抗日战争国民党战场的评价，关于官僚资本问题等等理论问题的研究都有突破，详见汪朝光《50 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通史型著作、丛书、专史著作、专题史著作的大量问世，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标志着新的中华民国史学科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建设发展得很快。尤其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史的著作也问世了，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了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了郭德宏主编《抗日战争史研究

---

① 汪朝光：《50 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② 刘红等：《首都青年史学工作者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研讨会纪要》中王建朗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③ 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13 页。

④ 张海鹏：《民国史研究的现状及几个问题的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 页。

⑤ 曾景忠：《对中华民国史研究中一些称谓的研讨》，《民国档案》1994 年第 4 期。

述评》、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翟作君等主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荟萃》等,更表明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建设已具规模。

(六)代表性著作: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

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下册,1981—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至2000年,除第一编外还出版了第二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一卷(1912—1916)(1987年)、第二卷(1916—1920)(1987年)、第五卷《北伐战争和北洋军阀的覆灭》(1996年),第三编第五卷《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2000年)、第六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2000年)。全书较为广泛深入地记述了中华民国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史有论,资料丰富,论断平实。

书中对中国政党的发展变化有较多的记述。如第一编第八章"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和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第一节"立宪团体及其活动"设三小节:一、"预备立宪公会",二、"政闻社",三、"宪政讲习会及其他立宪团体"。第三小节"其他立宪团体"写了"粤商自治会"、湖北"宪政筹备会"、贵州"宪政预备会"、贵州"自治学社"、上海"宪政研究会"等,及"谘议局事务调查会"、"谘议局联合会"等。第二编第一卷第一章第二节"各党派团体的勃兴及其政治倾向"设六小节:一、"从中华民国联合会到统一党",二、"同盟会改组及其新纲领",三、"共和党的组建与分裂",四、"以'第三党'相标榜的统一共和党",五、"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六、"中国社会党及其他政团"。第六小节"其他政团"写了"中华民国自由党"、"中华民国工党"等。中国政党的发展变化是中华民国产生发展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述中国政党的发展变化,把中国政党史融入中华民国史,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华民国政治史的内容,也使中华民国史的论述更有广度深度。这不仅在研究对象、内容上有新意,而在资料上也大显新意。

书中的论述也颇有新意。如论护国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指出:

> 护国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可以参加革命,而且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领导革命;不仅可以发动不流血的和平改革,而且还可以发动流血的革命战争。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独有的特点。但同时也证明:即使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战争期间,它也还是"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因为它所推行的,仍然是一向与革命相对立的、自上而下的、反对"破坏"的所谓"文明革命"的方针……

护国战争的历史又证明：在争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各派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合作，是至关紧要的。护国战争所以取得一定的胜利，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护国战争之所以未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直接的原因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各派的分裂。而这种分裂的结果，是改良派占了上风，革命派无能为力。革命派为什么没有取得这次战争的领导权呢？那就不能不归结到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犯了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它不仅重复了辛亥革命时期不敢发动群众的错误，而且把国民党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也排斥出去。要在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充当领导，不能单靠革命口号喊得多么高，也不能靠单纯的军事冒险多么勇敢，更重要的是要坚决地发动群众，正确地组成统一战线……

但是，护国战争的历史也证明了：中国的封建帝制自辛亥革命后，已经是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谁要想再把它抬出来招摇过市，那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即使如袁世凯这样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又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人物，也不能免。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人民意志不能违背，护国战争为人们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①]

这里对资产阶级改良派一分为二的分析，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没有成为护国战争的领导的分析，是有新意的。在总结护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强调发动群众、统一战线、顺应历史潮流、人民意志等，也是有新意的。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被称为“当代中国史”，是最近时段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及其学科的建设，是起步很晚、历史很短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产生

1947 年 6 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随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伴随着的各种记述、宣传日益沸腾。不说远的就说近的，比如，1949 年 4 月 25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千里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完全解放，我大军入城市民夹道欢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宣告灭亡！》等等，这些文字应该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记述，因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过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

---

① 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859—860 页。

过程。

新政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备会议和筹备机构。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开幕，就有很多记述、宣传。如1949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记述了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的盛况，特别称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新政协会议开幕后，也有很多记述、宣传。如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李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特写》，《大公报》1949年9月27日第二版发表高汾《人民政协开幕纪盛》，都记述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详情。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李庄《"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记人民政协最后一天大会》，记述了9月30日政协会议的情况，特别是选举的情况。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记述、宣传更多。如，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报道《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典礼》，第四版发表林韦《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其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这一声震撼世界的巨响，由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响亮地喊出的时候，参加盛典的三十万群众中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欢呼。①

1949年10月1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2期发表刘白羽《我们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则较详尽地记述了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到开国大典的整个历程，全文近六千字，其中谈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一种光辉的真正民主的政治生活。这是所谓"西欧文明"的资本主义时代"民主"所不可比拟的。②《中国青年》第22期还发表吴冷西长篇《时事漫谈：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七日》，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空前伟大的胜利，而且也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法西斯大战胜利之后的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最伟大的胜利。这是世界人民民主和平阵营的大胜利，也是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大失败。③这些论述，已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历史比较研究深度。

---

①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林韦：《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

② 刘白羽：《我们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青年》第22期第24页。

③ 吴冷西：《时事漫谈：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七日》，《中国青年》第22期第2页。

以上这些文字有政治宣传色彩，发挥着政治作用。同时这些文字也是理论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的产物，是最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的方针政策需要宣传，建国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建国的成就需要昭示以激励人心，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不断发展，论著不断发表。早期的文章如：许德珩《光辉灿烂艰苦奋战的一年》（1950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第 4 版）；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1950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第 3 版）；董必武《一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在政治法律方面的几项重要工作》（1950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第 3 版）；郭沫若《一年来的文教工作》（1950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第 4 版）；杨静仁《一年来的民族工作》（1951 年 3 月 4 日《人民日报》第 3 版）；叶芒《一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建立的回顾》（《世界知识》1951 年第 6 期）。著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伟大成就》（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编印）、《三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成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事业》（张学文，三联书店 1953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来政治法律工作的成就》（李琪，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来经济建设的成就》（杨培新，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来文化教育的成就》（薛和昉，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行较有体系的综合性研究的著作，最早的大概是廖盖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诞生的》，此书又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是解放战争史的专著，同时也是专论国民党政府是怎样被推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筹备建立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史的专著。完稿于 1950 年 2 月，1950 年 5 月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全书六章，第一章序论，第二、三、四、五章分阶段论述解放战争。第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开国盛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革命的胜利，全力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六节，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及其原因、意义，也简略地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情况。此书 1950 年 6 月第一次修订再版，增补了“从一九五〇年二月到同年六月”一篇附于书尾，其中写了四个小节：“（一）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稳定物价；（二）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三）为争取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四）中国的外部状况，朝鲜战争爆发。”即

补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年的部分历史。此书1951年7月第二次修订，又增补了“从一九五〇年六月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一篇附于书尾，其中写了五个小节：“（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二）加速进行土地改革；（三）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四）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五）恢复和建设人民经济事业的新成就。”又补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年来的部分历史。1954年12月此书又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原来的六章增为八章（第七章“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二年”；第八章“国民经济有计划建设时期的开始——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的删节本题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简史》1955年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诞生的》的两个修订本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的全本、删节本，不仅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建立的，又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较自觉、成熟、深入、有体系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著，尽管政治色彩浓厚，但同时有学术价值。

1956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被列入重点项目，翦伯赞提出：“为了实现总规划中规定要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议成立一个机构，专做此事。并且使这个机构成为常设机构，专管现代史的纪录，先按年编出长编，再写成各种专著。”①翦伯赞的建议大概没有被实施，但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开始启动。

最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命名的专著是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四册（1949年—1959年9月，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1960年版），则是最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体史书。

此外，《历史教学》1956年第3期发表的戴鹿鸣《如何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内容、体系、研究目的、任务等，是一篇论述国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文章。《人民日报》1956年6月28日第2版发表黄炎培在全国人大上的发言“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提出了国史资料建设的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2月28日第7版发表里凡《评〈中华人民共和

---

① 翦伯赞：《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历史教学》1958年4月号。

国史稿〉》,对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严重的缺陷"提出了批评,对如何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了看法,也是一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相关的文章。

以上表明,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备、建立、发展的推动下,至迟 1949 年已产生,1950 年代已有发展,而且开始进行学科的建设。

有些学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发端于 1978 年或者 1980 年代。顾为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从 1978 年 1 月胡乔木提出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78 年 2 月胡乔木又建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开始写,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 1978 年发端的。张星星说,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有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做过初步尝试。但是,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还是应当从 20 世纪 80 年代算起。[①]刘国新说,国史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并提出三条理由:一是 80 年代初,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重大问题作出全面的科学的总结,使国史研究有了可遵循的指导原则;二是 80 年代中期(1984 年 8 月)《当代中国》丛书第一批成果问世,标志国史研究有了正式命名的权威成果;三是 80 年代末,围绕建国 40 周年出现了一批个人署名的以共和国史为题目的专著和工具书,使国史研究具有了基本的学术规模。[②]似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世以前、《当代中国》丛书第一批成果问世以前、80 年代一批个人署名的以共和国史为题目的专著和工具书出版以前,就不会有国史研究、不会有以国史命名的权威成果。国史研究何时开始,是从客观的历史存在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主观建构的理论、理由出发?而且论"个人署名的以共和国史为题目的专著",最早就是廖盖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这也是当时的权威成果,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成果。种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从 1978 年以后开始的说法都忽视了早已存在的研究成果,忽视了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是不妥当不合理的。应该说中国官方提出并酝酿、组织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发端于 1978 年,而小规模的、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1949 年已发端,1950 年代已有一定的进展。至于香港中文大

① 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

② 刘国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理论视野》2009 年第 10 期。

学出版社2008年开始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总序》(写于2007年12月)中说,中国人终于开始为不寻常的20世纪中国撰写大型历史著作了。又说,中国从来就有忠于事实和敢言的历史传统,但很少有史家为当代写史,故这套书的出版是一种新现象。①这似乎就是说,在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以前,没有中国人写20世纪中国史、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人写20世纪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从这套书开始的,这就更无视历史事实了。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曲折发展(1949年至1978年12月)

1. 初步发展时期(1949年至1966年5月)

这一时期,不仅有一些年度性、专题性的研究著作问世(详前),也有综合性的研究著作问世。综合性著作的代表作主要是:廖盖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这两本书都遵循了学术规范,如都尽可能详尽地占有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参考了1 500多篇文件(详该书《前言》),引用资料都注明出处,也建立了自己的分期体系、研究体系,是学术著作,但同时也是政治色彩浓厚,是在当时政治理论、理念的指导下,受当时政治形势影响的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前言》说:是"在党委领导下",在党委和总支负责同志不断指示下,"以党的决议、毛主席著作、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社论为依据"进行编写的。"由于解放了思想,政治挂了帅",63名同学和5位青年教师,破除了对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的迷信,"干劲冲天,仅仅经过二十昼夜的苦战,便完成了"。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章节标题中比较突出领袖的个人作用。如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是"人民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和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第五章第一节的标题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第四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的标题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和毛泽东同志'关

---

① 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总序第2—3页。

② 20世纪50年代,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也出版过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论著,有的采取敌视态度,台湾出版的论著更是攻击、污蔑。如香港:《四年来的中共政权》2册(易明等,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年版)、《中共政权第五年》(祖国周刊社编,香港:友联社1955年版)等,如台湾:《五年来中共迫害人权纪实》(李天民编,台北:大陆杂志社1955年版)等。

③ 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第四章第六节第二小节的标题是"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方针"。行文中引用毛泽东的论断就更多。这反映了当时个人崇拜思潮的影响。

如阶级斗争理论已成为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引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话："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党内产生过陈独秀、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强调："即使现在过渡时期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②

如宣传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五章第二节"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对反右派斗争、对学校的拔白旗插红旗作了全盘肯定记述。第五章第三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和生产建设大跃进形势的形成"，第六章第三节"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发展"，对大跃进作了全盘肯定记述。其中写道："湖北省麻城县建国一社创造了亩产早稻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1958年全国早稻丰产纪录。粮食作物这种成倍增长的事实，就又一次地无情地打击了右倾保守思想，证明粮食是可以大量增产的。"③第六章第四节"人民公社化高潮"，对人民公社作了全盘肯定。引用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④。

以上足见，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受政治影响之深。当时的政治理论、政治理念已有某些"左"的内容存在，是有局限性的，以这些"左"的政治理论、政治理念予以指导的国史研究的局限性也就可想而知。以上的很多论述，在今天看来

---

① 廖盖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9—210页。

② 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2页。

③ 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4页。

④ 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7—368页。

已都是不妥当的。

2. “文革”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名的书出版,即便在建国20、25周年大庆之际,也只有几篇纪念性的文章发表。这一时期有不少非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书,如“中国共产党历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等,涉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这一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理论界、学术界成为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工具,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记述也是如此。

197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各报刊纷纷转载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第一句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了。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团结战斗的二十五年”,强调“战斗”而不是建设。文中谈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内四次大的路线斗争,都是围绕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进行的。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①]这就不仅把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看成两条路线斗争史,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看成两条路线斗争史。这类文章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但其基调、色彩已可见一斑。

当时各高校编印的非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工农兵上大学后的中共党史教材),有的是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合成一册,有的则是分为两册。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方交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河北电力学院教师共同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社会主义革命部分)》。此书1973年8月完稿,1974年1月印刷。书的前两页是“毛主席语录”,其中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等等。显然,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路线斗争正是写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的指

---

①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197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第1版。

导思想。全书分三章:第五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第六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七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中对彭德怀、刘少奇全盘否定的大批判式的记述,现在看来都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这一时期国史研究、历史研究、学术研究的不正常不健康,可见一斑。

3. 向健康发展过渡时期(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即"文革"结束后的最初两年。这两年,一方面由于"两个凡是"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如"文革"时期编印的《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等,1977年、1978年初稍稍修改后仍在翻印、使用。另一方面,拨乱反正的力量也在发展,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吹响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号角。

这两年,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已提上议事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官方编纂开始酝酿。1978年1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要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并建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①提出组建官方的研究机构,由官方来研究国史,这是建国近30年来的第一次。1978年8月,黎澍筹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郑惠负责组内日常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共中央党校北院2号楼。1978年12月,黎澍派郑惠和陈铁健到上海收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案的内幕资料,为研究"文革"怎样开始做准备。1979年4月理论务虚会后,国史编写组解散。②当时,对"文革"怎么评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17年怎么评价,对毛泽东怎么评价等,很多问题没有政治定论,很多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官方开展国史研究、创建国史研究机构的条件还未成熟。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健康快速发展(1978年12月至2000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取代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此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日益展开,学术研究、历史研究、国史研究也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发展,也为学术研究、历史研究、国史研究的快速发

① 顾为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② 陈铁健《怀念学术界诤友郑惠》,《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

展奠定了经济基础。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总结，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一方面，“决议”既是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更为中国大陆国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为新时期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服务，成为日益紧迫的任务。很快，官方的国史研究正式启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的一项重要工程，胡乔木倡议编写、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署的《当代中国》丛书正式启动。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正式提议，经中共中央批准，当代中国研究所也终于在1990年正式建立。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国史研究快速发展。其具体的基础性表征是：

首先，从中央到地方，国史研究的机构、学术团体相继建立并不断完善。地方的党史研究、史志研究机构都有专门的机构、部门研究国史。一些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设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国史系。[①]一些省市建立了地方当代史研究团体，如北京1996年成立了当代北京史研究会。国史研究的学术会议频频举行。国史研究的项目、经费逐年增加。

其次，建国后一直没有进行的国史研究的资料建设全面展开。文献资料方面，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卷)、《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相继出版，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众多领导人建国后的论著也都整理出版。政治、法律、经济、外交、军事、民族、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文献资料都陆续整理出版。回忆资料也大量出版，如薄一波《若干重要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吴冷西《十年论战》、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等。随着口述史学的发展，历史研究领域资源最丰富的国史口述史料迅速增加。如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的《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的《亲历者口述系列》丛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述外交史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当代口述史丛书》等。

再次，中外学术交流前所未有地发展起来。中外学者互访、讲学、参加学术会

① 详见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和前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议，以及著作互译。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介绍到国内，如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本尼威克等《90 年代的中国》，亚昂格尔登《社会主义之后的中国：步东欧后尘还是步东亚后尘?》，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托马斯·伯恩思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到农村的迁徙》，丹尼尔·凯利赫《中国农民的力量：1979—1989 的农村改革》，美国威尔逊中心《当代中国研究在美国》等，还有《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10 种)等陆续出版。

这一切都是 1978 年以前没有的。中国大陆国史研究的快速发展也就是必然的、势不可挡的。

1978 年 12 月以来的国史研究，可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1. 向独立快速发展过渡时期(1978 年 12 月至 1987 年)

1979 年 7 月，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制定《中共党史教学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只有一章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即第五章"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1949 年 10 月至 1956 年)"，显然，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历史怎么评价理论上还没有解决，所以暂不写。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 年 7 月，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制定的《中共党史教学大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下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部分"，就分四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写到 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但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学大纲"。

从出版的著作来看，1980 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德荣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全书一册，内分上、下两编。下编分两章：第五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六章"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只写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即根据教育部 1979 年的大纲写的。1981 年 12 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德荣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分上、下两册，下册是社会主义时期，分四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写到 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这表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公布，很多政治理论问题有了定论，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编写起了极其重要、关键的推动作用。

当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名的著作还没有出版，可以说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已开始，但与中共党史结合在一起，或者说附在中共党史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研究。

以后随着中国大陆高校开设“中国革命史”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与“中国革命史”研究又结合在一起。如红旗出版社1984年出版肖效钦等《中国革命史》下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郭彬蔚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纲》等,都是革命史与国史的结合,都是国史附在革命史中,国史研究仍然是非独立的状态。

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学启等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一卷,第二卷1988年出版,至1994年出第四卷(第三卷写“文革”未出)。尽管书中的内容仍然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主,但已不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作书名,这可以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在开始走向独立。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孙健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1949—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庄永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都是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著作,但还不是全史性的研究著作。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1985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81—198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记事(1949—1984)》,这些是编年体的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书,只是还不是论著。这些独立的非全史性非综合性的国史书,在当时也只是个别现象,但预示着新时期独立的全史性综合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论著已呼之欲出了。

2. 独立快速发展时期(1988—2000年)

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大庆,1988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名的著作一下子就出了几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柏福临等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朱宗玉等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上)》(郭彬蔚等编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还有《中国当代史》(上海大学等编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此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丛书》的一种《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也在1988年出版。198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书更多,将近30种。正是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大庆的东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名副其实独立了。因为各种有利条件陆续齐备,198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全方位地迅猛发展起来。在中国大陆,政治性的纪念活动对历史研究的驱动作用是巨大的。其具体成果有:

（1）一大批国史研究丛书以及有分量的多卷本的国史全史型著作争相问世。 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当代中国丛书》(150卷208册)、《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以及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每年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49—1989年的中国丛书》、《40年国是反思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丛书》；中国和平出版社《我们的共和国丛书》；西苑出版社《共和国将永远铭记丛书》；北京出版社《共和国之路丛书》；中国工人出版社《共和国里程碑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共和国记忆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老新闻——共和国往事丛书》；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丛书》；警官教育出版社《微观国史丛书》；红旗出版社《辉煌的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纪录》丛书、《钓鱼台档案丛书》、《红色中国丛书》，以及10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4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广西人民出版社《1949：中国历史大转折丛书》、《伟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丛书》，以及4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国是反思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系列丛书》，以及5卷本《五十年国事纪要》；团结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6卷)；吉林人民出版社《共和国史记》(5卷10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10册)；等等。

（2）专(题)史、事件史著作大批出版，研究空白不断被填补。 政治史方面有迟福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史》、李金山等主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史》、袁瑞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发展史》、文正邦等《共和国宪政历程》等。

法制史方面有韩廷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通史》、何勤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张希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史》、肖义舜主编《共和国法制建设50年》等。

外交史方面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纵横录丛书》、新华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亲历丛书》、裴坚章等主编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孙勇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纲》、吴学文等《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王红续《70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侯敏跃《中澳关系史》、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刘德喜等《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等。

经济史方面，除了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丛书》、青海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经济的历史与未来》丛书、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经济发展丛书》、改革出

版社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企业史丛书》、王珏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十年》(4卷)以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为名的书有多种,其中较有分量的是赵德馨主编的三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史各专史的著作很多,如袁伦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经济史》、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陈守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史》、商业部经济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稿》、庄启东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资史稿》、叶善莲《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简史:1949—1978》等。

军事史、军史方面有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代战史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旅大事纪实》丛书、解放军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剿匪纪实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抗美援朝战争纪实丛书》、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王定烈等主编《当代中国空军》、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民兵》、鲁英等《武警部队四十年(1950—1990)》等。

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涉及众多方面、众多领域。如**总体研究方面**有河北大学出版社推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丛书》,其中包括:《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何玉长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状况的变迁》(邱泽奇著)、《当代中国的单位变革与家庭变迁》(陈午晴著)、《当代中国劳动制度变化与工会功能的转变》(张暎硕著)等。此外有光明日报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丛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调查书系》、山东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丛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中间阶层研究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社会变革与发展研究丛书》。**城市史研究方面**有当代中国出版社《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以及《城市发展系列丛书》(同济大学出版社)、《城市发展研究丛书》(高等教育出版社)、《大城市发展研究丛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中国城市史研究丛书》(巴蜀书社)、《城市发展研究系列丛书》(上海三联书店)、《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利·空间·制度研究丛书》(东南大学出版社)等。还有范恒山等主编《中国城市化进程》、熊国平《当代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等。**农村史研究方面**有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村史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江南农村发展研究丛书》等。**人口史研究方面**有中国统计出版社《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丛书、中国人口出版社《新人口礼赞: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回顾与展望》丛书,以及路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五十年》等。**生态环境史方面**有《生态文明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及刘宗超《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等。

文化史方面有焦润明等《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3册)、张顺清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等。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史、哲学史、科技史、史学史、文学史、戏剧史、美术史、教育史、新闻史、广播史、电视史、出版史、报刊史、卫生史、体育史等都有一批著作。

事件史、运动史方面有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吉柚权的《白雪:解放西藏纪实》、叶永烈的《沉重的1957》、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谢春涛《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等。"文革"史的著作也出了一大批,改革开放史的著作更多。

(3) 地方史、行业史著作百花争艳。不仅省市自治区编纂了1949年以来的历史,地级市、县以及县级市也编纂了1949年以来的历史,有的还出版了丛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上海改革开放二十年:系列丛书》,其中分地区卷、行业卷等;《当代中国丛书》分部门(行业)卷、地方卷、专题卷和综合卷等,也成为地方史、行业史的重要成果。

1988—2000年,中国大陆国史研究成果之丰硕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惊叹。怎么评价？详下。

(四) 反思与愿景

1. 反思

对1988年以来中国大陆国史研究的评价,可能会有不同看法。总的来说,尽管成果的政治色彩依然浓厚,但学术价值、研究水平已在逐步提高。

第一,实事求是、历史分析、客观评价成为潮流。个人崇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走极端式、大批判式、贴标签式和以论代史、教条主义的研究,路线斗争史的模式,因人写史、因人废事、因人废言、随"风"转的习气,被逐一否定、抛弃。对领袖人物的研究,对建国初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的研究,都能一分为二,努力求真求实。对于"文革"爆发的原因也能实事求是进行分析论述(详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文化大革命"简史》)。

第二,"禁区"日益被打破,研究领域、视角日益扩展,研究向全面化、社会史化发展。所有的事件、人物都在开始被研究,所有的研究更加深入。不仅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物的研究不再有"禁区",高岗、林彪等人物的研究也不再有"禁区","右派分子"、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工商业人士的研究也不再有"禁区"。研究

范围从政治领域向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拓展。多线条、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发展了起来。团结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化、民族宗教、社会等部分,涉及了共和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不再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又如朵生春《中国改革开放史》在上、下两大卷的篇章里均有"中国人状况报告"一节,论述中国人口的自然状况、经济状况、人口的素质、人的意识、人的信仰、人的性格、人权甚至军人生活等。这表明国史研究不仅在向广度进军,也在向深度进军。

第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丰富,用这一理论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重新审视国史、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大陆国史研究的主流。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认识比以前更深刻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重大事件、重大问题的认识、论述比以前更合理了。在分期问题上,国史学者开始突破传统的国史分期,把国史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一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发展问题上,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意识已大大加强。

以上都是不同于以前国史研究的新气象。

是不是存在问题?应该说存在,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史研究已从中共党史研究中独立出来了,但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仍是国史的主要内容。但国史与中共党史二者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学科,写国史就应写出国史的特质,这仍是需要下大力气努力的。

第二,写领袖人物,写高层活动,仍然是主要内容。人民大众的活动、状况反映体现较少。①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承认:本书充斥着旧式史学的影子,那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国家治理者身上,而较少或很少反映历史的本体——人民大众。为什么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英雄史观"的俘虏呢?凡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都如此,这不能不反映我们潜意识中的"精英"情结。②很多学者口头

---

① 外国学者较早就有批评。如美国学者 S.C.皮尔森(Samuel C.Pearson)2000 年就谈到:不明白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不注意研究"人民"的历史、"人民"的思想。详见周巩固《关于中国高校史学理论教学的思考》,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② 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09—511 页。

上都说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潜意识中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有多少历史唯物主义，实在值得反思、警醒。

第三，重复劳动仍严重存在，大同小异的书太多。这与受政治纪念活动的驱动有关，也与不讲究学术规范有关。这造成了人力、财力、物力等的浪费，冲击学术规范，催生学术不正之风，实在是应该设法杜绝的。

2. 愿景

第一，发展政治认识。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应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要追求让中国人民大众、世界人民大众认同，要追求让子孙万代认同，这就要符合人民大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个人发展的利益。

国史研究总是为政治服务的，但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就必须讲究。要让人民大众认同，就应该为人民大众需要的政治服务，而不应该像“文革”那样，为了少数人或小集团的政治需要随意解释历史、歪曲历史，或者隐瞒历史，甚至伪造历史，学术界不会认同，人民大众更不会认同。

第二，回归人民立场。要让人民大众认同，就要站在人民立场上写史。人民立场是比较中立的立场，比阶级立场、意识形态立场中立（详见周一平《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河北学刊》2007 年第 5 期）。

如何做到比较中立、客观，减少意识形态色彩？那就要站在人民立场上。

第三，减少感情色彩。要让人民大众认同，让更多的人接受，要客观、中立，就必须减少感情色彩。

第四，全面加快学科建设：一是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历史理论建设，要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使历史进程、历史问题等得到更科学、准确的说明；二是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史学理论建设，使学科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学科的性质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得到更科学、准确的厘定；三是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组成体系的分支学科建设，如国史学概论、国史史学史、国史史料学等学科都应尽快建立起来。学科建设的完善，必将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独立、深入、快速地发展。

第五，加快资料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最近时段的历史，大部分档案资料因为时段近无法开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了一定期限的档案资料是不是可以开放？三十年以上的、四十年以上的档案资料是不是可以开放？所以，首先应尽快建立完善的档案资料公布、开放制度。其次应尽快编纂出版重要人物的全集。

再次应尽快组织健在的退职高层领导人、重大事件当事人、目击者撰写回忆录或进行口述访谈。只有资料建设搞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才能真正有扎扎实实的进展。

第六,进一步拓展范围:一、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写成一部人民史应是努力的方向;二、发展跨学科领域、边缘领域的研究,如环境史、灾难史、疾病史等研究都应发展;三、港澳台都应写,不能只写大陆,或不能只写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不写中国台湾,写中国台湾也要实事求是、客观,君不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较深入地写了中国台湾;四、发展各方面的中外比较研究,以便更客观深入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第七章　中国专史研究

一、中国政治史研究[①]

政治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政治活动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经验教训。具体内容包括各类政治现象、政治事件、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政治行为、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诸如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政治运动史、政党史、政府关系史、政治人物研究等等，都是政治史的分支。政治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也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是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中国的政治史研究传统悠久，中国古代的许多史书都是在政治史的基本框架下展开的，多以王朝兴衰、行政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和帝王将相等精英人物作为基本题材，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把中国"二十四史"斥为帝王家谱，呼吁写"民史"。但政治史研究依旧有其存在的必要和难以取代的价值，史学家们也不断尝试以新的视角来研究政治史。20 世纪 20—40 年代，出版的中国政治史著作有近 20 种，其中有：易君左《中国政治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 1930 年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蓝田书报合作社 1943 年版），贾君逸《中华民国政治史》（文化学社 1932 年版），周谷城《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 1942 年版），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3 年版），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独立出版社 1945 年版），等等。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香港生活书店 1948 年版）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早著作之一。出版的政治制度史著作有 10 种左右，其中有常乃德《中国政治制度小史》（上海爱文书局 1928 年版），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1—3 册）（重庆南方书馆 1933—1934 年版）、第 4 册（重庆建设出版社 1944 年版），陶希圣《秦汉政治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等等。王亚

---

① 本节参考了白钢：《中国政治史》，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葛荃：《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文史哲》2006 年第 5 期）等。

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时代文化出版社 1948 年版),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秦汉至民国的官僚政治发展变化的最早著作之一。出版的政治思想史著作有 10 多种,其中有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 1924 年版)、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新生命书局 1932—1935 年版)、王德周《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纲》(西北书局 1932 年版)、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45 年版)、萨孟武《现代政治思潮》(商务印书馆 1929 版),等等。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书局 1937 年版),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最早著作之一。出版的政党史著作有多种,如印维廉《中国政党史》(中央图书局 1927 年版)、杨幼炯《中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萧文哲《现代中国政党与政治》(中外文化社 1946 年版),等等。可以说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史研究的成果还是不少的。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处于停滞或半停滞,成果比民国时期少得多。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 2000 年,中国政治史研究有了飞跃式发展。

(一) 1949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

1952 年,中国大陆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各高校的政治学系、政治学专业被取消(以后设政教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①]政治学被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②]政治学研究、政治史研究受到了釜底抽薪的打击。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把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提出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批判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要恢复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等等,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③]企图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办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④]这样,社会学、政治学等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而长期搁置起来。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大陆社会学、政治学等研究的停滞,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此。政治学研究停滞了,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政治史研究也难以展开,或者说停

① 葛荃:《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文史哲》2006 年第 5 期)还谈道:直到 1960 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校恢复了政治学系,但为时不久,即都改为“国际政治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解放运动、西欧北美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② 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政治学研究》1985 年第 1 期。

③ 翦伯赞:《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4 日第 8 版。

④ 郭沫若:《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6 日第 3 版。

滞了。20世纪50—70年代,以“政治史”、“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为书名的新写的书几乎没有公开出版。有的是重印或再版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如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52年由人民出版社再版,至1963年出了第5版。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是由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删改而成。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也再版,至1961年人民出版社出了第4版。“政党史”的著作中,“中国共产党历史”书出版了一些,其他党派历史的书没有出版。中国国民党史的书,不好写,也无法写,大概当时也没人敢写。还有农民政权研究、政治制度的分支的研究的书出版了一些,如吴恩裕《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印),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1957年版),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探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不公开出版的高等院校内部印行的讲义,稍有一些,如王惠岩《中国政治与法律制度史讲义》(吉林大学1962年印)等。

“文革”十年间,史学变成“文革”的工具,有没有政治史研究?不能说没有,风行一时的儒法斗争史被视为两条路线斗争史,实际上成了政治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也有出版,都是两条路线斗争史模式(详见《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一节),也可以视为政治史。“文革”时期的这些史书,搞“七真三假”,跟着政治风向转,没有学术性、科学性可言。

20世纪50—70年代,香港、台湾地区的政治史研究仍承袭民国时期的学脉继续发展。1959年,钱穆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为他的专题演讲合集,分析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得失。1961年,钱穆在香港又出版了他的八次演讲汇集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第二讲是《如何研究政治史》,他认为“政治史”研究包括三个层次:其一,制度史,即所谓的政治制度,如监察制度等;其二,政府政策;其三,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这是继梁启超之后,对政治史理论问题又一次较为系统的阐述。

台湾则杨树藩的成果较多,出版了《两汉地方制度》(台湾政治大学1963年出版)、《两汉中央政治制度与法儒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唐代政制史》

(台北正中书局1967年版)、《宋代中央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辽金中央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元代中央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明代中央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清代中央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等。此外还有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中正书局1954年版)、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三民书局1969年版),陶希圣《中国政治制度史》(台北启业书局1974年版)等。

(二)1978年12月至2000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也稳步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大步前进,政治理论研究、政治经验教训的总结成为迫切需要。高校的政治学系、政治学专业陆续恢复,政治学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也开始培养。有的高校还设立了政治研究所、政治研究院。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成立。1984年,中国政治学会被接纳为国际政治学会团体会员。1985年,《政治学研究》创刊。政治学研究的中外交流飞速发展。政治学研究重新振兴、繁荣起来,政治史研究也随之重新振兴、繁荣起来。

1. 中国政治史研究

这一时期,以"政治史"为名的中国政治史的主要著作有:王瑞明《宋代政治史概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此书完成于1985年,是当时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较早的成果。对宋代三百多年的政治作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指出:宋代政治,是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是秦代集权政治的延续和发展。从政权、军权、财权三方面的集权论述了宋代的君主专制政治。肯定了宋初四十年的政治有一定的进步性,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促进了宋代社会的各方面发展。其后,政治趋于黑暗、腐败,终致覆灭。指出:宋代320年历史成败的关键就在民心的得失上。[①]书中专章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也专章论述了朱熹政治思想,专章论述了"从《宋论》看宋代政治的症结",涉猎广泛,资料翔实。是中国政治史的重要著作,也是宋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王金鋙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史:191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自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以后,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政

① 王瑞明:《宋代政治史概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0页。

治史的著作，对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伪满洲国政府以及革命根据地人民革命政府等的制度、政策等都有翔实论述，对不同阶级、政党政治主张、政治思想理论、政治实践等都有论述、分析。书中强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①

规模较大的中国政治史著作有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史仲文等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中的"政治史"部分，分别为《中国远古暨三代政治史》、《中国春秋战国政治史》、《中国秦汉政治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中国隋唐五代政治史》、《中国宋辽金夏政治史》、《中国元代政治史》、《中国明代政治史》、《中国清代政治史》、《中国民国政治史》10 册，1995 年人民出版社又将这 10 册合为 1 册出版（精装合订本），书名为《新编中国政治史》。这实际上是一套中国政治史通史著作，遗憾的是没有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而此后泰山出版社 2003 年出版齐涛主编的 12 卷本《中国政治通史》，其中第 12 卷《开天辟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就是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这表明当代政治史研究不再是禁区，政治史研究已更加学术化、更加成熟。

民族政治史著作有，西藏自治区《西藏政治史》评注小组编写的《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是针对 1976 年夏格巴在印度出版的《西藏政治史》进行的评注。对《西藏政治史》中杜撰的部分、史料错引漏引、篡改史料等一一澄清指明，还历史本来面目。这本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是一本爱国主义教材，对一切鼓吹"西藏独立"的论调进行了驳斥。以后，伍昆明主编《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鹭江出版社 2006 年版），全书参阅了葡萄牙文、意大利文、英文、藏文及汉文 220 余件（部）文件、档案、电函、著作、论文、译文的内容，资料翔实，论证严谨，是论述西藏政治史的权威著作。

此外，政治史著作还有魏良弢《关于喀喇汗王朝政治史述略》（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宣兆琦《齐国政治史》（齐鲁书社 1997 年版）等。

还有一些较经典的政治史著作，如王连升主编《中国宫廷政治》（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李治安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

① 王金鋙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史：191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82 页。

版)、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侯宜杰《20 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较深入地揭示了中国政治史的特别风貌。再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论述了从公元 4 世纪初年至 5 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虽不是全面的东晋政治史,但从东晋门阀士族的兴替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也可一窥东晋政治史基本面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一节中也有对此书的介绍,可以参见)。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虽是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作者却没有只停留在制度的探讨上,而是进入到社会角色中去,把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和政治学相关理论引入到历史学来进行分析,可以说此书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吏制的著作,这也是社会政治史研究的新尝试。

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史研究,一方面是开始振兴,另一方面也面临挑战,如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崛起,使政治史已不可能享有老大、老二的地位,并有边缘化的趋势。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也与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发生冲突,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政治史研究强调"变",日新月异;而社会史研究则强调"不变",中国近代社会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些变化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实质。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放到一起去,就好像是在说两个国家。[①]如何化解政治史与社会史的隔阂、冲突,成了一个新课题。

2.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②]

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主干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成果很多。如通史型的著作有:左言东《中国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1989 年第 2 版)、张晋藩等《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邵德门《中国政治制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李天庆等《中国政治制度史》(学苑出版社 1989 年版)、杨鸿年等《中国政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王惠岩等《中国政

---

① 茅海建:《中国近代政治史面对的挑战及其思考》,《史林》2006 年第 6 期。

② 本节参考了薛明扬:《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探索与争鸣》1987 年第 6 期),白钢:《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学研究》1989 年第 6 期),白钢:《20 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赵秀玲:《50 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及其展望》(《政治学研究》1999 年第 4 期)等。

治制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陈高华《中国政治制度史纲》(黄山书社 1991 年版)、张星久等《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储考山等《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三联书店 1993 年版)、史远芹《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版)、朱延惠《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00 版),等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著作有:王汉昌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罗辉映主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等。《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著作还有不少,但不少是教材。有些《中国政治制度史》书,内容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有些《中国政治制度史》书已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如左言东《中国政治制度史》1989 年第 2 版,就较 1986 年初版增加了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的论述。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也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王德宝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政治管理专业教材,则写到清末,没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中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新开拓,也完全形成了纵向贯通的中国政治制度史通史著作。左言东、韦庆远的书都是教材,从先秦一直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有利于讲清楚政治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专题史著作也有不少,如王汉昌主编《中国古代人事制度》(劳动人事出版社 1986 年版)、刘文瑞《继承与变革: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的发展历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祝晏君等《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李铁《中国文官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刘梅生主编《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史略》(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楼劲等《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许树安《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朱绍侯《军功爵制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1997 年第 2 版)、秀奇《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1 年版)、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彭勃等《中国监察制度史》(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 年版)、谢重光等

《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006年第2版)、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著作也很多,详《中国法制史研究发展》一节。

中国古代各代政治制度史的著作也很多,如张秉楠《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亚初等《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葛志毅《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齐鲁书社1984—1985年版)、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8年第2版)、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年版)、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2年版)、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版)、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关文发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薇《明代的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学苑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郭松义等《清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张玉芬《清朝皇嗣制度》(大连出版社1991年版)、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年版)、赵云田《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

禁城出版社 1988 年版），等等。以上可见，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已有很大的发展。

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也进展很快，主要著作有林代昭等《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李进修《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刘梅生主编《中国近代文官制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韩延龙等《中国近代警察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王松、周一平《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魏余秀主编《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袁继成等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林炯如等《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 1984 年版），孔庆泰等《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黄志仁《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张光宇主编《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宋金寿等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蒋伯英等《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以上政治制度史著作，也有一部分是教材。以上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政权建设的研究著作的问世，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新气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著作问世，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新气象，表明中国政治制度史著作中的附带、涉及性的研究发展到了专题性的全面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已完全成为一个学术领域，也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诞生。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浦兴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罗成徽主编《中国当代政治制度》（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张明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陈明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迟福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浦兴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国家行政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机构五十年》（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0 年版）、蔡

庆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洋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研究:政治制度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还有谢庆奎《当代中国政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金山等主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何华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袁瑞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蔡定剑《人民代表大会二十年发展与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王崇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文正邦等《共和国宪政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李盛平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夏禹龙等主编《2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发展,对于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很直接的作用。

还有民族政治制度史著作,如谢本书等《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已有了前所未有的飞跃。以下是几本著作的具体面貌。

王惠岩等《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下册,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是在王惠岩《中国政治与法律制度史讲义》(吉林大学1962年印)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983年12月完稿,吉林大学校内印行,后又不断修改,1989年正式出版。上册论述中国夏朝至鸦片战争前清朝的政治制度史,下册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每个朝代基本上从国家机构、地方机构、军事制度、官吏制度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对政治制度、官吏制度等的经验教训有所总结。此书在20世纪60年代的讲义基础上修改而成,成书在80年代前期,在论述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时还是有点感情色彩。

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著作,分《总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辽金西夏》、《元代》、《明代》、《清代》十卷。没有写中华民国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总论》综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各断代卷论述各代政治制度。各卷基本上都分元首制度(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中央行政体制、

地方行政体制、立法和司法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财政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几个部分展开论述。书中认为，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评价，应当采取历史主义的原则，采取科学的态度，不能用“专制主义”一语骂倒。既要看到以往勒定成文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一面，即它对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治理国家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对周边国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等等，又要看到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它还有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窒息科学文化的进步，尤其是对近代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的一面。①从历史主义原则出发，书中论述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时，一方面指出了它依附于皇权，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国古代的监察机构是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在整饬吏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谏官在规谏官员除授不当、规谏穷兵黩武、规谏穷奢极欲、规谏滥施刑罚、驳正诏书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②书中指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是有不少经验值得借鉴的。比如，人事管理方面就有一套比较成功的经验。一是采取考试制度，并且使科举考试制度法律化；二是在官员的使用上，注重实践的考绩，先试职，后实授；三是在官员的管理上，实行品阶、俸禄、考课、铨选、迁转、监察、回避、请假、致仕等一整套严密制度。如宋代的回避制度，有避亲法、避嫌法、避籍和避置产业州县等立法。这些都是“历代统治者为实现政治清明，保持官员廉洁、提高行政效率所作的努力，其中许多内容至今仍不乏启迪和借鉴之处”。指出：“那种以为搞现代化就要摒弃传统的观点是不对的。事实上，只有把现代化注入传统，改造传统，以形成新的传统，才能保持我们的民族特色，实现真正的现代化。”③这套书不仅资料丰富，而且思想性、现实性都很强。

陈明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是第一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为书名的政治制度史著作，记述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至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建立、发展的历史。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共和地方行政制度、国防制度、外交制度、人口制度、教育制度、干部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都分门别类逐一记述，既述历史，亦总结经验教训。如记述司法制度的曲折发展时指出：从 1957—

---

①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总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01—802 页。

②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总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91—597 页。

③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总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6—56 页。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中，由于在指导方针上"左"倾错误的产生，破坏了"以法治国"的思想，不仅没有大量地制出新的法律，相反，原有的法律制度得不到贯彻执行。所以，社会主义的法制受到严重破坏。①正是吸取了沉痛的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从根本纠正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就是法律的现象，走上了以法治国的时期，保障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全面开展，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②这样的论述是一针见血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书中在总结经验教训中也强调了必须党政分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已经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碍于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设，有碍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党政本身的混乱，引起了国家行政体制内部各种功能的紊乱。"弊端很多，如机构重叠、行政人员臃肿、环节繁多、效率低下，不利于增强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不利于社会民众参政热情和参政能力的发挥，不利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巩固和完善，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③这样的论述也是一针见血极有现实意义的。又如在论述"一国两制"的意义时强调："一国两制"有利于保持香港、澳门、台湾的繁荣与稳定，也必将有助于全中国的繁荣与稳定；"一国两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上的传统观念；"一国两制"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性的标志。它对于中国未来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④这样的论述是有理论深度的。书中也指出西方两院制、三权分立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的："有人提出要在中国搞西方国家的上、下两院的议会政治，即把人大变为上议院（或参议院），政协变为下议院（或众议院）。这完全违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上、下两院或三权分立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那样不仅会削弱党的领导，而且会失去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优势。"⑤足见全书的思想性是很强的。

---

① 陈明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② 陈明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429页。
③ 陈明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266页。
④ 陈明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513页。
⑤ 陈明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175页。

3.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①]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著作很多。通史型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著作主要有：王引淑等《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3 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徐大同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朱日耀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等等。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著作有:邵德门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 1983 年版)、桑咸之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姚风莲等《简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张馨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鱼俊清等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简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朱曰耀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钟康模《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王有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谭双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田海林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田子渝等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档案出版社 1990 年版)、许光杦等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刘健清等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彭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 1982 年印)、林茂生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李世平《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严怀儒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彭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范荣祥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谌宗仁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高军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刘景富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东北师范大

---

① 本节参考了葛荃:《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文史哲》2006 年第 5 期),朱汉国等:《近 30 年来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8 年第 10 期),杜文君:《十年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阎书钦:《近十年来国内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3 年第 5 期),杨海蛟等:《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透视》(《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4 期)等。

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王金閣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海振忠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俞祖华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2009 年第 2 版),等等。还有陈旭麓等《"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等。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著作有:范小方等《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翁有为等《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 1991 年版)、张光宇主编《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王桧林《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党建读物出版社 1998 年版)、段瑞华等《苏区思想发展历程》(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等。还有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 年版)、林代昭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王兰垣等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沈宝祥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7 年版)、金隆德等《时代的呼唤: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等。以及郑德荣等《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讲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郑德荣等主编《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下卷,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1991 年版)、杨超等主编《毛泽东思想史》(4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1993 年版,2001 年第 2 版)、金春明等主编《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刘放《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简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毛泽东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欧阳国庆等《邓小平理论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杨三省主编《邓小平理论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杨先农等主编《邓小平理论发展史》(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蒋世琳主编《邓小平理论发展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9 年版)、俞良早等《邓小平理论发展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以上众多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有一部分是教材。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共产党思想著作的出版,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开拓。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为《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元明清卷》3 卷,论述商、周至清鸦片战争中国政治思

想、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原有续写第四、第五卷的想法,后未果。这套书是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中国大陆出版的篇幅较大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通史著作。刘泽华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主题是: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由古代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主要是对上述三者的超越,即:由君主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崇圣观念向自由观念的转变。①书中论述龚自珍政治思想时指出:龚自珍是第一个明确以"衰世"来看待世道的思想家。龚自珍的政见虽不足以创新,却可引以破旧。从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文化范式上看,龚自珍属于旧的时代,其政治思想属于封建主义政治文化范畴。龚自珍没有摆脱"尊君—罪君"传统政治文化范式,即一方面"罪君",非议、批判乃至抨击帝王,另一方面又"尊君",即尊崇君主制度、尊崇理想中的圣王或以尊崇时君为己任。在西方思想涌入中国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才开始摆脱"尊君—罪君"传统政治文化范式。②这些都是独到的一家之言,亦可见研究的深度及思想性。

田子渝等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档案出版社 1990 年版),记述了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49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百余年间中国各阶级、各党各派的政治主张、政治思想理论及其矛盾斗争。内容广泛,论述较为客观。全书 19 章,其中第六章"五四新文化运动"、第八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第十五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第十七章"抗日战争时期各种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第十九章"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纲领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都涉及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论述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时指出: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又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适合中国国情。这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和重大贡献。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断巩固和发展,为全面社会主义的建设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历史时期,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和革命传统,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权阶级基础的广泛性,表明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③这些论述,反映了此书的理论研究深度及思想价值。

翁有为等《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论述了 1949 年 10 月至 1992 年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的曲折发展,总

---

①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小序》。

②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28—732 页。

③ 田子渝等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档案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09—411 页。

结了经验教训。涉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统战理论、民主宪政思想等。书中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是以当代中国的国情为母体、以社会主义为灵魂、以现代化为血肉的新的思想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又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思想,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思想。它是自成一体的,又是广取博采的;它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是注重优秀传统的,又是导向现代化的;它曾有过幼稚甚至荒唐的昨天,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正在摆脱幼稚,走向成熟。[①]并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可以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一个时期可称为"毛泽东时代",后一个时期可称为"邓小平时代"。在第一个时期,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先后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发展、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与思考,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也有不少严重的失误,甚至在较长时期内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使当代中国政治思想这一新生命出现了严重的病态。在第二个时期,邓小平与第二代、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比较成功地探讨和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适合当代中国实际的邓小平理论,使当代中国政治思想这一新体系焕发了勃勃生机和活力。[②]在探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时,书中指出: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政治思想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证;第二,民主化和法治化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标志和目标;第三,社会实践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向前发展的基础和检验是非的标准;第四,爱国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健康繁荣的立足点和生命线。[③]以上这些论述,可以反映出此书的理论研究深度及思想价值、现实意义。

关于现当代政治思想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及存在的问题,还可参见杜文君《十年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阎书钦《近十年来国内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3 年第 5 期)、朱汉国等《近 30 年来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

---

① 翁有为等:《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② 翁有为等:《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8—419 页。

③ 翁有为等:《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6—431 页。

2008年第10期)等。

4. 政治文化史[①]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中国政治文化史研究也很快兴起，这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并推动了中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进展。“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5年首次使用。[②]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尽管对“政治文化”的内涵，西方学者、中国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把政治上升扩展到文化层面进行认识、研究和建设，确实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1987年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讨会在吉林大学举行，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文化史的研讨会。随后，政治文化丛书开始推出，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丛书的推出。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1993年推出的《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收入了《千秋功罪：君主与中国政治》(赵轶峰等)、《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葛剑雄)、《礼的精神：礼乐文化与中国政治》(柳肃)、《圣王理想的幻灭：伦理观念与中国政治》(朱汉民)、《被阉割的守护神：宦官与中国政治》(冷冬)、《权力裂变：监察·监督与中国政治》(黄百炼)、《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吴松弟)、《两种智慧：科学与中国政治》(李杨)、《冲击与蜕变：西方文化与中国政治》(胡维革等)、《社会反三和弦：民族、民俗与中国政治》(宋抵)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推出的《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收入了《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杨阳)、《亦主亦奴：中国古代官僚的社会人格》(张分田)、《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葛荃)、《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张荣明)、《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胡学常)等。以上这些书，大多以政治文化的理论，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内涵、政治性，反思它们在现实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如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指出：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政治精神是社会主体关于政治价值认识、政治伦理观念、政治意识及情感等在思想上的凝聚和提升。政治精神的表达可以通过话

---

① 本节参考了葛荃：《拿来与创新：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马庆钰：《近50年来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顾》(《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蒋英州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主题及其特点》(《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等。

② 详见G.阿尔蒙德著、李黎译：《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8期。

语，也可以通过政治行为或其他政治表现。政治精神一旦形成，对于认识主体的行为选择将产生强大的支配力。政治精神对于人的政治存在是至关重要的。[①]全书以明朝东林党人为个案，从政治精神切入，剖析、梳理了制约着中国封建社会士人政治存在及其行为选择的志向、观念、情感、心理等。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士人是思想上的巨人，他们祖述尧舜、宪章汤武，自命为往昔圣贤的当然传人，研习经典为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士人又是行动上的矮子，他们尊师孔子，礼敬权威，奉行的根本价值准则是"尊王"，遵行的首要道德规范是"忠诚"。因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在无可抗拒的王权面前，他们总要跪拜阶下，虽说他们有时也能做到直言敢谏，据理力争。[②]书中又指出：士人既是儒家文化的实际承载者，又是君主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在政治运作中举足轻重，历史上的士人确乎处在文化与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所思与所为，就不能不带有生而与俱的政治文化意义。士人身负的文化内涵，诸如道德品性、理想信仰、人格特质、思维定式等在长期的历史遭递中，已经融入了文化传统而符码化，它们并没有随着士人的消亡而寂灭，而是偕裹于传统文化之中延传下来。士人身上曾经具备的所有优长与拙劣、胆识与懦弱、精湛与平庸，仍然以各种形式和各种面目，不同程度地存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认真剖析历史上士人们的思与行，将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反思和认识自我的起步。[③]以上已可见全书的政治文化意义及深深的现实关怀。

刘泽华是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也是较早重视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推出的《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就是由他主编的。他认为，中国政治史、政治思想史上有些现象只有从政治文化角度去解释才能说得通。如海瑞与东林党人把自己的死置之度外，却为荒唐皇帝的声誉忧心忡忡，担心"徒使枉杀臣子之名，归之皇上"（杨涟语）。对这种现象很难用一般的历史研究方法说清楚，而用"政治文化"的方法则可以得到较合理的解释：在君主面前没有任何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可言，在"圣旨"面前没有是非可论，与"天子圣明"相对的是"臣罪当死"。许多历史现象很难用理性去分析，而用"政治文化"却很容易理解其中的蕴意。[④]他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一方面是文化政治化，如儒家文化上升为

① 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② 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 页。
③ 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 页。
④ 刘泽华：《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序》，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政治文化化，即政治制度通过不断的社会化过程，逐渐内化为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皇帝至上观念，即绝对权威崇拜，就是长期的君主专制制度社会化的产物。[①]所以刘泽华比较强调应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他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3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已注重从“政治文化”切入。如《先秦卷》第十三章标题就是“诸子政治文化总论”。《隋唐宋元明清卷》论述龚自珍政治思想时，设了一小节“‘尊君—罪君’政治文化范式”，强调了龚自珍没有摆脱“尊君—罪君”传统政治文化范式（详前）。

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也是中国政治文化史的著作。如《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就强调：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走向未来之时，首先必须回顾历史。在今天，对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作认真的清理和总结，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重要。因为，我们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对传统作深刻的批判和反思。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因此，要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传统，就必须以政治为切入点。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范式是以“圣化”为中心。虽然，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蕴涵着丰富多彩的政治智慧和极为光辉的远见卓识，但是作为一种范式，传统政治思维必须被扬弃。[②]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研究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士大夫政治。此书旨在通过记述士大夫政治的演生，揭示一种独特政治文化模式的演生过程和结构设计。这种模式作为传统，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行为、制度和观念，并且就是在那些行为、制度和观念之中，体现了它的存在。作者强调：“我们的讨论将要涉及的，主要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所以“本书的叙述线索、整体框架以及对历史材料的运用、解释和组织，与基于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或社会史的视角所做的处理，就将经常有颇大的不同”。[③]即强调了本书是一本政治文化史的著作。

---

① 刘泽华：《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第2—4页。

③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中国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包含着对现实政治文化的反思，对推动现实政治文化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积极作用，这与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是一样的。

5. 政党史

中国政党史研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活动恢复正常并得到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实践及其经验教训的研究成为社会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各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中国政党史》、《中国民主党派史》等课，教材的编写也成为重要任务。中国政党史研究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详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一节），其他研究也有了突破性发展。

（1）中国政党史

出版的著作有：朱建华等《中国近现代政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朱建华等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政党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朱建华主编《中国近代政党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1894—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朱汉国《中国政党制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等等。

其中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1894—1949）》篇幅较大，此书论述了 1894 年兴中会成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现代政党产生、发展的历史，涉及近百个政党的政治主张、政治活动，对各政党的进步政策与实践活动都给予了肯定。资料丰富、翔实。书中总结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总结中国近百年来政党发展史的经验，可以肯定地说，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①]指出："历史经验证明，任何政党只有顺应时代潮流，肩负起国家民族的历史任务才能发展和获得成功。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党，不管它一时多么强大终将受挫失败。近代中国的政党，先后不下数百个，曾经出现过三次政党纷建的高潮，一时鼓荡起颇具规模的民主主义波澜，但是时不多久，大多数政党都灰飞烟灭，有的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追根究底，都脱不出这一客观规律，历史的淘汰。"并引用宋庆龄的话说："国民党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背叛了人民；共产党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属于人民和人民在一起。"[②]指出：历史经验证明，任何

① 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1894—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绪论》第 12 页。

② 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1894—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绪论》第 14—15 页。

一个政党要取得发展和胜利，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的同盟者，为共同目标而合作，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合则两利，分则两伤”。[①]并强调：近代中国先后出现几百个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彻底胜利，是因为共产党是由当代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它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严密的组织，有千千万万矢志为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战士，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因而得到各革命阶级、阶层、党派的广泛支持。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伟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历史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各民主党派给中共诞生二十八周年的贺电中所说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三百余万共产党员在毛主席领导下艰苦奋斗，实为其最主要的因素。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始能终了。贵党之诞生，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信号”。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1949 年 9 月，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同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一些民主人士参加了各级人民政权的领导工作，正式形成了多党合作的格局。这一切说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历史的必然，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选择。[②]这些论述，反映了全书的理论研究深度及思想性。

朱建华等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政党史》，是朱建华等《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的姐妹篇，是最早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党发展史的著作之一，是中国政党史研究的一个新进展。论述了 1949 年 10 月至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政党的发展，或者说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曲折发展的历史。论述基本上比较客观。如论述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时，一方面肯定各民主党派帮助了共产党整党，同时也指出有极少数分子乘机向共产党进攻。并对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进行了批评，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大批的知识分子，一些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久经考验的党的老干部，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作家，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被打成右派，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不能为国家发挥他们的聪

---

① 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1894—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绪论》第 16 页。

② 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1894—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绪论》第 17—19 页。

明才智,这不仅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各民主党派一部分成员及其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挫伤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内一些有历史经验的领导成员,在反右斗争以后离开了各级领导岗位,影响各民主党派本身工作的开展,损害了民主党派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影响,这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一个严重的损害。也是对民主党派的一次严重的冲击。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生活,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①这样的论述是深刻的,有现实意义的。全书的中共党史色彩较浓,政治学理论的色彩还不浓,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怎么认识、怎么建设,怎么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等,论述还不够。

(2) 中国民主党派史②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党派,主要是指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八个参政党,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主要是指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有爱国民主人士和一些进步分子参加的具有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性质的党派,是坚持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与中国共产党进行长期合作、共同奋斗的党派。除了现存的八个党派外,还有中国人民救国会(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以上三个党派,1949 年 9 月宣布结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民权同盟)、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民族大同盟)、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旅美联盟)、中华职业教育社(职教社)、乡村建设派(以上五个党派较早就已结束或与其他党派融合)以及 1949 年随国民党迁至台湾的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主要是研究以上党派的产生、演变。

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的著作很多。其中出版的丛书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1996 年推出了彦奇主编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收入了彦奇等

---

① 朱建华等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政党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4—145 页。

② 本节参考了李玉荣:《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综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1 期;余科杰:《中国各民主党派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朱新镛:《民主党派史研究的回顾和改进》,《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 期等。

《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1984 年)、曹健民等《中国民主同盟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1994 年)、王德夫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1994 年)、周淑真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历史研究》(1996 年)等。以后有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推出了薛启亮主编的《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收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卷》、《中国致公党卷》、《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卷》、《九三学社卷》、《中国农工民主党卷》、《中国民主促进会卷》、《中国民主建国会卷》、《中国民主同盟卷》。丛书的出版，足见研究的发展很快。

其他综合性的著作有：邱钱牧《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中国民主党派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姜平《中国民主党派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李起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胡邦宁等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王天文等《中国民主党派史纲：民主革命时期》(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杨育光等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修订版)，俞云波等《中国民主党派史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刘秉扬《中国民主党派史纲：民主革命时期》(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吴智棠等主编《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道路》(沈阳出版社 1989 年版)，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国革命与民主党派》(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李田贵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王德华等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党派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窦爱芝《中国民主党派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张癸《中国民主党派史纲：1927—198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陈志远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稿：1928—1988》(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曹健民主编《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林治理等主编《中国民主党派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孙晓华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刘延东主编《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年版)等。以上诸书有一部分只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只写了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一部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写到社会主义时期。从写法上来看，大部分书分时期、阶段记述，少部分书以党派记述为主，一

个一个党派的历史分别记述。如俞云波等《中国民主党派史述略》,便是分别记述八个民主党派的历史,每一个党派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写到社会主义时期,并分时期、阶段记述。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史、地方史著作,如袁旭等《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年版)、廖明铨等主编《西南财经大学民主党派史略》(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王孔杰主编《山东民革五十年》(齐鲁书社 2000 年版)等。各地新修地方志,大多也设了民主党派志,如王季平总纂《吉林省志·民主党派、工商联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民主党派志》(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 年版)、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志·民主党派志、工商业联合会志、国民党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民主党派、工商联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民主党派、工商联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民主党派、工商联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郭凤岐总主编《天津通志·政协民主党派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民主党派、工商联、国民党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等,以及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政协、民主党派、工商业联合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等。这表明民主党派史的研究已得到非常广泛的重视,已非常广泛地开展起来。

陈志远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稿(1928—1988)》,是综合性的通史型的分时期、分阶段论述的中国民主党派史著作。全书对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过程中的积极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各民主党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为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为胜利进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多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各民主党派在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做出的贡献,书中也作了充分的肯定。书中引用邓小平的话强调:各民主党派“都已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①全书有一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的色

① 陈志远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稿(1928—1988)》,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5—346 页。

彩，从政治学理论层面分析研究问题还不够，叙史多，理论分析不多。

（3）中国国民党史[①]

中国国民党史研究，1949年10月至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没有怎么展开。随着解放思想的深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逐渐开展，至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著作出版。主要著作有：李友红等《中国国民党简史：1894—1949》（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肖效钦《中国国民党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苗建寅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894—1988》（西安交大出版社1990年版）、季鸿生等《中国国民党史纲》（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彦奇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文主编《中国国民党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刘健清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季鸿生等《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神州出版社1992年版）、马尚斌等《中国国民党史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肖恩芳《中国国民党一百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万邦《中国国民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3册（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专题性的著作有：孙彩霞《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简介（1924—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尚明轩《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尹诚善等《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金德群主编《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1905—1949）》（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汪学起等《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王彦民《蒋介石与国民党腐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史的研究，国民党军队史的研究等还有不少著作。还有地方性的国民党史，如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等《四川国民党史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各地编地方志，也有“国民党志”。关于国民党到台湾以后的历史研究也有一些，如宋春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郭传玺主编《中国国民党台湾40年史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等。有很多通史型的著作，又有不少专题性的著作，足见大陆的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发展非常快，也在日益深入。

---

① 本节参考了李松林《90年代中国国民党史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茅家琦《中国国民党史研究概况述评》（《民国档案》2003年第3期）等。

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三册，是以上所出书中篇幅最大的，分三编：上编《中国国民党的创立和发展(1894—1927)》，从创立兴中会写到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中编《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统治(1928—1949)》，从1928年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写到1949年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覆灭。下编《中国国民党在台湾(1949—1994)》，从1949年国民党移至台湾写到1994年。最后是《附录》，分两部分：一、《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统治主要代表人物、重要会议及文献》，二、《中国国民党历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成员名单及机构演变概况》。全书资料丰富，立论较公允。对国民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给予肯定，对国民党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不幸进行了批评。书中强调：国共两党"只应合作，不应分裂"，"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也是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所应走的历史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应当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为重，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图祖国统一大业，使我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早日昂首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①]书中对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领导人李登辉走向"台独"进行了谴责，号召"全世界的炎黄子孙，携起手来，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共同努力"。[②]《附录》中的"一、《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统治主要代表人物、重要会议及文献》"，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列了50人(为50人作了小传)，有黄兴、宋教仁、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蔡廷锴、胡適等，没有蒋介石、蒋经国等。这样的《主要代表人物》冠以"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统治"，似乎是不妥当的，题为《中国国民党主要代表人物、重要会议及文献》较合理。

(4) 各政党人物研究

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中国大陆政党人物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物的研究，特别是毛泽东研究有一些成果，其他党派人物的研究成果很少。比如蒋介石的研究，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展开，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大陆流传的关于蒋介石的书仅为翻印的唐人的《金陵春梦》(类似章回小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内部发行。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在海峡两岸对立的年代，大陆学者很难去研究蒋介石，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中共十一届三保全会以后，随着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端正，随着学术研究的健康、深入发

① 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1册，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第2页。
② 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2册，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5页。

展，也由于人民群众很想了解一些知名人物各方面情况，各方面人物的研究都火爆起来。中国共产党人物的研究大发展，从领袖人物扩展到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人物，民主党派人物、国民党人物的研究也前所未有地发展起来，也扩展到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人物。

首先，民主党派人物、国民党人物的传记集、类传纷纷出版。1978—2000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民国人物传》10 卷，其中就收入了大量的民主党派人物、国民党人物。此外有宋玛利等《中国民主党派创始人传略》（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5 卷（华夏出版社 1991—1994 年版），蒋景源主编《中国民主党派人物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彭庆遐、刘维叔《中国民主党派历史人物》（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年版），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中国革命博物馆《国民党将领传略》（新华出版社 1989 年版），刘继增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名人录》（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3 年版），刘国铭《中国国民党二百上将传》（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沉度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传略》（华文出版社 1995 年版），戚伍《国民党超级特务谱》（团结出版社 1994 年版），夏继诚《国民党将军人生悲欢录：反戈》、《国民党将军人生悲欢录：折戟》、《国民党将军人生悲欢录：喋血》（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化夷《国民党去台高官大结局》（珠海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其次，民主党派人物、国民党人物的研究专著大量出版，不胜枚举。从 1979—2000 年，孙中山生平、思想研究的著作有二百余种；宋庆龄生平、思想研究的著作有一百余种；蒋介石生平、思想研究的著作有二百余种；宋美龄生平、思想研究的著作有五六十种；宋子文生平、思想研究的著作有十余种，其中吴景平就出版了“宋子文研究系列”，有《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1998 年第 2 版）、《宋子文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等等。其他各种人物研究的传记、年谱等著作可以说已汗牛充栋。如研究陶行知，研究梁漱溟，都有近百种著作。

以上民主党派人物、国民党人物研究著作在中国大陆的大量出版，在改革开放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一是由于政治上的忌讳难以去涉及，二是资料也难以获得，三是即便去涉及也难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感情色彩。而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问题陆续都成为过去，所以才有研究、出版的空前火爆。而且对民主党派人物、国

民党人物的研究，大多都是学术性的，都能实事求是、平实公允。如张宪文等主编《蒋介石全传》2 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指出：蒋介石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为推翻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统治作出过有益的贡献。[①]蒋介石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着力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②]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束缚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限制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一新的、与北洋政府不尽相同的政治体制，也还有它的积极的一面。它的五院制度、政治上的监察制度以及人事上的考铨制度等，都有一些值得思考和总结的经验和教训。[③]同时又指出：蒋介石一生曾与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不仅导致两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也使海峡两岸长期分离 40 年，为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幸。[④]书中对到台湾以后的蒋介石的评价是：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吸取了失败的严重教训，一方面刷新政治，改造国民党，起用了一批少壮派力量，并在国际上完全依赖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推行新的土改政策和经济措施，这些都为台湾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蒋介石到台湾后，继续实行独裁政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控制，长时间实行戒严政策，至死未放弃反共复国的梦想。但是，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⑤]全书对蒋介石的评价是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平实公允的。此书的资料工作是下了功夫的，但正如作者坦言的，唯一的缺憾是还没有看到台湾的“大溪档案”，[⑥]这就使研究难免存在着某些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政治史研究有了广泛深入的发展，但如何上一个新台阶，仍须认真探索。如在中国政治史的研究中如何加强理论研究，如加强对专制主义的理论研究，加强对民主政治的理论研究，加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研究，加强政治学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融会贯通等，仍须下大力气努力研究、实践。又

---

① 张宪文等主编：《蒋介石全传》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绪论》第 2 页。
② 张宪文等主编：《蒋介石全传》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绪论》第 10—11 页。
③ 张宪文等主编：《蒋介石全传》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绪论》第 12 页。
④ 张宪文等主编：《蒋介石全传》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绪论》第 4 页。
⑤ 张宪文等主编：《蒋介石全传》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绪论》第 13 页。
⑥ 张宪文等主编：《蒋介石全传》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绪论》第 1 页。

如，对于西方的新政治史如何借鉴，如何更好地将社会学、社会史、文化学、文化史与政治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也须下大力气努力研究、实践。2000 年以来，已有很多学者关注了政治史研究如何发展的问题。如杨念群《为什么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茅海建《中国近代政治史面对的挑战及其思考》（《史林》2006 年第 6 期），王海燕等《从"地方"到"整体"——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徐永志、戴巍《政治—社会史：深化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史学月刊》2007 年第 1 期），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历史研究》2009 年第 6 期），台湾学者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综论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趋向》（《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刘文鹏《清朝的满族特色——对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动态的思考》（《清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刘向阳《论环境政治史的合法性》（《史学月刊》2009 年第 12 期）、《环境、权力与政治：论塞缪尔·黑斯的环境政治史思想》（《郑州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李正华《中国当代政治史学科建设与发展前景》（《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等等。学者们纷纷提出政治史研究在史学多元化跨学科趋势中，怎样更好发展的途径。有的也指出了新政治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政治史范围的扩展、视阈的敞开在给政治史研究带来了无限活力的同时，也意味着其界限的消融、面目的模糊。新政治史正在失去政治史的"政治特征"，在政治史研究中过多地强调文化和象征层面的问题，似乎也有矫枉过正之嫌，等等。①学者们的很多意见值得重视、参考。

二、中国法制史研究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法制史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如丁元普《中国法制史》（法学编译社 1930 年版）、程树德《中国法制史》（华通书局 1931 年版）、陈顾远《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等等。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20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可以分以下几个阶段论述：

---

① 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

(一) 开新与局限(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时代任务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发展。同时，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学术事业的政策也对当时的史学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式提出，对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此外，广大学者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热潮，并在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上形成了新的共识，如：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些新认识自然使学术研究、历史研究、中国法制史研究出现了新面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些政治运动、思想、学术批判运动中的较“左”、过“左”的做法，也影响了学术研究、历史研究、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史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记述：

首先，学科理论问题研究有发展。有不少文章发表，如戴克光《关于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2月30日)、蒲坚《关于“中国法制史”名称的商榷》(《新建设》1957年第4期)、蒲坚《试论中国国家与法历史的对象和范围的问题》(《新建设》1957年第5期)、张晋藩《试论“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的对象”》(《教学与研究》1958年第5期)等。在理论问题的讨论中，学科名称首当其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政治、经济等领域“以苏联为师”，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也“以苏联为师”。当时苏联高校中讲法制史的课的名称是“国家与法的历史”，于是中国的一些高校也开“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课，而不是开“中国法制史”课。戴克光等则主张应该沿用“法制史”这一学科名称，因为这一学科包含了国家与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内容，没有必要借用“国家与法的历史”这一学科名称。戴克光指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研究中国国家与法的产生和它们在各个历史阶段里面的发展变化的过程；(2)研究在特定历史阶段里面的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及它们所具有的特点；(3)国家与法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作用；(4)研究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及其法制产生、发展和它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中所发挥的巨大创造性的作用。”①这时的讨论，尽管有局限性，但也使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对象、范围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① 戴克光：《关于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2月30日。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开始起步。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国法制史书不多,有的是翻印民国时期的著作,如商务印书馆 1959 年重印了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写的书有几种,虽然少,但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已很强烈,政治色彩也很强烈,自然局限性是难免的。

如张晋藩等《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宪丑史》(通俗读物出版社 1955 年版),是一本 2.5 万字左右的中国近现代法制史小册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指导,论述了清政府的"立宪"、北洋政府的"制宪"、国民党政府的"制宪"的历史。强调: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搞的都是"伪宪法",他们实际上是不要任何宪法的,他们对人民的任何民主自由都是反对的,他们制造伪宪法的目的,是要抵挡人民革命,企图援救自身的灭亡。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取得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才能制定出人民自己的宪法来,中国人民才能享受到民主宪法所带来的自由权利与幸福。[①]这样的论述,政治色彩、感情色彩显然是浓厚的,但这对于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本书除了引用毛泽东的两段话注了出处外,其他引用的资料都没有注出处,资料价值、学术价值是有点欠缺的。

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3 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63—1965 年版),是一部贯通中国古代、近现代及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史著作。主要特色是:第一,用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法制史进行了阶段划分、论述。分期为:中国奴隶制国家与法权时期(夏至春秋)、中国封建制国家与法权时期(战国至 1840 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国家与法权(1840—1949 年)与人民民主政权时期(1949 年之前)。这样的分期突破了民国时期中国法制史著作以朝代断限的方法,体现了理论的新意。这样的分期显然更利于认识国家与法权的阶级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如书中论述商代的国家与法权,强调:"把握阶级斗争的线索,是考查商朝奴隶制国家和法权的基本观点。"[②]"商朝法律是奴隶主贵族阶段的法律,是他们用来镇压奴隶和平民反抗的重要工具之一。"[③]这样的论述,显然从历史现象

① 张晋藩等:《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宪丑史》,通俗读物出版社 1955 年版,《编者的话》第 1—2 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分册),人民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5 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分册),人民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5 页。

深入到了历史本质。当然,这样的分期和论述受到范文澜、郭沫若等撰写的中国通史的影响也是明显的。第二,"厚今薄古"。这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史学界流行的口号,中国法制史研究自然也是如此。《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的第一册考察了古代国家与法权的历史,第二册考察了近现代,第三册考察了中国革命根据地。换言之,古代部分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近现代部分占全书的三分之二。与民国时期中国法制史著作"厚古薄今"做法完全不同。"厚今薄古",研究现实史,研究距离现实近的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最能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这是现实政治需要的,是有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的。但从学术价值来看,研究任何一个时段的历史都是有价值的。如果一味追求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无视学术价值,那就会走向学术研究的反面,走向实用主义。《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如只对国家与法权进行阶级分析,而对其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积极意义忽略不提,这显然是不客观、不实事求是的。

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史研究成果还有:林景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制底建立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1951年印)、李琪《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来政治法律工作的成就》(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丘汉平《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62年版),等等。

(二)顿挫与畸形(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法制遭受破坏,学术性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完全中断。但由于"四人帮"批"大儒"的政治需要,一种变形的"路线斗争史",一种畸形的中国法制史——"儒法斗争史",却红火起来,出版了大量的书。如《儒法斗争史通俗讲话:先秦部分》(北京铁路分局工人理论组、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工农兵学员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4年版)、《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李锦全等编写,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儒法斗争史讲稿》(杭州大学历史系1974年编印)、《历史上的儒法斗争》(鄂城钢铁厂工人理论组编写,湖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儒法斗争史概况》(北京大学儒法斗争史编写小组编写,山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等等,一二年里,至少出版了四十多种。

这些书的面貌是怎样的?不妨看一下北京大学儒法斗争史编写小组编写的《儒法斗争史概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此书9万字左右,分三章:一、春秋战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儒法斗争;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建社会中的儒法斗争;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儒法斗争。第三章分四节:(一)鸦片

战争时期的儒法斗争,(二)戊戌变法时期的儒法斗争,(三)辛亥革命时期的儒法斗争,(四)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的儒法斗争。书中强调:“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和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是当前政治思想战线上一项重要任务。”①足见编写儒法斗争史书,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治任务。全书虽只写到1919年前,但在第三章第四节特别写了林彪1920年写“尊孔黑文”,赞扬袁世凯恢复祀孔仪式。②书中还强调: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和咒骂法家,都是现代的儒。③这样的论述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没有什么学术意味、学术价值。

“文革”时期,还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法制史的资料整理取得一些成绩,特别是出土的古代法律文献的整理。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一批竹木简牍,其中有《守法守令十三篇》等法律文献;1972—1974年,甘肃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出土了一批包括诏书、律令、劾约等内容的文献;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地出土了《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关于秦律、律文解释和治狱文书程式方面的文献。这些文献资料填补了战国、秦汉法制史资料的空白。这些文献资料出土后,作了初步整理,这就为以后的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做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工作。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里,学术研究开始拨乱反正,但由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还未端正,学术研究还未走上正确、健康的轨道,中国法制史研究也是如此。

(三)复苏与繁荣(1978年12月至2000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一方面,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端正了,学术研究者的思想逐步解放,理论、方法日益创新,学术研究开始走上正确、健康的轨道而真正繁荣起来。另一方面,在反思“文革”的沉痛教训中,中国法制建设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研究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中国法制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快复苏并繁荣起来。

① 北京大学儒法斗争史编写小组:《儒法斗争史概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4页。

② 北京大学儒法斗争史编写小组:《儒法斗争史概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1—142页。

③ 北京大学儒法斗争史编写小组:《儒法斗争史概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页。

首先是中国的政法类大学恢复办学，一些综合性大学、文科类大学相继恢复法律系，纷纷开设中国法制史课，中国法制史的教材纷纷出版。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相继恢复或设立法学研究所。中国法制史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陆续开始培养。

接着，学术团体成立。1979年，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1982年，中国法学会成立（是"文革"前中国政法学会的恢复、发展）。学术会议频频召开，海峡两岸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国际性学术会议也相继召开。

学术报刊大量面世。1979年《法学研究》复刊，此后陆续面世的刊物有《法学》、《中国法学》、《现代法学》、《当代法学》、《法学评论》、《法学杂志》、《法制与社会发展》、《政治与法律》、《政法论丛》、《政法学刊》、《法学家》等100多种。报纸有《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北方法制报》、《西部法制报》等10种左右。

随着思想解放，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的探讨有了突破。如法律具有继承性，基本达成共识。要正确运用阶级分析及其他的研究方法探索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基本达成共识。①

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法学研究、中国法制史研究。

中国法制史研究大繁荣的具体表现是：

1. 中国法制史资料大量整理、出版

如刘歧山《古代法案选编》（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盛京刑部原档：清太宗崇德三年至崇德四年》（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4年版），湖北政法史编纂委员会《武汉抗战法制文献选编》、《武汉国共联合政府法制文献选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大理院公报》（缩微品）、《南京图大理院判决录》（缩微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3年），等等。以及雷晟生译注《近代法制文选译》（巴蜀书社1997年版）等。

2. 中国法制史通史著作大量出版

如张晋藩《中国法制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肖永清主编

① 详见陈晓枫等：《中国法制史研究世纪回眸》，《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关于1978年12月以后中国法制、法学重建的具体情况，还可以参见蔡定剑：《历史与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篇《重建和发展》。

《中国法制史简编》(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1982 年版)、游绍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10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 1995 年版),等等。1981—2000 年出版的一册本《中国法制史》书有五六十种,大多是教材。

在中国法制史通史著作中,集大成的著作是张晋藩总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全书为《夏商周》、《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清末、中华民国》、《新民主主义政权》十卷,从上古写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论述每个朝代、每个政权的法制基本上都从立法思想、立法概况、行政法律、民事法律、经济法律、刑事法律、司法制度等方面展开,纵横贯通。全书重视吸取新资料、新研究成果,开展比较研究,如第一卷设专节对中西法律起源进行比较研究。虽有个别讹误,仍堪称 20 世纪学术水平、学术价值最高的中国法制史巨著。而且也有一定的思想性。如第十卷指出:新民主主义政权法制史,开辟了中国法制史的新纪元。中国历史上各类剥削阶级的法律,是少数统治者压榨劳动人民的工具;而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法制,则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向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武器。[①]强调:认真研究新民主主义政权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直接借鉴作用。要正确理解和掌握我国现行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实质,必须从历史上考察其来龙去脉及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以避免再犯各种错误。同时应使革命根据地政法战线上积累的好思想、好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②]这套书的学术价值、思想价值、社会价值都很高。

3. 各阶段、各代法制史著作大量出版

如韩国磐《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李力《出土文物与先秦法制》(大象出版社 1997 年版),冯卓慧等《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黄中业《秦国法制建设》(辽沈出版社 1991 年版),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张景贤《汉代法制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张建国《两汉魏晋法制简说》(大象出版社 1997 年版),倪正茂《隋律研究》(法律出版社 1987 年版),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钱大群等《唐律论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① 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十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绪言》第 1 页。

② 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十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绪言》第 1—2 页。

王立民《唐律新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2001 年第 2 版),钱大群等《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赵晓耕《宋代法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王天顺主编《西夏天盛律令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8 年版),曾代伟《金律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张晋藩主编《清朝法制史》(法律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华书局 1998 年版),马作武《清末法制变革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范明辛等《中国近代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邱远猷等《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等等。

还有张希坡等主编《中国革命法制史(1921—1949)》(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87、1992 年版)、张希坡主编《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法律出版社 1994 年版)、杨木生《中央苏区法制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杨永华等《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法制出版社 1987 年版)、杨永华《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著作也出版不少,如赵震江主编《中国法制四十年(194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杨一凡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韩延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通史》(上、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林青山主编《中国法制建设 2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许骅等主编《中国法制建设 20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蔡定剑《历史与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郭成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 50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肖义舜主编《共和国法制建设 50 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年版)、曾瑞芝等主编《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其中韩国磐《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以深厚的考据学功底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提出所谓的"刘邦除苛法"未必就真的存在等(详见徐娜《〈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评介》,《北方论丛》1995 年第 1 期)。

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大大推动了秦律研究，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如高敏《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中华书局编辑部《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 1981 年版）、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等，台湾出了吴福助《睡虎地秦简论考》（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等，但研究秦律的个别方面多，而对秦律的总体研究还不够（详见谭前学《秦法制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

宋史的研究是断代史研究中相对繁盛的，法制史的研究也很热，已出了三本书：赵晓耕《宋代法制研究》、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以及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这三本书较全面地揭示了宋代法制史的全貌、宋代法制的新特点，有研究的广度，但研究的深度还欠缺。比如美国学者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书中对宋代妇女的继承权进行了研究、探讨，提出许多新见解。这类涉及宋史的有新意的、下了大工夫的著作，中国大陆还不多见，中国大陆的宋代法制史研究，大多还是人云亦云，缺乏新意和深度。

明朝法制研究中，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明大诰研究》颇见功力。不仅版本校勘、史料考辨用功很深，并采用计量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提出不少创见（详见曲英杰《一本有突破性的法律史著作——读杨一凡著〈明初重典考〉》，《学习与探索》1985 年第 3 期；林原《〈明大诰研究〉在学术上的重大建树》，《学习与探索》1990 年第 3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研究中，蔡定剑《历史与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有多方面的价值。全书计：第一篇摧毁与创建（1949—1957）；第二篇停滞与毁灭（1957—1976）；第三篇重建和发展（1976—1997）；第四篇回顾与反思；第五篇危机与变革。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近 50 年的法制建设历史，总结了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有史有论，是一本有学者独立见解、独立思想的法制史著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出现的失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论述。如第二篇指出：1957—1976 年，在法制建设方面，党和国家从开始轻视法制到彻底抛弃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彻底摧毁旧法基础上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法制，又被自己再度摧毁。①而“文化大革命”对法制的破坏很大，它抛弃宪法，践踏人权，砸烂法制机构，破坏一切法律秩序。

---

①　蔡定剑：《历史与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9 页。

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毫无权利可言，以致人的财产、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通过"文化大革命"，过去再忽视人权、法制的中国人，也深感秩序、安全、法制、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所以，"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国家领导人总结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一定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才有了1978年后中国法制的重建和发展。①书中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法制建设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也指出：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法制还面临着全面而深刻的危机，表现为旧的法律体系严重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新制定的法律仍带有很深的计划体制的烙印，法律实施机制严重失灵等。因此必须进行法制的彻底改革，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并提出了法制改革的具体建议。②全书体现了很高的学术价值、思想理论价值、社会价值。

4. 地区法制史著作出版不少

如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更多的是各地编纂的地方志都设有关法制的志，如《广州市志·公安志、检察志、审判志、司法行政志》(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陕西省志·审判志》(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甘肃省志·审判志》(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等，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江苏省志·司法志》(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湖北省志·司法》(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天津通志·审判志》(丁建津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广东省志·审判志》(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广西通志·审判志》(黄建明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还有《云南审判志(900—1994)》(邱创教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省市以下市、县的志中也都设有关法制的志。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各地法制建设历史的著作也出版了不少，如吴克泽主编《宁夏法制建设五十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毕振东主编《福建法制建设概观》(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等。1999年以后推出了《法制建设巡礼》丛书，如魏彬主编《四川法制建设巡礼》(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湖南法制建设巡礼》编辑委员会《湖南法制建设巡礼》(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黑龙江省

① 蔡定剑：《历史与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② 蔡定剑：《历史与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自序》、第五篇《危机与变革》。

人大常委会《中国法制建设巡礼·黑龙江省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等《中国法制建设巡礼·福建省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以后又有《中国法制建设巡礼·内蒙古卷》(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曾宪义《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法制建设》(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等。

这些地区法制史著作,对各地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都有深入的总结。

5. 宪法史、立法史著作也出版了一些

如张晋藩等《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 1979 年版)、蒋碧昆《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法律出版社 1988 年版)、张国福《民国宪法史》(华文出版社 1991 年版)、韩大元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张善恭《中国立法史论》(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4 年版)等。以后有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等。

张晋藩等《中国宪法史略》,论述晚清至 1978 年的宪法发展史。1979 年 1 月成书,是新时期第一本中国宪法史著作,但书中的某些论述还不够客观。张晋藩 2004 年出版的《中国宪法史》,论述较为客观,学术价值也大大提高。

韩大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共同纲领》、1954 年《宪法》、1975 年《宪法》、1978 年《宪法》、1982 年《宪法》及宪法的历次修改,作了深入、全面的记述。客观分析了宪法与社会生活、特定环境的相互联系,实事求是指出了每一部《宪法》的长处及不足。还对中国宪法的发展趋势作了展望,指出趋势之一是走向国际化,这包括如下内容:中国宪法在国际宪法体系中应居于平等的地位,这种地位应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相适应;中国宪法发展的经验与实践中开发的宪法理论应取得与世界宪法体系平等对话的能力;中国宪法的国际化将有利于世界宪法发挥维护和平与正义的功能,推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强调:中国宪法是在拥有 12 亿人口的大国中实行的,它的发展程度与积累的经验,对世界宪法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没有中国宪法参与的世界宪法发展是不完整的。①此书的学术价值、思想理论价值、社会价值都很高。

① 韩大元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3 页。

6. 刑法史著作出版了不少

如乔伟《中国刑法史稿》(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印)、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周密《中国刑法史》(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魏国库《中国历代刑法浅谈》(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光灿等主编《中国刑法通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1989年版)、张晋藩等《中国刑法史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宁汉林等《中国刑法简史》(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周密《中国刑法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希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史》(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与张晋藩等《中国刑法史新论》各具特色。蔡书,第一章《从血缘到地缘、从诸夏到中华、国和家》,第二章《婚姻、姓氏、宗族和亲属》,第三章《所有制及社会阶级的产生和变化》,第四章《风习、制令和法令神权、君权和民权》,先论述中国刑法产生的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然后第五至十二章再分别论述刑罚体系的产生和演变、刑法名实的沿革、刑法的起源和发展以及犯罪概念和罪责的变化等等,各章所述从上古迄民国,详于古代,民国只是略有提及以作古今比较。蔡枢衡国学根底深厚,对中国古代的史料考订精详,并多有全新解读。张书,第一章《刑法的起源》,第二章《刑法的发展》,先论述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至近代社会(1949年10月前)中国刑法的产生、发展,然后第三至十四章再分别论述刑罚体系、刑罚思想、刑罚原则、刑罚执行、奴隶制刑法中的罪名、封建制刑法中的罪名、近代刑法中的罪名、奴隶制刑法中的刑名、封建制刑法中的刑名、近代刑法中的刑名等。张书篇幅较蔡书大,内容更丰富。张书不仅注重中国刑法发展的纵向比较研究,更注重中国刑法与世界各国刑法的横向比较研究。强调:通过比较研究,有助于拓宽中国刑法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刑法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全面地汲取刑法史中的丰富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刑法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①]如论述"刑罚的目的",指出中国古代的"神意报应主义"、"道德报应主义"及中西古代都有的"复仇报应主义",局限性都是很大的,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的法律报应主义,虽然满足于事后报复,有消极的因素,但它以平等报应的价值标准奠定了罪刑相适应的基础,提出了惩罚犯罪的客观尺度,避免了刑罚的无限升级,大大减轻了刑罚的严酷程度。[②]这样的论述是有理论深度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

① 张晋藩等:《中国刑法史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4页。
② 张晋藩等:《中国刑法史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485页。

7. 民法史、经济法史著作出版了一些

如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孔庆明等《中国民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何勤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华东政法学院《民商法丛书》一种)、张晋藩主编《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巴蜀书社 1999 年版),等等。台湾出版了潘维和《中国近代民法史》(台北:汉林出版社 1982 年版)等。

如薛军《中华商法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9 年版)、李景文主编《中国经济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张研《中国经济法制史》(审计出版社 1992 年版)、蒋晓伟《中国经济法制史》(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张希坡《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立法》(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等等。

叶孝信《中国民法史》,是民法法制史的通史性著作,绪论探讨了中国民法史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明确了中国民法史研究的对象、发展特点及其发展缓慢的原因等。以下八章分别论述:先秦民法、秦汉民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民法、隋唐民法、两宋民法、元代民法、明清民法和民国民法。论述每一个朝代,都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背景出发考察民法的不同内容和不同特点,从而有史有论系统地展现了中国民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认为中国古代民法一直是存在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地完善。全书资料丰富,既重正史记载,也采野史及小说笔记等,不少资料是前人不曾采用的。

何勤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是第一部也是迄 21 世纪初的唯一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的研究著作。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初创(1949—1952)、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法的发展(1953—1956)、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法的发展与挫折(1957—1976)、改革开放与民法的复兴(1977—1991)、社会转型时期民法的新发展(1992—1999)五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从国家、社会的基本特征出发,揭示该阶段民事立法的原则和特点,并涉及民间层面上的民法,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大陆民法建设的 50 年发展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论述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民法的发展。书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受苏联的影响很大,虽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已有意识地摆脱苏联法制的影响,更关注现实国情,更多地学习、借鉴大陆法系民法传统,但决不应低估苏联经验的影响,它已经深刻地融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传统之中。同时指出:对于苏联的法制,也应理性地正视而不应全盘否定。①

① 何勤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 页。

书中也提出了对未来民法建设的设想,如要重视民法法典化,要重视解决大陆与港澳台的法域冲突等。①全书有史有论,有理论深度,有现实针对性,学术价值、社会价值都很高。

8. 司法制度史、行政法史著作出版了一些

如熊先觉《中国司法制度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薛梅卿主编《中国监狱史》(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吕伯涛等《中国古代的告状与判案》(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版)、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庆军等《民国司法黑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如蒲坚《中国古代行政立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晋藩等《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士伟《中国行政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

张晋藩等《中国行政法史》,客观论述了夏商周至民国时期的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与行政法,尽管它是为剥削阶级专政服务的,但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法,仍不乏借鉴之处。如注意职官的权责分明,注意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注意行政管理的规范性、系统性和效率,制定内容十分广泛的行政法规,严肃任官之责,定期考课等等。②有学术价值,也有社会价值。

9. 法制思想理论史著作大量出版

如群众出版社1984年开始推出《中国法律思想史丛书》,至1987年出版了《孔子的法律思想》(杨景凡等,1984年)、《商鞅的法律思想》(杨鹤皋,1987年)、《贾谊的法律思想》(杨鹤皋,1985年)、《董仲舒的法律思想》(杨鹤皋,1985年)、《〈淮南子〉与刘安的法律思想》(段秋关,1986年)等。

如张国华等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1987年版)、马小红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侯欣一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光灿等总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4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2001年版)等等。

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研究中,杨鹤皋成果颇多,除了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丛

---

① 何勤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470页。

② 张晋藩等:《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第12—15页。

书》中出版了三种外，还有：《新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中国法律思想史》（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以及《先秦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魏晋隋唐法律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宋元明清法律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等。

近现代、当代的法制思想理论史著作有：张晋藩等《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宋仁《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 1990 年版）、唐自斌《孙中山法律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赵金康《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理论设计及其运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陈景良主编《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丛文胜《中国共产党的法制理论与实践》（白山出版社 1997 年版），等等。毛泽东法制思想研究有：李仲达《毛泽东法律思想和实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张穹等《毛泽东刑事法律思想初探》（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1 年版）等三四种。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有：张建田等《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侯欣一《邓小平法律思想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李龙主编《依法治国：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等十种左右。还有王列平《董必武的法律理论与实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朱力宇《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中最有分量的集大成的成果是李光灿等总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4 册 11 卷。第 1 册 3 卷：第一卷《夏、商、西周》，第二卷《春秋、战国、秦代》，第三卷《西汉、东汉》；第 2 册 3 卷：第四卷《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五卷《隋、唐》，第六卷《北宋、南宋》；第 3 册 3 卷：第七卷《辽、夏、金、元》，第八卷《明代》，第九卷《清代》；第 4 册 2 卷：第十卷《近代》，第十一卷《现代》。从上古论述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20 世纪 80 年代。对各代统治者、思想家、法学家的法律思想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为纵横贯通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巨著。资料丰富，论述客观，思想性强。如指出：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是儒家法律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缺乏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法治观念。但也涌现出一大批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家，积累了管理一个多民族大国可供后人继承的宝贵遗产。[①]如论述南宋宋慈的司法等

① 李光灿等总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 1 册，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总论》第 28—29 页。

思想时，一方面指出他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肯定他的慎审狱案，重民命的人道主义精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司法指导原则，秉公执法、不阿权贵、不徇私情，敢于为民请命，“雪冤禁暴”的精神，仍值得后人钦敬和学习。①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的成就、法制思想理论的发展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如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思想，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思想等。并强调必须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进步，永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活力。②

10. 专题史著作百花齐放

各种专门法制史著作：陈学会主编《中国军事法制史》(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安作璋等《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立民《上海租界法制史话》(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龙敬儒《宗教法律制度初探》(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周太银等《中国律师制度史》(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徐家力等《中国律师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徐家力等《中华民国律师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姚怡昕《中国版权制度变迁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陈学会主编《中国军事法制史》，论述中国上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90年代的军事法制发展历史，每一个朝代一般都从军事立法概况、军事行政法律制度、军事刑法制度、军事司法制度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纵横贯通，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中国军事法制通史著作。资料丰富，理论色彩浓厚。书中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军事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和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军事法。毛泽东和邓小平军事法制思想，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闪耀着伟大的光辉，在军事法制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③

① 李光灿等总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2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5页。
② 李光灿等总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2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1—614页。
③ 陈学会主编：《中国军事法制史》，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导论》第13页。

周太银等《中国律师制度史》(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年版),先论述律师制度的缘起,然后记述中国古代的诉讼代理制度和代书形式、清末律师制度的创立、中华民国时期的律师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辩护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律师制度及港台澳律师制度等,对各个时期的论述一般先介绍律师制度建设概况,再论述律师制度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兼及当时的典型辩护案件,纵横贯通,有史有论,制度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中国律师制度史著作。书中强调:律师是诉讼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俱全的标志。中国律师的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律师的发展需要理论指导,而中国律师的理论研究还很落后,律师学、律师制度学等都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者希望《中国律师制度史》的出版,能推动中国律师制度学的产生与发展。[①]

法文化著作: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马小红《礼与法》(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姜军等《中国伦理化法律的思考》(华文出版社 1999 年版)、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2004 年修订版)、程维荣《道家与中国法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史彤彪《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张培田《中西近代法文化冲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 年版)、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梁治平《法意与人情》(海天出版社 1992 年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年版)、公丕祥《法哲学与法制现代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徐忠明《法学与文学之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张培田《中西近代法文化冲突》,从中国近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汇、冲突出发,论述了中国传统法文化对西方法文化的抵抗,及其对晚清立宪、立法的影响。书中指出:实现法文化改革,必须从总体机制上适应社会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日本的法文化改革,以废除封建为目的,始终发挥着同文化近代化协调互补的功能;中国晚清被迫修律,目的在于巩固和维持封建专制统治,不仅不能促进社会文化的近代化,反而阻碍和延缓近代化的必然趋势。强调:完成法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才能推

---

① 周太银等:《中国律师制度史》,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年版,《前言》第 2—3 页。

动中国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和崛起，才能承担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要完成法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必须首先克服落后的狭隘的民族心态障碍。[1]这是有思想性的中外法文化比较研究的很有价值的著作。

除了以上的一些著作外，比较研究著作还有钱大群等《唐律与中国现行刑法比较论》（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张晋藩《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等等。

学术史著作：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研究综述（1949—1989）》（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张晋藩编《中国法制史学的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郭道晖等主编《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高铭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学研究历程》（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 年版）、曾宪义等《中国法律制度史研究通览》（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曾宪义等《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通览》（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等等。某一领域、某一问题研究的学术史研究文章发表，就表明这一领域、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规模和热度，而中国法制史学术史著作接二连三地出版，表明中国法学、中国法制史研究已非常热烈、十分繁荣。

（四）反思

中国法制史研究虽已繁荣，但问题与隐患还是存在。

首先，法制史（法律史）与法制思想史（法律思想史）两个学科的分与合要正确处理。两个学科的分，有利于两个学科的各自发展。但如果两个学科“截然分开，形成两张皮，即使是联系很紧密的问题也各说各的，不越雷池一步；二者共同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同样被人为地割裂，互不相通”。[2]这就会影响两个学科各自的发展，也影响整个法学的发展。尽管已有学者想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就整体中国法史学界看，其学术风貌依然罩在‘两张皮’的架构中”。[3]这个问题应该尽早处理好。

其次，中国法制史学科建设仍待加强。如理论建设仍需加强，中国法制史学科性质问题、中国法制史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关系问题、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问

---

① 张培田：《中西近代法文化冲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0—253 页。

② 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前言第 1 页。

③ 王强：《“两张皮”、危机与历史转折——关于中国法律史学科体系的一点思考》，《法史思辨》，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 页。

题等诸多理论问题，不尽早达成共识，显然要影响中国法制史学科建设。加强史学界与法学界的交流、合作，加强中外交流、合作，培养史法兼通的研究者、培养中外法制史兼通的研究者，对于中国法制史学科建设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强化学术规范建设，进行创新性的研究，避免重复劳动，这也是中国法制史学科建设必须重视的。

再次，中国法制史学科建设受市场经济、社会需求的冲击日益显现。一些学校、学院热衷于开应用法学类的课，学生热衷于听应用法学类的课，以致视中国法制史课为畏途，有的学院甚至停开中国法制史课了。同等学力人员申请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有关考试中也取消法律史。出版社热衷于出通俗性的法制史读物，出学术性的著作兴趣减少，以致《法律史论丛》连着好几期压在出版社未能面世。[①]这自然要造成学科建设的退缩，人才的流失。处理好各种关系，勇辟新路，开拓发展空间，走出困境，迫在眉睫。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

何谓思想史？对中国思想史到底如何作一明确定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思想史与文化史、哲学史、学术史的区别等等，至今仍众说纷纭。以下不打算纠缠在这些争论之中，也不对各专门学科的思想史研究状况如经济思想史、法律思想史等作介绍。

1949年以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情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命运紧密相连，充满了坎坷与曲折。建国初期一方面延续此前思想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一方面受政治影响开始发生偏向，直至经历“文革”的阵痛。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随着改革开放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并且逐渐以一门现代人文学科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拥有自己的学科范式、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涌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思想史著述和专业研究人员。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思想史研究，侯外庐等人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尤其是对思想史学科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巨大意义。侯外庐以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开始逐渐朝着相对独立的学科化道路发展。

---

① 详见黄震：《中国法律史的学科结构与学科制度》，载《渠水集：纪念饶鑫贤教授法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黄震：《中国法律史的学科史反思》，载《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2005年)。

1. 侯外庐与其开创中国思想史学科范式的《中国思想通史》

侯外庐1923年考入北京政法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攻法律和历史。1927年赴法留学，期间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直至1938年完成全书的中译本。《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撰写和出版，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齐，共计五卷六册、260多万字，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殷周至近代的思想发展历程。关于它的内容，侯外庐曾做过归纳，主要包括这样几个要点：1.按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分殷末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到清中叶，清中叶到"五四"等阶段论述中国思想发展；2.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及古代中国思想的发展阶段及其不同于古希腊的特征；3.用"土地私有权的缺乏""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关键"的理论解释中国中世纪思想的定于一尊；4.身份地主与非身份地主、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区分是形成中国思想史上唯心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正宗与异端的对立的原因；5.注意发掘中国思想上唯物主义及反正宗的异端思想的传统。[①]从中可以看出侯著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其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应是与他翻译《资本论》的经历息息相关的。

该书另一个重大特色就是注重研究社会史与思想史的演进关系，注重社会思潮的研究，即注重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如关于《通史》撰写所遵循的原则与规范，侯外庐总结了如下几点："1.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2.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又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3.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4.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5.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②]

这一系列原则和学术规范为以后中国大陆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所遵循和沿袭。与侯外庐合作的主要有杜国庠、赵纪彬、杨荣国等人，他们各有自己的学术史专著，如杨荣国的《中国17世纪思想史》(东南出版社1945年版)、《简明中国思想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等，但主要思想都集中在这部《通史》之中。

---

①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3、15页。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7页。

2.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思想史研究成果的整理和补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直至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成就主要是对40年代许多研究成果的整理、修订、补充、出版和再版。如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再版），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本书初稿完成于1937年，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熊十力《原儒》上下册（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5、1956年版）、《体用论》（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明心》（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9年版），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再版），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另一大特点便是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出现了一批新成果。除了侯著之外，在当时影响非常广泛和深刻的还有由任继愈主编、十多位学者合著完成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及石峻、任继愈、和朱伯昆合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等。

3. 台湾地区学者研究成果

台湾地区学者在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一批思想史著作，这些以重视思想史材料为特点的著作于21世纪陆续由大陆出版社引进出版。如1952年出版的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兰台出版社）便是其中代表之一。在其"自序"中，钱穆说："西方思想，大体可分三系：一为宗教，二为科学，三为哲学。此三系思想，均以探讨真理为目标。所谓真理，则可有两种看法：一认真理为超越而外在，绝对而自存；二即认真理为内在于人生，而仅为人生中的普遍与共同的。此二看法，各有是处。"①这是钱穆关于人类思想即哲学、科学、宗教三种思想之间关系的看法。关于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例言"中钱穆申明："本书旨在指示出中国思想之深远的渊源，抉发出中国思想之真实的生命。学者由此窥入，明体可以达用，博古可以通今。庶乎使中国民族之将来，仍可自有思想、自觅出路。"②其他思想史著述还有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等。

4.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简单化倾向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全面胜利的鼓舞，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学点哲学"的热潮。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运用到思想史研究的实际工作中，使思想史研究能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史研究，成为了我国绝大多

---

① 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兰台出版社1952年版，第6页。

② 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兰台出版社1952年版，第17、18页。

数思想史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由此围绕着社会历史中有无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哲学史研究对象等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关于哲学史研究对象的问题。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当时大多接受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①并以之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指导性原则和方法。任继愈在1957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提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应当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认识过程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日丹诺夫给哲学史下的定义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其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也认为，哲学史是认识史，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这两个说法本来是相互补充并不排斥的。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1957年科学出版社《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专辑》收入的贺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一文认为，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关系和争论，也不就是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关系，他们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师生朋友的关系。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并不是两个固定的阵营，哲学史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1958年，关锋在《哲学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认为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关系，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是反动的，并将那些和他在这个问题上相左的意见，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哲学史研究开始偏离学术轨道。

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唯心主义。陈修斋1957年发表了《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光明日报》1957年4月17日），提出“有些本身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也可能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如果认为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结论，也难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实，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和正确与错误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决不能机械地划等号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于唯心主义人们通常不把它看作是认识史上的必经环节，而是一个只能供批判的思想赘瘤；唯物的就一定是正确

① 日丹诺夫：《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4页。

的，唯心的就必定是错误的，将哲学上的唯物与唯心的概念与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密切联系。因此在有些中国哲学史论著中，作者按照唯物、唯心的标签去套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想家，把唯物主义成分较多的思想家的学说夸大成为纯而又纯的唯物主义体系，把唯心主义成分较多的思想家的学说夸大成为纯而又纯的唯心主义体系。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形而上学方法。

关于中国哲学史遗产的继承问题。对此问题，冯友兰在1957年10月8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认为："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以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他强调，对中国哲学史中的命题，应当区分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所谓"抽象继承"的问题，意思是舍弃原来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也即阶级内容），而承用其抽象的意义。① 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其中讲道，冯友兰的"一般意义"是一个超阶级的绝对，所谓继承哲学遗产，就是现成的把原来的东西拿过来或搬过来。冯友兰的根本出发点是形而上学的，和马克思主义继承观点正相反对的。②

以上讨论，推动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同时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学术探讨最终被政治批判所代替，许多学者遭到政治、人身迫害，例如对梁漱溟学术思想的批判，最终演化为政治批判。这制约了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曲折与教训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思想史被儒法斗争史取代。按照评法批儒运动中形成的儒法斗争模式认为，过去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儒家路线和法家路线的斗争。在当时的论者看来，春秋战国时，二者之争表现的是没落的、正在衰亡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兴的、有生命力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秦汉以后，儒家代表维护现状、维持既得利益的"大地主阶级"，而法家则代表要求改革的"中小地主阶级"。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存在着一种总体倾向：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影响较大的争论，都可能归为儒法斗争。③

---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7、88页。

② 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③ 周炽成：《闹剧背后：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评法批儒"运动》，《现代哲学》2006年第2期，第78页。

1. 从杨荣国《简明中国哲学史》看“文革”期间中国思想史研究情况

出生于湖南长沙的杨荣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有较深造诣，曾有《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简明中国思想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等著作。杨荣国主编，李锦全、吴熙钊编著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于1973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很快又在1975年5月再版。第2版中除原来编写成员之外，还有姜伯勤、李五湖及“部分工农兵学员”，“广州机电局和北京医疗器械总厂工人理论小组的同志”给了修订意见等。这便是“文革”期间著作写作过程中的特色之——广大工农兵的参与。序言开篇就是毛主席语录，作者从两段大字黑体语录中先后得出了“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路线的两军对战，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是历史上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的结论。书中大力赞扬了“要求革新和前进”的法家，而称以“孔丘”为代表的整个儒家是“畏天命、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鼓吹者，大力强调中国思想史中阶级斗争的观点，全书多有“反动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①]的表述，认为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的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唯物与唯心的斗争史，一部儒法斗争史。

杨荣国的这本《简明中国哲学史》及其同时期完成的旨在全面批判孔子的著作《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中华书局1973年版）成为了当时学界乃至全国评法批儒的一面旗帜，也是当时整个思想史研究走入歧途的典型反映。

2. 一大批关于儒法斗争的“研究成果”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开始以后，一时间不单正规出版社、专业研究人员，更有大量各种所谓儒法斗争小组的关于儒法斗争的“研究成果”充斥于市。如：著者不详的《论儒法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理论小组《儒法斗争简史讲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北大儒法斗争史小组的《儒法斗争史概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黑龙江省批儒评法座谈会编写小组《儒法斗争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南海县大沥公社沥中大队理论辅导组等

① 杨荣国：《简明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页。

编著的《儒法斗争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开封师院《儒法斗争史话》编写组编写的《儒法斗争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吉林师大历史系学员《史话》编写组《中国古代儒法斗争史话》(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曹思峰《儒法斗争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秦汉之际的儒法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广西人民出版社编印《秦汉时期的儒法斗争》(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理论小组编《我们农民反孔斗争史话》(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等。上海人民出版社于 1975 年出版的《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第一册,印了 21 万本。

大量为法家歌功颂德的书籍出版。如湖北人民出版社编印的《韩非——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山西人民出版社编印的《商鞅和〈商君书〉》(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等。

当中国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完全被纳入政治批判的轨道后,百家争鸣成为一句空话。严肃的、客观的、科学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断了整整十年。[①]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思想史研究逐渐步入正常轨道,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1. 中国思想史研究初见曙光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纲》上、下两册分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 1980、1981 年出版发行。后经过反复修订,现已作为具有一定权威性的高校教材。此书沿袭侯著思想史的一贯特色,注重社会史的研究。不以人物为主,而是对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流派或某一时期主流思想进行专题介绍,如"春秋时代的思想与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墨显学"、"经学成为官方正宗思想"、"魏晋玄学与反玄学",[②]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对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但作为"文革"时期写作完成的著作,仍未能摆脱那个时代的消极影响,带有明显的重唯物轻唯心的色彩,而且对宗教思想极为忽略,只对一些浮于表面的情况作了介绍,带有批判色彩,不够客观。

孙叔平 1980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扫"文革"时期学术界教条主义的阴霾之气,而代之以严谨和客观的态度对待中国思想史的学术研

① 刘文英:《中国哲学史百年述评与展望》,《中国哲学史》2001 年第 1 期,第 31 页。
②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 页。

究。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从1962年着手准备，期间断断续续直至1978年6月修改完成。后被教育部列为大学文科教材。《史稿》以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为主线贯穿了从盘庚迁殷开始到近代李大钊结束的中国思想史，作者以李大钊为结束篇，是因为他认为李大钊是“标志着中国旧哲学的结束，新哲学的开始”的“承上启下的人物”。[①]本书体例完整，叙述客观，但仍存在资料不全的缺陷，尤其是佛教及近代部分介绍不足。

何兆武主编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亦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梳理了从先秦到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思想史。除了注重思想方面的继承和发展的线索之外，本书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分门别类的对每个时期的各个方面的思想作了分析和介绍，不仅有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更有经济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以及农民革命思想等。不过也正因为这种分门别类的编写方式使得作者对于时代思潮的研究关注不够，重分析而不重史料，如介绍孔子，仅提到了《论语》的部分内容，其他记载介绍孔子言论思想的书籍却未提。

其他专题类的著作有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详尽论述了朱熹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思想，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朱熹思想的学术专著。另有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钱逊《先秦儒学》(齐鲁书社1982年版)、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还有张琢《鲁迅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

台湾地区出版的有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下册)(台北大林出版社1979、1980年版)，此书虽仍以人物为主线贯串全书，但韦著更注重“思想活动的历史”、“思想演变”和“发展的线索”，认为“说明关系、发现线索”是“思想史的主要工作”，相较而言孙叔平书在这点上则着墨不多。这一时期台湾地区出版的还有褚柏思《中国思想史话》(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臧广恩《中国哲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等。

---

① 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2. 从1983年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看当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思想史学科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11月在西安举行。这次会议就思想史的对象和方法，中国思想史与意识形态等关系以及中国思想史的特点等议题展开讨论，这场讨论的参与者的身份具有多学科的特点，有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美学等学科。这恐怕是最终未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统一的原因之一。如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可谓众说纷纭。有宏观说，即认为中国思想史不是对各门学科思想史内容的简单综合，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宏观方面研究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发展、演变的历史线索和共同规律。有社会思潮说，认为中国思想史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及其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持此种观点的，对社会思潮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认为社会思潮就是指那些反映思想斗争中心和交点的社会潮流，也有认为社会思潮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席卷某些阶层的一批人乃至几代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倾向，还有认为社会思潮就是时代精神等等。有综合说，即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社会意识各种形式的综合性学科。其他还有社会意识说等。除了分歧，这次讨论在很多问题上的争鸣却是非常深刻和有意义的，如对哲学史和思想史方法的区别，中国思想史的特点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等问题的讨论。①

这次会议虽然未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更多的一致意见，却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如研究对象和方法，思想史与意识形态诸专门学科的关系，中国思想史的特点等，做了深入和有益的争论和探讨，显示了中国思想史不仅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且逐渐以相对客观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探讨思想史研究的状况，开启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史研究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3.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繁荣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思想史研究内容的拓宽、加深，研究方法的不断多元化，中国思想史研究进入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发展时期。

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1987年版)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继《中国思想通史》之后的又一部扛鼎之作。此书的酝酿阶段始于1959年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时候，1980年侯外庐组织起包括邱汉生等人

---

① 卢钟锋:《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期,第3页。

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开始了《宋明理学史》的编撰工作。

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历来为思想史研究工作者所重视，也一直不乏相关方面的研究专著。如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1953 年版)、吴康《宋明理学》(台北华国出版社 1955 年版)、冯友兰《新理学》(香港中国哲学研究会 1961 年版)、黄公伟《宋明清理学体系论史》(台湾幼狮书店 1971 年版)等。大陆出版了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等。

以下将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与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作一比较研究。首先，二者都属于断代思潮研究，都推崇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篇章安排方面按时间线索，以思想家及思想流派为主线对宋明理学展开分析研究，注重对思想承续、流派关系进行介绍，都准确把握了宋明理学的发展理路和思想特性，如都认为"性与天道"是理学的核心论题等。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一是学科归属的差别，即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差别。从学科背景来看，侯外庐无疑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泰斗人物，而陈来则是长期从事儒家哲学、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哲学研究的哲学教授。从研究视角来看，如果说侯著更注重思想演进与社会历史演进的关系，思想史的范畴概念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和真相，也因此更重视思想原貌的呈现，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话，那么陈著则是以西方哲学的视角解读宋明理学，以相关哲学概念和范畴如"理一分殊"、"元会运世"等为中心议题展开分析和阐发，努力将宋明理学纳入中国哲学的体系建构之中。二是具体观点上的分歧，两本著述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存在分歧。如关于宋明理学的源头问题，侯著认为开创之功应归之于"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和石介三人。而陈著在肯定"宋初三先生"的同时，认为中唐的韩愈和李翱也是宋明理学的"先导和前驱"，并且强调了北宋前期"尊经"、"排佛"等社会思潮对于宋明理学建立之初的促进作用。三是全书体例架构方面。从篇章安排上来说，侯著显然要比陈著完整清晰：陈著只对宋明的理学发展进行介绍，忽略了宋朝理学发展至明的中间阶段——元朝，侯著却特辟一编"元代理学"予以论述。除此之外，陈著只选取了宋明理学史上二十余位思想家作介绍，而侯著则不仅重视这些主要的思想家，一些现有资料相对较少的思想家、学派也一并做了介绍，如对南宋胡安

国、朱震、张九成、张栻、吕祖谦、浙东事功派、陈淳、闽学干城、程端蒙、董铢、程端礼、真德秀、魏了翁、金华朱学的专题介绍是陈著所没有的。从叙述方法上来说，二者都具有哲学方法论的色彩，却各具特色。以张载为例，侯著将张载的思想分为本体论、道德论和认识论以及与二程的关系加以分别论述，而陈著则以张载思想中的五个哲学概念和范畴为中心议题展开介绍。

陈来《宋明理学》出版在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之后，他的研究可以说是建立在包括冯友兰、侯外庐等前人的理论成果之上，在宋明理学的分析和评述方面无疑是明显进步的，却并不能就此否定了侯著的价值，侯外庐的《宋明理学史》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是无法被替代的。侯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资料的搜集和考证功夫。侯著资料之翔实完备从前文关于侯著全书体例完整性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考证方面也很见功夫，包括对周敦颐的著作《太极图易说》与《太极图说》关系的考证，对朱熹、二程等人不同版本的《大学》进行考证和说明等。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也是侯外庐治学所一贯强调的原则，此书亦不例外，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料，研究问题。3.旨在通过对理学家及各学术流派的分析研究，“阐明宋明理学史的独立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揭示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①]陈来在其著作中也肯定侯外庐《宋明理学史》“是以宋明理学的整体为对象的第一部全面性研究著作”。[②]

80年代中期以来，思想史领域的各种专题研究层出不穷，研究范围和内容较以往都有很大突破。如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徐远和《洛学源流》（齐鲁书社1987年版）、袁伟时《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鼓应《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版）、钱逊《先秦儒学》（齐鲁书社1991年版）、孔繁《魏晋玄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石训等《中国宋代哲学》（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王茂等《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周树志《毛泽东哲学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郑家栋等《新儒家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吕希晨《张君劢思想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沈寂《胡適研究》（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宋志明《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郑大华《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

① 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4页。
② 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社 1999 年版）、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等。还有辛冠洁等主编《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二册（齐鲁书社 1982 年版）、方克立等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等。

关于宗教、民族思想史的研究有：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此书三个部分共八章论述佛教哲学的基本特征，原始佛教的基本理论，以及佛教哲学的宇宙要素论、结构论、生成论和本体论等。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任继愈在该书序言中说："《中国佛性论》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全局着眼，把佛性这个题目放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从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佛教研究的情况看，这部书有首创的功绩。"①其他还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1996 年版）。民族思想史研究成果有肖万源等《中国少数民族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等。

相对于此种专题类思想史而言，中国思想史的"通史"研究也有一批高质量的论著问世。对思想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和权威影响的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便是其中代表之一。

张岂之师承侯外庐，在侯外庐编写《中国思想通史》时期就曾协助整理其中一、二卷，后继续参加了侯外庐组织的《宋明理学史》的编写工作，是当代中国思想史学科的领军人物。《中国思想史》一出版便被作为高等院校的权威教材受到广泛好评，很快又于 1993 年出了该书的简编版。1989 年版的《中国思想史》共 7 编 54 章，叙述扼要简练，70 余万字的篇幅叙述了中国上至商周下迄近代数千年思想发展历程。作者旨在呈现历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的思想原貌，主要依据的是思想家的著作，进行客观的阐发和议论。张岂之认为："中国思想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思想史是人类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②明确了中国思想史的涵义和研究对象。

张岂之编著《中国思想史》主要针对的是文史研究生对中国思想史教材的需

① 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 页。

②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求，旨在编出一本体现中国思想史学科研究深度、广度的研究生教材，较注重“基础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的介绍方面”。[①]相对于张著的高校教材定位，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的价值则更在于他对中国思想史写作的创新尝试和可贵的探索精神。有过上山下乡和工厂工人经历的葛兆光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思想史》原是为了开一门有关思想史课准备的讲稿，从 1994 年开始动笔直至 1997 年 11 月完成了“导论”和“第一卷 7 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写作（第二卷“7 世纪至 19 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完成于 2000 年 10 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掀起一股“重写”之风，重写文学史、重写哲学史、重写思想史，葛兆光显然受这股风气影响，立意站在全新的视角上回顾中国思想史，重写思想史。此书完全抛弃过去《思想史》著作按人物学派分章列节或者教科书式的写作方法，而是一种建立在“对思想史的连续性的个人性理解”基础上——作者认为思想的连续性有三种类型的体现：一是“对传统命题思想命题的不断解释”；二是“表现在那些看似断裂的地方”；三是“对外来思想的回应中重新发掘和解释思想传统中的资源”。[②]“在比较长的时间段中描述着思想史的流程”[③]的方法，作者力图通过对传统写作方法的摒弃，强调按照个人性的理解寻找思想史的连续性脉络，从而提供理解思想史连续性的一种新思路。葛著最大创新之处也是最受争议之处便是他关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概念。葛兆光认为“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④]基于此，作者提出了区别于精英思想史的“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实务的解释”的，类似于年鉴学派“长时段”学说的能够“缓慢地但又是连续地在变化，真正地构成思想史的基盘和底线”[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概念。怎么来具体理解这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呢？举个例子，如作者认为“早期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就是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之学”，

---

①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1、63、64 页。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5 页。

④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 页。

⑤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16 页。

而“我们现在的思想史却常常忽略了数术方技与经学的知识”。[1]在葛兆光看来忽略了这些知识背景的思想史是说不清中国思想的历史的。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经出版即引来热烈的讨论,有赞扬也有批评,争议最多的便是这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概念,或质疑这根本与精英思想史无异或质疑这根本就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等等,当然关于他的思想史的“写法”,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分界,史料的搜集和考证等等方面都遭致了大量的讨论,无论是褒是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葛著的影响力。诚然,葛兆光的写作深受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及福柯知识考古学观念的影响和启发,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原创,但他把这种从外国学说中得出的启发用于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中应当可以说就是一种学术创新,首次尝试当然会有不够成熟和不尽完善的地方,却充满了可贵的探索精神,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继续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通史方面,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亦是不能不提的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该书出版后不断得到再版,除了最初的版本,今天还可以读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的《中国思想史论》三册,200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李泽厚集》也将这三本书收入其中。拥有西方古典哲学和美学背景的李泽厚在书中畅达淋漓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智慧”的理解,提出的“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等观念都曾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至今不绝。其他通史类思想史研究著作还有胡晓林《新编中国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少明《近代中国思想史略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靳德行《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许纪霖《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等。

(四)中国思想史研究反思与展望

翻开20世纪后半期以来名为思想史的著述,几乎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关于思想史的定义,虽不至于大相径庭,却也各有观点,不能统一。如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1947年版的序言中写道:“斯书更特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着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但在其1957年修订版的序言中又说:“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

---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9页。

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显得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注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同一本书的前后两个版本却对思想史的定义作了明显的改动。又如葛兆光认为：“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①]又是一个不同的定义。此种例子不胜枚举。思想史本身的包容性、普遍性、丰富性，使其无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还是一部著述的写作，都面临研究范围和内容模糊不清的尴尬。思想史者谓何，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定义，或精英思想说，或社会思潮说，或社会意识说等；似乎毋须言说，如徐复观在其思想史著作中就没有直接论述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对他而言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问题。思想史的界定似乎不必言，却也言说不清。直至21世纪初的几次思想史学术讨论会仍然围绕着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围，与各专门思想史如哲学史、学术史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讨论情况与80年代初的那次学术讨论会相比，并未得出更为明确的共识。看来这些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还是应尽早解决，否则或多或少会影响学科的建设、发展。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还有一些问题是应该重视的：

1. 加强史料建设。应重视的是对新史料的搜集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考古资料的发现尤其是《郭店楚墓竹简》（根据1993年10月湖北荆门战国楚墓出土的一系列文物整理写成，由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样新的思想资料的发掘不仅掀起“重写”风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对历史争议问题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对中国思想史的创造性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2. 重视与外国思想史界的交流与联系。一要重视国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动态、研究成果的了解、译介、研究，吸取国外研究中的有价值的资料、观点、方法；二要加强对国外各种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的了解、研究。如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就借鉴了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实现了有益的尝试。阐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等等理念和方法对于拓宽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手段，在丰富中国思想史研究和意义解读的视角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3. 大力发展跨学科研究。思想史学科本身就具有交叉性和边缘性，更由于其

---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研究内容的广博性，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应积极把各学科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运用到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来。

4. 关注社会的新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社会的发展，必然促进思想的发展、世界观的发展，必然产生对思想史的新认识。如网络世界（虚拟世界）、网络社会（虚拟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对物质观、实践观、联系观、矛盾观、动力观等的新认识，必然对思想的发展、对思想史和对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产生新的认识。这些新认识必然推动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四、中国文化史研究

受西方文化史思潮和文化史观的影响，清末民初中国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开始发展起来。较早以"中国文化史"为书名的著作是1914年上海科学书局出版的林传甲《中国文化史》，以后有顾康伯《中国文化史》（上海泰东书局1924年版），及柳诒徵、钱穆、陈登原等的中国文化史著作。杨东莼《本国文化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版），被认为是一部唯物史观的文化史著作。①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以下时期：

（一）停滞时期（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

这个时期，大学里几乎不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国内没有一所文化史研究的专门机构，没有一部以中国文化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出版，甚至都没有以中国文化史为题的文章发表。《历史研究》从1954年创刊到1966年被迫中辍，其间竟没有发表一篇从整体上探究中国文化发展过程或全局问题的文章。尽管当时有一些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宗教史、科学史等成果，然中国宗教、中国科学、中国艺术等等文化分支的理解、剖析，最终离不开对中国文化史的宏观把握和认识，因此，综合文化史研究的匮乏，必然制约着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②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文化事业蒙受了更大损失。"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文化事业才开始复苏与繁荣，中国文化史研究也得以全面复苏与繁荣。

这一时期文化史研究的停滞，原因和教训是多方面的，周积明《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已有分析，可以参见。

---

① 郑先兴：《中国最早以"文化史"命名的著作》，《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② 周积明：《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复苏与繁荣时期（1978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中国的经济建设大发展，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大发展，中国文化史研究迎来了春天。

1978 年和 1979 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科院近代研究所分别设立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有了以"文化史"命名的研究单位，预示文化史研究将在史学领域中占有应得的一席之地。很快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1980 年第 2 版）出版，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复苏的信号。1982 年夏，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近代研究所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开始联合筹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 1 辑，1984 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此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了一个学术交流平台。1982 年 1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与文化进步》中国编委会与《中国文化》编委会在复旦大学联合召开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讨论中国文化史研究现状与学科建设的学术会议。会议指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点"，"不了解一种文化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也对深入了解那个民族那个时代的社会全貌极其不利。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①]1983 年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与会者又就中国文化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问题，分别进行了专门讨论，提出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很快得到实施）。在这两次会议的推动下，中国文化史研究活跃起来并迅速繁荣，成为 20 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全国高校新成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机构达数十个，如山东大学传统文化研究所、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河南先秦文化研究中心、湘潭师范学院文化史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南充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所、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华南大

① 参见张宁等：《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 1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4 页。

学岭南近现代史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漳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研究所(后更名闽台文化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重庆师范学院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等等。黑龙江大学、湖北大学等设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西北大学、曲阜师大、湖南大学、吉林师大等设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设立思想文化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设立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此外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等。社科院系统也设立了一些文化、文化史研究机构,如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等。全国各地也成立了很多文化、文化史研究机构,如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设在北京广济寺内)、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河南省婚庆礼仪文化研究所、沂蒙文化研究所、凉山州彝族文化研究所、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大理白族文化研究所、绍兴越文化研究所等。不少高校和社科院开始培养中国文化史的硕士生、博士生。

文化、文化史研究的刊物如雨后春笋,相继冒出数十种,如:《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研究》、《中华文化论坛》、《文化学刊》、《文化月刊》、《华夏文化》、《华夏文化论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中国典籍与文化》、《中医药文化》、《新文化史料》、《中外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文化时空》、《文化纵横》、《汉字文化》、《语言与文化研究》、《秦文化论丛》、《科学文化评论》、《科学与文化》、《文化博览》、《民间文化论坛》、《群众文化论丛》、《三晋文化研究论丛》、《东南文化》、《抗战文化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三峡文化研究》、《上海文化》、《大理文化》、《鄂尔多斯文化》、《闽都文化研究》、《佛教文化》、《法律文化研究》、《廉政文化研究》、《企业文化》、《企业与文化》、《东方企业文化》、《商业文化》、《钢铁文化》、《建筑与文化》、《体育文化导刊》、《军营文化天地》,等等。以后又有《生态文化》等。还有一些文化史类的丛刊,如《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等。还有文化类的报纸问世,如《中国文化报》等。

伴随着的是国际性的、全国性的、地区性的文化研讨会、文化沙龙、文化书院联翩而起,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与人生、文化与科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等理论问题以及区域文化、社区文化、雅文化、俗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青年文化、妇女文化等在空前广泛的范围内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对象。文化、文化史研究不仅成为中国文化事业建设的一部分,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文化史理论问题的研究，发表的文章千篇以上，出版的著作也有，如：何新《中国文化史新论：关于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吴修艺《中国文化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常金仓《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等等，足见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火爆。在探讨、争论中有些问题有了客观的认识，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20 世纪 80 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 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①

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繁荣最重要的体现是：

1. 中国文化史丛书推出多种

先是 1984—1985 年上海书店推出了《中国文化史丛书》，虽然主要是影印民国时期已出版的数十种著作，但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1985—199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中国文化史丛书》，收入的主要是新的研究著作，其中有郑为《中国彩陶艺术》（1985 年）、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1985 年）、吴淑生等《中国染织史》（1986 年）、周振鹤等《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 年）、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 年）、胡奇光《中国小学史》（1987 年）、张正明《楚文化史》（1987 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1987 年）、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1988 年）、马学良等《彝族文化史》（1989 年）、陶阳等《中国创世神话》（1989 年）、刘旭《中国古代火炮史》（1989 年）、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1991 年）、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1994 年）、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1995 年）、田继周等《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1996 年）等，以及（加）许美德（Hayhoe，Ruth）等著、朱维铮等译《中外比较教育史》（1990 年）、（联邦德国）顾彬（Kubin，W.）著、马树德译《中国文人的自然观》（1990 年）等 20 余种。其中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出版

① 刘志琴：《50 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后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华书局1985—1995年推出《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其中有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1985年）、《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中国近代文化问题》（1989年）、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1989年）、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1992年）、张岂之等《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1993年）、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適：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1994年）、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1995年）等等。

商务印书馆1991—1998年也推出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其中收入的新的研究著作有顾森《中国雕塑史话》（1991年）、周传家《中国古代戏曲》（1991年）、任海《中国古代武术》（1991年）等等，此外又影印了一些民国时期已出版的著作，有的与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收入的有重复。

规模最大的丛书是《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开始推出《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随即商务印书馆、天津教育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与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都在1991年推出《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四家出版社先后出的书有200种左右，互有不同，也略有重复。1996—1998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或者说重印）了其他三家出版社已出的一些书。

其中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有李发林《中国古代石刻丛话》（1988年）、李万鹏等《中华礼俗纵横谈》（1989年）、徐进《古代刑罚与刑具》（1989年）、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1989年）、郑杰文《中国古代养生之道》（1990年）、刘锋《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1990年）、陶雪《古代中国与海外》（1991年）、荣新江《话说敦煌》（1991年）、冯杰《中国古代美术》（1991年）、郑重华等《中国古代游艺》（1991年）、潘吉星《中国造纸史话》（1991年）、陈克明《中国的经学》（1991年）、毕诚《中国古代家庭教育》（1991年）、来新夏《中国的年谱与家谱》（1991年）、李申《老子与道家》（1991年）、张绍勋《中国印刷史话》（1991年）、张明华等《中国古代的字典词典》（1991年）、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1991年）、何芳川等《古代中西文化交流》（1991年）、毕素娟《中国古代著名史籍》（1991年）、阎韬《孔子与儒家》（1991年）、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话》（1991年）、杨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1991年）、李汝涛《中国历代刑罚与断案史话》（1991年）、周迅《中国的地方志》（1991年）、吴洪印等《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典籍》（1991年）、吉常宏《中国人的姓名字号》（1991年）、汪子春等《中国古代生物学》（1991年）、赵荣《中国古代地理学》

(1991 年)等 50 余种。

其中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有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1991 年)、郭彦岗《中国历代货币》(1991 年)、赵翰生《中国古代的纺织与印染》(1991 年)、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1991 年)、王崇焕《中国古代交通》(1991 年)、黄水华《中国古代兵制》(1991 年)、柳玲《中国古代兵书》(1991 年)、潜明兹《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1991 年)、杨子慧《中国历代的人口与户籍》(1991 年)、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1991 年)、李仲均等《中国古代矿业》(1991 年)、刘云彩《中国古代冶金史话》(1991 年)、朱学西《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1991 年)、张静芬《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1991 年)、张习孔等《中国古代著名战役》(1991 年)、吴慧《中国古代商业》(1991 年)、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1991 年)、朱仲玉《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史话》(1991 年)、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1991 年)、陆国俊《美洲华侨史话》(1991 年)、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1991 年)、徐博东《台湾传统文化寻踪》(1991 年)、潜明兹《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1991 年)等 20 余种。

其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有黄石林《中国重要考古发现》(1991 年)、黄景略等《中国历代帝王陵寝》(1991 年)、李仲祥等《中国古代汉族婚丧风俗》(1991 年)、徐兆奎《中国地名史话》(1991 年)、谢凝高《中国的名山与大川》(1991 年)、吴松弟《中国古代都城》(1991 年)、董黎明《中国历代名城纵览》(1991 年)、葛晓音《中国名胜古迹》(1991 年)、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1991 年)、皮剑龙《中国古代的廉政与清官》(1991 年)、王炜民《中国古代礼俗》(1991 年)、王冠英《中国古代民间工艺》(1991 年)、李用兵《中国古代法制史话》(1991 年)、徐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革新与变法》(1991 年)、张仁忠《中国农民起义史话》(1991 年)、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1991 年)、李清和《中国古代民族》(1991 年)、朱启新《中国古代汉族的节日风情》(1991 年)、严汝娴等《中国少数民族婚丧风俗》(1991 年)、胡起望等《中国少数民族的节日风情》(1991 年)、戴念祖《中国古代物理学》(1991 年)等 20 余种。

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臧仲伦《中国翻译史话》(1991 年)、秦惠彬《中国的伊斯兰教》(1991 年)、王志敏等《中国的印章与篆刻》(1991 年)、王凤超《中国报刊史话》(1991 年)、焦树安《中国古代藏书史话》(1991 年)、潘桂明《中国的佛教》(1991 年)、刘耕路《中国的诗词曲赋》(1991 年)、李思敬《五经四书说略》(1991 年)、戚志芬《中国的类书、政书与丛书》(1991 年)、徐自强等《中国的石刻与石窟》

(1991 年)、徐改《中国古代绘画》(1991 年)、张国风《中国古代的小说》(1991 年)、徐家亮《中国古代棋艺》(1991 年)、任海《中国古代体育》(1991 年)、余桂元《中国的著名寺庙宫观与教堂》(1991 年)、周燮番《中国的基督教》(1991 年)、桑吉扎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1991 年)、薛克翘《中印文化交流史话》(1998 年)、白化文《汉化佛教法器服饰略说》(1998 年)、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1998 年)、丘桓兴《客家人与客家文化》(1998 年)、任继愈《墨子与墨家》(1998 年)等。还出了一些其他出版社已出的书,总计 100 种左右。

从推出的几套丛书来看,有两个特点:一、可以说包罗万象,涵盖了政治、法制、对外关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生活、民族、思想、宗教、文艺、学术、科学等各方面;二、各家出版社出了一些相同或相类似的书。如: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化史丛书》)出了林乃燊《中国饮食文化》(1989 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又出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1991 年)。

天津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出了邵秦《中国名物特产集粹》(1991 年),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又出邵秦《中国名物特产集粹》(1996 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出了赵匡华《中国古代化学》(1991 年),商务印书馆又出赵匡华《中国古代化学》(1996 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 年),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出了金正耀《中国的道教》(1991 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1990 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了耿刘同《中国古代园林》(1991 年),商务印书馆又出耿刘同《中国古代园林》(1998 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鲁海等《中国古代图书》(1989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来新夏等《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1990 年),商务印书馆出了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91 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傅起凤等《中国杂技史》(1989 年),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出了刘荫柏《中国古代杂技》(1991 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郎延芝等《中国古代杂技》(1992 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1989 年),商务印书馆出了刘

芹《中国古代舞蹈》(1991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沙嘉孙《中国古代服饰》(199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了戴钦祥等《中国古代服饰》(1991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徐鸿修《商周青铜文化》(1988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了李先登《商周青铜文化》(1991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徐鸿修等《中国古建筑简说》(1988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了楼庆西《中国古代建筑》(1991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蔡凤书《中国史前文化》(199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了王仁湘《中国史前文化》(1991年),商务印书馆又出了王仁湘等《中国史前文化》(1998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周国荣《中国历代官制纵谈》(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王超《中国历代官制与文化》(1989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了王天有《中国古代官制》(1991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刘凤君《中国古代陶瓷艺术》(1990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了李知宴《中国古代陶瓷》(1991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刘绍刚《中国古代文房四宝》(1990年),商务印书馆出了齐儆《中国的文房四宝》(1991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盛奇秀《中国古代考试制度》(1988年),商务印书馆出了郭齐家《中国古代考试制度》(1991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陈梗桥《书法源流概谈》(1988年),商务印书馆出了欧阳中石《中国的书法》(1991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于培杰《辉煌的古代音乐》(1988年),商务印书馆出了伍国栋《中国古代音乐》(1991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了张涛《中国古代婚姻》(1990年),商务印书馆出了顾鉴塘等《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1996年)。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了刘聿鑫等《汉字的演变》,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了董琨《汉字发展史话》、1998年又出了董琨《中国汉字源流》。

同一家出版社也出版了相同或相类似的书。如: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同时出了徐传武《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与陈久金等《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商务印书馆1998年又出了陈久金等《中国古代的天文与

历法》)。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了项观捷《中国古代数学成就》,1991年又出了郭书春《中国古代数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了晁中辰《中国古代科技》,1991年又出了金秋鹏等《中国古代科技史话》。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了张知寒《古代医药精华录》,1991年又出了魏子孝等《中国古代医药卫生》(商务印书馆1996年又出了魏子孝等《中国古代医药卫生》)。

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了朱汉民《中国的书院》,1998年又出了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

重复出版,是一种重复劳动,是一种浪费,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除了以上诸种丛书以外,辽海出版社推出了《中华文化百科》丛书(2001年第2版),分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综合等六卷,计100册,其中一部分也是与前已出版的丛书相同、相类似。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了《中华文明史话》丛书(1998—2012年版),其中一部分也是与前已出版的丛书相同、相类似。

此外还有各地方出的地方文化史丛书,如《福建思想文化史丛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1997年版),《浙江文化史话丛书》(宁波出版社1999年版),《民族文化文库·文化史论丛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2001年版)等。

从文化史的书争相出版来看,这或许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史的书很受欢迎,文化热、文化书热势热火朝天。

2. 通史型文化史著出版

谭家健主编《中国文化史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较早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通史著作。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文化史发展过程和大致脉络。书中按专题,以明白晓畅的语言,概括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衣食住行乃至园林、图书等,既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入门指导,具有知识的普及性,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997年该书又出版了增订本,增补了古代称谓、民间文学等知识,使全书内容更加丰富。特别是新增的附录"七十年来中国文化史著作简介",很有资料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通史著作更是大量出版,如:刘蕙孙《中国文化史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1997年再版改名为《中国文化史述》)、冯天

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胡世庆等《中国文化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版)、吴荣政等主编《简明中国文化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吴方撰文、齐吉祥配图的《中国文化史图鉴》(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张凯《中国文化史》(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年版)、郭尚兴等《中国文化史(英文版)》(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陈寒鸣《中国文化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胡世庆《中国文化通史》(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季芳桐《中国文化史纲要》(兵器工业出版社 1997 年版)、萧放《中国文化厄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裘士京等《中国文化史》(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等。篇幅大的是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10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年版)、萧克主编《中华文化通志》(10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等。

其中,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全书近百万言,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中华文化的生态环境,属于“论”,运用现代文化学原理,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揭示了中华文化在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特点,为“史”的叙述奠定了理论基础。下编记述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属于“史”,粗线条勾勒了从上古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文化史的编纂体例一般有两种,一是整体综合型,一是分门别类型。然而,文化既不能离开具体的门类,又不仅仅是各个具体门类的简单组合。因此,只有具体门类的记叙而缺乏宏观综合的论述,或只有整体宏观的综论而没有具体门类的阐述,就都有各自的不足或偏颇。上乘之法是将综论和分述有机结合,而此书堪称这种结合的成功之作。

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2000 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2007 年再版,2009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计 10 卷:《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两宋卷》、《辽西夏金元卷》、《明代卷》、《清前期卷》、《晚清卷》、《民国卷》。每卷都涉及哲学、思想、制度、教育、伦理、文学、史学、艺术、科学技术、社会风俗、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成为纵横贯通的“通史”。比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的内容大大丰富了。全书力求从社会生活环境入手,探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主流、文化主旋律,以及各种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变异,探讨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特色。编者强调:“现代化,首先就是人的现代化,而所谓人的现代化,离不开道德文化素质的提升,所以现代化的实现有赖

于文化的现代化。”[①]这成为全书编纂的指导思想，并赋予全书以现实意义、社会意义。

萧克主编《中华文化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典志体的中国文化史通史巨著。全书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加上总序卷共101卷、4 000余万字。其中每一志都是一部文化史专史著作。如：《地域文化典·齐鲁文化志》就是一部齐鲁文化史，《艺文典·诗词曲志》就是一部诗词曲史，《学术典·诸子学志》就是一部诸子学史。如《学术典·诸子学志》，第一章导论，论述诸子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诸子和诸子学的历史命运等，并附关于诸子的汇编资料介绍、20世纪关于诸子通论及考证等研究资料简目；第二章儒家；第三章道家；第四章墨家；第五章法家；第六章名家；第七章兵家；第八章阴阳家；第九章杂家。各章介绍各家代表人物、思想理论，并附录“书目举隅”介绍古代至民国时期的有关书目。全书历史脉络清晰，思想评价客观，资料、线索详备，学术价值、资料价值很高。十典百志汇成一编，概况性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总体结构、历史沿革、基本面貌，有助于了解、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

3. 断代文化史著作出版

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由十个断代卷组成，此外，断代文化史著作也出版了不少。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书出了一些。如：董琨等《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1994年重印）、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崇琛《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魏向东《中国古代文化史》（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作为高校中国古代文化史课程的教材，颇受欢迎。全书分三十余个专题介绍了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大概。2008年又出版了插图版，可读性进一步增加。

出版的各个断代的文化史的书有：李福泉《先秦文化史》（岳麓书社1996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韩

---

① 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第10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再版后记》。

养民《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 1992 年版)、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 1989 年版)、赵文润《隋唐文化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姚瀛艇等《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杨渭生《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陶绪《晚清文化史稿》(湖南出版社 1996 年版)、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张顺清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等等。还有汪澍白《20 世纪中国文化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傅长禄《中国现代文化史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肖效钦等《抗日战争文化史(1937—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等等。

4. 区域文化史著作出版不少

有的省市出版了地方文化史丛书(详前)。有的文化史丛书中也收入了地方文化史著作。萧克主编《中华文化通志》中也有各地区文化志。此外有:林正秋《浙江经济文化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丁守和等主编《北京文化综览》(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刘小兵《滇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马继孔等《云南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隋书今《东北俗文化史》(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滕复等《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连晓鸣等《台州文化史话》(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卢洪昭等《临川文化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王有三《吴文化史丛》(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李学勤等《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余太山《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5 年版)、徐晓望主编《福建思想文化史纲》(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福建思想文化史丛书》一种)、张复兴主编《银川文化史》(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 年版)、季学原《姚江文化史》(宁波出版社 1998 年版)、黄建荣《临川近现代文化史》(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9 年版)、杨玉厚《中原文化史》(文心出版社 2000 年版)、王长安等《安徽文化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其中很多著作都是开创性的。

如李学勤等主编《长江文化史》,是第一部研究长江流域文化发展史的著作。全书分史前、三代、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十章,全方位多角度对长江流域文化的孕育、发展、交融、勃兴、繁荣、鼎盛作了详细论述。以丰富的考古

资料、文献资料说明了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一样，长江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史前长江文化的发展也是稳步的、有连续性的，在发展过程中，还直接影响了黄河流域的文化。东晋、南朝以降，长江文化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长江流域的发展对国家的经济、文化命脉等的影响日益举足轻重。全书的很多论述是客观的、有新意的。

5. 民族文化史研究的著作很多

详见《中国民族史研究》一节。

6. 专题文化史著作大量出版，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闪亮领域

各种文化史丛书中收入了众多的专题文化史著作，萧克主编《中华文化通志》中也有一部分专题文化志。此外有：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版）、梁泽楚《群众文化史·当代部分》（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王玉哲主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等《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何芳川《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田久川等《中华酒文化史》（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石方《中国性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任常泰等《中国园林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丁广惠《中国古代民俗文化史·原始社会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章仪明《淮扬饮食文化史》（青岛出版社1995年版）、蔡尚思主编《中国酒文化史话》（黄山书社1997年版）、顾智明《中国军事伦理文化史》（海潮出版社1997年版）、杨健民《中国梦文化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黄镇伟《中华书文化史话》（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韩金科《法门寺文化史》（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年版）、宋会群《中国术数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马社香《中国货币文化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杨向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刘汝醴等《宜兴紫砂文化史》（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等。此外，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分《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唐宋卷》、《元明清卷》，2000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为多卷本的专题文化史。

专题文化史研究的勃兴，与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密切相关，很多专题的研究正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成果。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社会交往、社会思潮、社会心

理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的研究，既是社会史研究对象，也是文化史研究对象。文化史研究者的一些专题研究，不仅推动了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发展；社会史研究者的一些专题研究，不仅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两个学科的研究者都相互推动着两个学科的建设。如杨鹃《苗族舞蹈与巫文化：苗族舞蹈的文化社会学考察》（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0 年版）、朱英《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 1994 年版）、李少兵《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等等，可以说既是文化史研究的成果，也是社会史研究的成果；既是文化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的成果，也是社会文化史（新社会史）研究的成果；既扩大了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也扩大了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大趋势。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空间广阔，生机无限。

7. 中华文明史著作大量出版

"文化"和"文明"、"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含义一直在争论，但"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含义非常相近是毫无异议的。一些"文明史"的著作也可以视作"文化史"的一部分。正是文化和文化史热，带动了文明史研究。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年推出了《中华文明史话》丛书。如中华文明史编委会《中华文明史》（10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1994 年版），邵学海绘画、冯天瑜撰文《绘画中华文明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王炜民主编《中华文明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 2001 年版），苏开华等主编《千秋光华：中华文明史专题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等等。文明史研究的勃兴，给文化史研究的火爆又浇了一瓢油。

（三）几点思考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火爆、辉煌，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光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存在的不足也须重视。

首先，"文化史"的定位还有待解决。如有的学者指出：传统的历史学分科体系基本是按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框架安排的，其中根本没有"文化史"的位置。[①]这个问题不解决，无疑要影响"文化史"研究及其学科的发展。

其次，中国文化史的理论建设滞后。中国文化史理论问题、中国文化史学理论

---

① 杨念群：《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克服》，《中华读书报》2010 年 6 月 30 日。

问题、中国文化史学科理论问题的研究还不深入。如“文化”和“文明”的概念之争还没有尘埃落定。理论建设滞后也要影响“文化史”研究及其学科的发展。理论的创新和超越必将带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创新和超越。

再次,重复劳动、粗制滥造的现象严重。丛书推出的重复劳动,前已有分析。通史型的中国文化史,也存在重复劳动,有的粗制滥造。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的一部《中国文化史》(上、下册),讹误百出,其开卷 13 页,便发现各类错误 36 处,平均每页近 3 处。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悲哀”。[①]

最后,研究的薄弱环节不少,或者说还有些盲点。如中国人精神特质的发展规律的研究、中西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等,还研究很少。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就是要用先进的理论、方法,新时代的精神、观念,把中国文化的精华统统积累起来,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时代化,为中国文化再创辉煌,为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铺筑一条有效快速之路。

五、中国社会史研究[②]

中国史家有“述风俗”的传统,较重视记述社会生活方式。中国古代文献中,社会史的资料非常丰富。但中国的近代社会史学科,是伴随近代社会学的兴起而出现的。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社会史的理论影响了中国,中国一些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社会史研究。1911 年,张亮采《中国风俗史》面世,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史著作之一。以后陆续有: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 1928 年版)、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和《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中山书局 1929 年版)、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生活书店 1934 年版)、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 1930 年版),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之作,又是全面研究先秦社会生活的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 1949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沉寂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史学的主流。一方面,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出现僵化

---

① 详见一员:《开卷败兴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图书评论》1992 年第 4 期。

② 本节参考了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常建华等:《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和片面倾向，过分夸大阶级斗争效应，绝对固守单因单果的阶级分析方法，把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从而屏弃了阶级关系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斥之为“庸俗”、“烦琐”、“宣扬剥削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粗暴地驱逐于史学殿堂的门槛之外，轻率地中断了中国治史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社会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①]被取消被搁置，自然社会史研究也难以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二年中，中国大陆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寥寥，是不奇怪的。

这一时期出版的书有：董家遵《中国收继婚姻之史的研究》（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50年版）、王瑶《中古文人生活》（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版）、李剑农《魏晋南北朝民户大流徙》（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版）、梁国东《中国政治社会史》3册（群联出版社1954—1955年版）、王振德《地理环境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王承炤《中国古代社会史试论》（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清代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姚薇元《北朝胡婚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黄少槐《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与风俗》上册（民族出版社1958年版）、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龙门联合书店1961年版）、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964年版）、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等。

董家遵《中国收继婚姻之史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婚姻形态：收继婚，这种形态主要是从少数民族传过来的。董家遵分析了收继婚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并且指出，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汉化，中原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播，使得这种婚姻形态逐渐消失。该书语言十分生动风趣，以大量的事例进行说明。缺点是理论分析不够深入。

傅衣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贡献极大，他的研究非常的注重史料的运用，各种地方府志、笔记、日记、小说、账簿等等，都是信手拈来，细细考证，推究缘由，揭示史料背后所蕴涵的深刻社会本质。他的《明清时代商人及

---

① 翦伯赞：《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第8版。

商业资本》对明代徽州、江苏洞庭、陕西商人和福建海商，清代前期厦门洋行等地方商人作了研究，得出明清时代的商人是中国资产阶级前身的结论。并认为："中国商业资本的增殖方法，多不由正当的途径，而利用封建的独占方式，以巧取豪夺致富。自然，这赋予中国商业资本极富于游离的性质，缺乏坚实的基础。同时，使他们也必须与政治结着不解之缘，且常成为国家财政的尾闾。……他们也因和官僚政治太过于密切了，常不能独立的长久维持其经济上的活动，每随政治的变动，而起变化；辄与王朝的兴衰，同其终始。"[①]此书起初为论文集，系统性略逊，后几经修改，还是存在一些前后叠文的现象。

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根据甲骨文和出土文物，具体生动地描绘了殷代奴隶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写得深入浅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面还不宽，成果不多，社会史的理论研究更为缺乏，学科建设缓慢。

(二) 1978 年 12 月至 1991 年：重新崛起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学术研究开始健康发展，社会史的研究开始走上重新崛起之路。1979 年 3 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推动社会学重建的工作。社会学的重建对社会史复兴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不容忽视。随着高校开设社会学课程，中国社会史课程也很快开设。1978 年开始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后，一些高等院校即已开始培养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人才，198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确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方向。[②]1986 年由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讨论内容集中在社会史研究对象问题等方面。在此基础上，1986 年中国社会史学会成立。学术界有计划地恢复社会史研究的全面启动。随之，山西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成立了中国社会史研究所、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继之而来的是中国社会史著作大量出版。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社会史丛书 4 种，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合作，组织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 20 种。一时间，社会史研究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门。[③]

---

①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1 页。

② 行龙、胡英泽：《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③ 关于 1978 年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详情，可参见常建华等《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此外，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西方的社会史研究理论、方法荡涤着国人的心灵，解放着国人的思想，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兴起的新社会史潮流，影响极大。更多的史料被解读，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操作方法都在不断地与时俱进。计量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微观史学等的引进与广泛使用，也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具有着重大意义。

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理论问题研究有很大进展。如关于社会史的定义的说法便有好几种。乔志强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平行相邻的从属于通史的专门史。社会史研究体系由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部分构成，[①]是为“专史说”。陈旭麓认为社会史是通史，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②]张静如提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③]

理论方法的研究深入自然会带来社会史各领域研究的大发展，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专著有：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文史知识》编辑部《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中华书局1983年版）、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蔡尚思等《论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杨通山等《侗乡风情录》（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罗启荣等《中国年节》（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张舜徽《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张其卓《满族在岫岩》（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袁闾琨等《太监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仁兴《中国旅馆史话》（中国旅游出版社1984年版）、王玉波《历史上

---

① 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光明日报》1986年8月13日。

② 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③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的家长制》(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田方等《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郑明等《海外赤子——华侨》(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董守义《清代留学生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王宗虞等《漫话后妃》(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俊元等《贵姓何来》(河北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王骧《江苏岁时风俗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徐佩印等《民族风情》(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竹青《中国少数民族节日与传说》(北京旅游出版社1985年版)、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严汝娴等《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版)、吴存浩《中国婚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刘泽华《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潘绥铭《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冯尔康等《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树栋等《中国婚姻家庭的嬗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徐吉军等《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禹阶等《权力塔尖上的奴仆——宦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濮文起《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苏智良等《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金良年《酷刑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理论研究著作有: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

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领域较早的一部探讨社会史学科理论问题的专著。该书对于中国社会史下的定义是:"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中国社会史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个专门史,以其开拓历史研究领域,促进历史学全面地、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有交叉的内容,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①

①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应该说这个定义是符合人们一般性的认识的。该书对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了综述，探索其研究理路，总结其经验教训。在该书的第三编附有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专著目录。直到现在，这个目录都是社会史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入学的必读书目。该书是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史学科的一个理论总结，也对后来的社会史研究起到一个指导性的作用。

王玉波《历史上的家长制》探讨了历史上家长制的由来及沿革，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家长制的特征，分析了家长制与夫权、父权、族权、君权的关系。王玉波认为“家长制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现象”。①根据考古资料表明，在人类的远古社会是没有家长制的。“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随着父系氏族公社和私有财产的出现，才形成了父权家长制”。②奴隶社会解体之后，奴隶制的家长制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制的家长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必然形成家长统治”，③另外“封建所有制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必然要求和形成封建家长统治”。④书中指出：“私有财产是封建家长制家庭中一系列矛盾的根源，而这些矛盾的发展、激化，必然动摇、破坏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家庭的基础。”⑤封建家长制最终解体的原因在此。此书是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综合研究的成果，力图以家长制为线索，从各个方面揭示社会的全貌。

冯尔康等《清人社会生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清代社会史研究著作，包括清代的等级制度、社会组织、宗族活动、家庭结构、衣食住行、婚姻问题、丧葬祭祀、娱乐生活、人口增长、社会救济、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与历史发展等诸多方面。辛亥革命以后，学者们开始了社会生活的研究，但多侧重于婚、丧、祭、妇女生活、救荒等某一方面，系统地揭示某一时代人们生活全貌的著作从未问世，《清人社会生活》一书填补了这项空白。全书资料丰富，引用史籍约 450 种，其中不仅有正史、政书，相当多的则是方志、文集、笔记、诗话、碑刻等，还有他人很少引用的家谱资料，也引用了不少档案资料。而且此书不同于以前有关社会史方面的著作，多停留于社会现象的描述，而是如作者在前言所说，还要“说明社会生活自身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说明社会生活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关系及其在总体

---

① 王玉波：《历史上的家长制》，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页。
② 王玉波：《历史上的家长制》，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 页。
③ 王玉波：《历史上的家长制》，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 页。
④ 王玉波：《历史上的家长制》，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 页。
⑤ 王玉波：《历史上的家长制》，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4 页。

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即要搞清社会生活与历史发展的关系”。[1]此书不仅阐述了清人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现状及其特征,而且探讨了这种状况的承传演变及变化原因,揭示其发展规律。《清人社会生活》丰富了清史研究的内容,有利于建立全面科学的清史学。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是较早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著作。书中指出了中国近代会党特征:“(一)组织的非公开性。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组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存在的,它们的活动也是在暗中进行的。但这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它们也可能由秘密转为公开,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哥老会、抗日时期华北的红枪会就是如此。(二)具有秘密的宗旨(包括口号和誓词)、奇异的入会礼仪(包括宗教仪式)和互相联络的隐语暗号等。(三)进行非法的活动。它们一般都进行特殊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活动,这种活动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政府所建立的正常社会秩序是相违背的。(四)在一定条件下,对统治者和政府当局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2]书中把秘密结社的发展分为七个时期,并且进行了评述。书中还指出,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派和会党联盟的拆散,战友间统一战线的毁坏,是由于新的革命政权遣散和镇压会党。此书在中国近代会党史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三)1992—2000年:空前发展

90年代初,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静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相继出版,接着龚书铎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出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史及其理论研究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史著作大量出版,并且因为其所研究的内容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很多社会史著作都成为畅销书,这与以往学院派著作很少有普通百姓问津的情况完全不同的,这又引导史学工作者对社会史的研究付出更多的热情。这一时期的著作列其要者如下:

赵清《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周天游《古代复仇面面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

---

① 冯尔康等:《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②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页。

年版)、白钢《中国皇帝》(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葛承雍《儒生、儒臣、儒君》(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王子今《交通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董英哲《科技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彭卫《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王兆祥《白莲教探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侯杰等《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冯尔康等《中国宗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钱杭等《17 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姜振寰《技术社会史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 1997 年版)、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潘绥铭《性的社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史凤仪《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关文斌《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陈峰《漕运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王日根《明清小说中的社会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徐永志《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 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 2000 年版)、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还有商务印书馆 1995—1997 年推出《中国古代生活丛书》(李学勤总主编),计 44 种。

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被学界公认为“是整体社会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①]乔志强把社会史知识结构分成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大块,指出社会生活是弄清这个社会状况的基础,也是这个社会各种现象的形态、异

---

① 蒋美华等:《补史学之缺,成一家之言》,《晋阳学刊》1995 年第 6 期。

同、发展、变化产生的根源,社会生活是社会构成的表现及运动方式。[①]还指出:研究社会史可以采用的三种方法,即:历史调查法、计量方法和相关学科渗透法。[②]所谓"相关学科渗透法",其实就是现在所称的跨学科的方法。这些方法贯穿于乔书的始终。此书新意不少。如为全面描述近代人际关系,从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三方面入手,深刻揭示了每种人际关系的类型、特点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进而总结出近代人际关系发展的趋势及其特点。[③]如考察近代中国婚姻礼俗,以曾国藩的家书为例,指出在近代社会,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实已经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有许多青年男女可以取得婚姻的自主权。[④]当然,曾国藩是一个开明的地主阶级,给子女一定的婚姻自主权是可能的,但这是个案还是当时普遍现象,作者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明。此书也有不足之处,如秘密结社、贱民等级、乞丐问题、流氓问题等基本没有涉及。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为经,以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为纬,编织出近代社会的绚丽画面。陈旭麓在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的时候,反对所谓的"停滞说"、"阻滞说"等等,他认为是"代代相承,变化微渐"。[⑤]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出现了星星点点的新事物,但是却很难发展起来,鸦片战争之后,新事物的发展开始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在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原因之时,陈旭麓没有采纳以往的所谓是由于西方入侵的观点。他注重从封建社会机体的内部寻找原因,认为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移民的大量涌现以及会党组织的形成与规模化,这是内因。至于"洋货和洋害",陈旭麓看到了其对于中国的危害,但是也敏锐地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使中国历史改变了轨道。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国社会蹒跚地走入了近代。走这条路不是中国民族选择的结果,而是外国影响造成的,于是而有种种变态。这一点是决定以后 100 多年中国命运的主要东西,它影响了近代百年社会新陈代谢。"[⑥]陈旭麓的新陈代谢体系是近代社会史写作的一种新模式,它标志着社会史的写作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史写作的范式,有了自己的创见。此书语言十分优美生动,引人入胜。但此书明显受到

---

① 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18 页。
② 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 页。
③ 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56—360 页。
④ 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3 页。
⑤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 页。
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2 页。

"西方中心论"、"冲击—反应"论的影响,认为向西方学习才能成功,反之,则必将失败。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系统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宗族活动,认为中国宗族的特点是"一、传世久远;二、形态多变;三、成员日众;四、功能转换;五、影响深远"。①宗族形成的三要素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领导者与组织机构。书中指出,周代世袭贵族宗族最发达,魏晋至隋唐是士族宗族时代,宋元时期官僚宗族是最主要形态,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日益平民化,并分析了宗族在不同时期变化的原因。②指出,在不同的社会中,宗族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族闾制表明宗族关系在社区的重要性,保甲里社制实行表明宗法势力影响减弱,宗族间矛盾激化造成地方不安宁,宗族在移民社会中发挥团结族人的作用。③美中不足的是,一本关于宗族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对于宗族在当代的发展着墨不多,只涉及台港的宗亲会,对大陆的宗族还没有详细介绍,这一点不可不说是个遗憾。

社会史的发展,使得许多过去没有被人们所关注的领域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此书从乡村生产环境与两汉时代的农业状况、两汉时代的土地制度与乡村生产经营、两汉乡村社会的分野与农民的历史命运、两汉的乡里村落与宗族、两汉乡村的婚姻与家庭、两汉民间信仰与乡村神祇崇拜、民谣民谚与两汉乡村风情等方面,全方位、立体式的展现了两汉乡村的面貌。"乡村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点,也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源泉"。④但是长期以来,乡村社会史的研究始终是社会史的薄弱环节,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两点。一是史料的匮乏,自古以来,无论是正史记载还是野史笔记,关注的都是城市的历史、政治的历史,乡村的社会生活很少有记载。西方在进行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时候,主要是采用田野考古的方式,大量的乡村记账簿、宗教审判材料、个人的日记等等纷纷被史家们发掘出来,成为第一手的研究史料。但是在中国,虽然此类材料也时有保存,但是长期得不到重视,因此往往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湮灭。二是研究者自身条件的局限性。对于历朝历代乡村社会史的通史性考察,要求研究者自身必须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底蕴,对各代的情况都十分了解。而

①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 页。

②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8 页。

③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5 页。

④ 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 1997 年版,绪论第 1 页。

当今的一些研究者往往局限于各自的研究领域，具有通史通识能力的研究者不多，这就限制了乡村社会史的发展。而马新则采取了一种比较折衷的方式，仅对两汉断代的乡村社会史进行考察，用力集中，不至于有战线太长、力量不足之虞。在运用史料的时候，除了采取一些新的考古史料作为补充，并且在旧史料的解读方面也独辟蹊径，视角独特。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大发展，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也发展起来，如社会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研究。“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比较注重对上层的领袖人物、制度沿革及重大政治事件进行描述性的研究，而比较忽视对政治机制、政治结构、功能及政治决策执行情况的探讨，忽视官与民之间的基层政治组织及其与民众之间的政治联系。”而社会史研究往往只停留在社会生活史的层面上，“较少把社会史研究看作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因此，也就难以出现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政治史、经济史或思想史的尝试，描述性研究向分析性研究的转变，即在材料的基础上加强理论概括，自然是千呼万唤，难以露面”。[①]而赵世瑜的《吏与中国传统社会》则可以说是将社会史研究与政治史研究有机结合的一部较好的探索性之作。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以朝代为序介绍了历朝历代的吏的沿革和发展，下编揭示了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作者的意图是要写作一部政治社会史，这一点无论对于政治史的研究还是社会史的研究都是具有重要意义。在赵世瑜之前，有学者对于吏进行过研究，研究成果也很丰厚，但赵世瑜棋高一着之处就在于将社会史与政治史的有机结合。

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可说是社会史领域长期以来研究成果的一个大集成，是社会史得到空前发展的集中体现。全书分八卷：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元卷、明代卷、清前期卷、晚清卷、民国卷。《中国社会通史》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便是“通”。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个倾向：碎化问题。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史学科存在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普遍存在。研究者将目光集中于所谓的眼泪、戒指、耳环、同性恋、磨坊主之类，津津乐道于那些历史的细节，却缺乏总领全局的眼光，历史学被肢解为一个个小块。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龚书铎在该丛书的序言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单已经全面复兴，而且高潮迭起，成为当今中国史学

① 韩晓燕：《评赵世瑜著〈吏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界中的一门最为活跃的学科。这些成就除表现为研究成果繁富、研究人员素质较高、人数较多，并建立了相应的学会领导机构与年会制度外，更重要的是，关于社会史的地位、定义、对象、方法的理论研讨日趋深入，并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是总的来看，学者们对社会史的微观研究、专题研究投入较大，而对于它的宏观把握、整体架构工作做得不够。我们写作这部《中国社会通史》，目的就是为填补这一空缺，把我们对社会史学科的理论认识，应用于对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变迁研究之中，力图描摹出不同时期社会存在的前提、社会构造、社会运行机制、社会运行状态以及社会变革的情况，以期对其发展规律有较为清晰的认识”。[①]编者的目的就是要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有联系的全面的描述，并且力图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该套丛书因为是成书众手，因此很难免的存在前后体例不一致的地方。并且，既然是“通史”，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实在是个缺憾。

李学勤总主编的《中国古代生活丛书》是一套体系庞杂，几乎囊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史专史性丛书。其中有：《中国古代的婚姻》、《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家具》、《中国古代的家教》、《中国古代民间娱乐》、《中国古代的饮茶与茶馆》、《中国古代的酒与饮酒》、《中国吸烟史话》、《中国古代的养生》、《中国古代的武术与气功》、《中国古代的庙会》、《中国古代的江湖骗子和骗术》、《中国古代的人口买卖》、《中国古代的乞丐》、《中国的师爷》等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套“中国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同时为了适应普及的需要，在撰写的时候尽量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因此该丛书学术性与普及性并重，很受欢迎。该丛书的特点在于，每本书皆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叙述，以朝代为序，条分缕析。不足之处在于缺少一部统领全局的著作，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很难把握中国社会史的一个全貌，只是看到一个个局部。

20世纪后半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沉寂到复兴到大发展的时期。社会史的研究可说是目前史学领域最有活力和最具创新性的一个领域。理论、方法建设日益完善，领域、视角不断开拓，新史料大量发掘，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社会史本科生和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更为社会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后

① 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备力量。尽管出现了“碎化”的倾向，但总体来说，在20世纪后半期，社会史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

六、中国风俗史研究

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中国风俗的记载，《山海经》和《禹贡》中保存了大量的各地风俗物产的原始资料，“《山海经》记载各地风土，与后世方志设风俗，是一脉相承的”。[①]而《诗经·国风》也反映了上古时期中国劳动人民的恋爱婚姻、风俗民情等。汉代出现了专述各地风俗的篇章，如《淮南子·齐俗篇》，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班固《汉书·地理志》都记述了全国各地风土人情。东汉出现了两部记述风俗的专著——应劭《风俗通义》和《地理风俗志》。隋代出现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记》和《诸州图经集》等篇幅较大的记述全国风俗物产的地方志，风俗史研究更丰富。以后，唐代韩鄂《岁华纪丽》，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这些都是研究风俗史的宝贵文献。“明清时期涌现出大量的风土笔记，专记一地风俗物产，记福建有《闽小记》，记扬州有《扬州画舫录》，记苏州有《清嘉录》，记杭州有《杭俗遗风》，记南京有《白下琐言》，记北京有《燕京杂记》，记黑龙江有《黑龙江外记》等”。[②]

近现代以来风俗史著作更多，如缪凤林《中国礼俗史》、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等，这些著作大多对社会风俗的演变、传承进行研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了一些风俗史著作，但数量较少，如杨毓才等《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徐飞鸿《风俗刻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黄少槐等《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和风俗》（民族出版社1958年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节令风俗故事》（中华书局1963年版），等等。“文革”时期，风俗史的研究停滞。“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风俗史的研究开始复苏，以下分类记述之。

（一）丛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风俗史丛书陆续问世，这是前所未有的。

---

① 姚伟钧：《中国社会风俗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

② 姚伟钧：《中国社会风俗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

如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国风俗丛书”至2000年共出版了30多种。其中有《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韩养民等,1987年)、《中国古代饮茶艺术》(刘昭瑞,1987年)、《秦汉风俗》(韩养民等,1987年)、《姓名与社会生活》(金良年,1989年)、《中国古代寺院生活习俗》(王景琳,1991年)、《中国古代妇女化妆》(汪维玲等,1991年)、《闽台风俗》(林嘉书,1991年)、《中国语言避讳习俗》(李中生,1991年)、《中国古代养老习俗》(谢元鲁,1994年)、《中国古代礼仪习俗》(胡戟,1994年)、《中国京剧习俗》(叶涛,1994年)等等。其中,刘道超《中国善恶报应习俗》对善恶报应习俗的产生发展、盛行的原因、内涵以及与儒教、积阴德习俗的关系等都进行了研究。采用了史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摘取了大量古史、文学、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文献,如《周易》、《尚书》、《淮南子》、《墨子·天之上》、《洪范·五行传》、《梦粱录》、《西湖志余》、《拍案惊奇》、《大藏经》、《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盘洲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太平经》等。此套丛书出版后反响很大,台湾文津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此套丛书的繁体字本。邢良俊认为此套丛书之所以赢得读者欢迎,其特色是:在选题设置上不拘一格,既有承古通今的专题著作如:《中国古代节日风俗》、《中国古代饮茶艺术》、《龙的习俗》、《姓名与社会生活》等,又有以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独有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断代性的著作如《金代社会生活》、《唐代文苑风尚》、《放达不羁的士族》等。并熔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①

上海文艺出版社自1993年开始出版“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2000年与广西民族出版社合作出版,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将“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中的几种重新出版发行,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俗史新丛书”),至2000年共出版了十多种,其中有《中国典当史》(曲彦斌,1993年)、《妓女史》(徐君等,1995年)、《赌博史》(戈春源,1995年)、《小妾史》(王绍玺,1995年)、《选美史》(刘巨才,1997年出)、《医俗史》(陈乐平,1997年出)、《年画史》(王树村,1997年)、《贞节史》(章义合等,1999年)、《侠客史》(郑春元,1999年)等。其中戈春源《赌博史》,分别从赌博的产生、赌博的样式、赌博的人物、赌场、赌博的骗术以及禁赌等方面记述了中国赌博的发展史。书中指出:“赌博作为人类的文化形态之一,绝不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牧猪奴之戏’或无足轻重的‘小道’,而是一种对人类生活机制产生相

---

① 邢良俊:《民族风俗的绚丽画卷——介绍“中国风俗丛书”》,《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

当影响的社会现象。”[①]挖掘出赌博中不被世人关注的另一面。再如，郑春元《侠客史》一书，从侠客史的起源，侠意识的渊源、发展，侠观念与诸家思想的关系，侠的壮举，侠的智谋、奇节异行，侠的负面影响以及侠的结局等方面来记述侠客史。指出各个朝代中的侠都具有不同的含义，认为：“具有急人之难、舍己为人、伸张正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是侠。在大多数情况下，侠是替下层百姓解救困厄、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力量。”[②]除在内容上有创新之外，全书资料丰富，史料翔实。

此外还有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俗百科丛书”，共五册：《中国婚俗文化》（杨正文等，1990年）、《马背上驮来的新娘：庚午（马）年话马俗》（柳陆等，1990年）、《副语言习俗：手势、情态、口哨等语言现象》（曲彦斌，1988年）、《饮食习俗》（张劲松，1988年）、《古今育儿习俗》（张劲松等，1988年）。

199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国民俗文化系列”，有《拱手・鞠躬・跪拜》（余云华）、《祠堂・令牌・家谱》（刘黎明）、《契约・神裁・打赌》（刘黎明）、《婚姻・良缘・孽缘》（李鉴踪）、《乌纱・龙袍・大堂》（毛建华）、《姓氏・名号・别称》（王泽树）、《猜拳・博戏・对舞》（王定璋）、《洪门・青帮・袍哥》（王纯五）、《掮客・行商・钱庄》（王静等）、《马车・溜索・滑竿》（黄红军）等。

200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花喜鹊”民俗文库，三册：《悠悠千载一金莲：中国的缠足文化》（徐海燕）、《都市里的杂巴地儿》（齐守成）、《发式与发饰民俗：中国的发文化》（叶大兵等）。大连出版社推出“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丛书”共九种，除《中国名汤500种》（马凤琴，2000年）外，其他都为2000年后出版。

200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华民俗丛书”，其中有《抢婚》（叶涛等）、《谐音民族》（张廷兴）、《姓名》（纳日碧力戈）、《游戏》（陈连山），等等。

200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由冯广鹏主编的“中国传统俗语丛书”，为《新编歇后语》、《新编百事谚语》和《新编名言赠语》三种。

2000年，台南县文化局出版的“南瀛民俗风情丛书”共六册，为《南瀛抗日志》（涂顺从）、《南瀛地形志》（方书美）、《南瀛植物志》（李庆章）、《南瀛小吃志》（许献平）、《南瀛渔乡志》（谢玲玉）、《南瀛王船志》（黄文博）。

（二）通史

邓子琴《中国风俗史》（巴蜀出版社1988年版），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原有

---

① 戈春源：《赌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② 郑春元：《侠客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三编:第一编“宗法时代”(先秦至西汉),第二编“门阀中心时代”(东汉至唐末五代),第三编“士气中心时代”,即“泛伦时代”(北宋至民国)。但第一编原稿已丢失,1988年出版的书,只有后两编。书中大量征引正史、游记、笔记、稗钞、民歌乐府、古诗词等各种文献资料。内容从社会政治教化、士人品度,到百姓的婚丧嫁娶,并涉及了边远少数民族的各种风俗,反映出各民族间的和谐相处。

由史仲文等主编,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全史》“习俗史”卷,分为《中国远古暨三代习俗史》(郑若葵)、《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宋镇豪)、《中国秦汉习俗史》(岳庆平)、《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梁满仓)、《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臧嵘等)、《中国宋辽夏金习俗史》(柯大课)、《中国元代习俗史》(那木吉拉)、《中国明代习俗史》(王熹)、《中国清代习俗史》(李路阳等)、《中国民国习俗史》(岳庆平)十卷。其中岳庆平《中国秦汉风俗史》,结合正史资料及考古资料,从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姻、以及丧葬等六方面,对中国秦汉习俗的特点及发展演变进行了记述,同时选取大量图片资料,对秦汉习俗进行阐释,从而更加生动形象。再如,那木吉拉《中国元代习俗史》,从节令、服饰、饮食、起居、婚俗、丧葬、祭祀、宗教信仰、禁忌、娱乐等方面记述了元朝的习俗,认为元朝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各异,这就决定了元朝的习俗具有其独特性:民族性、阶级与阶层的差别、历史性、传承性。而作者对元朝习俗的研究并非仅限于对各个习俗的记述,更注重元朝习俗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揭示习俗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与其他书相比较,本书更突现了现实意义。

高丙中《民间风俗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三个方面详述了中国近世民俗的全貌:一、物质生活民俗,包括生产民俗、工商业民俗、生活民俗;二、社会生活民俗,包括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三、精神生活民俗,包括游艺民俗、民俗观念。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方法,从整体上概述了各种民俗,并分析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民俗之间的差异,以点带面、提纲挈领地记述了近世民俗的发展演变,同时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和民俗历史文献,从而使内容更加充实。作者认为民俗的自觉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关注、搜集民俗,第二个层次是为了实际目的而评论取舍民俗,第三个层次是民俗理论的系统化。[①]民俗的自觉性的提出,更有助于今后民俗学研究的发展。

---

① 高丙中:《民间风俗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不仅纵向贯通，横向上对不同时代的饮食风俗、穿着风俗、居住风俗、旅行交通风俗、生育风俗、婚姻风俗、丧葬风俗、信仰风俗等多方面都有记述，能使读者全面地了解风俗的发展演变。

(三) 断代风俗史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断代史风俗著作不断问世，使风俗史的研究更加深入。

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注重运用实物资料，同时将正史、类书、地理书、字书、文集、笔记小说以及古窟造像、墓葬实物等文物考古资料相结合，运用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的方法，详尽论述了魏晋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及对隋唐的影响，这是隋唐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贡献。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运用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政治变革为线索，详细地概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风俗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并对社会风俗史的对象、性质、功能做了简要的概述。同时还论及风俗与近代社会的儒学、道教、佛教的关系，从而更进一步揭示了影响中国近代社会风俗演变的各种因素。

相关专著还有张国庆等《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等。

(四) 专题史

1. 衣饰风俗

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将上古至明清时期的服饰史分为九章，分别介绍了中国古代各个朝代服饰的发展、演变，内容涉及冠巾、袍服、掸衣、裤子、围巾、裙子、袜子以及服饰的发展与理学的关系等。不仅运用了大量正史史料，同时还穿插了一些关于服饰的故事，并附有58幅图，学术性、可读性兼备。

周汛等衣饰风俗史的又一专著《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上海学林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合作出版)，分发饰、首饰、冠饰、面饰、耳饰、颈饰、手饰、服饰、腰饰、足饰10篇30节，彩图441幅，黑白图204幅，“历代妇女时世妆”10幅，图表9个，全面详尽记述了中国历代妇女的各方面妆饰。可从中看到唐代开放思想在妇

女妆饰上的反映以及程朱理学对女妆的影响等。此外还有胡铭等《民国社会风情图录·服饰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等。

2. 饮食风俗

饮食风俗因地而异,各个地方有自己的特色,但对于此方面学术界研究较少,著作不多。郭泮溪《中国饮酒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记述了中国造酒、饮酒的历史,酒具与饮酒方式,历代酤酒饮酒的场所,历代较为集中的饮酒日等等。不仅有丰富的历代正史资料,还引用了大量的笔记、小说、诗词等文献资料,并有图片资料,如介绍酒具与饮酒方式时,附有多幅插图。作者认为:"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每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留下的深浅不一的痕迹。这些众多深浅不一的痕迹,使得中国酒文化具有区别与其他国家酒文化的内涵。而这些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便是中国历代的饮酒习俗。"①此外还有陈忠良《传统卤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按菜名分为二十四个专题,每个专题都简要列出材料及示意图,并进行解说。

3. 居住风俗

住,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环节,中国的居住风俗因地而异。中国传统民居是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总结和继承这份遗产,对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建筑发展都是有意义的。但学界对居住风俗史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著作也不多。

荆其敏《中国传统民居》(天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通过一百例,论述了中国民居的传统、类型、布局特点及建筑方法,并附各种图片。作者认为"为了迎接我国村镇建设的高潮,应该及时整理和总结我国传统民居的设计经验,以利于兴建具有民族和地方特点的新式民居",而不应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方法。②

王之力主编《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是中国建筑学会组织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学会共同完成的,也是第一次关于传统民居建筑方面的全国性综合研究成果。本书将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按地理位置分为:东北传统民居、西北传统民居、华北传统民居、西南传统民居、中南传统民居、华东传统民居六大区域,并根据地理气候、空间布局、室内外空间组合、民居的结构和材料来选取典型实例进行研究。配有各区域典型民居建筑的照片、绘制图等。全书有

---

① 郭泮溪:《中国饮酒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② 荆其敏:《中国传统民居》,天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1页。

中国传统民居的总述,也有每一区域传统民居的类型、分布、特点等的综述。尽管深入研究还不够,但颇具资料价值。

季富政《巴蜀城镇与民居》(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选择巴蜀地区二十多个城镇和二十个民居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巴蜀城镇与民居在建筑文化上的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展示了清初以来,巴蜀人民在继承祖先城镇与民居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又融汇各省入川移民带来的新鲜知识和技术,在同一天地中,创造出了新一轮的巴蜀城镇与民居风貌。

此外,这方面的专著还有阎瑛《传统民居艺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高贵林等《家居风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

4. 节日风俗

中国节日风俗丰富多彩,各个民族和地方都有自己的节日及其风俗。社会、民众重视民俗节日及其风俗,学者自然也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就较多。

朱启新等《中国古代汉族的节日风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以十一个汉民族节日为主,记述了汉民族节日的历史渊源、节日活动及节日传说,揭示了汉民族节日的发展演变对华夏文化的形成的历史作用。还指出,由于汉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长期杂居,文化习俗相互交流和融合,这使汉民族的节日普遍为兄弟民族所接受,反过来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

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出版),揭示了中国传统节日发展演变进程及其原因和传统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运用文字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研究方法,以十三个中国传统节日为个案,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分析,得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贺年卡的国家、火药炮竹出现于宋代、七夕节的起源与牛郎织女传说无关、中秋月饼最早见于明代文献等。此外,作者还分析了中国传统节日与宗教的关系,认为不少传统节日的产生与宗教信仰、宗教活动有密切关系,且许多传统节日往往源于某种宗教崇拜或信仰。[1]与朱启新等《中国古代汉族的节日风情》相比较,杨书晚出,在学术价值方面杨书胜于朱书,尤其是在史料考辨及创建性的结论方面后来居上,是自然的。

---

① 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5页。

徐万邦《中国少数民族节日与风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作者分别从民族节日文化的一般理论,各个民族的节日,包括宗教节日、农耕节日、牧业节日、渔猎节日、商贸节日、纪念节日、健身节日、文体节日、社交节日、家庭节日;民族风情,包括婚俗、茶道、饮食、体育、葬俗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节日与风情。与其他节日风俗著作不同,此书论述了节日文化的相关理论,如节日的定义和来源、节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节日文化的特点和功能以及节日文化的发展趋势等,作者指出节日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一、节日研究是多种学科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二、节日文化研究能为党和政府提供制定有关民族政策的依据;三、节日文化研究有利于指导民族文化的扬弃工作"。[①]凸显了此书的理论研究价值。

常人春等《老北京的年节》(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0 年版),按岁时顺疗,由正月至十二月,每月编为一章。涉及各时的祭祀、饮食、娱乐等。关系到民俗学、天文学、历史学、文学、人类学、宗教学、工艺美术、戏曲杂技、园林建筑、饮食商贸等诸多学科。

此外,还有陈瑞隆《台湾民间年节习俗》(兴台文化出版社 1980 年版)、喊良冷等《欢庆泼水节》(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4 年版)、娄子匡《新年风俗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植三等《中国节日习俗趣闻》(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韩广泽等《中国古代诗歌与节日习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卞僧慧等《老天津的年节风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何虎生主编《中国民间故事・节日习俗卷》(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9 年版)、王子华《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云南民族节日》(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蔡志祥《打醮:香港的节日和地域社会》(香港三联书店 2000 年版)、凌志四主编《台湾人民俗・岁时节令传统行业》(桥宏书局 2000 年版)、林秋玲等《春节》(稻田出版公司 2000 年版)、曾美慧等《元宵节》(稻田出版公司 2000 年版)、曾美慧等《清明节》(稻田出版公司 2000 年版)、林秋玲等《端午节》(稻田出版公司 2000 年版)、林慧芬等《中元节》(稻田出版公司 2000 年版)、林秋玲《中秋节》(稻田出版公司 2000 年版),等等。

5. 婚姻风俗史

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各个民族、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婚姻风俗,学者对婚姻风俗史的研究历来较多,成果也多。

---

① 徐万邦:《中国少数民族节日与风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3—44 页。

方川《媒妁史》(上海文艺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以媒妁为视角,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论述了媒妁的起源及各历史阶段发展状况,探寻了媒妁在我国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根源,揭示了婚姻民俗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及媒妁民俗的发展所折射的民族心理。与其他婚姻风俗著作不同,《媒妁史》不以时间顺序为线索记述媒妁史发展演变的历程,而是在宏观上对中国媒妁史进行横纵交错、融汇古今的探讨。

叶涛等《抢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探讨了中国抢婚风俗产生、发展的原因及其社会本质。指出,抢婚风俗的产生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各种矛盾激烈对抗的结果,是男性借助高压手段迫使女性屈服并接受从夫居制的必然。①抢婚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提供了跳板,而私有制的产生为这一过渡奠定了物质基础。

严汝娴等《中国少数民族婚丧风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分为两大专题:婚娶风俗,包括婚姻的起源和发展、婚恋的成年礼、求爱方式、缔婚礼仪、结婚典礼、离婚与再婚、婚姻家庭形态;丧葬风俗,包括藏素的起源及演变、土葬、火葬、天葬、树葬、崖葬、水葬、塔葬,揭示了少数民族的婚娶风俗与丧葬风俗的发展演变及形式。作者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状况,因而中国少数民族的婚丧习俗也各尽不同,而婚丧风俗是历史的储藏库,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过时的方面,但无论哪一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②同时,书中对于少数民族的婚丧风俗的介绍还较简单,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

此外,还有王承权等《神秘的女性王国: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及习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9年版)、李仲祥等《中国古代汉族婚丧风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著《台湾婚丧习俗口述历史辑录:耆老口述历史》(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版)、严汝娴等《试释裕固族宗族和婚丧习俗的某些用语——裕固族习俗用语纵谈》(甘肃民族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李高峰等《黑二十四史》第一卷《婚姻纳妾史、奴婢史、性风俗史、选美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刘俊麟《台湾生死书:婚丧习俗及法律知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尚会鹏《闹洞房》(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秦军校摄《婚俗与丧俗:晋陕豫黄河流域民风》(中国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

① 叶涛等:《抢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② 严汝娴等:《中国少数民族婚丧风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6. 丧葬风俗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丧葬风俗，某些厚葬的风俗至今还有重要影响。政府反对厚葬，丧葬风俗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可能与之有关。

徐吉军等《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以专题为主较系统地阐述了历代丧葬观念的演变、纷繁复杂的丧葬礼仪、形式各异的葬式葬法、类型不同的墓地，同时还论及死者眷属的丧服制度、居丧生活等，揭示了丧葬礼俗之中所隐藏的伦理观念及等级观念。书中还论述了各少数民族的丧葬风俗，如第二章第四节介绍了高山族原始的宗教观念对丧葬习俗的影响，及丧葬过程的各种禁忌、葬式、服丧等。书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如关于宋代是否薄葬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自五代以来，至宋元明清，除少数统治者外，多数统治者没有实行厚葬。作者查阅大量文献及考古资料，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指出自五代以来，丧葬礼俗有着严格的等级和阶级之分，统治者的出殡和丧葬场面很风光，统治者为了维护这一制度，并用法律条文加以保护。

徐吉军的另一本《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年版)，以原始社会到民国时期的历史线索为经，以丧葬观、丧葬制度、丧葬习俗为纬，论述了中国丧葬习俗的发展演变。既研究、论述汉民族，也论述各个朝代的少数民族的丧葬风俗，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楚人择高坡丘陵为葬地，吴越的土墩墓葬和悬棺葬，巴蜀的船棺葬，唐代的吐蕃、突厥、回鹘、南诏、渤海等地少数民族的葬俗，西夏、辽、金时期的党项族、契丹族、女真族的葬俗等。通过对丧葬风俗的剖析，指出中国的丧葬风俗：一、起着联系和强化血缘、亲族的关系；二重视与推崇敬爱先人的孝道观念；三强调丧葬的社会教化与文化积淀。[①]资料工作也很扎实，不仅广泛搜集经、史、子、集文献中的相关材料，还大量引用近代以来的考古资料，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河北平山中山王陵、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明定陵地宫和清东陵地宫等，以及有关发掘报告等。此外，还有周苏平《中国古代丧葬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向明生《殡葬习俗与指南》(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2 年版)，等等。

7. 礼节风俗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但近代以来学界对礼节风俗的研究较少，直至 1978

① 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年版，绪论第 3—5 页。

年以后学界对礼节风俗史有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礼节的研究较为深入。

李晓东《封建家礼》(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记述了中国封建家庭中祖孙、父子、兄弟、夫妻、婆媳、主仆间的封建礼节及其相互关系。还列举了“烈女”、“节妇”、“孝子”等的大量事迹,揭示了封建礼制对人性的摧残和迫害。此书的最大价值不仅在于其对风俗史研究的贡献,而更重要的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对封建家庭中祖孙、父子、夫妻等人际关系进行了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及其性格特点。作者认为,封建社会的“礼”,特别是家庭之“礼”乃是统治者对社会施行道德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儒学伦理说教转化为社会道德力量的主要媒介。①

强钰等《家庭礼仪习俗》(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分专题论述了:家庭交际礼仪、家庭人员相处礼仪、宴请礼仪、馈赠礼仪、婚礼、祝寿礼、丧礼、杂事礼、亲属与称谓、节日习俗、礼仪习俗、家庭日常应用文等。对中国传统礼仪习俗进行了批判性论述。

此外,还有《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一至四册(中华书局 1983—1992 年版)、黄治华等《现代礼仪与习俗》(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雷绍锋《中国风俗与礼仪:缤纷的世俗画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何梅等《礼仪习俗散记》(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等等。

8. 宗教信仰习俗

宗教信仰习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迷信习俗,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近代以来学界对此的研究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研究更少,大概是因为有唯心主义色彩。改革开放后少许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程德祺《原始习俗与宗教信仰》(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分别从群居到个体婚、亲族社会制度与礼俗、原始宗教和神话等方面记述了原始社会习俗及宗教信仰。作者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理论基础,吸收了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新成果以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新成果,指出从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从对偶婚制向专偶婚制过渡是两种不同的过渡,前者的过渡与男女在社会的地位变化有关,而后者的过渡则与私有制的产生有关。

---

① 李晓东:《封建家礼》,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0 页。

孟慧英《尘封的偶像:萨满教观念研究》(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分别从萨满文化观念的形态、萨满与萨满法术、萨满教的神灵、动物信仰等方面,记述了萨满教信仰产生发展的历史及萨满教的各种宗教活动,揭示了萨满教的文化含义。此外还有:郎缨《西北突厥语民族的萨满教遗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4 年版),凌志四《台湾人民俗・民间信仰神明寺庙》(桥宏书局 2000 年版)及刘道超《中国善恶报应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等等。

善恶报应有封建迷信色彩,但自古以来很多人为什么又如此笃信不疑?其中有无合理的内涵,作为一种绵延数千年的重要习俗,它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有何影响?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隐秘的"下位层次文化",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五) 地方风俗

地方风俗史研究、编纂的全面启动在 1978 年 12 月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地方志编纂的复兴,旅游升温等都推动了地方风俗史研究、编纂的繁荣。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按地区记述了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湖州、金华、台州、丽水、舟山、畲族等的生产、生活、礼仪、岁时、社会等习俗。各地的良风陋俗均秉笔直书。如,在记述当地许多优良美德时,也详述了典妻、占卜、堕民等陋俗。作者认为,风俗是社会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是由社会、自然环境、人们心理状况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对风俗的研究要综合多学科的方法。[1]

山曼等《山东民俗》(山东友谊出版社 1988 年版),从岁时节令、衣食住行、人生礼仪、生产贸易、信仰禁忌、游艺竞技等多方面论述了近代山东民俗的基本情况及传统民俗在当代的流变。但多局限于汉族。作者的主要目的在于保存区域的原始民俗资料,资料性内容较多,理论研究、总结内在规律等较少。再如 2000 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郑凤杰主编《石家庄民俗文化》,分别介绍了石家庄的生活、丧葬、节令、礼仪、花卉、庙会、民间艺术、方言、崇拜、禁忌、恶俗、社会新风等方面的习俗,也多局限于汉族。

此外,还有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华北卷、东北卷、中南卷、西南卷、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1995 年版)、王昱等《青海风

---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 页。

土概况调查集》(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朱世奎《青海风俗简志》(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刘还月《台湾民俗志》(洛城出版社 1986 年版)、顾承甫《沪上岁时风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李现国《新疆风土记》(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民俗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3 年版)、刘志文《广州民俗》(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0 年版)、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省志·民俗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民俗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 1997 年版)、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民俗方言志》(中华书局 1997 年版)、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 1998 年版)、陈爱平《湖南风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民俗志》(三秦出版社 2000 年版)、张建忠主编《陕西民俗采风·陕南·陕北·关中》(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0 年版)、黄友良主编《四川省志·民俗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劲挺《延安风土记》(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长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春市志·民俗方言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版)、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文化志、风俗志》(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蔡利民《苏州民俗》(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浦江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浦江风俗志》(1984 年版)、窦若木《峄县民俗志》(山东省枣庄市 1991 年印)、刘兆元《海州民俗志》(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张鹏举等主编《鹿邑民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王金祥主编《方城民俗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李根水等《宁化客家民俗》(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 年版)、叶春生《广府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六)各民族风俗

中国近代以来学界对各民族风俗史的研究已有所展开,1978 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更为深入,学术著作较多。

杨英杰《清代满族风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论述了满族风俗形成的原因、变化发展及其规律,记述了某一特定阶段满族的生活风俗、社会风俗、信仰风俗、岁时节庆风俗以及生产风俗等,揭示了各种风俗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指出:一、满族风俗突出的反映了北方山林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二、满族风俗较多地保留了古老民族的原始风貌;三、满族风俗充分体现了多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发

展趋势。①

《思想战线》编辑部编《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从服饰、饮食、居住、婚姻和家庭、丧葬、节日、宗教信仰、禁忌等方面,论述了西南地区 30 个少数民族的风俗。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写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相关调查资料等,力求呈现西南各少数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

梁庭望《壮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从衣饰,饮食,建筑和居住,生育、男女社交及婚嫁,敬老、祝寿和丧葬,信仰和崇拜,岁时,生产,交通贸易,家庭和社会组织,民间文学,传统艺术,娱乐、体育、卫生等多方面记述了壮族风俗。此书资料丰富,也作了些理论探讨,如指出:一、壮人的风俗与古越人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在语言、文学、生活习俗上可以看到越族文化的延续;二、壮族风俗有内向型和某种程度的隐蔽性特点;三、壮族风俗受汉族风俗的影响较大。②

此外,还有徐行《记维吾尔族的性格与风俗》(甘肃省图书馆 1985 年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编《柯尔克孜族风俗习惯》(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编《巴里坤哈萨克族风俗习惯》(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汛河《布依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蒙国荣等《毛南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许良国《高山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王胜先等《侗族历史文化习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施联朱《畲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杨昌鑫《土家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马学义等《撒拉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马自祥《东乡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王胜先《越裔遗俗新探》(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王迅等《蒙古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杨万智《祈生与御死:哈尼族原始习俗寻踪》(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巴图宝音《达斡尔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王宏刚等《满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韩有峰《鄂伦春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杨知勇等《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黄任远《赫哲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巴莫阿依嫫等《彝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殷海涛《普米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

---

① 杨英杰:《清代满族风俗史》,辽宁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8 页。

② 梁庭望:《壮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4 页。

社1993年版)、陈平编《基诺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符达升等《京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罗日泽等《仫佬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才让丹珍《裕固族风俗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贺灵等《锡伯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赵富荣《佤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斯琴高娃等《傈僳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贺灵等《锡伯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胡绍华《傣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贺卫光等《裕固族民俗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七)反思

20世纪下半期,风俗史研究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但要进一步发展还须从多方面努力。

风俗涉及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传统风俗、新风俗,需要广泛搜集资料,不仅要搜集文献资料,更需要拓展田野考古、田野调查,尤其是那些还鲜为人知的、文献很少记载的风俗更需要田野调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等与香港大学同仁合作开展对珠江三角洲暨华南地区有关家族、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的调查,[①]这是值得提倡的。

加强理论研究。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叙事性的研究,囿于对各民族、各地方风俗现象的记述,而关于风俗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等问题研究的很少。这也造成重复劳动严重,"观点雷同之文随处可见,有的甚至仅集中在相关事件的猎奇上,缺乏客观系统的研究"。[②]加强风俗史各方面理论问题的研究,下工夫进行创新性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加强比较研究。各民族、各地方风俗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各民族、各地方风俗的比较研究,各民族、各地方风俗与全国风俗的关系研究还不多,这就容易造成研究的片面性、割裂性。不仅要发展中华民族风俗的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研究,还应发展中华民族风俗与世界各国、各民族风俗的比较研究,这将对中华民族风俗有更深的理论认识。

加强多学科合作研究。风俗及其史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等诸多方面,与民族学、风俗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

---

① 方艳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近代社会风俗史研究述评》,《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

② 方艳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近代社会风俗史研究述评》,《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

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关。加强多学科合作研究，注意和学习世界学术界的新理论、新方法，是发展中国风俗史研究的有效路径。

七、中国灾荒史研究

灾荒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促使了人们对灾荒问题的关注。中国较为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得中国对灾荒问题的重视由来已久，但是在20世纪以前，只是对灾荒进行简单陈述和记载，并没有上升到研究的层面。20世纪前半期，出现的相关中国灾荒史的著作和论文大多是对一些灾荒资料的整理和汇编，属于灾荒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推动了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有价值的著作，如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虽时有中断，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仍然较为丰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在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灾荒史的研究逐渐复苏并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局面，为21世纪中国灾荒史研究的不断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1949—1980年：中国灾荒史研究的薄弱阶段

1. 1949—1980年中国灾荒史研究的一些成果

这一阶段中国灾荒史研究在资料的整理和汇编方面取得一些成就，为此后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发展做了基础性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尽管政府非常重视防灾、抗灾、救灾工作，并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但是，自然灾害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地震、滑坡、洪涝、干旱、风暴、虫灾及森林火灾等灾害每年都有发生，并呈现出发生次数增多、频率加快、面积扩大、危害加重的趋势。①特别是1959—1961年中国爆发的三年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影响。这些都促使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对各种灾荒问题的研究。同时，有关部门也积极组织整理相关的灾荒资料，提高对灾荒问题的认识。1953年始，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组织一批历史学家查阅8 000多种历史文献，汇集近万次地震的资料，整理出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并在此基础上由李善邦(1902—1980)主持编制成《地震烈度区划图》等一系列地震图表，为当时基本建设提供了防震抗震标准的基本依据。②其他资料汇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

① 张健民等:《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页。
② 张健民等:《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0页。

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 1958 年版)、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等编《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中央气象局研究所 1975 年印)、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编《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等。与此相应,各地的文史馆、档案室、图书馆、气象局及部分出版社等也开始整理相关的史籍和资料。如:河南人民出版社编《农业合作社战胜灾荒的经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广东科技出版社 1961 年版)、河南省气象局编《河南省西汉以来历史灾情资料》(河南省气象局科研所 1976 年印)、陕西省气象局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陕西省气象局气象台 1976 年印)、南京大学气象系气候组编《关于我国东部地区 1401—1900 年五百年内的旱涝概况》(科学出版社 1977 年版)、广西图书馆编《广西自然灾害史料》(广西第二图书馆 1978 年印)等。

同时,一些研究灾荒的专著和文章也不断面世。如:何定华《怎样做好生产救灾工作》(中南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总结了湖北省四年多来生产救灾工作的经验和开展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怎样领导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做好灾区救济工作以及如何开展灾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且结合实例作了具体、扼要的论述。这本小册子可视为有关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最早的一部公开出版的专著。①1973 年发表的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 年第 2 期),是研究气候异常和气象灾害历史的典范之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②张水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灾荒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64 年第 1 期),主要记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所发生的各种灾荒及其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并指出当时国民党面对灾荒的发生不但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来降低灾荒对社会的影响,而且还在不断加剧对人民的剥削。进一步揭露出对灾荒问题的不恰当处理也是摧毁国民党政权的因素之一。最后,通过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应对灾荒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正确地、合理地处理灾荒问题对整个社会的积极意义。

2. 1949—1980 年影响灾荒史研究发展的因素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灾荒史的研究,无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这一领域的人数上都较 20 世纪前半期有所增长,但研究还是很薄弱。这一时期中国灾

---

① 蒋积伟:《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4 期。

② 张健民等:《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 页。

荒史的研究之所以薄弱，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这一时期史学研究较偏重于与阶级斗争相关的问题，研究重心较倾向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社会史方面关注很少或并不关注，而作为社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灾荒史的研究则更少关注；第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1966—1976年的“文革”，使整个中国史学的发展都受到很大影响，灾荒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在此期间，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几乎是一张白卷。

虽然这一时期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还处于薄弱阶段，但这一时期在中国灾荒史资料的整理和汇编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为此后中国灾荒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1980—2000年：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大发展

1. 1980—2000年中国灾荒史研究大发展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灾荒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灾荒史研究崛起的主要原因有：第一，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带动了中国灾荒史的研究。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使史学领域的研究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射到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之中，灾荒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也受到关注，陆续涌现出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第二，一批史学工作者开始关注或转向中国灾荒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部分史学工作者有感于史学界对灾荒问题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大力号召史学界加强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如以李文海为首的一批史学工作者开始投入到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中。1985年李文海主持的“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研究。1987、1990年，他主持的“中国近代灾荒史（1840—1919年）”和“民国时期灾荒研究（1919—1949年）”课题，相继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表明学术界对这个课题的重视和关切。[①]一些史学家提倡对灾荒史的关注和研究也体现在一些文章当中，如1988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戴逸《重视近代灾荒史的研究》。1988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发表李文海《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指出：研究历史应重视对灾荒史的考察，并强调应注重研究灾荒的发生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②]第三，灾害的发生对灾荒史研究的促进作用。特别是1998年中国发生的特大洪水，使得对灾荒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攀升，对灾荒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们日益意识到灾荒

---

① 闵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李文海：《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问题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必须重视对灾荒的研究，必须重视研究应对灾荒的历史经验教训。以1988年为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史学界对灾荒史研究加大了步伐，相关的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这种发展趋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

2. 1980—2000年中国灾荒史的研究的主要成果

(1) 资料更多地整理出版。由于这一时期对灾荒史研究的重视，相关部门和个人对于灾荒资料的整理和编辑无论从所涉及的灾种还是所涉及的区域等与前期相比都有所扩展。如：宋正海总主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资料编纂组编《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谢毓寿等主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等编《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等编《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张波等编《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陆人骥编《中国历史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另外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从1981年起编“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包括《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1年版)、《清代珠江、韩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8年版)、《清代黄河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3年版)、《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5年版)、《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5年版)等。

各地区也整理出版了地区性灾害资料。如：1982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印《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河南省水文总站编《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年鉴社1982年版)、河北省旱涝预报课题组编《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气象出版社1985年版)、张杰编《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8年印)、1997年河南省水文总站编印《河南省历代大水大旱年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这些资料工作为灾荒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2) 丛书推出。这是前所未有的。科学出版社1993—1994年推出马宗晋主编的《中国自然灾害丛书》，收入《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分论》、《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等。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推出马宗晋等主编的《中

国灾害研究丛书》,收入《中国矿山灾害》、《中国交通灾害》、《中国气象洪涝海洋灾害》、《中国地质地震灾害》、《灾害学导论》、《灾害历史学》、《灾害社会学》、《灾害经济学》、《灾害管理学》、《灾害统计学》、《灾害保障学》、《灾害医学》等 12 种。这两套丛书对中国的各种灾害作了记述,对防灾、抗灾的经验教训、对策,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保障学、医学等多方面进行了总结,不仅有历史研究的价值,更有社会实用价值。

(3) 综合性、阶段性灾荒史研究著作大量出版。如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年版),是孟昭华将 1989 年他和彭传荣合著的《中国灾荒史》(现代部分)与他后来按朝代顺序编写的从原始社会至民国期间的《中国灾荒史》,整合而成。《中国灾荒史记》采用编年体,以原始社会为上限,下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 1988 年,较为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历代灾荒情况。对每一朝代灾荒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先记述这一时期各类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以及由“灾”而引起的“荒”。然后再论述统治阶级对所发生灾荒的应对政策和措施。其中,对明代以后中国灾荒的论述用的笔墨较多。客观的呈现出人类在应对自然灾害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措施日趋系统和成熟。

如李文海等主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及《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是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 1840—1919 年间自然灾害的状况,再现了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清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是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①]而其续编主要记载了 1919—1949 年中国灾荒的情况。虽然这两部著作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材料的占有和深入论述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仍被史学界普遍认为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的著作。李文海等还有《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论述了近代中国灾荒与近代中国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要深刻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就需要对中国近代的灾荒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全面挖掘导致近代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李文海等还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对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1855 年黄河铜瓦

---

① 郎元智:《近代东北灾荒史研究:综述与展望》,《辽东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

厢决口前后，咸丰年间的严重蝗灾，丁戊奇荒(1877—1878)，1915 年珠江流域大洪水，1920 年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灾和甘肃大地震，1928—1930 年西北、华北大饥荒，1931 年江淮流域大水灾，1938 年的花园口决口事件，1942—1943 年的中原大旱荒等作了详尽论述。作者还将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当时较为混乱的社会局面相联系，揭露出灾荒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影响而导致的恶性循环。

此外，还有孙广忠等《中国自然灾害》(学术书刊出版社 1990 年版)、张水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朱幼棣《中国：世纪大灾变》(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郑功成《中国灾情论》(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高文学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地震出版社 1997 年版)、邱国珍《三千年天灾》(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年版)、张建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年版)、钱钢等著《20 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2000 年出版的著作有：科技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灾害综合研究组编《灾害・社会・减灾・发展：中国百年自然灾害态势与 21 世纪减灾策略分析》(气象出版社 2000 年版)、刘仰东等《百年中国史话——灾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夏明方等《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采取图文互证的方式考察 20 世纪中国的一些重大灾荒，并且分析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强调严重的灾荒问题是否会对统治者的统治地位造成威胁取决于统治者对待灾荒的态度和表现。

(4) 区域性灾荒史研究著作大量出版。如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全书分“西北灾荒史研究”和“西北灾荒志”两部分，对西北地区干旱、水涝、冰雹、霜雪冻、风沙、地震、滑坡、山崩地裂陷、虫害、鼠类、瘟疫、畜疫、饥荒等灾害进行论述，较全面地呈现出西北地区灾荒的历史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北地区灾荒史研究相对空缺的状况。

还有：《山西自然灾害》编委会《山西自然灾害》(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山西省水利厅水旱灾害专著编辑委员会编《山西水旱灾害》(黄河水利出版社 1996 年版)、梁必骐《广东的自然灾害》(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山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编委会编《山东水旱灾害》(黄河水利出版社 1996 年版)、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专著编辑委员会编《河南水旱灾害》(黄河水利出版社 1999 年版)、魏光兴等主编《山东省自然灾害史》(地震出版社 2000 年版)，以及赵明奇《徐州自然灾害史》(气象出版社 1994 年版)，等等。

一些地区政府、学术界对本地灾害问题研究的重视也促进了区域性灾荒史的研究。如1994年北京市成立了减灾协会，并由北京历史地理专家尹钧科主持完成了“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的重点课题，1997年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历史灾害研究》。①

（5）专题研究著作大量出版。如灾荒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著作有：马宗晋等主编《灾害与社会》（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胡鞍钢等《中国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对民国时期各类灾情进行记述和分析，采取数字对比的方式来说明灾害发生的强度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并且论述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当时人口流动、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等方面的影响。通过论述自然灾害对当时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而提出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发生引起乡村经济和乡村社会的一系列不良的连锁反应。在分析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冲突的基础上，挖掘出民国时期灾害的发生与当时政治秩序之间深层次的相互作用关系。对灾荒社会原因、社会影响的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使历史问题的研究分析更加全面深入。

灾荒应对措施的研究著作有：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是对清代荒政问题研究较为全面的一部著作，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清代荒政的基本内容，并且论述了清代荒政与财政和吏治之间的关系，为此后荒政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书尾附录三个年表：1644—1839年全国各省区的灾况年表、灾蠲年表、灾赈年表。提供了研究清代灾荒问题、清代救灾问题等较详细的资料。相关专著还有：施雅风等主编《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马宗晋等主编《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版）、李向军《中国救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高建国《中国减灾史话》（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范宝俊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史与救灾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曹健民主编《赋税史灾荒史救灾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耿怀英主编《自然灾害与防灾减灾》（气象出版社2000年版）、梁淑芬《湖南省自然灾害及防治对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高秉伦等《山东省主要自然灾

① 苏全有等：《20年来近代华北灾荒史研究述评》，《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害及减灾对策》(地震出版社 1994 年版)、曾令锋《广西洪涝灾害及减灾对策》(地质出版社 2000 年版)、王彦善主编《十年灾情与救灾》(黄河出版社 2000 年版)、宋玉麟主编《云南减灾年鉴(1998—1999)》(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三) 反思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年来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存在时空上的不平衡。研究清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时间段的灾荒史成果较多,而对中国古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灾荒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的灾荒史研究,对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灾荒问题关注较少。其次,在灾荒史的研究过程中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和互动不足。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灾荒史的研究应加强与相关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如天文气象史、环境生态史、疫病史、救济史、保险史、人口史、农业农村史、思想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等;还应密切关注其他更多学科的发展情况,发展跨学科研究,把灾荒史的研究推向更高层次。发展灾荒史的研究还应加强与世界各国相关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加强田野考察等等。

八、中国科技史研究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被打破,社会上有人对于中华民族产生自卑和绝望的情绪,许多仁人志士竭力发掘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力图鼓舞国人信心,以免过分地抬高西方,贬低中国本土的文化。这成为近现代学者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一个重要的动因。

中国科技史真正称得上研究的时期,是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的。①据粗略统计,自 20 世纪初至 40 年代末,大约发表了有关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论文和资料介绍约有二千多篇,出版的专著有二三十种。②主要的专著有:李俨《中国算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4 年版),朱文鑫《历法通志》(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天文学小史》(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历代日食考》(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钱宝琮《中国算学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2 年印),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医学书

① 林文照:《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科技史料》1981 年第 3 期。
② 林文照:《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历史略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 年第 6 期。

局 1920 年版），[①]郑肇经《中国水利史》（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李乔苹《中国化学史》（长沙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等等。学者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搜集中国古代有关科技的典籍，按照现代学科划分标准，摘录史料并做考证；把古代知识翻译成现代的科技语言或进行复原；开展专题研究，撰写学科史。[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继承了前阶段的成果继续向前发展。以下分两个阶段论述：

（一）1949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

1. 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5 月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开始指导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对于中国科技人物与科技事件的评价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同时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科技史研究。如竺可桢在《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人民日报》1954 年 8 月 27 日）中批评了怀德海"中国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的偏见，并且说："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充满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③]不过，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辩护欲逐渐衍生出一种倾向：注重发现中国人曾经创造过多少个"世界第一"、"领先于西方多少年"。[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些相关的科技史研究机构开始成立，如 1954 年创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委员会，1957 年成立了一个专业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史研究室（1975 年又扩充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⑤]这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科技史提供了先决条件。中国科学史研究刊物《科学史集刊》也于 1958 年创刊。还有一些刊物如《医史与保健组织专刊》、《农业遗产集刊》等也相继创刊。这些刊物的创办，对科学史研究工作的发展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⑥]

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史资料的整理有了进展。如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查阅了五千六百多种的历代地方志和二千三百多种的正史、别史、档案等历史资料，编成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两大册，不但为地震史研

---

①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李涛的《医学史纲》及王吉民、伍连德的英文著作《中国医史》，被誉为早期的三部中国医学史代表作。

②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 年第 3 期。

③ 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80—282 页。

④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 年第 3 期。

⑤ 洪震寰：《大力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群言》1990 年第 5 期。

⑥ 林文照：《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历史略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 年第 6 期。

究提供了丰富资料，而且对社会主义基本建设事业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①]同时，有关天文学史、数学史、医学史等的研究仍然保持强大势头，论文与著作相对较多。而农业史和化学史、物理学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科技大跃进"的影响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也提出了科技史研究"大跃进"的计划，但最后大多落空。[②]

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有：

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是一部酝酿多年的著作。论述了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中国历法的发展、中国天象纪事、中国古代的天文仪器(如圭表、漏壶、浑天仪等)、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种种学说(如天旋地动说、天圆地方说、盖天说、浑天说等)，并比较了中西天文学的异同和联系，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于中国古代先进的天文学科学技术的赞美。书中对中国传统星官和近现代天文学史的研究最具特色。作者认为研究古代中国天文史不能只是天文工作者的事，更应该是史学家的事。

冯家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上篇介绍中国火药的基本情况，包括火药的产生、命名以及产生以后历代的火药用于军事武器的发展情况；下篇介绍火药的西传，首先传入伊斯兰国家，而后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书后附有火药纪事年表等。书中认为，火药最先是用于军事而非娱乐，只是有些火器落伍才沦落为娱乐品；肯定了火药是由炼丹家献给军事家的。作者否定了西方国家的"培根发明了火药"的荒谬观点。本书既是通俗读物，也是学术著作。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提出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太宗梓行《女则》)左右，反驳了东周已经发明活字和活泥字不能印刷的说法，确定活字印刷产生于北宋庆历年间，布衣毕昇是胶泥活字的发明者。随后又根据印刷术采用不同材质的演进顺序论证了古代中国印刷水平的不断提高。书中又通过一些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证明远至欧非的印刷术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还根据《李朝实录》等资料，说明朝鲜铜、铅活字在世界印刷史上的地位。记述了元末大批刻工在日本刻书对日本印刷事业的贡献。并介绍了越南、琉球的古代刻书情况。记述了中国天主教徒在菲律宾开创的印刷事业。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工程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被称之为

---

① 林文照：《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历史略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6期。

② 席泽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40年》，《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标志我国古代机械工程史已进入分类史研究的新阶段，……揭开古代机械分类史研究的先河，是我国第一部机械分类史方面的科学专著，走在了这类研究工作的前列”。[①]书中按照现代农业的分类方法将古代农业机械分为七大类：整地机械、播种机械、中耕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加工机械和农村交通运输机械七大类。作者认为，我国历代发明的机械多以为农业服务为主，数量多且发明时间早，但是在过去的一两千年中推广极慢。而至近代，虽有外国新型农具的引进，但大多流于形式，并没有更多地应用于生产领域。作者除大量引用古文献考证外，还采用了出土的古代齿轮范、古代齿轮、汉墓壁画等文物进行论证，[②]书中在充分肯定古代机械数量与质量的同时，也不主张虚构和夸大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刘仙洲被誉为中国机械史学科的奠基人。

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 1964 年版)，是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数学史组的老中青学者集体编写的，大部分出自钱宝琮的手笔。[③]此书系统地记述了自上古到 20 世纪初叶的中国数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各个时期中国数学的发展和主要成就，历代杰出数学家生平事迹、数学成就和数学思想、数学教育和中外数学交流、数学与社会条件的联系等。史论结合，体系严整，考订翔实，立论精审，问世后很快就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④]

张子高主编《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 1964 年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中国化学史专著，图文并茂。第一章原始社会主要论述火的利用、陶瓷出现、酿酒技术；第二章奴隶社会叙述陶器、青铜器、染色技术；第三章封建社会(战国至南北朝)论述了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炼铁技术的发展，青铜器演变，铅铜合金，物质变化理论和物质构成的概念，炼丹术的产生和发展，陶器、瓷器和造纸术的发明和发展；第四章封建社会后期(隋唐至鸦片战争)，论述了钢铁冶炼、胆铜法、金属合金技术、炼丹术的发展，本草学的发展，四大发明的发明与演进以及中国化学成就对于西方化学的影响等等。书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① 游战洪等主编:《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刘仙洲与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发明史研究》一节。

② 游战洪等主编:《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刘仙洲与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发明史研究》一节。

③ 《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奠基者——钱宝琮》，光明网：http://www.gmw.cn/content/2005-07/05/content_264254.htm.

④ 《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奠基者——钱宝琮》，光明网：http://www.gmw.cn/content/2005-07/05/content_264254.htm.

物主义分析中国古代相关的化学问题和历史事件，并利用考古发掘资料来研究之前被人忽视和未曾涉及的化学史事。附录部分有《唐宋至明清之交哲学中唯物与唯心的斗争及其与化学的联系》一文，分析了“哲学”与“化学”的相关联系与相互作用，反映了作者对于中国古代化学史发展的深入思考。

此外，还有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 1962 年版)、李俨《13、14 世纪中国民间数学》(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等。还有一些专题研究著作和论文集，如：李俨《中算家的内插法研究》(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钱宝琮《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66 年版)、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等；专题论文有四千多篇。[①]

2. 1966 年 5 月至 1978 年 12 月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文革”时期，及“文革”结束后的两年，中国科技史研究遭受冲击，发展很慢。“文革”时期，科技史研究机构纷纷关闭，一些学科带头人被扣上各种罪名遭受批判，不少科技史的研究人员被下放或流散，科技史研究遭受严重影响。只是到“文革”后半期，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室受历史所委托，为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提供科技史方面的资料，以及为纪念哥白尼诞生 500 周年撰写论文《日心地动说在中国》，才重新有了点活动。[②]1974 年，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成立。[③]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经济工作期间，将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室扩建为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所。

“文革”时期，为配合“儒法斗争”，也出版了一些与科技史相关的著作。如《儒法斗争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出版社 1974 年版)、郑文光等《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广文等《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中医研究院理论组《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对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影响》(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5 年版)、杨友智等《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等等。这些书，与其说是研究科学技术史，不如说是利用科技史来宣扬“儒法斗争”，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说成是“儒法斗争”的结果，说统治者用儒家思想来迷惑人民，其本质是反动的、唯心的，严重阻碍了科技甚至是社会的向前

① 林文照：《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历史略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 年第 6 期。

② 席泽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40 年》，《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③ 席泽宗等：《20 世纪中国学者的天文学史研究》，《天文爱好者》1999 年第 5 期。

发展，而法家则是富有创新精神和改革精神的，是进步的、唯物的，积极地推动了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把科技史上所涉及的人物也分为儒法两派，儒家一概打到，不提或是少提，法家则一概颂扬。沈括、贾思勰被定为法家，所以出版了李群等《沈括和〈梦溪笔谈〉》（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浙江农业大学理论学习小组《〈齐民要术〉及其作者》（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林文照指出："70 年代中期，江青染指中国科学史，给中国科学史研究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所谓'儒法斗争'的谬论，使中国科学史的理论研究造成了很大的混乱。"①

"文革"结束后的两年，中国大陆也出版了一些科技史研究方面的著述，如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版）、刘仁庆《中国古代造纸史话》（轻工业出版社 1978 年版）、江琳才《中国古代化学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等。

这一时期，台港出版了一些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书，如：王萍《西方历算学之输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6 年版）、李书华《指南针的起源》（台湾大陆杂志社 1969 年版）、李石《中国古代数学史话》（香港中华书局 1973 年版）、刘伯骥《中国医学史》（台北华冈出版部 1974 年版）、成映鸿《古代天文学》（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75 年版）、张廷荣《易学与中医研究》（台北易学研究杂志社 1975 年版）、孔松龄《中国医学演进》（台北希代出版公司 1976 年版）、王吉民《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台北文丰出版社 1976 年版）、杨志一等《古今名医怪病奇治秘籍实录》（台北华贸出版社 1976 年版）、张子高《中国古代化学史》（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77 年版）、叶大松《中国建筑史》（台北中国电机技术出版社 1977—1978 年版）、黄宝瑜《中国建筑史》（台湾正中书局 1978 年版），等等。

这一时期，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中国大陆开始翻译出版，对中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 1978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逐渐形成，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科教兴国的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的口号日益深入人心，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为

① 林文照：《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科技史料》1981 年第 3 期。

了给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料的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及其领域也日益拓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广泛深入。这使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展现了新的面貌。

1980 年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下属有中国数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物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化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地学史专业委员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地方科技史志专业委员会等。[①]一些高等院校中也设立了相关的系、所。如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分别成立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清华大学设立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设立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设立科学史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很多高校都设立了自然辩证法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会议频频举行，据不完全统计，1980—2000 年，科学技术史学会共召开学术会议 150 多次[②]。

科技、科技史的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争相出版，至 2000 年总数达 2 000 种以上。如《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中国科技史料》、《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通报》、《科技通报》、《科学文化评论》、《科学与社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自然科学进展》、《自然杂志》、《大自然探索》等等，及《科技日报》、《大众科技报》等等。

以上这些既是科技史研究大发展的体现，也大大推动了科技史研究的发展。

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大发展主要体现是：

1. 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推出

卢嘉锡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1998 年由科学出版社开始出版。丛书计 30 卷：通史类 5 卷：《通史卷》、《科学思想卷》、《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卷》、《科学技术教育、机构与管理卷》、《人物卷》；分科专史类 19 卷：《数学卷》、《物理学卷》、《化学卷》、《天文学卷》、《地学卷》、《生物学卷》、《农学卷》、《医学卷》、《水利卷》、《机械卷》、《建筑卷》、《桥梁卷》、《矿冶卷》、《纺织卷》、《陶瓷卷》、《造纸与印刷卷》、《交通卷》、《军事技术卷》、《度量衡卷》；工具书类 6 卷：《科学技术史词典卷》、《科学技术史典籍概要卷》(一、二)以及《科学技术史图录卷》、《科学技术年表卷》、《科学技术史论著索引卷》。每卷 60—100 万字。至 2000 年，已出版了《人物卷》、《化学

---

① 苏玉娟等：《1979—2000 年中国科学史研究状况及趋向计量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 年第 1 期。

② 席泽宗：《科学技术史学会 20 年》，《中国科技史料》2000 年第 4 期。

卷》、《地学卷》、《农学卷》、《医学卷》、《机械卷》、《桥梁卷》、《陶瓷卷》、《造纸与印刷卷》、《军事技术卷》等。2001年出版了《科学思想卷》、《物理学卷》、《度量衡卷》等。这既是一套丛书，也是一套规模巨大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中国科学技术史总结性、集大成的巨著。其中的每一种都吸收了最新的考古资料、文献资料与中外最新研究成果，都反映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水平。有学者在1990年说："我们在某一学科、某一方面的研究上，很可能远远超过李约瑟，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没有赶上李约瑟。"[①]而这套《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出版后，可以说中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已在总体上超越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套《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出版后产生很大影响，如《科学思想卷》获第三届郭沫若历史学奖二等奖，《医学卷》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②]

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在差不多时间里，推出了两套《中国数学史大系》，即两套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吴文俊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1998—2001年出版)，计10卷：《上古到西汉》、《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东汉三国》、《西晋至五代》、《两宋》、《夏金元明》、《明末到清中期》、《清中期到清末》以及副卷一《早期数学文献》、副卷二《中国算学书目汇编》。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王渝生等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2000年出版)，全书11册，除了断代卷，如《中国数学的兴起与先秦数学》、《南北朝隋唐数学》、《李冶朱世杰与金元数学》、《中国近现代数学的发展》等，还有专题卷如《珠算与实用算术》等。这两套丛书互补，成为中国数学史总结性、集大成的巨著。

以后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戴念祖主编《中国物理学史大系》10册(2001—2002年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中国天文学史大系》10册(2008—2009年出版)。

推出中国科技史丛书，这是前所未有的，无疑也是中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的标志。

一些文化史丛书中也收入了科技史著作(详见《中国文化史研究》一节)，这既反映了科技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趋势，也反映了科技史研究的火爆。

2. 有分量的科技史著作接连出版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记述中国

① 本部分主要参考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3期。

② 《中国自己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8-10/02/content_16561298.htm.

原始社会至近代(1919年以前)的科学技术发展。对主要的科技成就、科技人物，以及中外科技发展不同道路的对比、历史经验教训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论述。对一些中国科技史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问题,书中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古代印度、古代希腊以及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的科学技术在发展的道路、处理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以至所包括的内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即有着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各个分支学科(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农学等)也都有自己的体系。如数学体系,是包括算术、代数、几何等各科数学知识的体系,以计算和解决实际问题见长。如天文学在历法、天文仪器、宇宙理论等方面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中以历法最为突出。宇宙理论方面所取用的"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在世界古代天文史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并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的发生、发展以至衰落,是同封建社会的总进程休戚相关的。[①]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原因问题,书中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造成的。具体而言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封建专制的思想统治、科学技术事业的官办性质、封建统治者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封建王朝盲目自大、缺乏文化之间交流和利用等因素造成的。[②]这些看法是有新意的,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著作,在差不多时间里,推出了两套巨著:一是卢嘉锡、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纲》(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分八编:第一编《数学史纲》、第二编《物理学史纲》、第三编《化学史纲》、第四编《天文学史纲》、第五编《地理学史纲》、第六编《生物学史纲》、第七编《农学史纲》、第八编《医学史纲》。每一编都采用章节体,分别记述每一个学科内各个方面的发展历史,并附录大事年表和主要参考文献。如《农学史纲》设以下章:第一章中国农业的起源,第二章中国古代的土地利用与土壤改良,第三章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第四章中国古代的肥料积制与施肥技术,第五章中国古代的农具及其演变,第六章中国古代的作物结构及品种选育,第七章中国古代的耕作栽培技术,第八章中国古代的贮藏与加工,第九章中国古代的农学思想和农学家;附录:中国古代农学史大事年表,主要参考文献。记述客观、详备,资料丰富。二是路甬祥总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2000年版),分八册:《地学卷》、《理化卷》、《技术卷》、《农学

---

①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325页。
②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1—335页。

卷》、《生物卷》、《医学卷》、《天文卷》、《数学卷》。其中《技术卷》的一些内容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纲》所没有的。所用体裁类似典志体。每卷分为主要著作、重要人物、理论学说、经验知识、工艺器具、机构制度、中外交流等类目分类记述。如《农学卷》分为《主要著作》、《重要人物》、《理论学说》、《农业技术》、《相关制度》、《水利设施》、《中外交流》、《农事诗与谚语》等类目记述。《农业技术》类下又设《轮作、间作、混作和套作》、《耜耕与铁犁牛耕》、《圩田(围田)、梯田》、《桑基鱼塘》、《御稻》、《嫁接》、《动物杂种优势的利用》、《农业害虫的生物防治》等12类目展开记述。内容丰富，资料扎实。这两套书都是仅次于《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巨著，并且可以互补。

此外，卢嘉锡等主编《(彩色插图)中国科学技术史》，1997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与(美国)祥云出版公司联合出版，图文并茂地记述中国原始社会至清朝的科学技术史，简明扼要，但影响不小。

分科史研究重要成果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中国农学史(初稿)》(二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李迪《中国数学通史：上古到五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数学通史：宋元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数学通史：明清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赵荣等《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等等。

3. 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科技史研究著作相继出版

杨德才等《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19世纪后半期的"西学东渐"为前奏，论述至1994年。突出科技事件、社会事件，如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标志着科学社团成熟，便设一章"中国科学社和近代科学的传播"(第二章)。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标志中国科研机构从政治体制中独立出来，推进了近代科技的发展，便设一章"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和近代科技的发展"(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中国科技发展有重要意义，便设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现代科技基础的奠定"(第四章)。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便设一章"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与现代科技的发展"(第六章)。注重内外史相结合(科技史与科技所处社会环境史相结合)，[①]两者的比例约为1∶2，注重社会因素对于科学技术的影响研究分析。并着眼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前途和未

① "内史"，是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来论述，如科技发明，科学原理、理论等；"外史"是研究科学技术所处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

来，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附录：一、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录，二、中国科学院院士录，三、中国工程院院士录(1994 年)，四、国家重点实验室谱，五、历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简介。从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中国科技的发展轨迹和成果。

陈建新等主编《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先纵向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十余年科学技术的曲折发展历程，然后横向记述各个学科的发展，并记述了中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中国交叉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科学学的发展等。书中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十余年，一、科技实力大大增强；二、科学技术取得重大成就；三、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著。但中国的科技基础薄弱，科技实力不雄厚，人均科技经费相对较少。要加快科技发展，必须：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技运行机制；二、摆脱任何非科技因素的干扰，尊重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三、处理好知识分子问题，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发展的成就及经验教训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颇有现实意义。

此外还有黄光壁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吴熙敬主编《中国近现代技术史》2 册(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郭金彬《中国科学百年风云：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论》(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等等。还有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中国学术出版社 1988 年版)、武衡等主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图强·改革·创新：共和国科技事业 50 年》(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推出卢嘉锡主编《中国当代科技精华》8 卷：《技术科学卷》(上、下册)以及《数学与信息科学卷》、《物理学卷》、《化学卷》、《医学卷》、《生物学卷》、《地学卷》等。既记载了中国当代的重要科技事件，也记载了中国当代重要的科技人物。

2000 年，"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计划列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2004 年底项目完成，并通过了验收。②也表明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

① 陈建新等主编：《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54—560 页。

② 胡维佳：《传统与当代——中国科技史研究浅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 年第 3 期。

4. 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实现突破

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开拓者是李迪、陈久金。李迪1978年出版了《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1987—1992年,李迪主编、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论丛7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1992年版)。随后,李迪主编、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包括《通史卷》、《天文历法卷》、《农业卷》、《医学卷》、《纺织卷》、《化学与化工卷》、《地学·水利·航运卷》,等等。以后,李迪又出版了《蒙古族科学技术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等。

陈久金在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已出版的著作有:《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回回天文学史研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贵州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贵州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等。

此外还有易华《中国少数民族科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巴拉吉尼玛等《蒙古族科学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人物的研究著作,反映了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日益深入。

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是很长时间被忽视的。1978年以后进行了开拓,是中国科技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体现,也是中国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体现。

5. 科技人物研究大发展

一是古代、近代、现代尤其是当代科技人物的类传大量出版。如:陈哲《中国历代科学家》(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2000年第2版)、张彤《中国历代科学家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张志东等《名闻遐迩的百名中华科学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下集(科学出版社1992—1993年版)、刘贵芹等《中国古代科学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沈渭滨主编《近代中国科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范瑞祥等《中国近代科学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及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家小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等等。又如: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出版了《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6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中国现代医学家传》一、二卷(1985、1989年),《中国现代农学家传》一、二卷(1985、1989年),《中国现代生物学家传》(1985年),《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1990

年)等。再如:马仁典等主编《中国现代科学家的人生路》(武汉出版社 1996 年版)、张玉来主编《崛起的中国新科学家》(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9 年版)、周文斌等《中国当代十大科学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年版)、《浙江大学青年科学家》编委会编《浙江大学青年科学家》(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于新和主编《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年版),等等。

规模更大的是,解放军出版社 1998 年开始推出《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文学传记丛书》。以后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2 年开始推出《中国科学家丛书》、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开始推出《中国首席科学家》(丛书)等。

二是很多省市都出版了地区的科技人物的类传。如:许永璋《河南古代科学家》(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徐伯春《江苏古代科学家》(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 年版)、施孟胥等《安徽古代科学家小传》(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年版)、王恭等《福建科学家小传》(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许义夫等主编《山东古代科学家》(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等等。

三是科技人物专传不断出版。古代科技人物传记有:李迪《从和尚到科学家:天文学家张遂》(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1 年版)、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王河等《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王竹楼《科学家郭守敬》(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邓文宽《我国古代的伟大科学家张衡》(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版)、王欣之《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颜中其等主编《中国宋代科学家苏颂》(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杨世兴主编《东周伟大医学科学家:秦越人扁鹊》(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年版),等等。

当代科技人物传记有:景才瑞《爱国科学家李四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谢长江《功勋科学家袁隆平》(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6 年版)、老苗子等《人民科学家叶渚沛》(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刘隽湘《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大量科技人物传记的出版,不仅反映了科技史研究向广度、深度发展,也与大量科技史著作的出版一样,反映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科教兴国战略深入人心,反映了科学家的社会地位极大地提高,反映了全社会对科学家的尊重、爱戴、向往,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爱戴、向往。而且,一些优秀的科技人物传记,对青少年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发挥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6. 专题史研究有发展

如梅汝莉等《中国科技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朱亚宗《中国科技批评史》(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等相继出版,表明中国科技史研究有了更多的开拓。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进展,必须提一下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及他主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译本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

李约瑟早年研究生物化学。1931 年,他出版了三卷本《化学胚胎学》,被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1937 年,三位中国留学生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的到来,使他转向中国科技史的研究。1942 年,李约瑟被派任英国驻华使馆的科学参赞,他首次来到中国。1943 年他负责组建了中英科学合作馆,全力协助中国科学家工作。[①]在华期间,李约瑟结识了一大批对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兴趣的科学家,如竺可桢、钱宝琮、石声汉、李俨、王玲等人,李约瑟不但得到他们的长期帮助,还直接与其中一部分人进行合作。在华期间,李约瑟收集了大量珍贵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和研究文献,所有这些都为他后半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奠定了基础。[②]回国后的 1949 年,李约瑟开始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③]并且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专家学者保持紧密联系。他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进程,还推动了中国有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如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建立便与李约瑟的个人努力有关。

很长时间里,欧洲人相当漠视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没有科学技术,对于世界的贡献也微不足道,即使有一些发明创造,也只不过是手工技艺,而不能提升到"科学"层面。李约瑟则认为,中国科技史是一个"绝对的金矿",其工作也是为了公正地评价中国文明对现代科学的贡献,纠正西方世界的偏见,"他是站在世界科学史、比较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的高度来研究中国科学史的"。[④]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介绍全书总的计划,考察汉语及汉字结构,论

---

① 参见程燕平:《古今中西第一人——李约瑟及其中国科技史研究》,《浙江师大学报》1995 年第 3 期。

② 戴建平:《李约瑟、李约瑟问题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科技与经济》2003 年第 1 期。

③ 陆运祥:《科学巨星——李约瑟》,《知识就是力量》2004 年第 8 期。

④ 潘吉星:《李约瑟文集》导言,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年版。

述中国地理、历史、中西科技交流等概况。第二卷论中国科学思想史和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各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释家及理学）和科学思想的演变发展。第三卷论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地学等。第四卷论物理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航海和远洋航行技术。第五卷论化学及相关科学技术，是全书篇幅最大的一卷。第六卷论生物科学及相关技术，包括农学和医学。第七卷分析中国社会和经济结构，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最后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①李约瑟视野开阔，将中国与外国的科技成果进行了比对和研究，并得出结论：中国人在研究大自然并用以造福人类方面，很早就跻身于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了。②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不仅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成就，进而了解科学是不同文明共同创造的，而且也鼓舞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技术专家进行新的创造。李约瑟认为近代科学不能发生在中国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及政治结构及环境和欧洲大不相同，而完全不是由于中国人有任何不适合于科学的倾向。③这部巨著出版震动世界学坛，从此，中国科技史就成为一门世界公认的学问，并使中国历史在国际学术上地位大为改善。④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总计7卷34册。中国大陆1975年由科学出版社等开始出版中译本，至2013年，中译本已出至第6卷第6分册。出版后大受欢迎、好评，也极大地鞭策了中国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努力撰写出超越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国科技史著作。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已有飞越性的进展，逐渐走在世界前列。但仍需要加强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拓展跨学科研究，使中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九、中国民族史研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二十四史”中有不少民族史的记载，但专

---

① 参见《最新历史版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科技中国：http://www.techcn.com.cn/index.php?edition-view-142307-0

② 夏侯炳：《简论李约瑟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江西图书馆学刊》1995年第2期。

③ 胡维佳：《传统与当代——中国科技史研究浅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④ 戴建平：《李约瑟、李约瑟问题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科技与经济》2003年第1期。

题的有现代民族理论体系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是20世纪开始的。20世纪上半期，已有中国民族史著作出版，如：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1934年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1934年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三联书店1947年版），是较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民族史的著作。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民族史有了很大发展。以下分两个阶段进行论述：①

（一）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建立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了建设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新社会，对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了解成为迫切任务，因此少数民族的族别史研究很快发展起来。

首先，民族史研究机构陆续建立。195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设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室），1956年在此基础上，扩建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58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2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与民族研究所合并成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这些单位的任务之一是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都设有民族历史研究组、室。此外，1950年8月，直属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西北民族学院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1950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前身是1941年9月建立的延安民族学院）开始筹建，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成立（1993年11月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1951年5月，贵州民族学院成立（1959年并入贵州大学，1974年恢复）。1951年6月，西南民族学院成立（2003年4月更名为西南民族大学）。1951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成立，1952年改名为中南民族学院（2002年3月更名为中南民族大学）。1951年8月，云南民族学院成立（2003年4月更名为云南民族大学）。1952年3月，中央民族学院广西分院成立，1953年改名为广西省民族学院，1958年改名为广西民族学院（2006年2月更名为广西民族大学）。1956年9月青海民族学院成立（前身是1949年12月成立的青海省青年干部训练班，1950年9月改建为青海省民族公学。2009年更名为青海民族大学）。1958年9月西藏公学建立，1965年7月更名为西

---

① 关于1949年10月至2000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详情，可参见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藏民族学院。这些民族高等院校基本上都设有研究民族史的教研室。随着民族工作的发展，一些其他高等院校及一些省、市、自治区的社科研究单位也陆续成立了民族和民族语文研究机构。有的单位、机构创办了刊物。如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4年创办了《民族问题译丛》(1958年改为《民族研究》)，不定期出版了《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1955—1957年，共6集)。这些都大大推动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

其次，开展了民族、民族历史的调查。1950—1952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先后派中央访问团赴西南、中南、东北、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进行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有400多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随即组织了全国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①先后有16个组、1 000多人参加，至1964年结束。②1956—1960年还进行了民族语言调查。这些调查为民族识别工作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提供重要依据。至1964年已经识别、确定了53个少数民族(1979年确定55个少数民族)。这些调查也产生了一大批成果。在调查的基础上，开始编纂《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志丛书》等，有的已完成了初稿，③有的已内部印行。④

再次，民族、民族史理论研究广泛开展。如关于"民族"的概念，有些学者恪守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费孝通等在1956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少数民族识别问题的研究》一文，指出："我们体会到不可能在语言、地域、经济联系和心理素质等方面之外去找一个简单的标志来解决族别问题，同时也不应当用近代民

① 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② 如1956年8月9日《人民日报》第7版刊登报道《为了弄清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七个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组出发》："据新华社7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成的七个综合调查研究组，今天起陆续分别出发到东北、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研究组计划在四年到七年的时间内，基本弄清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情况，并了解各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和各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调查研究组计划在头两年内，重点搜集各少数民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初期和上述各社会间的过渡时期的资料。参加这些调查研究组的有历史、民族、语言、考古、艺术等各学科的研究工作人员约二百人。"

③ 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1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963年印行的自治州、自治县概况初稿10余种。

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963—1964年印行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20种左右。

族的标准来要求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们共同体,我们只有就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①]认为斯大林的民族的四个特征的理论可以参考,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如关于民族英雄,周一良提出:民族英雄的产生与反民族压迫战争有关。[②]又如关于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讨论的文章就有数百篇,主要讨论了: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有没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在中国历史上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是否都曾出现过?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有哪些类型?等等。[③]此外,民族战争、民族疆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等问题也展开了讨论。当然,讨论是初步的、有局限性的。[④]

民族、民族历史的调查及理论问题的探讨,都推动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除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志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等开始编纂外,还有一些中国民族史的著作出版。

最有代表性的是马长寿(1907—1971)《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北狄和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版)、《乌桓与鲜卑》(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篇幅不大,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突厥族的发展过程,包括起源、分裂、兴衰等等。第一次提出了突厥从第一汗国到第二汗国,是一个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过程。《北狄和匈奴》对匈奴的人种和语言、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经济文化、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以及匈奴入居中原地区的活动等,作了全面的论述。此书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匈奴史研究专著。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匈奴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⑤]《乌桓与鲜卑》从族属、居地、社会状态及其所建政权等方面,对这两个古代民族作了详细的论述,并探讨了他们的社会发展规律。书中首次指出了拓跋鲜卑所居的地理位置:“鲜卑语言习俗与乌桓同,他们原始分布地,一在乌桓山,一在鲜卑山。……拓跋鲜卑的最初起源地在今内蒙古草原的东北角,即今额尔古纳河的东南。古时那里有座大鲜卑山,便是他们祖先原始分布所在。”[⑥]

---

① 费孝通等:《关于少数民族识别问题的研究》,《人民日报》1956年8月10日第7版。

② 周一良:《推进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几个具体问题》,《历史教学》1951年第5期。

③ 详见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8页。

④ 详见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第一章《中国民族史理论问题的探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⑤ 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⑥ 马长寿《乌桓和鲜卑》,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8页。

后来的考古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此外,还有黄华《中国少数民族》(上海群众书店 1950 年版)、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上海东方书社 1951 年版)、杨英杰《黑龙江边兴安岭的鄂伦春民族》(东北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郭应德《维吾尔族史略》(上海东方书社 1952 年版)、樊圃《西北少数民族》(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版)、黄现璠《广西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白寿彝《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 1957 年版)、丁毅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回回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 1958 年版)、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等等。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文革"爆发后,民族史研究基本上停滞了,已经开始编纂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志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等完全中断。而台港地区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不少成果出版。如:吴主惠《汉民族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8 年版)、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台湾中华书局 1969 年版)、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综合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史研究所 1971 年版)、刘义棠《维吾尔族史研究》(台湾中正书局 1975 年版),等等。

(二) 1978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思想路线也得到端正,学术研究开始健康发展。随着经济的繁荣,综合国力的增强,政府对学术研究的投入日益加大,学术研究繁荣起来。民族、民族史的研究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关系到反分裂斗争,尤其受到政府的重视。同时,改革开放的深入,使中外学术交流空前发展,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中外学术交流也空前发展起来。这一切都使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大发展成为必然。

民族、民族史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发展。各省市自治区的民委都设立了民族研究所。新成立了一些民族学院,如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后更名北方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学院等。1985 年设立的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1992 年更名为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9 年 1 月升格为四川民族学院)。改建、组建、升格的还有:1982 年改名的黔西南民族师专,1993 年升格为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0 年组建成黔南民族师范学院。1989 年,恩施师范专科学校改建、升格为湖北民族学院,等等。有一些大学设立了民族研究所,如云南大学设立了民族研究所(以后发

展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后又发展成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下设民族学研究所、宗教文化研究所、民族史研究所、边疆学研究所等），贵州大学设立了民族研究所（后发展成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设立了中国藏学研究所等。很多学校及社科研究单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民族史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

一批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建立，这是前所未有的，如：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后改名“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等，还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等，很多省市都建立了民族研究学会，有的还建立了有地方特色的民族研究会，如黑龙江省鄂伦春民族研究会、云南白族研究会等。有的还建立了国际性的研究会，如国际保护和弘扬纳西文化协会（1997 年）、国际纳西学会（1999 年）等。

民族、民族史研究类的刊物大量增加，这也是前所未有的。除了民族高等院校的学报外，还有《中国民族》、《民族论坛》、《民族理论研究》、《民族工作》、《今日民族》、《民族团结》、《民族大家庭》、《民族学研究》、《民族学刊》、《民族遗产》、《贵州民族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西北民族研究》、《西北民族论丛》、《广西民族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甘肃民族研究》、《西藏民族宗教》、《民族法学评论》、《中国民族教育》、《民族教育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民族艺术研究》、《民族艺术》、《民族音乐》、《民族语文》、《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中国民族医药杂志》，等等。此外，辽宁还有《满族研究》、《满学研究通讯》，黑龙江还有《满语研究》，台湾也有《满族文化》，等等。

国际、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大发展，学术会议频频举行，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如 1981 年 5 月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1985 年 10 月，中国民族史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在福建厦门举行，主要讨论了魏晋南北朝与宋辽金夏时期民族关系问题。以后基本上每两年开一次年会。1993 年 8 月，中国民族史学会在北京召开了海峡两岸中国民族史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1993 年 4 月，中华民族史研究会在重庆举行了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探讨了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的问题。接着，

1994年12月、1996年8—9月、1997年8月，又在海南、云南举行了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二至四次学术研讨会。又如，1990年8月，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等在杭州召开了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暨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1992年8月，首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在京举行。1995年9月，纪念满族命名3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承德举行。又如，第一届中法藏学研讨会，2000年11月在法国巴黎举行，主题“西藏：历史与人类学”。各地区召开的中国民族史为内容的研讨会更多。这些都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推动了中国民族、民族史研究的理论研究开辟了新局面。如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大量的论文发表，还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有：彭英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邱久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陈育宁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陈琳国《伟大的步履——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凝聚力》（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木芹《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萧君和《中华民族族体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伍雄武《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出：“今天的中华民族，它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的主流是由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这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不仅是一种客观的中国历史、中国民族史解释理论，也是一种有现实社会意义的中国社会发展理论。有人评价说：“费老的研究不仅创造性地引出了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崭新理论，而且是一项极为重大的发现，是认识中华民族整体结构的一把钥匙，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些事实是对形形色色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有力批判，而且对增进民族团结和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②又如关于民族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 宋蜀华：《认识中华民族构成的一把钥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读后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识别问题的研究，有的学者提出：研究中国的民族要注重历史上有关概念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也要注意这些概念所指的社会事实的产生、发展和变化。[①]有的学者提出：可以通过划分民族的边缘界限达到民族的认同。[②]其他很多理论问题也有讨论。[③]

民族史的资料整理（翻译）、出版有了很大发展。除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开始编纂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重新上马、陆续出版外，其他各方面的民族史资料也不断出版。如关于藏族的资料就出版了：《明实录藏族史料》3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清实录藏族史料》10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藏族史料集》4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1987年版）、《藏族编年史料集》一、二（民族出版社1989—1990年版）、《元代以来西藏地区地方与中央关系档案资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资料汇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译文集》（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汉文部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此外，《匈奴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8年版）、《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年版）、《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下册（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彝族史料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傣族史料辑要》（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等类的资料，也出版很多。也有非公开印行的资料，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编印了《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四辑、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印了《世界满文文献目录》（1983年版）等。其他很多资料的整理、出版，可参见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各章论述文献资料整理、出版各节、各部分。[④]

这些都奠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大繁荣的基础。

1978年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繁荣有多方面的体现：

---

① 纳日碧力戈：《从中国民族识别看"家系类似性"的方法论意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② 详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

③ 关于1978年以后的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可参见金炳镐主编：《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二十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 如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三章第四节"满族史研究"第四小节"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第七章第五节"白族、纳西族史研究"第三小节"文献整理"；第七章第七节"傣族史研究"第三小节"傣族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等。

一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开始编纂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志丛书》等，重新上马，陆续出版。如《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1978年以来开始陆续出版，至1989年已出版了由编写组编写的50个少数民族的简史：《回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塔吉克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黎族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土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高山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仫佬族简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瑶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栗粟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景颇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鄂伦春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裕固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赫哲族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保安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东乡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毛南族简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京族简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纳西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布朗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水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布依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基诺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哈尼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达斡尔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俄罗斯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柯尔克孜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独龙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拉祜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阿昌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佤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德昂族简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土家族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羌族简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锡伯族简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门巴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珞巴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哈萨克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怒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彝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普米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版)、《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维吾尔族简史》(新疆民族出版社 1989 年版),等等。以后双陆续出版了几种。以上各种著作,名为"简史",实际上是各个民族的简明通史。分别论述了各民族的族源、历史发展、社会经济形态、文化艺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各个民族的革命斗争传统以及在历史上对缔造统一的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等。以上各种著作,既依据历史文献记载,也运用了大量实地调查的资料,是有学术价值的。

二是中国民族史通史著作陆续出版。如江应樑主编《中国民族史》(上、中、下)(民族出版社 1990 年版),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顺序记述各民族历史,各个民族的族源发展、战争、民族交流与融合等,不仅记述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更注重少数民族间的交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和多元性。还探讨了王朝更替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书中引用的文献资料、调查资料很丰富,并广泛吸收了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研究成果。

如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是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并获 1995 年国家图书奖。全书共八编,前七编记述华夏各个民族的历史,第八编记述近代民族解放斗争。书中提出:"民族史与王朝史是两个独立的体系,……应把民族史作为独立的一个系统去写,同时,要把它与王朝史紧密联系起来,去研究和撰写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影响。"①这是此前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没有提出过的。

如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全书分七篇:第一篇华夏/汉民族,第二篇东北民族,第三篇北方民族,第四篇西北民族,第五篇青藏高原民族,第六篇西南民族,第七篇中南民族。以地域为主线,然后每篇又分历史时期进行记述。提出中国民族史可分以下几个时期:一、中国民族的起源(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二、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孕育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三、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端及第一次南北朝时期(秦汉、三国、两晋及南北朝);四、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及第二次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及辽宋金);五、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确立时期(元、明、清 1840 年以前);六、中国各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的独立与统一时期(1840—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②并提出以语言系属为基本因素,参照古今各民族起源、名称演变、分布地区、经济特点、

---

①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 页。
② 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5 页。

文化习俗等因素，来划分各族系，[①]还是别开生面的。

此外，还有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陈连开《中华民族史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张鑫昌等《中华民族发展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尤中《中国民族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等等。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年推出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计 8 种，为田继周《先秦民族史》、田继周《秦汉民族史》、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卢勋等《隋唐民族史》、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罗贤佑《元代民族史》、杨绍猷等人《明代民族史》、杨学琛《清代民族史》。每一种虽然断代为史，但 8 种合起来是一部资料十分丰富的多卷本通史。这套书的一个特点是写史与写人相结合，在记述每个民族的历史时，也注意记述该民族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更丰富多彩地反映了各民族历史。

三是民族关系史研究著作大批出版。这是以前很少见的。其中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民族关系史著作。全书分五编：远古到秦汉的统一；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统一；五代、宋、辽、金、夏到元朝的统一；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清朝的统一；近代民族关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全书突破了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过分地强调民族关系中的政治因素、阶级关系，忽视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局限，对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书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的成就及对汉民族的影响。突出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的灿烂文化和历史。在论述民族融合时，强调相互吸收和相互促进，正是在彼此交融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不可分割性。并就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民族压迫与平等、民族战争与和平、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民族关系主流等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探讨了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此书被认为是奠定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本框架”[②]。

---

① 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13 页。有关民族史研究成果集中性的著作还有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本书主要记载的是 1981 年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的主要摘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此时学术界在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上的突出成果，既包括民族史理论方面的问题也包括具体民族间的关系等，它还附录了 1951—1982 年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论文目录，虽然它的原创性不大，但是可以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大体状况。

② 方素梅：《最近十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民族研究》2005 年第 2 期。

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编写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客观记述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间的关系,如第三章对匈奴奴隶政权的建立、传统手工业、文化艺术等都给予了肯定。第五章记述突厥族等与唐朝关系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历史作用。

杨建新等《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提出了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关系的总体状况应是各民族共创中华的观点,这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此外,还有张雄《中南民族关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吴永章等《中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尹筑光等《新疆民族关系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德华《云南民族关系简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黄玉生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辅仁等《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黄佩谨《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发展》(齐鲁书社1991年版)、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等,以及黄光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民族关系史研究著作大批出版,还催生了李振宏《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探讨综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著作。

四是地区民族史研究著作大批出版。 以上列举的民族关系史研究著作中就有一部分是地区民族史的研究著作,此外还有:吕光天《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傅朗云等《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干志耿等《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雄《中国中南民族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马迎洲等《河南少数民族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吴永章《湖北民族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侯绍庄《贵州古代民族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胡国兴《甘肃民族源流》(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周廷贤《云南民族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蒋秀松等《东北民族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尤中《云南民族史》(非公开印行,1980年;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高路加《中国北方民族史》(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周伟洲《西北民族

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张博泉等《东北古代民族》（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7 年版）、赵廷光《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版）、杨铭《西南民族史研究》（重庆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新疆史的研究著作不少，如钱伯泉等《通俗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陈慧生等《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朱培民《20 世纪新疆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等。

地区民族史研究中以西藏地区最为热门，不仅中国学者关注，欧美学者也极为关注。大多涉及的是西藏与各方面的关系问题。周伟洲等《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是研究英、俄与中国西藏关系史较全面系统的学术著作，书中运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指出：清末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和谐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始终没有妄自称尊、背叛祖国下决心搞‘西藏独立’”。[1]祝起源等《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王贵等《西藏历史地位辨：评夏格巴〈藏区政治史〉和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西藏政治史》评注小组《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等都驳斥了“藏独”论调。此外，还有牙含章《西藏历史的新篇章》（四川民族出版社 1979 年版）、赵志忠《清王朝与西藏》（华文出版社 1999 年版）、曾国庆《清代藏事研究》（齐鲁书社 1999 年版），等等。

五是族别史研究著作大批出版。除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族别史简史著作外，还有不少篇幅较大的族别史著作出版。如张声震《壮族通史》（上、中、下）（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版），采用考古资料及正史、杂史、民族学、语言学等方面的资料，较全面系统论述了壮族从原始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各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是迄今国内外壮族史研究的最有分量的著作。在此书前有黄现璠等《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篇幅小一点；还有苏建灵《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等。

---

① 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4 页。

此外，还有江应梁《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4 年版）、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滕绍箴《满族发展史初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李燕光等《满族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伍新福等《苗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贺灵等《锡伯族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吴永章《瑶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郭大烈等《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黄义仁《布依族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蒙古族通史有数种：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3 册（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2001 年修订版）、乌云毕力格等《蒙古民族通史》4 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后修订为义都合西格主编《蒙古民族通史》5 卷，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等。还有浩帆《内蒙古蒙古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 1947—198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等。

藏族史有综合性、地区性多种：王辅仁等《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1 年版）、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新甘肃月刊资料室《甘肃之藏族》（甘肃省图书馆 1984 年印）、方范九《西藏民族来源考》（甘肃省图书馆 1986 年印）、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黎宗华等《安多藏族史略》（青海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雀丹《嘉绒藏族史志》（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陈光国《青海藏族史》（青海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版），等等。

回族史有综合性、地区性多种：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2 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穆罕默德·阿里·冯福宽《陕西回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吴钰《天水回族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以后有吕建福《土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等。

六是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著作大批出版。除了以上已提及的外，还有很多。

林幹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中成就卓著，其代表性著作有《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等。这些著作资料丰富、立论严谨，对国内外学术界有争议的问

题，一般不妄下结论，力求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作出全面、客观的记述。如《匈奴通史》（修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匈奴史》而成）对约有500年历史的匈奴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及先秦、两汉时期匈奴与中原的关系，屠各与南匈奴联合建立的“汉—前赵”政权，铁弗匈奴及其建立的“大夏”政权等都作了比较全面、系统、正面的记述，还对匈奴人在欧洲的活动也作了客观记述。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关于匈奴的种族和语言，只是指出：匈奴的种族，国内外学者争论较多，它究属突厥种抑属蒙古族，现时两说尚相持不下。但据近数十年来的考古资料证明，以属于突厥种的可能性较大。匈奴人的语言，一般认为是属于阿尔泰语系，但究属该系中的蒙古语族抑属突厥语族，则尚未有定论，但以倾向于突厥语族的居多。①这里没有下定论，而是采取诸说并存的存疑，是实事求是的。

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女真族的渊源、发展历史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的著作。书中对商、周、秦、汉、魏、晋、隋、唐以来女真族的先人进行了详尽的考辨，指出：不同地区、不同部分的女真人形成了女真系统的各个民族。女真是一个语族，其中包括有不同的语支、语群而形成各不相同的民族共同体。有时，甚至还包含了不属于这个语族、语系的其他民族。②指出：清朝的创建者满族，就是以女真族为主，并吸收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女真族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③

此外，还有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版）、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日蔚《丁零民族史》（甘肃省图书馆1985年印）、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一纯《吐谷浑族考证》（甘肃省图书馆1986年印）、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白滨《党项族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白翠琴《瓦剌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万永林《中国古代藏缅与民族源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

① 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第3页。

② 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1页。

③ 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1页。

年版)、何光岳《氐羌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等,以及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等等。

七是各种民族专题史研究研究著作大批出版。

1. 民族政策史的研究著作出版了一批。其中有:徐杰舜等《中国历代民族政策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田继周等《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张践等《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等,以及王红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2. 民族革命史的研究著作出版了一批。其中有:朱万一《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史 1840—1919》(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 1840—1949 年》(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李资源《中国近代少数民族革命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徐玉欣等《新疆三区革命史》(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版)、黄成授《广西壮族革命史》(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乔正孝等主编《青海少数民族革命与建设史论》(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冯可汉《近现代云南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3. 边疆民族史的研究著作出版了一批。边疆史研究离不开研究边疆民族,民族史研究离不开研究边疆。但边疆问题一直是个敏感问题,以致是研究的一个禁区。1978 年以后中国边疆史的研究有了大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 年成立)先后组织出版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中国边疆史地文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边疆史资料丛刊》等,使中国边疆史研究迅猛发展起来,自然也推动了边疆民族史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马大正《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袁祖亮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戴逸主编《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吏与边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马楚坚《明清边政与治乱》(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马汝珩等《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等等。

4. 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著作出版了一批。其中有: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白钢《元代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兰州

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卢明辉《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况浩林《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李侠等《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还有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编《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等。

5. 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著作出版很多。综合性的有:王佑夫《中国古代民族文化概述》(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李德洙《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刘鸿武《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田继周《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王永强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8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年版)、吴永章《中国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张碧波等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碧波等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族别性的有:马学良《彝族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李坚尚等《咯巴族的社会和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冯继钦《契丹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罗之基《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钟翰《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马启忠等《布依族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马维良《云南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段超《土家族文化史》(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索代《藏族文化史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2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开始推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至2000年已出版了陶天麟《怒族文化史》(1997年)、俞茹《德昂族文化史》(1999年)、杨宗亮《壮族文化史》(1999年)、张桥贵《独龙族文化史》(2000年)、纳文汇等《回族文化史》(2000年)、马世雯《蒙古族文化史》(2000年)、于希谦《基诺族文化史》(2000年)等。

其他还有：管林《中国民族声乐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年版）、肖常纬《中国民族音乐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高谊《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教育史的著作也不少，如谢启晃《中国民族教育史纲》（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史波《民族教育与文化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董建中《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张诗亚《西南民族教育文化溯源》（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朱俊杰等主编《湖南民族教育五十年（1949—1999）》（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6. 民族社会史的研究著作出版了一批。其中有秋浦《鄂伦春社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田继周等《西盟佤族社会形态》（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吕光天《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吴景山《突厥社会性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史继中《西南民族社会形态与经济文化类型》（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星全成等《藏族社会制度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霍维兆《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风俗史的研究著作出版了很多。如杨英杰《清代满族风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张国庆等《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等。各少数民族的风俗志基本上都已出版，如汛河《布依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蒙国荣等《毛南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许良国《高山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等等，详见《中国风俗史研究》一节。

宗教史的研究著作出版了一些。如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等。

7. 民族科技史的研究著作出版了一批。详见《中国科技史研究》一节。

8. 民族自治史的研究著作出版了一些。如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张尔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史纲》（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中国民族区域自治 50 年》课题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 50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张玉玺主编《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等。

9. 民族法制史的研究著作出版了一些。如吴宗金《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以后有徐晓光《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等。

10. 民族学史的研究著作出版了一些。如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中国民族学史》下卷(1950—1997)(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版)等。

以上足见民族史研究领域大大拓展,研究成果空前丰硕,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社会繁荣发展一样,民族史的研究也空前繁荣起来。

中国民族史研究还应加强理论研究,加快少数民族(史)资料的整理(翻译)、出版,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史研究人才,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中国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应有更多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

十、中国共产党史研究[①]

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 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十七年(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础上实现了飞越。首先,民主革命时期只能进行地下的、半地下的、内部的研究成为过去,中共党史书不能在全国公开发行成为过去,一批中共党史书公开出版发行,如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950年)等,在全国各地的发行达数百万册,这是前所未有的。相继出版的还有刘祖春《中国共产党简史》(1952年)、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1956年)、黄河《中国共产党三十五年简史》(1957年)、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1954年)、荣孟源《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1954年)、王德庆等《中国现代革命史讲话》(1957年)等。其次,中共党史研究由规模小向规模大,由不成体系向较有体系发展。开始划分历史时期,开始进行全史的、阶段史的各种类型的研究。如司绥延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1955年)、叶蠖生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1957年)、廖盖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

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详情,可参见周一平主编:《中共党史研究9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本节引用的各种论著的出处,亦详见《中共党史研究90年》附录《中共党史研究简目》。

简史》(1950年,又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诞生的》)等相继出版。再次,中共党史研究的队伍空前壮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研究中共党史,早期主要是党的领导人,后期主要是根据地宣传部门、学校的少数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各地宣讲中国共产党历史队伍的发展,随着高校、中学逐步开设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中共党史研究的队伍发展成全国各高校、中学、各地领导部门、宣传部门、报刊杂志社等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浩浩荡荡的理论大军,群众性的学党史、宣传党史的热潮此起彼伏。最后,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宣传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需要向全国人民群众进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进行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理论的教育,人民群众也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这决定了当时党史研究的政治色彩、宣传色彩浓厚。尽管如此,这在当时是合理的,是大变动以后的社会需要的,社会作用是积极的。

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开始不正常。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经济生活开始不正常。政治、经济生活的"左"倾发展,自然影响到学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从1958—1965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书、中共党史讲义数量日益增多,地方党史的研究也随着毛泽东号召各地编写地方党史发展起来,但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开始反映出来。如:一、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思潮抬头,尤其是突出领袖,围绕领袖著作写党史、解释党史,逐渐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不成文的规范。二、路线斗争逐渐成为中共党史的主线,多线条、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开始被单线条的研究取代。三、大批判式的研究日趋严重,否定一切、肯定一切式的走极端研究蔓延开来。因为批判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于是也批判"百团大战"是"右倾投降主义"。张培森曾说:张闻天在中共党内担任过中央总书记,如此重大的史实却在相当长时期内党史上是一直讳言的。直至1979年中央为他平反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所致悼词中才公布这一史实。①足见当时中共党史研究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这一时期也有较有价值的、较受欢迎的书,如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等。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中共党史工作最具学术价值的是资料建设全面展开。《毛泽东选集》四卷陆续出版,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李大钊选集》、《瞿秋白文集》、《孙中山选集》等文集相继出版。195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了

① 张培森:《三大历史关口的张闻天》,《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54 年起，民主革命时期的报刊资料也陆续影印出版，《新青年》、《向导》、《布尔什维克》、《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群众》等 47 种革命期刊先后影印出版；《红色中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 6 种共产党报纸，也先后影印出版。并重印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材料》。其他文献资料，《中国工会历史文献》5 集、《土地改革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党史资料》20 册、《中共党史参考资料》(24 册，后 13 册名为《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油印)244 册等先后问世。革命回忆录不断在报刊上发表，并出版小册子，如《跟随毛主席长征》、《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回忆叶挺将军》、《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等有 500 多种，《红旗飘飘》16 集、《星火燎原》10 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55 辑等也是回忆资料。此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东方杂志总目》、《国闻周报总目》、《中国现代丛书目录》等，也是有实用价值的二三次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工作成绩，对当时的党史研究起着积极的影响，也对 80 年代、90 年代以来的党史研究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应指出，由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出版难免存在着局限性。而且，负责收集与整理中共党史资料的部门还不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 17 年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种：

(1)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以下简称"《初稿》")。这是他 1949 年秋编写的中共党史教材[①]，经吴玉章修改，陆定一、胡乔木、胡绳等讨论、审定，最终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作书名，1950 年 3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即不断修订再版，至 1953 年 3 月出版了修订第 11 版。各地不断翻印，仅上海至 1954 年就第 18 次印刷，印数达 43 万余册。1955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新一版，1956 年出版新二版，据统计此书前后出了 14 版，发行 230 多万册，并有日文版、朝鲜文版，还用哈萨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②]。1981 年 4 月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增订本。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国革命史教材

---

① 最早想做高中的暂用课本和一般干部读物(详见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人民出版社 1953 年修订第 11 版，第 269 页)。出版后也被各大学用作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课或党史课的教材(详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胡华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7 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胡华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 页。

（也是中共党史教材）。该书以论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为内容，所以论史从五四运动开始，并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该书从五四运动写到抗日战争，分为五四运动、建党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四个时期。把建党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为一个时期，是按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论史。该书的分期体系，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中国革命史、讲中国革命史，只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只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而不涉及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分期体系、内容体系，一方面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一个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政治需要决定的。

该书做了不少资料工作，较重视史料、史实，努力追求实事求是叙史。但受当时政治形势、政治因素的影响，也难免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如突出记述林彪，谈到井冈山会师时说："朱德、林彪、陈毅率领原南昌起义的部队，……四月间和湘南农军八千余人，同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合。"[①]将林彪的名字排在陈毅之前，这显然有失实事求是之意。

（2）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是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写的一篇长篇文章（计5万字），也是一本简明中共党史书。毛泽东、刘少奇、陈伯达参与了修改，刘少奇修改最多，前后三次，计修改480余处。[②]最后毛泽东决定以"胡乔木"名义发表。[③]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各地报刊纷纷转载。6月底，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1月出版修订后的第2版。[④]此后不断重印，至1962年5月，人民出版社已重印28次，印数达212万余册。此外，各地出版社也租型重印，如上海人民出版社至1962年3月就重印38次，印数达156万册。如统计全国各地的发行量，《人民日报》1954年5月的报道是424万余册，[⑤]至60年代就更多了。此书成为中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60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人民出版社1953年修订第11版，第119页。

② 程中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作与发表经过》，《党的文献》2009年第1期。刘少奇对《三十年》修改，可详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484页。

③ 程中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作与发表经过》，《党的文献》2009年第1期。

④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年11月修订版的修改情况可参见佚名《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新版本》，《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8日第3版。

⑤ 《人民日报》1954年5月6日第3版佚名：《我国出版事业几年来有很大发展》。

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中共党史研究著作，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本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①。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非常突出地宣传了毛泽东的功绩和思想理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地位和巨大历史作用，总结、宣传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也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政治上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此书在中共党史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做出了不少成绩。如该书一开头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②这是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理论问题的比较科学的说明。

(3)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这是由《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修订而成。1950年，高教部决定在全国高等院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程，后改名为"中国现代革命史"，③委托何干之编写教材。在何干之主持下，教材完成后定名为《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1954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56年2月出版第2版。第2版较第1版有不少修改，并增加了抗战中《对敌斗争中的民兵斗争》、解放战争中《党的新区政策和新解放城市政策》、《党关于加强党内纪律性和健全党委制的指示》两节。此书1956年7月北京第13次印刷，印数达116万余册，1956年9月天津第15次印刷，印数达130万余册。足见当时影响很大。1956年底至1957年初，何干之根据中共"八大"的精神，根据各地提出的新的意见，再一次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分为上、下两册出版。上册，1957年6月出版，

---

① 《世界知识》1952年第5期发表(英)司徒华撰、钱春暐译《评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原载《共产主义评论》(*Communist Review*)1951年12月号)，谈道："全世界特别是英国普遍地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得这本简史，切合时宜，深受欢迎。""这本书不但是极度信实，而且令人兴奋鼓舞。每一页都是教育。这本书使人以能作一个共产党员而自豪。好好地掌握这本书，一定能大大地提高共产主义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党员的威望。"这是当时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评价的缩影，也可见该书在国外的影响。《人民日报》1952年7月29日第3版发表罗良《世界人民喜欢我国的外文书刊——介绍外文出版社》谈道：《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俄、英、法文译本，在各国的进步读者中受到极大的重视。《人民日报》1952年6月22日第3版《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译本》报道："布拉格的'自由出版局'出版了一万二千四百册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的捷克文译本。"《人民日报》1958年4月3日第5版张奚若《中罗文化合作的成就》谈道《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被译成罗文在罗马尼亚出版。《人民日报》1960年9月20日第8版徐淡庐《加勒比海人民热爱中国人民领袖——在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的感受》谈道：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书籍，在市场上已被抢购一空。

②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11月第2版，第72页。

③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高校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情况，刘辉《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有所涉及，可以参见。

下册 1958 年 2 月出版。两卷本书名为《中国现代革命史》，字数由原来的 29 万字扩展到 33 万字，下限由原来的 1952 年延伸到 1956 年。1964 年应外文出版社的要求，何干之再次对此书做了较大修订，准备译成外文出版。但修订完成后，未及翻译出版，"文革"爆发。幸亏手稿保存完好，"文革"结束后，由刘炼重新整理，1985 年 8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现代革命史》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方面，在当时做出了很大成绩。如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肃反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这次运动中也曾经发生过某些缺点和错误。""肃反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严肃和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坚持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必须重视真凭实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信（讯）的方法。"强调，只有很好吸取这些经验教训，"才能领导复杂尖锐的肃反斗争，掌握肃反的规律，提高自觉性，避免盲目性，克服'左'右错误倾向"。[①]这里提出了要克服"左"右错误倾向，特别是提出了要克服"左"倾错误，这在当时是有理论勇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何干之在革命史研究与教学实践中很注意反"左"，这便是一个体现。

《中国现代革命史》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大大减少。研究的内容有扩展，如经济方面的内容大大增加，对民族问题也展开了论述、研究。

(4)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1956 年，高教部委托李新、彭明等编写中国现代史讲义。在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下，1959 年 8 月讲义修改稿完成，书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1959 年 10 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第二、三、四卷于 1960 年、1961 年、1962 年相继出版（后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文革"期间，此书遭到批判。"文革"结束后，1979 年以后，此书又数次重印[②]。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受当时的政治形势影响很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也难免。当时的政治形势的特点是，一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发展起来，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判发展起来，该书对中间路线、民主

---

①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88—389 页。

②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写始末，详见李新：《编书记——八角亭编书的回忆》，载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1979 年以后重印时，略有修订，详见重印各卷卷首《重印说明》，参见吕涛《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日报》1980 年 7 月 18 日第 5 版）。

党派人物的批判，或多或少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二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开始发展，这是庐山会议以后的一个重要政治动向。如果说何干之《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对领袖的宣传较以前略有“降温”，体现了中共“八大”的一些精神，那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对领袖的宣传较何干之以前“升温”了。如在章节目录中提毛泽东增多，评价更高，引用毛泽东的论断论史的色彩更为浓厚。尽管如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在学术上还是有成就的。如开始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体系向通史发展，即向横向贯通的通史方向发展，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贯通，融为一体。在思想文化研究等方面，做了些开创性的工作。此外，在研究范围方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不只是研究“我”，也研究“敌”、“友”。在当时能顶住种种“左”的压力，用不少篇幅记述中共活动以外的内容，是难能可贵的。而该书对国民党、民主党派的论述评价有某些不妥当之处，其中的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资料工作也有很大成绩。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有大量的运用，国外资料、翻译资料也有引用。这在中国共产党人研究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该书还采用了很多照片、地图，图文并茂，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中也是开创性的。

2.“文革”时期(1966.5—1976.10)

“文革”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在很长时间里基本上被林彪、“四人帮”等控制，他们提出了“一个高度，三个突出”的中共党史编写原则，即站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度，“突出毛主席，突出路线斗争，突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①]还有一种“三突出”是：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缔造了党，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缔造了人民军队，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缔造了人民共和国。[②]不符合这个原则的书不准写、不准出版。不经他们同意编写的书，不经他们审定的书也不能出版、发行。因为控制严，十年中公开出版、发行的党史书极少。稍多一点是内部发行的资料、各高校印行的教学用书，有数十种，如：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资料专辑》(1969年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编辑部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

---

① 吴振坤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1949—19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811页。

②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222页。

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简编》（1969年印）、北京大学中共党史教学组编《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内部讨论稿1970年印，修订稿1972年印）、华东师范大学革委会政工组政宣组编《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1971年印）、广东省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初稿1972年印，修改稿1975年印）、同济大学《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初稿）》（1972年印）、西北大学《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参考资料（教学试用稿）》（1972年印）、上海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初稿）》（1973年印）、安徽劳动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组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973年印）、北京师范大学等《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1973年印）、北京师范大学等《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社会主义革命部分》（1974年印）、杭州大学《中共党史讲义》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稿1973年印，修改稿1974年印）、南开大学中共党史讲义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讨论稿）》（1974年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史讲稿》（初稿1975年印，初稿修订稿1976年印）、西安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1976年印）。

以上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第一，搞个人崇拜；第二，以路线斗争史代替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后，进而以十次路线斗争史概括全部党史；第三，走极端大批判式的叙述方式；第四，“七真三假”方法论盛行。公开鼓吹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①

比如1970年印的北京大学中共党史教学组编《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内部讨论稿）共八章，最后一章第八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966—1969年）”，下限写到中共“九大”召开。当时林彪还没有外逃，所以书的开头除了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还列了两条“林副主席指示”。书中还这样记述：

>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林彪、周恩来等同志击破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阻挠和破坏，率领在我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北伐军部队，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① 江青集团及其写作班子曾经提出：“写历史嘛，就是七真三假。”可以进行“文学加工。造出来就变成真的了”。详见蒋大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方法研究基本历程》，《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6期。

第一枪。[1]

一九二八年四月，林彪等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军队，经过在湘南发动农民起义，扩大兵力后，也奔上井冈山，直接参加毛主席领导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事件。从此，林彪同志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一直紧跟毛主席，最忠实地执行和最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2]

这里，林彪成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井冈山会师成了毛泽东与林彪会师，完全篡改了历史。[3]此外吹捧林彪、篡改历史的地方还有不少。

1972年印的北京大学中共党史教学组编《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修订稿)，虽然在1971年林彪外逃以后修订，但书中除了把吹捧林彪的内容删除外(历史在被改来改去)，并没有写“第十次路线斗争”，反而把1970年本的第八章删除，只剩七章，第七章“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为深入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新的进攻而斗争(1956—1966)”，只写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显然，林彪外逃事件发生使怎么写“文革”史变得复杂了些，只得暂时不写。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史讲稿》，初稿由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历史系、中共党史系、政治理论共同课的教师联合编写，修订则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进行。初稿为十一讲，初稿修订稿为十二讲，增加了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毛主席的建党思想”，作为第一讲。初稿1975年夏印，初稿修订稿1976年2月完成，1976年印。

3. “文革”后过渡时期(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文革”结束后的最初两年，由于“两个凡是”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文革”时期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如“文革”时期编印的《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中

---

① 北京大学中共党史教学组:《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内部讨论稿)，北京大学1970年印，第51页。

② 北京大学中共党史教学组:《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内部讨论稿)，北京大学1970年印，第53—54页。

③ 为什么要篡改历史、吹捧林彪，后来冯文彬指出:“林彪、‘四人帮’一伙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对党的历史进行篡改，妄图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那时候有的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里，不是有很多这种例子吗? 如把林彪写成‘一贯高举紧跟’的最好接班人，把‘朱毛会师’改成‘毛林会师’，把‘朱德的扁担’改成‘林彪的扁担’等等”。冯文彬并引陈云的话:“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总是要篡改党的历史，这是一条规律。”(冯文彬:《认真做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为实现党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在江苏省第三次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7月2日)》，《湖南党史通讯》1984年第9期)

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等，1977年、1978年初稍稍修改后仍在翻印、使用。中共党史研究虽然有所拨乱反正，但一些问题，如个人崇拜、路线斗争史代替党史等仍未根本改变，中共党史研究尚未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两年可以归在"文革"时期。

另一方面，这两年中，拨乱反正的力量日益积聚爆发质变的能量。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吹响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号角，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否定了"文革"，中共党史研究开始走上真正、全面拨乱反正的健康之路。

(二) 1978年12月至2000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拨乱反正。随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治路线的确立，随着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盛世治史，中共党史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空前繁荣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大发展的基础性特征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投入不断增加。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党史研究的机构、领导体制相继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共中央设立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区各县市也设立党史研究室（近年来有些地县级党史研究室与地方志办公室合并）。当代中国研究所设立，既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机构，实际上也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机构。科研经费等逐年增加。每年国家社科基金、各省市社科基金都有一批中共党史的研究项目立项，还有一批与中共党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科学发展观研究等项目立项。一些重大招标项目的经费，每项已达数十万元。

第二，学术团体日益发展，学术会议频频举行。不仅建立了全国和各省市的中共党史学会（还下辖各专业委员会），毛泽东思想研究会、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山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会、（各）革命根据地研究会、抗日战争研究会、八路军研究会、新四军研究会、李大钊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瞿秋白研究会、周恩来研究会、刘少奇研究会、叶剑英研究会等也先后建立。此外，中国

现代史学会、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等也把中共党史研究作为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各级各类学术会议频频举行。除了各学术团体的年会以外，在一些纪念日前后，如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各次代表大会纪念日、南昌起义纪念日、秋收起义纪念日、广州起义纪念日、遵义会议纪念日、长征纪念日、抗日战争爆发及胜利纪念日、人民解放战争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抗美援朝纪念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日，李大钊诞辰及逝世纪念日、瞿秋白诞辰及逝世纪念日、毛泽东诞辰及逝世纪念日、周恩来诞辰及逝世纪念日、刘少奇诞辰纪念日、邓小平诞辰纪念日、陈云诞辰纪念日、张闻天诞辰纪念日、叶剑英诞辰纪念日等从中央到地方都会举行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术研讨活动。有时一个月的中共党史研究学术会议全国总计在百次以上。此外，各省市也在各自的地方革命纪念日、各自的地方革命人物纪念日举行学术研讨活动。

第三，中共党史研究的专业报刊杂志竞相创办。其中《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等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主题刊物有数种，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等。此外还有《瞿秋白研究》、《叶剑英研究》、《徐特立研究》等刊物。各省市都有一家甚至数家中共党史研究的报刊。如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就办了《上海党史与党建》、《党史信息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办了《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陵园）办了《烈士与纪念馆研究》。上海市委党校办了《党政论坛》、《理论文萃》、学报等三四份刊物。与中共党史研究密切相关的统一战线研究类的刊物，中央有数家，各省市至少都有一家。与中共党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档案类刊物中央与地方也有很多家。[①]其他报刊，如中央和地方的大报，如社科综合类的刊物，如历史研究的刊物，也发表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性的刊物都发表中共党史研究的论文。

第四，中共党史研究人才辈出。除了老一辈中共党史工作者外，年轻的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中共党史工作者年年增长。[②]更有一部分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跳

① 改革开放以来党史期刊的发展，陈晋《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党史期刊发展的一些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可以参考。

② 关于中共党史学位点及与中共党史学科相近的学位点情况，可参见王顺生《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槽”研究中共党史，这不仅使中共党史研究的人才队伍日益壮大，也使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开始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

第五，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发展。中外学者互访、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著作互译。很多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国内，给中国学者极大启示、鞭策。如中央文献研究室 1987—1993 年编译出版了《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10 种，其中有施拉开姆《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威尔逊《毛泽东》、《历史巨人毛泽东》，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赖斯《毛泽东的路》，韦克曼《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历史与意志》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其中有费正清等《中国：传统与变革》、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罗芙芸与艾华《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 年以来的性别话语》、顾琳《中国的经济革命：20 世纪的乡村工业》、帕金斯等《走向 21 世纪：中国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前景》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阅读中国》系列，其中有赛尔登《革命的中国：延安道路》、弗里德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回看 20 世纪中国译丛》，其中有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系列》，其中有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等。单行出版的有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还有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和毕剑横等《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叶卫平《西方“毛泽东学”研究》、梁怡等《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等陆续出版，《费正清文集》、《竹内实文集》等相继出版。国外的很多档案资料，特别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资料已译成中文出版。美国也有价值很高的档案资料整理发

表、出版，如《美国外交文件集》、《基辛格密档》、《洛德档案》等。[①]很多中国学者开始进入世界各国的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杨天石《海外访史录》即可见一斑。更令人可喜的是，中外学者的合作研究日益发展。如汪熙与威克曼合作完成了《中国寻找现代化、历史的远景展望》、牛军与韩特合编了《关于中国共产党1920—1960年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等。[②]

第六，内地与台湾、香港的学术交流日益发展。学者互访、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著作互介前所未有地发展起来。中国台湾地区出版的著作、资料集，已在内地的很多图书馆可以看到，如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蔡国裕《中共党史》、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等等。大陆的不少学者查阅了台湾的档案资料，如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资料，“国史馆”的蒋介石档案、陈诚档案等。大陆的一些著作、论文开始引用台湾的资料。杨天石出版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Ⅱ》等，其中得益于台湾的档案资料不少。郭铁鎗主编《台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评析》出版，也是两岸三地学术交流的一个成果。

第七，中共党史资料建设突飞猛进。1980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后，中央各部委、中央军委也相继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8年以后，各级党史资料征集机构逐渐与各级党史研究室合并），大大推动了中共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一大批被埋没、尘封的资料，被重新挖掘、发现、整理。[③]中共中央文件、中共各方面领导人著作，越来越多地被整理出版。各方面、各层次人物的回忆录、日记、书信等越来越多地被整理出版。建党以来历次重要事件资料、各地区（根据地）资料、各部队和各团体资料，也越来越多地被整理出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组织史资料、各省市组织史资料，以至各地县组织史资料陆续整理出版。民国政府、国民党、民主党派的资料，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资料，也大量整理出版。有一部分档案资料已开放，如外交部开放了一部分档案，有些省市开放了一部分档案。有些资料还在互联网上公开，如上海档案馆已推出了“上海档案信息网”，一些政府机关也推出自己的信息网。

---

① 详见梁怡等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② 详见梁怡等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③ 据1987年底的统计，全国有2 000多个中共党史资料征集部门，专职人员约2万人以上，兼职人员10余万人。仅山西一省，专职人员上千人，兼职人员上万人，投资百余万元，查阅干部档案141 030件，查阅文献资料2 036 846件，访问老干部89 159人，形成访问记录53 602件。

还有一些专题性的中共党史网站，毛泽东网站、周恩来网站、邓小平网站等。不少资料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在网上下载。有关中共党史资料的数据库光盘也越来越多出版。关于中共党史资料工作的新进展，还可以参见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张启华《努力开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新局面——在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7 年 1 月 9 日）》（《中共党史资料》2007 年第 1 期）、韩钢《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7 期）、许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党史资料的管理、收集与整理概述》（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党史学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等。

以上这些现象、这些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并成为中国中共党史研究空前繁荣的基础和强大推动力。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出现的令人欣喜的崭新气象，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究方法、编纂方法有长足发展

首先是实事求是、历史分析、客观评价成为潮流。个人崇拜式、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大批判式、贴标签式的研究，以论代史的研究，教条主义的研究，领袖史、路线斗争史、歌功颂德史的模式，因人写史、因人废事、因人废言、随“风”转的习气，“七真三假”的方法，均被否定和抛弃。如研究中共创建史，给陈独秀、李大钊及其他众多的人以充分的肯定。研究南京国民政府不再一笔骂倒，也肯定它在十年经济建设、外交方面的某些成绩。研究解放战争不再只讲解放军的辉煌，也讲不足、失误；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不再只讲共产党的功劳，也讲民主党派的功劳；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史不再只讲辉煌，也讲失误。长期以来的“禁区”越来越多地被突破，如“AB团”事件、“富田事件”、西路军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所遇到各类自然灾害以及人为过失所造成的损失都开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其次，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被逐步引入党史领域。**如王跃《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的变迁》、程贵铭等主编《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研究》、孙风武《当代领导干部社会心理分析》、马栋《现代军人社会心理研究》、张俊芳等《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心态变迁规律研究》等，乐国安等主编《毛泽东社会心理思想研究》、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等论著，采用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房列曙《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李立

志《变迁与重建:1949—1956 年的中国社会》、师吉金《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等著作,采用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沈士光《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研究(1977—1982)》、曾峻等《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民主:历史与经验》等著作,采用了**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赵凌云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顾龙生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刘勉玉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发展史》、何玉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迎秋《总需求变动规律与宏观政策选择:中国(1952—1990)经验的理论分析》等著作,采用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村田忠禧《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以政治报告为素材》、《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等论文,采用了**计量史学方法**。董世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三民主义比较研究》、朱小玲《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廉政思想比较研究》、肖光荣《执政之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执政思想比较研究》,赵康太等主编《中国与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梁琴等《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彭澎主编《中外执政能力比较研究》、郭亚丁《政党差异性研究: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比较》、刘咸岳和(越)黎友层主编《中越经济改革比较研究》、赵传君等《中俄经济体制改革比较》等,采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其三,编纂方法有长足发展。**不再是章节体、编年体的几张老面孔,出现了很多新面孔:**长编体**:李新等主编 12 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财政部税务总局组织编写多卷本《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长编》等。**典志体**:郑惠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志》、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等。**纪事本末体**:任建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朱宗玉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纪事本末》、周华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等。**口述史**:陈丽君《南京部分老红军口述长征史》、张军锋主编《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等,孙丽萍主编《口述大寨史:150 位大寨人说大寨》、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主编《我的一九七六》、周言久主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邱传贵主编《新农村建设之路:山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头人口述历史》、吕国光主编《农民工口述史》等。**史话体**:刘凤舞《中国共产党史话》、曾宪文等《井冈山斗争史话》、解放军出版社《军旅史话丛书》、胡悌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话》等。**纪实文学**体著作更是异军突起,蔚为大观:刘秉荣《中央红军长征纪实》、肖思科《延安红色大本营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人民出版社《中国革命战争纪实》、张树德《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决策纪实》、张树军主

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纪实》、解放军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剿匪纪实丛书》、李庆山《志愿军援朝纪实(1950—1958)》、刘斌主编《20世纪末平反冤假错案案例纪实》等等。叶永烈撰写的纪实文学有关中共党史及党史人物书有十余种，如《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的秘书们》、《毛泽东与蒋介石》、《邓小平改变中国》、《反右派始末》、《"四人帮"兴亡》、《江青传》、《王洪文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陈伯达传》等。**演义体**：广东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演义丛书》，其中包括《铁血红军》、《八路军演义》、《新四军演义》、《解放军演义》、《中美决战在朝鲜》等。**画史、画传**：中国革命博物馆《光辉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历史图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图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图志》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众多人物画传一大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种新的中共党史研究体裁，大受欢迎，影响巨大——**影视(型)史、影视(型)传**，如《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如长征历史专题片，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历史专题片。研究方法、编纂方法的改进、发展，使中共党史研究向科学的方向发展，使中共党史著作可信、可读，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和普及，从而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同时也大大拓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范围。

第二，理论研究、学科组成体系建设大大发展

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著作，1990年后陆续推出，实现零的突破。如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唐曼珍《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王炳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王先俊等《邓小平与中共历史学》、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等。**中共党史学概论学科**开始建立，代表著作有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卢耸岗主编《党史研究概论》等。**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开始建立，主要著作有：张静如和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史学史》，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共党史史学史》，田子渝等《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王学勤《中共党史若干著作研究》，张注洪等《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梁怡等《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郭铁鎗主编《台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评析》，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杜玉芳《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王文滋《胡绳晚年学术思想研究》，周一平《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毛泽东生平研究史》，侯且岸《毛泽东研究史论》，周一平《邓小平生平研究史》，马兆明《邓小平理论研究

史论》,杨先材主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等。**中共党史史料学学科**开始建立,主要著作有张注洪《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张宪文《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何东《中国现代史史料学》、陈明显《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等。**中共党史文献学学科**正在建设,著作有周一平《中共党史文献学》。**中共党史学批评(评论)学科**正在建设,王仲清《中共党史学概论》中有"党史学批评(评论)"专章。论文有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批评刍议》,郭若平《应该注重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批评》、《意义再生产:中共历史研究的批评话语》等。**中共党史目录学学科**正在建设,论文有周一平《中共党史目录学几个理论问题初探》等,上海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党史论著目录索引》之类的目录书也出版了多种。还有张惠芝等主编《毛泽东生平著作研究目录大全》、河南省委党史办《刘少奇研究论著目录》、周龙祥主编《邓小平研究著作总览》、周一平主编《江泽民重要思想研究论著目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等等。**中共党史校勘学学科**正在建设,论文有周一平《关于中共党史校勘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初探》等,相关书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等。中共党史版本学学科正在建设,论文有周一平《中共党史版本学基本理论问题初探》等,相关书有:张国柱等《早期长征著述版本图录》、施金炎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刘跃进《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蒋建农等《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张国柱等《早期毛泽东传记版本图录》、柏钦水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鉴赏》、徐有力等主编《周恩来百年书目图典》等。

此外,周一平《建立中共党史心理学》、王静《党史研究应借鉴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周一平《建立党史计量学》、赵淑梅《论计量史学与中共党史研究》、丁卫平《系统科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阎尚杰《把系统理论引入到党史研究工作中来》、汤立双《关于系统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断想》、李怀义《中共党史研究的系统论视角》、周宝龙《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与中共党史研究》、陈伟刚《口述史学的特征与中共党史的研究》、黎淑莹《在革命纪念性博物馆运用口述史之探析》、王宇英《口述史方法对"文革"史研究的意义》、付永革《区县档案馆口述史资料征集"四要""四不要"》、周文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注意运用比较法》、周一平《将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在党史研究中》等论文的发表,也体现了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新气象。

第三，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范围大大扩展

一方面是现实社会的需求日益扩展，学术研究关注点也日益扩展；另一方面是新方法、新理论的运用，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范围日益扩展。从只研究政治、运动、军事、会议，只研究个别领袖，扩展到研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党派关系、社会问题、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各种专题史研究的著作纷纷问世，学术研究空白不断被填补（以下著作略有几种21世纪初年的，以见研究发展趋势）如：

组织建设史：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陈至立等《中国共产党建设史》、方开淇等《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建设》、王金玲《中国共产党党章发展史》、黄大熹《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发展路径的历史考察》、阎颖《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刘继增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史稿》、曹润芳等《中国共产党机关发展史》、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费云东等《中共秘书工作简史》、罗孟涵主编《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概述》、王一帆等《中国共产党历次整党整风》、刘晶芳等《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建设史》、魏明铎主编《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史》、吴传煌等《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王光华《中国共产党法规和制度建设研究》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何一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研究》、林志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及其规律研究》、郑谦主编《延伸与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1949—1978）》、张静等《现代化新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等。

思想史：张静如等《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刘华清等《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段瑞华等《苏区思想发展历程》、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范小方主编《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李曙新等《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史》等。

经济史：以上谈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采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已介绍了一些著作，不再重复。此外有：孔永松《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赵效民等《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舒龙等《中央苏区贸易史》、车德文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研究》、陈挥等《中国共产党与工业现代化》、毛黎娟等《中国共产党与农业现代化》、张旭东《1949—1978中国共产党四种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及认识研究》、熊辉主编《中国共产党统筹兼顾思想的传承与

创新》,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类的书很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

政治史:以上谈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采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已介绍了一些著作,不再重复。此外有:黄志仁《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史》、王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研究》、李忠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史》、蒋伯英等《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宋金涛等《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张军《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申春生《山东解放区的政权建设》、梁星亮等《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张光宇主编《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演进》等。还有刘华清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史》、梅丽红《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探索之路》等。还有杨淑娟主编《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史稿》、朱新镛等《社会主义中国多党合作史纲》、李春《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张尔驹等《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类的书很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

法制史:丛文胜《中国共产党的法制理论与实践》、杨永华主编《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等。张希坡等主编《中国革命法制史》、张希坡主编《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杨木生《中央苏区法制建设》、张希坡《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立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类的书很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

统一战线史:胡之信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宋春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史》、刘宗武《鄂豫边区统一战线工作史》、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铁木尔·哈达等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简史:社会主义时期》、王国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战线 50 年》,冯正钦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稿》等。还有林家有等《国共合作史》、王功安等《国共两党关系史》、马维政等《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史》、唐纯良等《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关系史》、曲峡等《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史》、陈金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宗教问题:关于党的宗教政策的历史考察》等。

民族工作史:何龙群《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郑广智主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史类的书很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向青等《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张喜德《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三次转变与共产国

际》等。

对外关系史、外交史：杨云若等《中国革命与对外关系》、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张树军《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外交实录（1949—1998）》、许月梅《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各类著作很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

社会史：以上谈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已介绍了一些著作，不再重复，此外还有大批著作（并产生一些分支如城市史、农村史、生态环境史、人口史、卫生医疗史等）：田克勤等《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师晓霞《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高冬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56）》、康沛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各类著作很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

城市史：李玉荣《中共接管城市的理论与实践》、杨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城市行政体制研究：以重庆为例（1949—1957）》、王伟等《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变迁》等。

农村史：钟日兴《红旗下的乡村：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动员》、万振凡等《苏区革命与农村社会变迁》、王瑞芳《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史各类著作很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

文化史：朱志敏《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文化》、齐卫平《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刘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孙建娥《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历史经验研究》、肖云岭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史》、刘云《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卢少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研究》、李方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等。

哲学史：李曙新《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史》、刘惠恕《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思想史研究》、庞元正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60年》、刘怀玉等主编《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

史学史：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洪认清《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张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五十年》、王学典《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邹兆辰等《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张

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理论嬗变》等。

文学史、文艺史：内蒙古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中国共产党人与新文学(1921—1927)》、饶良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化运动》、刘国清《中央苏区文学史》、王剑青等《晋察冀文艺史》、亦文等《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运动史稿》、郭仁怀等《淮南抗日根据地文艺史》、刘增杰等《中国解放区文学史》、王建中等《东北解放区文学史》、苏春生《中国解放区文学思潮流派》、王子韩《中共福建省文艺工作发展史》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文艺史各类著作很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

新闻、出版、广播史：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严帆《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等《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钱承军《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晋察冀日报史》、廖永祥《新华日报史新编》、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赵玉明主编《中国解放区广播史》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史各类著作很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

教育史：赖志奎等《苏区教育史》、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谢济堂《闽西苏区教育》、赵紫生主编《冀鲁豫老区教育史》、王世杰主编《安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该书编写组《山东解放区教育史》、该书编委会《湖北老解放区教育史稿》、苏甫主编《东北解放区教育史》、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金晓钟等《党员教育史》、王仲清等《党校教育历史概述》、李小三主编《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简史》、许启贤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各类著作很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

体育史：苏肖晴《新民主主义体育史》、曾飙《中央苏区体育史》、该书编审委《陕甘宁边区体育史》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各类著作很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

科技史：唐莲英《中国共产党与科技现代化》、栾雪飞《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历史经验研究》、曾敏主编《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研究》、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史各类著作很多，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

邮票史：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解放区邮票史》、孙少颖主编《中国邮票史》第五卷(1930—1945：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之一)、《中国邮票史》第六卷

（1945.9—1950.6：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之二）、《中国邮票史》第七卷（1949.10—1966.5：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一）、《中国邮票史》第八卷（1966.5—1978.12：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二）、《中国邮票史》第九卷（1979—1991：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三）等。

以上列举的研究领域出版的著作，有很多是新开拓的、填补空白的。

此外，其他各种专题史、阶段史著作也是大量的、新颖的，如高尚斌等《中国共产党延安时代研究》、林之达等《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刘继增等《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罗平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盖军《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游国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沈骏《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与祖国和平统一》、张高陵《中共领导人与中国现代化》等等。

地方中共党史、行业党史、单位党史研究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各省市、自治区、各区县、各系统、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的中共组织史资料、党史大事记的编纂陆续完成，有的还完成了通史、通志的编纂，这使党史研究的领域、层面进一步拓展、深入，使党史研究向社会史化方向发展。

人物研究，从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领袖扩展到众多领袖，扩展到高、中、低各层次的杰出人物、英雄人物，并从政治人物扩展到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各界人物；从正面人物扩展到反面人物；从党内人物扩展到党外人物、民主党派人物、国民党人物、国际人物等。不仅有大量的人物传记专著出版，还有百卷本《中共党史人物传》、多卷本《解放军将领传》和《解放军英雄传》等等出版。人物研究成果众多[①]。

第四，学术价值高、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如李新等主编的12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后修订为《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沙健孙主编的5卷本《中国共产党通史》（后修订为《中国共产党史稿》）、张静如主编的3卷6册本《中国共产党通史》、郭德宏主编的3卷本《中国共产党历程》、郑惠和张静如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13卷）、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12卷）、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2册）、军事科学院5卷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和3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刘明逵等主编的6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

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情况，李捷《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等，可以参见。

年谱》、《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朱德年谱》、《邓小平年谱》、《陈云年谱》等。这些著作大都是权威部门、著名专家编纂，运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实事求是地述史、论史，观点新颖，资料翔实，连一些国外的专家都惊叹不已，自觉望尘莫及。[①]这表明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已有一部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第五，为现实服务成绩显著

一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二是在新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已向广度、深度发展。不仅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更注重总结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仅总结思想理论发展的经验教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也总结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社会建设的经验教训、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作风建设的经验教训等，还总结解决“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科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一国两制的经验教训等，为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同时，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史和执政党建设史的经验教训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有了极大、极快的发展，成绩是可喜的，[②]不足之处也仍然存在，其中的经验教训也需要认真总结。

这一时期的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种：

1. 胡绳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88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编写一部篇幅不大的党史简本的任务。1990年3月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杨尚昆、胡乔木等提出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的希望。这个任务自然就交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90年5月，在胡绳主持下开始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简本，1990年底初稿完成。1991年1月，在胡绳主持下再请各方面专家进行修改定稿。修改稿完成后，即交胡乔木审阅。胡乔木着重看了第六、七、八、九章及结束语，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并亲自作了多处修改，

① 参见陈志让《〈周恩来传〉读后》，《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还可以参见吴志军《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

还为此书写了《题记》。1991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此书的出版。此书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 年 8 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力求客观述史，从政治因素出发的述史、论史减少。运用了新的资料，如一些尚未公开的档案资料。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道路和经验教训进行了较全面较深入的总结，而且“陈言大去，新意迭见”，提出了很多新论断。如社会主义时期的失误问题，该书指出：“大跃进”、“文革”是两次大的失误，此外还有几次失误，或者出现一些偏差。失误的次数有数次，那么失误在什么问题上：“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在前后约达 20 年（1957—1976）之久的长时间中，我们党在这两个大问题上都一再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的失误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歧途和曲折。”①这个分析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没有的。该书夹叙夹议，史论结合，以论见长。“议”“论”大多恰到好处，个别地方的“论”“议”可能受到写作时的形势的影响，仍有值得进一步研究之处。

2.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李新在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受教育部委托，领衔主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文革”结束以后，受胡乔木的委托，1978 年 8 月又开始领衔主编多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至 1997 年 9 月，12 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齐。后又修订为《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2001 年出版。从开始编纂至全书修订出版，历时 20 余年。

该书卷帙多，工程浩大，全书由李新、陈铁健领衔主编，各卷又有分卷主编，李新、陈铁健亦是第一、第五卷的分卷主编。国内一批著名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各卷的编纂工作。参加编纂的人员众多，各卷的资料多寡、观点新旧、文笔高低略有差异，势所难免。但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篇幅最大、资料翔实、学术价值极高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著作，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此书的编纂宗旨是写信史、写真史。“宁可写废话，也不写一句假话”。②《序言》中说的“凡是材料不足、问题还不清楚的，宁可暂时不写”，③也是这个意思。为了做到“写信史、写真史”，该书从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0 页。

② 这是 1997 年 8 月周一平访问李新时，李新所说。

③ 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序言第 1 页。

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一是材料不足、问题没搞清楚的不写，宁可少写些事、少写些问题。二是所写的事所写的问题，都尽可能写得详尽充实，将原始材料充分摆出来，重要的原始材料全文照录。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及其结局和影响等，都通过材料的叙述把它们展示出来。①即保持原始材料的原始性、完整性，不作人为的加工、取舍，从而保持所述史事的真实性。三是少论。即以述史为主，以摆史料为主，寓论于述史之中，一般不作专门篇幅的论断。但不是完全不作论断，而是论断很少，占全书的比例很小。②所作论断一般都必须合乎历史实际，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的论断才能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才是写真史必要的，否则不必作论断，而由读者自行判断、自行论断。

该书不仅资料扎实、丰富，披露了很多新史实，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如关于西路军的记述等等)，而且进一步搭起"通史"框架。从纵向来看，从1919年写到1949年10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各项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叙述。从横向来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比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涉及的面和内容更多。称"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是名副其实的。

3. 沙健孙等《中国共产党通史》。此书由沙健孙主编，约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0个单位的专家学者共26人分工合作撰写。此项工作于1994年启动，第一卷1996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5卷出齐。后《中国共产党通史》略作修订改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2006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5卷一次出版。《中国共产党通史》只记叙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即1919年到1949年，但没有写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历史，是很遗憾的。严格说来，还不是完整的、真正的通史，或者只能是半部通史。

该书思想性强，在突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突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方面着墨较多。对一些错误认识进行了批判，如，学术界曾有"救亡压倒启蒙"论，"告别革命"论，等等。该书指出："救亡"的口号，不是五四运动时提出来的，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来的，是辛亥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们(如严复)提出来的，是他们在19世纪末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重创的危急关头提

① 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2页。
② 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2页。

出来的。[①]“在当时的中国，从根本上说，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唤起启蒙”。[②]革命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情况下的客观社会现象，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的主观选择。革命的兴起，不是哪一个人想不想干的问题，而是形势所逼，不能不干。[③]革命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当然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现实社会的产物”[④]。

4. 郑惠、张静如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此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初版，3册13卷，署“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4册4卷13编，署“张静如、梁志祥、镡德山主编”。

《中国共产党通志》1997年初版为13卷：第一卷政治志，第二卷组织志，第三卷纪律志，第四卷宣传志，第五卷统战志，第六卷军事志，第七卷根据地志，第八卷工人运动志，第九卷青年运动志，第十卷妇女工作志，第十一卷经济工作志，第十二卷对外关系志，第十三卷人物志。记事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01年修订版“13卷”为“13编”，仍为13志，只是原“对外关系志”列第十二，修订版改为“外联志”列第六，其他志的顺序略有调整。记事至2000年12月前后。修订版主要是续写、增补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也有个别的删削，如初版《人物志》为“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思想文化人物”、“革命英烈”、“英雄模范”、“叛党乱党分子”六部分，“叛党乱党分子”部分，收王明、王洪文、叶群、向忠发、江青、张国焘、陈公博、陈伯达、林彪、周佛海、饶漱石、顾顺章、高岗、康生、谢富治等19人。修订版将第六部分“叛党乱党分子”全部删除。这一删除可能并不是十分妥当的。

该书是第一部用中国传统典志体编撰的中共党史著作。分十三个专题分别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十二个方面的工作发展历史及各种人物历史。克服了一般章节体的中共党史通史著作无法面面俱到地连贯地记述中国共产党各方面工作历史、各种人物历史的弱点。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方位记述，使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别开生面。

---

① 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 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③ 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④ 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中国共产党通志》还可以增设一些志。比如可以增设文化志、教育志、卫生志、社会志等。此外，有工人运动志、青年工作志、妇女工作志，而没有农民（农村、农业）工作志，也不妥。还可设立“著作志”（或依传统志书之旧设立“艺文志”），以记述中国共产党人的各方面、各种类的著作，存一代著述之史。此外，《人物志》还可以增设“国际友人”、“经济人物”、“科技人物”等。每个人物都配上一张照片更好。这样记述中国共产党历史将更加全面。另外，体例统一，遵守学术规范，也是应该注意的。

第八章　外国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世界史研究经过50年的发展，既取得了很大成就，也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虽然已经有学者从世界史学科角度回顾和总结过，[①]但是以中国史学发展或者中国史学史学科视野进行考察，无疑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一、世界通史研究一波三折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的世界史研究可谓一波三折。前17年经过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受苏联影响，中国学者积极开展世界史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单就通史性著作而言，出版了如齐思和、朱寰、杨生茂等人分卷撰写的《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但与中国史研究相比，与"五朵金花"相比，世界史研究还是薄弱的。[②]"文革"期间，世界史研究一度中断，工农兵上大学后，历史系要开世界史课，世界史教材进行了编写，大多为高校自印，也有公开出版的，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简明世界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内蒙古师范学院编写的《读一点世界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等等。"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世界史学界迎来了新的春天，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努力，批判继承苏联史学，借鉴欧美史学成就，使得世界史研究空前繁荣起来。单篇论文难以数计，就通史性著作而言，一方面世界史知识普及工作继续开展，出版一系列

---

① 例如，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于沛主编：《世界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于沛等主编：《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新城主编：《中国学术百年·历史学百年》中的相关部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文汇报》1957年5月13日第1版报道《世界史研究工作遭到忽视：北京天津世界史学者提出批评》，可以参见。

著作；[1]另一方面出于培养专业人才考虑，许多带有研究性的高等院校教材得以面世，[2]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世界史》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一) 世界上古史研究历程艰难

"文革"前 17 年是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世界古代史学科建立了专业队伍，[3]并开展初步研究。从发表的论文来看主要研究了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在古希腊史方面，主要探讨了希腊人的起源问题、[4]奴隶制城邦政治问题、[5]

---

① 例如，郑国：《世界历史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刘文鹏等：《外国历史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 年版；丁建弘等：《世界史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胡佑安等：《世界历史简明读本》，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胡刚等：《世界简史》，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续建宜：《图解世界通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冯克诚等：《世界通史故事全编》，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其余恕不详述。

② 例如，李纯武：《简明世界通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刘明翰等：《世界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熊家利等：《世界通史纲要》，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5 年版；彭树智：《世界历史教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杨孝臣等：《新编世界史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傅孙铭：《世界通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崔连仲：《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马世力：《世界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齐涛等：《世界通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1953 年东北师范大学开办世界上古史研究生班，其中有相当一批学员例如毛昭晰、刘家和、周逸天、崔连仲、刘文鹏、李长林等后来成为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带头人。同时，复旦大学周谷城、武汉大学吴于廑、南开大学雷海宗、内蒙古大学胡钟达等教授，也在该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其他院校也陆续培养出一些世界古代史人才，其中有些人如王敦书、张树栋、廖学盛、施治生、张广智、王阁森成为世界上古史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④ 华明：《希腊人究竟从何时移入古代希腊地区？其移入情况如何？最早的城市国家斯巴达和雅典各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历史教学》1956 年第 5 期。

⑤ 田农：《雅典自从梭伦改革政治以来，直至贝理克里斯，每届选举的执政官是多少？各执政官的位置和权力是否一样？》，《历史教学》1955 年第 4 期；日知：《古典作家所记的黑劳士制度》，《历史研究》1956 年第 12 期，又见《东北师大科学集刊》1957 年第 3 期；史亚民：《希腊城市国家形成的过程》，《东北师大函授教学(历史版)》1956 年第 8 期；吴于廑：《希腊城邦的形成和特点》，《历史教学》1957 年第 6 期；胡钟达：《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历史教学》1957 年第 6 期；丁名：《斯巴达的亚基斯和克里昂米尼改革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历史教学》1957 年第 11 期；陆满堂：《试论雅典民主政治(函授生学习指导)》，《历史教学问题》1959 年第 3 期；潘群等：《代表工商业奴隶主集团的梭伦立法》，《山东大学学报》1959 年第 2 期；戴裔煊：《古代希腊城市国家奴隶制的类型及其产生的由来》，《历史教学》1963 年第 9 期；黄淮：《古希腊的奴隶状况如何》，《历史教学》1965 年第 9 期。

亚历山大远征问题、[1]哲学、[2]文学,[3]以及其他文化问题。[4]古罗马史方面,主要探讨了罗马整体社会情况、[5]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6]改

---

① 何耕:《亚历山大的远征结果如何? 对亚洲西部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历史教学》1955 年第 4 期;吴于廑:《略论亚历山大》,《历史教学》1956 年第 10 期;彭世奖等:《试论亚历山大远征胜利的原因》,《中学历史教学》1957 年第 9 期。

② 庞听记:《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一些问题》,《哲学研究》1962 年第 5 期;周辅成:《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文汇报》1962 年 9 月 9 日;李佩玖:《关于赫拉克利特哲学的阶级性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64 年第 1 期;汤敬昭:《德谟克利特的善恶辩证法》,《江海学刊》1962 年第 1 期;苏舒:《苏格拉底》,《学习》1956 年第 12 期;齐良骥:《苏格拉底》,《光明日报》1957 年 6 月 8 日;任华等:《关于苏格拉底的评价问题(二篇)》,《学习》1957 年第 5 期;方炜:《柏拉图的〈理想国〉》,《读书》1959 年第 14 期;丕之、汝信、秀山:《论柏拉图的〈理想国〉》,《新建设》1959 年第 8 期;滕大春:《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教育理论初探》,《河北大学学报》1963 年第 4 期;槐佚玲:《柏拉图的美论》,《江海学刊》1961 年第 12 期;郭斌和:《关于柏拉图美学思想的一些问题》,《文汇报》1962 年 9 月 18 日;徐怀启:《亚里士多德"论证的原理"》,《学术月刊》1962 年第 4 期;刘放桐:《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光明日报》1960 年 1 月 31 日;方炜:《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读书》1959 年第 15 期;马特:《论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和排中律的相对局限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 年第 3 期;朱天顺:《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术论坛》1957 年第 3 期;朱光潜:《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1 年第 2 期。

③ 郑朝正:《希腊文学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1954 年第 1 期;刘思虹:《希腊戏剧》,《西北大学学报》1957 年第 2 期;常任侠:《关于"希腊时代艺术为什么比资本主义时代进步"》,《新建设》1951 年第 4 卷第 5 期;王英白:《论希腊时代艺术与资本主义时代艺术》,《新建设》1951 年第 5 期;日知:《古代希腊历法简介》,《古代世界史通讯》1957 年第 1 期;李天祐:《古代希腊的竞技会与现代国际奥运会》,《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 年第 3 期;田农:《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是地名呢? 还是人名?》,《历史教学》1955 年第 1 期;刘思虹:《希腊史诗——〈伊里亚特〉与〈奥狄赛〉》,《人文杂志》1957 年第 3 期;日知:《荷马史诗若干问题》,《历史教学》1962 年第 9 期;王永江:《试论〈伊索寓言〉中奴隶的哲学思想》,《光明日报》1975 年 7 月 17 日;罗念生:《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新建设》1954 年第 9 期;罗念生:《索福克斯和他的悲剧"安提戈涅"》,《文汇报》1961 年 10 月 28 日;罗念生:《埃斯库罗斯和他的悲剧"普罗米修斯"》,《光明日报》1961 年 8 月 9 日。

④ 田农:《早期及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历史教学》1955 年第 5 期;日知:《线文 B 的译读》,《文史哲》1962 年第 5 期;唐陶华:《希腊文化高度发展的原因》,《中学历史教学》1957 年第 11 期;吴于廑:《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历史教学》1958 年第 2 期;李宗正:《色诺芬的〈经济论〉——兼评对〈经济论〉的几种观点》,《新建设》1962 年第 2 期。

⑤ 宋泽生:《罗马的奴隶制》,《新史学通讯》1953 年第 9 期;陈同燮:《古代罗马奴隶社会概述(上、下)》,《文史哲》1956 年第 11、12 期;周庆基:《从塔西陀笔下看古代日耳曼社会》,《新史学通讯》1954 年第 3 期;唐陶华:《古代罗马骑士阶层的演变》,《历史教学》1962 年第 12 期;齐思和:《从伽图的农业论看罗马农业》,《大公报》1951 年 5 月 11 日;王藻:《论罗马奴隶制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 年第 1 期;王藻:《论罗马帝国后期封建因素的萌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 年第 1 期。

⑥ 梁作檊:《关于古代罗马贵族阶级的起源及其成分问题》,《历史教学》1956 年第 9 期;田农:《古罗马共和时代初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历史教学》1954 年第 6 期;宋泽生:《罗马平民与贵族的起源及其在罗马早期历史上的斗争》,《新史学通讯》1954 年第 8 期;刘文鹏:《公元前 2 至 1 世纪罗马的奴隶起义对罗马社会的影响》,《历史教学》1957 年第 11 期;赵步云:《公元前 90 年意大利人起义的领袖是谁? 起义的地点是在什么地方? 具体情形如何?》,《新史学通讯》1955 年第 2 期;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斯巴达克起义是奴隶自觉的革命运动吗?》,《科学与教学》1957 年第 1 期;蔡鸿生:《西罗马帝国的巴高达运动》,《历史教学》1963 年第 8 期;魏杞文:《周谷城歪曲了古罗马的阶级斗争》,《光明日报》1964 年 12 月 3 日。

革问题、[1]对外斗争和罗马的崩溃、[2]科技问题、[3]基督教问题,[4]等等。

当时的学者通过学习苏联治史经验而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世界古代史研究,出版一些著作。[5]其中,1962 年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齐思和任分册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分册出版,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当时达到的水平和成就"。[6]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学者开始怀疑苏联学界的一些解释,但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一正常发展进程。虽然在十年动乱中仍有一些学者埋头研究和著述,但其成果只能束之高阁而不能出版问世。因而,"文革"十年总体上是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停滞的时期。

"文革"结束后,世界古代史研究获得重大发展机会。众多在国内外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新生力量进入该研究领域,不少人较好掌握了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从而使研究工作上升到考据层次。在此基础上,陆续出版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专著。[7]这里以综合性的世界上古史为例加以说明。林志纯主编

---

① 王侃:《塞维阿·塔力阿的改革》,《历史教学》1956 年第 9 期;华明:《塞维阿改革后罗马的兵役制度如何?》,《历史教学》1956 年第 1 期;吴于廑:《格拉古改革》,《历史教学》1964 年第 3 期;陈文明:《罗马农民的土地运动和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山西师院学报》1960 年第 4 期。

② 袁家诒:《高卢人内侵的结果是被打回去的呢? 还是如新编世界史上所载被一千磅黄金买回去的?》,《历史教学》1955 年第 6 期;周庆基:《罗马海外侵略胜利的原因和对罗马社会的影响》,《历史教学》1958 年第 11 期;陈柟:《安息、波斯和罗马斗争的具体情况如何?》,《历史教学》1956 年第 11 期;张纯明:《试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郑州大学学报》1964 年第 4 期;孙秉莹:《关于东西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崩溃问题》,《新史学通讯》1954 年第 12 期。

③ 史亚民:《古代罗马、希腊度量衡制度》,《古代世界史通讯》1957 年号;吴宓:《罗马历法简说》,《古代世界史通讯》1958 年第 3 期。

④ 刘家和:《基督教的起源及其早期历史的演变》,《历史教学》1959 年第 12 期;雷海宗:《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历史教学》1957 年第 1 期;李成德等:《基督教分为哪些派别? 各派主张如何?》,《新史学通讯》1956 年第 4 期;朱光潜:《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北大学报》1958 年第 1 期;雷海宗:《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大公报》1951 年 8 月 17 日;雷海宗:《"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大公报》1951 年 8 月 24 日;史辛:《〈圣经〉是谁的作品?》,《羊城晚报》1963 年 11 月 16 日。

⑤ 重要的有:周庆基《新编世界史》第一册,自由出版社 1953 年版;郭圣铭《世界古代史简编》,群联出版社 1955 年版;童书业《古代东方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版;吴于廑《古代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版;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高教出版社 1958 年版;东北师大历史系世界古代史组《世界古代史》,高教出版社 1958 年版。

⑥ 陈启能:《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1 页。

⑦ 例如,刘家和:《世界古代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崔连仲:《世界史——古代史》,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邓炎熙等:《世界古代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版;王洪慈:《世界古代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吴雁南:《中外历史新编》(第四卷世界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凌谟介:《新编世界古代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史仲文等:《新编世界古代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年版。

的《世界上古史纲》，[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依据大量原始资料，广泛吸收了国际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考古资料，提出了独到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的《世界史》中的“古代史编上卷”，对苏联学者的教条主义观点和西方部分学者所持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批评。总之，这两部书“表明中国的世古史研究者已经越出简单模仿状态，开始了自主研究和发展的新阶段”。[②]

(二) 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经历坎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中世纪史完全是从头开始的。从 20 世纪 50—60 年代初，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中世纪史论述前提下，主要讨论了西欧封建制问题、[③]中世纪的城市问题、[④]十字军问题、[⑤]地理大发现问题[⑥]等。其间出版一些

---

① 林志纯：《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郭小凌：《世界上古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河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③ 史苏苑：《日耳曼人是怎样由氏族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新史学通讯》1952 年第 10 期；李敬亭：《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庄园制度是怎样产生的》，《新史学通讯》1953 年第 9 期；郭振铎：《中世纪初期西欧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新史学通讯》1956 年第 3 期；齐思和：《从世界史角度看土地国有制》，《文汇报》1961 年 4 月 4 日；郭振铎：《中世纪初期西欧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新史学通讯》1956 年第 3 期；耿淡如：《西欧封建社会内“王国”“公国”的区别如何? “基辅俄罗斯为何”称“基辅国”?》，《历史教学》1957 年第 7 期；齐思和：《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度》，《历史教学》1957 年第 7 期；周庆基：《在教学中如何阐明西欧封建制度的发生》，《历史教学》1958 年第 5 期；刘明翰：《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山东大学学报》(历史) 1960 年第 2 期；高亨庸：《关于西欧封建制度形成问题》，《历史教学》1961 年第 8—9 期；辜燮高：《欧洲中古城市与贸易路线图说明》，《历史教学》1956 年第 3 期。

④ 曙明：《欧洲中世纪行会组织及其作用如何?》，《历史教学》1956 年第 2 期；辜燮高：《欧洲中古城市与贸易路线图说明》，《历史教学》1956 年第 3 期；蒋相泽：《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中山大学学报》1957 年第 1 期；杨熙时：《欧洲中世纪城市作用的研究》，《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7 年第 1 期；齐思和：《中世纪的集市和庙会》，《历史教学》1964 年第 8 期。

⑤ 杨辉：《十字军东征是七次? 抑八次? 各次起讫年代如何?》，《历史教学》1954 年第 1 期。许宏杰：《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原因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华南师院学报》1957 年第 2 期；史政三丙“烈火”小组：《对许宏杰先生“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原因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文的意见》，《华南师院学报》1959 年第 2 期；顾海：《揭穿周谷城对“十字军东征”性质的歪曲》，《厦门大学学报》1964 年第 4 期。

⑥ 雷海宗：《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关于“地理大发现”》，《历史教学》1954 年第 5 期；家昌：《瓦斯哥·达·加马的航行》，《历史教学》1955 年第 4 期；孙培良：《哥伦布发现新航路的过程如何?》，《历史教学》1956 年第 12 期；朱寰：《哥伦布的生平及其远航》，《历史教学》1958 年第 3 期；郑如霖：《新航路发现的背景及其后果》，《历史教学》1961 年第 10 期；马南村：《谁最早发现美洲》，《河北日报》1961 年 10 月 12 日；陈新华：《谁最早发现美洲，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祖先比哥伦布早整整一千年就到了美洲》，《中国青年报》1961 年 11 月 5 日；朱谦之：《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北京大学学报》1962 年第 4 期；宋辑：《比哥伦布早一千年我国慧深和尚发现美洲》，《南方日报》1962 年 10 月 21 日；陈昌福：《论所谓“地理大发现”》，《文汇报》1965 年 12 月 16 日；侯仲之：《所谓“新航路的发现”的真相》，《人民日报》1965 年 3 月 12 日；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2 年第 4 期。

对后学有重大影响的教材和专著。[①]这时期既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又初步进行史料编纂，虽经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为今后中世纪史的教学与研究初步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世纪史研究停滞下来。

“文革”结束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史学工作者从新的角度对中世纪史的主要问题，即封建社会与封建主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如对中世纪欧洲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对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近现代社会各方面因素的探讨，对封建主义实质及其参与影响的认识与批判等”。[②]90年代以后，社会结构问题、封建化问题、中西比较研究等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专门史、地区史和国别史研究更加深入，经济与物质文化史、法制史、思想文化史、宗教史、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加，研究呈现多样化、细致化的趋势。这一时期许多著作发表出来。[③]新时期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是存在着教学与研究人员严重缺乏的状况。

（三）世界近代史研究曲折向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近代史研究，与世界古代史研究一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60年代初为初创阶段。这一时期，由于中国世界史研究曾一度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特别是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史学界相隔离。而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却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部《世界通史》的近代部分即5—7卷的汉译本，分别出版于1963、1965和1975年。虽然“文革”前后中国学者对其态度截然相反即由推崇走向批判，但都表明它在中国史学界有着重要影响。有论者就其对“文革”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影响明确指出：“随着苏版《世界通史》的印行，随着中国学者对它散发出来的苏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质上是斯大林主义）的接纳，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是，那种业已存在于

① 例如，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中由朱寰主编的中世纪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齐思和主编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齐思和、刘启戈主编的《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中世纪中期的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均由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

② 徐建新：《世界古代中世纪学科的发展脉络》，《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2月13日。

③ 仅综合性而言，重要的就有朱寰主编《世界中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郑之等《世界中古史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孙义学编写的《世界中世纪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张盛健编写的《新编世界中世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蒋国维编写的《新编世界中古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学界的公式化、简单化与教条主义的作风,在当时中国政治上日益浓烈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变得格外彰显,使历史研究更加丧失其科学性与自身特点,而沉溺于一种僵化的模式中。"[①]这一时期,出版几种开创性的著作,[②]体现对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同时忽视了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等领域。

"文革"期间,世界近代史研究受到严重摧残,但是还是有学者坚持编写教材,延续着学脉。[③]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两个阶段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研究成果突出。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文艺复兴整体情况研究、[④]科学家研究、[⑤]文艺复兴文学艺术及其他问题研究。[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世界近代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并逐步走向繁荣,一系列世界

---

① 张广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384页。

② 钱亦石:《简明世界近代史》,三联书店1950年版;沈炼之:《简明世界近代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林举岱:《世界近代史讲义》,华东师范大学函授部1959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世界近代史讲义》(1640—1870)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长春师范专科学校三校世界近代史教师:《世界近代史》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 例如,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世界近代现代史讲稿》,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1972年印;上海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世界近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上海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世界近代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组:《世界近代史讲义》第二分册,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世界史组1975年印。

④ 吴于廑:《文艺复兴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历史作用》,《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尹曲:《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4年第1期。

⑤ 陶宏:《伽利略》,《科学大众》1957年第1期;本刊资料组:《敢想、敢说、敢作的伽利略》,《物理教学》1958年第4期。席泽宗:《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文汇报》1964年4月12日;陈遵妫:《纪念伽利略诞生四百周年》,《人民日报》1964年2月25日;林万和:《伽利略的生平及其对科学的贡献——纪念伽利略诞生四百周年》,《物理通报》1964年第3期;席泽宗:《纪念伽利略诞生四百周年》,《科学史集刊文汇报》1964年第7期;严敦杰:《伽利略的工作早期在中国的传播》,《科学史集刊》1964年第7期;郑光文:《火刑:纪念约丹诺·布鲁诺》,《科学大众》1957年第2期;长工:《布鲁诺》,《光明日报》1961年9月1日;晋盛:《不屈的战士布鲁诺》,《自然辩证法杂志》1975年第2期。

⑥ 向达:《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旅行家》1956年第4期;贺祥麟:《但丁的〈神曲〉》,《广西日报》1963年4月12日;丰子恺:《达·芬奇的生平及艺术》,《大公报》1952年5月4日;司徒乔:《读达·芬奇札记的体会:对芬奇的艺术观、人生观与工作态度的一点认识》,《光明日报》1952年5月4日;陈华新:《蒙娜丽莎依然是蒙娜丽莎》,《羊城晚报》1962年12月29日;毅人:《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和米开兰吉罗》,《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1期;靳鉴:《对"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和米开兰吉罗"一文的意见》,《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4期;毅人:《敬答靳鉴同志》,《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4期;秦宣天:《关于米开兰吉罗的评价》,《南师学报》1962年第3期;朱龙华:《伟大的文艺复兴艺术家:乔托》,《美术》1956年第11期;丁民:《14世纪佛罗伦萨梳毛工人起义的背景和具体情况如何?》,《历史教学》1961年第11、12期;徐则灏:《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历史教学》1962年第3期。

近代史专著相继问世。①

其间中国学者逐渐融入自主意识。例如，刘祚昌等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中，否定了传统的“法国热月政变是反革命”的观点，认为德国统一只有“自上而下”的唯一道路，肯定美国革命期间的民主改革在世界史的重大意义，批判了关于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走向反动的传统提法。再如，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屏弃了以前的以巴黎公社为界、把世界近代史硬性分成两大时期的作法，按照近代世界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而科学地设计其体系。本书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摆脱了传统观点的束缚，提出了新观点。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春风沐浴下，充分吸收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例如，在教材编写方面吸收了国际通行的做法，开始打破旧的以几次革命、几条线、几个高潮为核心，采用以几个主要国家为主体的国别史集成式体系，把世界近代史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

在历史人物、事件评价方面发生根本转向。例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热点众多且更为深入中肯，对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拿破仑、路易·波拿巴、俾斯麦、华盛顿、杰弗逊、林肯、门罗等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功过是非虽然仍有争论，但是更具体地评价其在具体事件和历史时期的作用，着眼积极方面更多些。对工人运动发展程度和革命时机等问题的认识更为客观冷静，特别是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对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内部斗争的认识以及其中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已开始走出简单化、极端化的误区。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评价标准更切实际，绝对化倾向较少，对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更多的是强调其历史进步性和客观可行性，而不再苛求于其“局限性”“妥协性”和“反人民性”等等。因此，对德国统一、热月政变、拿破仑帝国、第二帝国等均从反封建这个标准出发给予了更积

---

① 王荣堂等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林举岱等主编《世界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书后由高教出版社1992年出版为《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册）；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1991年出版；乔明顺《世界近代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书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统设课教材；彭树智《世界近代史》（上、下册），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翌年出版其《世界近代史基本问题》；管敬绪《世界近代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韩承文《世界近代史诸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瞿季木等《世界近代史纲》，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骆永林《世界近代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吴家振《世界近代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吴雁南《中外历史新编》第五卷《世界近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王洪慈《世界近代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黄尊严《世界近代史学术争鸣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介绍了近十年来史学界提出的新问题、新论点及争鸣情况，反映了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现状。

极的评价。

(四) 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的世界现当代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现当代史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至世纪之交，取得了很大进步。

20世纪的历史大舞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譬如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诸问题、国际联盟、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30年代的国际关系与大国的外交政策、罗斯福新政、雅尔塔体系、苏共“二十大”与匈牙利事件、欧共体的形成与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诸问题等等，构成学者们研究世界现代史的热门话题。同时，随着西方国家及苏联档案的解密，许多过去学者无法见到的资料公诸于众，为世界现当代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自然推动了中国的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国际学界的20世纪历史研究，处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大背景下，整体观念得以流行，也促使中国学者以整体历史观来看待世界现当代史。

中国学者重视史料的筛选和整理工作。例如，齐世荣在80年代初主编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一、二分册，[①]90年代又主编并出版了《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三分册；[②]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写了《世界现代史报刊论文报刊资料目录索引：1949.10—1981.12》；[③]王斯德编写了《世界现代史参考资料》。[④]

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世界现当代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考察。1984年，吴于廑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应把研究世界史的注意力引向历史怎样“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一观念。[⑤]李植枬主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当代部分)[⑥]，是对20世纪世界史作整体研究的第一次尝试。后来，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现代史编》把这一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该书《前言》中，齐世荣写道：“完整意义的世界史，在20世纪终于形成。……世界历史

① 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册1980年出版，第二册1982年出版，第三册2007年出版。
②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一分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二、三分册。
③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1982年印。
④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⑤ 吴于廑：《研究世界历史要重视横向发展》，《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1日。
⑥ 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虽然从近代已经开始,但到了20世纪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联系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①]李植枬主编的《20世纪世界史》(上、下),[②]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

许多高校都编写带有自己特色的教材。例如,吉林师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史组编写的《世界现代史(1917—1945)》(上册)于1974年面世,南开大学历史系所编的《世界现代史(1917—1945)》(上、下册)1977年印行,苏州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世界现代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80年代以后关于20世纪历史的著作纷纷出版,[③]而研究20世纪历史巨变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投入学者最多的,当推齐世荣、廖学盛主持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的、国家委托研究的重点项目"20世纪的历史巨变"。其中的成果《20世纪的历史巨变》已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出版,共计12个专题,内容包括对资本主义及其新发展的探索,对十月革命与苏联兴衰的探索,对20世纪科技腾飞对人类物质文明影响的探索,以及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第三世界及国际格局变动与两次世界大战等问题的探索。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现当代史研究的现状,张宏毅认为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对世界近现代史的根本特征——整体化,达成大体一致的认识;第二,"20世纪历史巨变"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第三,对高科技革命问题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第四,对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研究成为重中之重;第五,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对当代国际关系和第三世界问题的研究视野也进一步拓宽;第六,重视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翻译工作;第七,高度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深化理论的学习和研究。[④]所言极是。

---

①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现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夏景才:《世界现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吴继德:《世界现代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吴继德:《当代世界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戴志先:《战后世界史》,湖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徐天新等:《世界现代史:1917—1945》,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王春良:《世界现代史》上册、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1986年版;汪宏玉等:《世界现代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唐仕润:《世界现代史》,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郭售嘉等:《世界现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石卞:《世界现代史纲》,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王斯德:《世界现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徐保森:《世界现代史》,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植枬:《20世纪世界史》(上、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卢文璞:《世界现代史:1914—194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段炳麟:《世界当代史:1949—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1994年版;李世安:《世界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版。

④ 张宏毅:《世纪之交的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历史教学》2004年第9期。

二、深化了世界历史写作的区域和国别史研究

决定世界通史写作水平高低的基础，是区域史或者国别史研究。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域史或者国别史研究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一) 欧洲史研究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欧洲史一直都是世界历史写作中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改革开放前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问题、①殖民扩张问题、②两次世界大战问题、③资产阶级革命问题、④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问题、⑤

① 辜燮高:《欧洲产业革命的经过情形怎样?(问题解答)》,《历史教学》1953年第6期;耿夫孟:《为什么说法帝国主义是高利贷帝国主义? 它是如何形成的? 德帝国主义的特征是什么? 它是怎样形成起来的?》,《历史教学》1956年第3期;谷书堂:《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强和国际斗争的加剧》,《历史教学》1957年第1期;林举岱:《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一些特征》,《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1期;林举岱:《资本主义世纪体系形成后欧洲阶级斗争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4期。

② 王绳祖:《英德关于殖民地的争夺》,《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李时岳:《美菲战争、英布战争与中国》,《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蒋相泽:《黑人是怎样被套上奴隶的枷锁的》,《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陆庭恩:《关于殖民主义者贩卖黑人的若干史实》,《学术月刊》1964年第6期;江宏:《殖民战争与殖民侵略》,《国际问题研究》1964年第2期;杨真:《传教事业与殖民主义——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史札记》(一、二、三、四),《新建设》1964年第10—11、12期,1965年第1期;史军:《了解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四谈读一点世界史》,《红旗》1972年第11期。

③ 王存华:《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与性质怎样?》,《新史学通讯》1953年第10期;郑玉林:《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性质问题——与丁则民同志商讨》,《光明日报》1956年2月2日;王绳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集团战败的原因是什么?》,《历史教学》1956年第10期;王养聪:《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2期;刘心显:《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样结束的? 协定的内容如何?(问题解答)》,《历史教学》1958年第4期;蔡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服军事劳役的华工》,《历史教学》1963年第8期;王明中:《资产阶级学者伪造历史之一例——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问题》,《光明日报》1964年2月26日;甘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国在巴尔干的争霸》,《历史研究》1975年第6期。

④ 耿夫孟:《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历史教学》1954年第10期;魏宏运:《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范畴》,《南开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王季敏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教学》1955年第4期;潘硌基:《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光明日报》1956年9月13日;克拉辛:《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教学》1957年第10期;郑如霖:《欧洲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在德国的原因》,《历史教学》1960年第1期;程西筠:《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前线》1962年第21期;薛靖:《关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学术学刊》1964年第2期;何耀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论"神圣同盟"的兴灭》,《云南大学学报》1974年第2期。

⑤ 张子凡:《纪念巴黎公社80周年》,《人民日报》1951年3月18日;高放:《从巴黎公社说到镇压反革命——公社失败八十周年纪念》,《新建设》1951年第3期;赵俪生:《马克思怎样分析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历史?》,《文史哲》1952年第5期;高放:《马克思与巴黎公社》,《新建设》1953年第5期;林寿晋:《巴黎公社》,《历史教学》1953年第2期;宋学海:《马克思、恩格斯论普法战争中德国工人阶级对战争的态度》,《史学月刊》1958年第3期;林寿晋:《1848—1851年的法国革命》,《新史学通讯》1953年第11期;嵇文甫:《一种事变三种讲话》,《新史学通讯》1953年第9期;辜燮高:《有关巴黎公(转下页)

(接上页)社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3年第10期;辜燮高:《"有关巴黎公社的一些问题"的补正》,《历史教学》1953年第12期;江宗植:《拿破仑第三与第二帝国》,《历史教学》1954年第8期;熊锡元:《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次一次地胜利——纪念巴黎公社八十四周年》,《政法研究》1955年第2期;关勋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者论巴黎公社》,《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7期;萧曼:《国家工场于1848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光明日报》1956年7月19日第3版;杨立文:《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杜昆:《马克思论巴黎公社》,《光明日报》1955年3月18日;上官杰:《法国"劳动总同盟"是怎样成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历史教学》1955年第1期;胡代聪:《19世纪30、40年代欧洲的革命运动》,《历史教学》1956年第9期;关勋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者论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7期;江宗植:《普法战争中法德两国工人的反战斗争》,《历史教学》1956年第11期;杨立文:《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徐泰来:《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对关勋夏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者论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一文的商榷)》,《东北人大学报》1956年第2期;李思温:《学习"1848年欧洲革命"的一点体会》,《历史教学》1956年第9期;关勋夏:《再论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答徐泰来先生"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一文的意义)》,《中学历史教学》1957年第4、5期;王萱痕:《巴黎公社的文教政策》,《光明日报》1957年6月20日;刘文英:《巴黎公社政权的性质及其特点》,《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2期;纪风:《马克思对待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读〈法兰西内战〉》,《读书》1957年第17期;杨甫:《学习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历史教学》1958年第7期;王宏吉:《巴黎公社是"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分界线(纪念巴黎公社87周年)》,《人文杂志》1958年第2期;肖兰瑞:《19世纪30年代法国的里昂工人起义》,《历史教学》1958年第10期;关勋夏:《19世纪末期法国的工人党》,《中学历史教学》1958年第1期;刘昆山:《读了〈巴黎公社诗选〉以后》,《诗刊》1957年第7期;林举岱:《1848年欧洲革命斗争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5期;罗大纲:《"国际歌"的产生和它的意义》,《语文学习》1959年第7期;柏园:《巴黎公社英雄赞——读芦利耶的〈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读书》1959年第5期;王萱痕:《杰出的巴黎公社活动家瓦尔连》,《史学月刊》1959年第12期;穆克:《普法战争性质是怎样的转化的?是否是因为普军攻入法国本土才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1870—1871)》,《历史教学》1959年第12期;韩承文、李式琪:《论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开封师范学院学报(历史)》1960年第5期;陈文艺:《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和教训——纪念巴黎公社八十九周年》,《史学月刊》1960年第3期;叶丙炎:《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历史教学》1960年第1期;谢琏造:《巴黎公社革命和法国社会各阶级》,《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关勋夏:《关于巴黎公社几个问题——与谢琏造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李昌道:《巴黎公社劳动妇女的战斗精神》,《解放日报》1961年3月18日;北京师大历史系世界近代史研究班:《巴黎公社时期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北京师大学报》1961年第1期;张椿年等:《论巴黎公社的历史创举》,《历史教学》1961年第7期;杨效农:《巴黎公社儿女的脚印》,《人民日报》1961年3月19日;王琳:《19世纪无产阶级运动最伟大的典范——巴黎公社事略》,《世界知识》1961年第6期;李光灿:《巴黎公社和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张仲实:《巴黎公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发展》,《人民日报》1961年3月18日;黎澍:《巴黎公社原则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大公报》1961年3月18日;王明中:《记取巴黎公社的教训》,《江海学刊》1961年第3期;胡代聪:《伟大的历史经验——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新建设》1961年第2、3期;刘宗绪:《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任众等:《巴黎公社的原则无往而不前》,《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1年第1期;沈嘉荣:《巴黎公社的原则永存》,《江海学刊》1961年第3期;艾思奇:《巴黎公社必将遍布全世界》,《人民日报》1961年3月18日;林举岱:《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旗帜——纪念巴黎公社成立九十周年》,《文汇报》1961年3月17日;陈崇武:《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面旗帜——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解放日报》1961年3月18日;柳波夫:《巴黎公社的年轻英雄们》,《中国青年报》1961年3月12日;李德庆:《巴黎公社文学的旗(转下页)

共产国际问题、①基督教问题②等。

(接上页)手》,《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陈叔平:《巴黎公社工资政策的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李德庆:《巴黎公社文学的旗手——略论鲍狄埃的诗歌创作》,《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刘纵一:《法国1848年革命前夜的阶级关系和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河北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王明中:《一部历史巨著,一座理论宝库——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光明日报》1962年5月25日;王荣堂:《19世纪中期法国工人的三次起义》,《历史教学》1962年第5期;张泽森:《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4期;许征帆:《学习巴黎公社英烈的崇高品质——读〈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人民日报》1963年4月11日;孙信华:《巴黎公社的主要经验——纪念巴黎公社九十二周年》,《实践(浙江)》1963年第3期;管敬绪:《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江海学刊》1963年第5期;张恩慈:《学习〈法兰西内战〉》,《光明日报》1963年6月21日;林歧瑞:《读〈法兰西内战〉》,《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2期;徐知免:《关于巴黎公社文学》,《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方民生:《略论巴黎公社工资原则的革命意义》,《浙江学刊》1964年第5、6期合刊;陆耀庭:《巴黎公社的工资政策及其意义》,《教学与研究》1964年第6期;国际政治专业七三级工农兵学员:《巴黎公社冲击资产阶级法权的尝试》,《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王荣堂:《德莱福斯案件发生的原因和实质是什么?》,《历史教学》1964年第11—12期;王荣堂:《请说明布朗热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实质》,《历史教学》1964年第8期;陈崇武:《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典范——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汇报》1964年3月19日;王森阁:《读〈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文史哲》1964年第3期;戈振纲:《1848年法国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历史教学》1965年第12期;管敬绪:《1848年的巴黎六月起义》,《新建设》1965年第6期;刘宗绪:《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历史教学》1965年第6期;施向东:《纪念巴黎公社》,《红旗》1966年第4期;刘惠民:《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红旗》1966年第11期;刘连祥等:《战斗的巴黎公社诗歌》,《光明日报》1966年3月20日;施鉴思:《法国六月起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的第一次大交锋》,《文汇报》1972年10月14日;陆云翔:《从巴黎公社工资政策得到的启示——读〈法兰西内战〉札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75年第1期;史群:《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曙光——巴黎公社的教育革命》,《教育革命》1974年第3期;施平:《巴黎公社的教育》,《教育实践》1975年第1期;陈显泗等:《巴黎公社教育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5期;曹特金等:《巴黎公社的可耻叛徒——评苏修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歪曲》,《历史研究》1976年第1期;万松玉:《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6年第2期。

① 韩承文:《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初年各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成长的根源是什么?机会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有什么危害?》,《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7期;李纯武:《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历史教学》1956年第11期;王庆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些重大斗争》,《学习》1957年第2期;张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几个历史时期》,《文汇报》1958年5月5日、9日;韩承文:《近代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史学月刊》1958年第8期;亦平:《第一国际建立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历史教学》1958年第10期;王庆成:《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创立》,《历史教学》1959年第12期;施和颐:《康德主义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张子凡:《巴黎公社和国际主义》,《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潘润涵:《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历史教学》1964年第6期;关勋夏:《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学术研究》1964年第1期;王兆铮、何孝瑛:《第一国际与国际主义——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一百周年》,《教学与研究》1964年第5期;闻斌:《巴黎公社是国际主义的旗帜》,《文汇报》1971年3月23日。

② 雷海宗:《近代史上的罗马教》,《历史教学》1951年第3期;雷海宗:《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今日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简介》,《历史教学》1951年第2期;杨真:《西方基督教神学是怎样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红旗》1964年第21、22期。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成立。之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也相继成立欧洲研究所或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推动了中国欧洲史研究的发展,欧洲区域史著作纷纷出版。[①]鉴于欧洲国家众多,内容丰富,故以下按国家分述。

英国史研究。改革开放前,学术界主要讨论封建制问题,[②]中世纪的宪章运动、农民起义等政治问题,[③]资本主义发展问题,[④]殖民扩张问题,[⑤]

① 汪异之《西欧简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赵瑞芳主编《欧洲北美近代史:1492—1918》,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觉非主编《欧洲五百年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辜燮高:《对英国上古、中古史分期的意见——兼评英国史家的英国史分期》,《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陈力、耿天孟:《请根据具体史实说明英格兰自亚勒弗烈王朝至诺曼底侵略时期(所谓封建前期)经济结构的变化》,《历史教学》1955年第7期;蒋孟引:《15世纪英国封建制度的危机》,《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郭振铎:《英国国会与法国三级会议产生原因及其与王权的关系?》,《史学月刊》1957年第2期;李德成:《英国封建化过程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58年第2期;蒋孟引:《论英国封建化过程的特征》,《江海学刊》1962年第6期;马克垚:《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齐思和:《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征》,《新建设》1964年第10—11期合刊;齐思和:《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

③ 马毓良:《1381年窝特台勒的起义》,《历史教学》1954年第2期;喻松青:《英国大宪章历史分析》,《南开学报》1956年第1期;郭振铎:《英国国会与法国三级会议产生原因及其与王权的关系》,《史学月刊》1957年第2期;萨师炯:《英国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教学与研究》(甘肃师大学报副刊)1959年第5期;杨宗遂:《15世纪英法统一国家的形成》,《历史教学》1959年第12期;王荣堂:《1639年苏格兰人民起义的背景及具体情况如何?》,《历史教学》1961年第10期;王荣堂:《1549年英国凯特起义的背景与具体情况如何?》,《历史教学》1962年第3期;刘大明:《从英国的原始积累过程看资产阶级的本质》,《郑州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肖明:《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意义与失败的原因》,《历史教学》,1964年第11—12月合刊;齐文颖:《请说明英国皇室法庭的作用》,《历史教学》1965年第1期。

④ 辜燮高:《11—17世纪初英国的钱币问题——英国史读书札记》,《南开学报》1956年第1期;耿淡如:《英国圈地运动》,《历史教学》1956年第12期;郑如霖:《16世纪英国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史学月刊》1959年第7期;卓天华:《试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1期;齐思和、马克尧:《西方进步史学家关于英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战》,《北大史学论丛》1959年第12期;王裕群:《从16世纪英国工业的发展看农业的基础作用——与郑如霖先生商榷》,《光明日报》1961年2月27日;蒋孟引:《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条件和概况》,《历史教学》1963年第6期;蒋孟引:《16世纪英国的圈地狂潮》,《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蒋孟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农民反对圈地的斗争》,《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刘大明:《从英国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看资产阶级的本质》,《郑州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

⑤ 韩承文:《"英国资本主义承继了前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广大的殖民地,这就决定了英国帝国主义发展的特点"。这究竟如何理解?》,《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0期;王绳祖:《英德关于殖民地的争斗(1884—1914)》,《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乔明顺:《英国航海条例的内容如何?英国颁布航海条例的目的何在?它对英国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问题解答)》,《历史教学》1957年第10期;陆文艺:《19世纪晚期英国丧失世界垄断地位以后,为什么它的资本输出仍然居于世界首席地位?英国为什么将庞大的资本输出到国外?》,《史学月刊》1957年第3期;张铁东:《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钟一均:《17—18世纪英国对缅甸的侵略与英法争夺》,《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王明中:《英布战争(1899—1902)》,《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林杰:《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著作》,《人民日报》1963年6月14日;郑子希:《英帝国从"日不落"到"日薄西山"》,《文汇报》1972年7月2日;郭继培:《20世纪初英德争夺中东的斗争》,《文汇报》1972年7月9日;朱锋:《达尔文和他的进化学说》,《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1期。

资产阶级革命问题，[①]产业革命问题，[②]工人运动，[③]经济学、[④]文学、[⑤]哲

---

① 刘祚昌:《掘地派运动与温斯丹莱的原始"共产主义"》,《文史哲》1954 年第 11 期;田农:《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教学》1954 年第 1 期;刘祚昌:《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英国农村的剖析》,《文史哲》1954 年第 2 期;蒋孟引:《世界近代史为什么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南京大学学报》1955 年第 1 期;林举岱:《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及其意义》,《历史教学》1956 年总第 68 期;刘祚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东北师大科学集刊》(历史)1956 年第 1 期;林举岱:《英国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华东师大学报》1957 年第 1 期;翁大竹:《以英国革命为例谈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7 年第 4 期;钟一均:《哲拉尔德·温斯坦里的政治思想初探》,《中山大学学报》1958 年第 1 期;林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掘地派"是怎样出现的? 主张与活动如何?》,《历史教学》1958 年第 7 期;向红:《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阶级关系和斗争形式》,《历史教学》1958 年第 8 期;刘文英:《关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史教学的基本线索》,《历史教学问题》1958 年第 7 期;王荣堂:《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历史教学》1959 年第 9 期;王荣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级分析》,《辽宁大学学报》1959 年第 3 期;健平:《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工人运动看无产阶级早期斗争的发展》,《历史教学》1959 年第 11 期;豁然:《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作用》,《历史教学》1959 年第 11 期;黄嘉吉:《对 17、18 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初步分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些体会》,《历史教学》1960 年第 9 期;潘润涵:《温斯腾里和掘地派运动》,《历史教学》1962 年第 4 期;吴介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封建王朝复辟问题》,《红旗》1962 年第 23—24 期合刊;金开山:《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广西日报》1962 年 10 月 17 日;林举岱:《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爱尔兰的民族起义》,《历史教学》1962 年第 2 期;王荣堂:《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社会经济、阶级与宗教》,《历史教学》1963 年第 5 期;蒋孟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农民反对圈田的斗争》,《南京大学学报》1964 年第 8 卷第 2 期;赵瑞芳:《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封建王朝复辟问题》,《历史教学》1965 年第 8 期;武汉港务局工人理论小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历史研究》1975 年第 3 期。

② 杨辉:《1779 年克伦普吞发明的纺骡是什么?》,《历史教学》1954 年第 4 期;张弓长:《略谈英国工业革命》,《历史教学》1958 年第 9 期;关勋夏:《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和工农业关系的问题——与苏国荫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61 年 7 月 10 日;魏永理:《英国产业革命始于何时》,《学术月刊》1963 年第 4 期;林举岱:《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历史教学》1964 年第 7 期;施鉴思:《英国的产业革命》,《文汇报》1972 年 6 月 12 日。

③ 韩承文:《19 世纪 50—60 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走向消沉的原因是什么?》,《史学月刊》1957 年第 3 期;关勋夏:《英国宪章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中学历史教学》1958 年第 5 期;江中植:《为什么说应该的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教学》1960 年第 4 期;如海:《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文汇报》1961 年 11 月 4 日;王荣堂:《19 世纪初期的英国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辽宁大学科学论文集》1962 年;潘润涵:《"合法革命"的道路行不通——英国宪章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历史教学》1966 年第 4 期;天津港务局轮驳公司工人理论组等:《19 世纪中叶英国工联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危害》,《历史研究》1976 年第 5 期。

④ 陈其人:《"亚当·斯密信条"批判》,《复旦学报》1957 年第 2 期;吴兆莘:《英国古典学派的财政思想》,《厦门大学学报》1961 年第 3 期;健邦:《庸俗经济学者——西尼耳的"节欲"论》,《光明日报》1963 年 3 月 11 日;李宗正:《李嘉图经济学说的科学成就和它的历史命运》,《光明日报》1962 年 4 月 16 日;王学文:《李嘉图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及其局限性》,《新建设》1962 年第 10 期;黄仲熊:《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与国际分工理论》,《江汉学报》1964 年第 4 期。

⑤ 张月超:《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者菲尔丁》,《新建设》1954 年第 10 期;赵诏熊:《莎士比亚及其艺术》,《文艺报》1954 年 9 月;陈嘉:《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所流露的政治见解》,《南京大学学报》1956 年第 4 期;孙大雨:《狄更斯和他的〈匹克威克书简〉》,《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19 日;陈嘉:《宪章派文学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地位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59 年第 2 期;范存忠:《英格兰诗人罗勃特·彭斯——彭斯诞生二百周年纪念》,《南京大学学报》1959 年第 2 期;范存忠:《英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威廉·布莱克》,《江海学刊》1960 年第 1 期;赵沣等:《论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教学与研究》1961 年第 2 期;杨耀民:《狄更斯的〈匹克威克书简〉和人道主义》,《光明日报》1964 年 7 月 5 日;罗力:《如何看待拜伦作品中的"民生性"精华》,《光明日报》1965 年 1 月 3 日;赵沣等:《论莎士比亚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发展》,《文史哲》1963 年第 2 期。

学[①]等思想文化问题。

1980年，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成立，推动了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发展。程西筠、王璋辉所写《英国简史》，[②]虽然篇幅不大且许多方面有待深入研究，但是作为"文革"后英国史的第一部专著，对英国史研究起了承上启下作用。[③]之后多种英国史著作先后出版。[④]其中，蒋孟引主编《英国史》，打破了以往偏重政治史的写法，从多个角度再现了英国社会发展的全貌。该书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没有一本有分量的英国通史的局面。[⑤]

法国史研究。改革开放前主要研究法国中世纪的封建制、中央集权、战争问

---

① 周建人：《纪念达尔文逝世七十一周年》，《光明日报》1953年4月19日；梁正兰：《关于达尔文学说中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4年第4期；周建人：《达尔文主义与辩证唯物论》，《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曹绍濂：《费边社思想的批判》，《武汉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任华：《近代欧洲唯物论的鼻祖——佛·培根》，《人民日报》1956年7月25日；韦卓民：《对法朗士·培根关于科学研究问题的贡献和他的逻辑归纳法的估价与批判》，《华中师院学报》1957年第1期；陈珊：《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托马斯·莫尔》，《学习》1957年第7期；陆修斋：《巴克莱——近代西方主观唯心主义》，《学习》1957年第3期；吕大吉：《破滥的哲学，精巧的神学——巴克莱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批判》，《哲学研究》1957年第3期；胡其安：《"费边社会主义者"拉斯基述评》，《学术月刊》1958年第5期；张江夏：《从洛克的"代表说"到巴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教训了我们什么》，《光明日报》1958年2月16日；李天祜：《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托马斯·莫尔》，《历史教学与研究》（甘肃师大学报副刊）1959年第4期；方炜：《培根的〈新工具〉》，《读书》1959年第19期；方宗熙：《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纪念达尔文诞生150周年》，《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5日；吕大吉：《对洛克关于人类起源于经济的理论的一些看法》，《光明日报》1960年9月16日；吕大吉：《洛克反对天赋观念学说的斗争》，《光明日报》1960年5月15日；方炜：《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读书》1960年第7期；石再：《大卫·休谟》，《光明日报》1961年11月27日；周辅成：《简论霍布士及其伦理学说》，《光明日报》1961年1月27日；夏雪松：《弗兰西斯·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江海学刊》1961年第2期；陆成一：《培根——英国唯物主义的始祖——纪念弗兰西斯·培根诞生四百周年》，《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胡宁：《培根关于哲学应和实际效用相结合的思想——纪念弗兰西斯·培根诞生四百周年》，《光明日报》1961年2月10日；苗力田：《"知识就是力量"——纪念弗兰西斯·培根诞生四百周年》，《人民日报》1961年1月22日；吉洪：《培根的"新大西岛"和"论说文集"》，《文汇报》1961年12月10日；张世英：《布拉德雷的认识论批判》，《新建设》1962年第2期；陈启能：《论莫尔与康帕内拉》，《文史哲》1963年第4期；陈其人：《费边派的"滑进社会主义"论》，《江汉学报》1963年第12期；朱仙顺：《牛顿的世界观和自然哲学思想》，《新建设》1963年第8期；王辉明：《论欧文学说体系的形成》，《南师学报》1964年第1期；齐力：《培根和洛克的形而上学》，《人民日报》1965年4月7日。

② 程西筠、王璋辉：《英国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③ 钱乘旦：《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④ 范存忠《英国史提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王荣堂《英国近代史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比较完整地记叙了1640—1914年的英国历史；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之后陆续出版的有：郑庆云《英美简明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钱乘旦等《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晓律等《英帝国》（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

⑤ 钱乘旦：《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题,[①]资产阶级革命问题,[②]拿破仑及其战争问题,[③]帕斯卡、居里等科学家,[④]拉伯

① 刘承坤:《查理大帝时法兰克国家对外侵略征服了哪些地方?》,《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11期;程丁:《法兰克宫相查理·马泰尔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何?》,《历史教学》1957年第12期;郭振铎:《论法兰西中央集权国家专制君主政体形成的历史条件》,《开封师院学报》1962年第3期;郭振铎:《论法兰西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历史条件》,《史学月刊》1957年第3期;杨宗遂:《法国的胡格诺战争》,《历史教学》1956年第5期;舒仁:《法国爱国女儿贞德》,《历史教学》1956年第12期。

② 杨生茂:《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教学》1951年2卷第2、4、5期;高放:《18世纪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专政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当时反革命分子是如何镇压的? 后来雅各宾派是怎样覆灭的?》,《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4期;方镇中:《18世纪末法国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成就及其失败的必然性》,《新史学通讯》1952年第10期;范纯善:《1789年法国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为什么发生表决权之争呢?》,《新史学通讯》1952年第10期;耿孟夫:《为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能联系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解答)》,《历史教学》1954年第10期;奚邦准等:《关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性质问题》,《历史教学》1955年第8期;江宗植:《关于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教学》1955年总第10期;曹绍濂:《18世纪法国的先进思想家及其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作用》,《历史教学》1957年第5期;宋广祥:《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俱乐部和党派的发展与演变》,《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4期;刘宗绪:《雅各宾派的资产阶级局限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第7期;魏越:《18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王荣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9期;王荣堂:《对于北美"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的理解与分析》,《历史教学》1959年第7期;侯尚志:《人民群众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伟大作用》,《甘肃师范大学学报》(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2期;潘润涵:《法国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的早期发展——社会小组——疯人派活动——巴贝夫密谋》,《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钟显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人民日报》1963年1月31日;潘润涵:《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复辟问题》,《光明日报》1963年9月25日;郭华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欧洲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干涉》,《历史教学》1964年第2期;戚佑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巩固问题》,《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4年第1期;林举岱:《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封建王朝的复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赵瑞芳:《关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的原因》,《光明日报》1965年7月14日;刘宗绪:《略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吉伦特派》,《光明日报》1965年6月16日;王荣堂:《群众革命运动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伟大作用》,《辽宁大学学报》1973年第2期;上海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编写组:《试论雅各宾派的历史作用》,《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李元林等:《正确的政治路线是防止复辟的根本保证——雅各宾派专政的历史经验》,《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74年第2期;史尚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文汇报》1972年7月2日;施鉴思:《复辟与反复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普遍现象——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说起》,《文汇报》1974年11月29日;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理论组:《法国革命与拿破仑的反复辟斗争》,《福建师大学报》1975年第1期。

③ 方镇中:《拿破仑评传》,《新史学通讯》1953年第2期;刘纵一:《拿破仑帝国崩溃的原因究竟外部主要,还是内部主要?》,《历史教学》1955年第9期;李浩培:《拿破仑法典初步批判》,《政法研究》1955年第2期;张泽:《关于拿破仑战争拿破仑帝国的几个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薛实:《〈拿破仑法典〉与法国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历史研究》1975年第5期;李元明:《拿破仑帝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阶段》,《历史研究》1975年第5期;史平:《拿破仑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几项重要措施》,《福建师大学报》1975年第2期;石建:《论拿破仑》,《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1期;韩承文:《评拿破仑》,《开封师院学报》1975年第1期。

④ 郭廷章:《比埃尔·居里和玛丽亚·居里》,《光明日报》1956年12月12日;郭沫若:《富兰克林、居里夫妇纪念会开幕词》,《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3日;钱三强:《居里夫妇生平》,《文汇报》1956年12月13日;李迪:《伟大的科学家巴斯加尔》,《光明日报》1962年8月19日;曾如阜:《天才数学家帕斯卡尔》,《羊城晚报》1962年6月2日;王锦光:《伟大的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尔》,《文汇报》1962年8月12日;严济慈:《镭的父母——居里夫妇——纪念比埃尔·居里逝世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56年4月19日。

雷、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莫泊桑等文学家，①笛卡尔、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思想家，②空想社会主义、实证主义等思想。③

---

① 郑振铎：《纪念弗朗索瓦·拉伯雷》，《光明日报》1953年9月28日；李健吾：《"人类，我爱你！"纪念维克多·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5月3日；夏玫等：《〈红与黑〉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意义》，《光明日报》1958年8月23日；耿峰：《莫泊桑的〈俊友〉》，《文汇报》1958年4月19日；王季深：《撕破资产阶级家庭温情脉脉的纱幕——纪念巴尔扎克诞生160周年》，《人民日报》1959年5月20日；周俊章等：《关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问题的讨论——（论文共六篇）》，《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朱陈：《巴尔扎克的政治立场》，《合肥师院学报》1960年第4期；金嗣峰：《关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及其他》，《文汇报》1962年4月17日；江伙生：《试评夏多布里盎》，《外国文学研究》1963年第4期；廖钟闻：《一部反映旧制度复辟的政治历史小说——评司汤达的〈红与黑〉》，《辽宁大学学报》1975年第2期；张长霖：《略谈〈红与黑〉的政治意义》，《江苏师院学报》1975年第3期。

② 李质明：《笛卡尔的二元论》，《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3期；陈修斋：《笛卡尔——提倡理性的思想先驱》，《人民日报》1956年8月31日；方炜：《笛卡尔的〈哲学原理〉》，《读书》1959年第21期；郭麟阁：《18世纪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的美学思想》，《西方语文》1958年2卷第1期；汪裕荪：《伏尔泰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光明日报》1962年5月11日；黄嘉德：《法国启蒙运动奠基者孟德斯鸠》，《文史哲》1955年第2期；罗大冈：《孟德斯鸠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人民日报》1955年5月3日；黄嘉德：《法国启蒙运动奠基者孟德斯鸠——纪念孟德斯鸠逝世二百周年》，《文史哲》1955年总第30期；徐大同：《孟德斯鸠——反封建专制制度、维护和平的思想家》，《新建设》1955年第5期；罗大冈：《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文学研究》1957年第1期；周新民：《对研究孟德斯鸠的几点意见》，《政法研究》1962年第2期；赵俊欣：《卢梭思想的根源及其体系》，《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于凤梧：《卢梭——18世纪法国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光明日报》1962年8月24日；韩延龙：《略论卢梭的政治思想——为纪念卢梭诞生二百五十周年而作》，《政法研究》1962年第3期；杨国光：《卢梭的社会学说——纪念卢梭诞生二百五十周年》，《文汇报》1962年6月28日；任华：《法国启蒙运动思想者卢梭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人民日报》1963年1月17日；刘楠来：《略论卢梭的国家学说》，《新建设》1962年第12期；郑晓沧：《简述卢梭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光明日报》1962年7月21日；滕大春：《卢梭——教学论发展史上的丰碑（纪念〈爱弥儿〉问世二百年）》，《河北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陈震东：《卢梭的劳动教育观点》，《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黄学溥：《试论卢梭劳动教育观点的几个问题》，《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光仁洪：《让·雅克·卢梭学案——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3期；陈修斋：《〈狄德罗哲学选集〉》，《人民日报》1956年9月2日；葛力：《狄德罗的认识论》，《新建设》1956年第5期；程为昭：《狄德罗的反宗教思想》，《光明日报》1956年11月28日；超俊欣：《唯物论者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方炜：《西方古典哲学名著评介〈狄德罗哲学选集〉》，《读书》1960年第11期；朱光潜：《狄德罗对于艺术与自然的看法》，《光明日报》1961年2月23日；樊莘森：《狄德罗论真、善、美的统一》，《文汇报》1962年9月4日；朱光潜：《狄德罗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新建设》1962年第5期；朱德生：《狄德罗的唯物主义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6期；林德宏：《狄德罗的运动观》，《江海学刊》1962年第12期；朱德生：《略论狄德罗的无神论思想》，《江海学刊》1963年第6期。

③ 方镇中：《勃朗基的主张是什么？他对于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有何贡献和不良影响（问题解答）》，《新史学通讯》1953年第4期；杨耀琳：《关于普鲁东主义于巴枯宁主义》，《历史教学》1955年总第55期；陈修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光明日报》1955年6月29日；葛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社会政治观点》，《文史哲》1956年第12期；葛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伦理观点》，《文史哲》1956年第7期；葛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反宗教的斗争》，《新建设》1957年第1期；卢文中：《关于奥古斯特·布朗吉的社会思想》，《东北师大科学集刊》1957年第3期；李健吾：《科学对法兰西19（转下页）

1979年，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成立，推动了中国法国史的研究和发展。撇开论文不说，之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① 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②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通史著作的翘楚，而郭华榕《法兰西第二帝国史》、③ 孙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史》、④ 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⑤ 等，呼应国际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重视，代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

德国史研究。改革开放前，主要研究封建制问题、⑥ 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问题、⑦

(接上页)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许征帆:《昂利·圣西门和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学习》1957年第8期;杨耀民等:《对〈科学对法兰西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的意见》,《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吴达志:《19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艺术》,《美术》1958年10月号;关勋夏:《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评述》,《史学月刊》1960年第6期;苗力田:《梅叶〈遗书〉的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光明日报》1960年9月23日;朱一智:《什么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文汇报》1961年11月8日;高嵩:《傅立叶的世界观》,《文汇报》1962年8月14日;高嵩:《傅立叶的情欲学说》,《文汇报》1962年8月24日;潘润涵:《巴贝夫主义和平等派密谋》,《历史教学》1962年第8期;徐则灏:《傅立叶对"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讽刺》,《光明日报》1962年11月16日;张建寅:《傅立叶的批判手法和批评观点》,《光明日报》1963年10月6日;胡景钊:《试论梅叶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性质与特点》,《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高嵩:《梅叶反神学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人民日报》1963年10月15日;杨工:《为什么法国唯物主义是西欧19世纪哲学认识前进发展的起点》,《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江宗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历史教学》1963年第7期;邢贲思:《圣西门和傅里叶的社会学说及其历史观》,《哲学研究》1964年第2期;余长河:《"按劳分配"的说法不是圣西门主义者提出来的》,《光明日报》1965年1月25日;韩焕然:《略论布朗基》,《历史教学》1966年第2期;陈元晖:《近代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哲学批判》,《文汇报》1963年6月24日;肖坻:《孔德与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9日;侯外庐:《怎样对待孔德的社会学观点》,《哲学研究》1958年第2期。

①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⑤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⑥ 朱寰:《介绍"马尔克"》,《东北师大函授教学》(历史)1956年第9期;程丁:《德意志封建国家的发展及其特点》,《历史教学》1955年第10期;王藻:《论罗马帝国后期封建因素的萌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总第1期;吴于廑:《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

⑦ 王养聪:《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1期;梁作干:《宗教改革是古代和中世纪阶级斗争的思想形式》,《光明日报》1960年12月22日;金嗣焜:《关于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4期;常德志等:《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及其作用》,《红色教师》1960年第3期;刘明翰:《路德初论》,《山东大学学报》(历史)1963年第3期;赵俪生:《恩格斯怎样分析德国的农民战争》,《历史教学》1954年1期;华中师院外语系理论学习小组等:《把革命和投降的对立展示给人民——学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的一点体会》,《长江日报》1975年12月5日。

三十年战争问题,[①]以及其他问题。[②]

1980 年,中国德国史研究会成立,推动了中国德国史的研究和发展。1980 年以前只出版了张炳杰《德国简史》,[③]之后的德国史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版了。[④]

俄国史研究。改革开放前,主要研究俄罗斯中央集权和农奴制、[⑤]俄国革命、[⑥]列宁与革命、[⑦]俄国与中国的关系。[⑧]之后,1985 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之后,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等学术团体也相继建立,推动了中国对于苏俄史以及东欧国家史的研究和发展。1985 年以前只出版了闻一《苏联的过去和现在》[⑨]

---

① 杨宗遂:《三十年战争对德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历史教学》1958 年第 8 期;郑如霖:《三十年战争对捷克和德国的后果》,《历史教学问题》1959 年第 4 期;田农:《三十年战争》,《中等学校教学参考材料》,《历史教学》1953 年第 1 期。

② 孙培良:《汉萨同盟是怎样成立的? 其组织和活动情况如何?》,《历史教学》1957 年第 2 期;刘君煌:《农业资本主义的所谓普鲁士道路与美国道路如何具体简要的区别?》,《历史教学》1954 年第 12 期;维谷、李星:《论"神圣同盟"》,《浙江学刊》1964 年 1 期;江宗植:《普法战争中法德两国工人的反战斗争》,《历史教学》1956 年总第 11 期。

③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1979 年版。

④ 朱忠武等:《德国现代史:1918—1945》,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张炳杰:《德国的历史与两个德国的现状》,旅游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丁建宏、陆世澄:《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20 世纪德意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沈国梁等:《德国:从分裂走向统一》,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4 年版;张立新:《百年巨变:19 世纪德意志的历史和文化》,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孙炳辉等:《德国史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吴友法:《当代德国——命运多舛的世界新秀》,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⑤ 张椿年、陈启能:《关于古代俄罗斯国家起源的"诺尔曼理论"批判》,《历史教学》1962 年第 6 期;李天祜:《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历史教学与研究》(甘肃师大学报副刊)1959 年第 5 期;王阁森:《东斯拉夫人历史上前期封建时期的特征与实质》,《曲阜师院学报》1963 年第 1 期;李天祜:《古代俄罗斯封建制形成的前提》,《历史教学与研究》(甘肃师大学报副刊)1959 年第 3 期;孙成木:《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历史教学》1963 年第 4 期;徐景学:《伊凡四世在巩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中的作用》,《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3 年第 2 期;等等。

⑥ 姜德昌:《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历史背景》,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历史)1956 年第 1 期;温占武:《俄国 1905 年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为什么是无产阶级领导》,《辽宁日报》1956 年 1 月 11 日第 3 版;李淑璧:《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 年第 4 期;赵克毅《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妥协党为什么能够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并且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新史学通讯》1955 年第 2 期;李荫农:《我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和平发展方针的理解》,《历史教学》1955 年总第 60 期;吴崇庚:《关于俄国的农村公社和革命的土地问题》,《历史教学》1955 年总第 59 期。

⑦ 王淇:《列宁论东方民族革命》,《教学与研究》1959 年第 11 期;张静如等:《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北京师大学报》1960 年第 2 期;许征帆等:《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新建设》1962 年第 11 期;许崇德:《列宁对资产阶级宪法的批判》,《政法研究》1963 年第 4 期;丁守和:《列宁和民族解放运动》,《历史研究》1964 年第 2 期。

⑧ 丁则良:《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与中国》,《历史研究》1954 年第 5 期;黎澍:《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研究》1955 年第 1 期;范若愚:《第一次俄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日报》1955 年 12 月 5 日第 3 版;郭庆昌:《中古时期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关系》,《复旦学报》1959 年第 9 期;杨一也:《关于一九一九年苏维埃政府"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历史教学》1956 年总第 8 期。

⑨ 战士出版社 1980 年版。

(1980年),1985年以后出版的著作日益增多。[①]

至于东欧其他国家的历史,主要涉及哥白尼、[②]夸美纽斯、[③]阿尔巴尼亚起义、[④]胡斯战争[⑤]等人物和事件。

其他欧洲国别史研究有拜占庭史、[⑥]西班牙和葡萄牙史、[⑦]荷兰史。[⑧]专著有张

---

① 主要有,李传明:《苏联史:1917—1945》,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孙成木等:《俄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洪宇:《简明俄国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张义德:《苏联现代史(1917—1945)》,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徐景学:《俄国史稿》,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周尚文等:《新编苏联史(1917—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之骅:《苏联史纲(1917—1937)》,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徐景学:《西伯利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陈之骅:《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邢广程:《苏联最高决策70年》,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汪毓清等:《跻身强国的轨迹:俄罗斯百年强国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竺可桢:《波兰伟大科学家哥白尼的贡献》,《光明日报》1953年5月24日;关肇直:《纪念波兰的伟大学者哥白尼》,《光明日报》1953年9月27日;竺可桢:《纪念尼古劳斯·哥白尼》,《光明日报》1953年9月28日;高士其:《尼古劳斯·哥白尼》,《光明日报》1953年9月29日;李仲:《哥白尼和伽利略》,《文汇报》1957年5月1日;朱仙顺:《尼古拉·哥白尼》,《物理通报》1958年第9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天文学的伟大革命——纪念哥白尼诞生五百周年》,《人民日报》1973年2月19日;金若水:《哥白尼》,《自然辩证法杂志》1973年第2期。

③ 傅任敢:《夸美纽斯对几个重要教育问题的主张:纪念夸美纽斯诞生365周年》,《人民教育》1957年第5期;常道直:《杨·阿姆司·夸美纽斯的生平和教育思想(1592—1670)》,《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1期。

④ 孙秉莹:《11—15世纪的罗马尼亚》,《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4期;蔡鸿生:《斯坎德培与15世纪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土耳其的斗争》,《历史教学》1962年第6期;穆欣:《斯坎德培》,《光明日报》1965年7月3日。

⑤ 幸燮高:《胡斯战争是15世纪发生在波西米亚的宗教战争,其详细情形如何?》,《历史教学》1954年第1期;尹曲:《胡司战争的时代背景》,《史学集刊》1956年第2期;尹曲:《胡司战争与塔布尔派》,《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4期;郑如霖:《论15世纪捷克农民战争》,《华南师院学报》(历史专号),1960年第3期;慕林:《捷克胡司战争为什么能胜利地坚持很长时间?后来又为什么失败了?》,《历史教学》1964年第9期;刘明翰:《论胡司运动及其性质》,《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2年第3期。

⑥ 许宏杰:《拜占庭封建化过程的几个问题》,《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2期;杨连山:《关于拜占庭封建制起源与封建化问题的探讨——对许宏烋同志〈拜占庭封建化过程的几个问题〉一文的商榷》,《史学月刊》1957年第1期;陈兆璋:《试论拜占庭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蔡鸿生:《7—9世纪拜占庭的保罗派运动》,《历史教学》1965年第4期;郭振铎:《"6—7世纪时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与斯拉夫人"地图说明》,《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2期;尹曲:《拜占庭帝国是怎样灭亡的》,《历史教学》1956年第3期;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周昌:《论基马尔革命》,《华东师大学报》1956年总第4期。

⑦ 幸燮高:《158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合并的事实过程是怎样的?》,《历史教学》1953年第11期;张绍良:《16、17世纪,葡、西、荷等国家的海外殖民怎样衰落的?》,《新史学通讯》1953年第5期;王淡芳:《塞万提斯和他的杰作〈堂吉诃德〉》,《人民文学》1955年第10期;叶君健:《〈堂吉诃德〉的现实主义——纪念〈堂吉诃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光明日报》1955年11月25日;曹未风:《纪念〈堂吉诃德〉出版350周年》,《文汇报》1955年11月26日;冰夷:《纪念〈堂吉诃德〉初版三百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5日;杨绛:《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文学评论》1964年第3期;牛庸懋:《西班牙的伟大戏剧家维加》,《河南日报》1962年7月15日;李健吾:《光荣永远属于人民的好手——纪念世纪文化名人洛卜·德·维加诞生四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戏剧报》1962年第12期;罗念生:《维加和他的历史剧〈羊泉〉》,《光明日报》1962年6月5日;黄如文:《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者——纪念维加诞生四百周年》,《羊城晚报》1962年6月16日;胡代聪:《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洪启翔:《明季葡萄牙对中国的侵略和它对我澳门的窃居》,《华南师院学报》(历史专号)1960年第3期;陈庆华:《早期天主教势力底武力征服中国的阴谋》,《历史教学》1951年2卷第2期。

⑧ 耿淡如:《尼德兰革命——性质和意义》,《历史教学》1957年第4期;陈碧笙:《17世纪上半期(转下页)

德政《西班牙简史》、[1] 赵克毅《意大利统一史》、[2] 刘祖熙《波兰通史简编》、[3] 于贵信《古代罗马史》、[4] 他石《瑞士联邦 700 年(1291—1991)》、[5] 李天祜《古代希腊史》、[6]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7] 杨公素《希腊近代史》、[8] 辛益《意大利近代史》、[9] 郭增麟《波兰独立之路》。[10] 此外,1998 年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的普及性知识读物《新编世界列国史丛书》,[11] 其中的《中欧各国》卷,介绍了德国奥地利、瑞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等国家的历史概况。

(二) 亚洲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改革开放前,主要研究东方古代社会特点、[12] 亚欧关系、[13]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14] 和亚洲历史评价[15] 等问题,通史性著作有顾学宏主编《亚洲通史》[16] 等;同时,国别史研究却不断细化,兹分述如下。

(接上页)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侵略及其失败》,《厦门大学学报》1962 年第 1 期;金冶:《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林勃兰》,《美术》1955 年第 6 期;司徒乔:《伟大的现实主义先驱——伦勃朗——为伦勃朗诞生 350 周年纪念而作》,《美术》1956 年第 7 期;许幸之:《为自由而创造的画家——伦勃朗诞生 350 周年纪念》,《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20 日;许幸之:《卓越的现实主义大师伦勃朗——为纪念伦勃朗诞生 350 周年而作》,《译文》1956 年第 7 期;吴作人:《伦勃朗的艺术——纪念伦勃朗诞生 350 周年》,《光明日报》1956 年 7 月 15 日;贺麟:《斯宾诺莎哲学简述》,《哲学研究》1957 年第 1 期;方炜:《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读书》1959 年第 24 期;张世英:《关于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与认识论》,《哲学研究》1961 年第 6 期。

①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②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 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④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⑤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0 年版。
⑥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⑦ 东方出版社 1994 年版。
⑧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⑨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⑩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
⑪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⑫ 吴泽:《古代东方社会的基本特点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 年总第 5 期;林加坤:《关于古代东方农村公社的若干问题》,《新史学通讯》1956 年第 3 期。
⑬ 王季敏:《16、17 世纪欧洲殖民者东侵时期东亚诸国落后的原因》,《史地教学通讯》1956 年第 2 期;林加劲:《16 世纪马来群岛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1963 年第 3 期;陈逸光等:《东南亚国家的土地关系》,《新建设》1965 年第 4 期。
⑭ 丁则良:《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历史研究》1955 年第 4 期。
⑮ 刘大年:《亚洲历史怎样评价?》,《人民日报》1965 年 7 月 8 日。
⑯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版。

日本史研究。改革开放前主要研究日本古代社会性质、[①]幕府政治、[②]明治维新、[③]中日关系[④]等问题。198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之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大大推动了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发展。1980年以前出版了万峰《日本近代史》，[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撰写的首部日本断代史专著。1980年以后相关著作出版良多。[⑥]

朝鲜和韩国史研究。改革开放前，主要研究朝鲜古代史、[⑦]历史人

---

① 李成德：《日本古代社会性质的初探》，《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4年第1期；沈达铭：《关于大和时代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文史哲》1957年第6期；林秀峰：《关于古代日本邪马台国的所在问题》，《湖南师院学报》1962年第4期。

② 吴廷璆：《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5年第1期；王立达：《日本平安朝时期的"摄政关政治"和"院政"》，《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期；王立达：《日本室町幕府统治时期内发生的农民起义》，《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5期；陆成侯：《丰臣秀吉之死与壬辰倭乱的结局》，《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9期；王裕群：《1592—1598年日本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及其结局——兼对陆成侯先生"丰臣秀吉之死与壬辰倭乱的结局"一文作初步商讨》，《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2期；江治荪：《镰仓、室町时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发展》，《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张殿吉：《关于日本封建土地国有制问题》，《文史哲》1963年第5期。

③ 王存华：《日本明治维新会严重地打击藩侯的利益，为什么得不到藩侯的反抗，反而有些藩侯如萨摩长洲等还积极的支持使其能顺利进行，这是什么道理?》，《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3期；周一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农民运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总第5期；王立达：《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德川氏江户幕府统治时期内的日本社会》，《中学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韩承文、伊文成：《"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各阶级分析》，《历史教学》1958年第11期；陈之安：《试论日本宽永锁国之原因及其评价》，《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④ 王立达：《7—9世纪日本"遣隋使""遣唐史"的派遣经过及其影响》，《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1期；朱梓荣：《唐代的日本留学生》，《史学月刊》1958年第4期；孙蔚民：《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唐僧鉴真》，《江海学刊》1961年第10期；邓健吾：《日本唐招提寺的建筑和造像艺术》，《文物》1963年第9期；常任侠：《鉴真和尚与日本艺术》，《光明日报》1963年10月6日；周一良：《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文物》1963年第9期；周一良：《荣西与南宋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光明日报》1963年12月31日；丰子恺：《雪舟的生涯与艺术》，《天津日报》1956年8月6日；马采：《日本画家雪舟二三事（附育山王）》，《人民日报》1956年8月9日；常任侠：《日本画圣雪舟在中国的旅行》，《旅行家》1956年第6期；马采：《日本杰出的画家——雪舟等杨：纪念雪舟逝世450周年》，《美术》1956年第8期；傅抱石：《雪舟及其艺术》，《人民日报》1956年8月23日。

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⑥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赵建民等：《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记述了从日本列岛形成至竹下登访华的历史过程；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比较详尽记述了日本整体历史的发展过程；王振锁：《战后日本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汤重南：《日本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2005年再版；吴晓临等：《东西合璧的明珠：日本百年强国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振锁：《战后日本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⑦ 陈育良：《关于古朝鲜地址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王立达：《新罗末期的农民起义》，《历史教学》1954年第12期；王立达：《关于高丽高句丽及其朝鲜问题的商榷》，《历史教学》1955年第5期；王立达：《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并立"时期内朝鲜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在沟通中日文（转下页）

物、[①]中朝关系、[②]朝鲜历史写作问题。[③]1979年，中国朝鲜史研究会成立，会址设在延边大学。朝鲜史的研究进一步展开。1992年8月中韩建交。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延边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教学科研单位，都先后创设了韩国学研究中心或韩国研究所。韩国研究其中包括韩国史研究逐渐增多。这方面出版了一些著作。[④]

东南亚史研究。改革开放前，主要研究东南亚古国、[⑤]西方对东南亚的侵略、[⑥]

(接上页)化上所起的作用》，《史学月刊》1957年第10期；李成德：《6—7世纪新罗的社会性质——奴隶制的瓦解与封建制度的产生》，《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2期；戴浩旭：《试论新罗社会的经济形态》，《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王立达：《略论朝鲜历史上10—14世纪王氏高丽的兴亡和李氏朝鲜的建立》，《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2期；王立达：《略论李氏朝鲜时代土地制度的变迁》，《史学月刊》1958年第4期；张秀民：《朝鲜的古印刷》，《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① 金永杰：《义军将领郭再祐》，《新朝鲜》1963年第12期；李清源：《伟大的爱国者李舜臣将军》，《新朝鲜》1955年第3期；崔凤翼：《16世纪朝鲜卓越的唯物主义者徐敬德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57年第1期；李相镇：《金应瑞(17世纪初)》，《新朝鲜》1964年第11期；袁水柏：《热爱和平反抗侵略的爱国诗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朝鲜诗人朴仁老诞生四百周年》，《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陶冰蔚：《朝鲜卓越的爱国诗人朴仁老》，《光明日报》1961年8月11日；尹世平：《17世纪的爱国诗人朴仁老》，《新朝鲜》1955年第5期。

② 张政烺：《上古时代的中朝友好关系》，《光明日报》1951年5月19日；常元敬：《再论古代中朝关系》，《新建设》1951年4卷第4期；王逊：《朝鲜古艺术和中国的关系》，《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张秀民：《中朝两国对于活字印刷术的贡献》，《大公报》1953年2月22日；卢南乔：《16世纪中朝联合抗日的新认识》，《文史哲》1951年1卷第1期；柳树人：《"壬辰倭乱"和中朝人民的抗战》，《历史教学》1952年第6期；耿夫孟：《16世纪末朝鲜的民族英雄金时敏领导军民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斗争事迹如何?》，《历史教学》1955年第7期；方诗銘：《16世纪李如松在朝鲜进行的抗日援朝斗争》，《历史教学》1951年2卷第6期；常元敬：《研究古代中朝关系的一个新证据》，《新建设》1951年4卷第2期；张家驹：《11、12世纪中朝人民的友谊和文化物质的交流》，《光明日报》1951年6月16日；李俨：《从中国算学史上看中朝两国的贸易、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大公报》1952年10月23日。

③ 李启烈：《日帝御用史家怎样伪造朝鲜历史》，《历史教学》1951年第3期；郑容郁、王学林：《评王辑五编"亚洲各国史纲要"中朝鲜史部分》，《光明日报》1959年2月5日；李启烈：《关于朝鲜史的若干问题(评王辑五著"亚洲各国史纲要"朝鲜部分)》，《历史研究》1958年11月；池喜谦：《朝鲜古代中世纪简史(讲义)》，《古代世界史通讯》1957年第3期。

④ 主要有：车哲九：《南朝鲜四十年》，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版；曹中屏等：《当代韩国史：1945—2000》，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朴真奭等：《朝鲜简史》，延边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姜孟山等：《朝鲜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曹中屏：《朝鲜近代史(1863—1919)》，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金光洙等：《朝鲜通史》(第四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⑤ 韩振华：《西居国在何处》，《光明日报》1956年12月6日；童书业等：《越南陈氏王朝得国经过考》，《山东大学学报》(历史)1962年第3期；黄盛章：《文单国——老挝历史地理新探》，《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陈序经：《骠国考》，《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郭振铎：《越南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有那几个古老的国家？当时的社会制度怎样?》，《史学月刊》1964年第7期。

⑥ 吴世璜：《荷兰殖民者怎样侵略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5日；谢林风等：《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人民日报》1958年1月19日。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①问题。1979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成立，促进了中国东南亚区域史和国别史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学者在东南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推出了30多部东南亚地区史和国别史著作，②改变了70年代之前很少有正式出版的中国人写的东南亚史的状况。③

中西亚史研究。改革开放前，196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成立，中东史研究初步展开。1964年，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所在西北大学成立（1978年改名为中东研究所）。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古代巴比伦、④古代赫梯、⑤阿拉伯帝

---

① 陈玉龙：《中国和老挝传统友谊》，《人民日报》1956年8月21日；王立达：《中国封建王朝直接统治期间的越南》，《中学历史教学》1957年第5期；陈云章：《16、17世纪中菲人民友好关系与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的迫害》，《山东大学学报》（历史）1959年第4期；唐锡仁：《我国古籍所述的美丽富饶的柬埔寨》，《人民日报》1965年10月8日。

② 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1978年以来《全国总书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等，不包括列国志丛书和通俗读物。东南亚区域史著作有，刘迪辉等：《东南亚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梁英明等：《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民同：《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贺圣达：《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黄鸿钊：《远东简史》（香港），开明书店1997年版；梁英明、梁志明：《东南亚近现代史》，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杨军、张乃和：《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是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东亚地区的历史著作，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东南亚国别史专著有，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缅甸简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张凤岐：《老挝简史》，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0年版；钱文宝等：《马来西亚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泰国简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王任叔：《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泰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刘迪辉等：《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雷启淮等：《亚太世纪的号角：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百年强国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郭振铎等：《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余富兆：《越南历史》，中越文对照，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版；温北炎、郑一省：《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③ 贺圣达：《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成就和展望》，《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

④ 童书业：《从古代巴比伦社会形态认识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性》，《文史哲》1953年第1期；童书业：《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历史研究》1956年第5期；日知：《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评童书业著〈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日知：《敬答童书业先生（补白）关于奴隶在巴比伦的地位和待遇》，《学术月刊》1957年第8期；孙道天：《与童书业先生论古巴比伦的社会性质》，《光明日报》1956年12月20日；童书业：《论奴隶在巴比伦的地位和待遇（上、下）（兼答孙道天、日知二先生关于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学术月刊》1957年第5、6期；李永采：《对童书业先生有关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论著的几点意见》，《山东大学学报》（历史）1959年第1期；李雅书：《苏末人的由来及其文化上的贡献如何?》，《历史教学》1958年第9期；陈隆波：《乌鲁卡基那改革的具体经过如何?》，《历史教学》1965年第3期；刘文鹏：《论巴比伦时代社会阶级与等级问题》，《东北师大函授教学》（历史）1956年第8期；陈维声：《古巴比伦的社会性质》，《哈尔滨师院学报》1962年第1期；李永采：《论古巴比伦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兼与吴泽、曹植福等先生商榷》，《山东大学学报》（历史）1963年第2期；李季谷：《汉谟拉比法典中的古代巴比伦王国》，《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8期。

⑤ 田农：《古代赫梯人国家》，《历史教学》1955年第2期；阎崇临：《关于赫梯——军事奴隶所有者》，《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施治生：《关于赫梯法典的"人道主义"》，《山东大学学报》（历史）1961年第4期。

国史[①]等。改革开放后，中国西亚史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彭树智主编的 13 卷本《中东国家通史》，[③]是以当代中东 18 个民族独立国家为主体、以中东各国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为主线，由古及今的中东国家编年通史。每卷约 25 万字，全书共计 300 余万字。《中东国家通史》依照通史的体例，来把握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各卷自成一体，又互为联系，注重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立论中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东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填补中

---

① 方思一：《伊斯兰教史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5 年第 2、3 期；马坚：《穆罕默德的宝剑》，《人民日报》1951 年 1 月 20 日；纳忠：《倭马亚王朝的统治与哈里发王朝的分裂》，《历史教学》1958 年第 4 期；任玉：《萨马尼王朝》，《历史教学》1965 年第 8 期；马坚：《中世纪的巴格达城》，《人民日报》1963 年 1 月 9 日；马坚：《阿拉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历史教学》1956 年第 1 期；马坚：《阿拉伯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9 日；马坚：《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人民日报》1956 年 8 月 15 日；宋大仁：《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历史研究》1959 年第 1 期；郭庆昌：《对宋大仁先生"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一文的意见》，《历史研究》1959 年第 6 期；张昌绍：《纪念阿维森纳》，《大公报》1952 年 5 月 4 日；世文：《阿维森纳》，《历史教学》1965 年第 8 期；宋大仁：《关于"西域""回回"和"阿维森那"问题》，《历史研究》1959 年第 12 期；马坚：《伊斯兰文化的光芒——庆祝伟大科学家阿维森纳诞生一千周年纪念》，《光明日报》1952 年 5 月 4 日。

② 中东区域史著作有，刘竞：《中东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既是一部工具书，也是一部全面介绍中东国家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的历史著作；赵国忠：《80 年代中东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彭树智：《20 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2000 年修订版，为高校教材，是中国学者编著的第一部中东通史著作，再版时，作者又增补了 20 世纪最后十余年的中东史内容，吸取了最新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黄鸿钊：《中东简史》，（香港）开明书店 1993 年版，（台湾）书林书店 1996 年版；姜桂石：《战后中东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阐述了战后中东历史发展进程，并在中东国家的合作与冲突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姚大学、王泰：《中东通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等。中东国别史著作有，郭应德：《阿拉伯中古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关阿拉伯中古时期历史的著作；郭应德：《阿拉伯史纲（610—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1997 年再版，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阿拉伯通史著作，论述了阿拉伯人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并对中国和阿拉伯之间很早就开始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也作了系统的、开拓性的研究；彭树智：《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1999 年修订版，2002 年再修订版更名为《阿拉伯国家史》）和《阿富汗史》（1993 年版，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阿富汗国家的通史著作）；李铁匠：《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纳忠：《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出版上卷、1999 年出版下卷，系统阐述了阿拉伯民族从游牧部落发展到横跨三大洲的阿拉伯—伊斯兰大帝国的历史；赵伟明：《近代伊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于卫青：《波斯帝国》，三秦出版社 2001 年版；冀开运等：《20 世纪伊朗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冀开运：《约旦史》，台湾三民书局 2004 年版；默父：《阿拉伯帝国》，三秦出版社 2005 年版；张倩红：《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等。

③ 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各卷依次为：彭树智、黄杨文：《阿富汗卷》（2000 年）；王铁铮、林松：《沙特阿拉伯卷》（2000 年）；肖宪：《以色列卷》（2001 年）；杨辉：《巴勒斯坦卷》（2002 年）；王新中、冀开运：《伊朗卷》（2002 年）；黄维民：《土耳其卷》（2002 年）；黄民兴：《伊拉克卷》（2002 年）；王新刚：《叙利亚和黎巴嫩卷》（2003 年）；雷钰、苏瑞林：《埃及卷》（2003 年）；郭宝华：《也门卷》（2004 年）；王铁铮：《约旦卷》（2005 年）；何志龙：《塞浦路斯卷》（2005 年）；林松业：《海湾五国卷》（2007 年）。

东史研究空白的意义。至于中亚史研究，改革开放前主要有突厥史、[①]匈奴史、[②]蒙古史[③]等。改革开放后，1980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成立，是中国专门研究中亚问题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中亚史的著作有，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是中国第一部中亚史著作，也是中国中亚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之后，类似著作陆续出版，[④]以王治来编著的《中亚通史》[⑤]的出版为标志，表明中国对中亚史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南亚史研究。改革开放前主要研究古代印度民族、[⑥]奴隶制、[⑦]种姓制度、[⑧]佛教、[⑨]文学哲学等文化[⑩]问题。改革开放后，印度作为殖民地的历史和独立后印度

---

① 刘启戈：《塞尔柱突厥的兴起对亚洲西部的历史有何影响?》，《历史教学》1958 年第 7 期；侯尚智：《试论突厥汗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兰州大学学报》1959 年第 1 期；周止礼：《"不"与"培哥"是突厥的官号》，《历史教学》1955 年第 12 期；蔡鸿生：《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学术研究》（广州）1963 年第 5 期；蔡鸿生：《突厥法初探》，《历史研究》1965 年第 5 期；陈祖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1958 年第 12 期；陈祖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特征》，《历史教学问题》1958 年第 3 期。

② 马长寿：《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4 年第 5 期；贺鲁：《古代之匈奴是否为哈萨克族之祖先》，《历史教学》1954 年第 7 期。

③ 李朝栋：《蒙兀尔帝国》，《历史教学》1955 年第 6 期；卢苇：《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改革》，《历史教学与研究》（甘肃师大学报副刊）1960 年第 4 期；冯家升：《蒙古西征用过火药吗?》，《历史教学》1952 年第 3 期；家昌：《蒙古族武力强盛时所建立的四个汗国（钦察汗、察合台汗、窝阔台汗、伊尔汗）是否归元朝统治?》，《历史教学》1955 年第 4 期。

④ 主要有：王治来：《中亚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中亚近代史：16—19 世纪》，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委员会组织：《中亚五国手册》，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1992 年版；王沛：《中亚四国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邢广程：《崛起的中亚》，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1993 年版；赵常庆的《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年出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当代中亚五国的学术著作，他的《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东方出版社 2003 年版等。

⑤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⑥ 陈序径：《猛族诸国初考》，《中山大学学报》1958 年第 2 期；许重远：《印度古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2 年第 3 期。

⑦ 朱杰勤：《评印度奴隶制度特殊论》，《历史教学》1956 年第 12 期；季羡林：《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历史研究》1965 年第 3 期；刘家和：《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北京师大学报》1963 年第 4 期。

⑧ 武希辕：《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云南大学学报》1957 年第 2 期；周庆基：《古代印度的瓦尔那制度》，《历史教学》1965 年第 10 期。

⑨ 季羡林：《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历史研究》1965 年第 3 期；刘家和：《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北京师大学报》1962 年第 2 期；赵步云：《印度的佛教始于何时，其背景如何?》，《新史学通讯》1956 年第 8 期；耿夫孟：《佛教主释迦牟尼出身贵族阶级，怎样会同情穷人（奴隶）而创佛教? 他的动机如何?》，《历史教学》1955 年第 3 期。

⑩ 王寿亭：《古代印度诗人迦梨陀娑简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9 年第 2 期；王衍礼：《关于迦梨陀娑出生年代问题》，《文史哲》1956 年第 8 期；金克木：《关于印度诗人迦梨陀娑》，《新建设》1956 年第 9 期；陆侃如：《迦梨陀娑——印度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文史哲》1956 年第 5 期；郑振铎：《印度大诗人迦梨陀娑传》，《文艺报》1956 年 10 月号；季羡林：《纪念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人民日报》1956 年 5 月 26 日；潘光祖：《印度古代最伟大的文学家迦梨陀娑》，《光明日报》1956 年 5 月 26 日；季羡林：《古代印度的文化》，《历史教学》1962 年第 10 期；黄心川：《印度古代的唯物主义》，《新建设》1963 年第 8 期。

社会史受到重视，一些通史性著作面世了。[①]

(三) 北美史研究

美国史是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改革开放之前主要研究美国的殖民扩张史，[②]富兰克林受到特别的关注。[③]1979 年底，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之后，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都相继设立了美国问题研究中心或美国史研究所，促进了中国学者的美国史研究。1979 年以前出版的刘祚昌《美国内战史》，[④]是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论述美国内战史的著作。此后有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⑤]和《美国史纲：1942—1823》、[⑥]黄安年《20 世纪美国史》、[⑦]杨生茂等《美国史新编》、[⑧]余志森《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⑨]顾学稼等《美国史纲要》、[⑩]何毅等《大

---

① 林承节：《殖民主义史・南亚》，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崔连仲：《古代印度》，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培伦：《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华中师范大学：《简明印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李文业：《印度史：从莫卧儿帝国到印度独立》，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林承节：《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昆仑出版社 2003 年版；《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印度史》，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和《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许海山：《古印度简史》，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年版；林太：《印度通史》，上海科学院出版社 2007 年版等。

② 王存华：《19 世纪末美帝是怎样变菲律宾为其殖民地的？》，《史学月刊》1957 年第 10 期；关勋夏：《美国为夺取世界霸权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历史教学》1958 年第 3 期；默微：《美帝国主义和古巴》，《历史教学问题》1959 年第 3 期；李煦：《美帝国主义与巴拿马运河》，《史学月刊》1960 年 4 月；陈嘉：《马克・吐温——美帝国主义的无情揭露者——纪念马克・吐温逝世五十周年》，《江海学刊》1960 年第 12 期；美德昌：《美国夺取巴拿马运河的历史丑剧》，《吉林师大学报》(社)1963 年第 1 期；丁则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历史教学》1963 年第 1 期；丁则民：《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第二次占领(1906—1909 年)》，《历史教学》1963 年第 5 期；丁则民：《1899—1902 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第一次占领》，《文史哲》1963 年第 6 期；王明中：《美帝国主义对巴拿马运河的侵略》(资料)，《江海学刊》1964 年第 2 期；李永锡：《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早期的大帆船贸易》，《中山大学学报》1964 年第 3 期；吴机鹏：《美帝国主义侵略古巴的"普拉特修正案"》，《历史教学》1964 年第 4 期；丁则民：《1899—1923 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政策》，《吉林师大学报》(社)1964 年第 4 期；陈显泗：《美西战争前美国对古巴的侵略》，《江海学刊》1964 年第 5 期；艾周昌：《美国对非洲的早期侵略》，《人民日报》1965 年 8 月 6 日；刘念柯：《美国新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传教侵略》，《人民日报》1965 年 8 月 6 日。

③ 钱临照：《纪念富兰克林诞生 250 周年》，《光明日报》1956 年 1 月 16 日；马大猷：《纪念富兰克林诞生 250 周年》，《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7 日；吴有训：《富兰克林的生平和他在科学上的贡献》，《科学通报》1956 年 12 月号；吴兴华：《纪念本杰明・富兰克林》，《光明日报》1956 年 12 月 12 日；郭沫若：《富兰克林、居里夫妇纪念会开幕词》，《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13 日。

④ 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⑤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⑥ 原名《美国早期发展史(1942—1823)》，人民出版社 1957 年初版；重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修订版，更为现名。

⑦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⑩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熔炉的强音:美国百年强国历程》。[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六卷本《美国通史》[②]的出版。李剑鸣等著第 1 卷《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张友伦主编第 2 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丁则民主编第 3 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 世纪末)》,余志森主编第 4 卷《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刘绪贻、李存训著第 5 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刘绪贻等主编第 6 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这部《美国通史》,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包括殖民地时代在内的 400 年美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撰写的最有分量的美国史专著,展现了中国美国史学研究的最新水平。

加拿大史研究。1984 年,中国加拿大研究会成立。此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教研机构相继建立加拿大研究中心,推动了中国加拿大史的研究,但目前中国加拿大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还比较薄弱。主要著作有:张友伦《加拿大通史简编》,[③]王云弟、刘广臻《枫林之国的复兴:加拿大百年强国历程》。[④]

(四) 拉丁美洲史研究

1961 年 7 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成立,中国的拉美史研究开始步入正轨。之后,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等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成立,推动了中国拉丁美洲史的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中国的拉丁美洲专题史,例如海地、[⑤]古巴、[⑥]墨西哥[⑦]历史研究成果比

---

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初版,下限止于 1986 年;2002 增订本,下限止于 2000 年,2002 年出齐。

③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④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⑤ 洪腊梅:《拉丁美洲的第一次革命风暴:1790—1804 年的海地革命》,《文汇报》1972 年 10 月 24 日;李春辉:《海地革命(1790—1804):拉丁美洲第一个黑人国家的成立》,《历史教学》1965 年第 7 期。

⑥ 高鸿志:《伟大的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0 年第 5、6 期;华南师范学院世界史组:《古巴人民六十年来革命斗争简述》,《中学历史教学》1959 年第 2 期;丁则民:《1868—1878 年古巴人民争取独立的"十年战争"》,《历史教学》1964 年第 7 期;陈文源:《19 世纪下半期的古巴华工》,《江海学刊》1963 年第 2 期;陈显泗等:《19 世纪我国有关古巴的著作述评》,《郑州大学学报》1964 年第 2 期。

⑦ 林捷:《巴拿马运河二三事》,《人民日报》1964 年 1 月 14 日;李永锡:《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早期的大帆船贸易》,《中山大学学报》1964 年第 3 期;王春良:《墨西哥的独立战争》,《历史教学》1965 年第 3 期;乔明顺:《墨西哥独立战争前社会矛盾关系发展初探》,《河北大学学报》1964 年第 5 期;张友伦:《1910—1917 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教学》1963 年第 12 期。

较丰富，通史研究亟需加强。

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拉丁美洲通史著作是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内部发行，叙述了从美洲印第安土著居民产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的拉丁美洲史，下限止于1956年；1983年，商务印书馆分两册公开发行（下限止于1956年，2001年重印）；第三卷由李春辉、苏振兴等主编，1993初版，2001年重印。其中总论部分从经济、政治、外交三个方面对“二战”后拉丁美洲发展的历史作一总的概述，而分论部分则分国别叙述“二战”后拉美33个国家的历史，下限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

其他还有拉枚、华建《墨西哥简史》、[①]田森《阿根廷简史》。[②]此外，由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陆续出版的普及型读物《世界各国知识丛书》，其中也介绍了美洲和中美洲、南美洲诸国的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概况。

（五）非洲和大洋洲史研究

196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成立，对包括非洲73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历史、社会、文化、民族、宗教、法学等领域进行研究。近40年来，该所成为国内西亚非洲研究领域的学术中心。之后，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中国非洲史研究等学术团体相继成立，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非洲史的研究。

改革开放之前，非洲史研究的主要领域有民族史、[③]古国文明、[④]奴隶制[⑤]和中非交通史[⑥]等。这些研究为后来的深入探讨打下了基础。随后出版一系列区域性

① 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②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③ 陈赞威：《关于非洲的民族形成问题》，《世界知识》1959年第23期；穆珍：《非洲的民族》，《人民日报》1962年3月22日；潘朗：《突尼斯民族文学的传统和新生》，《光明日报》1964年1月10日。

④ 诗亙：《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摩洛哥非斯城的卡罗因大学》，《世界知识》1962年第1期；吴于廑：《埃及和巴比伦古代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历史教学》1962年第3期；桑重露：《从贝宁铜雕看非洲文明》，《北京日报》1962年12月15日；叶藻：《西非古国贝宁》，《羊城晚报》1964年2月21日。

⑤ 李剑生：《前1750年的埃及农民与奴隶联合起义》，《史地教学通讯》1956年第2期；日知：《古埃及自公元前3200年统一后，奴隶制为什么没有高度发展？境内氏族制度的农村公社仍旧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陈文明：《论前17世纪前埃及和两河流域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1期；蔡鸿生：《4—5世纪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历史教学》1963年第1期；周庆基：《古代埃及统一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历史教学》1964年第10期；陈隆波：《埃赫那吞宗教改革的具体经过如何？》，《历史教学》1965年第4期；任玉：《公元前1750年埃及农民和奴隶起义的情况是怎样的？》，《历史教学》1965年第9期。

⑥ 臧荣：《伊本·白图塔的广州之游（中摩人民友好史话）》，《羊城晚报》1963年12月29日；夏鄤：《我国古籍记载的非洲》，《南方日报》1964年1月12日；李希泌：《从非洲最早来中国的旅行家之一——伊本·白图塔》，《文史哲》1964年第2期。

和国别著作。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非洲通史》。其中何芳川、宁骚主编古代卷，艾周昌、郑家馨主编近代卷，陆庭恩、彭坤元主编现代卷。这是至今为止比较全面的一部非洲通史专著，记述了从远古到20世纪80年代的非洲历史。此外，1998年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的普及性知识读物《新编世界列国史丛书》，其中《中非各国》卷，介绍了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等国家的历史概况。

中国的澳洲史研究起步较晚，1980年前，只有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对澳大利亚经济开展过研究，安徽大学外语系翻译和介绍了大洋洲文学（包括澳大利亚文学），有关澳洲的出版物寥寥无几。②1990年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徐州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等教学科研机构都相继建立了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澳大利亚史的研究。

仅通史类的著作就有：骆介子《澳大利亚建国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李志良《南十字照耀在星空》（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叙述了澳大利亚200余年的发展历史）、郑寅达等《澳大利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张天《澳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姜天明《澳大利亚联邦史略》（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三、走向深入和突破的专门史研究

世界史中的专门史研究，与通史、地区或者国别史研究有着类似的经历。不过这里不去重申其一波三折，且一时无法作出全面分析与综合，而是举出个案包括

① 非洲区域史著作有，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1918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1914—193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陆庭恩：《非洲的过去和现在》，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陆庭恩、艾周昌：《非洲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吴秉真等：《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郑家馨：《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国别史著作有，赵淑慧：《扎伊尔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周庆基：《古代埃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郁心强：《尼日尔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周启迪：《古代埃及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杨灏城：《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刘鸿武：《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姜忠尽：《中非三国：从部落跃向现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许海山：《古埃及简史》，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等。

② 安景华编：《澳中关系》，澳大利亚驻华使馆1995年印。

21世纪初的一些成果以说明其深入性和突破性。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是个案举例,无意忽视其他众多成果。

(一)经济史研究的专门化

经济史一直是中国世界史学者所关注的课题。传统上多从生产方式、赋税制度等层面研究的。改革开放后,借助社会学、经济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经济史,一些新的专门成果问世了,中世纪商业史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证。赵立行在皮雷纳、雷伯兹、汤普森、马克·布洛赫、索特恩和黑尔等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欧洲商业复兴的探讨,选定商人阶层为研究课题。他在研究中发现过去的研究存在着缺憾:第一,人们往往把中世纪商业复兴前和商业复兴时期看作两个互相对立的阶段。认为前者是一个封闭的、保守的、无商业的、黑暗的时代,后者则是一个开放的、进步的、复兴的时代。只注意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而忽略了或根本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第二,研究西欧的商业复兴,人们更多地关注对城市和市场的研究,而对发展城市和经营商业的主体——商人——却研究不够。即使描绘这些商人,也主要集中于意大利的威尼斯商人等,而忽视对西欧内陆的商人研究。第三,过去的研究很少把商人作为一个阶层来研究,从而无法全面地概括和了解商人阶层兴起的特征、影响和作用。第四,人们往往把商业复兴和商人阶层的兴起作为西欧社会变动的背景,不把它当做促成西欧社会变动的直接力量,因而没有把商人阶层摆在应有的位置。赵立行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利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方法考察了欧洲商人阶层的形成和他们对西欧社会转型的影响,认为商业阶层的形成是社会机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经济变动的结果,它不是在与庄园制对抗和对立中完成的,而是双方势力此消彼长的结果,它的形成不但引起了经济力量的分化,而且引起了法律、道德、文化和社会意识等一系列变动,是西欧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些结论是对以往成就的深入和突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把这些意见出版为《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转型》。①

另一重要例子是谢丰斋出版的《英国市场发育导论:12—14世纪的“扩张”时期》。②他以西欧封建社会的商品流通领域的运行情况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谢丰斋分析了“长途贸易”论的贡献、局限和受到的批判,梳理了“新人口”论的开拓性及其遭受的质疑,指出了“商业化”学说的贡献和局限。在这个基础上,他具体研究了英国在“末日审判”到“黑死病”之间的不同层次的市场建制问题、农业经济与市场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关系问题。其基本看法是:这一时期英国封建经济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二元经济";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超越近代的较低水平和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性。这一结论把国内学术界关于英国中世纪经济史研究提高到新水平。

(二)社会史研究的细致化

社会史研究一直是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不过,传统上大多从社会形态或者结构中,具体说是从社会基本矛盾为线索去做宏观研究的。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史学特别是年鉴派的输入,中国的世界社会史研究自觉地融入国际史学潮流,走向研究大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史,以下所举即是显例。

朱伟奇长期从事中世纪史的教学与研究,他发现国内学界虽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越来越关注中世纪骑士问题,可是关于骑士精神的整体研究却是缺乏的,而国外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热衷于骑士研究,但是从骑士精神演变角度的研究同样是不够的,因此朱伟奇选定"中世纪骑士精神"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篇学位论文后来公开出版为《中世纪骑士精神》。①他在文中考查了骑士精神的起源与产生,分析了骑士精神与战争、骑士精神与宗教、骑士精神与妇女、骑士精神与文化等问题,使得国内在骑士研究的深入和专门化方面迈进了一步。

再如,陆启宏关于近代早期的巫术与巫术迫害研究。他回顾了西方学者在巫术问题上的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女性主义和功能主义研究,以"巫术迫害"为切入点,从欧洲社会宏观的时代背景中,发掘出巫术及巫术迫害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西欧近代早期在宗教文化、政治版图、社会心理等方面发生的剧烈变革。其成果"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主流史学及其编制出来的历史教科书,而是剔除陈见,另辟蹊径,显示出了与前者迥异而又别开生面的近代早期西欧的历史面貌"。②

还如,夏学花研究作为美国主流文化叛逆的嬉皮士文化运动,也是显例。美国史尤其是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文化史,日益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她却着眼于美国大都市的"嬉皮士"群居村,潜心梳理史料,其研究成果出版为《嬉皮士》。③书中描摹了嬉皮士的生活,分析了其内心世界,追溯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展示其不凡的政治意义。它为读者提供一种考量历史和观察世界的新视野,从一个侧面推进美国

① 朱伟奇:《中世纪骑士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张广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序〈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陆启宏:《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

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专门化。

(三) 政治军事史研究的深入

政治军事史从来都是最受世人关心的话题,历史学界虽然在一些时候表现出不同意见,但是改变不了其在史学中的重头戏的地位。既如此,深入和专门研究在政治军事史研究中尤为重要。以下举例以见一斑。

解光云在其《多维视野下的古典雅典城乡关系》,①从宗教、政治和经济的视野下考查古典雅典的城乡关系,并得出城乡和谐是古典雅典城邦强盛之道的结论。在研究中,他自下而上解构城邦,对于城邦理论作了新的构建;大量运用神话、史诗、戏剧类型的史料,借鉴了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术语和方法,将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完美结合在一起。②他的研究"很有可能动摇一些传统的观点,提出新的见解,进而深化对古典雅典城邦的理解"。③

赵恒的印度核政策研究。印度是南亚头号强国,与巴基斯坦都致力于核研究和试验,研究印度的核问题无论是对于印度历史,还是对于南亚乃至亚洲、全球历史都是一种深入和专门化。其著作《印度核政策的历史分析》,④以历史学思维,以国际政治学中的安全困境、核不扩散等理论,以大量的史实材料,对印度的核政策进行了较为完整和深入的考查。

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⑤完整地探讨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的过程及其前因后果,着重分析了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霍梅尼思想的基本内容、特征本质等,思考了其与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而论述了伊朗的"输出革命"等对外政策的形成与实施,以及伊朗革命与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对当今"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有论者说:此书的创新意义"在于作者能够从尽可能客观叙述的历史内容中抽象出自己的思考所得的'一家之言'。如果说历史研究的价值首先在于提供历史的真实过程,那么其更高层次的价值就在于提供基于原创性的诠释。安全的论文表现出了这种学术追求,他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效"。⑥

---

① 解光云:《多维视野下的古典雅典城乡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李勇等:《古希腊史研究的新突破——评〈多维视域下的古典雅典城乡关系〉》,《安徽史学》2008 年第 3 期。

③ 黄洋点评,见解光云《多维视野下的古典雅典城乡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185 页。

④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⑤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⑥ 余伟民:《序》,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 页。

（四）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进步

这里也只能借希腊化问题研究这一斑以窥整个思想文化研究之豹。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还没有出现有分量的相关研究著作，而且已有的成果一般对希腊化持否定态度；之后希腊化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态度较以前为公允，视野也更为广阔了，出现不少高质量的论著。例如，黄天海的《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思想》，[①]在西方学者研究基础上，从史学的角度，借助哲学，研究了古代犹太人在希腊化时代的心路，深入分析了两河流域文化与希腊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及西方文化的起源。再如，梁工、赵复兴的《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文学研究》，[②]在希腊化时代文化大背景下讨论犹太文学发展史和创作特性。还如，陈恒的《希腊化研究》，[③]考察了希腊化时期的文学与史学、宗教和哲学、艺术与城市建筑、科学与技术、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流，是目前最为系统和全面研究希腊化时期文化的专著。

四、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史研究在发展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主体意识的增强则是不争的事实。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建议开展世界史的研究”[④]或者认为“应当及早开展世界史的研究工作”，[⑤]提出“要重视世界史这门学科”，[⑥]一直到 60 年代、70 年代仍有人这样主张。[⑦]这表明中国学者普遍意识到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可是，应该如何研究或者撰写世界历史则成为关键问题。

（一）学界掀起讨论热潮

最初，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是 50 年代从世界史研究中的概念引起的，日知比较了“古代世界”和“古典世界”的不同，[⑧]雷海宗就一些名词也提出了自己的

---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③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④ 何居：《建议开展世界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53 年 12 月 12 日。

⑤ 朱庆永：《应当及早开展世界史的研究工作》，《光明日报》1959 年 7 月 10 日。

⑥ 杨人楩：《要重视世界史这门学科》，《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10 日。

⑦ 郭圣铭：《加强世界史的研究》，《文汇报》1964 年 2 月 18 日；史军：《读一点世界史》，《红旗》1972 年第 4 期，《人民日报》1972 年 4 月 9 日，《光明日报》1972 年 4 月 8 日。

⑧ 日知：《古代世界与古典世界》，《大公报》1952 年 8 月 14 日。

见解。[①]后来发展到要以怎样的观念研究世界史，世界史研究应以什么为中心，建立怎样的新体系等问题。[②]像杨人楩、齐思和、王觉非等人都提出自己的看法。[③]到了60年代初，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广西师范学院世界史教研组、陕西师大历史系、华南师院历史系世界通史教研组、扬州师院历史系、四川师院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甘肃师大历史系纷纷组织相关问题的讨论。[④]对此，《历史教学》和《新建设》进行了专题报道。[⑤]讨论中的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或者形成不刊之论，因此直到世纪之末有些问题还处在被讨论之中。讨论中出现一些热点问题，现分述如下。

(二) 批判欧洲中心论

学术界最初批判的欧洲中心论。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有学者总结，[⑥]这里需要

① 雷海宗：《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历史教学》1953年第10—12期；雷海宗：《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

② 周谷城：《史学上的全局观念》，《学术月刊》1959年第12期；齐思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世界史方面的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61年3月13日；胡玉堂：《世界史的研究应当为现实斗争服务》，《浙江学刊》1963年第3期；林元汉：《世界史应该以历史发展规律为中心——对世界史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问题的探讨》，《福建日报》1961年4月9日；吴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10日；王春良：《试论世界史应以什么为中心》，《光明日报》1961年5月7日。

③ 何炳然：《杨人楩教授提出有关世界史研究工作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12月7日；齐思和：《关于开展世界史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59年8月14日；王觉非：《关于如何开展对世界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

④ 宋泽生、林加坤：《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讨论如何建立世界通史体系问题》，《河南日报》1961年5月26日；宋泽生、林加坤：《开封师院讨论世界史的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5月16日；鸿临：《广西师范学院世界史教研组讨论建立世界史新体系的问题》，《广西日报》1961年6月7日；振荣：《陕西师大历史系讨论世界史的体系等问题》，《陕西日报》1961年6月13日；关勋夏等：《华南师院历史系世界通史教研组探讨建立世界史新体系问题》，《羊城晚报》1961年7月25日；《扬州师院历史系讨论建立世界史新体系问题》，《文汇报》1961年10月28日；《四川师院、中山大学历史系讨论世界史中心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关于世界史的中心问题——四川师院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热烈开展讨论》，《光明日报》1961年5月7日；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讨论“世界史的中心”问题》，《内蒙古日报》1961年6月9日；甘肃师大历史系：《甘肃师大历史系教师关于世界史体系问题的讨论》，《甘肃日报》1962年2月10日；《甘肃师大讨论世界史体系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6日。

⑤ 《当前世界史讨论的几个问题情况简介》，《历史教学》1961年第8—9期；《史学界探讨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新建设》1961年第2—3期。

⑥ 例如，邹兆辰：《三十年来中国史学思潮及史学发展》，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张广智：《当代中国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舒建军：《“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成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陈志强：《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于沛：《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纂中的“欧洲中心”倾向——兼介绍西方作者对“早期近代世界”的一种诠释》，《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裔昭印：《“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笔谈)——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于沛：《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史学集刊》2001年第2期等。

重新认识。

在60年代初,随着对周谷城《世界史》的评论,出现了批判欧洲中心论的高潮。[①]这一批判导出"欧洲中心论"含义的讨论。按照吴于廑的说法,欧洲中心论者就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一切。在欧洲文明发生以前,所有其他文明都只是它的准备;在它发生以后,全世界的历史又必然受它支配和推动,是它的从属品"。[②]郭圣铭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实质就是殖民主义。[③]到了21世纪,中国学者中,颜善文以为:"'欧洲中心论'实质上就是种族主义,它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解释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甚至要使其他文化都适应西方文明的标准,这是一种霸道的强权主义。"[④]夏继果赞同美国学者罗伯特的看法,认为"欧洲中心论"是普世的种族主义世界观。[⑤]李义中则认为:"'欧洲中心论'亦作'西方中心论',依照其西语形式,二者又分别被称为'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⑥]与此同时,学者们还探讨了"欧洲中心论"的起源问题,如江爱沪讨论"西欧中心"史学思想的源头,关于近代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的思想;[⑦]张广勇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述,这反映在他与张广智合著的《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

(三)讨论世界史的中心

"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出世界有无中心的讨论。60年代,吴于廑就坚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世界中心。[⑧]改革开放后,这一问题得到深入讨论。郭圣铭认为,人

---

① 金兆梓:《关于世界史研究中欧洲中心论偏向——致周谷城同志的一封信》,《文汇报》1961年2月7日;《关于世界史书中欧洲论偏向问题(中山大学讨论在世界史中破除"欧洲中心论"的问题)》,《羊城晚报》1961年4月6日;《史学界讨论世界史中破除"欧洲中心论"问题》,《文汇报》1961年5月19日;司马英:《西南师院历史系古代中世纪史教研组批驳"欧洲中心论"》,《重庆日报》1961年7月11日;朱杰勤:《"欧洲中心说"的反动本质》,《羊城晚报》1961年4月20日;戴裔煊:《关于世界史的欧洲中心问题》,《羊城晚报》1961年4月20日;李淑璧:《"欧洲中心论"与周谷城的奴化史观》,《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3期。

② 吴于廑:《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江汉学报》1964年第7期;吴于廑:《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③ 郭圣铭:《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2页。

④ 颜善文:《文化模式多样化及反欧洲中心论——对〈文化模式〉一书的文化解读》,《学术论坛》2006年第5期,第105页。

⑤ 夏继果:《现代世界起源的非欧洲中心论阐释》,《齐鲁学刊》2007年第6期,第15页。

⑥ 李义中:《"欧洲中心论"与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构建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7年第1期,第105页。

⑦ 江爱沪:《"西欧中心"史学思想探源》,《安徽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⑧ 吴于廑:《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江汉学报》1964年第7期。

类历史的发展是没有“中心”的，他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中提道：“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世界各地的文化发展呈现为多元的，说不上哪个地区是中心。”[①]对于这种观点，不少学者持批评态度。叶洵灶认为：“主张历史无‘中心’的观点，掩盖和降低了处在历史中心地区、国家、民族的作用和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否认典型性国家的存在，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无助于对历史规律性的理解和掌握。同时，对其他地区发展道路的认识也是有妨碍的，不利于对人类历史的认识。”[②]他认为，“中心”应该是某一地区、国家或民族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代表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对周围国家和地区发生着积极的影响，这样的地区、国家或民族应该认为是当时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中心”不能自封，也不能伪造，更不是用表决的方法或暴力的手段来决定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也不能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仅仅是处在世界历史中心地区的国家所创造的。马世力提出：“这种看法既没有反映历史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③]他也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中心”始终是存在的，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和方向的先进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示范作用与地位。“中心”的存在恰恰是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产物与表现形式。只要历史发展还不能消除不平衡性，也就不能没有历史发展的中心。其他学者如李纯武、胡玉堂等均赞同世界历史有中心的观点[④]。

进而，有学者提出要具体分析中心论。例如，丁建弘曾提出：“不要一提到西方的著作就把它贬之为‘欧洲中心论’，如果这种理论是用来宣扬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动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鼓吹欧洲是人类历史的中心、文明的摇篮、进步的源泉；宣扬侵略有理、劫夺有功、强权政治，贬低亚非人民，其政治目的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霸权服务的，像这样的‘欧洲的中心论’因而必须予以批判。”[⑤]

（四）走向“全球史观”

“全球史观”在西方最初是与西方中心观的对立物提出来的，倡导“全球史观”的学者们反对的就是那种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反对

---

① 郭圣铭：《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② 叶洵灶：《对破除“欧洲中心论”，必须作具体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③ 马世力：《也谈“欧洲中心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④ 杭州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法国史研究室：《对多卷本〈世界通史〉体系、主线及中心论的几种意见》，《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

⑤ 杭州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法国史研究室：《对多卷本〈世界通史〉体系、主线及中心论的几种意见》，《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

形形色色的"中心论"或"中心主义"，承认并正确对待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自然形成的不同文明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在研究世界史和反思世界史研究中，特别是在批判"欧洲中心观"中也走向了全球史观。

早在50年代、60年代，周谷城就提出"史学上的全局观念"，①雷海宗以亚欧草原的游牧世界和土著世界为揳入口表达出其全球观念。②吴廷璆追求世界史的新体系，实际上就是服膺全球史观。③

随着批判"欧洲中心论"的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全球史观对于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性。例如，在谈到世界古代史写作时，胡玉堂从全球观角度提出"在每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中，可以按照不同的特征，分为一些大的地区或者是大的单元，如西亚和北非，在大的历史时期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西亚、北非的古代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希腊和罗马和封建社会的欧洲，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④再如，李植枏在全球观下思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说："研究世界现代史必须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全局来考察。只有把握世界的整体发展，才能揭示20世纪历史的进程及其发展趋势。"⑤总之，学者们主张全球史观，正如有论者所言："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日益紧密的整体，需要历史学家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把握世界历史进程，许多学者提出了跨国界的地区研究的范式"。⑥

在这些学者中，特别要提到吴于廑。他在其与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序言》⑦中系统表述了他在全球观念下对于世界史整体的构建，并将这些理论在《世界史》编纂中得到了实施。这部《世界史》，"在编排时采取世界全局的观点。叙述时以文明区域为主，同一文明区域又以核心国家为主。在叙述历史纵向发展时，也注重各个文明区域的横向发展，从而打破了过去按时间顺序逐个叙述各个国家的块状结构。"⑧

---

① 周谷城：《史学上的全局观念》，《学术月刊》1959年第12期；周谷城：《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

② 雷海宗：《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公元前1000—公元570）》，《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

③ 吴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10日。

④ 杭州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法国史研究室：《对多卷本〈世界通史〉体系、主线及中心论的几种意见》，《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

⑤ 李植枏：《世界历史与整体发展》，《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

⑥ 朱晓罕：《加强学科建设创中国学派——"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学术动态》2000年第6期。

⑦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⑧ 叶明勇：《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给我们的启示——评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古代、近代史编）》，《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学者意识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要有自己的主体性，例如，在全球史观问题上，兰岚就指出："我们在研究'全球史观'时，要注意一个'地方化'或'本土化'的问题。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觉地构建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不能因为强调'全球性'，而失去了'民族性'或'时代性'，以致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权。必须注意的是，'全球史观'是一种历史思维，一种历史认识的'方法'，但并非是一种理论基础。"①这一认识难能可贵。

五、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下)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从最初就离不开借鉴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自觉和强烈了。其走势总体上有一个从半封闭到封闭再到打破封闭的过程。

(一) 对于苏联的世界史写作：从推崇到批判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发端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童年时代"向"青年时代"的转变，从"引进西方史学向引进苏联史学的转变，从摄纳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向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转变"。②

是的，通过俄文历史著作的翻译出版，苏联学者来中国讲学、办研究班、在学校课堂上授课，通俄文或学成归国的留苏中国学者通过撰写论著等方式，苏联史学在中国得以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其中，苏联学者的世界史著作的输入"也为数甚多，它涵盖了从古典世界至近现代世界各个时期的作品"。③其中影响最大者当为苏联科学院主编的 13 卷的《世界通史》。这些著作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阶级斗争观点、人民群众的观点直接影响了中国的世界史写作，可以说，中国学者 50 年代、60 年代出版的世界史著作，例如郭圣铭的《世界古代史简编》、童书业的《古代东方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世界古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中山大学戴裔煊《古代世界史纲要》、周吴本《世界通史》等，都是从苏联那里派生出来的，甚至，新时期出版的众多的世界史教材，仍难摆脱苏版《世界通史》的影响。④

---

① 兰岚：《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评述》，《理论前沿》2006 年第 9 期。

② 张广智：《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8 页。

③ 张广智：《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0 页。

④ 钱乘旦：《社会科学的规范化——评世界史教科书的视角》，《中国书评》1995 年第 4 期。

对于苏联学者的成就,中苏友好时期,中国学者极为推崇。尚钺在1955年指出:“苏联的历史科学,与其他部门的科学一样,在近三十年来获得了照耀世界的辉煌成就。……特别是苏联的历史科学家,卓越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法则,灵活地、具体地运用到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民族国家的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现代史的研究中去。”①杨生茂等人在1957年称“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②齐思和等人于1959年说苏联《世界通史》为“历史科学进展的丰碑”。③

可是,到了中苏关系恶化时期,中国学者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例如,关于苏联《世界通史》,1965年出版第6卷汉译本时,《出版说明》有:“苏联科学院编纂的《世界通史》是苏联历史学界经过多年准备集体编写的。他们自诩这部书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书籍中阐明从远古至现代所走路程的第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对于这样的一部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有必要对它进行考查和研究,并且予以评价。”④1975年出版第7卷汉译本,《出版说明》指出:“苏修叛徒集团为适应其反革命政治路线的需要,在本卷中以修正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历史事实作了种种篡改歪曲。”⑤同时,中国学者们不仅指出其在朝鲜和日本史问题上的史料错误,⑥而且批判《世界通史》中的大俄罗斯主义。⑦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能够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待苏联的世界史学术了。例如,钱乘旦一方面批评苏联史学对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教条主义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肯定其“曾经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没有这个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史学科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⑧再如,张广智批评苏联《世界通史》使历史研究更加丧失其科学性与自身特点,而沉溺于僵化模式之中,同时指出它是战后世界史重构工作中的一种出版物,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史家

---

① 尚钺编:《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编者的话”,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页。

② 杨生茂、来新夏:《揭穿雷海宗“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的反动的政治目的》,《南开大学学报》总4期,1957年。

③ 齐思和等:《历史科学进展的丰碑:介绍〈世界通史〉第一卷》,载《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1日。

④ 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中译本)(第6卷),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页。

⑤ 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中译本)(第7卷),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页。

⑥ 金锡亨等:《关于〈世界通史〉(苏联科学院编)有关朝鲜的叙述的错误》,《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李戚周:《日本室町战国时代的农民战争问题——评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在这个问题上的缺点和错误》,《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⑦ 李显荣:《马克思主义,还是大俄罗斯主义?——评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

⑧ 钱承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世界通史观念与体系的作品，一种世界通史编纂的新模式，自然自成一种流派，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编纂的世界通史。①

（二）对于英美世界史研究：从否定到吸收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从总体上看，呈现出‘一边倒’的倾向，即排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入华”，②批判欧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世界史著作。③

可是，慢慢地人们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局限，例如，彩安指出：“我国世界史学界长期以来沿袭苏联的世界史体系，忽视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探讨，缺乏对世界史的全局考察、宏观研究。”④刘远图也说：在世界史的研究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评价一种社会制度、一项方针、一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常用一些套话，有的还贴上阶级的标签。对具体的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没有从宏观的视角加以阐述，缺乏微观的研究。⑤

事实上，在50年代欧美史学家非常推崇全球史观了。例如，巴勒克拉夫提出：“主要以西欧观点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点”，“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⑥他的识见已日益获得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的赞同，虽然在写作实践上时有脱节，但在西方史家中还是出版了一些具有个性特点且视野开阔、卷帙庞大的世界通史著作，如有科恩和瓦尔贾维克主编的10卷本《世界通史》（1952—1961年出版）、曼恩主编的10卷本《世界通史》（1960—1965年出版）以及稍后由斯塔夫里阿诺斯个人撰著的《全球通史》（1988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等。

西方学者的这些主张和实践，对中国学者很有启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学者认为：“世界发展到今天，环顾全球，世界已形成为一个‘地球村落’。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紧密依存的整体。”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学者开始编纂体现全球史观的著作，吴于廑、齐世荣教授主编的《世界史》就是典型。需要说明的是，体现这种新观念的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著作还有很多，不再赘述。

---

① 张广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386页。
② 张广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③ 谢琏造：《评一本美帝的世界历史教科书》，《新建设》1951年第4期。
④ 彩安：《世界史的世界性》，《社会科学评论》1987年第11期。
⑤ 崔志鹰：《1998年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年会综述》，《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
⑥ 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1955年英文版，第27页。
⑦ 周中林：《世界历史：世界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历史》，《世界史》1994年第11期。

可是，在向欧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学习的过程中，出现过分脱离传统的现象。对此，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例如庄锡昌认为当前史学界，“在世界史的研究中，有一种赞美改良、批评革命的倾向”。[①]叶险明也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实不可跨越的。”[②]

（三）积极参与国际史学活动

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家积极谋求在国际史学界能听到中国的声音，从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到举办之，就是先例。1980 年，第 15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中国历史学家组团出席，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比较军事史、历史学方法论、拜占庭史、法国大革命史、大学史、古钱学等问题的研讨。这标志着中国史学界以积极姿态出现在国际史学界，并且中国史学会于 1982 年正式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出席了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通过不断密切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国学者直接、感性地了解了世界史学的潮流、趋势，也让国外学者了解了中国史学（更可喜、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 2015 年 8 月在中国山东济南举办了第 22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此同时，国内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也多了起来。这些活动都表明中国史学家主体意识的增强。

（四）兼而借鉴苏联和西方的学术

中国的世界史学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改革开放后，对于国际学界的世界史研究成果，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里以世界史的分期问题为例加以说明。

世界史分期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史研究的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有些学者就提出来开展讨论。例如，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国大陆学者在上古史和中古史的断限问题上就有不同的看法，[③]在近代史开端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④]直到世纪之末，世界近代史分期问题仍在受到热切

---

① 崔志鹰：《1998 年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年会综述》，《世界历史》1998 年第 5 期。

② 叶险明：《世界史时代与“跨越问题”》，《世界史》1994 年第 4 期。

③ 朱寰：《部分世界历史研究工作者教学者集会长春讨论世界中古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61 年 7 月 5 日；张德生等：《论世界古代史和中古史的断限问题》，《文史哲》1962 年第 3 期；刘明翰等：《关于世界上古史和中世纪史的断限问题——兼与张德生、吴象生、陈正飞等同志商榷》，《文史哲》1963 年第 3 期。

④ 卢文中：《对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史开端的管见》，《光明日报》1954 年 9 月 2 日；杨辉：《近代史第一时期是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呢？还是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呢？》，《历史教学》1954 年第 1 期；韩承文：《世界近代史为什么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而不从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新史学通讯》1956 年第 12 期；肖兰瑞：《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中学历史教学》1958 年第 1 期；张少叔：《对“世界中世纪史应以中国为开端论”的商榷》，《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59 年第 2 期；陈正飞：《世界中世纪史应以中国为开端论》，《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59 年创刊号；畅如：《16 世纪尼德兰革命为什么不能说是近代的开始》，《历史教学》1960 年第 2 期。

关注，但是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①]比较一致的做法是："以那些对世界历史发展有重大意义并导致世界历史出现质变的事件为界，把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彼此衔接但又不同的段落，借以说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阶段性和连续性，以深化人们对漫长历史过程的认识。"[②]

关于整个世界历史分期有两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也是传统的，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依据，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其中，古代史又分为上古史和中古史。上古史以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为主要内容；中古史以封建社会为主要内容；近代史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和发展为主要内容；现代史则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平行发展为主要内容。尽管因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不同而具体时间有所不同。但大体上可概括为：从三四百万年前人类的产生到 15—17 世纪为世界古代史，其中以公元 5 世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上古史和中古史的分界线，标志着西欧奴隶制的结束和封建制的开始。从 15—17 世纪的文艺复兴或地理大发现或英国革命开始到 20 世纪初的十月革命或"一战"结束为近代史的时间断限。从 20 世纪初到现在为世界现代史。或再一分为二，以 1945 年"二战"结束为界分为现代史和当代史。

第二种，是吴于廑、齐世荣对世界历史的分期作了新的尝试，提倡以全人类一体化历史发展过程作为世界历史的分期标准，这种分期方法代表着目前国际史学界的新趋势。持此种观点的历史学家强调以全人类的历史发展作为考察对象，着重研究各个地区、国家、民族和文明类型之间的联系、交流与碰撞，而反对用地区国别历史的拼凑来充当世界历史。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6 卷本)一书中，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世界古代史：自远古有人类以来至公元 1500 年。自有人类以来至公元 5、6 世纪左右的民族大迁徙和它所引起的政治格局的巨变，为上古史；公元 5、6 世纪至公元 1500 年，世界逐渐向连成一体前进，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是中古史。世界近代史：1500 年的地理大发现至 1900 年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世界现代史：1900 年至 20 世纪末。这一分期方法代表着世纪之末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历史分期的最新研究成果。

---

① 例如，王占阳：《世界近代上限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翁有利：《世纪近代史分期分段再研究》，《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3 期；申晓若：《世界近代史开端之管见》，《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1 期；刘波：《对世界近代史分期及阶段特征的再认识》，《史学月刊》1995 年第 2 期。

② 马世力：《世界史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页。

在世界史分期诸多问题中，世界近代史断限和分段问题非常突出，讨论得也颇为热烈。

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问题，史学界存在着不同观点。目前共存在着四种看法：第一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说。这是传统的观点，以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所持的观点为代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确定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不能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产阶级的出现为依据，而是应以带有全局性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事件为标志，英国革命正是这样一个对全世界发生了决定影响的事件。第二是尼德兰革命说。60 年代初，有学者主张以尼德兰革命为开端，这在上文已经提到过。直到 80 年代还有学者坚持这一主张。他们认为，世界近代史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落的历史，确定其开端标准必须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必须发端于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世纪；二是必须选定一个能够集中反映该时代本质和主流的事件；三是必须牢固地树立近代世界为一全局整体的观念。只有把上述三点有机的结合起来，全面地综合考察，才能正确地认识近代世界历史的开端。第三是 19 世纪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15 世纪的下半叶，是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史的转变期，到 16 世纪初，欧洲即正式进入近代史阶段，但直到 18 世纪末，整个世界并未进入近代史阶段，这一时期，实际上只是世界近代史到来的准备期。从 19 世纪初到 19 世纪末，这是世界从前资本主义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完整过渡期，是世界近代史的真正上限。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仍在继续，其资本主义社会也在向上发展之中；另一方面，占世界人口和面积大多数的亚、非、拉各大洲，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时代，因而，整个世界也就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即进入了近代史的历史阶段。第四是 1500 年说。目前史学界大部分学者都持这种观点。1992 年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近代史编）高校教材，以全球从分散到一体化为标准，即 1500 年开始向一体化发展到 1900 年正式形成，把世界近代史界定为 1500 年到 1900 年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取得支配地位的历史。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指出：“世界历史近代与古代分期断限，应该以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经济形态的变化为主要依据。1500 年前后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等，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引起了遍及世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因此 1500 年为世界近代史的上限，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①

① 刘祚昌等：《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关于近代史内部分段问题。大体说来，对以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众家没有异议。但对这两大时期的内部分段，因所持标准不一，看法颇不一致。关于第一时期，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界分两个阶段；第二种意见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爆发为界，分为三个阶段；第三种意见分为两段，但具体分法不同：有的学者主张以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为界，有的主张以1848年革命为界。关于第二时期也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以1905年俄国革命为界，分为两段。另一种意见是以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为界，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阶段。第三种意见以1905年俄国革命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界，分为三个阶段。1984年，主张以尼德兰革命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一学者又提出了两大时期五个阶段说：第一时期分三个阶段，即从尼德兰革命到法国大革命前夕为第一阶段，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为第二阶段，从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到巴黎公社革命和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为第三阶段；第二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到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第二阶段从19世纪末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同观点，跟学者们采取的标准不同有着密切关系。比较传统的观点是按照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突出阶级斗争线索，来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的。但是这种划分方法是有局限的。世界通史的编纂需要以世界为一全局来进行综合安排，可以说是经纬万端。不仅要看到各国、各地区历史纵的发展，又要看出他们各自的来龙去脉；不仅要看到他们纵的发展又要看到他们横的联系，就是他们各自的和总体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他们有时候是相互牵制，有时候又是相辅相成，总之情况是相当复杂。所以用这一划分方法，在实际的过程中有时候可能照顾到了社会发展上的一致性，就照顾不到时间上的一致性。

出于突破这一局限考虑，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采取世界全局的观点，叙述时以文明区域为主，同一文明区域又以核心国家为主。在叙述历史纵向发展时，也注重各个文明区域的横向发展，从而打破了过去按时间顺序逐个叙述各个国家的块状结构，这种编排体例具有新颖独到之处。[①]到了2000年，又有学者提出重新选择标准即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依据，以建立世界近代史新体系，把

---

① 叶明勇：《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给我们的启示——评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古代、近代史编）》，《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世界近代史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工场手工业时期（大约 1500—1800 年）；蒸汽机时期（大约 1800—1870 年）；电气化时期（大约 1870—1914 年前）。[1]这些观点都是见仁见智的结果，相信今后仍然还会继续讨论下去。这一做法显然是既保留了苏联的做法，又吸收了欧美的观点，体现了开阔的学术胸襟。

（五）余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成绩喜人，但是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队伍建设。实际说来，近几十年世界史队伍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分布很不平衡，研究欧美的偏多，非欧美地区特别是作为外语是小语种地区的研究偏少，甚至没有；研究近现代的偏多，研究古代史的成为凤毛麟角。这些情况都是中国世界史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加强资料建设。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资料不足的状况长期存在，这就从根本上束缚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应该说，现在的科技条件和国际环境对于当前搜集资料工作是有利的。有计划、分区域购置乃至翻译外文资料例如《德意志史料集成》，这些原始史料成为世界史学科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同时，外国学者的著作，例如《剑桥非洲史》、《剑桥日本史》等的翻译出版，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突破薄弱环节。中国的国别史区域史研究存在许多不平衡的现象：与中国有历史交往、现实外交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研究成果比较多，反之，则研究成果甚少。如日本、英国、美国、德国等的研究成绩比较显著，而比利时、西班牙等则尚无通史型的专著出版，翻译的著作也比较少，如《比利时史》还只是 1973 年的翻译本（比利时 J.东特著，南京大学外文系法文翻译组译）；《西班牙史》仅法国让·德科拉著，管震湖 2003 年译本等。国别史、区域史研究中的这些不足将来必须要克服的。

第四，拓展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合作。国内学者的通力合作已产生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 13 卷本《中东国家通史》、6 卷本《美国通史》等。国内学者的合作要拓展，以便产生更多的有分量的国别史、区域史学术成果。中国学者与世界各国学者的合作更要拓展，以便推出类似剑桥系列的国别史、区域史学术成果，更可以推出超越剑桥系列的国别史、区域史学术成果。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

① 陈新田：《试论世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

第九章　经验、教训和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史学，有曲折、停滞也有飞跃、发展，有萎缩、萧条也有兴旺、繁荣，有老一辈史学家遭迫害、遭扼杀也有新一代史学家的成长和崛起。如何才能发展？如何才能进一步繁荣？无疑必须总结经验教训。

就整个历史研究领域来说，距离现实最近的历史领域，研究中遭遇的麻烦可能最多（中国自古以来如此，所以形成易代修史的传统），经验教训可能尤为深刻。以下对历史研究经验教训的总结，既鸟瞰中国整个历史研究领域，又特别投射于距离现实最近的历史领域——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国当代史领域。

一、搞好资料建设

历史研究，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认识活动。研究者一般无法直接与前人对话，直接参与前人的活动，而只能依据前人遗留下来的实物和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只能依据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分析研究、论证解释来描述历史、重现历史。即便是当代人研究当代史，因为一个人参与历史的有限性、局限性，也必须依据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分析研究、论证解释来描述历史、重现历史。能不能充分占有历史资料，占有的历史资料价值如何，成为历史研究成果价值如何的关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料无法进行历史研究，资料发生什么样的问题，研究也就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有的学者说“没有史料，没有历史”①，强调了史料的重要。但这样的说法并不全面，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史料也有历史，但没有史料无法研究历史、重现历史，没有史料没有历史研究，这是无疑的。19世纪末以来甲骨、金文的发现，推动先秦史研究发展；汉晋简牍、封泥的发现，推动汉晋史研究发展；敦煌文物的发现，推动隋唐史研究发展；古民族文字资料的发现，推动古民族史研究的发展；清内

① 详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阁档案的发现，推动明清史研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明清经济史资料的挖掘、整理，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出版，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再如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或称“朝鲜战争”）研究等实现突破，就是得益于原共产国际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资料建设对于历史研究意义是无疑的。要进一步繁荣历史研究，资料建设还应加快步伐，至少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更快、更多地整理、出版资料

对于世界史研究来说，更快、更多地整理、翻译、出版资料仍是十分迫切的任务。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来说，考古资料的更快、更多地整理、出版非常需要。对于中国现当代史研究来说更快、更多地整理、出版资料更为迫切，但遇到的问题更多。

1980年以来中国现当代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出版，已有不小进展，但资料的供给仍满足不了需求，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仍落后于研究工作的发展，以致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展。如关于抗战史的资料，田子渝等指出：“史料的收集、考证、整理，与研究深入发展的客观要求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目前已经出版了一些大型的、系列的历史资料集，但缺少反映中共抗战总体情况的大型资料集，中共抗战史料处于片段成集的局面。目前已有的系列资料集涉及中共抗战者最多不过5册，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近千万字的《抗日战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关于中共抗战的内容除敌后战场的材料较详尽外，其他也较有限，远远不能反映中共抗战波澜壮阔的全貌。相比之下，台湾方面在70年代就有上百册的基本资料集和长编性的著述。90年代以后，一方面中共抗战史料整理走向细化，但另一方面，愿意从事艰苦扎实的史料整理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史料的出版越来越难，一些原始史料已经濒临消失的边缘，急需进行抢救性的挖掘和整理。另外，国外也有大量关于中共抗战的档案、回忆等资料。总体而言，我们的了解、掌握、整理和利用还很不充分。为推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应举全国之力，编辑一套内含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各方面，形式包括档案、函电、文件、回忆、报刊等类型，来源包括国内各方面的中文资料和国外的翻译资料，成果形式既有全国的又有地方的，还附有书目题解、资料来源说明等内容，全面、系统、准确、翔实的大型资料丛书使史料集中出版流传下去；并应编辑现行史料书目索引和工

具书，为后来者提供可寻的轨迹”。①这是很好的建议，遗憾的是和者甚寡。不仅抗战史的资料整理、出版需要加快步伐，其他中国现当代各阶段史、各方面的资料整理、出版也需要加快步伐。有学者谈道，日本学者极为重视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甚至许多著名学者也不拒绝这种‘为人作嫁’的基础性工作。日本学者整理的《中国共产党资料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集成》，都是煌煌几十卷、几千页的大部头著作，基本史料几乎囊括无遗。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各种重要会议的文件，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决定和通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的社论和其他评论员文章，中共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亲笔撰写的文章等，甚至连罗章龙、郑超麟、彭述之等人的文章也一并收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料集还在不断补充新发现的材料，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集成》1998 年的最新版本已经收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文件和有关材料②。还应该提及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在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集》10 卷、《毛泽东集补卷》10 卷(含《毛泽东著作年表》一卷)，收集了曾经发表过的 1949 年 10 月以前的毛泽东的文稿，也有一些没有发表过的文稿，并与中国大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作了校勘；在现在来看集中收入的有些文稿，仍是现在中国大陆已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集子中没有的，仍有很高的资料价值。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现当代史的资料搜集、整理、出版有如此的成绩，实在值得中国学者及有关部门反思。

对于中国来说，更快、更多地整理、出版中国现当代史资料，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的。如“文化大革命”资料，大量的档案资料没有整理、出版自不待说，就是当时大量的红卫兵小报、非正式出版物也散见于各地、各单位和个人手中，有的被外国图书馆收藏，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似乎还没有注意过(而外国已大量出版)，这就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又如邓小平研究，关于邓小平前半生的研究，1993 年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出版后，就难有更具分量的著作。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的研究，2000 年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出版后，也难有更具分量的著作。为什么？最主要的也是缺乏资料。有学者指出，关于邓小平领导 1975 年整顿的研究：“收集材料比较细致、发表文章相对多一些的，是工交、军队、教育、文化、中国科学院的整

① 田子渝等主编：《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3—194 页。

② 林晓光：《我在日本学习中共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顿,其他一些重点部门和行业的整顿,还没有专题资料发表。关于党组织的整顿,只有一两篇文章和回忆录。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和会议,如商业整顿、南方十二省会议等,基本上是空白。而在这些方面如不进行填补,就难以揭示1975年全面整顿的全貌。"这里提到的"商业整顿"和"南方十二省会议"是《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没有涉及的,为什么没有涉及?为什么其他著作也没有涉及?显然是缺乏资料,是"材料公布得很不够,存在不少空白点"。所以希望"在条件成熟时,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一本1975年整顿专题资料集,这是深化研究迫切需要的"。[①]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实践和思想的研究,也仍有不少空白。有学者指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酝酿与筹备情况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盲点,……这就给我们研究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次会议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的?会议的议题是怎样确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经过怎样的讨论?邓小平在何时、什么情况下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列入会议的议程,他当时讲了些什么理由?华国锋在开幕会上代表政治局宣布工作重点转移是会议的'中心思想',把这一问题确定为会议的'中心思想'是何时提出来的,是不是邓小平在提出把它作为会议的议程时就已经提出,等等。"又指出,从中央工作会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否召开过会议?召开过多少次?讨论过一些什么问题?有没有争论?怎样争论的?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生平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②]要填补这些空白,显然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整理、出版,需要档案资料的开放。此外,邓小平是何时提出要起草《历史决议》的,现在也没有真正搞清楚,这也需要更多资料的披露,需要档案资料公开后才能解决。[③]到目前为止,已公开出版的邓小平资料,比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资料少得多。又如邓小平生平的最基本资料——邓小平1926年在俄国写的自传、1968年写的《我的自述》,至今没有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没有收入以上两种邓小平自述)。更不用说更多的资料整理、出版了。这无疑影响着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的深入。

就是毛泽东的研究要深入,也需要更多的毛泽东资料整理、出版。毛泽东的资

① 龙平平主编:《邓小平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42页。

② 龙平平主编:《邓小平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73—274页。

③ 龙平平主编:《邓小平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11页。

料在众多领袖的资料中是整理、出版的最多的了，但在毛泽东已经去世 30 多年后，毛泽东的全部资料还没有整理、出版，已整理、出版的只是不多的一部分。如果《毛泽东全集》、《邓小平全集》能早日出版，就一定能推动毛泽东研究、邓小平研究更快地达到科学的境界，一定能大大推进中国现当代史研究。试想，如果资料不全、不真，资料打了折扣，研究怎能不打折扣？

毛泽东、邓小平的资料整理、出版还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他领袖人物，其他非领袖人物的资料，其他各方面的资料，整理、出版要做的工作就可想而知了。没有紧迫感不行，没有危机意识不行。

（二）完善档案开放制度

如果说，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是最重要的资料，那么对中国现当代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资料是档案资料。中国古代史领域大概不存在档案资料开放的问题，留存下来的明清档案资料已全部开放，并陆续整理出版。而中国现当代史档案资料的开放仍是学者们期待解决的大问题。如前面提到的，要使邓小平研究、毛泽东研究等上一个台阶，就需要档案资料的公布。有的学者谈道：研究 1956—1966 年的历史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档案资料公布较少。关于这一段的档案资料，目前所能公开看到的不多。已经公布或披露的，也往往散见于各种文集、资料集或某些来自于权威研究部门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很不系统，很不全面，有些甚至是零星的片段。一些重要会议和高层决策的具体情况，研究者知之不多。这妨碍了对有些问题的深入研究。[①]如“国外有一位知名学者在其很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中，仅据《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幅 1957 年 2 月 27 日最高国务会议的新闻照片中没有刘少奇这一点情况，就推断刘少奇是反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的。过去看此书时，虽不同意这一观点，但找不出反驳它的资料。直到前不久一位日本学者来信探讨这一问题时，我才根据刚出版的《刘少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等书公布的一些资料，基本搞清了 1957 年 2 月到 4 月间刘少奇的大概行踪及他未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的原因，找到了反驳上述观点的根据。由此可见，适当地公布档案资料在澄清谬论方面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②]档案资料对于中国现当代史、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性，是国内外学

---

① 谢春涛：《关于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载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理论纵横谈》，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0 页。

者公认的。

胡乔木曾指示：档案要为历史研究服务。认为档案，“（1）经过一定负责机构提出请求并经过审批；（2）经过严格的登记、保存手续，限定阅读、使用范围，并规定严格的保密制度，是可以并应该借阅的。否则党的重要文件如何编辑，党史如何研究？”“党史上的秘密，经过一定的时间，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减少，这是世界各国档案工作中的共同规律”。①在胡乔木作指示后，“负责机构”，主要是中央机构的高层次、高级别人员可以查阅中央档案馆的档案了，但普通研究人员，甚至包括张静如、张注洪等知名教授，仍难以查阅中央档案馆的档案。②甚至有些档案馆还以中央规定为由，本来可以开放的资料，他们为了自己出版东西赢利，而有意对读者进行信息封锁，即便是可以对读者开放的资料，也是拐弯抹角、手续繁杂。③中国档案资料的开放，远远没有制度化。1949 年 10 月以前的档案资料，民国政府的档案开放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档案则尚未完全开放。这实际上制约了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发展、繁荣。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路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档案资料陆续开放了一点，也整理出版或公布了不少档案资料，这是国内外学者有目共睹的。但总的来说，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无法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并且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被国外学者批评为“文献垄断”和“封锁史料”的现象。有些档案资料，只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一些高级别的研究人员和官员可以查阅，而一般高校、社科院的普通研究人员不能查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等，引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然没有注明出处，一般研究人员无法查阅已被引用的档案资料在引用时是否存在某些问题。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批评了中国的“封锁史料”和“垄断文献”。村田忠禧指出：“在中国确实存在着一部分研究人员可以利用的历史文献一般人（更不用说海外学者）不能利用的现象。如果那是因为史料保存上的技术问题所造成的，也就没有办法了，然而根本不是那个问题，另一部分人却可以利用。”又指出：“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毛泽东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

① 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 页。

② 张静如教授说，他 1980 年曾去中央档案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去了以后就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即看不到什么资料。详见《静如文存》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3 页。

③ 张静如等：《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新视野》2005 年第 2 期。

然而与争论有关的文献却没有公开，我们只能了解到中国学者引用的片断。像这样垄断文献、垄断文献解释权（引用也是一种解释）的研究，按道理说不能算是科学的研究。如果是科学，它应该经得起他人的查证，但我们现在却无法查证史料的引用是否妥当。”“总之，如果史料不公开，要想判断中国学者围绕毛泽东与立三路线关系的争论哪个是正确的，我看很难作出公正的判断。”[①]日本学者的批评，应该说是中肯的，也是值得引起中国有关部门反思的。日本学者是很想多看到一些资料，以提高中国问题研究水平的。外国学者有如此的想法，中国的普通研究人员何尝没有如此的想法呢？

档案资料一部分人可以看到，另一部分人看不到，这首先就影响学科的科学建设。科学的结论，比如自然科学中的科学结论，它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可以进行重复的实验，不能进行重复实验的结论，或进行重复实验得不出同样的结论，便不是科学的结论。对于中国现当代史研究来说同样是这样。如果一些书和文章中引用的资料是他人看不到的，尽管被引用的资料可能是准确的，但至少暂时无法证实它是准确无误的，甚至会引起无法查对原件的研究者怀疑，文字是否无误，内容是否全面还是断章取义。如果被引用的这些他人看不到的资料，并不准确，暂时可能无人来修正，但总有一天会被人修正。如共产国际的档案和前苏联档案公开后，中共建党史、大革命史的某些问题的结论、朝鲜战争某些问题的结论就被修正了。那些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档案的人及整理者，他们不是完美无缺的、全能型的、通才式的专家，他们会受到各种局限，他们在抄录、整理、解释档案时会因为某种局限而出现失误。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64年版中的“我粟谭军在如皋附近，八月二十二日歼敌交通警察部队五千，八月二十六日又歼敌一个旅，八月二十七日又歼敌一个旅”。1991年版修订为：“……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歼敌交通警察部队……”这当是整理者查对了毛泽东写的原稿进行了修订。而毛泽东的原稿是档案资料又无法查阅，于是就不知1991年版的修订正确与否了。幸而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的《纪念毛泽东》画册（198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有毛泽东原稿的照片，标题为“关于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文字与《毛选》本略有不同，其中涉及到的月日为代名，作“未养”、“未感”、“未俭”。“未，地支第八位代“八月”。“养”，韵目代日，代“二十二日”。“感”，韵目代日，代

① 村田忠禧：《中国近年来在毛泽东研究上的成就与问题》，《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一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56—557页。

"二十七日"。"俭",韵目代日,代"二十八日"。这一校勘,证明1991年版的"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中的"八月二十一日"是不符合原文的。1964年版和1991年版的"八月二十六日"、"八月二十七日"均有误,应作"八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这表明档案资料的整理者、引用者是会产生失误的,而这种失误便影响了成果的科学性。如何才能纠正这类失误,保证成果的科学性,那就需要开放资料,使研究者人人都可以查核。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查阅、校勘、研究档案资料,就会纠正更多已被引用、已被整理出版的档案资料的讹误,使成果更科学。日本学者提到的毛泽东与立三路线的关系问题研究的科学性,确实也只有这方面的档案资料完全开放、公布后,才能实现,即才会得出正确的不可移易的结论。

档案资料一部分人能看到,另一部分人看不到,不仅不利于纠正研究中的错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学化,也不利于中国研究走向世界。任何研究领域,如果研究材料少,那么研究的人也就少,研究的材料多,研究的人也就多。为什么中国的中共党史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有不少人会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法律问题、中国文化问题?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共党史专业许多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已超出了党史研究的领域,所写的论文已不像党史论文,使党史论文的选题"面临挑战与变革"。[①]这是为什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资料太少,看不到资料没法研究,不得不转而研究资料丰富的课题。只有中共党史研究的有关档案资料更多开放,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研究中共党史,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来研究中共党史,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研究者来研究中共党史。反之,中国学者、外国学者研究的注意力、兴趣就会越来越少地投向中共党史研究,转而他顾了。可以相信,中国的档案馆开放程度高,就会有更多的国外研究者来中国查阅档案资料,也就会使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史研究更广更深地向全世界扩展。海外的中国现当代史、中共党史研究发展了,会对中国国内的研究发展有促进作用。总而言之,资料条件是研究条件的极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的开拓、扩展有重要的影响,在海外是这样,在中国国内也是这样。

档案资料一部分人能看到,另一部分人看不到,这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中的不平等、不公平的表现。这种不平等、不公平,对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都是不利的,对任何一部分人的研究都是起着限制甚至是抑制的作用的。北京大学的张注洪教授

① 李庆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成立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说过这样的话:“有的材料明明知道在某个单位保存,但因为种种限制,只好放弃利用,最后索性将研究题目也取消了。”[①]这是对档案资料没有充分开放的批评,也是对学术研究中的不平等、不公平的批评。足见档案资料的不充分开放,档案查阅的不平等,不利于学术交流,不利于学术竞争,不利于学术研究发展,不利于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就像法律面前不平等,不利于法制建设,不可能建立法治社会;经济竞争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一样。研究的科学性,有一个基本条件是自由,即自由研究才能实现科学的研究,受到限制的研究就难以成为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所以被称为“科学”,首先,它的任何研究是自由的、无限制的,任何研究领域都是开放的。自由研究会产生研究的自由竞争,研究的自由竞争,是推动研究科学化的有效手段,而这离不开平等、公平的环境。没有平等、公平的环境,就不会有真正的研究的自由竞争,也就难以有真正科学的研究。这在海外是如此,在中国国内也是如此。

就历史档案资料而言,其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被研究、被利用,并被更多的人研究、利用,以造福于社会。如果档案资料不能被研究、利用,就实现不了其价值,既不利于档案资料本身,也不利于研究、不利于社会。而档案资料只有充分开放,才能被充分研究、利用。档案资料开放得少,能看的人少,其被研究、利用自然就少;其开放的多,能看的人多,其被研究、利用自然就多,就会在广度、深度上得到充分的挖掘,研究利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开拓。

如果中国也能尽快建立、完善档案开放制度,使档案开放法制化,为学者查阅档案提供方便,中国现当代史研究无疑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 更好地整理、出版资料

资料的整理出版以求全求真为上,这是衡量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科学性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求全,就是要无遗漏;求真,就是要保持反映本来面貌。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也许并非是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史的各种资料的整理已日益求全、求真,并不断被补遗、修正。但中国现当代史领域的各种资料的整理离求全、求真还有距离。

比如中共中央民主革命时期的文件出版了《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件出版了《选编》,都不是《全集》。毛泽东的文稿,出版了早期文稿及《选集》、《文

---

① 张注洪:《中国现代史论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8 页。

集》、《建国以来文稿》。建党至大革命时期的文稿尚未出版，大革命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稿是《选集》，《建国以来文稿》也不全。《建国以来文稿》的《出版说明》已说明："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①而且可以从有些书和文章引用的建国以来毛泽东的言论中发现有《建国以来文稿》中没有收录的文字。②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文稿大都是《选集》、《文选》，刘少奇、周恩来等《建国以来文稿》刚出版几卷。这表明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出版离"求全"还有很大距离。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不够"全"，研究自然就受到限制，也不可能"全"。国外出版的《毛泽东集》篇目、内容比中国国内出版的多，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即把某些并非毛泽东写的文章，毛泽东只表示同意的文章也作为毛泽东的文稿，如中苏论战的文章、社教运动的文件、"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等③。这种"求全"未免过分，反而走向失实、失真。

整理、出版文献资料，求全的问题是要慢慢解决的，并非一时可以解决的，而求真的问题还是可以，并且应该尽快解决。

求真，保持、反映文献的本来面貌方面，最常见的问题是删节、修改原始文献。比如《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毛泽东文稿，删节、修改的都不少。有些文章只是收入了原文的一部分，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只是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一部分。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了删节、修改，原文是给林彪的一封信。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了很多修改，等等。这就造成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没有保持、反映文献的本来面貌。这种文献整理出版时就形成的局限，自然就迫使研究也会有局限，受到某种限制。《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映了毛泽东 20 世纪 50 年代的思想认识，如果要研究 20 世纪 20 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就应该看毛泽东 1925 年 12 月 1 日发表在《革命》半月刊第 4 期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 20 年代的其他版本。如果以《毛泽东选集》上的《分析》文来研究毛泽东 20 年代的思想，显然得不出准确的结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时，

---

①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卷首。

② 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上册引用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问题致高岗、金日成电（1951 年 6 月 13 日）（第二卷上册第 79 页），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中没收入的。第二卷下册引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 年 6 月 14 日）（第二卷下册第 574 页），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中没收入的。

③ 详见[澳]黑利：《西方毛泽东研究中争论的焦点和存在的问题》，《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 年第 5 期。

提出以《毛选》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正，附以《革命》半月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即同时收入两个版本的《分析》，既尊重了毛泽东后来的修改，又可以了解文献的本来面貌。这个方案得到胡乔木的批准，胡乔木并指示应以原版本为正，以《毛选》本为附。[①]不同版本的同一文献一起收入，这是整理出版文献资料的好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自己的旧作一般不改动，如有改动，也要加以说明。斯大林20世纪初期的一些著作，有些论点是错误的，不成熟的，但在1946年收入《斯大林全集》时，斯大林没有因为40年后觉得不对而加以修改，只是在《作者第一卷序言》中说明："为了理解和恰当地评价这些著作，应该把它们看做一个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因此，这些著作中自然还留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某些后来显得陈旧了的论点的痕迹。这些论点以后被我党纠正了。我指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纲领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问题。"[②]这种尊重历史、不掩饰以往不足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如果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作为历史文献看，那么这些文献首先应该保持、反映本来面貌。中共中央的文献、毛泽东等人的文献，如果作为研究对象、历史文献看，也应首先保持、反映本来面貌。[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时，注意到了保持、反映文献原来面貌的问题。如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原稿（手稿）为（一）、（二）、（三）、（四）、（五），五点，而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时，毛泽东删去了第（四）点，并将原序号"（五）"改为"（四）"。《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编辑时，一方面尊重毛泽东删去第（四）点的意愿，另一方面加了一条注释指出："毛泽东起草的这个电报，原共五点，这一段文字是其中的第五点。一九六〇年出版本卷第一版时，删去了第四点，其原文为：'淮海战役的结果，……六七两月开封睢杞战役就是西兵团与刘邓协力的结果。'"将第（四）点220余字在注释中全文补出。这一补就保持了文献的原来面貌，使研究者可以看

---

① 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260页。

②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卷首。

③ 王贵秀等曾发表《保持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1980年8月22日《人民日报》第5版），提出：编入集子的文字不应该作修改，特别不应该将以后的思想加到以前的文章中去。原文中涉及的人、事、观点都不应改动，如要改动，应加以说明。收入集子的论著等，最好说明依据的版本，注明最初版本及其他版本。已逝世的作者的著作，任何人无权修改、补充。活人发表自己的旧著，也不应修改。如果有新认识应写新著，不能把新思想放进旧著中重新发表。这些意见都是合理的。

到文献的原貌，同时可以体会、研究为什么第(四)点要删去。这种保持文献本来面貌的做法，值得提倡。保持历史文献原貌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应该注意研究和运用。遗憾的是《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并非是所有的文章都有这样的补充。比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仍不提林彪的名字，仍没有将原信的开头部分作注补全，只是题解重新修改了，作："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作这样的说明，对于恢复文献的本来面貌是有益的，但仅仅停留在这个说明上，人们并不能看到这个文献的原貌，如果能将那些地方删改了作详尽的说明，这才完全恢复了文献的原貌。好在《纪念毛泽东》有《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第91幅照片)油印本的第1页照片，是信的开头部分，略可补《毛泽东选集》本反映原貌的不足。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注意保持、反映文献原来面貌，还表现在有些毛泽东文稿中的话已证明是错的，但保持原样，不改动。如《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在驳斥艾奇逊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所谓"极权政府"的诬蔑时说："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这里对铁托政府的指责，显然是错误的。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参加中共"八大"的代表团时曾谈到：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一九四五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有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和你们商量。这是毛泽东向南斯拉夫道歉，实际上就是纠正《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的说法。《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没有删除原文中批评南斯拉夫的话，但增加了一条注释，引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期间对南斯拉夫代表团说的话。这样，一方面保留了毛泽东文稿的原貌，另一方面又在注中提出了对原文的一点修正。这种做法与斯大林尊重历史的做法是一样的，是值得提倡的。

原始文献被修改了，这已不应该，拿已被修改了的原始文献为据再去修改其他

原始文献就更不应该。

删改往往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由于政治上原因而修改原始文献还有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是隐去要回避的人的姓名。比如某人出了问题，于是在一些文献中便以“×××”或“□□□”隐去此人的姓名。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隐去姓名。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收入蔡和森的《论陈独秀主义》其中提到“自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主义，以至鲍罗庭主义。”“谭××”，实即谭平山，大概因为谭平山是民主党派人士，所以想隐去他的名字。再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收入的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一个中文全本，较其他各残缺本自然为优，但遗憾的是其中的一些人名被隐去，代以虚缺号。这样整理，如果在政治上、政策上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学术上、在科学上是不可原谅的。这使文献失去了原来面貌，不利于学术研究，这种做法严格地说，是不科学的。有的不仅隐去姓名，甚至将有关此人的文献删去。荣孟源曾谈到，在编辑《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时，把高岗的讲话都删去了，“那时主观上怕犯错误”。实际上“这样的删节是错误的”。要“接受这一教训，应该坚持实事求是”。①这样的回避做法，给研究制造了麻烦，研究者必须设法去查证被回避了的人名和内容，然后才能进行研究。

在文献整理过程中也有因为技术上的原因修改原始文献的。如由于对原始文献的字、词、句不懂，没理解透或者误认误读，于是认为原文不通，遂将其改通，而这一改，反而错了。比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发行)收入的1934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局、全总执行局关于白区革命工会工作的决定》中，有两处将原稿中的“工反”改为“工友”。一方面“反”与“友”形似，另一方面可能不知“工反”何意，遂改之。实际上“工反”是“工人群众反日会”的简称。至1991年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发行)，已将“工友”改回为“工反”。②又如1934年1月28日《中央、全总执行局致河北省委与全总办事处党团的一封信》原件谈到：“英领事与开滦英矿务司，亲赴省府面于，要求严办工潮首事人，强令工人复工”。有的版本将“面于”改为“面谈”。当不知“面于”何意。实际上“于”，指当时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面于”即面见于学忠。1991年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收入此信时按原件作“面于”。这证明，文献的整理者在整理文献时是会出现失误的。如何才能防止

① 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页。

② 详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第84页。

这些失误出现呢？（纠正失误是需要的，防止失误更重要）这就需要制定一些合理的行之有效的规则和方法。比如专家学者在整理中国古籍文献时曾制定了一些保持古文献原貌的规则和方法，现在已被中国现当代史文献的整理者所采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出版说明》就指出："编入这部文献集的文稿，已经公开发表的，按发表稿排印，没有公开发表的，按手稿或其他原件排印。每篇文稿末尾，均有所据稿本或版本的刊印说明，有的还有不同版本变动情况和选用情况的说明。文稿中的错字、漏字，分别在〈 〉号和〔 〕号内校正，衍字加□号。原稿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原稿没有标点的，由编者加了标点。文稿中史实不准确的，加注释说明"。[①]这里谈到的对错字、漏字、衍字的处理，是首先保持原样，然后再加括号等注出正确的字，指出其错误。这样就避免了原始文献被误改，保证了原始文献保持原貌，这是合理的、科学的整理文献的方法。这个《出版说明》所谈的依据何种版本的问题，似乎还可以做得更科学一些。公开发表的版本，自然是定本，作为整理的第一依据是合理的。但手稿本是最原始的资料，其研究价值不可低估。如果某一文献的手稿本与发表本有差异，可以将两个版本的差异进行校勘和比较研究，藉以研究差异的原因以及思想、理论发展的脉络。这种比较研究的条件就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都能看得到。所以，文献的整理者在某一件文献有手稿本、修改稿本、发表本等多种不同版本的情况下，最好能写一校勘记，将不同版本的差异一一注出、说明。这样就最完整地保持了文献的本来面貌，并使这件文献有了最优最精的版本，同时也使研究者大大获益。

文献整理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如标点问题也不能忽视、小看。在中国古籍文献的整理中标点问题是个大问题，中华书局出版的由专家校点的二十四史等，至今仍因标点的错误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批评。在中国现当代史文献中，出现标点的错误要少得多，但还是存在的。如《毛选》第一版收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一句"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这个《报告》在1927年3月至4月出版的《战士》周报上连载时，此句为"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这两种版本，文字相同，标点不同，意思略有不同，前者无范围限制，后者有范围限制。查《报告》中相同的句子很多，如"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的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说明"地方"当与"农会势盛"相连，成为一个限制词。《毛选》第二版遂改为

①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卷首。

“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这就恢复了文句的原意。又如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献中有一篇1919年5月5日教育部咨文，其中有：“学生约二千人，齐集天安门外，对于青岛外交问题公开演说，继复游行街市，麇聚赵家楼、曹宅地方，纷扰滋事。”这里将“赵家楼”、“曹宅”点断，成为两地。实赵家楼曹宅为一地，两者是从属关系，不能点断。[①]又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有一句“在北伐军未到前五月中，汉口纱厂、烟草工人，已经开始斗争”。查此书40年代的版本亦如此。但此段文字是从张闻天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引来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此句作：“在北伐军未到前，五月中汉口纱厂烟草工人已经开始斗争”（详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24页）。查汉口纱厂、烟草工人的斗争起于5月，并非是北伐军未到前的五个月当中。所以中国人民大学版及40年代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都将标点后移了，应该纠正。足见标点的准确与否，与保持文献的本来面貌也是极有关系的，是不能小看的。

其他如原件的繁体字简化整理后是否准确；原件中是否有特殊的字形，是否有黑体字等；原件的行款，如分段、格式、版式是否维持原样等等，都与保持、反映文献的本来面目有关系，都是要引起重视的。如《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11期发表《新发现的两封何叔衡书信》。何叔衡信的原件是手写繁体字直排，该刊发表时改为简体字横排。格式、版式变通问题还不大，糟糕的是繁体字改简体字，文字讹误达14处，而两封信总共才一千字左右。如原件“圜”（圆），发表稿作“园”（園）。原件“歉仄”，发表稿作“歉疚”。原件“空色相”，发表稿作“空包相”。原件“骨肉之亲”，发表稿作“骨血之亲”等等。遭到了研究者的批评。[②]这表明文献整理过程中有很多环节都会出现失误，决不能掉以轻心，也说明文献整理者的素质提高是刻不容缓的事。

关于整理、出版中国共产党文献资料方面的经验教训，刘建平《历史与政治学视野中的党史文献编纂》（《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9期）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可以参见。

（四）抢救活史料

这不是于中国古代史领域的问题，只是中国近代、现当代史领域的问题。回忆资料、口碑资料、口述资料对于中国现当代史研究来说与档案资料一样是重要的。回忆资料、口碑资料、口述资料可以补文献、档案资料的不足，又可以纠正其错误。

---

① 详见曹喜琛等：《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241页。

② 详见杨通才：《对〈新发现的两封何叔衡书信〉一文的订正》，《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

当然文献、档案资料也可以补回忆、口碑资料、口述资料的不足，纠正其错误。文献、档案资料，易于保存，只要需要，可以设法永久保存。回忆资料、口碑资料、口述资料只有记录下来（或录音、录像）才便于保存，如果不记录下来，就容易消失。记录下来的回忆资料、口碑资料、口述资料可以转化成文献资料、档案资料。记录回忆、口碑、口述资料是很重要的资料工作，也是很迫切的资料工作，即通常所说的抢救活史料、活资料，也是当今已成热门的口述史。重视口述史，即重视抢救活史料。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了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展开了全国规模的抢救活史料工作。一批退休的老同志，有了良好的环境撰写回忆录，使众多的长篇革命回忆录得以出版。其中较重要的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李维汉《回忆与研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等等。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思想文化人物、民主党派人物以及犯过错误、犯过罪的人物都有回忆录出版。这些众多的回忆录的出版，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交口称赞，推动了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不过也应该承认，抢救活史料的工作开展的还不够理想，还应该抓紧做。说不够理想，一是很多重要的中共领导人都没有留下回忆录。如毛泽东，除了曾向斯诺自述青少年时代至红军长征的经历外，其他没有系统的回忆录留下来。当然，这有客观原因，即工作太多太忙，没有空闲的时间。国民党要人李宗仁留下了回忆录，自然与他长期赋闲有关。美国总统有不少写了回忆录，也与他们总要离任、退休，有闲暇时间来撰写回忆录有关。中共的很多重要领导人没有留下系统的回忆录，这是中共党史资料工作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胡乔木写《回忆毛泽东》也动手太晚了，原打算写 40 年代和 50 年代毛泽东的活动，可惜因为患病，40 年代毛泽东的活动还未完成就逝世了，50 年代毛泽东的活动只得缺失了（详后），多么遗憾！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撰写回忆录，这不仅是留下党史国史资料的问题，而且是留下党和国家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造福后世的问题。高层次人物所经历、了解的人和事一般说来比低层次人物所经历、了解的人和事更重要些、更有价值些，高层次人物的回忆录，一般说来比低层次人物的回忆录价值更高，应有更多的高层次人物写回忆录。邓小平希望老同志们写回忆录，说："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那很有益处。"[①]这无疑是邓小平的一个遗愿。二是重大事件的专题回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7 页。

忆资料还太少。有些事件参与的人成千上万，可撰写回忆录的很少，出版的回忆录更少。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后斗争情况的回忆录很少。粉碎“四人帮”斗争的回忆录很少，“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很少，社教运动的回忆录很少，庐山会议的回忆录很少，“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回忆录很少，反右派运动的回忆录很少，镇反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的回忆录很少，合作化运动的回忆录很少，抗美援朝的回忆录也不多，西藏民主改革的回忆录很少，全国各地解放的回忆录不多，民主革命时期重大事件的回忆录就更少些。如大革命时期和中共建党时期的回忆录实在太少，足见抓紧抢救活史料的紧迫性。中共建党、大革命时期的活史料，几乎已无法抢救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活史料也将濒临灭绝。抗战时期的活史料，不抢救也将灭绝。比如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在各地的伤亡人数，再不进行有姓有名的调查，以后就很难调查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史事，如中共“八大”“九大”“十大”，参加过的人已不多，参加过 1959 年庐山会议的人剩下的就更少了，怎能不抓紧做些抢救工作？知道要保护、抢救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就更应知道保护、抢救“濒临灭绝”的党史、国史活史料！

抢救活史料，党和政府有责任，参加过革命实践的同志都有责任。党和政府要积极组织人力物力组织老同志撰写回忆录，组织专业人员采访老同志，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老同志撰写回忆录。老同志应积极认真克服一切困难撰写回忆录，提供回忆资料。

在重视抢救活史料后，接下来就应重视抢救活史料的具体方法。

任何人的记忆都会产生误差，于是回忆也会产生误差。要防止、纠正回忆资料出现的误差，要防止、纠正抢救活史料时出现资料的误差，保证活史料的准确性，就必须重视史料的核实。这是抢救活史料的一个重要方法。

组织一个班子帮助重要人物撰写回忆录，在核实史料方面就容易做深做细，把好关。如薄一波撰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就由中共中央组织了班子帮助薄一波写。薄一波在书的《前言》中说：“我觉得，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去探讨，是我的责任。”“多年来我有一个愿望，想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了解的情况为基础，再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写出一部书来。可是因为工作量大，我又一直抽不出时间，迟迟没有动手。党的‘十三大’后，中央分配我的日常工作有所减轻，这件事才总算提上研究日程。1988 年 4 月，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项工作，当即得到了中央的赞同。在中央和中央党

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关心、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这部书的上卷终于在党诞生 70 周年的前夕同读者见面了。”“可以说，这部书是将个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①从薄一波的说明中，可以看到他对撰写回忆录的重视，也可以看到他对核实资料的重视。这本回忆录的上卷所以能核实大量的档案资料，所以能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就是因为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从而既保证了资料的准确，又保证了完成回忆录的进度。又如胡乔木的《回忆毛泽东》也是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前言》是“本书编写组”写的，其中有：“写成和出版一部回忆毛泽东在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思想和活动的著作，是胡乔木生前未了的心愿。1990 年初，胡乔木开始考虑撰写这样一部著作，并指导几个同志着手写了几个专题。1991 年 9 月，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工作。在这前后，胡乔木就这项工作进行过二十多次谈话。在他指导下，编写组写出 40 年代的大部分专题的初稿，并陆续送他审阅修改。有些初稿经他审阅提意见后又写成修改稿。到 1992 年 4 月，他初审了三篇修改稿（即《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整风运动：1941 年‘九月会议’前后》和《编辑党的历史文献与‘九篇文章’》），表示基本符合要求。以后，由于他病情加重，再也无力过问这项工作。1992 年 9 月 28 日，胡乔木逝世。按照原来的设想出书的条件已经失去。已写出的回忆 40 年代毛泽东的一批文稿，虽按照胡乔木的初步意见作了修改，但修改稿的大部分他都没有看过；他看过的几篇也还不是经他最后审定的文稿。考虑到胡乔木生前回忆毛泽东的多次谈话和在他指导下撰写的专题回忆文稿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经党中央有关方面领导批准，决定将它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名义编辑出版。……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胡乔木二十多次谈话的记录。……这些记录未经他本人审定，但多是根据录音整理，只作了必要的文字修饰。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按胡乔木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的谈话精神撰写的十九篇文稿。在写作这些文稿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档案及其他资料。”②从编写组写的《后记》中还可以了解到，胡乔木还“亲自翻阅和选择历史档案，并为文稿中得以使用一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欣喜”。也可以知道参加胡乔木回忆工作的人员前后有十余人，编写组由龚育之、郑惠、石仲泉负责，而逄先知、金冲及等都审阅过书稿。编写组也对这项工作动手太晚表示遗憾：“原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卷首。

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卷首。

定编写回忆50年代毛主席活动书稿的计划，更是无法实现。这是令人十分痛惜和遗憾的。”①尽管胡乔木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动手太晚，但是还是在写作班子的帮助下初步完成了回忆毛泽东40年代活动的工作。并且由于胡乔木严谨、求实的学风和极高的理论水平，使这部“残缺”的回忆录也很有体系，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作为组织班子撰写的回忆录，还可以提出更高的资料工作要求。如可以编写一些附录。《彭德怀自述》有两个附录：(1)《彭德怀同志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给毛主席的信》；(2)《毛主席与彭德怀同志的谈话（摘录）（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此外，还附了《注释》共85条。这些显然都是与回忆录有关的必不可少的资料，有助于阅读、理解、研究这部回忆录。又如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每一章的后面都有“人物”、“事件”、“文献”，即将本章涉及的人物、事件、文献及本章的参考文献作一目录。这些实际上就是附录。这类的附录是目录式的、提要式的。这些附录，对于阅读、理解、研究这部回忆录也是有帮助的。附录还可以编写很多。如果是某一人物的系统的长篇回忆录，无论是组织班子撰写还是个人撰写，附录人物的生平年表、主要著作目录等，也是必要的。再如还可以编制索引。编制一些人名索引、地名索引、主题索引或事件索引，可以方便阅读、研究。如果再选编些照片，那么资料工作更是锦上添花。这是形象资料，可以与文字资料互相补充。如《彭德怀自述》选编了彭德怀的生平照片11幅，还选编了彭德怀“自述”手稿两页照片。这很有必要，能使这部回忆录增色。应该说选编的照片还少了点，能再多选二三十幅照片更好。《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仅选编了5幅照片，实在太少。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只有一幅作者工作照片，而与回忆录相关的历史照片没有选编，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可以说做好回忆录的资料工作是无止境的，应以精益求精为目标。既要考虑资料的准确性，也要注意资料的全面、完备、丰富性，以及检索、利用的方便等等。

胡乔木、薄一波等人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撰写回忆录有条件组织写作班子，而基层的干部、党员撰写回忆录，就很少会有这样的条件，怎样才能保证回忆资料的准确、质量高呢？这也需要花功夫核实史料。有条件查阅文献资料的，应该查阅文献资料；有条件查阅档案资料的，应该查阅档案资料。还可以与其他当事人一起

①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9页。

回忆，请其他当事人一起核实史料。可以再到实地进行考察、调查。如陈平（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干部），抗战时期曾在冀热辽坚持无人区的斗争，离休以后，他想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于是就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核实工作。一方面是搜集档案文献资料，如中共中央文件、省委文件，还亲自到辽宁省档案馆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搜集敌伪资料。获得了一些有分量的资料，如日军驻冀东司令官铃木启久关于为什么要在长城内侧制造"无人区"的交代等。另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一年中走了25个县，与当年的同事、老乡一起回忆、核查，搞清了很多问题，获得了更多的资料。最后写成《从坚持"无人区"到进军东北》一文，被《党史研究》采用，并获奖。以后又在此文的基础上写成著作——《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填补了抗战时期"无人区"斗争研究的空白。此书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如果没有陈平的努力，后人将不知道抗战时期的"无人区"是怎么回事，没有他的努力，学术界就会缺少一部史料珍贵的回忆、研究专著。陈平撰写回忆录的做法及走的道路，应是个人撰写回忆录的典范。陈平虽已去世，但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思想资料财富，他的一生有了更多的价值和贡献，他和英雄人物一样也将被历史永久地缅怀。

无论是组织班子写或是个人自己写回忆录，最重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决不能虚构史实。不能因为追求生动、追求文采，而把写回忆录当成写小说，虚构情节。对于作假作伪的回忆资料，要注意鉴别。报喜不报忧是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的不良作风，也是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撰写回忆录中的不良风气，是值得引起重视，予以抵制、纠正的。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董狐、司马迁等敢于秉笔直书，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共党史研究者应该比古人做得更好。①

（五）加强、加快信息化建设

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每一项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发展趋势。史学研究的"e"时代（网络时代）已来临。史学研究依据"e"文本，进行"e"考据，已越来越多，并且显示出优越性（详前）。

"e"时代的资料建设，就需要资料的"e"文本化，即数字化、数据库化。这方面的工作已做了一些。

---

① 关于撰写回忆录的各方面问题，王海光《回忆录的写作与当代史的存史》（《理论学刊》2007年第4期），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可以参见。

清华大学已开发出《〈四库全书〉全文网络版》、《〈四部丛刊〉全文检索版》、《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还有《中国期刊网》等。陕西师范大学已开发出《汉籍文献全文电子版检索系统》。浙江大学已开发出《中国近代期刊电子版阅读检索系统》。各图书馆也都有电子资源。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不仅有电子书、电子报刊,还有《古籍特藏》、《数字方志》、《中国学》、《民国文献》、《博士论文》等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1993年建立,2000年1月在互联网上正式开通,已拥有百万余册图书。台湾已有很多数据库,如《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古籍民国全文电子书》、《龙语翰堂典籍数据库》等。但还只是杯水抔土。并非是所有的中国古籍都已数字化、数据库化。近代文献、现代文献、当代文献的数字化、数据库化,档案文献的数字化、数据库化,地方文献数字化、数据库化,已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比如不少国家的档案资料已可以在网上查阅。如不仅在日本国内可以上网查阅档案,甚至在中国上日本档案馆的网站也可以查阅档案(有的要付费)。再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的"张学良档案"等,可以上网查看,这给研究者带来多大的方便。如果中国的档案馆的资料也能上网查阅,研究者能将所需要的资料"一网打尽",那对于研究的推动作用之大将难以想象、难以形容。待中国近现代、当代的全部报刊资料都电子化之时,不仅中国近现代史、当代史研究会有大发展,大概很多学科的研究都会有大发展。

二、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②这也是对史学研究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新价值取向。

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首先要面向人民,历史学科建设应把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作为努力和发展的方向、目标。

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即向人民负责,向未来负责,向世界负责,要经得起人民的检验、未来的检验、世界的检验。历史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它的未来价

① 《中共中央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人民日报》2004年3月21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值、与时效性是成正比的，时效性短的成果其价值就低，时效性长的成果其价值就高。要追求研究成果的时效性，进行研究时就必须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而要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就必须正确认识、处理以下一些问题：

（一）立场问题

立场问题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翦伯赞说："一个史家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处理历史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①这是经验之谈。那么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研究历史呢？

有人主张"价值中立"，换句话说立场中立。这自从马克思·韦伯提出后，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也有不少中国学者主张价值中立、立场中立。如叶昌友说："引入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价值中立论对于史学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②杨凤城谈到中共党史研究也说："作为学术研究，它需要客观、严谨的态度，需要将研究对象充分客体化，持某种意义上的价值中立立场。"③何平说："历史叙事往往是由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操纵的，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民间意识形态，抑或是内化了的史家个人意识形态，都会对历史样态产生裁择、抑扬、变形等诸多影响。……历史叙事尚且如此，历史评价的意识形态印记就更为主观、感性，更易受时代话语左右，当然也更不具稳定性。"④反对意识形态的干扰，实际上也是主张价值中立。但也有学者反对"价值中立"。朱佳木说："绝不能搞什么所谓的'价值中立'，不加区别地提什么'排除来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各种干扰'。境外也有人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无论他们抱什么目的，用什么思想指导，也都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不可能在'选定研究课题'后就'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⑤

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究竟应是怎样的涵义？究竟能不能做到价值中立？

如果有一种价值、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为"中立"，研究者只要采取这种价值、立场，就可以做到价值中立、立场中立，那么做到价值中立、立场中立，或许并不困难。但似乎还没有什么人说有这样的价值、立场。于是只能这样来看，即从逻辑上讲，

---

① 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2期。

② 叶昌友：《略论史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中州学刊》2004年第4期。

③ 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④ 何平：《历史叙事功能的退化与史学危机——兼论历史评价问题》，《探索与争鸣》2005年2期。

⑤ 朱佳木：《当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5期。

不采取这种价值，也不采取那种价值，通俗地说，不采取任何价值，这就是价值中立。换句话说，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也不站在那个立场上，即不站在任何立场上，就是立场中立。但这个简单的逻辑，赞同价值中立的学者、反对价值中立的学者都是否定的。反对价值中立的学者认为价值中立不可能做到，也不存在（见朱佳木说）。赞同价值中立的学者认为排斥任何价值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韦伯主张，社会科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理性活动，必须排除研究者个人的情感好恶，更要避免以自己的价值、体验等主观因素去解释客观对象，而要实事求是地做出事实判断。即在研究自己的对象时，应当遵循客观事实，撇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立场，回避自己的价值观念。但同时，他又认为，价值中立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学研究中完全排斥价值因素。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自然科学有本质区别，社会活动都要由一定的价值来支配。因此，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恰恰必然包括在特定的价值之中，遵循一定的价值观念去解释社会现象。还认为，作因果分析时不应受价值关系的干扰，要对社会现象做出客观的科学考察，在把握意义时则要借助价值关系做主观的理解。[①]实际上承认，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价值的关照、渗透，离不开主观因素。叶昌友赞成价值中立，同时又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研究者，又是参与者。研究者本人不断介入到研究对象中，研究者的情感、意志、价值观念不断渗入到研究对象中。研究者在获取研究对象信息的同时，研究对象也不断对研究者产生影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这种互动的关系，很难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②]。这是从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和机制着手，肯定了研究中存在价值观念、主观因素的渗入。承认在研究中是有价值倾向的，而且坦言自己的价值倾向，即自己研究中的主观因素。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主观的渗入不可避免，如杜维运引述道：恺撒大帝诚然被推倒了，拿破仑诚然遭滑铁卢之败，“但是这些事件发生的正确原因与正确经过究竟如何呢？史学家所见，可能极度分歧”。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总有个人的特色，[③]即总有个人的主见。又说：任何史家在作判断时，不能不有某种观点（肆力客观，避免采用观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往往采用了某种观点而不自知），观点即思想的化身。圣·奥古斯丁以早期基督徒的观点看罗马历史，蒂勒蒙则从 17

① 详见叶昌友：《略论史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中州学刊》2004 年第 4 期。
② 详见叶昌友：《略论史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中州学刊》2004 年第 4 期。
③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5 月版，第 8 页。

世纪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吉本是18世纪英国人的观点，到蒙森又是19世纪德国人的观点了。史学家的叙事，有时无法完全脱离价值判断，涉及解释，则处处是价值判断，所以史学家不能不面对无法避免价值判断（不自觉中不断作价值判断）的现实。[①]

西方历史哲学明确指出，历史学家在历史文本的建构中不可能完全拒斥历史主观性。某种历史叙事结构本身就受认识主体的偏好、兴趣、利益和创造力的影响。弗兰克·安克斯密特专门写了《为历史主观性而辩》。迈克尔·霍华德甚至说“没有偏见就没有著述”。[②]都是说离不开主观因素。[③]

一方面主张价值中立，另一方面又主张价值（主观）关照、价值（主观）倾向，这不是矛盾了吗？有这样的价值关照、价值倾向，没有那样的价值关照、价值倾向，或者说有某一种价值关照、价值倾向，没有另一种价值关照、价值倾向，这能说“中立”吗？大概不能。有主观因素的渗入，还能客观吗？大概很难。

于是有些主张价值中立的学者也不得不否定“价值中立”的存在，而倾向于努力接近“价值中立”。李剑鸣认为：“提倡‘价值中立’，虽然会限制史家评判史实、裁量人物的自由，而且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价值中立’，但如果史家有‘价值中立’的意识，就有可能减少主观投入的分量。”[④]即认为“价值中立”是做不到的，也即不存在的（如果“价值中立”不存在，那么“价值中立”的意识也会变得虚幻了），只能做到“减少主观投入的分量”。

从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和机制来说，从学者的共识来说，纯粹的即纯而又纯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一方面，因为任何社会科学研究或多或少都离不开一定的价值关怀、主观投入（这从研究一开始就显现出来，选这个题目研究，不选那个题目研究，就已经有了主观因素、价值因素）。但“减少主观投入的分量”，比较接近于“价值中立”，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另一方面，既然离不开价值的关怀、主观投入，那就必须讲究价值、主观的本身，必须考虑所奉的价值是否接近中立，所持的主观是否接近客观，必须考虑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主导研究，考虑能不能找到一种比较“中立”的价值、立场。

---

①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74—175页。

② ［荷兰］弗兰克·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下），陈新译，《学术研究》2003年第4期。

③ 历史研究离不开主观因素，还可以参见陈新：《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④ 李剑鸣：《世界史研究的规范化问题刍议》，《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

有没有比较“中立”、客观的价值、立场？有，这就是以人民的价值取向为价值取向，以人民的立场为研究立场。

人民立场、人民价值取向，是比较中立的，是科学的。

人民可以分为抽象的和具体的，抽象的人民可以指全世界人民，可以指历史长河中有人类以来各个社会形态、各个历史时期所有的人民。人民立场可归于共时性、整体性、中立性立场。价值取向、立场，必然涉及利益、思想理论。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代表一部分思想理论，站在一部分人、一部分思想理论的立场上，无论是这一部分人、这一部分思想理论还是那一部分人、那一部分思想理论，自然已无中立、客观可言。而代表人民的利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避免了这一部分人、那一部分人，这一部分思想理论、那一部分思想理论，应该说就是价值中立。当然，这种中立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人民及其立场毕竟是有政治性的。

人民立场所以是科学的，这是因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力量或者说根本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民是永恒的主体。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一切社会发展问题、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立足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有发展规律和方向的，而这个发展规律和方向从本质上说就是人民的活动规律和方向，由人民的利益、意志、活动决定。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来自于实践，真理在实践中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实践是人民的实践。完整地说，真理来自于人民的实践，真理在人民的实践中发展，人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人民是创造真理、发展真理、检验真理的主体。检验真理要站在实践的立场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是检验真理、评判是非，是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体及终裁者。离开人民的实践的立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就会出现偏差，即使能得逞于一时、流行于一时，最终会被人民纠正、被历史纠正。“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①]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必须坚持人民立场。

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克服历史研究的相对主义。1951 年出版过《历史哲学导论》的(英)沃尔什认为，历史真实和历史实在是一种历史判断的结果，尽管它需要证据支持，却不再是以往那种绝对的、不可改变的东西。“如果在我看来

---

①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 年 7 月 2 日第 1 版。

是真实的东西对你来说也是真实的，除非你表明我错了，那么，这只是就我们共有的基本的思维方式并都承认同样的初始资料而言是这样的”。这里提出了历史真理观的主体间性概念，即真实性源自于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认同。但认同若是局限在不同主体各自隶属的小范围内部，相对主义便不可避免。对历史真实而言，不断寻求更大范围的主体间性正是一种克服相对主义的不懈努力[①]。即小范围内的认同，只具有相对的真实性、真理性，要克服相对主义，就必须追求大范围的认同。而全体人民的认同是最大主体间性的认同。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从史实的真实走向史学的真实，实现对历史真理的认识和表现。

站在人民立场上进行历史研究，必须要解决代表谁写历史、为谁写历史、写给谁看的问题。应以人民为中心，代表人民写历史，为人民写历史，写给人民看。而不是代表少数人、某一部分人写历史，不是为少数人、某一部分人写历史，不是写给少数人、某一部分人看。中国人写历史，不应只是代表中国人、写给中国人民看，而应代表全世界人民、写给全世界人民看，即“面向世界”。当代人写历史，不应只是代表当代人、写给当代人看，而应代表子孙万代、写给子孙万代看，即“面向未来”。写历史不能追求让少数人、某一部分人认同、满意，而要追求全体人民（空间上的全体人民、时间上的全体人民）认同、满意。有了这样的价值取向、立场、意识、态度，坚持和宏扬求真、求实、求信、求是的精神就有了基础，研究也就能较为客观、中立。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能无所畏惧，才能解放思想，敢于打破条条框框、冲破种种禁区，填补一个个空白，实现研究的突破、创新。才能拿出学术精品，而且是传世精品。

只有面向人民才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为了面向人民必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只有被人民肯定，才能被未来肯定，被世界肯定。如果被人民否定，也就被未来否定、被世界否定。

（二）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关系

这是个历史学界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从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出发，这个问题要处理好仍需努力。

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当代史研究，是有政治性的，它在现实生活的政治教育、政治宣传中发挥着作用，它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

---

① 陈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东南学术》2003 年第 6 期。

设有巨大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实社会的需要决定了历史研究要为政治、为现实服务。[①]但这个服务是有“度”的，处理不好就走偏，就无法做到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对以下几条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1. 为政治服务不能与为人民服务相矛盾。为某种政治利益服务必须与为人民利益服务相一致。为现实服务不能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相矛盾，为现实服务不是为眼前利益服务，而要为长远利益服务。否则为政治服务的东西会被人民抛弃、被未来否定、被世界否定，其价值就可想而知了。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服务、为两条路线斗争服务的书籍、文章，就是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相矛盾的，最终被否定、抛弃。

2. 除了为政治、为现实服务的选择、路径之外，另外的选择、路径仍然存在，如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有三种类型：文化积累型，学术探索型，服务现实型。[②]这三种类型都各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前两种类型是纯学术研究。如果以为政治、现实服务来否定纯学术研究，认为纯学术研究没有必要，纯学术研究得不到支持，导致学术研究发展不起来，那么学术品格的丧失就是学科独立品格的丧失，这个学科就会消失，也不会有真正的学术界公认的科学性。所以，为政治、现实服务的研究可以支持，同时纯学术的研究也要支持。不能简单、轻率地否定、排斥为政治、现实服务的研究，也不能简单、轻率地否定、排斥纯学术的研究。为政治、现实服务的东西未必都能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而且其存在的时间往往比较短暂，而纯学术的研究也能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而且其存在的时间或能较为长远。

胡绳早就说：“哲学社会科学的有些研究，并不是直接为解决当前问题提供具体对策，然而是必要的”。“我们重视对策的研究，但并不因此轻视基础理论研究。

---

① 有些学者反对史学为政治、为现实服务。顾颉刚认为：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做学问的目的”（顾颉刚：《厦大之孔诞祝典》，《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傅斯年主张史学应超然于政治，反对“致用”。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页）。杜维运认为：“有意的武断与附会，与诈伪同科，足以尽毁历史。”（《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现实是史德的反面。史学家一旦现实，便随世浮沉，历史的真相，即无法暴露。史学家与谏官一样，在基本上是反现实的，或者说是超现实的。”（同上288页）但同时又说：“政治是最现实的，而历史可以资治。”（同上305页）“资治”又是为政治、为现实服务的。

② 参见孙逊：《量化无异于记工分》，《社会科学报》2004年4月15日4版。

实际上，如果没有基础理论研究，也不可能为解决具体问题提出科学的对策”。①这实际上强调了要重视、支持不为现实服务的学术研究。如果像20世纪50—70年代那样只注重史学为现实服务，②无疑会制约史学的发展、繁荣。

3. 为政治服务不能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迟早要被人民否定，被未来否定。为了政治需要随意解释历史、歪曲历史，或者隐瞒历史，甚至伪造历史，把历史变成实用主义的工具，这就走向了反面，走向了伪史学。就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学，最终被人民唾弃。

为政治服务，要为人民拥护的政治服务，不为人民反对的政治服务；为人民大众需要的政治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需要的政治服务；为人民大众的意志、利益服务，不为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利益服务，不为小团体利益服务。否则也会被人民否定、唾弃。

4. 不要把学术观点当成政治观点，不要把学术探讨当成政治问题。即便学术观点错误，也不能当作政治错误来处理。胡绳早就强调：“不能把学术上的错误随意上纲为政治错误。有些社会科学的问题，容易牵涉到政治问题，但即使是这样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当政治问题来处理。”③邓小平也曾强调：“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④

如果硬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让政治来节制、约束学术，学术始终是政治的奴仆，学术无法获得独立、获得解放，学术无独立与自由，学术的智慧就无法发挥，学术创造力就无由启动，学术也就无法发展，也就没有真正的学术、科学的学术。⑤

---

① 胡绳：《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比如，20世纪50年代批判戴家祥介绍学生读当时在台湾的钱穆的历史书，是“引导学生到台湾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详见《文汇报》1957年7月26日第1版报道《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继续集会金仲华揭露右派两面手法》）。这就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把学术见解进行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了。

② 《文汇报》1958年6月25日第2版有一篇报道《依靠群众来写历史：上海史学界确定五年工作规划，着重研究最具现实意义的历史题目》，从报道中可以看到，研究的题目很少，史学谈不上繁荣。

③ 胡绳：《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页。

④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10月第2版，第5页。

⑤ 陈独秀1918年就说：“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为伦理学之附属品。……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见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第5卷1号）这至今发人深省。

再如，有人突破了中央决议的一些结论、观点，作为学术探讨应该允许，而不要视为反对中央的决议，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胡乔木谈党的决议与党史的关系时说："党的历史非常生动，非常丰富。党的实践远不能用一系列的决议来说明。我不是说这些决议没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党的实践经常要超出决议范围很多很多，在决议之外，还有我们党的全体党员，还有我们党所领导的广大革命群众，也包括与我们党密切合作的党外人士的活动。我们党的活动远远超过这些决议。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决议，实际上我们党并没有照那些做。有些决议通过了，而且通过时很认真，但是写一个决议（无论是好的或不好的）是一回事，党的实践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那个决议不符合于当时党的斗争的实际情况，那末，要实现决议提出来的要求，也是非常困难的。有些决议中有很多对于当时形势的评价并不合乎当时的实际，这些评价也有些是出自我们党的历史上很有权威的卓越的领导人。这种例子很多。"①胡乔木所谈的决议，不是指两个"历史决议"，但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也是适用的。比如第一个"历史决议"对于陈独秀的评价，现在看来是存在问题的；对于经验主义（周恩来等）的批评，也是有片面性的。

第二个"历史决议"，也应历史地看。社会在前进，理论在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发展。如胡绳晚年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就三大改造的具体途径来说，是有自己的创造，但就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的样式来说，则是苏联模式。这一选择，如党的十四大所说，是'有它的历史由来'的，'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②胡绳的看法就对第二个"历史决议"有所突破。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是有成就的，而邓小平说是"停滞"的，两者"都是正确的"，是从不同的角度说的。③其实，也可以看作是邓小平的论断是对"历史决议"的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发展，"决议"的结论、观点被突破是正常的。关于如何看待突破两个"历史决议"，林蕴晖《中共党史学必须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5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可以参见。

有的学者强调：要提倡学术、理论创新，就必须：一、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应以政治不干预学术为第一要义。学术研究越活跃，为政治提供的选择余地就越大，并且还可以在做出选择之后因其他理论的评价和批评而及时做出新的选择；

① 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57页。

② 转引自林蕴晖：《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索拾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郭德宏：《关于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地方党史的几个问题》（上），《四川党史》2001年第2期。

二、处理好学者与政治家的关系。政治家应尊重和维护学者的学术自由，因为学者失去了学术自由，政治家也就失去了可供选择的促使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理论；三、处理好研究与宣传的关系。宣传不排斥研究，研究更新着宣传。[①]这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对于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进行政治活动的人及其言论，也应保持警惕。要善于识别、谨慎对待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更要善于识别、严肃对待政治行为和学术行为。而且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

5. *不能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要用学术批评、百家争鸣的方法解决，而不能用政治批判来解决，也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方法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来解决，更不能用剥夺发言权的方法来解决。

在总结20世纪5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经验教训时，陈晋指出：把文化领域当作十分敏感的政治领域，对学术文化成果作绝对的阶级划分，很难公允、客观和全面，并造成普遍的紧张气氛；……轻易地甚至粗暴地对十分复杂的文化学术研究作出政治结论，这些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和繁荣，也不利于人们真正深入地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由于在文化建设上过分追求一个“纯”字，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丢失了不少必要的文化资源，并严重影响到对知识分子在创造先进文化中的突出作用作出充分的估计，最终影响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②]庞松也指出：这一时期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偏差，主要是突出强调过渡时期交织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尖锐对抗，在文学艺术界、社会科学界不切实际地估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对于艺术、学术上的不同流派，包括受到唯心主义影响的思想理论观点，习惯于从阶级斗争的观念出发，强调“我们必须战斗”，彻底予以揭露和批判，而未能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科学工作者，通过自由讨论、自由批评，求得分清是非、匡正纠误的解决。这些偏差，给我国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长期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尤须深刻记取。[③]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不

① 朱宝信：《理论创新：学术智慧和政治环境的关系》，《理论与改革》2003年第2期。

② 陈晋：《毛泽东与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庞松：《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载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仅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而且往往不让被批判的对象说话，并进行政治处理，这样对待学术问题显然是不妥当的，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也造成了一些错案冤案。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问题几乎都成了政治问题，学术问题都用政治方法来解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了。[①]说明中国在政治建设、制度建设上还存在问题，扫除封建专制主义的任务还繁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政治干预学术的事还时有发生。如陈铁健发表关于西路军的文章，曾被责令检查。数年以后西路军的研究才解禁。学术研究要达到科学的境界，就需要自由研究。用政治的方法阻止学术研究，这就会阻碍学术研究的发展，阻碍学术研究达到科学的境界。在学术研究中用政治的方法进行干预、设置禁区，这是与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背道而驰的。

6. 减少感情色彩。学术研究的立场以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为佳，学术研究文章的措词以减少感情色彩为上。减少感情色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减少政治色彩。这个问题在中国现当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中还需要花力气解决。田子渝等在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某些不足时，说：“有的文章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缺乏冷静的理性思考。”[②]如 2000 年出版的郭铁鎗主编《台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评析》谈到台湾学者时说：“第一部分是反共‘学者’，如郭华伦、王健民之流。这些人中有一些根本不是学者，而只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反共人士，与张国焘、龚楚、司马璐等是一路货色。这些人从事的当然也就不是真正的‘中共党史’研究。”[③]又如谈道：“据他们说：‘胡氏（他们把维经斯基译为胡定斯基——笔者注）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催生婆，而中共之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的儿子党一说，其原因当在于此了’。这句话本身就是逻辑混乱或叫语无伦次，没有‘十月怀胎’即使催生婆有天大的本领也不能有‘一朝分娩’；再说，婴儿出世了，怎么‘催生婆’就又成了‘老子’了？神经正常的人能说出这样的‘疯话’吗？”[④]这样的行文就带有感情色彩，不利于平等、和谐地进行讨论，不利于说服人、团结人。行文遣词应中性些，不要带感情色彩，更不要骂人，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中国大陆 50 年代、60 年代的有些文章，感情色彩

---

① 20 世纪 50 年代至 1976 年，一直在说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有的文章题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万岁！”（石西民，《文汇报》1959 年 10 月 3 日第 3 版），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好。

② 田子渝等主编：《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6 页。

③ 郭铁鎗主编：《台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评析》，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 页。

④ 郭铁鎗主编：《台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评析》，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 页。

太浓，火药味太浓，伤了一些人，伤了一些人心，这方面的教训值得记取。

胡乔木曾特别谈道："对蒋介石不能说是'篡夺领导权'，应该说是'夺取'。'篡夺'这个词国民党不能接受。在政治斗争中，蒋介石用各种手段夺权，我们当时搞不过他，不能说他是'篡夺'。"[①]这是强调行文中性的一个很好例子。只有行文中性、感情色彩少的论著，才易于被更多人接受，才易于被未来、被世界接受。

（三）转变思维方式

原来没有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观念，现在要树立之，这不仅面临观念更新，更面临思维方式的更新。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造成了政治生活中的"左"倾，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左"倾，造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宁左勿右"的心态，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极端。社会生活中的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第一、"宁左勿右"的心态，影响了很多人的思维方式，政治第一，唯上、唯本本的思维方式，不仅成为政治领域、政治生活中的主流，也成为社会领域、社会生活的主流，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主流。这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中尤为明显。研究任何问题，首先考虑毛泽东怎么说的，"决议"怎么说的，中央的精神是什么，考虑政治影响如何，然后再判断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照《毛泽东选集》去写没错"，"照'决议'去写没错"，"照中央精神去写没错"，"政治上站得住就行"，此类的口头禅流行。毛泽东批判过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流行起来。只有向本本负责、向上负责的观念，没有向人民负责、向未来负责的观念。只有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没有政治为学术服务的观念。只有政治性第一的观念，没有科学性第一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思维方式下产生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成果和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研究成果（如儒法斗争史研究成果），被批评为不可信是自然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左"倾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还不可能一下子清除。2001年田子渝等谈抗战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时仍指出："有些人受传统的党史教学体系和观念影响，还不大能够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利用史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具体地研究各相关问题，往往习惯于从一些概念化的政治思维的角度看问题"。[②]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是依据可信的史实、史料来说明历史的真相。如果研究仅以某人或某种论断为依据、为出发点，以某人或某种论断代替史料，"以论代史"，这既违

---

① 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② 田子渝等主编：《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反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也经不起史实和历史的检验。这样的研究是无法面向人民、面向未来的。

2001 年，杨凤城指出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时说："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问题的考量与评价，从宏观到微观，基本上均以党的文件和重要领导人的界说为准，连话语都是相同的，讨论也只能在这样一个框架下进行。""先有一个对与错、是与非的价值判断，然后据此去研究，必然会导致许多认识上的盲点。"①龚育之也指出：科学的党史著作，不是以历史决议为出发点作简单的演绎，而是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从中引出合乎实际的历史结论来。②要写出科学的中共党史著作，必须更新观念、更新思维方式，不要唯本本、唯上，要唯史实、唯真。

翁贝尔托·埃科曾指出人类存在"错误认同"：人类"周游、探索世界的同时，总是携带着不少'背景书籍'，他们并非是体力意义上的携带，而是说我们周游世界之前，就有了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它来之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即使在十分奇特的情况下，我们也必然知道我们将发现什么，因为先前读过的书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背景书籍'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无视旅行者实际所见所闻，而将每件事用它自己的语言加以介绍和解释"。而中国现当代史、中共党史研究者同样受"背景书籍"的巨大影响，如果不能摆脱这种影响，将已有结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就会使研究沦为以"论"证"史"的逻辑演绎，甚至会任意想象、歪曲历史，其结果只能是学术性的丧失与政治性的苍白无力。③可以再一次强调，中国现当代史、中共党史研究要发展、要科学化，必须规避"错误认同"、摆脱"背景书籍"的束缚，必须转变观念、转变思维方式。

研究历史，从史实出发还是从经典作家的论断出发？还是从已有的观点、结论出发？应该从史实出发。杨天石说：检验历史判断的唯一标准是历史实际。提出一种新的历史判断时，人们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将这一判断去和某本书、某些既定的看法对照，而是首先应该和历史实际对照。只有坚持这一原则，历史研究才能不断创新，不断揭示出历史真相。④这样的看法，这样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

---

① 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

② 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94 页。

③ 彭祥睿：《论中共党史研究中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5 期。

④ 施宣圆等：《且拨雾霭观丘壑，漫卷风涛入史篇——访中国近代史专家杨天石》，《文汇读书周报》2004 年 2 月 27 日第 5 版。

在“左”倾年代还形成了“贴标签”、走极端的思维方式。这是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第一、“宁左勿右”的必然产物。一个人只要属于无产阶级，那么这个人就是好人，这个人干的事就都是好事。是好人就是无产阶级，就什么都好，完美无缺。一个人只要是属于地主阶级的，或属于资产阶级的，那么这个人就不是好人，这个人干的事就都是坏事，不可能干好事，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是坏人就是彻头彻尾的坏人。一个人只要被批判，即便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么这个人就不是好人，就没有干过好事，就是彻头彻尾的坏人。这种“贴标签”、走极端的思维方式，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相联系的，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相联系的，与政治大批判相联系的思维方式。

“贴标签”、走极端的思维方式，是与实事求是、求信求真求实背离的，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产生的历史研究成果，是没有科学性可言的，是不会被人民接受、认可的。

杨奎松曾谈道：“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并采取双重标准，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说‘好人’，一切都好，即使有严重错误，也要再三肯定动机好；说‘坏人’，一切都坏，即使动机未必不好，也一定要按照‘动机效果统一论’将其动机解释成居心不良。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其党性原则和阶级立场。殊不知，在历史研究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能是越研究离历史真实越远。”①这里批评的就是“贴标签”、走极端的思维方式。

杨天石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谈道：“应屏弃凡进步人物说的都可信，反面人物说的都不可信的思维定势，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检验。”②这里批评的是“贴标签”、走极端思维方式的又一种表现。还有这样的现象，反面人物说的坏话是可信的，说的好话是不可信的。反面人物说的话与已经写上书的话是一致的，是可信的，不一致的是不可信的。似乎历史的可信与否、真实与否，不是由历史事实决定的，倒是由人物的某种性质决定的。这样下去历史真实就不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历史研究也无科学性可言了。

“贴标签”、走极端的思维方式造成历史研究中因人废事、因人废言，把一部分历史真相掩盖起来，也就背离了求真求信，也就断送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这样的思维方式必须清除。而清除“贴标签”、走极端的思维方式还任重道远。

---

① 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② 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思维方式要转变、要更新，更应实现思维方式的创新。思维方式的创新，是观念创新、方法创新的基础，而思维方式创新、观念创新、方法创新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基础。实现思维方式、观念、方法的创新，就能推动学术研究的各方面创新。要实现思维方式的创新，就需要培育起创造型（创新型）、开放型、跳跃式、前瞻性的思维方式，而抛弃经验型、静态型、封闭式、单一化的思维方式，提高思维创新能力；就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用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要求审视自己、完善自己；就要以科学方法、科学态度，以新视野、新高度、新起点，大胆进行探索；就要有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做前人没做过的事的勇气、志气、豪气，而没有因循守旧、顾虑重重、缩手缩脚、徘徊不前、浅尝即止、遇难而退的俗气、老气、腐气，这样就能在学术研究中不断解决新问题、不断创造新成绩，推动学术研究的新发展。

(四) 贯彻落实“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这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针，是有利于历史研究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方针。

“双百”方针是毛泽东时代就倡导的，但那时没有贯彻到底，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把“百家”争鸣压缩为“两家”争鸣，即认为在世界观方面不是什么百家争鸣，而是两家争鸣。又常常把“百花”简单分为“香花”与“毒草”两类。于是只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两家之争，“香花”与“毒草”两类之争，接下去就是批判资产阶级以增强无产阶级的免疫力，铲除“毒草”以肥田（也是一种“贴标签”的思维方式）。结果是学术研究往往只在“一家”范围内展开，自然就没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要把“双百”方针真正贯彻到底，必须正确认识、正确对待“百家”、“百花”。

“百家”，应是各种不同观点的各派、各家，“百家争鸣”应是各种不同观点的各派、各家的争鸣。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儒、法、墨、农、名、兵……的“百家争鸣”，就是不同观点的各派、各家的争鸣。“百家争鸣”，通俗地说就是各种不同观点的各派、各家的文章、书籍争鸣。如果发表一百篇文章、出版一百本书籍，都是同一观点，大概不能算各派、各家的争鸣，不能算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花”的种类更是不计其数，有的花是香的，有的花无味，有的花有异味；有的花是红色的，有的花是紫色的，或蓝色的，或白色的，或黑色的，就是红色也有大红、紫红、粉红、橘

红、淡红、灰红……之分。“百花齐放”就是让所有的花都放，才能有一个真正的欣欣向荣的满园春色。如果只让一种味道的花、一种颜色的花放，不让其他味道、其他颜色的花放，或只让一部分花放，不让另一部分花放，大概就不是“百花齐放”，也不会有满园春色。

要把“双百”方针贯彻到底，真正落实，就应做好以下一些事：

1. 要尊重、提倡学术个性，欢迎有个性色彩、有个性思想的著作。提倡学术创新，标新立异，提倡筚路蓝缕，独辟蹊径。提倡学术勇气、胆识，大胆探索，闯禁区，破禁区。

2. 要提倡、欢迎多样性。没有多样性，没有或缺少矛盾斗争，发展和繁荣就缺少动力；学术、理论、思想的优化选择就缺乏基础。没有多样性就谈不上繁荣。统一性与多样性应同步发展。

3. 创造各派学者、各种观点都受到尊重、地位都平等的民主、宽松的文化环境。你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你必须承认对方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要反对学术特权、学术霸权。反对歧视平民、弱者、小人物。反对各种学术歧视，反对各种政治歧视。

4. 在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规、条例的前提下，既要允许、方便官方的著作出版、流通，也要允许、方便非官方著作出版、流通；既要允许、方便体制内的作者的著作出版、流通，也要允许、方便体制外的作者的著作出版、流通。胡绳曾提出：不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也应该允许。“不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也可能有研究成果，甚至他的成果比马克思主义者的成果的水平还高。”[①]又说：“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学者，也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能够在这个那个问题上提出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②]

5. 活跃学术讨论、学术批评。学术讨论、学术批评是学术界的一种矛盾斗争，也是一种学术界的舆论监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应充分活跃起来。田子渝等谈到抗战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交流和讨论仍然不足。即使在某一问题上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研究者也往往只对自己的观点作正面阐述，缺乏争鸣批评，缺乏公正、客观的活跃的讨论气氛。”[③]胡绳也说：“现在很缺少严肃的学术评论。

---

① 胡绳：《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

② 胡绳：《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8页。

③ 田子渝等主编：《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所谓严肃，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真正有研究、充分地讲道理。”①胡绳提倡的严肃的学术评论，现在确实很少，而不严肃、不正常、不健康的学术批评却不少，如：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产生的高质量的学术批评成果少，缺乏研究深度的泛泛而谈的学术批评成果多。有些著作，甚至是评上奖的著作，明明存在一些或不少问题，如果不深入研究就无法发现问题，无法作出客观的评价。又如说好话多，说不好者少。如同政治领域的报喜不报忧。“新八股文”式的“批评”文章比比皆是，甚至还出现自我表扬式的“学术批评”，即书评文章是由书的作者撰写，请其他人署名发表。还有些书尚未出，尚未上柜台销售，吹捧的文章就先行发表了，自然也是作者起的草。把学术批评变成媒体宣传，类似于作秀，类似于电影等宣传。此类庸俗化现象的发生，有某种经济原因，如想扩大书的销售量，以便增加经济效益。也有某些制度上的原因，比如一本书要评奖，就需要填写“社会影响”，就要说明书评的情况，有的甚至规定要有三篇以上的书评，这样一来，策划宣传、炮制书评、书评滥竽充数，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要清除、杜绝不严肃、不健康的学术批评，需要学者的自律，需要报刊杂志的自律，更需要完善各方面的制度，还应该对学术批评进行监督、批评。此外，学术批评应建立规范，即：一、学术批评以学术为中心；二、学术批评以文本为中心；三、学术批评以批评为中心。②

6. 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小辫子，不给小鞋穿。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乃至70年代，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第一、大批判的影响下，在当时政治形势、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在学术讨论、学术批评中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常常发生，以至80年代、90年代也时有发生，往往就是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看，对不同的学术观点扣政治帽子、打政治棍子。这显然背离了“双百”方针，显然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繁荣。

胡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武器，不是靠权势、靠政治帽子压人，而是靠真正讲道理”。③“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时的‘大批判’，任意上纲上线，随便给别人戴帽子，丝毫不讲道理，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④进行学术讨论、学术批评，不讲道理，讲不出道理，只会扣政治帽子、打政治棍子、以势压人，这是理亏的表

---

① 胡绳：《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449页。

② 详见曹树基：《学术批评的规范》，载《文汇报》1999年3月6日第12版。

③ 胡绳：《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

④ 胡绳：《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3页。

现，是学术上懦弱的表现，而不是强者表现；是没有人会信服的，是经不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的。中国的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学术研究要让人认同，让更多的人接受，就是要有理，要讲道理。对大陆的学者要讲道理，对台湾香港学者、对国外学者更要讲道理。

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可能并不简单、容易，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制度上、法律上、政策上的问题要进一步解决，必须上上下下有更多的人来做“双百”方针的促进派，必须全社会都来做“双百”方针的促进派，都来扫除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障碍，“双百”方针才能真正贯彻落实。

(五) 加快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

多种文化的交流，是推动文化繁荣的强大动力。有交流、互动，才有观念的改变，才有经验教训的互用，才有新的材料、新的思想、理论、方法的互用。有交流、互动，才能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自己的短处。只有对自己的短处、别人的长处有清楚、准确、全面、足够的认识，然后才能取长补短、取长去短(扬长避短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取长补短、取长去短，只有取长补短、取长去短才能扬长避短)。中国唐朝文化的繁荣就与多种文化的交流分不开。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正推动着文化全球化。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建设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已成为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再次强调了要“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这对历史研究也提出了新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的国内外交流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内外学者的互访、著作的互介日益频繁。国外学者在资料、观点、方法、视角等多方面都对中国学者有启发作用，从而鞭策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历史研究中有些禁区被打破，“开放”功不可没。中国的历史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需要进一步学习世界学术界的优秀成果，从世界学术界获得发展的动力，同时，中国历史研究成果也要走向世界，这是很艰巨的任务，要做很多工作。

中国的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史、中共党史研究必须走向世界，这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手段、重要渠道。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任务是很艰巨的。

中国学者出版的书要走向世界还要做很多工作，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要走向

世界也还要做很多工作。如外国的一些中国问题研究刊物是同时用多国文字发行的，如英国的《中国季刊》、俄罗斯的《远东问题》等是用三、四国文字同时发行的。而中国的刊物，如《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等，还没有以多种外国文字发行。显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限制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

中国的历史史研究要走向世界，首先需要了解世界，要了解世界学术界的研究动向、研究成果，从而不落后于世界学术界，落后于世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是无法走向世界的。

因为长期封闭形成的习惯及各方面条件的落后，中国学术界了解世界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还做得不够。比如中国出版的资料、研究成果，外国的学者基本上都会很快了解、掌握，甚至中国尚未出版的资料，外国的学者也能掌握。而外国出版的资料、研究成果，中国学者却没有能很快了解、掌握，以至外国学者掌握的中国尚未出版的资料，中国学者也没有掌握。如王作鑫编的《毛泽东著述编年索引》(新华出版社 2001 年 6 月出版)，居然没有参考(甚至可能不知道)在国际学术界颇负盛名的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1970 年 7 月就由日本北望社开始出版，至 1972 年 2 月 10 卷出齐。1983 年由苍苍社出了修订版)，《毛泽东集补卷》9 卷(1983—1985 年苍苍社出版)，《毛泽东集补卷·别卷·毛泽东著作年表》(1986 年 3 月苍苍社出版，为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的著作年表，与前补卷 9 卷合为 10 卷)，以至《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收入的文稿、《毛泽东著作年表》著录的文稿，有一部分《毛泽东著述编年索引》没著录，中国 2001 年出版的毛泽东文稿编年著作在某些方面还未达到 1986 年日本出版的毛泽东文稿编年著作水平。此外，也没有参考(也可能不知道)竹内实主编(监修)的《毛泽东著作年表(1949—1976)》上、下卷(1980—1981 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也没有将这部年表的研究水平反映出来。而日本的这些毛泽东资料及研究成果，大部分资料来自于中国国内公开发表的资料，少部分来自于台湾、国外的资料。10 多年前、20 多年前国外已经出版的资料、成果，中国的学者没有掌握、没有看到，足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差距。

不仅直接了解外国学术界很不够，就是间接了解外国学术界也很不够。比如有些外国的资料已经译成中文，却没有去关注。姚金果谈到中国大革命史研究时指出：共产国际、联共(布)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档案资料于 1997—1998 年在我国相

继翻译出版已经四五年了,并没有得到广大研究者应有的重视。由于关注学术前沿不够,这几年发表的有关文章中,老生常谈的仍不在少数。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将陈独秀的错误已经改称“右倾机会主义”。但这本书出版已经一年有余,至今仍有人使用“右倾投降主义”来定性陈独秀的错误。再如,新公布的档案资料明确显示,“五月紧急指示”是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并直接发给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至今仍有人称其为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还有,大革命时期莫斯科的决定和指示绝大多数来自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导了中国大革命。但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者仍在共产国际的身上打转转,很少有人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角度来做文章。以敏锐的目光时刻关注档案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发表,以清醒的头脑时刻注意学习和吸取其他研究者的长处,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大革命研究的最新潮流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始终站在学术前沿,为大革命研究不断做出新的贡献。①

如果这样的情况不改变,成果出的不少,可质量低于国际水平,中国的研究成果怎么走向世界?这种低水平“繁荣”,只能令中国学术界羞愧。只有国际水平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才能走向世界。中国的历史研究与世界各国一样需要高水平的繁荣。

中国学者要了解世界,一方面是中国学者个人要提高素质,以便直接时时关注世界学术界的动向;另一方面是中国学术界要做好介绍世界学术界的工作,以便中国学者间接了解世界学术界的动向,而这方面的工作,中国也是做得很不够的。梁怡等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谈到中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工作的不足时指出了几点,其中有:“一、信息了解不够及时和全面”,“二、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追踪评析意识不强”,“三、翻译原著未尽准确”。②郑萍2006年谈到中国对日本的毛泽东研究了解不足时指出:一、未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日本出版的著作、文章了解较少。二、以国内关心的问题为主线去考察相关的日本方面的研究,介绍与我们的观点较相近的观点。比如围绕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和中

---

① 姚金果:《关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载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梁怡等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1页。

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而对国外与我们观点不同的意见介绍不够,这样不利于我们批判地看待国外学者的观点,也丧失了进一步展开交流切磋的机会。三、对日本从事毛泽东研究的重要学者、学术团体、学术活动、刊物等,尽管有一部分介绍,但远不够全面和系统。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对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涉及的年代、内容、范围以及研究人员,尚缺乏整体性把握,这当中也有日本毛泽东研究热减退的原因所致。因此,依据目前的成果来谈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还无法构成横向、纵向的框架,这对于毛泽东研究领域与日本乃至世界的研究接轨,不可说不是一种欠缺。①

又如1980年12月创刊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介绍国外研究1840—1949年10月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在出版27期后于1995年12月停刊。1990年创刊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杂志,在介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信息方面发挥了不少作用,却在1996年第6期出版后停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曾自行编印过《外国史学摘译》,北京大学历史系曾自行编印过《国外史学动态》,都是非正式出版物,也都只"活"几年,就"过世"。《国外中国古代史研究》刊物,《国外世界史研究》刊物,还未见过。此外,江苏省社科院编的《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78年创刊,1989年后停刊。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编的《国外社会科学论文索引》,1979年创刊,1997年后停刊。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编的《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79年创刊,1989年后停刊。江苏省社科院编的《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80年创刊,1998年后停刊。中共中央党校编的《国外社会科学信息》,1988年创刊,1993年后停刊。现在还存在的大概只有《国外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文摘》。但没有公开发行的《国外史学动态》,也没有《国外史学文摘》。

再如《国外出版中国近现代史书目(1949—197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已出版30余年,也没有再出续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已出版20余年,也没有再出续编。《国外研究中国问题书目索引(1977—1978)》(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也没有再出续编。而《国外出版中国古代史书目》、《国外出版世界史研究书目》、《国外出版史学理论研究书目》,还未见过。曾出版过《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

① 郑萍:《近年来日本毛泽东研究状况及中国的了解状况述评》,载《"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扬州大学2006年8月印。

研究述评》(金应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20 多年过去了,没有再出续编。

中国学术界直接了解世界学术界的情况,如中国学者直接到外国去了解,总是有限的。这就使间接了解也成为非常重要和紧迫的,即在中国用中文介绍世界学术界。介绍世界学术界的刊物都应该继续办下去,应该办得更好更多。一个学术大国,没有几份介绍国外社会科学的刊物,不定期出版一些介绍国外社会科学研究动态的书,是不利于学习外国的优秀成果,不利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发展,不利于中国的学术研究面向世界、走向世界。

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展与世界学术界的合作研究。中国与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合作已广泛开展,科学研究的合作已广泛开展,尖端的航天工程也已邀请外国科学家进行合作研究,都取得双赢多赢的结果。世界很多国家的学术界、史学界之间的合作已常态化。如多卷本《剑桥中国史》,就是世界各国史学界合作的优秀成果。但中国大陆史学界与世界史学界的合作,虽已有所开展,但很不够,需要加快开展。史学研究的合作,有利于互相学习长处,有利于达成更多共识、认同。如中国大陆学术界 1996 年立项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 年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但一发表就遭到国际学术界很多知名专家学者的批评。2003 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赴美参加了有关“夏商周断代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会上,海外的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尽管可以亡羊补牢,但如果 1996 年立项时就有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意识,就加强与国外专家学者的交流,吸收国际学术界的一切优秀成果,或者采取中外合作研究的方法,大概就易于提高学术水平、科学水平,易于被国际学术界认同吧。这是不是中国史学界各个领域都应该吸取的一个教训呢?

中国史学要发展,就一定要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这需要中国学者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外语能力,提高使用现代化工具的能力。同时要加强三方面的意识: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意识,研究成果国际化意识,为世界学术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意识。并应该让更多的中国学者走出去,将更多的外国学者请进来、引进来,加快发展中外合作研究。

（六）大众化

历史研究成果要面向人民，要被人民群众认同，首先应该让人民群众喜欢看。这就需要解决学术研究成果的大众化问题。学术研究成果的大众化问题，也是一个通俗化问题、可读性问题。学术价值高的著作，如果可读性差，不能吸引多的人来看，那么它的社会价值就会降低，学术影响也会降低。学术著作增强可读性，是必须重视也是非常紧迫的问题。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 1982 年版），一出版即以极强的可读性风靡大江南北，以致掀起“黄仁宇热”。“黄仁宇现象”似乎在给中国大陆史学界进行启蒙，告诉史学家要走出“象牙塔”，要屏弃高堂讲章式的、经院学究式的八股文章，要走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路。

如何增强学术著作的可读性？至少有以下几条路径：

1. 图文并茂。即配用相关的照片。照片是一种形象性史料，与文字史料相配可以增加一定的感性认识，也可起征信的作用。照片，是文化水平低的人也能看得懂，也喜欢看的。以照片为主的“画史”、“画传”，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在历史著作中多配用一些相关的照片，可读性会大大增加，可信性也会增加。图文并茂已成为历史著作编纂的新潮流。很多学者已高度重视。

历史著作的图文并茂，有几点是应该注意的。一是引用的“图”务必是照片，而不是美术作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活动的照片，是历史的记录，这是历史资料、是史料，可以反映历史现象的真实（当然也有照片被篡改的）。但美术作品只能是艺术资料，不是历史资料，不能反映历史现象的真实。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只有史料才能说明历史真相，应该引用史料来说明历史真相。历史研究的原则，是以史料为依据，而不能以非史料的资料为依据。作为历史研究著作，只应该引用史料，不应该引用非史料的资料。引用非史料的资料、没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不仅不能说明历史真相，也应该是史料工作的失误、历史研究的失误。文艺小说、历史小说采用一些艺术创作的插图，无可非议，展览馆、纪念馆采用一些雕塑作品、美术作品，情有可原，但历史著作引用非史料的美术作品，就背离了历史研究求真求信的基本原则。①二是照片必须有说明的文字，说明要准确、客观、详尽。照片中的人物要准确说明，时间、地点、事件也要准确说明，而且要进行客观的说明。一张没有时间、地

① 关于历史著作应该引用照片不能引用美术作品的问题，可详见周一平：《略谈〈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的价值》（《近代史研究》2008 年 1 期）、《〈彭湃研究丛书〉简评》（《中共党史研究》2008 年 6 期）。

点说明的照片，其资料价值、使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且容易误用，与不知道时间、地点的文字史料容易误用一样。三是采用照片也应注明作者、出处。引用资料注明出处，第一表明有根据，第二便于检验，第三使他人可以同样获得，第四尊重资料创造者、整理者的劳动成果，第五防止伪(假)引、错(误)引。引用文字资料要注明出处，采用照片资料也应注明出处。①

2. 写史事的细节、情节、场景。这可使读者有身临其事之感，引人入胜。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长处即在此。如记述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追悼大会，大多学术著作一般把时间、地点、邓小平致悼词及悼词主要内容交待一下就完了。而程中原等编写的图文版"历史转折三部曲"中"决战"写道：

> 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以下是悼词中的内容)邓小平致悼词时表情凝重，声音低沉悲痛。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②

《决战》对追悼大会进行了细节、场景的描写，对邓小平进行了细节的刻画，感染力一下子就从纸上爆发出来。

历史著作要加强细节、情节、场景描写，很多学者都强调过。胡乔木曾说：历史不仅是简单的记事，而是要像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那样写得脍炙人口。③我们的党史本一定要有科学性，要有科学的分析，科学的论断，要对重要的问题作结论，同时又要有生动的叙事。行文要有悬念，有照应，有精辟的议论、动人的描写，有大开大阖章法。④胡绳谈如何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指出："我们写这本书，要有一些特写，要有点形象。我们的历史著作往往概念化，讲得很笼统，叫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讲科举考试，就说士子们去参加考试，到底科举考试具体是怎么考法，没有说明，读者还以为科举考试和现在考大学一样。倒是外国人

---

① 关于引用照片，必须有说明的文字，必须注明作者、出处的问题，可详见周一平：《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第二编"画传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周一平主编：《中共党史研究90年》第四章第四节"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插图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② 程中原等：《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③ 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④ 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写中国历史注意讲明细节。现在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历史上许多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应当让他们弄清楚。”①他们都强调了要写细节，要有场景描述，要形象化，这不仅是叙述生动需要的，更是讲清楚历史事实需要的。这对于学术著作被人民群众接受、认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细节、场景描写是一种文学手法，可以加强艺术感染力，在文学作品中也是这样，在史学著作中更是这样（当然，史学的细节、场景描写与文学的细节、场景描写有根本的不同，文学的描写是可以虚构的，史学的描写是不可以虚构的）。史学论著中注重细节、场景描写，不仅可增加文学色彩，增强论著的可读性，也有助于披露历史真相，增加学术价值，甚至增加思想理论价值。

3. 注意写众人、写群众。如写解决“四人帮”，有的书只是写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如何决策，如何指挥执行，具体执行人员姓名很少提。而程中原等编写的图文版“历史转折三部曲”中“决战”记述解决“四人帮”，特别将执行人的姓名一一列出：

> 汪东兴同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一起商量，从中央警卫局机关局、处、科级干部和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师、团、营级干部中，挑选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都好又熟悉情况的人员，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执行任务的人员分为五个行动小组，明确分工：第一行动小组解决王洪文，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第二行动小组解决张春桥，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第三行动小组解决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第四行动小组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第五行动小组解决毛远新，组长李连庆。现场警戒为：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参加行动的其他人员有：黄昌泰（8341部队副参谋长）、廉洁（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孙洪起、孙振发（服务科正、副科长），曹志秀、李合（交通科正、副科长），还有六位司机：史友令、俞桂兴、尚占良、王明臣、吴增彬、张中臣。②……布置就绪以后，行动小组的人员就在怀仁堂大礼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准备。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以及在车上应急用的速射武器，有的在活动腿脚，熟悉擒拿、解脱的动作。汪东兴巡视检查一番，鼓励突击队员们

① 胡绳：《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② 程中原等：《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

> 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只能取胜，不能失误。党中央的决心要靠你们去实现，千斤重担落在你们的肩上。大家齐声回答：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①]

这样的记述，使每一个执行任务的人现于史册，突出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党中央的决心要靠你们去实现，千斤重担落在你们的肩上”一句，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解决“四人帮”归根结蒂要依靠群众。以上也是记述细节，这不仅有助于披露历史真相，增加学术价值，也增加了思想理论价值。写人民群众的历史，自然就与人民群众距离近，人民群众自然喜欢看。

要受人民群众的欢迎，还应写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事，写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写人民群众想知道的真相。这一点，陈金龙《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大众化的路径选择——以〈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9—2005）〉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略有论述，可以参见。

4. 文采飞扬。同样记一件事，文字生动与不生动，有文采与没有文采，其感染力、吸引力大相径庭。程中原等编写的图文版“历史转折三部曲”在行文的生动、文采方面下了工夫。如“前奏”写“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的情况：

>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反击”的旋风把整个中国搅得周天寒彻。邓小平部署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整顿带来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复苏、好转和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人们刚刚升腾起来的希望，被困惑、迷惘所取代。“四人帮”妖雾重来，邓小平再次挨批，周总理又病重垂危，中国将怎么办？1976年元旦，尽管广播喇叭中响彻着“到处莺歌燕舞”的豪迈诗句，却无法驱散全国人民心头的惨雾愁云。[②]

以上这些生动的文字，准确的形容，形象的比喻，适当的联想，读之兴趣盎然。

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即道出了没有文采的作品是不会有吸引力、无法传世的。

三、发扬创新精神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

---

① 程中原等：《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② 程中原等：《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301页。

葆生机的源泉。”[①]把这意思引申到学术研究、历史研究，那也可以说，创新是学术研究、历史研究的灵魂，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创新，再创新”，[②]提倡“原始性创新”，[③]这对于学术研究、历史研究同样有意义。中国大陆的历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了大发展，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问世了一大批有新意的，即有创新的论文、著作。正是这些创新的论文、著作反映了较高的研究水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一经验表明，只有不断创新，历史研究才能不断发展；只有不断拿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历史研究才能不断繁荣。而不能创新，历史研究就不能发展。没有新意的研究成果，重复劳动的成果，是没有价值的，是会影响历史研究发展、繁荣的。

何谓创新？即创造原初的新知。创新的特征是独特性、求异性、跳跃性，有原创性。什么是原创性？一是首创性、第一性、唯一性。从学术研究、历史研究来说，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课题，写从来没有人写过的书和文章，这样的成果有原创性。反之，重复劳动，就没有原创性。在一个省市有第一性、唯一性，在国内没有第一性、唯一性；在国内有第一性、唯一性，在国际上没有第一性、唯一性，都非原创性。二是创作性，非引述性、解释性。不受他人影响，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研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产生的第一性研究成果，有原创性。对他人的成果进行研究、引述、解释，都非原创性。

历史研究如何创新？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创造新理论、运用新理论；发明新方法、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发现、使用新资料；构建新体系；采取新视角；提出新观点；研究、解决新问题等。大凡以上诸“新”，具备其一，就是有新意、有创新、有学术价值。如果一“新”也不具备，就没有新意、没有创新、没有学术价值。

(一) 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④]政治上不能实现理论创新，一个党、一个国家就会失去活力，就会停滞不前，以致不进则退。学术上不能实现理论创新，一个学科、一个领域就会失去活力，就会停滞不前，以致不进则退。增强历史

---

①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

②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④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研究的活力，很需要实现理论创新。政治上提倡理论创新，学术上也要提倡理论创新。在历史研究中进行理论创新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提出突破前人的理论，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理论，即进行理论的原创。这是高层次的理论创新，应大力提倡。但这方面的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在做，应该是今后追求的目标。在历史研究中，理论描述比现象描述更能反映历史的本质，更能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既是现象描述的发展过程，更是理论描述发展过程。而理论的科学与否决定理论描述的准确性。理论描述是否科学，需要探索，需要理论创新。而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中国现当代史领域，更需要解放思想，弘扬创新精神。

二是运用新理论。运用他人提出的新理论、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研究历史，即运用历史研究中尚未运用过的理论进行研究。尽管这是中层次的理论创新，但这对历史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仍然值得提倡。如有人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用武力合法性权威、个人魅力合法性权威、意识形态合法性权威向法理合法性、政绩合法性转变的理论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如美国学者裴宜理（E.J.Perry，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完全利用中国出版的资料，而用政治学理论，从国家民兵在国家中的地位的角度研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进行各国的比较研究，给人耳目一新（详见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海光认为，麦克法夸尔“铁三角”理论（一边是政府，一边是意识形态，底边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法律和强权部门）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中是可以借鉴的[①]。但总的来说，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只是刚刚开始，还应该用更多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如社会学理论、[②]法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等等。应该鼓励多学科的、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如有的学者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科业社会（工业社会必然走向科学

① 王海光：《他山之石的启示：关于中国治史理路的再认识——兼评麦克法夸尔的“铁三角”理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1期。

② 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中，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从“社会怨恨释放”出发，通过“政党伦理化”“政党伦理国家化”等分析范畴，研究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响应。

研究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科业社会)。①执政党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中应如何有所作为？中国现当代史的发展与这一社会发展趋势的关系如何？这显然是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三是进行新的理论分析,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即进行前人没有进行过的理论分析,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理论观点。这是低层次的理论创新,这对历史研究也是有推动作用的,也是值得提倡的。这方面的工作不断有人做,但有影响的成果并不多,应该继续加强,实现新的突破。

(二) 方法创新

方法创新是实现历史研究创新的重要手段。即便理论没有新意、资料没有新意,而使用了新方法,也能实现研究的新突破,也有新价值。方法创新的类型:

一是创造新的研究方法或叙述方法、编纂方法,进行方法的原创。这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研究中产生过,如司马迁创五体合一的纪传体,袁枢创纪事本末体,而近现代以来,中国很少有史学方法的新创造,章节体是从外国学来的,只是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文献与地下出土实物互证)还有点新意。在最近数十年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研究方法的创新,这对于历史研究的发展、繁荣是不利的。创造新的研究方法或叙述方法、编纂方法,这应该有人去做,应大力提倡。

二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或叙述方法、编纂方法。如运用他人新创造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即运用历史研究中尚未运用过的方法进行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史学危机"引发的方法论大讨论、大探索后,一些其他学科的方法开始被介绍到历史学界,并开始尝试运用。如系统论、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计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心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等等,相继被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产生了一些成果。如金观涛等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1994 年版),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尽管书中的观点有可商榷之处,但运用了新方法。但总的看来,用新方法研究历史的成果并不多,尤其在中国现当代史、中共党史领域。1989 年,张静如等曾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党史研究要积极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中的有用部分,但很多党史研究者对此很陌生,几乎可以说缺乏常识。有的人居然不知道社会

① 详见刘吉:《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解放日报》2003 年 9 月 5 日第 11 版。

学、社会心理学中的角色理论是什么意思，甚至认为硕士研究生用它说明党史中的某些问题是歪门邪道。文章希望大家多看点介绍现代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书，补补课。[①]过了20年，柳建辉2009年发表的文章谈道：国内的党史研究在引入新方法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与国外的党史研究相比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其一，应用新方法的力度不够。多年来，介绍新方法的文章不断涌现，但在实际研究中并没有太多的人采用，大多仅停留在评介上，研究者还缺少自觉应用新方法进行研究的意识。[②]希望学者们的意见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开辟新领域

新领域的开辟是研究新突破、新发展的重要方面。开辟新领域的著作，往往是原创性的著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开辟新的领域，可以是开辟一个新学科。可以是一个学科中开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范围。比如"中国创新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政府史"、"中国灾难史"、"中国环境史"、"中国知识分子史"、"中国秘密社会史"、"中国城镇史"、"中国家庭史"、"中国性史"、"中国节日史"、"中国筷子史"等等，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有所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这些新领域的开辟，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繁荣。

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在很长时期里偏重于政治方面、军事方面的研究，这就给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喻权域曾谈道："这几年我研究人权，发现当年中央苏区颁布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婚姻法》在尊重人权、维护人权方面非常先进，规定得非常细。不仅30年代西方的国家法律没达到中央苏区的法律水平，就是到90年代，西方的许多国家也还没达到。可是，我国出版的党史著作对此不着一字。我在中、加两国联合举办的人权学术会议上拿出来，加拿大学者大吃一惊，说是从来没听说过，你们中国也没宣传过"。"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都颁布了《人权保障条例》，现已收集到13个。那些条例很先进，订得很细，而我们的党史著作中也一字未载"。而这对有些文章所说的"我们缺乏民主、人权的传统"是很好的驳斥。[③]尽管以后有郭晓平《论新民主主义人权观》（《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等文发表，但实际

① 张静如等：《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② 柳建辉：《党校系统党史学科发展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1期。
③ 喻权域：《中共党史的主体应该是什么？》，《当代思潮》1998年第2期。

上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权观、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权观及其比较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观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人权观的比较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观与资产阶级政党人权观的比较研究,仍然是一个有待全面开辟的新领域。

谢春涛谈“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史研究的努力方向时强调: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对于过去注意不够、但又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些研究领域,应加大研究力度。如这一段的社会变迁、体制沿革、思潮流变等,就很值得研究。而一些过去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得比较多的课题,也有必要从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新的角度加以审视,或许能够使我们打开一片新的天地。①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2005年又出版了《21世纪100个交叉科学难题》。历史学科也应该出这样的书,提出一些待研究的领域、课题。这必将加快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开辟,必将有利于历史学科的大发展。

(四)运用新资料

历史研究与资料的关系前已论及。发现、运用新资料,是历史研究新突破的基础。如1975年湖北云梦县城关睡虎地发现秦简1 100多枚,为墓主所抄录的文件等,其中有秦律。21世纪初湖南又发现2万余枚秦简,这都大大推动了秦史的研究进展。发现、搜集新资料,是历史研究成功的重要经验,是实现历史研究新突破的重要路径。必须克服轻视史料、不屑“坐冷板凳”的观点。

什么是新资料?一般来说是没有发表过的资料,没有被使用过的资料。历史研究的新资料大概有以下几个部分:一、没有发表过的档案资料,包括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国家档案及私家收藏的私人档案;二、自己或他人调查研究所得的没有发表过的资料;三、已发表过的但尚未被研究、采用过的原始资料,如报刊资料、回忆资料、统计资料等;四、已整理出版的但尚未被研究、采用过的档案资料;五、没有发表过的图片资料;六、已发表过的但尚未被研究、采用过的原始图片资料;七、考古新发现,新发现的实物资料。同时,不仅要关注中国大陆包括港台的各类新资料,也要关注国外的各类新资料。

搜集新资料应就地开始,由近及远。不重视当地地方资料的搜集,实在是一个搜集资料进行研究的误区。杨奎松在2002年批评:地方各省编纂的一系列革命历

---

① 谢春涛:《关于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载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史档案资料汇编，现在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很少去用[①]。这是值得深刻反省的。

实地调查也是很重要的。应提倡研究当地的历史，在当地做调查研究，"就地取材"，解决一些历史问题，这同样是有价值的。如咸宁师专丁一，就对发生在汀泗桥、咸宁的战争进行了实地勘察，画了地图，写出《北伐战争在咸宁》(《咸宁师专学报》1986 年第 1 期)等文，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说法，为历史研究作出了贡献。而现在有的人不屑研究家门口的史事、历史人物，不愿在家门口先做些调查研究工作，对家门口档案馆的资料不闻不问，这是缺乏务实精神的，是难以在研究中取得成绩的。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的是资料真伪鉴别。一本历史著作有没有资料价值，既要看资料丰富与否、看资料量，更要看质，即资料信、新与否。"新"是历史资料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最重要的价值是"信"。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原则是求信求真。求信求真，首先是要求资料之信和真。只有资料可靠、可信，研究成果才会可信，才具有科学性，反之就失信、失真，就没有科学性。

如王明《中共 50 年》叙述很多事，都是造谣。书中说毛泽东把潘汉年、胡均鹤抓起来处决了。[②]实际上，潘汉年于 1955 年 4 月被捕后，到 1975 年 5 月被送到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安置，夫妻团聚，一直活着。1977 年 3 月 24 日因病被送到长沙治疗。1977 年 4 月 14 日因病去世。1979 年 2 月 24 日夫人董慧因病去世。[③]胡均鹤 1954 年 9 月被捕，1982 年潘汉年冤案平反，1983 年胡均鹤保外就医。1984 年公安部对他的问题作了结论：已交待的历史罪行，既往不咎；1941 年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后对革命所做的一切给予肯定，宣布无罪释放。上海市公安局给他享受离休干部待遇。1993 年 3 月去世。[④]可见王明在造谣。这就提醒研究者，不是所有的文献资料都是可信的，必须认真鉴别。在政治上，在生活中，要切忌受骗上当、误入陷阱、误入歧途，在学术研究中也要切忌受骗上当、误入陷阱、误入歧途。[⑤]

---

① 李庆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成立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

② 王明：《中共 50 年》，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0 页。

③ 武在平：《潘汉年的最后岁月》，《湖南党史》1997 年第 4 期。

④ 王勇：《从叛变投敌到迷途知返——胡均鹤的曲折人生》，《党史文汇》1998 年第 6 期。

⑤ 关于搜集、运用新资料问题，沈传亮：《史料运用与中共党史研究创新》(《北京党史》2002 年第 2 期)，可以参见。

(五) 构筑新体系

构筑新体系是任何研究实现新突破的重要手段,历史研究如此,其他研究也如此。而构筑新体系往往与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资料新发现等相联系,也与新学派的产生相联系。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体系的变化、发展很清晰。在帝王崇拜思想的指导下、在英雄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是以帝王为中心的等级分明的纪传体体系。这个体系被梁启超批判为"帝王家谱"。[①]1904 年,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形成了以章节体写的中国历史书新体系,但并未摆脱英雄史观及王朝循环论。至 1930 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4 年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6 年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41 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3 年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等问世,构筑了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指导的新的中国古代历史体系。这一新的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逐渐形成古史分期的不同学派,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古史分期体系。如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也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有的主张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高潮"说(胡绳等),有的主张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三个阶梯"说(李时岳等)。这些主张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到 20 世纪末,胡绳开始主张以现代化为线索写中国近代史(1840—1949),得到不少学者赞同(如王旭东等《以现代化为主线略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 3 期)。这些新体系的构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都起了推动作用。近年来有学者主张,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②]主张"建构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研究范式"。[③]这些新体系的设想是有价值的,但关键是付诸实施,拿出学术界、人民群众认可的成果。在理论上提出一些新体系的设想,也许并不难,难就难在将新体系付诸实施,写出新体系的历史书。

(六) 观点新

提出新观点或者说新看法、新见解,是任何研究发展的标志之一,历史研究也是如此。从历史研究来说,提出新观点至少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宏观上、理论上

① 详见周一平:《论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形成》,《华东师大学报》1995 年第 5 期。

② 沈传亮:《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趋向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 年第 2 期。

③ 韦磊:《美国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 年第 1 期。

（可以是史学理论、可以是历史理论）提出新观点，这是高层次的；二是就某个具体历史问题（可以是历史事件、可以是历史人物或其他问题）提出新观点，这是低层次的。无论提出什么样层次的新观点都是有价值的，都能推动研究的发展。一般来说，采用了新资料往往可以提出新观点，提出或运用新理论、创造或运用新方法往往也可以提出新观点。

张宪文《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 4 期），提出十四年抗日战争是一个整体过程，不能只讲八年抗战。提出研究抗日战争必须以民族意识、民族大义作为思考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能简单的以政党观念、阶级意识来认识一切。这是从历史理论方面提出了新观点。

高正礼《"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之刍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6 期），提出："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同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既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也是'文化大革命'合法化的标志。"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说"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费解。这是就一些具体历史问题提出了新观点。

杨天石治史格言：没有新资料的论文不写，没有新见解的论文不写①。这是值得提倡的。

如何才能提出新观点？一是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新资料；二是解放思想，不要被前人观点、传统观点束缚；三是要独立地潜心研究，通俗地说是"钻进去"。有人认为能依据寻常的旧资料提出新观点是治史的更高境界②。即不用新理论、新方法、新资料，而能提出新观点，就像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这是人人习以为常的事，而从中发现万有引力，这确实达到了科学研究的杰出境界。这就是"钻进去"，甚至是钻牛角尖。提出新观点需要有问题意识、怀疑精神、研究能力以及毅力、手段和勇气。

（七）研究、解决新问题

任何研究都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任何研究要发展，也必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解决一直没有解决的老问题，研究尚未研究过的新

---

① 施宣圆等：《且拨雾霭观丘壑，漫卷风涛入史篇——访中国近代史专家杨天石》，《文汇读书周报》2004 年 2 月 27 日第 5 版。

② 严耕望说：采用新材料而取得成绩，并不十分困难，而能从人人见得到的寻常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和提出新见解，乃是治史的较高境界。见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 页。

问题，是任何研究实现突破、发展的基础之一，历史研究也是如此。问题有宏观、微观之分，[①]有大小之分，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是有价值的，都能推动研究的发展。提出或运用新理论，创造或运用新方法、采用新资料，最后的结果就是解决一个或多个问题，解决高层次问题或低层次问题。前面所论各方面创新的各种成果，如提出新观点的成果，实际上都解决了一些问题，以上各小节对于研究、解决问题以求创新来说都是可以参见的。

(八) 新语词

创造、运用新语词，也是一种创新，也应重视。

在当代信息化的社会里，科学技术在发展，经济在发展，政治文明在发展，语言、语词也在发展。一方面是国外有些新名词被输入中国，另一方面网络中的一些新名词在中国广泛传播。如"PK"、"给力"、"山寨"、"雷人"、"打酱油"、"囧"、"槑"等已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新名词。其他新名词多得很。有些网络语言简直令非"网虫"们看不懂，如"介素虾米东东？（这是什么东西）"。历史研究中也有"配景论"（详见张耕华《从怀疑论、配景论说到历史学Ⅱ的普遍性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9 年第 1 期）、"过密化理论"（详见史翼《关于"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的讨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 年第 2 期）、"主体间性"论（详见陈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东南学术》2003 年第 6 期）等等。从新名词来看，有的属于生活方面，有的属于网络中的，有的属于学术方面。

怎么看待新语词？

社会总是不断创新、发展，包括语言，如果不了解甚至拒绝、抵制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发展，与社会隔离开来，就会被社会抛弃。而学术研究要实现其价值，就必须被社会承认、接受，这就需要学术研究者与时俱进，接受新东西，接受新名词、新语言。年轻人总是追赶时代和新潮流，乐于使用新名词、新语言。学术研究成果要走进年轻人的视野中，既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也要用他们感兴趣的语言。能被年轻人接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会有生命力的。新时代、旧观念不行，新时代、旧话语也不行，都是不合时宜的，都会阻碍学术研究的发展、普及。梁启超不仅思想新、

---

① 陈铁健谈抗战史研究重点应放在何处？认为应放在微观研究。"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战役、战斗，把具体问题研究透彻，宏观的全局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准确的、科学的判断和评价，否则只能重复空话、套话、旧话甚至假话，这样的文章即使有千百篇，也无法使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历史真实"。详见陈铁健：《抗日战争史研究浅议》，《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 4 期。

吸引人，他报章体的新语言（半文半白）也吸引人，年轻人愿意读他的文章，社会追捧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影响也就大。

在学术研究中玩弄文字游戏是应该反对的。有学者批评："近年来，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界忽然刮起了大引、大造新词之风。一时间，'语境'、'语汇'、'范式'、'后后某某时代'等新词，夹杂着大量类似词语的西式长句子，盛行于各种文章报刊，置人于云山雾罩之中。毫无疑问，这些新词大多从外文翻译或杜撰而来。是不是中文里真的没有朴实易懂的词语与之对应，非要找一些晦涩难懂的词汇来做解释呢？显然不是，这些所谓的新词对应的英文，大多早已被先人们用大众化的平实语言解释过了，甚至大多在一本普通的'英汉词典'里也可查到。这里寥举一例，'post-cold war'本可翻译为'冷战后'，可有人偏偏喜欢将其译为'后冷战时代'，以该词为'蓝本'，又诞生了'后后冷战时代'。此类例子俯首可拾。"古人常讲"语不惊人死不休"，时下演变为"语不懵人誓不休"，更有人"生造出除自己之外谁也看不懂的词"。[①]这里批评的编造新名词，只是玩文字游戏，而没有实质性的新内容，是没有学术价值的，确实是不应该提倡的。胡绳也曾说："创新不是靠灵机一动，靠搬弄几个新的术语。"[②]历史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体系创新、领域创新、资料创新、观点创新等方面，这些创新都是有实质性内容的创新，这些创新是首先应该提倡的。在有实质性内容创新的基础上，同时也能使用新语词，这是锦上添花，也应予以肯定。

而与新理论、新方法相联系的新名词，都是有实质性内容的，这些新名词的运用是不可避免的，是值得提倡的。如以上提及的"配景论"、"过密化理论"、"主体间性"论等都是与新理论、新方法相联系的，都是在学术研究中可以运用的。有的学者指出："一种新的概念、新的话语，往往代表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新的观察视角。例如，现代社会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就是对那种以什么什么为纲——片面决定论的反拨。它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也反对文化决定论。决定一种社会状态的，是许多方面、许多力量的总合。这种总合的效果，许多时候更取决于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和相互作用。"[③]意即要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就要使用新语词。但如果只接受新名词、新概念，而不注意接受其内在新理论，这就走偏了。罗志田指出，自 20 世纪

① 郭容克：《国际政治学界令人痛心的"新现象"》，《社会科学报》2004 年 9 月 30 日第 8 版。

② 胡绳：《胡绳全书》，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三卷下，第 452 页。

③ 王家范：《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载《探索与争鸣》2004 年第 9 期。

初以来，中国学人常常容易先接受西方的新名词、新概念，而不甚注意西人学说中内在的“条理”。[①]这是中国学术界致命弱点。这一弱点至今仍有所反映，仍应注意克服、防范。

“良史莫不工文”，“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历史研究应该重视行文有美感、有新语言，能吸引人，能让人喜欢看。

四、拓展比较研究

中国史学要不断创新，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拓展史学比较研究是一极好的路径。

（一）史学比较研究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间的联系、依赖日益发展，互相认识、了解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愿望不由自主地产生、发展。历史及其发展的比较、文化及其传统的比较、经济及其生活的比较、政治及其制度的比较、社会及其结构的比较，不由自主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着，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制定相应的对策、政策，共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史学领域当然也是如此。

中国的历史学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走向人民、走向未来、走向世界，其中面向世界、走向世界是最根本的。面向人民、走向人民不只是面向中国人民、走向中国人民，而是面向世界人民、走向世界人民。面向未来、走向未来不只是面向中国未来、走向中国未来，而是面向世界未来、走向世界未来。

史学研究的成果要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需要消除某些偏见，这需要进行比较研究。

比利时史学家皮雷纳说：“唯有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家间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史学家局限于国家民族史狭小范围内，其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使其陷于泥淖之中，无法真正了解其所研究的历史，因他无法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相会通。许多史学家缺乏公平，不是由于先入之见，而是由于知识的不足。沉淫于欣赏自己的民族，必然夸张其创造性，而将本为模仿来的，认为系其独创。对其他民族不公正，由于不了解其他民族，知识的闭塞，使其易于为由

①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纪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情绪所建立的偶像所欺骗。”①“比较历史的研究，能缩短民族间的距离，能使历史的全貌呈现”。②消除某些偏见和克服文明误解、文化误读的研究成果，自然就易于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

史学研究的成果要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需要提高各方面的价值，提高公信力，增加时效性，而比较研究可以使这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

布洛克认为，比较就是假设—验证—再假设—再验证的过程，不断的假设、验证，直到得出令人满意的、可依赖的精确解释。比较方法是一种间接的实验方法。③即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结果。穆尔认为，比较史学研究方法有三方面的优点：一、可以导致提出非常有用的问题，有时还能提出新问题；二、可以从反面大致地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解释；三、也许可以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④即比较研究可以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史学研究实现创新，不断向前发展，而不至于停滞不前。梁启超认为，比较可以辨史实（事实判断）、析原由（因果判断）、明得失（价值判断）。⑤这些大家的概括，基本反映出了比较研究在提高史学研究各方面价值中的功用。通过比较研究加深研究的深度、广度，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公信力，无疑就增加了研究成果各方面的价值，增加了被认可、被传播的系数，自然也就易于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

回眺世界史学界，被世界认可的著作往往是在比较研究中完成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这样，韦伯的著作是这样。再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汤因比《历史研究》都是比较了多种文明后写成的。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弗兰克《白银资本》都是比较史学方法的成功之作。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研究分析了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情况，概括出政治现代化的四个阶段和七种类型，被誉为比较史学的“光辉范例”。⑥这些著作，在中国也已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被不少人认可。而当代中国大陆似乎还没有能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史学著作，原因大概在于还没有能在扎实比较研究基础上问世的著作。

---

① 详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②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③ 详见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305页。

④ 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

⑤ 详见王秀青《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⑥ 详见何平《比较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杜维运说:“通往世界史的坦途,是比较历史;通往世界史学的坦途,是比较史学。”①这是很有道理的。史学研究的成果要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必须重视史学的比较研究。完全可以说:比较史学是中国史学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二)史学比较研究是中国史学取世界史学之长补己之短、去己之短的必由之路

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一个认识世界史学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世界史学接轨的过程,只有完成接轨才能实现走向世界。而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接轨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互相取长补短、取长去短,这就需要对自己的长和短、别人的长和短有清楚、准确、全面、足够的认识,而认识自己的短处、认识别人的长处尤为重要,这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去己之短的前提和基础。这种取长补短、取长去短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无疑是可以通过史学比较研究实现的。

中国的传统史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一些优良的史学传统,但与西方史学相比较也存在不少的缺点。

有的学者比较了中西古代史学对“历史”的认识,指出:中国古代对“史”所作的规定,是记载君主的言与行,即“史”必须为君主和权力服务,是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了历史记载必须满足君主的各种历史要求,并为现行权力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提供权威的历史证明。人的好与坏、善与恶、是与非,在中国传统史学精神中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一切都以权力为标准。任何人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均需依据权力而定性。它不需要史家具有什么“主体”的批判性和独立性,它只需要史官的效忠性和服从性。“主体性”作为与之格格不入的东西受到专制制度的全面排斥和严厉压制。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对历史学家个性和思想的摧残是极为严重的。它使得历史学家一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就失去了自我,变得不再是自己,不再有人格、尊严和良知。在古希腊,“历史”一词的含义是“调查得来的知识”,它还包含有“研究、探索”的意思。这规定了“历史”是积极、主动地去调查、询问、探求,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去记载、叙述、保存。是史家个体自觉地追求真理的表现,而不是为政治或党派服务的工具。史学精神包含有法的精神,即客观、真实、公正,并产生“历史审判”的观念,是批判的、理性的。西方传统史学精神包含双重平等性规定:一是

①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所有人是平等的，二是所有国家和民族是平等的。正因为如此，西方历史著作很早就杜绝了对君主的崇拜和对权力的迷信，并彻底根除了对国家（特别是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特别是自己民族）的神化和狂热。①

有的学者将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学批评家刘勰与西方最早的史学批评家琉善（Loucianos，希腊人，约125—192）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中西古代史学宗旨、精神的不同。如：琉善认为“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这“与歌颂之间有不可沟通的洪谷”。因为“歌颂者的唯一任务是颂扬与取悦他的对象，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即使言过其实，也在所不计”。而“历史则唯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琉善强调：历史家“必须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无所畏惧，不仰赖他人”，“他唯一的原则与坚定信念是：绝不考虑今日的听众，而只想到未来的读者”。“他是大公无私的判官，对谁都不怀恨，但是对谁都不徇私；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无帝王将相，绝不考虑他们的喜怒，而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优秀史家不会在帝王面前发抖，或希望以歌功颂德博得各种赏赐，他应当不卑不亢，善恶必书。即史学家应不为外在力量所左右，应超脱现实利益。而刘勰认为：“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诫与夺，必附圣以居宗。”赞成“尊贤隐讳”，赞成曲笔，也就使直笔大打折扣，完全丧失史家的独立精神。②

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历史是“由官僚写给官僚看的，编写历史的目的是收集必要的资料和事例，用来训练培养官僚的统治技能”。③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侧重本体论、方法论，忽视认识论。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心经历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转移，并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而由于近代科学的缺位，中国没有经历上述变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历史学近代化（职业化和科学化）的进程。④

这些对中国传统史学缺点的认识，对西方传统史学长处的认识，应该说是一针见血的，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中国史学如何取长补短、取长去短提出了有价值的课题。

近代以来，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家、史学理论家及历史哲学、史学理论

① 雷戈：《“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方史学精神之比较》，《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② 详见徐善伟：《刘勰与琉善史学批评思想之比较》，《齐鲁学刊》1996年第4期。琉善言论见琉善《论撰史》，载《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王丽娟：《试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异同》，《文教资料》2006年5月号中旬刊。

④ 徐浩：《史学理论结构的非均衡发展——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著作不断涌现，汤因比《历史研究》、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卡尔《历史是什么》、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勒华拉开杜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勒维《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加登纳《历史解释的性质》、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雷克斯·马丁《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断》、雅斯贝斯《历史起源与目标》、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威廉·德雷《历史哲学》、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戈夫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古奇《19 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伊格尔斯《20 世纪的历史学》、波克《20 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等等。而中国只有《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之类的书，只翻译西方历史哲学的书，或编了《西方历史哲学读本》、《西方历史哲学导论》之类的书，却没有“中国历史哲学读本”、“中国历史哲学导论”之类的书，没有什么可介绍到世界去的、在世界产生影响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著作。究其原因，或许与中国传统史学消极影响还没有被彻底清除，“短”还未完全被补、被去有关。

学习西方史学的长处，清除中国传统史学消极影响，完成史学传统的现代转换，建设中国史学新传统，是当代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接轨的需要。

取长补短，取长去短，与世界史学接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了解、跟上世界史学的潮流。当今世界史学潮流是什么？从 2005 年在悉尼举行的第 20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可以看到：“以反映全球化而进行的文明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潮流。概括起来，这一趋向有以下几个新的特征：首先，文明的研究更为注重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的状况，环境史的兴起便是标志之一；其次，文明的单位已经与以前呈现明显的不同，以往东、西方的概念已经为人所大大突破。……最后，对文明的观察，也从原来注重民族、国家的兴亡，转而注意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涉和牵制。”①注重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环境史的兴起，正是当代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论产生、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的必然反映。中国

① 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 20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

正在普及的科学发展观、制定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正是这一世界潮流的反映。注重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涉和牵制研究，是与当代中国正在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推动社会发育、成熟完全合拍的。无论从跟上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出发，还是从史学为中国现实服务出发，中国史学研究增加人与自然关系史、增加环境史以及增加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互动史的内容，都是取长补短、取长去短的重要任务、重要内容，都是必须的。尽快补缺、补短，可以推动中国史学加快发展，加快与世界史学接轨，也可以推动中国史学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中国史学界只有主动迎接世界史学新潮流，积极与世界史学新潮流对话，真正与世界史学新潮流互动、交流，中国史学才能融入世界史学，实现与世界史学接轨。

迎接世界史学新潮流，积极与世界史学新潮流对话，需要有学术大师引领，需要有一批学者参与，学贯中西、擅长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学术大师、学者必备的基本素质。

(三) 加快拓展中国的史学比较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有了发展，论文发表了一些，但专题著作还很少，像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论》等做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著作，在中国大陆还不多见。何平在 2004 年发表文章说："我国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比较史学流派，比较史学也未被建立成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专门的比较史学刊物也并未出现。"几年后这样的状况仍未改变。而美国 1958 年创刊了《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in Society and History*)季刊，1970 年创刊《历史交叉学科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①]。杜维运在 2006 年版的《史学方法论》中仍说："'比较史学'一词，在中国并不流行。"[②]意即在台湾不流行，在大陆也不流行，这应该是事实。总的来说，中国史学比较研究与世界比较史学的发展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

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必须加快比较史学研究的发展。加快比较史学研究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拓展比较史学研究。拓展比较史学研究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比较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比较研究有非全面性、相对性的局限，往往只重视某一个特点、某一个侧面的比较，比较也容易附会，只有拓

---

① 何平：《比较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史学理论研究》2004 年第 4 期。

②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7 页。

展比较研究的广度、深度，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研究，才能克服比较研究中的相对性、局限性。

拓展史学比较研究要做很多功课，至少要先做好以下功课：

一是历史比较研究向史学比较研究发展。历史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要认识历史发展的特点，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要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就需要进行比较研究。如前所说，没有比较研究，其成果的价值、认可度是有限的。巴勒克拉夫也说“不考虑西方的影响便无法理解亚洲的近现代史”，“不考虑亚洲对西方的影响便无法理解西方的历史”①。历史比较研究要发展，如从历史细节比较研究向历史主干比较研究发展，从同类比较研究向不同类比较研究发展，从中国历史前后比较研究（古代、近代、当代比较研究）向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发展。历史研究的发展有赖于史学研究的发展，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界而言，史学的比较研究更需要发展。从历史比较研究向史学比较研究发展，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更重要的意义。

二是中国史学比较研究向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发展。史学研究向比较史学研究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史学潮流。比较史学研究如何发展？中国的史学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来说也是不能忽视的。如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代史学、中国当代史学的比较研究，如中国封建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比较研究，如中国大陆史学、中国台湾史学、中国香港史学的比较研究，这些史学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史学的取长补短、取长去短更有价值，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更重要的意义。史学比较研究，更需要进行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与英国史学、法国史学、美国史学、日本史学比较研究，更需要进行中国传统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传统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比较研究，更需要进行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制度与西方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制度的比较研究，以便中国史学取长补短、取长去短，以便中国旧史学传统的改造，新史学传统的建设，以便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三是史学比较研究向跨学科比较研究发展。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研究创新、

①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

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不断异军突起。如新政治史学(研究政治社会史、政治文化史以及公众选举、选举周期等)、新经济史学(研究新出现的事物如铁路、新出现的机构如银行、新出现的生产方式如炼钢等对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新文化史学(研究文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注重文化分析、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传播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等)、环境史学(研究环境与人关系,环境与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等)、城市史学(研究社会城市化过程的历史等)、家庭史学(研究家庭结构、规模,婚姻状况,性问题,儿童问题,人口迁徙,家庭经济功能等)、心理史学(研究历史人物心理因素对其一生的影响、历史人物无意识行为等,其中有精神分析心理史学、非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如行为主义心理史学、特征心理史学、认知心理史学等不同派别)等。这些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影响的产物,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心理学等与历史学相互渗透、结合的产物。这些新兴学科的产生和日益增多,反映了当代"知识整化"的趋势,同时也为史学比较研究指示了新的拓展方向——跨学科比较研究。

要发展跨学科研究,就必须先发展跨学科比较研究。要认识其他学科的长处,找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点,就需要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进行比较研究。跨学科比较研究显然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要发展,就必须先发展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由此,历史学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的比较研究要进一步发展,历史学与文学、美学、哲学、法学、新闻学、教育学、(当代)地理学、民族学、宗教学、和平学、人学、死亡学、行为科学、未来学、预测学、创造学、统计学、科学学、思维科学等,比较研究都可以发展,以取各学科之长,进行新的"科际整合",以建设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如文化学注重实地调查、整体研究、结构研究等;如统计学强调数量性、社会性、总体性、具体性、广泛性,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大量观察法、分组法、综合指标法等;如新闻学强调重要性、接近性、新鲜性、真实性等;如思维科学、创造学提倡灵感(顿悟),创造性思维强调求异性、多向性、丰富想象力,常以不合逻辑的和违反常规的形式出现,突破了一般逻辑思维和一般经验、知识、模式的局限,强调辐射思考(亦称分殊思考)、辐集思考、相似思考、反向思考、分合思考等。历史学可以吸取这

些学科的长处，推动历史学新分支学科的产生，推动史学的新发展。新历史统计学、新闻历史学、创造历史学、灵感历史学完全有可能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再如和平历史学（历史和平学）、唯美历史学（历史美学）、唯人历史学（历史人学）等等，也完全有可能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积极开展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将创造出新的史学分支学科，创造新的史学潮流。与其做一个史学潮流的追赶者，毋宁做一个史学潮流的创造者，做一个世界史学潮流的引领者，占据史学发展的制高点，这正是中国史学家发展中国史学、发展世界史学应负、应担、应尽的责任。

五、加强学术规范建设

中国大陆的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史中的学术不正之风，即失范现象以至违法现象是较为严重的，而且涉及一些权威机构、权威人士。如果说在学术研究遭到大破坏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书籍、发表的文章中失范现象、违法现象严重，这是不奇怪的。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后，在学术研究拨乱反正多年后，学术研究中的失范现象、违法现象仍然存在，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仍指出："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①]这就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得不寻找其原因，思考惩治的对策。不搞好学术规范建设，中国大陆的历史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将无法走向科学，无法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一）严重的失范现象

学术规范之一：在成果的开首作一学术史的叙述。这是避免重复劳动的重要措施。而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著作，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较少。

学术规范之二：引用资料注明出处。这样做，一是表明有根据，二是便于检验，三是使他人可以同样获得，四是尊重资料创造者、整理者的劳动成果，五是防止伪（假）引、错（误）引。而中国大陆出版的某些著作，比如现当代人物的一些权威单位撰述的研究著作，有不少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没有注明出处。有的著作全书竟然没有一条注释，即书中引用的所有资料都不注明出处。

如《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2 页记：1932 年 4 月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第 2 版。

20 日入漳州城:“红军部队举行入城典礼,毛泽东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随队入城。”没注出处。而蒋伯英《走出困境的毛泽东》(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6 页记:“毛泽东似乎并未刻意修饰自己的装束。他还是穿着那件宽大的青灰色军装,头戴草帽,骑在一匹黄色的军马上,跟着队伍缓缓地进入漳州城。”也没注出处。一说“头戴凉盔帽”、骑“白马”,一说“头戴草帽”、骑“黄马”。孰是孰非,怎么查?

又如宗峻《总设计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4 页引用李德生《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上党战役》中的文字:“刘邓常常说,敌情变化了是否还是那样办?不能单从自己方面打如意算盘。”没有注明出处。而实际上《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上党战役》是李达写的,收入杨国宇等编的《刘邓大军征战记》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不注出处,也不利于自己查验,以致把作者搞错,出现错引、误引也不知道。

不注明出处,或许也可以说明并没有根据。如宗峻《总设计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9 页记:邓小平夫妇乘机去南昌,“卓琳同继母夏培根(案:应作‘夏伯根’)两人坐在一起絮絮细语,她们心中最不放心的是老二胖胖。去年 5 月,正在北大物理系读书的邓朴方,被‘乱世狂女’聂元梓操纵的红卫兵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脊椎骨严重折裂。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狂热冲昏了头脑的年轻人干完他们严惩走资派儿子的游戏后便扬长而去。幸而有一位工人师傅在逆境中挺身而出,伸出了救死扶伤之手,把昏迷中的邓朴方送进了医院。……卓琳一想起病卧在医院的二儿子,大小便失禁,无人照看,生活无着落,心如刀割,愁泪涟涟。此番匆匆离京,连告别一声都不可能。”这些记述,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这些记述是没有根据的。邓朴方是怎么“造成脊椎骨严重折裂”的,是他被逼跳楼所致。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版)第 96 页记:“哥哥因不堪虐待,不愿再受凌辱,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又记送医院的情况:“朴方摔伤后,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们把朴方送到一家医院,医生一听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竟然拒绝治疗。此后一连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后来听说聂元梓急了,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收下了事。”并没有什么“一位工人师傅在逆境中挺身而出,把昏迷中的邓朴方送进了医院”。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 124 页又记:“在离京前,在母亲的要求下,中办同意她去三〇一医院看望朴方。……见到了儿子,看到儿子住一个单

间，病房条件还好，母亲略感心安。不管怎样，在离开北京之前，能看一看儿子，总是了了一个心愿吧。”说明离京前卓琳曾去医院与邓朴方告别。“此番匆匆离京，连告别一声都不可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 129 页记在飞机上的情况说：“这是一架老式的伊尔-14 型军用飞机，……在没有隔音设备的机舱中，只有引擎的轰响，始终没有人说话。”卓琳同继母“两人坐在一起絮絮细语”云云，也是毫无根据的。这表明《总设计师》的某些记述没有注明出处，当是原本就没有根据，或许有的只是来自传闻，或许有的是随意编造的。所以，不注明出处，可以说明没有遵守学术规范，也可以说明学术研究的态度很不严谨、严肃。

学术规范之三：在书尾注明参考资料。这是尊重前人研究成果，避免重复劳动的重要措施。而中国大陆出版的某些著作，就不做这一工作。有的作者在书的后记或其他地方声明参考了一些资料，谨表谢意。但没有说明参考了哪些研究成果，这是不规范的。想用这样的声明代替规范及规范的做法，是不对的。而有的书，连这样的声明也没有，更没把规范放在眼里了。

学术规范之四：不做重复劳动。重复劳动（只要是重复劳动就是低水平的，谈不上有什么高水平重复劳动）是一种浪费，也影响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影响学术研究的繁荣。不做学术史的叙述，不注明出处、参考资料，助长着重复劳动的蔓延。纪念活动催生的纪念史学，形势需要催生的形势史学，也容易助长重复劳动的泛滥。

（二）严重的违法现象

一是抄袭现象很严重。学术不正之风、浮夸之风已有所漫延，网上下载论文、著作的方便以及惩处力度很不够，都使抄袭现象严重起来。

1998 年瞿林东指出，近 20 年来，史文之注日渐衰微，其严重者以致“省去”了其文立论之所据，形成一种以他人之说为己说，以他人之发现为己之所发现的假象。这种隐瞒前代人或同代人学术成果对本人启示的做法，有愈演愈烈之势。倘不思改进，如此下去，则中国史学的诸多见解不独难以考镜源流，恐怕更有面临经不起推敲的窘境。居安思危，可不惧哉！至于浮华急躁之心，目空前贤之论，热衷于构建体系，陶醉于标新立异，这些不良的学风在史学界亦多有反映。这种不良学风，不仅危害今人，而且殃及古人。譬如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历代帝王训政丛书》，其中有一本《唐太宗治国训政》，全书所录竟是唐代史家吴

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而编著者和出版者竟没有在任何地方说明这是全文照录《贞观政要》，从而欺骗了一般读者。说明当今的学风已经不良到何等程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实在是不可轻视的。①全文照录他书，却没有任何说明，这就是抄袭。

二是篡改史料也时有发生。

如宗峻《总设计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记述“上党之战”，不仅抄了李达《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上党战役》，而且还改李达的文章。如李达文章说：“刘伯承司令员起草了一个《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刘邓大军征战记》第一卷第 5 页）。《总设计师》第 91 页改成：“刘伯承、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共同起草和签署了一个《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的文件”。李达文章说：“刘伯承同志说：‘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在上党战役能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回答是，因为我们的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刘伯承同志在论述合围钳形攻势的要旨时，精辟地说：‘由于我军善于宽大的机动捕捉敌人的弱点，……以便适时机动扩张结果’”（《刘邓大军征战记》第一卷第 14—15 页）。《总设计师》第 98 页把“刘伯承同志说：……因为我们的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改成：“刘邓回答得很有趣：‘因为我们的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第 98—99 页把“刘伯承同志在论述合围钳形攻势的要旨时，精辟地说：……”改成：“邓小平在讲话中反复提到合围钳形攻势的要旨时指出：……”（详见周一平《邓小平生平研究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学术界》2006 年第 4 期）。

以上这些学术不正之风、失范、违法现象，如不杜绝，历史研究会有什么样的繁荣？

学术失范、违法为什么会屡屡发生？首先是长期以来中国没有颁布实施统一的学术规范。尽管中国有著作权法，但著作权法并不涉及一些具体的学术规范。没有成文的学术规范或条例，自然也就缺乏学术规范的教育、宣传。2004 年杨玉圣分析道：第一，现代知识产权观念淡薄；第二，科学的学术规范体制没有确立起来；第三，单纯的“量化”政策导向等学术管理体制的负面效应；第四，实事求是的学

① 瞿林东：《百年史学断想》，《世纪论评》1998 年第 1 期；又见瞿林东《20 世纪中国史学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37 页。

术批评严重缺乏；第五，缺乏正常的舆论监督；第六，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特别是学术诚信与学术素质教育严重缺失；第七，对已暴露出来的问题重视不够，处置不力；第八，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的干扰与侵蚀，特别是目前愈演愈烈的“学术官僚化”、“学术大跃进”现象为害尤烈。①

与市场经济规范要努力与国际接轨一样，学术规范也应努力与国际接轨。复旦大学原校长、后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在与中学生谈话时曾说：“美国一所大学发生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教授上课时引用别人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刚说完，下课铃声响了，他来不及说明出处，结果被听课的学生‘投诉’，不久教授解职而去。”“这种‘较真’放在中国学术界似乎‘不可理喻’，然而，这可能正是中国科学与世界一流相比所差的最重要的‘一口气’。”②足见中国的学术规范建设与世界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的学术规范建设还要加大力度，对学术规范、学术法规的宣传、普及还要加大力度，学术道德教育、诚信教育、学术素质教育还要加大力度，学术监督还要加大力度，不虚美、不掩恶的学术批评还要大力发展，对学术违纪、违法现象惩处还要加大力度，完善学术管理体制还要加大力度。以前，中国没有颁布学术规范，2004年以来，学术规范已陆续出台。当务之急，一方面学者要自觉自律，要了解规范、遵守规范、维护规范，另一方面更要加强法制建设，严惩失范、违法者，让学者懂得不能失范、违法，必须老老实实、踏踏实实、清清白白地做学者，否则就要被清除出学者队伍。而且学术规范建设，遵守学术规范，必须从权威机构、高层机构、权威人士、高层人士做起。

(三) 严重的重复劳动现象

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复劳动是比较严重的，也可以说是最严重的，因为与中国现当代史、中共党史有关的政治性的纪念活动最多，而且相关的机构、团体、人员也最多。韩凌轩在对“五四”时期人物研究提意见时也说：“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劳动。同一个题目，集中了几个或者十几个学者去研究，结果在材料运用、文字表达上都差不多。尤其在论文方面这种情况更为严重，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③田子渝等在谈到抗战史研究的问题时，指出

---

① 杨玉圣：《挥起学术道德这把利剑》，《社会科学报》2004年3月18日第5版。

② 《报刊文摘》2004年2月16日第3版《杨福家院士寄语中学生“讲真话”是基本素质》。

③ 韩凌轩：《关于“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意见》，《东岳论丛》1994年第1期。

了“相当多的论著仍然是低水平重复”；[①]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研究，“论著的内容大同小异”；[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有些研究重复，有的文章甚至内容雷同，有的著作大同小异”。[③]不仅是文章重复多，书籍也重复很多。

据1991年《全国总书目》（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等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统计，仅1991年出版的关于中共党史的通史书就有八十余种之多。

此外，各地各部门各学术团体在纪念中共建党七十周年活动后出版的论文集，《1991年全国总书目》注录的约有30种。而实际上，以各种杂志增刊的名义出版的论文集还有不少，也有一些自行印刷非公开出版的论文集，这些《1991年全国总书目》都没有注录。还有些论文集，在1992年出版，甚至到1993年出版，如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3册，就是1993年3月出版的，自然《1991年全国总书目》不会注录。

以上仅是《1991年全国总书目》著录的书，《书目》未著录的书还有，如内部发行、自办发行的书等。而且只是1991年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通史、创建史、党建史、图集等部分的书，其他还有很多部分的书，如各阶段、各事件、各人物、各专题研究的书，这些部分的书也存在着重复。只有少量的专题书，重复较少，如：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学概论》、青岛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七十年》、湖南出版社《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等。各地出版的地方党史、部门行业党史的书，也重复较少。

以上所录反映出的重复情况有这样几类：一、不同地区、省市出的书重复。如《光辉的历程》，浙江大学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等都各自出版；二、同一地区、省市，不同的出版社，出的书重复。如北京地区的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出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书；三、同一出版社同时出版内容相同的书。如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七十年》，只是书名略异而已；四、以上的重复只是1991年一年时间内的重复，以前、以后出版的书的重复不算在内。

论文发表的重复情况更为严重（详见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重复劳动应设法避

---

① 田子渝等主编：《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② 田子渝等主编：《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页。
③ 田子渝等主编：《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页。

免》,《学术界》2000年第4期)。有的是不同作者、不同报刊发表相同文章。有的是同一作者的同一文章在不同报刊多次发表①。

重复劳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重复劳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是无意义的、无价值的;从劳动的角度看,是不创造价值的,是无效劳动,是浪费;从社会价值看,重复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一方面是同一个课题,很多人研究,差不多的文章、书籍同时发表、出版,有的文章、书籍无人看,有的书只印一二千册也卖不完,积压在仓库里。另一方面是不少的课题无人研究,这类课题的文章、书籍从未发表、出版。有些填补空白的文章、书籍甚至发表、出版不了。这么一比较,就更令人痛心,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人生,浪费太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复劳动对中共党史研究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有阻碍作用。重复劳动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该制止、杜绝。经济建设上的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已认识到要坚决制止、杜绝;学术研究的重复劳动,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造成中共党史研究重复劳动的原因,除了学术规范不健全,写书、写文章的人没有规范的约束,不知、不懂学术规范以外,还有:一、纪念活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很大。纪念活动前后发表、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文章、书籍,重复劳动情况总是比较严重,且有"纪念史学"的色彩。似乎不出点有关的书,不发点有关的文章,就是对纪念活动"不重视"。除纪念史学容易造成重复劳动外,形势史学(形势需要一哄而上的研究成果)、政治史学(政治需要一哄而上的研究成果)、权钱史学(由权钱支持、指挥的研究成果)也容易造成重复劳动;二、缺乏创新意识及其氛围。这与学术规范的不健全有关,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有的人不愿坐冷板凳,不愿花工夫。有的人为了评职称,急着需要书籍、文章凑数,于是找关系出书、发文,花钱出书、发文。如有的科研项目、丛书、书籍、文章的领衔人是党政领导,他们有权、有

---

① 近年来,重复劳动的现象依然严重,如同一篇文章重复发表很严重,胡国喜《建国60年来党内民主发展的历程、经验及前瞻》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攀登》2009年第4期、《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新东方》2009年第5期、《当代社科视野》2009年第6期上发表,《党内民主60年:历程·经验·前瞻》在《理论视野》2010年第4期上发表,《党内民主60年:成就与展望》在《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兵团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4期、《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党政干部学刊》2009年第7期、《人大研究》2009年第11期、《唯实》2009年Z1期上发表,《党内民主60年:基本经验与前景展望》在《桂海论丛》2009年第4期上发表,《党内民主发展的演进轨迹及其基本经验》在《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上发表,《未来党内民主发展的前瞻》在《理论参考》2009年第9期上发表,胡国喜谈党内民主发展的文章共发表了17次。

钱，于是组织人搞“研究”，这些领导并非学术研究内行，又要赶任务，难免“拼凑”、“演绎”。如客观上资料条件的限制，档案资料开放有限，挖掘一些新资料很难，不得不用权威部门、权威人士用过的资料。再如政治任务需要、宣传主题需要，已经做过的题目还要做。又如某些人物说过的话、一些决议的结论变成框框，有的人便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是一味重复这些话和结论。此外，确立科研项目，发放科研经费，没有把创新、填补空白作为首要标准，以致出现一些做过的题目重复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也没有重视在创新、填补空白方面提出严格要求，没有在确定选题前进行“查新”检索、论证，以致出现一些选题重复、“拼凑”（“集大成”）的论文，并影响了研究生日后的研究思路、方法、习惯（有些导师本身就不懂学术规范、不遵守学术规范，带出的学生自然也不懂学术规范、不遵守学术规范）。最后是学术评奖，并不把创新、原创性作为首要标准，对创新的研究和成果缺少发现、激励机制。

要防止、避免重复劳动显然需要：一、健全学术研究的规范，对重复劳动现象，应进行公开、点名批评，决不姑息纵容；二、对创新、原创性的研究和成果，建立奖励、扶持机制；三、评职称，把研究成果是否创新、原创性作为首要标准，而不把数量作为首要标准；四、课题立项、经费发放，应把创新、填补空白作为第一目标，应找到最内行的学者，尤其应找有闯劲的青年学者，而不应搞什么“平稳”“照顾”；五、为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创造各方面的条件，如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良好的资料条件，健全档案开放制度等。

李君如指出，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中很少有低层次的重复，就在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有两个明晰：一个是成果的发现者和发明人明晰，包括进入市场的研究成果可以享有知识产权的专利；另一个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方向明晰。社会科学要体现它的科学性，并且减少低层次的重复，也要往这个方向努力①。这是有益的经验，值得史学界借鉴。

认真吸取教训，善于学习一切好经验，全面拓展比较研究，努力开拓创新，中国史学一定能创造新的辉煌，一定能在世界史学界扩大影响力，引领史学潮流。

---

① 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卷首李君如《如何深化当前的党史研究？（代序）》。

附录:参考文献简目

凡　例

一、本目为书目。论文目录因篇幅限制暂略,引用论文可详见各章节的注释。

二、本书目的资料一般截止于2010年。

三、本书目为简目,有些征引的书没有收入。资料书一般不收入,如标点本“二十四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等没有收入,可详见相关章节。中国共产党历史方面的书没有收入,可详见相关章节及周一平主编《中共党史研究90年》附录《中共党史研究简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因为篇幅的限制,也删了一些书目。

四、分类排列。同类书,按出版年代的先后排列。

五、著作的作者,一般只注录第一作者(第一主编)。

六、著作出版地一般不标。同一出版社,多地都有,标出版地,如:北京: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

(一) 主要参考文献

丛书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1998

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乔治忠等.1996

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等.1996

秦汉史研究概要.周天游.1990

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张国刚主编.1996

宋辽金史研究概述.李天石等.1995

元史学概说.李治安等.1989

明史研究备览.李小林等主编.1988
清史研究概说.陈生玺等.1991
洋务运动史研究叙录.乔还田等.1989
辛亥革命研究一览.李喜所等主编.1991
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冯尔康.1988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宓汝成等.1989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览.夏良才.1991
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概览.张一文等.1991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备要.汪永祥等.1992
中国法律制度史研究通览.曾宪义等.1989
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通览.曾宪义等.1989

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李文海等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牛润珍
20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罗新慧
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王东平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梁景和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辩.岑大利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赵晓华
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方敏等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史学专辑.陈祖武等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2007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吴怀祺.2006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朱乃诚.2006
甲骨学殷商史研究.宋镇豪等.2006
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赵超.2005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李锦绣.2006
宋史研究.朱瑞熙等.2006
辽西夏金史研究.李锡厚等.2005

元史研究.刘晓.2006
明清史研究.钞晓鸿.2007
中国近代史研究.张海鹏等.2005
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林颊.2006
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董新林.2005
世界史研究.于沛.2006
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余太山主编.2005

20 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丛书.瞿林东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9
20 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陈其泰等.2005
20 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侯云灏.2007
20 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肖黎主编.2007
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张广智主编.2007
20 世纪中国史学论著要目.汪受宽等.2007
20 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马宝珠主编.2007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瞿林东主编.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案丛书.李振宏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周祥森
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阶级观点问题研究.王学典等
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王彦辉等
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李振宏等
生存与抗争的诠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臧知非
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何晓明
突破重围: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郭世佑等
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王先明

著作

中共史学新探.吴安家.台湾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83(一版),1988(三版)

新史学九十年.许冠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史学危机的呼声.逯耀东.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肖黎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周朝民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历史学的发展趋势.白钢等.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探讨综述.李振宏.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学(1949—1989).姜义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王学典.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张书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历史学百年.刘新成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

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夏杏珍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青年学者论坛.中国史学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曹家齐.西苑出版社,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邹兆辰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王学典.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新史学与新汉学: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续编.王学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0世纪百年学案·历史学卷.黄敏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五十年.张剑平.学苑出版社,2003

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王学典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史学会五十年.中国史学会秘书处.海燕出版社,2004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史学卷.盛邦和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姜义华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杨念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理论嬗变.张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史学引论.王学典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中国历史学 30 年(1978—2008).张海鹏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历史学.李学勤等卷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0 世纪中国史学散论.瞿林东.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王学典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历史变迁与历史学.姜义华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王学典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传统与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年.王雪萍主编.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99

复活的文明:一百年中国伟大考古报告.张自成等主编.团结出版社,2000

20 世纪中国考古十大发现.林华东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1984;方志出版社,2007

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臧振华.台北:"中央研究院",1997

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徐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金应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0 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赵梅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蒋海升.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20 世纪明史研究综述.赵毅等.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王家范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浙东史学研究述评.钱茂伟主编.海洋出版社,2009

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趋势.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4

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曾业英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徐秀丽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综述.李育民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评.曾景忠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资料集(1978—1988).许庆朴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述评.王廷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郭德宏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抗日战争研究述评.刘德军主编.齐鲁书社,2005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选编(1995—2004).杨青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新时期的中国现代史研究.陈廷湘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战后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宫长为等译.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

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李文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

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述评.刘德军主编.济南出版社,2008

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冯尔康等.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常建华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厉声等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达力扎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法制史研究综述(1949—1989).张晋藩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法制史学的四十年.张晋藩.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刘广安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张维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中国近代法制史学史研究.周会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中国思想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一辑).张岂之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戴锦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邵汉明主编.人民出版社,2003
中国文化研究30年.邵汉明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
"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贺桂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侨史研究十年: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刊.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
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40周年(1964—2004)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台湾研究十年.陈孔立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陈启能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1978—2008).于沛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王军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中国的中东文献研究综述(1949—2009).成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孔子研究四十年.徐志祥等主编.巴蜀书社,1990
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孙中山研究学会.中华书局,1986

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谢保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郭沫若研究三十年.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等.巴蜀书社,2010
顾颉刚先生学述.刘起釪.中华书局,1986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王学典等.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陈寅恪史学述略稿.王永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吴晗传.苏双碧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朱政惠.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朱政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陈其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王学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瞿林东.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瞿林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金景芳学述.金景芳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戴家祥学述.戴家祥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王利器学述.王利器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王钟翰学述.王钟翰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邓广铭学述.邓广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周一良学述.周一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杨向奎学述.杨向奎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谢本书史学研究述评.曹维琼等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姜义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王尔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史学家评传(3卷).陈清泉等.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二) 主要征引与参考文献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嵇文甫.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
影射史学批判.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78
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杜维运.东大图书公司,1981
历史科学概论.葛懋春等.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史学概论.白寿彝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历史学概论.田昌五.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史学概论.吴泽等.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历史学概论.赵吉惠.三秦出版社,1986
中西古代史学比较.杜维运.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2006(二版)
史学导论.姜义华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010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李振宏.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1999(二版);2008

（三版）

忧患与史学.杜维运.东大图书公司,1993

史学概论.庞卓恒.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穿越历史的丛林:史学论.彭卫.北京:三联书店,1997

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于沛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白寿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历史研究》编辑部.齐鲁书社,1983

史料与史学.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俯视与沉思:论中国史学传统.李颖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汪荣祖.中华书局,1989

唯物史观与史学.蒋大椿.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蒋大椿.巴蜀书社,1992

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彭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王子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陈启能.团结出版社,1993

历史与意义:论作为时代精神基础的元史学.雷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瞿林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王学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历史与历史学.何兆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历史唯物论与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吴廷嘉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穿越历史的丛林:史学论.彭卫.北京:三联书店,1997

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于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史学与史学评论.瞿林东.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陈启能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庞卓恒.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史学与民族精神.陈其泰.学苑出版社,1999

人类重要史学命题.王银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因革之辨: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0

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王晴佳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历史学的困惑.陈支平.中华书局 2004

史学在思想.雷戈.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瞿林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史学理论研讨讲义.宁可.鹭江出版社，2005

中国史学通论.瞿林东.武汉出版社，2006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陈其泰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杜维运.商务印书馆，2010

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陈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刘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何兆武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张广智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西方的历史观念.王晴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1 世纪的史学理论.陈新.上海三联书店，2013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陈其泰.商务印书馆，2011

环境史研究叙论.梅雪芹.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

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包茂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中共党史学概论.王仲清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欧阳淞.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概论.滕方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史学方法.王尔敏.台湾东华书局，1977

历史比较研究法.项观奇.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历史学方法论.赵吉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彭卫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杨豫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近代史学与史学方法.麦劲生.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

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康乐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史学方法论.杜维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历史进程与历史理性: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李杰.人民出版社,2010

二元历史论.章笑力.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

比较史学.范达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史学田野调查.董建波.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中国史学史稿.刘节.中州书画社,1983

中国史学史(上下册).张孟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986

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仓修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史学发展史.尹达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中国史学史(第一卷).白寿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006

中国史学简史.施丁.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中国史学史纲要.宋衍申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996

中国史学思想史.吴怀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饶宗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中国史学史纲要.王树民.中华书局,1997

中国史学史纲.瞿林东.北京出版社,1999;2005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吴怀祺主编)汪高鑫.黄山书社,2002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吴怀祺.黄山书社,2002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元代卷.(吴怀祺主编)周少川.黄山书社,2002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吴怀祺主编)向燕南.黄山书社,2002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吴怀祺主编)王记录.黄山书社,2002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前卷.(吴怀祺主编)陈鹏鸣.黄山书社,2002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后卷.(吴怀祺主编)洪认清.黄山书社,2002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总论卷历史思维论卷.吴怀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卷.(吴怀祺主编)白云.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文献学思想卷.(吴怀祺主编)王记录.福建人民出版

社,2011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盛衰论卷.(吴怀祺主编)庞天佑.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吴怀祺主编)汪高鑫.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3卷).瞿林东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第一辑).邓鸿光等主编.崇文书局,2002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南北朝魏晋卷.(吴怀祺主编)庞天佑.黄山书社,2003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隋唐卷.(吴怀祺主编)牛润珍等.黄山书社,2004

中国史学史(第二卷).(白寿彝主编)许殿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中国史学史(第三卷).(白寿彝主编)瞿林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中国史学史(第四卷).(白寿彝主编)吴怀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中国史学史(第五卷).(白寿彝主编)向燕南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中国史学史(第六卷).(白寿彝主编)陈其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中国史学史.谢保成主编.商务印书馆,2006

中国史学史.杜维运.商务印书馆,2010

中国史学史纲.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中华史学三千年史.李小树.中国物资出版社,2010

中国史学史.乔治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史学史.王记录.大象出版社,2012

中国史学史.谢贵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4册).杨翼骧等.商务印书馆,2013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五卷).仓修良等.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中国古典史学的求真精神研究.王振红.黄山书社,2012

中国古代史学家.朱仲玉.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中国近代史学家.胡逢祥等.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清代史学与史家.杜维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中华书局,1988

中古史学观念史.雷家骥.台湾学生书局,1990

元史探源.王慎荣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儒学与中国史学.许凌云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孔子与中国史学.李颖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千古往事千古书:中国古代历史学.管士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

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瞿林东.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罗炳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周少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庞天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研究.白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明代史学的历程.钱茂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罗炳良.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罗炳良.泰山出版社,2005

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罗炳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南宋史学史.罗炳良.人民出版社,2008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瞿林东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瞿林东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秦汉史学研究.许殿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史记》研究.施丁等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汉书》研究.陈其泰等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后汉书》、《三国志》研究.张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晋书》、"八书"、"二史"研究.周文玖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向燕南等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10—13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施建雄.人民出版社,2010

《宋史》研究.罗炳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北宋史学思想流变研究.李峰.人民出版社,2013

南宋义理史学研究.曹宇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

《辽史》、《金史》、《元史》研究.吴凤霞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明史》研究.姜胜利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清前《史通》学研究.王嘉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汪高鑫.商务印书馆,2012

史学巨子范晔.邱明印.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

黄宗羲的经学与史学.吴海兰.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章学诚史学哲学研究.刘延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章实斋与邵二云.罗炳良.商务印书馆,2013

中国近代史学史.吴泽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历史与民族精神:近现代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李成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胡逢祥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陈其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马金科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高国抗等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蒋俊.齐鲁书社,1995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张岂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刘俐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刘兰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历史时代嬗变的记录: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瞿林东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传承与更新:留美生与民国时期的史学.李春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嬗变中的近现代史学:以学科互涉为视点的考察.宋学勤.学苑出版社,2008

中国近代史学史论.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史学史通论与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叶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近代转型与史学反思.胡成.北京:三联书店,2013

太平天国史学述论.吴善中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中国近代史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研究.杨鹏.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石莹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何炳松史学研究.刘馨.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桂遵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张剑平.人民出版社,2009

中共党史学史.张静如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周一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中共党史史学史.周一平.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中共党史研究90年.周一平.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张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陈峰.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洪认清.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于文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研究.符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学术与国家:《史地学报》及其学人群研究.陈宝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谢保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彭明辉.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谢保成.北京:三联书店,2012

金毓黻与《中国史学史》.胡正宁.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古史辨派.吴岩等.长春出版社,2013

台湾史学五十年:1950—2000.王晴佳.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彭明辉.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当代香港史学研究.周佳荣等主编.香港三联书店,1997

台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评析.郭铁鎗等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西方史学史概要.郭圣铭.1983

欧洲近代史学史.孙秉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西方著名史学家评价.郭圣铭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到新史学.姚蒙.香港三联书店,1988

西方史学史纲.宋瑞芝等.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张广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80年代的西方史学.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张广智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徐正等.东方出版社,1991

西方新史学述评.庞卓恒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西方历史哲学导论.韩震.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西方史学史.杨豫.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外国史学史纲要.夏祖恩.鹭江出版社,1993

外国史学史.王建娥.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

克丽奥的童年——古典西方史学.郭小凌.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西方史学史.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009(二版)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徐浩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罗凤礼.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现代西方史学.张广智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晏绍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西方史学史.张广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西方史学之路.王岩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20 世纪的西方史学.于沛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论战后美国史学:以《美国历史评论》为讨论中心.程群.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西方历史编纂学史.何平.商务印书馆,2010

理性主义史学研究:以 18 世纪的法国为中心.黄冬敏.岳麓书社,2010

西方史学通史(六卷).张广智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西方史学史.于沛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姜芃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苏联史学理论.陈启能等.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兰克史学研究.易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梁民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新文化视野下的人民历史:拉斐尔·萨缪尔史学思想解读.贺五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周一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瞿林东.中华书局,1994

刘知幾评传:史学批评第一人.赵俊等.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刘知幾史学批评研究.赵海旺.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白云.人民出版社,2010

中国史

简明中国通史.吕振羽.三联书店,1950;人民出版社,1955(新一版)、1959(二版)

中国通史简编(一二三编).范文澜.人民出版社,1953—1965(修订本)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54

中国历史纲要.尚钺主编.人民出版社,1954

中国通史(2册).周谷城.新知识出版社,1955—195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新一版)

中国历史概要.翦伯赞等.人民出版社,1956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63—1965(一、二、三册),1979(四册)

中国史稿.郭沫若、中国史稿编写组.人民出版社,1962—1963(一至四册);1976—1995(五至七册另地图集2册,其中一至三册郭沫若主编、四至七册编写组编写)

中国通史(12册).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1992(前6册);2007(后6册为蔡美彪主编)

中国通史讲稿(3册).张传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984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3册).赵矢元等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中华人民通史.张舜徽.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1989

中国通史(12卷22册).白寿彝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9;2004(修订本)

尚氏中国古代通史.尚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中国通史(12卷).丁文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中国通史(8卷22册).赖新元主编.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通史(4册):彩图版.戴逸等主编.海燕出版社,2000;2001(二版)

新编中国通史(4 册).邱树森等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1996; 2001(二版)

中国通史图鉴(15 卷).莫久愚等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通史全编(20 册).冯克诚等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中国全史:百卷本.史仲文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全史:简读本.曹健民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中国全史:图鉴版.王文书等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中国全史:彩图版.翟文明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中国社会通史.总主编龚书铎.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白钢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政治通史.齐涛主编.泰山出版社,2003

中国法制通史.游绍尹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法制通史.总主编张晋藩.法律出版社,1999

中国经济通史.朱伯康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中国经济通史.周自强等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二版)

中国经济通史.赵德馨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中国文化通史.胡世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

中国文化通史.郑师渠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中国风俗通史.陈高华等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005

中国改革通史.漆侠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夏史探微.郑杰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3

商史探微.彭邦炯.重庆出版社,1983

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新编中国春秋战国史.王宇信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94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1980

六国纪年.陈梦家.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楚史稿.李玉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秦史稿.林剑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秦国发展史.林剑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秦帝国史.王云度等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秦史.王蘧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秦汉史略.何兹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秦汉史纲要.杨翼骧.新知识出版社,195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古南越国史.余天炽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余太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三国史研究.张大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三国史.马植杰.人民出版社,1993

三国史.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魏晋南北朝史史略.何兹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魏晋南北朝史隋初唐史(上册).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980

三秦史.洪涛.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前秦史.蒋福亚.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

隋唐史(二卷).岑仲勉.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1954;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中华书局,1982(修订本)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1954

隋唐五代纲要.杨志玖.新知识出版社,195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隋唐五代史.吴枫.人民出版社,1958

隋唐五代史(二册).吕思勉.中华书局,1959

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三联书店,1961;人民出版社,1977;1979

隋唐五代史论.臧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五代史略.陶懋炳.人民出版社,1985

简明宋史.周宝珠等.人民出版社,1985

南宋史稿.何忠礼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辽宋西夏金史.邓广铭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西夏简史.钟侃.宁夏人民出版,1979

西夏史稿.吴天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简明西夏史.李蔚.人民出版社,1997
大金国(第一部).白玉奇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元史三论.杨志玖.人民出版社,1985
元史研究论稿.陈高华.中华书局,1991
明史新编.傅衣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中华书局,1982
南明史略.谢国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南明史.南炳文.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南明史.顾诚.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明清史.李洵.人民出版社,1956
简明清史(2册).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0
清史(上编).郑天挺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清代全史(10卷).李洵等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993
清史编年(12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范文澜.上海: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
中国近代简史.彭明.天津联合图书出版社,1950
中国近代简史.刘洁华.上海益昌书店,1953
中国近代史(上册).范文澜.人民出版社,1955(九版)
中国近代史.林增平.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1979(二版)
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戴逸.人民出版社,1958;1963(二版)
中国近代史.范文澜.人民出版社,1973;1984
中国近代史稿(上、下册).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人民出版社,1976
中国近代史稿(3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人民出版社,1978—1984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胡绳.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近代史新编(3册).苑书义等.人民出版社,1981—1988
中国近代史记.徐泰来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国近代史.郑师渠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10 册).戴逸主编.红旗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现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中国现代史.上海市教育局.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中国现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二版);1963(三版)
中国现代史(暂用本).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中国现代史稿(1919—1949).魏宏运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现代史.黄元起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中国现代史.王维礼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中国现代史.王大同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
中国现代史.王维礼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新编中国现代史(上册).陈善学等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新编中国现代史(中册).张圻福等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新编中国现代史(下册).赵少荃等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现代史(上、下册).王桧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1989;1991(二版)
中国现代史(1919—1949).李世平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现代史.李光一等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中国现代史.陶用舒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新编中国现代史.郭绪印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现代史.张华腾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现代史.魏宏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中国 20 世纪全史(6 卷).胡绳武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中华民国史(12 卷).李新等主编.中华书局,1981—2006
中华民国史纲.张宪文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中华民国史稿.张玉法.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98
中华民国史(4 卷).张宪文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中华民国史(10 册).朱汉国等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中华民国专题史(18 册).张宪文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人民出版社,19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柏福临等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中国当代史.上海大学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上).郭彬蔚等.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郭彬蔚.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

1949—1989年的中国(1).林蕴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949—1989年的中国(2).丛进.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949—1989年的中国(3).王年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949—1989年的中国(4).王洪模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朱建华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靳德行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1993(修订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研究.张广信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主编.档案出版社,1989;1995(增订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1949—1989).廖盖隆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金春明.开明书店,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朱建华等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周华虎等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陈明显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5卷).徐达深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当代中国史.王幼樵等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刘国新等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修订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郭大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6卷).编委会.团结出版社,1996

中国当代史.柏福临.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有林等主编.红旗出版社,1993;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编.张启华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999(二版)

五十年国事记要(5 卷).郑惠等主编.湖南出版社,1999
共和国史记.徐达深总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国当代史.周兴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廖盖隆等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龙德等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许嘉璐等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3 卷).王学启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地图出版社,1982—1987
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中华书局,1978—1982
甲骨文合集释文.胡厚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胡厚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甲骨文合集补编.彭邦炯等.语文出版社,1999

殷墟发掘.胡厚宣.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出版社,1994
中原考古大发现:殷墟之谜.苏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北京三联书店,1999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张之恒.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屈家岭文化.张旭球.文物出版社,2004
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档案.阎东.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考古发现与华夏文明.张童心等.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夏商考古.陈旭.文物出版社,2001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两周考古.赵丛苍等.文物出版社,2004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下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文物出版社,1988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袁仲一.文物出版社,1990
秦风永驻:秦始皇・始皇陵・兵马俑.古方.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刘庆柱.科学出版社,2000
彩绘兵马俑.王晓谋.文物出版社,2001
地下军阵:秦兵马俑坑考古大发现.徐卫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轻车锐骑带甲兵: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与研究.王学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秦始皇帝陵与兵马俑.孙伟刚.三秦出版社,2003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文物出版社,2006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文物出版社,2007
兵马俑真相.陈景元.华文出版社,2009
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记.岳南.海南出版社,2007
秦始皇陵与兵马俑.田静.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秦兵马俑.孟剑明.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
秦始皇陵兵马俑.郝熙美.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宣帝杜陵陵园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出版社,1996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湖南省博物馆等.文物出版社,1973
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文物出版社,1980
望都汉墓壁画.北京历史博物馆等.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文物出版社,1978
魏晋南北朝考古.罗宗真.文物出版社,2001
云冈石窟研究.阎文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龙门石窟.龙门文物保管所.文物出版社,1985
炳灵寺石窟.甘肃省博物馆等.文物出版社,1982
隋唐考古.秦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张学锋.北京:三联书店,2013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
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开封市文物工作队.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定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文物出版社,1990
20世纪的敦煌学.郝春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中国陶瓷.冯先铭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德化窑.福建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90
漳州窑.福建省博物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宜兴紫砂.梁白泉.文物出版社,1991

齐国政治史.宣兆琦.齐鲁书社,1997
北魏政治史研究.张金龙.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
关于喀喇汗王朝政治史述略.魏良弢.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宋代政治史概要.王瑞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现代政治史(1919—1949).王金鋙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史与中国传统社会.赵世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宫廷政治.王连升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李治安等.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明代内阁政治.谭天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侯宜杰.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政治制度史.左言东.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989(二版)
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晋藩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中国政治制度史.邵德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中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政治制度史.李天庆等.学苑出版社,1989
中国政制史.杨鸿年等.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中国政治制度史.王惠岩等.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政治制度史纲.陈高华.黄山书社,1991
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星久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政治制度史.储考山等.上海:三联书店,1993
中国政治制度史.史远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中国政治制度史.朱延惠.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王汉昌等.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罗辉映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林代昭等.重庆出版社,1988
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李进修.求实出版社,1988
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谢俊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国近代文官制度史.刘梅生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韩延龙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王松、周一平.海南出版社,1996
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魏余秀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袁继成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徐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林炯如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钱实甫.中华书局,1984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孔庆泰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史.黄志仁.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演进.张光宇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宋金寿等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蒋伯英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浦兴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罗成徽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概要.张明澍.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陈明显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史.迟福林等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浦兴祖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机构五十年.国家行政学院.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史研究.蔡庆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当代中国政府.谢庆奎.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史.李金山等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发展史.袁瑞良.人民出版社,1994
人民代表大会二十年发展与改革.蔡定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

共和国宪政历程.文正邦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李盛平等.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2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夏禹龙等主编.重庆出版社,1999

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王汉昌主编.劳动人事出版社,1986

继承与变革: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的发展历程.刘文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祝晏君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中国文官制度.李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史略.刘梅生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楼劲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许树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历代选官制度.陈茂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军功爵制试探.朱绍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1997(二版)

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秀奇.中国人事出版社,1991

中国监察制度史.邱永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中国监察制度史.彭勃等.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

中国僧官制度史.谢重光等.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宦官制度史.余华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006(二版)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杨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赵云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商周政体研究.张秉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张亚初等.中华书局,1986

周代分封制度研究.葛志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周代宗法制度研究.钱宗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钱杭.学林出版社,1991

周代国野制度研究.赵世超.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葛志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秦汉官制史稿.安作璋等.齐鲁书社,1984—1985

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柳春藩.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秦汉军制史论.黄今言.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秦汉军事制度史.熊铁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秦汉赋役制度研究.黄今言.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二版)

汉唐职官制度研究.陈仲安等.中华书局,1993

北魏前期政治制度.严耀中.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三省制略论.王素.齐鲁书社,1986

唐勾检制研究.王永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宋朝兵制初探.王曾瑜.中华书局,1982

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杨若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元代吏制研究.许凡.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

元代分封制度研究.李治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关文发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明代国家机构研究.王天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明代的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研究.张薇.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张德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学苑出版社,2001(修订本)

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李鹏年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清朝典制.郭松义等.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清朝皇嗣制度.张玉芬.大连出版社,1991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杨启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清代宗族法研究.朱勇.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赵云田.中华书局 1989

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赵云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清代地方官制考.刘子扬.紫禁城出版社,1988

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谢本书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王引淑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徐大同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朱日耀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邵德门主编.法律出版社,1983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桑咸之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简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姚凤莲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张馨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简编.鱼俊清等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朱曰耀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钟康模.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王有光.知识出版社,1993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谭双泉.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田海林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熊月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田子渝等主编.档案出版社,1990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许光枨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刘健清等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彭明.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1982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林茂生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李世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严怀儒主编.北京出版社,1985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彭明.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范荣祥等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谌宗仁等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刘景富等.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王金阁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海振忠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俞祖华等.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2009(二版)

“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陈旭麓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史.范小方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翁有为等.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刘泽华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刘泽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刘泽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朱建华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政党史.朱建华等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近代政党史.朱建华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政党史(1894—1949).邱钱牧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政党制度史.朱汉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邱钱牧.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民主党派史.邱钱牧.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中国民主党派史.姜平.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中国各民主党派.于刚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中国民主党派史稿.李起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中国民主党派史.胡邦宁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民主党派史纲:民主革命时期.王天文等.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杨育光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张军民.华夏出版社,1989

中国民主党派史述略.俞云波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民主党派史纲:民主革命时期.刘秉扬.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道路.吴智棠等主编.沈阳出版社,1989

中国民主党派史.李田贵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党派史论.王德华等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民主党派史.窦爱芝.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中国民主党派史纲(1927—1989).张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中国民主党派史稿(1928—1988).陈志远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状.曹健民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民主党派简史.林治理等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国民主党派史.孙晓华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刘延东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中国国民党简史(1894—1949).李友红等.档案出版社,1988
中国国民党史.肖效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国民党史(1894—1988).苗建寅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国民党史纲.季鸿生等.百家出版社,1990
中国国民党史纲.彦奇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国民党史.李文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国民党史.刘健清等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季鸿生等.神州出版社,1992
中国国民党史纲.马尚斌等.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国民党派系斗争史.郭绪印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国国民党一百年.肖恩芳.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国国民党史.王万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程思远主编.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简介(1924—1949).孙彩霞.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尚明轩.人民出版社,1986
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尹诚善等.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1905—1949).金德群主编.海洋出版社,1991
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蔡铭泽.团结出版社,1998
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汪学起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张晋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中国法制史简编.肖永清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982
中国法律史.张晋藩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
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93

西周法制史.冯卓慧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秦国法制建设.黄中业.辽沈出版社,1991

秦律通论.栗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汉代法制研究.张景贤.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两汉魏晋法制简说.张建国.大象出版社,1997

隋律研究.倪正茂.法律出版社,1987

唐律初探.杨廷福.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唐律研究.乔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唐律论析.钱大群等.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唐律新探.王立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2001(二版)

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钱大群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宋代法制研究.赵晓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宋代法制研究.郭东旭.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

宋代法制初探.戴建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西夏天盛律令研究.王天顺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金律研究.曾代伟.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

明初重典考.杨一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明大诰研究.杨一凡.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怀效锋.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清朝法制史.张晋藩主编.法律出版社,1994;中华书局,1998

清末法制变革思潮.马作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清代法律制度研究.郑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近代法制史.范明辛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张国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邱远猷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中国革命法制史(1921—1949).张希坡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992

革命根据地法制史.张希坡主编.法律出版社,1994

中国法制四十年(1949—1989).赵震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杨一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通史.韩延龙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中国法制建设20年.林青山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中国法制建设20年.许骅等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历史与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历程.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50年.郭成伟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共和国法制建设50年.肖义舜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曾瑞芝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上海法制史.王立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中国宪法史略.张晋藩等.北京出版社,1979

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蒋碧昆.法律出版社,1988

民国宪法史.张国福.华文出版社,199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史.韩大元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立法史论.张善恭.上海三联书店,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许崇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中国宪法史.张晋藩.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中国刑法史稿.乔伟.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

中国刑法史.蔡枢衡.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中国刑法史.周密.群众出版社,1985

中国刑法通史.李光灿等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1989

中国刑法史新论.张晋藩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

中国刑法简史.宁汉林等.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

中国刑法史纲.周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史.张希坡.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

中国民法史.叶孝信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民法史.孔庆明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清代民法综论.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何勤华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张晋藩主编.巴蜀书社,1999

中国近代民法史.潘维和.台北汉林出版社,1982

中华商法简史.薛军.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中国经济法史.李景文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经济法制史.张研.审计出版社,1992
中国经济法制史.蒋晓伟.知识出版社,1994
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立法.张希坡.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司法制度简史.熊先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监狱史.薛梅卿主编.群众出版社,1986
中国古代的告状与判案.吕伯涛等.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
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郑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黄宗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民国司法黑幕.张庆军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中国古代行政立法.蒲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行政法史.张晋藩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行政法制史.王士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司法制度史.张晋藩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张兆凯主编.岳麓书社,2005
中国法律思想史纲.张国华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1987
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马小红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中国法律思想史纲.马作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中国法律思想史.侯欣一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法律思想通史.李光灿等总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2001
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张晋藩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宋仁.学苑出版社,1990
孙中山法律思想研究.唐自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理论设计及其运作.赵金康.人民出版社,2006
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陈景良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军事法制史.陈学会主编.海潮出版社,1999
秦汉官吏法研究.安作璋等.齐鲁书社,1993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梁治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上海租界法制史话.王立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宗教法律制度初探.龙敬儒.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中国律师制度史.周太银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中国律师制度史.徐家力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中华民国律师制度史.徐家力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中国版权制度变迁研究.姚怡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梁治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道家与中国法文化.程维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张中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史彤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中西近代法文化冲突.张培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张晋藩.法律出版社,1997
唐律与中国现行刑法比较论.钱大群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

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等,1950—1960
简明中国思想史.杨荣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
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侯外庐.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1981
中国思想发展史.何兆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思想史.张岂之.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
新编中国思想史.史仲文等.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国思想史.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人民出版社,1979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东方出版社,1987
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人民出版社,1998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于化民,胡哲峰.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李占才.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李慈健等.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李明山,左玉河.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史.秦英君.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程凯.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翁有为等.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当代中国统战思想史.蒋建农等.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谢益显.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近代中国思想史略论.陈少明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杰出人物与中国思想史.徐雁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中国哲学史稿.孙叔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方克立.人民出版社,1982
先秦儒学.钱逊.齐鲁书社,1982
宋明理学史.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84;1987
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蒙培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宋明理学研究.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宋明理学.陈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中国文化史要论.蔡尚思.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中国文化史新论:关于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何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文化史概要.谭家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中国文化史稿.刘蕙孙.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中国史前文化.蔡凤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中华文化史.冯天瑜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文化史.胡世庆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简明中国文化史.吴荣政等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文化史图鉴.吴方撰文,齐吉祥配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
中国文化史.张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中国文化史(英文版).郭尚兴等.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文化史纲.陈寒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文化史纲.冯天瑜.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文化史.郭尚兴等.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文化史纲要.季芳桐.兵器工业出版社,1997
中国文化史述.刘蕙孙.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中国文化厄史.萧放.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中国文化史.裘士京等.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
中国文化史.陈登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中国文化史.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等.人民教育出版社等,1998
中华文化通志.萧克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史编委会.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1994
中华文明简史.王炜民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文明史.启良.花城出版社,2001
千秋光华:中华文明史专题研究.苏开华等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中国古代文化史.阴法鲁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张崇琛.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古代文化史.魏向东.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
先秦文化史.李福泉.岳麓书社,1996
秦物质文化史.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三秦出版社,1994
秦汉文化史.韩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汉唐文化史.熊铁基.湖南出版社,1992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万绳楠.黄山书社,1989
隋唐文化史.赵文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宋代文化史.姚瀛艇等.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北宋文化史述论.陈植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两宋文化史研究.杨渭生.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明清文化史散论.冯天瑜.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晚清文化史稿.陶绪.湖南出版社,1996
中华民国文化史.史全生.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论.汪澍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中国现代文化史略.傅长禄.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抗日战争文化史(1937—1945).肖效钦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张顺清等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中西文化交流史.沈福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何芳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中日文化交流史话.王晓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商务印书馆,1996
方言与中国文化.周振鹤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禅宗与中国文化.葛兆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道教与中国文化.葛兆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楚文化史.张正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彝族文化史.马学良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中华酒文化史.田久川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的佛教.潘桂明.商务印书馆,1991
中国的伊斯兰教.秦惠彬.商务印书馆,1991
中国的基督教.周燮番.商务印书馆,1991
中国人留学史话.吴霓.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余秋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工艺美术史.田自秉.东方出版中心,1985
清代饮食文化研究.林永匡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王玉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佟柱臣.巴蜀书社,1991
云南文化史.马继孔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东北俗文化史.隋书今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
临川文化史.罗传奇等编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中国性文化史.石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园林史.任常泰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中国文化史观.谭元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2002(二版)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李德洙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侠文化史.曹正文.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中国医学文化史.马伯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西域文化史.余太山主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

长江文化史.李学勤等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淮扬饮食文化史.章仪明主编.青岛出版社,1995
福建思想文化史纲.徐晓望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福建宗教史.陈支平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中国梦文化史.杨健民.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中国军事伦理文化史.顾智明.海潮出版社,1997
怒族文化史.陶天麟.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闽台文化交融史.林仁川等.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林金水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中华书文化史话.黄镇伟.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中国传统雕塑.顾森.商务印书馆,1997
中国的印章与篆刻.王志敏等.商务印书馆,1997
中国酒文化史话.蔡尚思主编.黄山书社,1997
汉唐佛寺文化史.张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汉唐饮食文化史.黎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银川文化史.张复兴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常金仓.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法门寺文化史.韩金科.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
中国术数文化史.宋会群.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货币文化史.马社香.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杨向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宜兴紫砂文化史.刘汝醴等.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沈福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中国运河文化史.安作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中国审美文化史.陈炎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古代复仇面面观.周天游.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交通与古代社会.王子今.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科技与古代社会.董英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彭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经君健.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唐力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近代人口史.姜涛.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侯杰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宗族.冯尔康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邓伟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传统社会心态.陆震.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的社与会.陈宝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17 世纪江南社会生活.钱杭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近代流民.池子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罗苏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技术社会史引论.姜振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两汉乡村社会史.马新.齐鲁书社,1997
性的社会史.潘绥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熊志勇.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份.史风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游子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关文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漕运与古代社会.陈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明清小说中的社会史.王日根.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中国近代社会史.乔志强.人民出版社,1992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张静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张静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徐永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 年的山东农村.张佩国.齐鲁书社,2000

中国古代服饰风俗.周汛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严昌洪.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吕一飞.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辽代契丹习俗史.张国庆等.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
中国古代汉族的节日风情.朱启新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国少数民族节日与风情.徐万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杨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媒妁史.方川.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中国古代汉族婚丧风俗.李仲祥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国少数民族婚丧风俗.严汝娴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国古代丧葬习俗.周苏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丧葬礼俗.徐吉军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丧葬史.徐吉军.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封建家礼.李晓东.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家庭礼仪习俗.强钰等.湖南出版社,1991
原始习俗与宗教信仰.程德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中国善恶报应习俗.刘道超.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民间风俗志.高丙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壮族风俗志.梁庭望.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布依族风俗志.汛河.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毛南族风俗志.蒙国荣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高山族风俗志.许良国.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侗族历史文化习俗.王胜先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畲族风俗志.施联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土家族风俗志.杨昌鑫.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撒拉族风俗志.马学义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东乡族风俗志.马自祥.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水摆夷风土记.姚荷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越裔遗俗新探.王胜先.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蒙古族风俗志.王迅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祈生与御死:哈尼族原始习俗寻踪.杨万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

达斡尔族风俗志.巴图宝音.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满族风俗志.王宏刚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清代满族风俗史.杨英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鄂伦春族风俗志.韩有峰.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志.杨知勇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赫哲族风俗志.黄任远.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彝族风俗志.巴莫阿依嫫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普米族风俗志.殷海涛.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基诺族风俗志.陈平.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京族风俗志.符达升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仫佬族风俗志.罗日泽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裕固族风俗志.才让丹珍.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锡伯族风俗志.贺灵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佤族风俗志.赵富荣.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傈僳族风俗志.斯琴高娃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锡伯族风俗志.贺灵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傣族风俗志.胡绍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裕固族民俗文化研究.贺卫光等.民族出版社,2000

中国灾荒史(1927—1937).张水良.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李文海等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灾荒与饥馑(1840—1919).李文海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李文海等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中国:世纪大灾变.朱幼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李文海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高文学主编.地震出版社,1997
三千年天灾.邱国珍.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三千年疫情.张建光.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中国灾荒史记.孟昭华.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钱钢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百年中国史话——灾荒史话.刘仰东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夏明方等.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中国救灾史.李向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减灾史话.高建国.大象出版社,1999
中国自然灾害史与救灾史.范宝俊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清代荒政研究.李向军.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夏明方.中华书局,2000

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冯家昇.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
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陈遵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13、14 世纪中国民间数学.李俨.科学出版社,1957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秀民.人民出版社,1958
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侯仁之.科学出版社,1962
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工程发明史.刘仙洲.科学出版社,1963
中国数学史.钱宝琮.科学出版社,1964
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张子高主编.科学出版社,1964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杜石然等.科学出版社,1982
中国古代科学史纲.卢嘉锡等主编.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路甬祥总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2000
发明的国度:中国科技史.周瀚光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农学史(初稿).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科学出版社,1984
中国数学通史:上古到五代卷.李迪.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中国数学通史:宋元卷.李迪.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数学通史:明清卷.李迪.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中国地理学史:清代.赵荣等.商务印书馆,1998
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王成组.商务印书馆,2005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黄光壁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20 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杨德才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陈建新等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彝族天文学史.陈久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回回天文学史研究.陈久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贵州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陈久金.贵州科技出版社,1999
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陈久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中国科技教育史.汝莉等.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中国科技批评史.亚宗.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中国少数民族.黄华.上海群众书店,1950
西北回族革命简史.马宵石.上海东方书社,1951
黑龙江边兴安岭的鄂伦春民族.杨英杰.东北人民出版社,1952
维吾尔族史略.郭应德.上海东方书社,1952
西北少数民族.樊圃.新知识出版社,1955
广西僮族简史.黄现璠.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
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白寿彝.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回回民族.丁毅民.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
周秦少数民族研究.蒙文通.龙门联合书局,1958
中国民族志.胡耐安.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
中国边疆民族简史.周昆田.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
中国边疆民族史.刘义棠.台湾中华书局,1969
中国民族史新编.徐杰舜.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
中国民族史.江应梁主编.民族出版社,1990
中华民族史初探.陈连开.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
中国民族史.王钟翰主编.中国科学出版社,1994
中华民族发展简史.张鑫昌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民族史研究.尤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中国民族史纲要.陈连开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中华民族发展史.田晓柚.华夏出版社,2001
中华民族史.萧君和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编写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西北民族关系史.杨建新等.民族出版社,1990
中南民族关系史.张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中南民族关系史.吴永章等.民族出版社,1992
新疆民族关系史.尹筑光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云南民族关系简史.杨德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邓锐龄.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黄玉生等.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王辅仁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蒙藏关系史研究.樊保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发展.黄佩谨.齐鲁书社,1991
宋夏关系史.李华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杜建录.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清代民族关系史.杨学琛.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侯绍庄等.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黄光学等.鹭江出版社,1999
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吕光天.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
东北民族史略.傅朗云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干志耿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西南民族史.尤中.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杨建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中国中南民族史.张雄.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河南少数民族史稿.马迎洲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湖北民族史.吴永章.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
贵州古代民族史.侯绍庄.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甘肃民族源流.胡国兴.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
云南民族史研究.周廷贤.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
东北民族史纲.蒋秀松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中国北方民族史.高路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
西北民族史研究.周伟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刘迎胜.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南方民族史.王文光.民族出版社,1999
东北古代民族.张博泉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

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达力扎布.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

云南跨境民族研究.赵廷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西南民族史研究.杨铭.重庆出版社,2000

通俗新疆史.钱伯泉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民国新疆史.陈慧生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20 世纪新疆史研究.朱培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壮族通史.黄现璠等.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

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苏建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

壮族通史.张声震.民族出版社,1997

傣族史.江应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彝族史稿.方国瑜.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羌族史.冉光荣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畲族史稿.蒋炳钊.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满族发展史初编.滕绍箴.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满族通史.李燕光等.辽宁民族出版社,1991

苗族史.伍新福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中国苗族通史.伍新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

锡伯族史.贺灵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瑶族史.吴永章.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纳西族史.郭大烈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布依族史.黄义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蒙古族通史.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民族出版社,1991;2001(修订本)

蒙古民族通史.乌云毕力格等.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蒙古民族通史.义都合西格主编.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藏族史要.辅仁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藏族史略.黄奋生.民族出版社,1985

明代藏族史研究.尹伟先.民族出版社,2000

安多藏族史略.黎宗华等.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

嘉绒藏族史志.雀丹.民族出版社,1995

青海藏族史.陈光国.青海民族出版社,1997
中国回族史.邱树森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云南回族史.编写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云南回族史.杨兆钧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二版)
陕西回族史.穆罕默德·阿里·冯福宽.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天水回族史略.吴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契丹史略.张正明.中华书局,1979
敕勒与柔然.周伟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楚国民族述略.顾铁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丁零民族史.王日蔚.甘肃省图书馆,1985
匈奴通史.林幹.人民出版社,1986
喀喇汗王朝史稿.魏良弢.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吐谷浑族考证.张一纯.甘肃省图书馆,1986
女真史.孙进己等.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突厥史.林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丁零、高车与铁勒.段连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百越民族史.陈国强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党项族史研究.白滨.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东胡史.林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瓦剌史.白翠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突厥史.薛宗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林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古代藏缅与民族源流研究.万永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氐羌源流史.何光岳.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中国经济史.黎世衡.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中国经济史.许坛.台北世界书局,1970
简明中国经济通史.郑学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简明中国经济史.孔经纬.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
新编中国经济史.孔经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经济史.贺耀敏.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经济简史.贺润坤.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汤明檖.中州书画社,1982
中国古代经济史.余也非.重庆出版社,1991
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李剑农.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古代经济史.齐涛.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李根蟠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中国封建经济史述略.孔经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5卷).傅筑夫.人民出版社,1981—1989
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李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彭雨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田昌五等.齐鲁书社等,1996
先秦两汉经济史稿.李剑农.北京三联书店,1957;中华书局,1962
三国经济史.余鹏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李剑农.北京三联书店,1959;中华书局,1963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新探.张尚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胡如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宋元明经济史稿.李剑农.北京三联书店,1957
宋元经济史.王志瑞.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
宋代经济史研究.吴晓亮.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宋代经济史(2册).漆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乔幼梅.齐鲁书社,1995
辽夏金经济史.漆侠等.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
西夏经济史研究.杜建录.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中国经济史略:明清至抗战前.孔经纬.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秦佩珩.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明清经济史.李龙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清代经济史简编(1644—1840).郭蕴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清代经济史研究.吴量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吴杰.人民出版社,1958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

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写组.人民出版社,1978

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纲.孔经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近代经济史.凌耀伦等.重庆出版社,1982

中国近代经济史稿(1840—1927).王方中.北京出版社,1982

中国近代经济史.于素云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近代经济简史.陈绍闻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近代经济史纲.魏永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蒋建平.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孙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近代经济史.聂希斌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国近代经济史.蔡行秀等.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近代经济史.赵金鹏等.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

中国近代经济史.乔培华等.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纲.蒋立文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郭化光等.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刘佛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现代经济史(1919—1949).董长芝等.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现代经济史.黎惠英.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民国社会经济史.陆仰渊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1927—1937).赵效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中央苏区经济史.余伯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柳随年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1949—1985).李德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赵德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赵德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89).曾璧钧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陈昌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当代经济史.李炳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孙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朱培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1949—1995).张奕曾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奠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五十年.刘仲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50年(1949—1999).曾培炎.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李宗植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武力.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苏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册).董辅礽.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史(1949—1998).丛树海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5—1991).赵德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国经济思想史(3册).胡寄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981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3册).叶世昌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1983
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胡寄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史组.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经济思想史.朱家桢.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经济思想史.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4卷).赵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
先秦两汉经济思想史略.王沺琮等.海洋出版社,1991
先秦经济思想史.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3册).赵靖等.中华书局,1964—1966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赵靖等.中华书局,1980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侯厚吉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1984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胡寄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简史.姚家华.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3册).马伯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992
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张问敏.人民出版社,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胡寄窗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李占才,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历史地理学.陈芳慧.台湾大中国图书公司,1977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侯仁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马正林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历史地理(上、下册).张步天.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1988

中国历史地理要籍介绍.杨正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靳生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地理学发展史.鞠继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史念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历史地理简编.陈昌远.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历史地理学概论.张步天.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历史地理.施和金.南京出版社,1993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邹逸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1999

历史地理学四论.侯仁之.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中国历史地理学.李恩军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

中国历史地理.韩滨娜.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中国历史地理论纲.张全明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中国历史地理.陈代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施和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尤中.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方国瑜.中华书局,1987

西域历史地理.孙北海.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

东北历史地理.孙进己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马正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上海市沿革地理.祝鹏.学林出版社,1989

山西历史政要地理.张纪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宁夏历史地理考.鲁人勇等.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尹钧科.北京出版社,1994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侯仁之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内蒙古历史地理.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疆域史.刘宏煊.武汉出版社,1996

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葛剑雄.商务印书馆,1997

中国古代疆域史纲.安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张明庚等.华侨出版社,1996

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吴必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东北历史地理研究.冯季昌.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

开封历史地理.李长傅.商务印书馆,1958

商代地理概论.郑杰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史念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黄河变迁史.岑仲勉.人民出版社,1957

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文焕然.商务印书馆,1959

大运河的变迁.绍华.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

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史念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韩昭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王妙发.知识出版社,1999

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李心纯.人民出版社,1999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鲁西奇.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古代方志考.张图涂.中华书局,1962

浙江地方志考录.洪焕椿.科学出版社,1958

地理文献浅论.徐近之.商务印书馆,1962

世界史

世界通史(3 册).周谷城.商务印书馆,1949;1958(二版)

新编世界史(上册).周庆基.上海自由出版社,1953;1954(三版)

新编世界史(下册).周庆基.上海自由出版社,1954

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齐思和分册主编.人民出版社,1962;1973(二版);1980

世界通史(中古部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朱寰分册主编.人民出版社,1962;1972(二版);1980

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杨生茂分册主编.人民出版社,1962;1972(二版)

简明世界通史(上下册).李纯武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世界史:古代史.崔连仲主编.人民出版社,1983

世界史:中世纪史.刘明翰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

世界史:近代史.刘祚昌主编.人民出版社,1984

世界通史纲要(古代部分).熊家利.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世界通史纲要(近代部分).姜德昌等.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世界通史纲要(现代部分).任众等.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世界史·古代史编(上下卷).吴于廑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世界史·现代史编(上下卷).吴于廑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世界通史(6册).崔连仲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97

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齐涛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齐涛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世界通史教程:现代卷.齐涛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简明世界通史.齐涛主编.泰山出版社,2000

世界通史全编(20册).冯克诚等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世界古代史简编.郭圣铭.群联出版社,1955

古代世界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及中世纪史教研室古代史组.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世界上古史.刘家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世界古代史.邓炎熙等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世界古代史.田德全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000(二版)

新编世界古代史(30册).史仲文等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世界古代史.童自觉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世界中世纪讲义.齐思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世界中古史.朱寰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新编世界中世史(上、下编).张盛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世界历史:中古部分.马克垚.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新编世界中古史.蒋国维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西洋近代史纲.林举岱.上海杂志公司,1949

简明世界近代史.沈炼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世界近代史讲义(3册).林学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8—1959

世界近代史.上册.吉林师范大学等.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

世界近代史(上下册).上海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编写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974

世界近代史.林举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世界近代史(上下册).四川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编写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世界近代史(上下册).彭树智.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

世界近代史.骆永林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世界近代史纲要.杨云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世界近代史.吴家振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世界近代史.王洪慈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

世界近代史.管敬绪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世界近代史.刘宗绪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999(二版)

世界近代史.潘润涵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世界现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二版);1963(三版)

世界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编写组.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

世界现代史.王贵正.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世界现代史.吴继德等.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世界现代史.唐仕润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世界现代史.王斯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世界现代史(上下册).王开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世界现代史.卢文璞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现代世界史简编.叶伯华等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世界现代史.李茂梓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
世界现代史.李世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0 世纪世界史(上下卷).李植枬.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20 世纪世界通鉴.萧洪.广州出版社,1998
战后世界史.戴志先.湖南大学出版社,1985
当代世界史.高明振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当代世界史简编.陈英吴等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当代世界史(1945—1987).徐天新等.人民出版社,1989
当代世界史.吴继德等.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
当代世界史(1945—1990).沈学善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当代世界史(1945—1992).徐天新等.人民出版社,1993
世界当代史(1945—1993).段炳麟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当代世界史(1945—1993).吴继德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战后世界史(1945—1991).金重远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美国简明史.黄绍湘.三联书店,1953
美国早期发展史(1492—1823).黄绍湘.人民出版社,1957
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人民出版社,1979
美国史纲(1492—1823).黄绍湘.重庆出版社,1987
战后美国史(1945—1986).刘绪贻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
20 世纪美国史.黄安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英国简史.程西筠等.商务印书馆,1981
英国史.蒋孟引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995(二版)
法国通史.张芝联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德国简史.张炳杰.商务印书馆,1979
德国通史简编.丁建宏等主编.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俄国通史简编.孙成木等.人民出版社,1986
苏联现代史(1917—1945).张义德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俄国史稿.徐景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新编苏联史(1917—1985).周尚文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苏联兴亡史.周尚文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苏联史纲(1917—1937).陈之骅主编.人民出版社,1991
苏联史纲(1953—1964).陈之骅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
日本近代史.万峰.人民出版社,1979;1981(二版)
简明日本古代史.王金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简明日本近代史.吕万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日本通史.赵建民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西欧简史.汪异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
欧洲史论.王党.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欧洲五百年史.王觉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芬兰史(3册).刘绪贻.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
西班牙简史.张德政.商务印书馆,1984
意大利统一史.赵克毅.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意大利近代史.辛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波兰通史简编.刘祖熙.人民出版社,1988
古代罗马史.于贵信.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罗马史纲要.杨共乐.东方出版社,1994
古代希腊史.李天祜.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
希腊近代史.杨公素.商务印书馆,1997
澳大利亚民族志.阮西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澳大利亚建国史.骆介子.商务印书馆,1991
澳大利亚史.郑演达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澳洲史.张大.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澳大利亚联邦史略.姜天明.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美洲印第安人史略.刘明翰.三联书店,1982
拉丁美洲史稿.李春辉.商务印书馆,1983
拉丁美洲国家史纲.李春辉.商务印书馆,1993
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史.徐世澄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美洲史论.罗荣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巴西.丁西.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墨西哥简史.拉枚,华建.商务印书馆 1978
阿根廷简史.田森.商务印书馆,1984
加拿大民族志.阮西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加拿大通史简编.张友伦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非洲通史.非洲通史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 1918 年.杨人楩.人民出版社,1984
非洲史教程.陆庭恩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殖民主义史·非洲卷.郑家馨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埃及近代简史.纳忠.三联书店,1963
埃及近代史.杨灏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古代埃及史.周启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古代埃及史.刘文鹏.商务印书馆,2000
扎伊尔简史.赵淑慧.商务印书馆,1981
尼日尔简史.郇心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亚洲各国史.朱杰勤.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
亚洲通史.顾学宏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中亚史(第一卷).王治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中亚史纲.王治来.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中亚近代史(16—19 世纪).王治来.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东欧中亚列国志.金挥主编.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
中亚五国史纲.马大正等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东南亚简史.刘迪辉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梁英明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东南亚史纲.王民同.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贺圣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东南亚近代史.余定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梁志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殖民主义史·南亚卷.林承节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中东简史.刘绪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战后中东史.姜桂石主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

阿拉伯史纲(610—1945).郭应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阿拉伯国家简史.彭树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阿拉伯通史.纳忠.商务印书馆,1997

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王铁铮等.商务印书馆,2000

印度尼西亚简史.黎国彬.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印度尼西亚简史.厦门大学历史系《印度尼西亚简史》编写组.商务印书馆,1978

印度尼西亚古代史.王任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印度尼西亚历史.周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王任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印度简史.季羡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印度通史.培伦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印度古代社会史.刘欣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简明印度史.华东师范大学《简明印度史》编写组.湖南出版社,1991

印度近现代史.林承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印度史:从莫卧儿帝国到印度独立.李文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印度古代史纲.林承节.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菲律宾史稿.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商务印书馆,1977

菲律宾史.金应熙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新加坡简史.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新加简史》编写组.商务印书馆,1978

缅甸简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缅甸简史》编写组.商务印书馆,1979

缅甸史.贺圣达.人民出版社,1992

老挝简史.张凤岐.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0

老挝史.申旭.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

马来西亚简史.钱文宝等.商务印书馆,1981

泰国简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泰国简史》编写组.商务印书馆,1984

泰国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朝鲜简史.朴真奭等.延边教育出版社,1986

朝鲜近代史(1863—1919).曹中屏.东方出版社,1993

喀喇汗王朝史稿.魏良弢.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柬埔寨两千年史.陈显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尼泊尔民族志.王宏纬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土耳其现代史.杨兆钧.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
犹太通史.张文建.商务印书馆,1993
越南通史.戴何来.商务印书馆,1993
阿富汗史.彭树智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
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彭树智等.商务印书馆,2000

后　　记

本书为周一平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研究项目《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研究》(05JJD770108)的最终成果的修改稿。2010年完成180余万字初稿,2011年修改为150余万字结项稿,2015年再修改为120余万字出版稿。出版稿较结项稿的主要不同是,删去了两个附录:《中国高校学科建设的新面貌》、《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发展》,各章节进行了一些删削、修改,其中第四章《考古新成就》删削最多。修改过程中并不只是压缩,也增补了一些新资料、新观点。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研究","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史",从理论上说,应该对20世纪后半期整个中国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中国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进行研究,包括对台湾、香港、澳门的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各个分支学科都进行研究,但在实际的操作上,这是不易做到的。本书论述的只是中国大陆史学的一些主要学科研究的发展。台湾、香港、澳门的史学研究,原本已请一位台湾学者负责研究、撰写,他已答应,但最终没有交稿,现在的书中只是略有涉及,很是遗憾。好在台湾、香港的史学研究已有专著可以参考,如:王晴佳《台湾史学五十年(1950—2000)》(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高明士等《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2004年版)、周佳荣等主编《当代香港史学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等。本书的诸多不足、缺失,只有以后设法增补。

本书是集体成果,本书编写者的分工情况如下:

绪论——周一平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研究

　　一、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认识回归理性——周文玖初稿,周一平修改

二、史学理论研究走向独立发展——周文玖初稿，周一平修改

三、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大讨论——周一平

四、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论争——周一平

五、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争鸣——吕振宇初稿，周一平修改

六、“五朵金花”——中国古代社会五个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曹守亮初稿，周一平修改

第二章 史学史、史学批评史研究

一、中国史学史研究——周文玖初稿，周一平修改

二、西方史学史研究——李勇

三、史学批评及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周一平

第三章 大规模历史文献整理与出版

一、《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王嘉川撰写，张毅提供部分初稿

二、《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王嘉川撰写，刘文霞提供部分初稿

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王嘉川撰写，胡敏提供部分初稿

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及相关资料编纂——王嘉川撰写，李新冲提供部分初稿

五、中国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王嘉川撰写，周雷提供部分初稿

六、中国民族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王嘉川撰写，黄蕾提供部分初稿

第四章 考古新成就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王嘉川撰写，张强提供部分初稿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王嘉川撰写，刘荣提供部分初稿

三、夏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王嘉川撰写，黄信远提供部分初稿

四、安阳殷墟考古的新进展——王嘉川撰写，王维佳提供部分初稿

五、西周考古的新发现——王嘉川撰写，杨润含提供部分初稿

六、春秋考古的新突破——王嘉川撰写，冯雪提供部分初稿

七、战国文物的大量出土——王嘉川撰写，刘春红提供部分初稿

八、“世界第八大奇迹”——秦陵兵马俑——王嘉川撰写，狄三峰提供部分初稿

九、秦汉以后历史遗迹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王嘉川撰写，吕振宇提供

部分初稿

十、简帛出土与历史研究——王嘉川撰写，李晋提供部分初稿

十一、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王嘉川撰写，俞英杰提供部分初稿

第五章　中国通史编纂——王嘉川撰写，王莎、刘荣、吕振宇提供部分初稿

第六章　中国断代史研究

一、先秦史研究——王嘉川撰写，狄三峰提供部分初稿

二、秦汉史研究——王嘉川撰写，张毅提供部分初稿

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王嘉川撰写，张毅提供部分初稿

四、隋唐五代史研究——王嘉川撰写，李晋提供部分初稿

五、宋史研究——王嘉川撰写，李晋提供部分初稿

六、辽西夏金元史研究——王嘉川撰写，吕振宇提供部分初稿

七、明清史研究——王嘉川撰写，胡敏、狄三峰提供部分初稿

八、中国近代史研究——周一平撰写，王毅提供部分初稿

九、中华民国史研究——周一平撰写，肖薇提供部分初稿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周一平撰写，赵艳提供部分初稿

第七章　中国专史研究

一、中国政治史研究——周一平撰写，许曾会、陈秀利提供部分初稿

二、中国法制史研究——周一平撰写，张雷、刘荣提供部分初稿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周一平撰写，梁文慧提供部分初稿

四、中国文化史研究——周一平撰写，张毅、孙金珠提供部分初稿

五、中国社会史研究——周一平撰写，刘荣提供部分初稿

六、中国风俗史研究——周一平撰写，刘春红提供部分初稿

七、中国灾荒史研究——周一平撰写，冯雪提供部分初稿

八、中国科技史研究——周一平撰写，狄三峰提供部分初稿

九、中国民族史研究——周一平撰写，朱丽丽提供部分初稿

十、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周一平

第八章　外国史研究——李勇撰写，焦帅、付灵灵提供部分初稿

第九章　经验、教训和前景——周一平

附录：参考文献简目——沈茶英

全书由周一平通稿。

在此对参加本项目、本书稿工作的所有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本项目、本书稿工作,自始至终得到瞿林东教授的指导、帮助,也得到罗炳良、张越教授的指导、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书稿出自众人之手,写作的风格、文字略有差异,敬请学术界鉴谅。

本人从1974—1988年在历史学领域进行着学习、研究、教学。在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出过一点成果,如著作《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等。而1988年下半年以后,转向了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共党史领域本应是隶属于历史学领域,但实际上却与政治学关系很深,于是我似乎就离开了历史学界。从1988—2004年,在历史学界淡出后,却在中共党史学界出了不少中共党史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成果,而且得到中共党史学界的承认,如《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学》等成了一些高校研究生的教材。2004年下半年,为了帮助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申报博士点,从华东师范大学来到扬州大学。2005年一方面协助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申报成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博士点,另一方面又协助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申报成功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硕士点,以后又协助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申报成功了中国史一级博士点。因为要主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硕士点,不得不重回历史学界,在从事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史学理论研究教学的同时又重新从事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的研究、教学。先是开始参加全国性的史学史、史学理论会议。接着又在多所高校的教授支持下,成功申报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研究"项目。

在十多年后重回历史学界,发现变化太大了。原来著名的第一代老师辈的学者大多去世,第二代师辈学者也多退休,甚至同辈学者中也有退休的。代之而起的是一大批风华正茂、年轻有为的学者,其中有不少同辈学者,也有不少学生辈,乃至徒孙辈的学者。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成果已极大丰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十多年后重新看史学史、史学理论界乎!有惊喜感,有坐不住感,有陌生感,有亲近感。

由本人来主持"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研究"项目并编写本书,既是老手又是新兵,既熟悉又陌生,大概有短处,也有长处。短处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及80年代、90年代的重要史学活动,基本没有参与,要重新搜集资料,重新了解,重新

研究。长处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可以超脱一些，可以更旁观些，更客观些来重新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也许可以识得某些庐山真面目，也可以集众家之长，集各种观点、理论之长。同时，50年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显然应包括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这是以往史学史界忽视的，而这是本人的强项，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扬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史的研究中。

本书离中外学术界的要求、期望，会有很大距离，之所以出版，就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批评、指正、增补，以便本书进一步修订、完善。

周一平

2015年孟秋

2017年1月至2月，校阅了三校样，在校阅的过程中，又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新的思考，同时删了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内容。

周一平

2017年孟春